

目录

[導讀 重新帶回國家 13](#_Toc54533202)

[一 13](#_Toc54533203)

[二 15](#_Toc54533204)

[三 15](#_Toc54533205)

[四 16](#_Toc54533206)

[序言 19](#_Toc54533207)

[第一部分 國家之前 23](#_Toc54533208)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23](#_Toc54533209)

[政治焦慮 23](#_Toc54533210)

[政治衰敗 24](#_Toc54533211)

[無政府幻想 26](#_Toc54533212)

[達到丹麥 27](#_Toc54533213)

[中國第一 29](#_Toc54533214)

[底下無數龜 31](#_Toc54533215)

[第2章 自然狀態 32](#_Toc54533216)

[黑猩猩政治與人類政治發展的關系 34](#_Toc54533217)

[唯獨人類 35](#_Toc54533218)

[紅臉野獸 37](#_Toc54533219)

[尋求承認的斗爭 38](#_Toc54533220)

[政治發展的基礎 39](#_Toc54533221)

[進化與遷移 40](#_Toc54533222)

[第3章 表親的專橫 41](#_Toc54533223)

[史前階段 42](#_Toc54533224)

[家庭和族團層次的組織 42](#_Toc54533225)

[從族團到部落 43](#_Toc54533226)

[祖先和宗教 45](#_Toc54533227)

[宗教和權力 46](#_Toc54533228)

[第4章 部落社會的財產、正義、戰爭 46](#_Toc54533229)

[親戚關系和私人財產 47](#_Toc54533230)

[法律和正義 48](#_Toc54533231)

[戰爭和軍事組織 49](#_Toc54533232)

[從部落制到保護人—依附者和政治機器 52](#_Toc54533233)

[第5章 “利維坦”的降臨 53](#_Toc54533234)

[國家形成的理論 53](#_Toc54533235)

[國家為何不是普世共有？ 57](#_Toc54533236)

[第二部分 國家建設 60](#_Toc54533237)

[第6章 中國的部落制 60](#_Toc54533238)

[部落的中國 61](#_Toc54533239)

[中國的家庭和親戚關系 61](#_Toc54533240)

[中國的“封建”時期 63](#_Toc54533241)

[第7章 戰爭和中國國家的興起 64](#_Toc54533242)

[戰爭與國家建設 65](#_Toc54533243)

[持續戰爭帶來的制度改革 65](#_Toc54533244)

[商鞅的反家庭運動 67](#_Toc54533245)

[儒家與法家 68](#_Toc54533246)

[中國發展路徑為何異于歐洲 70](#_Toc54533247)

[多種現代化 71](#_Toc54533248)

[第8章 偉大的漢朝制度 71](#_Toc54533249)

[秦朝國家和崩潰 72](#_Toc54533250)

[漢朝政府的性質 73](#_Toc54533251)

[第9章 政治衰敗和家族政府的復辟 75](#_Toc54533252)

[富人更富 76](#_Toc54533253)

[國家分裂和家族制復辟 77](#_Toc54533254)

[強大的中國國家 78](#_Toc54533255)

[第10章 印度的彎路 79](#_Toc54533256)

[印度部落社會 80](#_Toc54533257)

[印度家庭和親戚關系 81](#_Toc54533258)

[過渡到國家 82](#_Toc54533259)

[彎路 83](#_Toc54533260)

[第11章 瓦爾納和迦提 84](#_Toc54533261)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85](#_Toc54533262)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86](#_Toc54533263)

[第12章 印度政體的弱點 89](#_Toc54533264)

[孔雀帝國：何等國家？ 90](#_Toc54533265)

[社會戰勝政治 93](#_Toc54533266)

[外國人的國家建設 93](#_Toc54533267)

[中國和印度 94](#_Toc54533268)

[第13章 軍事奴隸制與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95](#_Toc54533269)

[創建穆斯林國家 96](#_Toc54533270)

[軍事奴隸制的起源 98](#_Toc54533271)

[第14章 馬穆魯克挽救伊斯蘭教 101](#_Toc54533272)

[馬穆魯克的衰退 105](#_Toc54533273)

[作為犯罪集團的國家 106](#_Toc54533274)

[第15章 奧斯曼帝國的運作和衰退 107](#_Toc54533275)

[僅一代的貴族 108](#_Toc54533276)

[完善軍事奴隸制 110](#_Toc54533277)

[作為治理機構的奧斯曼國家 110](#_Toc54533278)

[家族制的復辟和衰敗 112](#_Toc54533279)

[奧斯曼帝國的遺產 113](#_Toc54533280)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觀念 114](#_Toc54533281)

[例外的歐洲 114](#_Toc54533282)

[馬克思的錯誤 115](#_Toc54533283)

[從身份到契約 115](#_Toc54533284)

[歐洲建國的社會背景 118](#_Toc54533285)

[第三部分 法治 121](#_Toc54533286)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121](#_Toc54533287)

[法治的現代迷惑 121](#_Toc54533288)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論 123](#_Toc54533289)

[從慣例法到普通法 124](#_Toc54533290)

[第18章 教會變為國家 127](#_Toc54533291)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 128](#_Toc54533292)

[羅馬法的再現 129](#_Toc54533293)

[法律和現代國家的興起 130](#_Toc54533294)

[中世紀教會為法治樹立先例 131](#_Toc54533295)

[第19章 國家變為教會 132](#_Toc54533296)

[中東的法治 133](#_Toc54533297)

[國家與清真寺的分離 134](#_Toc54533298)

[印度和伊斯蘭教的法治無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門 135](#_Toc54533299)

[西歐的法治為何較強 137](#_Toc54533300)

[第20章 東方專制主義 138](#_Toc54533301)

[唐宋過渡之后的中國現代化 138](#_Toc54533302)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則天 140](#_Toc54533303)

[天命 141](#_Toc54533304)

[第21章 “坐寇” 143](#_Toc54533305)

[好政府，壞政府 145](#_Toc54533306)

[“壞皇帝”的問題 146](#_Toc54533307)

[光有制度還不夠 147](#_Toc54533308)

[第四部分 負責制政府 150](#_Toc54533309)

[第22章 政治負責制的興起 150](#_Toc54533310)

[姍姍來遲的歐洲建國 150](#_Toc54533311)

[向平等進軍 151](#_Toc54533312)

[僅了解一個國家等于不懂國家 152](#_Toc54533313)

[歐洲的東周時期 152](#_Toc54533314)

[法律在歐洲發展中的作用 153](#_Toc54533315)

[國家建設的架構 154](#_Toc54533316)

[第23章 尋租者 155](#_Toc54533317)

[家族專制主義的起點 156](#_Toc54533318)

[總督和中央集權 158](#_Toc54533319)

[中央集權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159](#_Toc54533320)

[抵抗法國專制主義的失敗 161](#_Toc54533321)

[尋租的社會 162](#_Toc54533322)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163](#_Toc54533323)

[破產的西班牙國家 164](#_Toc54533324)

[無代表仍納稅 166](#_Toc54533325)

[制度移植到新大陸 168](#_Toc54533326)

[大莊園的鐵律 169](#_Toc54533327)

[第25章 易北河以東 170](#_Toc54533328)

[主人和奴隸 171](#_Toc54533329)

[憲政主義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172](#_Toc54533330)

[自由和寡頭政治 175](#_Toc54533331)

[第26章 更完美的專制主義 176](#_Toc54533332)

[俄羅斯專制主義的來源 177](#_Toc54533333)

[自由選擇 180](#_Toc54533334)

[農奴所有者結成卡特爾（Cartel） 181](#_Toc54533335)

[彼得大帝之后 182](#_Toc54533336)

[專制主義完成 183](#_Toc54533337)

[第27章 征稅和代表權 183](#_Toc54533338)

[英國政治團結的根源 184](#_Toc54533339)

[自由城市和資產階級 187](#_Toc54533340)

[征稅斗爭 188](#_Toc54533341)

[光榮革命 189](#_Toc54533342)

[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191](#_Toc54533343)

[第28章 負責制或專制主義？ 191](#_Toc54533344)

[弱的專制主義 192](#_Toc54533345)

[強大的專制主義 193](#_Toc54533346)

[英國的結果為何不像匈牙利？ 194](#_Toc54533347)

[達到丹麥 195](#_Toc54533348)

[第五部分 邁向政治發展理論 198](#_Toc54533349)

[第29章 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 198](#_Toc54533350)

[政治的生物基礎 198](#_Toc54533351)

[思想作為原因 199](#_Toc54533352)

[政治發展的普遍機制 201](#_Toc54533353)

[處處是拱肩 202](#_Toc54533354)

[制度（機構）[15] 203](#_Toc54533355)

[政治衰敗 204](#_Toc54533356)

[暴力和功能失調的均衡 205](#_Toc54533357)

[第30章 政治發展的過去和現在 206](#_Toc54533358)

[托馬斯·馬爾薩斯 207](#_Toc54533359)

[馬爾薩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209](#_Toc54533360)

[當代條件下的發展 211](#_Toc54533361)

[現代發展的范例 214](#_Toc54533362)

[什么變了 215](#_Toc54533363)

[今天的負責制 216](#_Toc54533364)

[未來會怎樣 217](#_Toc54533365)

[參考文獻 219](#_Toc54533366)

[致謝 240](#_Toc54533367)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本譯叢獲理想國文化發展基金會贊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毛俊杰 譯

政治秩序的起源

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桂林·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11 by Francis Fukuyama 　　 Maps copyright © 2011 by Mark Nugen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Book Paradis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政治秩序的起源 : 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 (美)福山著 ; 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9（2015.12 重印）

書名原文: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495-5511-6

Ⅰ. ①政… Ⅱ. ①福… ②毛…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Ⅳ. ①D5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24314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發行熱線：010-64284815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　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635mm×965mm 1/16

印張：35.75　字數：476千字　圖片：39幅

2014年9月第2版 2015年12月第5次印刷

定價：88.00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 導讀 重新帶回國家

劉瑜

好的學術著作其實像偵探小說：作者提出一個懸念，然后拋出一個接一個的線索，在每一個線索上誘導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現的論據給它打上問號，直到最后的解釋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這樣一本“偵探小說”。為什么今天我們所見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現出如此之豐富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的起源何在？就這個引人入勝的問題，福山引領讀者進行了一場穿越時空、跨越學科的“追蹤”：從生物學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風貌的不同，從部落文明的特點到宗教的政治影響，從歷史發展的經濟基礎到各個社會不同群體的博弈縱橫，福山試圖把近年來生物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不同領域的知識進展整合到一個問題框架中來，在一團亂麻中找到政治發展的脈絡。

這顯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在一個學術日益專業化、精細化、技術化的時代，幾乎已經沒有學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氣勢磅礴的問題，更不用說就此寫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體的基礎上理解局部，從歷史全貌出發定位當代，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維方式，而不符合21世紀初的“學術范式”。但福山先生卻“偏向虎山行”——某種意義上，這不僅僅是挑戰，甚至可以說是挑釁：對從技術性細節出發理解我們所身處的世界這一可能性的質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問題而言，打開視野的廣度又是必然要求。顯然，如福山自己所說，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如此之多領域的專家，但是對不同領域權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該書從本質上而言不僅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無數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許福山在每一個領域都不能稱為專家，但一個學者的敏銳性和洞察力，從來就更多取決于他通過問題意識組織和提煉知識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知識本身的掌握。就串連龐雜的細節組織成一個“偵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沒有讓人失望。

## 一

提起福山，人們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歷史終結論”。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福山表達了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態，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爾喬亞則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這一觀點發表于冷戰結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視為西方取得冷戰勝利的宣言。當然，基于同樣的原因，它也被視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義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過去二十年來，福山先生的問題意識一直在慢慢轉向。從1995年的《信任：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到2004年的《國家建構》，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國》，再到最近出版的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個幾乎可以說“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漸浮現。甚至可以說，前面幾本書都是為最后這本書所做的準備工作，最后這本書構成了對前面幾本書的整合與深化。

在何種意義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構成對《歷史的終結》的“180度轉向”？與其說對同一個問題“新福山”給出了與“舊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說“新福山”所關注的是全新的問題。如果說觸動福山寫作《歷史的終結》的，根本上而言是“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終能夠征服世界”，那么觸動他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則是“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夠征服世界”。

從關注“同一性”走向關注“多樣性”，從關注“終結”走向關注“起源”，從關注“人性”走向關心“歷史”，這個問題意識的轉向顯然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而與過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發展緊密相關。在這二十年來，福山和我們一樣，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國落地生根的艱難：中東歐在轉型過程中的陣痛、非洲許多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種族和部落動員、美軍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艱難，乃至最近中東地區民主化過程中的動蕩與反復……固然，也有韓國、巴西、波蘭這樣相對成功的案例，但是這二十年的風云變幻，使得“西方的勝利”這樣的結論顯得過于輕率和樂觀。

那么，“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夠征服世界”？或者說，為什么今天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如此多樣？對這個問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福山的主要切入點是：國家建構。什么叫“國家建構”？沿著韋伯對國家的定義，福山將“國家建構”理解為政府的統治能力。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政府國防、征稅、官僚機構架構、維持社會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等能力。

客觀地說，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對政治發展的認識有三個維度：國家建構、法治和問責（他使用“問責”一詞，以囊括在民主制發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態，但就其當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編按：本書譯為“負責制”］）。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間的平衡，但在整本書中，福山對“國家建構”這個維度的格外強調是清晰可見的。

這首先體現在書的構架上。在整本書的三個核心內容部分，“國家建構”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遠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從內容上而言，福山對世界各國政治傳統分野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對其政治源頭“國家建構”成敗與早晚的分析。由于將“國家建構”視為政治發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對比較政治史的講述，刻意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也就是說，他不是把歐洲模式當做政治發展的“常規狀態”，把其他國家視為偶然的“變異”。相反，他在書中強調，“我把中國作為國家建構的原型，追問為何其他文明沒有復制這一模式”。（參見本書第24頁）將中國作為坐標的原點，是因為早在秦朝，“中國就獨自創造了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成功地發展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廣大的疆域與人口”。（參見本書第25頁）如果說“為什么他們沒能成為歐洲”是西方學者慣常的思考出發點，現在福山想掉過頭來問：“為什么我們沒有成為中國？”

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是因為它最早開始了“國家建構”進程。查爾斯·蒂利所說的“戰爭制造國家”，中國是最早最經典的例證：春秋戰國時期的幾百年征戰給當時的各地君主帶去“國家建構”壓力——唯有那些能夠最大程度軍事動員、控制和管理生產以及汲取社會資源的政權能夠“適者生存”。于是，集權最成功的秦國“脫穎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國家后將這一“秦國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

相比之下，印度從很早開始就是“弱國家”傳統——或許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國之間的戰爭從未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那種頻度和烈度，而且其國家建設的進程被婆羅門教的興起所阻截和壓制——根據該教的教義，宗教首領的權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領的權力。這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為今天印度的“強社會弱國家”、“強問責弱治理”的政治形態埋下了伏筆。

中東則像是一個“遲到”因而“發育不全”的中國。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中東的政治傳統長期是部落式的，伊斯蘭教在7世紀的興起給中東地區帶來“國家建構”的契機，之后埃及和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奴隸制則把這個國家建構過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國家建構時間上的“遲到”、宗教的“尚方寶劍”地位、最高權力繼承體制的缺乏以及軍事奴隸制對外來力量的依賴，使中東的這種國家建構從未達到過中國的高度。

歐洲的傳統則介于中國和印度之間，一方面，中世紀之后連年不斷的王朝征戰給歐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國家建構”壓力；另一方面，這種壓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經形成的法治傳統、教會和貴族勢力、城市經濟等制度環境。于是，集權的壓力與分權的傳統相互作用，形成了獨特的歐洲。

可見，對于“政治為何如此多樣”這個問題，除了開篇談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強調的是，各國在擺脫部落制和封建制過程中，政權與社會不同集團的力量對比與博弈，以及“國家建構”與法治、問責制之間的發展順序。換言之，在歷史的源頭，“國家建構”的成敗與時機是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第一推動力。

## 二

“國家建構”越成功越好嗎？顯然不是。在書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當國家建構與法治、問責構成平衡時，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才構成“現代政治的奇跡”。而“一個沒有法治和問責制的強國家相當于專制。它越現代和制度化，其專制就越有效”。 （參見本書第137頁）秦國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被其稱為“極權主義的原型”。

那么，為什么對政治發展的“國家建構”維度格外強調？與其說這是因為福山過去二十年有一個價值轉向，不如說他對現實形勢的判斷出現了變化。

現實形勢如何？在書中，福山時不時流露出這樣一種看法：就那些轉型中的國家而言，是國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過程常常成為失序化過程。即使是那些相對成熟的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機。“現代民主制的失敗有各種情況，但21世紀初這一失敗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國家能力的薄弱：當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腳和陷入僵局，因此無法作出困難的決定以確保其經濟與政治的長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設施建設的緩慢、歐洲福利國家的滯漲乃至美國赤字問題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國家能力欠缺的表現。

也就是說，現實政治形勢的演化使他越來越擔憂，在國家能力、法治和問責的“三角關系”中，人人過于強調前者對后二者的傷害，卻往往忽視國家能力同時往往也是建設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書中的努力，是試圖彌補這個認識上的盲點。換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對國家建構的強調，不是為了弘揚專制主義，而是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與民主。

基于對國家能力的強調，福山認為，過度宣揚經濟上的放任主義是對歷史和現實的誤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應該是索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實際上索馬里的經濟一團糟。

同樣，基于對國家能力的強調，他也對“社會放任主義”的觀念（姑且發明這個詞）進行了批評。我們今天習慣于把英國的憲政發展歸功于“教會”、“貴族”等社會性因素對王權的制衡，卻沒有足夠重視在這一過程中，英國社會并沒有失去對王權的尊重——它從未失去其保守主義的這一面。如果王權越軟弱、一個國家就越容易實現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實現民主和法治的，不應該是英國，而是匈牙利——13世紀初，匈牙利就產生了匈牙利版的“大憲章”，但是在匈牙利，貴族如此之強大，王權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體制演變成了“寡頭統治”。正如美國南部社會的種族主義、印度社會的種姓文化所展現的，“社會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進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帶來另一種形式的專制。

此外，福山還對沒有國家能力保障的“法治”發展表示質疑。他對哈耶克所說的“自發擴展秩序”表示異議：在他看來，法治在英國的生根不完全是“自發秩序自然演進”的結果，無論是早期的國王、后來的教會還是諾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權力，都曾相當大程度上訴諸自上而下的強制或干預去建立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

## 三

對“國家建構”如此強調，是否可以說，“新福山”已經否定了“舊福山”？“舊福山”二十年前的觀點已經“過期作廢”？

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你看，連福山都不談民主，轉而談論國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國，不少“國家主義者”為福山的問題意識轉向感到歡欣鼓舞。但對《起源》一書真正嚴肅的閱讀會使我們認識到，與其說福山試圖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歷史的終結》，不如說他試圖用《起源》去完善《終結》。

何以如此？福山與中國一些國家主義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對國家能力的強調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則性的。即，他對國家能力的強調不是基于一種抽象的觀念，而是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處方”。因為他認為，目前，在世界上許多轉型國家和民主國家，國家能力的欠缺導致諸多政治問題，所以應當強化國家能力。但就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言，在《起源》一書中，他的判斷始終是“國家能力過強”，而“法治與問責不足”。“推斷有問責體制的社會會最終戰勝那些沒有它的社會，有一個重要原因：政治問責給制度的適應性變遷提供了一個和平的路徑。在王朝階段，中國的政治體系始終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壞皇帝’的問題。……在對上而不是對下負責的當代中國，這個問題仍然至關重要。”（參見本書第436—437頁）

同樣，不能將福山對“社會因素”的警覺視為站在國家的角度敵視社會。固然，他強調我們不能無條件地將一切社會自發性力量當做文明的動力，但是，當他試圖解釋英國道路（問責制政府）與法國道路（弱專制主義）更不用說俄羅斯道路（強專制主義）的不同時，他訴諸的解釋因素恰恰是社會力量的強大和團結程度。在英國，貴族、底層士紳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團結構成了抵御王權、達至憲政的強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國的貴族、士紳和資產階級被法國王權瓦解分化，而在俄羅斯，他們則對王權幾乎是徹底依附。

因此，從價值上而言，似乎始終只有一個福山。雖然對世界各地情勢的總體判斷使他現在更強調國家能力——因為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貫徹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紙空言，而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作為基本秩序的維護者，民主很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但如果脫離語境，將這種強調應用于那些國家能力已經超強甚至過剩的國家，就成了認識上的刻舟求劍。

## 四

問題在于，強調“國家建構”，矯枉可能過正。如何把握國家能力的“度”？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難題。

對于思想者而言，一個悖論在于，時代往往是有意義問題意識的來源，但是為時代寫作又有可能導致問題感的短視。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有過一次矯枉過正的經歷。為了超越民主專制類型學的政治學視角，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表達了統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體現政治發展的觀點，并在這個意義上把美蘇歸為一類而不是兩類國家。他的這一觀點曾經啟發了幾代學人，但是到1989年，蘇聯及其陣營的垮臺則某種意義上否證了亨廷頓的觀點：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國和蘇聯并不是一類國家。

當福山頻繁地將國家能力強化等同于政治發展、將國家權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敗”時，同樣的危險也隱約可見。尤其在中國，這樣的觀點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條主義的國家主義者當做武器彈藥。固然，一定的國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發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問責也是國家能力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秦朝、更不用說納粹德國會最后崩坍——摧垮這些政權的，并不是權力分散化、封建化帶來的“政治衰敗”，而恰恰國家能力的無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與問責使國家能力的發展變得“有價值”。對比政治發展的三個維度，我們會發現，由于法治原則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問責原則中的自治與參與精神，這兩個維度具有內在價值，相比之下，國家能力則僅僅具有“工具價值”——幾乎不會有人認為不顧及民眾死活的“強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國家能力這種“工具”服務于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時，我們才能把它視為褒義的“政治發展”。如果不劃出這條界限，一味將國家能力的深化稱為“政治發展”，將國家權力的分散和下沉稱為“政治衰敗”，這既不合乎我們的倫理直覺，也不合乎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國家能力的相對“衰敗”使法治與問責的“發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書中指出的，“馬爾薩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農業社會——和“后馬爾薩斯的世界”有著根本的不同。在“馬爾薩斯的世界”里，國家建構在政治各維度中顯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賴于對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奪，而占領土地和掠奪人口則依賴于強大的國家能力。但在一個“后馬爾薩斯的世界”里，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賴科技創新和資本聚集，而科技創新與資本安全則更多地依賴于法治與問責制。換言之，即使歷史上國家能力曾經是政治各維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個已經徹底變遷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則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選擇問題上“重新帶回國家”，一定程度上，福山過去二十年的個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識界的思想史走向。這種轉變既是現實的變遷使然，也是知識的邏輯使然。冷戰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勢要求知識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應，而不僅僅是用歷史必然性來“一言以蔽之”。對未來的闡述不能替代對現實的解釋，對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對歷史多樣性的追問。如果說《政治秩序的起源》對《歷史的終結》有明顯超越的部分，大約就是對其“歷史決定論”色彩進行了涂改：一個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著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著它在將來也會“一直如此”。回訪歷史往往會使一個人的樂觀變得更加審慎，因為歷史往往意味著路徑依賴、意味著制度惰性、意味著文化慣性，而對歷史的超越則取決于人們刻意的選擇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起源》是對《終結》一書的推翻，不如說是對它的救贖。

紀念

塞繆爾·亨廷頓

#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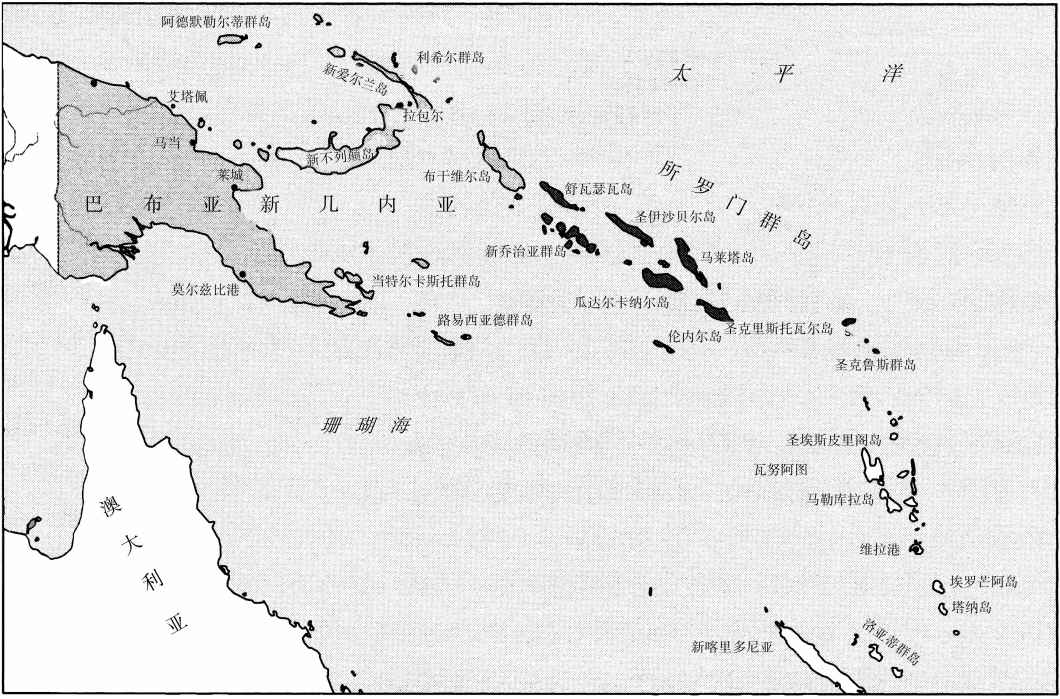
本書有兩個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師哈佛大學的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請我為他1968年的經典之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寫新序。[[1]](#m1)亨廷頓的著作代表了從宏觀角度論述政治發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學中經常要求學生閱讀的。它在比較政治學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見解，包括政治衰敗的理論、威權現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發展是有別于現代化其他方面的現象等。

我在寫新序時覺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盡管很有啟發，但確實需要認真的更新。它的成書時間距離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戰后的世界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結論反映了那一時期政變和內戰所帶來的極端不穩定。但自該書出版以來已發生很多重大變化，像東亞的經濟奇跡、全球共產主義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紀70年代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發展中地區卻取得成功。返回該書的主題，將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個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訂亨廷頓思想時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詳細解說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的起源，還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將人類歷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視作理所當然。其時，國家、政黨、法律、軍事組織等制度（institutions，參見本書第29章“制度[機構]”一節的編者按，本書第406頁）均已存在。它所面對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但沒有解釋這些現代化制度在其發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國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過去，但在許多情況下，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前發生的事，仍對政治的性質發揮著重大影響。如想弄懂當代制度的運作，很有必要查看它們的起源以及幫助它們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對制度起源的關心又與第二份擔憂緊密吻合，即現實世界中國家過于薄弱和最終失敗的問題。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就政府瀕臨崩潰或不穩的國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國家和民族構建的難題。與此有關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與世界秩序》。[[2]](#m2)美國和廣大的國際捐贈社區，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國家建設項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海地、東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亞。我本人也跟世界銀行和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AusAid）接洽，觀察包括東帝汶、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尼巴布亞省、所羅門群島在內的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的國家建設問題。它們在建造現代國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難。

譬如，如何將現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亞社會，如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該社會以人類學家所謂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體，其中的親戚人數少至幾十，多至數千。這些群體在本地被稱為一語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詞語“一種話語”的洋涇浜變種，即操同一語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亞的社會分裂頗不尋常，巴布亞新幾內亞擁有超過九百種互不通用的語言，幾乎占世界現存語種的六分之一。所羅門群島的人口僅50萬，卻有超過七十種的獨特語言。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多數居民，從沒離開過出生地的小峽谷，他們生活在一語部落內，與鄰近的其他一語部落互相競爭。



美拉尼西亞

一語部落接受頭人（Big Man）的指揮，但沒有一個人生來就是頭人，也不能將之傳給兒子。更確切地說，必須在每一代贏得該職。它不一定落在體力強壯者的頭上，通常給贏得社區信任的人——以分配豬肉、貝殼貨幣和其他資源的能力為基礎。在傳統的美拉尼西亞社會中，頭人必須時時小心，因為權力覬覦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沒有可供派分的資源，他就會失去其領袖地位。[[3]](#m3)

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準許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英國也承認所羅門群島獨立。它們都建立現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參加多黨派的選舉，以選出議會成員。在澳大利亞和英國，政治選擇離不開中立偏左的工黨和保守黨（澳大利亞的自由黨和英國的托利黨）。總的來說，選民根據意識形態和政策來決定取向（譬如，他們要更多的政府保護，還是要更多的市場取向）。

但這種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亞后，結果卻一片混亂。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亞多數選民投票不看政治綱領。更確切地說，他們只支持自己的頭人和一語部落。如果頭人（偶爾是女頭人）被選入議會，這位新議會成員將盡力運用自己的影響，將政府資源搬回自己的一語部落，向自己的擁護者提供學校費用、埋葬開支、建筑工程等。盡管有全國政府和主權象征，如國旗和軍隊，美拉尼西亞的居民中沒幾個覺得自己屬于一個國家，或屬于自己一語部落之外的社會。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的議會中，沒有凝聚的政黨，只有大批單槍匹馬的領袖，將盡可能多的豬肉帶回自己狹小的擁護者團體。[[4]](#m4)

美拉尼西亞社會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經濟發展，因為它阻止現代產權涌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95%以上的土地屬于所謂的慣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據慣例的規則，財產是私有的，由親戚團體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說沒有法律文件）一起擁有。他們對土地享有單獨和集體的權利，地產的意義不僅在經濟上，還在精神上，因為死去的親戚都葬于一語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語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頭人，都無權將土地賣與外人。[[5]](#m5)尋覓地產的開礦公司或棕櫚油公司，必須與數百人談判，有時甚至是數千人。此外，根據傳統規則，土地產權不受時效法律的限制。[[6]](#m6)

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亞政治家的行為看來像政治腐敗。但從傳統部落社會的角度看，頭人只是在履行頭人歷來的職責，那就是向親戚分發資源。只是現在，他們不但擁有豬肉和貝殼貨幣，而且享有開礦和伐木權利的收入。

從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首都莫爾茲比港（Port Moresby）起飛，幾小時就可抵達澳大利亞的凱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種意義上，這一航程跨越了幾千年的政治發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亞的政治發展時，我開始考慮：社會如何從部落層次過渡到國家層次，現代產權如何從慣例產權中脫穎而出，倚靠第三方執法的正規法律制度如何問世。美拉尼西亞社會從沒見過正規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遠，認為現代社會已遠遠超越美拉尼西亞，依我看來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為頭人——將資源派分給親戚和擁護者的政治家——在當代世界依然到處可見，包括美國國會。如果政治發展的涵義就是脫離家族關系和人格政治，那我們必須解釋，為何這些行為仍在多處幸存，為何看似現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頭路。

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關答案，這段歷史需要認真的梳理，以重溫亨廷頓的主題。

因此就有了現在這本書，考量政治制度的歷史起源和政治衰敗的過程。這是兩卷中的第1卷，涵蓋從前人類時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發展。本書與過去有關——事實上，它并不始于有記載的人類歷史，而是人類的靈長目祖先。它的前四個部分講述人類史前史、國家起源、法治、負責制政府。第2卷會一直講到今天，特別關注非西方社會在追求現代化時受到西方制度的影響，然后再解說當代世界的政治發展。

閱讀本卷時需要預先掂量第2卷的內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講得很清楚，現代世界的政治發展所遇到的條件，與18世紀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業革命發軔后，人類社會退出了直到那時一直所身歷的馬爾薩斯式處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種新動力被注入社會變化的進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讀者可能覺得，這里敘述的漫長歷史進程意味著，社會會受困于自己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們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動力多樣的環境下。

本書涵蓋眾多社會和歷史時期；我也使用自己專長之外的資料，包括人類學、經濟學、生物學等。為了從事如此廣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幾乎全然依靠二手資料。盡管我嘗試讓這些資料承受盡可能嚴密的專家過濾，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實和解釋方面的錯誤。對深入研究特定社會和歷史時期的專家來說，本書很多單獨章節是不夠格的。但我認為，以比較方式作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種美德。若全神貫注于特定題材，往往會看不清政治發展的大模式。

# 第一部分 國家之前

##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第三波民主化，時人對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擔憂；左右兩派憧憬政府消亡，發展中國家卻在身受其害；我們視各式制度為理所當然，但對其來龍去脈卻一無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間，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經歷一次高漲。1973年，世界151個國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估為自由國家的僅45個。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機構，每年就世界各國的公民權和政治權提供量化評選。[[1]](#m1_1)該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是獨裁政權；蘇聯和其東歐衛星國仍顯得強大和凝聚；中國正卷入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敗的“終身總統”正在非洲鞏固他們的統治；大部分拉丁美洲處于軍人獨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們親眼目睹巨大的政治變化。民主制和市場導向的經濟，在中東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興起。20世紀90年代后期，約有120個國家——占世界獨立國家總數的60%——成為民主制。[[2]](#m2_1)這一變化，即是亨廷頓所講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為預設，已成為21世紀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觀。[[3]](#m3_1)

潛行于體制變化之下的，是社會的一大轉型。世界上一度消極的千百萬民眾組織起來，參與他們各自社會的政治生活，其結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轉向。此次社會大動員，背后有眾多因素：廣為普及的教育，使民眾意識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環境；信息技術，使思想和知識得到迅速傳播；廉價的旅行和通訊，讓民眾得以用腳來參與選舉，特別在對政府不滿時；經濟繁榮，誘發民眾渴望獲得更齊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紀90年代后達到頂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出現“民主衰退”。參與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約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復到威權主義，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嚴重侵蝕。[[4]](#m4_1)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連續下跌的第四年，這是其自1973年創辦自由度測評以來的首次。[[5]](#m5_1)

### 政治焦慮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現若干形式的病狀。第一種焦慮，取得民主進展的某些國家出現徹底逆轉，如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其民選領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機構、操縱選舉、關閉或鯨吞獨立的電視和報紙、取締反對派的活動。自由民主制不僅僅是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它由一套復雜制度所組成，通過法律和制衡制度來限制和規范權力的行使。很多國家，雖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卻在系統性地取消對行政權力的制衡，并對法律發起系統性的侵蝕。

第二種焦慮，那些似乎走出威權政府的國家，卻又陷入政論家托馬斯·凱羅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謂的“灰色地帶”，既非完全威權，也非貨真價實的民主。[[6]](#m6_1)蘇聯的許多繼承國家，如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后有個普遍假設：幾乎所有國家將過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實踐中的種種挫折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逐一克服。凱羅塞斯指出，該“過渡模式”的假設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權精英階層無意建立削弱自身權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種焦慮，無關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關乎它們能否向民眾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務。擁有民主制度這一事實，并不表明其治績的優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烏克蘭就是一個案例。2004年，它給世人帶來驚奇，成千上萬的民眾涌向基輔的獨立廣場，抗議總統選舉的不公。這一系列抗議被稱為橙色革命，引發新一輪選舉，導致改革家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當上總統。然而一旦當權，橙色聯盟卻一無是處，尤先科辜負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內部爭吵不已，無法應付烏克蘭的嚴重腐敗，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治下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2010年初，當選為新總統的是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縱選票、企圖竊取選舉成果從而觸發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擾民主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治理失誤。眾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那里，階級等級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領袖的上升，如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與其說是不穩定的起因，倒不如說是不均的癥狀。很多人覺得，名義上是公民，但在現實中卻橫遭排擠。持久的貧窮經常滋生其他社會功能的失調，如幫會、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倫比亞、墨西哥、薩爾瓦多，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威脅國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處理這些難題，民主制合法性便會受到破壞。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它一直維持頗為成功的民主制——考慮到其貧窮程度、種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員的廣袤，此成就尤為驚人。（如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待印度的政治發展，將會減少我們的驚異。這是本書第10—12章的主題。）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制作，越是近距離觀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舉例來說，幾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員，現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訴，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謀殺和強奸。印度政治家經常從事公開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來交換選票。印度民主的爛攪難纏，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上很難做出決策。印度眾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見非洲式的貧窮。

印度民主明顯的混亂和腐敗，經常與中國快速和有效的決策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統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責任的牽制：如想建造大水壩、拆除舊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機場、實施即時的經濟刺激，他們的速度遠遠超過民主的印度。

第四種政治焦慮與經濟有關。現代全球資本主義，證明是高效的。其創造的財富，遠遠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夢想。自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幾乎翻了四倍。[[7]](#m7)由于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政策，亞洲人口的大部已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資本主義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動的良方，尤其是金融業。金融危機定期折磨全球的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初是歐洲，1997—1998年是亞洲，1998—1999年是俄羅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說是罪有應得，此種危機最終在2008—2009年擊中全球資本主義的老窩——美國。為促進持續的增長，自由的市場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動調節，特別在涉及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機構時。制度的不穩定最終仍屬政治上的失敗，即未能在國家和國際層次上提供恰當的管制。[[8]](#m8)

這些經濟危機的累積，未必減弱把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當作引擎的信心。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憑借對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參與，在經濟上繼續表現良好。但顯而易見，開發恰當的管制以馴服資本主義的大幅波動，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 政治衰敗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種緊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慮。政治制度的發展通常是緩慢和痛苦的，必須經歷漫長歲月。人類社會一直在努力組織起來，以征服自己所處的環境。政治制度一旦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便會發生政治衰敗。制度的保存自有規律。人類是循規蹈矩的生物，生來就傾向于遵守身邊的社會規則，并以超越的意義和價值來加固那些規則。周圍環境改變時，便會出現新的挑戰，現存制度與即時需求便會發生斷裂。既得利益者會起而捍衛現存制度，反對任何基本變化。

美國政治制度可能正面臨其適應能力的重大挑戰。美國制度基于這樣一種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構成了朝不慮夕的危險。因此，美國憲法設有廣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門得以防范其他部門的暴政。迄今為止，這個制度表現良好。因為在歷史關鍵時刻，當強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時，其政治領導最終能達成共識，取得勝利。

很不幸，沒有機制上的保障能夠確保美國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時按照初衷來順利行使國家權威。后者取決于對政治目的達成社會共識，這恰是最近幾年來美國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國現在面對一系列巨大挑戰，大部分與其長期財政困境有關。過去一代，美國人把錢花在自己身上，沒有繳納足夠的稅款。寬松的信貸，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無疑是雪上加霜。長期的財政虧空和對外負債，威脅美國在世人眼中的國力根基。其他國家的地位，如中國，則獲得相對拔高。[[9]](#m9)

這些挑戰，如采取痛苦和適時的行動，沒有一項是無法克服的。美國的政治制度本應促進共識的形成，現在反而加劇挑戰的艱巨。國會兩極分化，令法案的通過變得異常困難。國會中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仍比最開明的共和黨人更偏向自由派，這是現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選票當選的國會議員席位，19世紀末仍有將近200名，持續下降至21世紀初，僅剩50余名。此類席位，往往是兩黨爭奪的主要對象。兩大政黨在意識形態上變得更加物以類聚，審慎的辯論日益退化減少。[[10]](#m10)這種分裂并非史無前例。但在過去，強勢的總統總是能夠駕馭此類分裂。而近來，則未見強大能干的總統。

美國政治的未來，不僅依賴政治，而且依賴社會。國會的兩極化反映了一大趨勢，即美國的社區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質化。美國人選擇在何處居住，從而在意識形態上自我排隊。[[11]](#m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處，這一傾向因媒體而獲得增強。交流途徑的多樣化，反而減弱了公民的共享經歷。[[12]](#m12)

國會的左右兩極化、既得利益團體的成長和力量，都在影響美國政治制度應付財政挑戰的能力。工會、農產企業、制藥公司、銀行、大批有組織的游說團，經常對可能損害其經濟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決權。民主國家里，公民保護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屬預計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類保護將化作索求特權，大家的利益都變得神圣不可侵犯，社會為此而陷入困境。這解釋了左右兩派高漲的民粹主義憤怒，這種憤怒又進一步推動兩極化，更反映出社會現實與國家原則的不協調。

美國人抱怨美國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團體。這反映了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收入和財富的不均在與日俱增。[[13]](#m13)不均本身，不是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大問題。美國強調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均等。如人們相信，通過努力工作，他們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機會獲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規則取得成功的，那么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實上，美國世代流動性的比率大大低于眾多美國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傳統上被認作僵化和等級分明的其他發達國家。[[14]](#m14)日積月累，精英們得以鉆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護自己的地位。他們向海外轉移財產來避稅，通過精英機構的優惠途徑將優勢傳給下一代。該伎倆的大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暴露無遺。人們痛苦地發現，金融服務業的報酬與其對經濟的實際貢獻沒有直接關聯。該行業動用相當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設法廢除有關的管制和監督。金融危機發生后，它仍在繼續抵抗新的管制。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指出，美國金融寡頭的力量無異于新興市場國家中的類似團體，如俄羅斯或印尼。[[15]](#m15)

沒有自動機制可使政治制度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因應不良，即政治衰敗的現象，會在本卷的后半部得到詳細介紹。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沒有較早接納槍械以應付外國威脅，這并不是非發生不可的。最終擊敗他們的奧斯曼帝國，就這樣做了。中國明朝皇帝沒向老百姓征收足夠稅金以支撐一支強大的抗滿軍隊，這也不是無可避免的。兩件案例中的癥結，都是現存制度的巨大慣性。

社會如不能通過制度上的認真改革，以應付重大的財政危機，像法蘭西國王在1557年無力償還“大借款”（Grand Parti，編按：此指1555年，法蘭西國王亨利二世為支付戰爭開銷，向里昂銀行家大舉借貸一事）后所做的，它就會傾向于采取短視的補救，最終卻腐化自己的制度。這些補救屈服于各種既得利益者，即法國社會中有財有勢的人。國家預算不平衡，導致破產和國家本身非法化，這一歷史過程以法國大革命告終。

美國的道德和財政危機還沒到達法蘭西王國的地步。危險的是，其處境將會繼續惡化，直到某種強大力量徹底打破這當前功能失調的制度均衡。

### 無政府幻想

我們對未來的甚多焦慮，如俄羅斯退回威權、印度腐敗、發展中國家政府衰敗、當代美國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條共同線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維持有效的政治制度，雖然強大，但遵守規則，又承擔責任。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級小學生都認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這又是很多聰明人迄今尚沒弄清的。

讓我們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紀初世界上發生的民主衰退開始。我認為，當前我們對民主傳播的失敗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這個層次。思想對政治秩序極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礎，它能夠凝聚人心，并使民眾愿意服從政府的權威。柏林墻的倒塌標志共產主義的破產，共產主義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競爭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為被最廣泛接受的政府形式，獲得快速的蔓延。

時至今日，這仍是事實。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說，民主制仍是“預設”：“民主尚未獲得普遍的實踐，甚至未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輿論的大氣候中，民主制已獲得被視作基本正確的地位。”[[16]](#m16)世界上很少人公開欽佩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石油民族主義、烏戈·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的伊斯蘭共和國。沒有重要的國際機構將民主制以外的任何東西認作是公平合理的統治形式。中國迅速的經濟增長，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興趣。但它的威權主義模式，不易解釋清楚，更少被其他發展中國家輕易模仿。現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權政客，為了合法也必須上演選舉，寧可躲在幕后操縱媒體。事實上，不但極權主義從地球上消失，連威權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來稱頌民主制。

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世界上大多數人極向往這樣的社會：其政府既負責又有效，民眾需要的服務能獲得及時和高效的滿足。但沒幾個政府能真正做到這兩點，因為很多國家的制度衰弱、腐敗、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不管是南非和韓國的，還是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他們的激情足以帶來“政權更替”，使威權政府蛻變成民主制。但如沒有漫長、昂貴、艱苦、困難的過程來建設相關的制度，民主制是無法成功的。

有一種奇妙的想法，對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視而不見，這幾年來影響很多人。他們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這種憧憬，不專屬于左派或右派，他們各有自己的版本。共產主義之父卡爾·馬克思的預測廣為人知：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后，私人財產廢除，“國家消亡”。自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以來，左翼革命家認為，摧毀舊權力機構即已足夠，沒去認真思考何以代之，這項傳統延續至今。反全球化的學者，如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議削減國家主權，代之以互聯的“群體”（Multitude），以鏟除經濟上的不公平。[[17]](#m17)

現實世界中的共產黨政權，恰恰做了與馬克思預測相反的事。它們建立龐大且暴力的國家機器，如民眾不是自覺自愿，就逼迫他們參與集體行動。這影響了整整一代的東歐民主活動家。他們憧憬心目中的無政府社會，讓動員起來的公民社會來取代傳統的政黨和集權政府。[[18]](#m18)這些活動家隨后對無情的現實感到失望，因為沒有制度，社會便無從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厭煩的妥協。共產主義垮臺后的數十年，東歐是民主的，但對其政治或政治家來說，卻不一定感到滿意。[[19]](#m19)

右派中最流行的無政府幻想認為，市場經濟令政府變得無關緊要。20世紀90年代的網絡繁榮期間，參照花旗銀行前首席執行官沃爾特·利斯坦（Walter Wriston）的口吻，很多狂熱者主張世界正在經歷“主權的黃昏”。[[20]](#m20)新興的信息技術在挑戰傳統上由國家掌控的政治權力，使邊界變得不易管轄，使規則難以執行。互聯網的上升，導致電子邊疆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約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躍分子發布“網絡空間的獨立宣言”。它通告工業化世界的政府：“在我們中間，你們不受歡迎。我們聚集的地方，你們沒有主權。”[[21]](#m21)全球性資本主義，將以市場的主權取代民主制的主權。如果某國議院采用嚴格條例限制貿易，它將受到債券市場的懲罰，最后還是被迫改用全球資本市場所認可的合理政策。[[22]](#m22)無政府幻想總能在美國找到同情聽眾，因為美國政治文化的常數就是對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不僅要縮減蔓生的福利計劃，甚至要廢除像聯邦儲備委員會和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這樣的基本機構。[[23]](#m23)

認為現代政府變得臃腫，因而限制經濟增長和個人自由，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風冷漠、政客腐敗、政治中不講原則，也絕對正確。但在發達國家，我們視政府的存在為理所當然，以致忘記它們有多重要、重建它們有多難、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界會有多大的不同。

我們不但視民主為理所當然，還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務當作理所當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是美國最富的縣之一，位于華盛頓特區郊外。每年的冬天風暴過后，由于季節性的結冰和解凍，縣公路上便會出現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結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的填補，無須擔心在坑洼里撞斷自家汽車的底軸。如沒有填補，費爾法克斯縣的居民會變得憤怒，會抱怨地方政府的無能。沒人（除了政府專家）停下來思忖哪個政府部門在盡此職責。它復雜，但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也沒人停下來問，為何接壤的哥倫比亞特區卻需要較長時間來填補坑洼，為何很多發展中國家從不填補它們道路上的坑洼。

實際上，左右派夢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無政府的社會，并非只是海市蜃樓，其確實存在于當代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的天堂。該地區大體上都是低稅收的烏托邦，政府征收的稅金通常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10%。相比之下，美國超過30%，部分歐洲國家占50%。如此低的稅收，與其說釋放工商創業的熱情，倒不如說導致政府資金異常短缺，無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補道路坑洼之類的基本公共服務。現代經濟所依據的基礎設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這里不見蹤影。自20世紀80年代晚期以來，索馬里就缺乏強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擁有突擊步槍，還可擁有火箭推進榴彈、防空導彈、坦克。民眾有保衛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們是別無選擇。尼日利亞生產的電影，數量可與印度聞名的寶萊塢媲美。但必須盡快賺回報酬，因為政府無力保障知識產權，無法避免其產品的非法復制。

發達國家的民眾視政治制度為理所當然。這習慣可見證于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計劃，或善后計劃的缺乏。美國政府似乎認為，薩達姆·侯賽因的獨裁政權一倒臺，伊拉克就會自動回復到預設的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等到伊拉克的國家機構在瘋狂的洗劫和內亂中轟然崩塌時，美國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驚訝。在阿富汗，美國的目標遇上同樣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數千億美元的投資，迄今沒能培植出一個穩定合法的國家。[[24]](#m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你“叫政府讓開”后，市場經濟和富裕不會魔術般出現，它們得依賴背后的產權、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場、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自發的“群眾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組件，但不能替代強大且等級分明的政府。近幾年來，經濟學家有了廣泛認同，“制度確實重要”。窮國之所以窮，不是因為它們缺少資源，而是因為它們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們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來源。

### 達到丹麥

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的問題，常被形容為如何“達到丹麥”。這其實是一篇文章的標題，作者是世界銀行社會學家蘭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邁克爾·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25]](#m25)對發達國家居民而言，“丹麥”是個具有良好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神秘國度。它民主、穩定、熱愛和平、繁榮、包容、政治腐敗極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將索馬里、海地、尼日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轉化成“丹麥”。國際發展團體列出一份假設是丹麥屬性的長清單，嘗試幫助落后國家來“達到丹麥”的水平。

這個想法，問題多多。那些異常貧窮和混亂的國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內建立起復雜制度嗎？這顯得有點不靠譜，要知道，那些制度的進化花費了多長時間。此外，制度反映它們所處社會的文化價值。丹麥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嗎？誰也不清楚。富裕穩定的發達國家，其多數居民不知道丹麥本身是如何“達到丹麥”的——甚至對于很多丹麥人自己來說也是這樣。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的斗爭，既漫長又痛苦，以致工業國家的居民對自己社會的來龍去脈罹患了歷史健忘癥。

丹麥人的祖先是維京人，一個很兇悍的部落，曾戰勝和擄掠從地中海到烏克蘭基輔的大部分歐洲。率先定居不列顛的凱爾特人、征服他們的羅馬人、取代羅馬人的日耳曼蠻族，起初都組成部落，像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亞新幾內亞現存的那些部落一樣。中國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幾乎地球上所有人類，都有過同樣經歷。他們盡的主要義務，不是對國家，而是對宗族；他們解決爭端，不通過法庭，而通過以牙還牙的正義；他們把死者葬在宗族集體擁有的土地。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部落社會逐漸發展出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央集權，在固定領土范圍內實施有效的軍事力量壟斷——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國家。和平得到維持，不再靠宗族團體之間的大致均勢，而靠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它們成為常備力量，對抗鄰近的部落和國家，保護自己的社區。財產不再歸屬于宗族，而為個人所擁有，其主人漸漸贏得任意買賣財產的權力。產權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來解決爭端、補償損失。

日積月累，社會規則越來越正規化，變成書面法律，不再是習慣或非正式的傳統。這些正式規則，不必顧及在特定時間行使該權力的某人，可自主決定制度中的權力分配。換言之，制度替代了領袖。這些法律，最終成為社會中的最高權威，高于暫時指揮軍隊和官僚的統治者，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會不僅迫使統治者遵守限制國家權力的書面法律，還責成他們向國會、議會和其他代表較多人口的機構負責。傳統的君主制，含有某種程度的負責，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顧問征求非正式的咨詢。一旦統治者接受正式規則，限制自己的權力，并讓自己的統治權臣服于通過選舉表現出來的大眾意志，現代民主制便呱呱墜地。

本卷的目的，是想詳述那些已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從而填補歷史健忘癥所造成的空白。將要討論的三種制度，即是剛才所提及的：

1.國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負責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制，把這三種制度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能取得這種平衡，本身就是現代政治的奇跡。能否結合，答案不是明顯的。畢竟，國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權力，要求公民遵從法律，保護自己免遭他國的威脅。另一方面，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又在限制國家權力，首先迫使國家依據公開和透明的規則來行使權力，再確保國家從屬于民眾愿望。

這些制度的首次出現是因為民眾發現，可借此來保護他們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與人合作，都取決于使政治結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礎。

三種制度中已存在一種，并不意味著其他兩種也會出現。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來一直舉行民主選舉，但只擁有非常孱弱的國家，在其領土大部無法執法。相比之下，俄羅斯擁有強勁的國家，也舉行民主選舉，但其統治者覺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縛。新加坡擁有強勁國家和英國殖民者遺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縮了水的負責制政府。

這三種制度最初來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驅使它們誕生？又在何等條件下得到發展？建立的順序如何？彼此間有何關系？如能弄清這些基本制度的出現，我們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馬里離當代丹麥究竟還有多遠。

如不理解政治衰敗的補充過程，就講不清政治制度的發展。人類的制度很“黏糊”；這是指，它們長期延續，只有經受了重大的艱辛，方能得到變革。為滿足某種條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該條件改變或消失時，常常得以茍延；未能妥善因應，便會引發政治衰敗。這適用于舊式政治制度，也適用于集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于一身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國家。不能保證，一個民主政體會繼續向公民提供所允諾的；也不能保證，它在公民的眼中繼續是合法的。

此外，人類袒護親友的自然傾向——我稱之為家族主義（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強大抑制，會一再重現。組織起來的團體——經常是有錢有勢的——久而久之，得以盤根錯節，并開始向國家要求特權。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財務或軍事危機時，這些盤踞已久的家族團體更會擴展其優勢，或阻撓國家采取妥善的因應。

政治發展和衰敗的故事，曾被講述多次。多數高中開設“文明之興起”的課程，提供社會制度如何進化的概論。一個世紀前，講述給大多數美國學生的歷史，以歐洲甚至英國為中心。它可能從希臘和羅馬開始，然后轉向歐洲中世紀、大憲章、英國內戰、光榮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國憲法的起草。今天，類似的課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國和印度那樣的非西方社會，更會講述歷史上遭排斥的群體，像土著、婦女、窮人，等等。

現存的關于政治制度發展的文獻，我們有理由表示不滿。首先，大部分沒在足夠廣泛的規模上作出比較對照。只有通過比較不同社會的經驗，方可梳理復雜的因果關系，弄清為什么某些制度出現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關于現代化的理論，從卡爾·馬克思到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等當代經濟歷史學家的大量研究，都側重英國作為首個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英國的經歷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對處在不同境地的國家來說，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幾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敘述，很大程度上也沒作嚴肅的比較對照。它們選擇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貢獻于人類進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負面故事。為什么某制度發展于某社會而不在另外社會，我們很難找到嚴肅的比較分析。

優秀的社會學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常說，僅了解一個國家的觀察者是不懂國家的人。沒有比較對照就無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實踐或行為，是某社會中所獨具的還是眾多社會所共有的。只有通過比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關系，才能把地理、氣候、技術、宗教、沖突與今日世界上呈現的各式結果掛上鉤。這樣做，我們也許能解答下列問題：

· 為什么阿富汗、印度叢林地區、美拉尼西亞島國、中東部分地區，至今仍是部落組織？

· 為什么中國的預設統治是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過去三千年歷史中，除短暫時期，從沒見過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權？

· 為什么幾乎所有成功的現代威權政體——像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臺灣地區——都集居在東亞，而不在非洲或中東？

· 為什么民主制和齊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納維亞生根發芽，而處于類似氣候和地理條件下的俄羅斯，卻產生了不受節制的專制主義？

· 為什么在過去一個世紀，拉丁美洲國家反復遭遇高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而美國和加拿大卻沒有？

本卷提供的歷史資料很有趣，因為它們照亮現狀，解釋不同政治秩序的來龍去脈，但人類社會不囿于自己的過去。為了備戰和參戰，現代國家得以在中國或歐洲出現。這并不意味著，今日非洲的薄弱國家為達到現代化，必須重復同一經驗。我會在第2卷中討論，今日政治發展的條件大相徑庭于第1卷所涵蓋的。社會成員的組合，因經濟的增長在不斷重新洗牌；今天國際因素對個別社會的沖擊遠遠大于舊日。本卷的歷史材料可以解釋，各種社會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們走過的路徑，既不能決定它們的將來，也不能成為其他社會的楷模。

### 中國第一

偉人所編寫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如卡爾·馬克思、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傾向于認為西方經驗是現代化的范本，因為工業化首先在西方發生。這樣注重西方不難理解。1800年后，在歐洲和北美所發生的生產力爆發和經濟持續增長，既是史無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樣。但發展不只局限于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制度也在不斷發展。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有時與經濟變化緊密相關，有時又獨立自主。本卷著重于政治方面的發展和政府制度的進化。現代政治制度在歷史上的出現，遠早于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現在理解的現代國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已到位。其在歐洲的浮現，則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講述國家崛起時，就以中國開始。經典現代化理論傾向于把歐洲的發展當作標準，只探詢其他社會為何偏離。我把中國當作國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詢其他文明為何不復制中國道路。這并不表示中國勝于其他社會。我們將看到，沒有法治或負責制政府的現代國家，可能實施非常暴虐的專制主義。中國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發展史解說，卻很少提及此一創新。

我自中國開始，就跳過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會，像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中南美洲。在此還需要作進一步解釋，為何不在本卷詳細涵蓋希臘和羅馬。

古代地中海世界樹起的先例，對后續的歐洲文明發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時代起，便受到歐洲統治者的自覺模仿。一般認為，希臘人發明了民主制，其統治者不是世襲的，而是選出的。多數部落社會也是相對平等的，其統治者也是選出的（參看第4章）。但希臘人超前一步，其介紹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標準而非親戚關系為基礎。公元前5世紀雅典或羅馬共和國實踐的政府形式，其較為貼切的稱號應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為選舉權只屬于少數公民，尖銳的階級差別排斥大批人（包括眾多奴隸）的參與。此外，這些不是自由國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國家，不尊重隱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權。

希臘和羅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會的模仿，包括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寡頭共和國、諾夫哥羅德（Novgorod）、荷蘭聯合省。但這種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學者，包括很多深思該傳統的美國創始人，都有廣泛認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擴充。它在小型且均質的社會中表現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城市國家或早期的羅馬。這些共和國因征服或經濟增長而漸漸壯大，難以維持曾凝聚他們的社群價值。隨著疆域和居民的擴展，羅馬共和國面臨無法解決的矛盾：誰該享受公民權，如何分配國家的戰利品。君主制最終戰勝希臘城邦國家，羅馬共和國經歷漫長內戰，最終也變成帝國。君主制作為一種政府形式，特別在管理龐大帝國時，證明是出類拔萃的。羅馬帝國就是在此種政治制度下，達到其權力和疆域巔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將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為現代民主制先例的題目。如要研究國家的興起，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注，因為只有中國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尤其是與地中海的歐洲相比。中國早已發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譯按：“非人格化”在本書指不受基于家族關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公元1年時，中國總人口可與羅馬帝國媲美，而中國人口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要遠遠超過羅馬。羅馬自有其重要遺產，尤其在法律領域中（在第18章中詳述）。作為現代負責制政府的先驅，希臘和羅馬非常重要。但在國家發展上，中國更為重要。

可與中國相比的社會還有印度。大約在相同時間，印度社會也自部落升至國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羅門宗教的興起，印度走上一段彎路。該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組織可達到的權力，卻在某種意義上為現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礎。穆罕默德先知的時代，中東也是部落組織。伊斯蘭教的誕生，再加上軍事奴隸制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組織崛起成為主要的政治力量。歐洲則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過統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過天主教在社會層次頒布的規則。只有在歐洲，國家層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組織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關鍵，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題。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東、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歐，獨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強勁的發展，并設法轉成世俗形式，存續至今。

第四部分中，負責制政府的興起主要在歐洲，但在這一點上，歐洲各國并不齊整一致。負責制政府在英國和丹麥興起，卻沒在法國或西班牙；俄羅斯發展出專制主義，其權力與中國的旗鼓相當。社會能否把負責制強加于君主，取決于各項特殊的歷史條件，譬如幸存至現代的某些封建機構。

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西歐的政治發展次序是高度異常的。其現代國家或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社會層次的個人主義便已出現，而且早了數個世紀；其政治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經存在；其負責制機構的興起，卻是因為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無法擊敗或消滅舊封建機構，比如議會。

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的組合一旦出現，證明是高度強大和極富吸引力的，之后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我們必須記住，這一現象僅是歷史上的偶然。中國有強大國家，但沒有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現又有負責制政府，但傳統上一直缺乏強大國家；中東有國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類社會不囿于自己的過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們過去長得如何，幫助塑造了它們今天的面貌，但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是只有單一的路徑。

### 底下無數龜

本卷的宗旨，與其說是介紹政治發展的歷史，倒不如說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現的原因。被稱作“一連串混賬事件”的眾多歷史著作，不愿意盡量提煉普遍規律和適用于其他場合的因果理論。人類學家所寫的民族志，也沒跳出這個窠臼，雖然細致詳盡，但仍然故意避開廣泛的概括。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較和概括，將跨越眾多的文明社會和歷史時期。

本卷有關政治發展的整體構架，與生物進化有很多相似之處。達爾文進化論建筑在差異和選擇這兩條原則上：有機體發生隨意的遺傳變化，最適應環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發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會產生變異，最適合當時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擴散。但生物進化和政治進化之間，又有很多重大差別。人類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設計和選擇；它們的代代傳播憑借文化，而不是遺傳；它們因各種心理和社會的機制，而被注入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變得不易變革。政治發展因政治衰敗而經常逆轉，其原因就在人類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觸發制度變革的外界變化，往往遠遠超前于社會接受改革的實際意愿。

然而，該整體構架不是預測政治發展的理論。依我看，要找到政治變化的精簡理論，就像經濟學家所謂的經濟增長理論，根本是不可能的。[[26]](#m26)促使政治制度發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復雜，經常依賴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證出某種發展的原因，卻發現其本身仍有先決條件，這樣的溯源回歸是永無止盡的。

讓我們舉例說明。有一條政治發展的著名理論認為，歐洲因需要發動戰爭而建立國家。[[27]](#m27)在現代歐洲的早期，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大家公認的。我們將看到，它也同樣適用于古代中國。但在宣布這是國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須回答下列難題：為什么某些地區，盡管歷經長期戰爭，卻一直沒能發展國家制度（美拉尼西亞）？為什么在另外地區，戰爭似乎反而削弱了國家制度（拉丁美洲）？為什么某些地區，其沖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區（印度與中國相比）？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術、宗教。戰爭發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擁有相應技術（馬匹）的地區，與發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區相比，會發揮截然不同的政治影響。戰爭促使國家形成的理論，涉及更多更深的問題，譬如，為何某種戰爭僅爆發于某種地區。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種中間理論，既避免高度抽象（經濟學家的惡習），又躲開巨細無遺（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問題）。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19世紀歷史社會學或比較人類學的傳統。我不想一開始就向普通讀者推介龐大的理論構架。在介紹歷史的章節中，我會觸及各種理論，但對政治發展的抽象討論（包括基本概念的定義），我會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這包括政治發展之所以產生的通論，以及政治、經濟、社會之間的互動。

將理論放在歷史之后，我認為是正確的分析方法。應從事實推論出理論，而不是相反。當然，沒有預先的理論構思，完全坦白面對事實，這也是沒有的事。有人認為這樣做是客觀實證，那是在自欺欺人。社會科學往往以高雅理論出發，再搜尋可確認該理論的實例，我希望這不是我的態度。

有個可能不真實的故事，由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轉述。一位著名科學家在作有關宇宙論的演講，房間后面有位老婦人打斷他，說他是廢話連天，而宇宙只是馱在龜背上的一只圓盤。該科學家反問，那龜又馱在何物之上？以為就此便可讓她閉嘴。她卻回答：“你很聰明，年輕人，但底下是無數的龜。”

這是任何發展理論的難題：作為故事開頭你所挑選的龜，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龜的背上，還是站在一頭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條鯨魚背上。大多數所謂的發展概論，其失敗的原因，在于沒有考慮發展史中獨立的多維性。他們只是化繁為簡，試圖從復雜的歷史真實提取出單獨的誘因。他們沒能將故事推至足夠原始的歷史時期，以解說它的起點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遠。講中國發明了國家制度之前，我們必須了解戰爭的起源，甚至人類社會的起源。令人驚訝的是，它們不是外在的。自有人類起，就有社會和沖突，因為人類天生是群居和競爭的動物。人類的老祖宗靈長目，就在實踐一種縮了水的政治。要弄清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自然狀態和人類生物學，在某種意義上為人類的政治行為設定框架。生物學為支撐龜們提供一定的穩固基礎，但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學，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點。

## 第2章 自然狀態

自然狀態的哲學討論；現代生命科學彰顯人性和政治的生物學基礎；黑猩猩和靈長目中的政治；誘發政治的人性特征；人類出現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學傳統中對“自然狀態”的討論，一直是理解正義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議題。而正義和政治秩序，又是現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礎。古典政治哲學把天性和慣例（或稱法律）截然分開。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張，合理城邦必須存在，與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曇花一現和不斷變化的人性。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給予這差別以進一步的拓展。他們撰寫有關自然狀態的論文，試圖以此作為政治權利的基石。討論自然狀態，其實是討論人性的手段和隱喻，用來建立政治社會應予培養的各級人性美德（a hierarchy of human goods）。

但在一個關鍵命題上，亞里士多德與霍布斯、洛克、盧梭涇渭分明。他主張，人類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賦使之在社會中興旺發達。而這三位早期現代的哲學家則恰恰相反。他們爭辯說，人類天生不是社會性的，社會只是一種手段，使人類得以實現單憑個人所無法得到的東西。

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在羅列人類的自然激情后主張，人類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斃。他由此演繹，大家享有保護自己生命的自由，這就是基本自然權。人性中有三項誘發爭端的特征：競爭、畏葸（害怕）、榮譽；“第一項，誘發人類侵略以獲好處；第二項，以獲安全；第三項，以獲榮譽”。因此，自然狀態被描繪成“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為逃離這一危險處境，人類同意放棄隨心所欲的自由，以換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權。國家，也就是利維坦，以社會契約的形式來執行這一相互的允諾，來保障他們天生擁有但在自然狀態中無法享受的權利。政府，也就是利維坦，借保障和平來保障生命權。[[1]](#m1_2)

約翰·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對自然狀態的觀念，比霍布斯的溫和。他認為，人類所忙碌的，主要是將勞動與自然物結合起來，以生產私人財產，而不是彼此打斗。洛克的基本自然法，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權，還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財產”。[[2]](#m2_2)依照霍布斯，自然狀態中不受節制的自由會引發戰爭；為保護自然的自由和財產，社會契約便成為必要。依照洛克，國家雖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為自然權利的褫奪者。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權威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追尋幸福之權，直追霍布斯的天賦人權，再輔以洛克有關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的暴力的自然狀態，與盧梭較和平的版本，一直是鮮明的對照。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和短暫的”，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好幾處公開批評霍布斯：“最重要的，讓我們與霍布斯一起總結：人天生是惡的，因為他對善念一無所知；他品行不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為何物；他拒絕為同類做事，因為他自信不虧欠他們；他因此而理直氣壯，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并愚蠢地視自己為整個宇宙的主人。”[[3]](#m3_2)盧梭認為，霍布斯實際上沒能發掘出自然人，《利維坦》講述的暴虐人，其實只是數世紀承受社會污染的產物。對盧梭而言，自然人雖很孤獨，但卻是膽小恐懼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戰。野蠻人的“欲望，從不超越其物質需求；除了食物、配偶、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他財產”；他害怕疼痛和饑餓，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會的產生，不代表拯救于“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反而因相互依賴，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奴役。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開門見山：“我們此時所從事的研究，不可當作歷史真相，只算是假設性和有條件的推論。它適合于解釋事物的本性，并不適合于顯示其真正起源。”對盧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狀態與其說是歷史敘述，倒不如說是揭示人性的啟發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歷史所附加的舉止后，人類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意圖是提供人類行為的發展史。盧梭談論人的完美性，推測其思想、激情、行為的長期進化。他引證新大陸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豐富資料，評判觀察動物所獲得的論據，嘗試弄清天生人與社會人的差別。自認懂得偉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圖總是很危險的。霍布斯、洛克、盧梭對自然狀態的解釋，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關重要。所以，將之對照我們因生命科學最新進展所認識的人類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類認識存在于若干領域，包括靈長動物學、人口遺傳學、考古學、社會人類學，當然還有進化生物學的總構架。我們可以用更好的實證資料，再次運行盧梭的思考試驗。所得的結果，既確認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對他的其他觀察提出疑問。以現代生物學來尋找人性，作為政治發展理論的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將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們可借此來理解人類制度后來的進化。

盧梭的有些觀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認為，人類不平等起源于冶金、農業、私人財產的發展。但盧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個重要論點上是錯誤的。這三位思想家，都視自然狀態的人為隔離中的個體，都視社會為非自然的。根據霍布斯，原始人類的相處，主要表現為害怕、羨慕、沖突。盧梭的原始人更為隔離，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卻不是；人類的相互依賴幾乎是意外發生的，如農業的技術發明，使大規模的合作成為必要。他們認為，人類社會隨著歷史進展而出現，人與人相互妥協，從而放棄自然的自由。

但事實并非如此。英國法律學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詞句批評這些自然狀態理論：

這兩種理論（霍布斯和洛克的），將英國的嚴肅政治家長期分裂成敵對的兩派。其相似處，只有對史前無法取證的人類狀態的基本假設；其分歧處，則有前社會狀態的特征，以及人類將自己提升入社會的反常。我們熟悉的，只是社會。但他們一致認為，原始人與社會人之間有一道鴻溝。[[4]](#m4_2)

我們可將之稱為霍布斯式謬誤：人類一開始各行其是，僅在發展中較遲階段進入社會，因為他們作出理性推算，社會合作是達到各自目標的最佳方法。原始個人主義這個假設，支持美國《獨立宣言》對權利的理解，也支持后來興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該假設更支持了當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其各項模型的前提是：人類是理性的，并希望將自己的功效或收益發揮到極點。但在事實上，人類歷史上逐漸獲得發展的是個人主義，而不是社會性。今天，個人主義似乎是我們經濟和政治行為的核心，那是因為我們發展了相關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體本能。亞里士多德說，人類天生是政治的，他比這些早期現代的自由理論家更為正確。從個人主義角度理解人類動機，有助于解釋今日美國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活動，卻不是理解人類政治早期發展的最佳途徑。

現代生物學，與人類學所介紹的自然狀態完全相反：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從沒經歷過隔離時期；人類的靈長目先驅，早已開發出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技巧；促進社會合作的功能是人腦與生俱來的。自然狀態，可被描繪為戰爭狀態，因為暴力是自發的。實施暴力的，與其說是個人，不如說是密切結合的社會群體。人類并不因為自覺且理性的決定，而進入社會和政治生活。公共組織在他們中間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環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獨特的合作方式。

事實上，人類出現的數百萬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學家找到合作行為的兩個自然來源：親戚選擇（kin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關于第一，生物進化的競爭，不是指有機體本身的繼續生存，而是指有機體體內基因的繼續生存。這種情形一再出現，以致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將之定為包容適存性原則（inclusive fitness）或親戚選擇。該原則認為，有性繁殖物種的個體，對待親戚時是利他的，利他程度與它們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m5_2)父母和小孩，親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他們之間的利他，更強于他們與堂表親之間，因為后者僅分享25%的基因。這種行為可見證于各類物種。譬如，黃鼠在筑巢時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類而言，現實世界的裙帶關系，不僅基于社會緣由，更基于生物學緣由。[[6]](#m6_2)將資源傳給親戚的欲望是人類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態。

與遺傳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學家稱作互惠利他。這是親戚選擇之外，社會行為的第二生物學來源，也可見證于眾多物種。社會合作取決于如何解答博弈論的“囚徒困境”游戲（prisoner’s dilemma）。[[7]](#m7_1)在那些游戲中，如大家合作，參與者都有可能獲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費搭乘，則可獲益更多。20世紀80年代，政治學家羅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組織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戲的電腦程式比賽。優勝戰略是“一報還一報”：如對方在較早比賽中是合作的，則采用合作態度；如對方以前不予合作，則采用拒絕態度。[[8]](#m8_1)艾克塞洛德以此論證，隨著理性決策者彼此間長期互動，道德可自發產生，盡管一開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類之外，互惠利他還出現于其他眾多物種。[[9]](#m9_1)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觀察到在群居地喂養和保護伙伴的后代。[[10]](#m10_1)另一些情況中，就像清潔魚和它們所清理的大魚，相互幫忙的紐帶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種。狗和人之間的交往，顯示了這兩個物種相互進化得來的行為。[[11]](#m11_1)

### 黑猩猩政治與人類政治發展的關系

進化生物學，為我們弄懂人類如何從靈長目先驅進化而來提供了宏大框架。我們知道，人類和現代黑猩猩共享一個類似黑猩猩的祖先。人類分支出來，約在五百萬年前。人類和黑猩猩的染色體，約有99%的重疊，多于靈長目內任何其他的一對。[[12]](#m12_1)（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別，那1%的偏離與語言、宗教、抽象思維等有關，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然不可能研究這一共同祖先的行為，但靈長學家花費很長時間，在動物園和自然棲息地觀察黑猩猩和其他靈長目動物的行為，發現它們與人類擁有明顯的連貫性。

生物人類學家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惡魔》一書中，敘述成群結隊的野外雄性黑猩猩，遠離自己領土去攻殺鄰近社區的黑猩猩。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蹤包圍，先殺死單獨的鄰居，再逐一消滅社區內的其他雄性，然后捕獲雌性，以納入自己的族團。這很像新幾內亞高地男人的所作所為，也像人類學家拿破侖·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觀察到的雅諾馬馬印第安人（Yanomamö Indian）。根據蘭厄姆的研究，“甚少動物生活于雄性組合的父系群體，其雌性為避近親繁殖，經常去鄰區尋求交配。組成一個緊密的系統，由雄性發起領土進攻，包括突襲鄰近社區，尋找弱小敵人，再加以攻擊和消滅，如此做的，已知道的僅兩種”。[[13]](#m13_1)這兩種，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據考古學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 LeBlanc）的研究，“非復雜社會的人類戰爭，大部分與黑猩猩的攻擊相似。在那個社會層次，人類大屠殺其實是罕見的。由消耗戰而取得勝利是可行戰略之一，另外還有緩沖區域、突襲、收納女俘、刑辱敵人。黑猩猩和人類的行為，幾乎是徹底平行的”。[[14]](#m14_1)其主要差異，只是人類的更加致命，因為他們的武器更多樣、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類群體一樣，保衛自己的領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會組成家庭來撫養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級組織。然而，等級組織中的統治權運作，又令人想起人類群體中的政治。黑猩猩群體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來如此，像美拉尼西亞社會的頭人一樣，必須借建立同盟來贏得。體力雖然要緊，但最終還得依靠與他人的合作。靈長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荷蘭阿恩海姆動物園觀察馴養的黑猩猩群體。他敘述兩只年輕黑猩猩，如何聯手取代較年長的雄性老大。篡奪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兇狠對待它曾經的同盟者，并最終將之殺害。[[15]](#m15_1)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級組織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統治地位，便行使權威——即解決沖突和設定等級規則的權力。黑猩猩通過卑順的招呼來承認權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嚕聲，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級伸手，親吻上級的腳。[[16]](#m16_1)德瓦爾介紹一只占統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媽媽（Mama），相當于西班牙或中國家庭中的老祖母。“群體中的緊張氣氛達到巔峰時，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內的參戰者總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兩只雄性之間的激烈沖突告終于她的手臂。沖突升到頂點時，對手們沒有訴諸暴力，反而大聲尖叫，奔向媽媽。”[[17]](#m17_1)

在黑猩猩社會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當的，需要有評判他人品質的能力。像人一樣，黑猩猩擅長欺騙，所以需要評估潛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動物園長期觀察黑猩猩行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顯著個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賴。德瓦爾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觀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擊伙伴或假裝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動。由于這些行為，低等級的黑猩猩都學會遠離她。[[18]](#m18_1)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們被企盼遵循社交規則，但不總是照辦。如違反群體規則或違抗權威，它們會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覺。德瓦爾講起一件軼事，一位名叫伊馮的研究生，與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輕黑猩猩同住：

可可變得益加淘氣，該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電話聽筒擱起。伊馮一邊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緊，一邊給予嚴厲的責罵。這頓責罵似乎蠻有效果，伊馮便坐上沙發，開始讀書。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凈，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蓋，伸出手臂摟她的脖子，并給她一個典型的黑猩猩親吻（嘴唇敞開）。[[19]](#m19_1)

德瓦爾很清楚將動物人格化的危險，但貼近觀察黑猩猩的人們，絕對相信這些行為背后的情感潛流。

黑猩猩行為與人類政治發展的關系是很明顯的。人類和黑猩猩，都進化自同一的類人猿祖先。現代黑猩猩和人類，尤其是生活在狩獵采集或其他相對原始的社會中的，表現出相似的社交行為。如霍布斯、洛克或盧梭對自然狀態的敘述是正確的，那我們必須假定，在進化成為現代人類的過程中，我們的類人猿祖先短暫拋棄了自己的社交行為和情感，然后在較遲階段，從頭開始第二次進化。較為可信的假定應是：人類從沒作為隔離的個體而存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前，社交和融入親戚團體已成為人類行為的一部分。人類的社交性，不是因歷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類天生的。

### 唯獨人類

將人類與類人猿祖先分開的1%染色體，還含有什么？我們的智力和認知力，總被認為是我們人類身份的關鍵。我們給人類的標簽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屬（Homo）中“有智慧的”。人類自類人猿祖先分支出來，已有五百萬年。其間，人類的腦容量翻了三倍，這在進化史上是異常神速的。不斷增大的女人產嬰通道，勉強跟上人類嬰兒碩大頭顱的需求。那么，這認知力又來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類似乎需要認知力來適應和征服他們的自然環境。更高的智力，為狩獵、采集、制造工具和適應苛刻氣候等提供優勢。但這一解釋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他物種，也狩獵、采集、制造工具，卻沒能獲得類似人類認知的能力。

很多進化生物學家推測，人腦如此迅速增長的原因，是為了與人合作，是為了與人競爭。心理學家尼古拉·韓福瑞（Nicolas Humphrey）和生物學家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分別表明，人類實際上走進一場相互的軍火競賽；運用新的認知力來理解彼此行為，以建立更復雜的社會組織，成為競賽中的優勝者。[[20]](#m20_1)

前文提及的博弈論表明，經常與人互動的個人，愿意與誠實可靠者合作，避開機會主義者。但要行之有效，他們必須記住彼此的過去，并揣測動機，以測將來。這頗不容易，因為潛在合作者的標記，只是誠實外表，而不是誠實本身。譬如，依照經驗你似乎是誠實的，我愿意與你攜手合作；但如果在過去，你只是在故意積累信任，將來，你就能從我這里騙得更大好處。所以，自利推動了社會群體中的合作，也鼓勵了欺瞞、行騙和其他破壞社會團結的行為。

黑猩猩能達到數十成員的社會族團層次，因為它們擁有所要求的認知技術來解答基本的“囚徒困境”游戲。如阿恩海姆動物園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歷史，而遭遇其他黑猩猩的回避；“媽媽”取得領袖地位，因她調停糾紛時公正的聲譽。黑猩猩擁有足夠的記憶和溝通技巧，以解釋和預測可能的行為，領袖與合作遂得到發展。

但黑猩猩無法邁進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因為它們沒有語言。早期人類中出現的語言，為改進合作和發展認知力，提供了大好機會。有了語言，誰誠實和誰欺詐，不再取決于直接經驗，而變成可傳送給他人的社會信息。但語言又是說謊和欺騙的媒介。發展更好的認知力來使用和解釋語言，從而測出謊言，能這樣做的社會群體，對其競爭者就占有優勢。進化心理學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認為，求偶對認知力的獨特需求促進了大腦皮層的發展，因為男女不同的繁衍戰略，為欺騙和偵測生育能力創立了巨大獎勵。

男性繁衍戰略是，尋求盡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戰略是，為自己后代謀求最佳的雄性資源。這兩種戰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認為，這在進化方面激勵人類發展欺騙本領，其中語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m21_1)另一位進化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語言、社交能力、掌控環境都在相互加強，為精益求精而施加進化壓力。[[22]](#m22_1)這解釋了腦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腦皮層很大一部是用于語言的，它恰是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獨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類身上是找不到的。[[23]](#m23_1)

語言的發展，不僅允許短期的行動協調，還令抽象和理論成為可能，這就是人類所獨有的關鍵認知力。詞語可指具體物件，也可指物件的類別（狗群和樹叢），甚至可指抽象的無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綜合兩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為可能——那是指因果關系的一般聲明（“因為太陽發光，所以變得溫暖”；“社會強迫女孩進入定型的性別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這樣的推論能力給予我們巨大的生存優勢。盡管哲學家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無數一年級統計學的教授一再告誡，關聯不表示因果，但人類經常觀察周遭事物的關聯，以推斷之間的因果關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親的草根，你將免遭同樣命運，并可迅速將此規矩告訴子孫。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將原因歸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這就是宗教出現的基礎。宗教——篤信一個無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類社會。很不幸，試圖重建早期人類血統的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對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線索，因為他們依據的是化石和營地的物質記錄。但我們尚未發現沒有宗教的原始社會，并有考古跡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類群體，也可能有宗教信仰。[[24]](#m24_1)

今天有人主張，宗教是暴力、沖突、社會不協調的主要來源。[[25]](#m25_1)但在歷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會的源泉。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是簡單、理性、自私的參與者。宗教則允許他們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廣泛更安全。據我們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戲的參與者，應能取得一定的社會合作。但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顯示，隨著合作群體的逐漸擴展，集體行動便開始瓦解。在龐大群體中，越來越難監察每個成員的貢獻，免費搭乘和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變得司空見慣。[[26]](#m26_1)

宗教得以解決這集體行動的難題，通過獎罰而大大增強了合作的好處，甚至在今天也是這樣。如我認為部落領袖只是像我一樣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從他的權威。如我相信部落領袖能調動已死老祖宗的靈魂來獎勵或處罰我，我會對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監視，比活人親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動機，我的羞恥感可能更大。與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見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是很難得到證實或證偽的。即使我懷疑部落領袖與已死老祖宗的聯系，我也不愿承擔風險，萬一這是真的呢？根據“帕斯卡賭注”（Pascal’s wager），我們應該相信上帝，因為他可能存在。這在人類歷史中一直適用，雖然在早期懷疑者可能會更少。[[27]](#m27_1)

在加強規范和支撐社區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認的。[[28]](#m28)“一報還一報”（tit-for-tat），即以牙還牙和報李投桃，是反復互動的合理結果，也是圣經道德的基礎，更是人類社會幾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準則。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這條黃金定律只是“一報還一報”的異體。它只是強調善，不講惡罷了。（由此看來，基督教以德報怨的原則是反常的。人們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會，它也很少付諸實施。沒有一個我所知道的社會，把以怨報德當作其群體的道德準則。）

進化心理學家主張，凝聚社會所提供的生存優勢是人類天生偏愛宗教的原因。[[29]](#m29)思想可增加集體的團結，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們有民族主義，還有世俗意識形態，如馬克思主義——但在早期社會，宗教在社會組織走向復雜一事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沒有宗教，很難想象人類社會得以超越族團的層次。[[30]](#m30)

從認知觀點出發，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稱作現實世界的心智模型。它們把因果關系，歸因于日常世界之外的無形力量，歸因于形而上的王國。改造自然界的理論由此而生。例如，神的憤怒造成干旱，把嬰兒血灑入大地的犁溝，便可使之平息。之后，它又導向禮儀，即有關超自然秩序的重復表演。人類社會希望借此來獲得對環境的主導。

禮儀反過來又幫助區分群體，標記邊界，使之有別于其他群體。它促進社會團結，最終會脫節于導致其產生的認知理論。譬如當代世俗歐洲人，仍繼續慶祝圣誕節。禮儀本身和支撐它的信念，會被賦予極大的內在價值。它不再代表心智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選擇時可隨意拋棄的普通理論，而變成目的本身。

### 紅臉野獸

促使人類合作和存活的心智模型和規范，產生時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經濟學家所說明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即便證明有錯，也從來不是可棄之如敝屣的簡單理論。它被視作無條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謬誤，會受到社會和心理的沉重懲罰。現代自然科學帶來的認知進步，為我們提供了檢驗理論的實驗模式，允許我們更好地改造環境（如使用灌溉系統，而不是人的血祭，來提高農業生產力）。這里有個疑問：人類為何忍受如此僵硬難改的理論構思？

基本正確的答案是：人類之遵循規則，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過程。人腦培養了情緒反應，猶如自動導航裝置，以促進社會行為。喂奶的母親看到嬰兒，便會分泌乳汁。不是因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為在不知不覺中，她大腦產生荷爾蒙，誘發了乳腺分泌。對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對無緣無故的傷害表示憤怒，這不是精心考慮的反應，也不一定是學來的情感（盡管通過實踐，這些感受會獲得加強或受到抑制）。同樣，當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視我們，或評論我們母親或姐妹的德行，我們不會核算評論的精確度，也不會考慮為未來交往而保護聲譽，我們只是感到憤怒，只想痛揍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這些行為——對親戚的利他主義，捍衛自己的聲譽——可用理性的自利來解釋，但卻是在情緒狀態下作出的。一般情況下，情緒化的反應卻是理性的正確答復。為什么？這是進化的安排。行動經常是情感的產品，而不是計算的產品。所以我們經常弄錯，打了更強壯、更會報復的人。

這種情緒化反應，使人類中規中矩，遵循規范。規范的獨特內容由文化決定（不吃豬肉、尊敬祖先、宴會上不點香煙），遵循規范的能力卻是遺傳的。同樣，語言因文化而異，但都植根于人類普遍的語言能力。例如，在違反規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規則時被人看到，大家都會覺得困窘。很明顯，困窘不是學來的舉止，因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覺得困窘，即使是小小過失。人類能將自己置于他人位置，并通過他人眼睛觀察自己的行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會被診斷為具有自閉癥的病理征兆。

通過憤怒、可恥、有罪、驕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規范的習慣得以嵌入人性。規范受到侵犯時，如陌生人費盡心思羞辱我們或團體分享的宗教禮儀受到嘲笑或忽視，我們會感到憤怒。無法跟上規范時，我們會感到恥辱。取得大家贊許的目標，從而獲得群體的稱贊，我們會感到驕傲。人類在遵循規范中，投入這么多情感，以致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幫派成員因受到侮辱（實際上的或想象的），而向另外幫派的成員施以報復，但心里很清楚，這將導致暴力的逐步升級。

人類也將情感投入后設規范（metanorm），即如何恰當地闡述和執行規范。如果后設規范得不到妥善的遵循，人類會發起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稱的“說教型進攻”。[[31]](#m31)某命案的結局與自己利益毫不相關，但人們仍想看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這解釋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戲劇為什么特受歡迎，還解釋了人們對巨大丑聞和罪行為什么著迷關注。

規范化行為植根于情感。它促進社會合作，明顯提供生存優勢，協助人類進化至今。經濟學家主張，盲目遵守規則在經濟上卻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計算得失，就會變得非常昂貴和適得其反。如必須跟伙伴不時談判新規則，我們會陷入癱瘓，無法從事例行的集體行動。我們把某些規則當作目標本身，而不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這一事實大大增加了社會生活的穩定。宗教進一步加強這種穩定，并擴充潛在合作者的圈子。

這在政治上造成難題。很多案例中成效明顯的規則，遇上短期的特殊情況，卻變得蒼白無力，甚至功能失調，因為導致其產生的情形有了大變。制度規則是很“黏糊”的，它抗拒改革，變成政治衰敗的主要根源之一。

### 尋求承認的斗爭

規范被賦予內在價值后，便成為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所謂“尋求承認的斗爭”的目標。[[32]](#m32)尋求承認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經濟行為中獲得物質的欲望。承認不是可供消費的實物，而是一種相互的主觀意識。借此，個人承認他人的價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習俗、信念。我作為鋼琴家或畫家，可能很自信。如能獲獎或售出畫作，我會有更大的滿足。自從人類把自己組織起來，進入社會等級制度后，承認往往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使尋求承認的斗爭，大大有別于經濟交易的斗爭。它是零和（zero sum），而不是正和（positive sum）。即某人獲得承認，必然犧牲他人的尊嚴，地位只是相對的。在地位比賽中不存在貿易中的雙贏情形。[[33]](#m33)

尋求承認的欲望有其生物學根源。黑猩猩和其他靈長目，在各自的族團中，爭奪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體的等級制度提供繁衍優勢，因為它控制群體內的暴力，凝聚成員，一致對外。雄性老大獲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證繁衍成功。在包括人類的各種動物中，尋求地位的行為已成為遺傳，與尋求者大腦中的生化變化直接有關。當猴子或個人順利取得高級地位時，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經傳遞物復合胺（serotonin），會獲得大幅提高。[[34]](#m34)

人類具有更為復雜的認知力，其尋求的承認不同于靈長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為自己尋求承認，而人類還為抽象概念尋求承認，如上帝、旗幟、圣地。當代政治的大部，以尋求承認為中心。對少數民族、女性、同性戀者、土著等來說，尤其如此。他們有歷史理由相信，自身價值從沒得到重視。這些尋求可能有經濟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嚴的標記，并不是目標本身。[[35]](#m35)

我們今天把尋求承認稱作“身份政治”。這類現象主要出現于流動且多元的社會，其成員可具多重身份。[[36]](#m36)甚至在現代世界出現之前，承認已是集體行為的重要動機。人類奮斗，不僅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體，要求外人尊重他們的生活方式——習俗、上帝、傳統。所采取的形式，有時是統治外人，更多時候是相反。人類自由的基本涵義是自治，即避免隸屬于不配的外人。猶太人三千多年前逃離埃及的奴役，以后每逢逾越節所慶祝的，就是此種自由。

承認現象的根本所在是裁決他人的內在價值，或人為的規范、思想和規則。強迫的承認毫無意義，自由人的贊美遠遠勝過奴隸的卑從。群體欽佩某成員，因為他顯示出彪悍、勇氣、智慧、判決糾紛時的公平，政治領袖遂得以產生。政治可說是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但也是追隨者的故事。大眾甘做部屬，愿意給予領袖更高地位。在凝聚且成功的群體中，部屬地位是心甘情愿的，這基于領袖有權統治這一信念。

隨著政治制度的發展，認可自個人移至制度——轉移到持續的規則或行為模式，像英國君主制或美國憲制。在這兩個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統治所帶來的權威。合法性意味著，社會成員大體上承認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項規則。我們相信，當代社會的合法性，表現在民主選舉和尊重法治。但在歷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終以社會凝聚為基礎。凝聚可源自自利，但光是自利不足以誘使追隨者為群體而犧牲自己生命。政治力量不僅是社會可掌控的公民人數和資源，也是對領袖和制度合法性的認可程度。

### 政治發展的基礎

現在，我們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構件來組建政治發展的理論。人類雖然自私，但卻是理性的，如經濟學家所稱的為自利而學會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會性的既定途徑，為人類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 包容適存性、親戚選擇、互惠利他是人類交際性的預設模式。所有的人都傾向于照顧親戚和互換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強烈的懲罰。

· 人享有抽象和理論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關系，又偏愛在無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尋找因果關系。這是宗教信仰的基礎，而宗教又是凝聚社會的重要源泉。

· 人傾向于遵循規范，以情感為基礎，而不是理性。心智模型和其附屬的規則，常被賦予內在價值。

· 人渴望獲得他人的主觀承認，或對自己的價值，或對自己的上帝、法律、習俗、生活方式。獲得的承認成為合法的基礎，合法本身則允許政治權力的實施。

這些自然特征是社會組織益加復雜的基礎。包容適存性和互惠利他，不僅屬于人類，也見于眾多動物，為（主要是）親戚小群體的合作作出了解釋。人類初期的政治組織，很像在靈長目中看到的族團社會，如黑猩猩的。這可被認作社會組織的預設。照顧家人和朋友的傾向，可通過新的規則和獎勵加以克服。譬如，頒發規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種意義上，較高層次的制度則顯得頗不自然，一旦崩潰，人類就會返回較早的社會形式。這就是我講的家族制的基礎。

人類以其抽象理論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環境和調節社會行為的新規則，遠遠超過黑猩猩中存在的規則。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他無形力量的觀念，訂下新規則和相應的獎勵。不同種類的宗教大大提高人類社會的組織程度，并不斷開發社會動員的新形式。

與遵循規范有關的一套高度發達的情感，確保關于世界如何運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現實，也不是可丟棄的簡單理論。（甚至在現代自然科學領域，雖有假設檢驗的明確規則，但科學家偏愛現存理論，寧愿抵制相反的實驗證據。）心智模型和理論常被賦予內在價值，從而促進社會穩定，允許社會的擴展。但這顯示，社會是高度保守的，將頑強抵制對其支配觀念的挑戰。這在宗教思想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世俗的規則，以傳統、禮儀、習俗的名義，也被注入極大的情感。

社會在規則上趨向保守，是政治衰敗的來源之一。因應環境而建立的規則或制度，在新的環境中變得功能失調，卻得不到更換，因為人類已注入強烈情感。這表示，社會變化不會是直線的——隨時勢的變動而作頻繁的小型調整，而是延長的淤滯，繼之以劇烈變革的爆發。

由此說明暴力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對暴斃的恐懼，與獲益或經濟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難為自己的生命或愛人的生命標出一個價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對人類的激發，往往是單純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現是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變化的背景。社會可能陷于功能失調的制度均衡中，因為既得利益者否決任何必要的變革。為打破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脅有時就變得不可或缺。

最后，獲得承認的欲望，確保政治不會降成簡單的經濟自利。人類對他人或制度的內在價值、功用、尊嚴不斷作出裁決，再借此建立等級制度。政治力量最終植根于承認——領袖或制度被公認的合法性，得以贏得追隨者的尊敬。追隨者可能以自利出發，但最強大的政治組織，其合法性以廣受歡迎的觀念思想為基礎。

生物學為我們提供了政治發展的構件。橫跨不同社會的人性是基本不變的。我們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異，不管是現在還是歷史上，首先是人類所處環境的產物。人類社會分支蔓延，填補世界上多樣的自然環境。他們在特定進化（specific evolution）的過程中，發展出與眾不同的規范和思想。此外，各群體也在互動，在促進變化方面，其重要性與自然環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遠的社會，對政治秩序問題卻提出異常相似的解決方案。幾乎每個社會，都曾一度經歷過以親戚關系為基礎組織起來的階段，其規則逐漸變得復雜。多數社會隨后發展了國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國、中東、歐洲和印度的農業社會，得以發展中央集權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聯系的社會，卻發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國、歐洲、南亞政府所建立的鹽業專賣。近年來，民主負責制和人民主權成為普遍接受的規范思想，只在實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會經不同路徑而走到一起，這一重聚提示了人類群體在生物學上的相似。

### 進化與遷移

古人類學家追溯從靈長目先驅到“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的進化。人口遺傳學家所作的貢獻，則是追蹤人類朝地球不同地區的遷移。普遍認為，類人猿至人類的進化在非洲發生。人類離開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經歷了兩次大遷徙。所謂的古人類——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人（Homo 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萬至二百萬年前就離開非洲，遷往亞洲北部。三十至四十萬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達歐洲。他們的后裔就是歐洲后來的人類，如赫赫有名、散居多處的尼安德特人。[[37]](#m37)

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體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現代人類——出現于約二十萬年前。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的出現，約在五萬年前。他們能用語言進行交流，并開始開發較為復雜的社會組織。

依據時下的理論，幾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某群體的后裔。約在五萬年前，這個其成員可能僅150人的群體離開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島的霍爾木茲海峽。雖然缺乏書面材料，但人口遺傳學的最新進展，使古人類學家得以跟蹤此一進程。人類的遺傳，包括Y染色體和含歷史線索的線粒體DNA。Y染色體歸男性獨有，余下的DNA則由母親和父親的染色體重組，代代有別。Y染色體由父親單傳給兒子，基本上完好無損。相比之下，線粒體DNA是陷入人類細胞的細菌痕跡。數百萬年前，它就為細胞活動提供能源。線粒體有它自己的DNA，可與Y染色體媲美，由母親單傳給女兒，也基本上完好無損。Y染色體和線粒體都會積累基因的突變，然后由后代兒子或女兒所繼承。計算這些基因突變，弄清哪個在前哪個在后，人口遺傳學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類群體的血統。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幾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某群體的后裔，因為在中國、新幾內亞、歐洲、南美洲，當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統。（非洲本身有較多血統，因為現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當時非洲數個群體之一的后裔。）該群體在阿拉伯半島分道揚鑣，一個族團沿阿拉伯半島和印度的海岸線，進入現已不存的巽他大陸（Sunda，連接現今的東南亞諸島）和薩浩爾大陸（Sahul，包括新幾內亞和澳洲）。他們的遷移得益于當時出現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凍成冰帽和冰川。與今日相比，當時海平面足足低了數百英尺。依據遺傳定時法（genetic dating），我們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亞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將近四萬六千年。這表示，他們的祖先離開非洲后，僅花費不長時間便抵達這一偏遠角落。

其他族團離開阿拉伯半島后，朝西北和東北兩個方向遷移。前者經過近東和中亞，最終抵達歐洲。在那里，他們遇上早先脫離非洲的古人類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則在中國和亞洲東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時連接西伯利亞和北美洲的陸地橋梁，最終南下至中南美洲。約在公元前一萬二千年，已有人抵達智利南部。[[38]](#m38)

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圣經故事稱，上帝把統一聯合的人類驅散到各地，令他們講不同語言。在比喻意義上，這確是真相。人類遷移到不同環境，隨遇而安，發明新的社會制度，開始退出自然狀態。我們將在之后的章節看到，起初的復雜社會組織，仍以親戚關系為基礎，其出現全靠宗教思想的協助。

## 第3章 表親的專橫

人類社會進化的事實和性質，以及相關的爭議；家庭或族團層次的社會向部落的過渡；介紹血統、宗族和其他人類學基本概念

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4年）發表之后，涌現出大量涉及人類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論。首先在19世紀末，新興人類學的首創者，如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積累了尚存原始社會的實證資料。[[1]](#m1_3)摩爾根對日益減少的北美洲土著進行實地勘察，發明了解釋其親戚關系的詳盡分類，并將此推及歐洲的史前。在《古代社會》一書中，他將人類歷史分為三階段——野性、野蠻、文明，他認為，所有人類社會都須一一經歷這三個階段。

卡爾·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讀了摩爾根的書，運用該美國人類學家的民族學研究，發展出私人財產和家庭的起源理論，之后變成共產世界的福音。[[2]](#m2_3)馬克思和恩格斯攜手推出現代最著名的發展理論：他們設置一系列的進化階段——原始共產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全部由社會階級的基本矛盾所驅動。馬克思主義這一錯誤和從簡的發展模型，誤導了后來數代的學者，或尋找“亞細亞生產方式”，或試圖在印度找到“封建主義”。

早期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第二動力，來自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種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論的進一步闡述。將生物進化原理應用到社會進化上，像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紀初所作的，在邏輯上講得通。[[3]](#m3_3)斯賓塞認為，人類社會都要參與生存競爭，優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歐洲之外社會的發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滯不前。達爾文之后，進化理論在辯護當時的殖民秩序上確實取得成功。全球等級制度的頂端是北歐人，通過黃色和棕色皮膚的深淺不同，一直降至身處底部的黑色非洲人。[[4]](#m4_3)

進化理論中褒貶和種族的特色，釀成20世紀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響世界上人類學和文化研究部門。優秀的人類學家弗蘭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張，人類行為受到社會徹頭徹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學。他在一項著名研究中，以移民頭顱大小的實證資料證明，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歸因于種族的東西，實際上卻是環境和文化的產物。博厄斯還認為，早期社會的研究需摒棄對各式社會組織的高低評估。在方法論上，民族學家應放棄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見，全身心投入他們所研究的社會，評估其內在邏輯。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認為，不同社會只可解說，不可互比，不分軒輊。[[5]](#m5_3)博厄斯的學生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 Kroeber）、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則把文化人類學科繼續引向非評判性的、相對的、絕無進化的方向。

早期的進化理論，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還存有其他問題。它們的社會形式，往往是相對直線的，有嚴謹的等級，前階段必須早于后階段，某元素（像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決定整個階段的特征。隨著對尚存原始社會的知識積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復雜性的進化不是直線的。任何指定的歷史階段，往往包含前階段的特征。將社會推至下一階段，又憑借多重的動態機制。事實上，我們可在以后的章節中看到，前階段并不被后階段完全替代。中國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親戚關系的組織過渡至國家層次。但時至今日，復雜的親戚關系組織，仍是一部分中國社會的特征。

人類社會是非常復雜的，很難由文化的比較研究總結出真正的普遍規律。發現了違反所謂社會發展規律的冷僻社會，人類學家常常感到興奮。但這并不表示，不同社會中沒有進化形式中的規則性和同類性。

### 史前階段

以19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背景，博厄斯派的文化相對論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較人類學的領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求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持久遺產。嚴格的文化相對論，有悖于進化論，因為后者明確要求厘清社會組織的不同層次，并確定后一層次取代前一層次的原因。人類社會隨時間而進化，這是顯而易見的。生物進化的兩個基本組件——變化和選擇——也適合人類社會。即使我們細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評判，但它們確實變得更為復雜、更為豐富、更為強大。因應成功的文明，常常戰勝因應不成功的，恰似個體有機體之間的競爭。我們繼續使用“發展中”或“開發”的名詞（如“發展中國家”和“美國國際開發署”），佐證了下列共識：現存的富裕國家是上一階段社會經濟進化的結果，貧窮國家如有可能，也將參與這一進化過程。在歷史長河中，人類的政治制度借文化而獲得傳遞，與借基因的生物進化相比，則面對更多的悉心設計。達爾文的自然淘汰原則與人類社會的進化競爭，仍有很明顯的類似。

這一新認可導致了進化理論在20世紀中期的復興。人類學家如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6]](#m6_3)、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7]](#m7_2)、埃爾曼·塞維斯（Elman Service）[[8]](#m8_2)、莫頓·弗萊德（Morton Fried）[[9]](#m9_2)和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0]](#m10_2)認為，各式社會在復雜、規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升級。[[11]](#m11_2)根據薩林斯和塞維斯，人類群體都經歷所謂的“特別進化”，以適應他們所占居的生態環境，其結果便是社會形式的多樣化。對社會組織的普遍問題，不同社會往往采取類似的應對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匯的“普遍進化”在生效。[[12]](#m12_2)

人類學家的難題是，沒人能直接觀察，人類社會如何從早期模式發展到較復雜的部落或國家。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設現存的狩獵采集或部落社會是早期模式的實例，再通過觀察其行為來推測引發變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變為國家。可能是基于此，對早期社會進化的推理，已從人類學移至考古學。不像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可通過不同文明在數十萬年間留下的物質記錄，追蹤其社會活力的伸張。例如，考古學家調查普韋布洛（Pueblo）印第安人住宅和飲食的改變，得以了解戰爭和環境壓力對社會組織的改造。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缺乏民族學研究的豐富細節。太依賴考古學記錄，會導致對唯物主義解釋的偏愛，因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認知世界，其大部已永遠丟失。[[13]](#m13_2)

泰勒、摩爾根、恩格斯之后，對社會發展的進化階段的分類系統，也經歷了自身的進化。放棄了具強烈道德色彩的詞句，如“野性”和“野蠻”，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點明主要技術的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鐵器時代。另一系統則點明主要的生產方式，如狩獵采集、農業、工業社會。進化人類學家，以社會或政治組織的形式來排列階段。這是我在此所選用的，也是我的主題。埃爾曼·塞維斯發明了四個層次的分類，即族團、部落、酋邦、國家。族團和部落中[[14]](#m14_2)，社會組織以親戚關系為基礎，成員之間相對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國家等級分明，不以親戚關系而以領土為基礎來行使權力。

### 家庭和族團層次的組織

很多人相信，原始人類社會組織是部落的，這一見解可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比較人類學家，如努馬·丹尼斯·甫斯特爾·德·庫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和亨利·梅因，認為要在復雜的親戚團體中去理解早期的社會生活。[[15]](#m15_2)但部落組織的興起，要到九千年前定居社會和農業出現時。這之前，狩獵采集社會歷時數萬年，由類似靈長目族團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這樣的社會，至今尚存于合適的邊緣環境，如愛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須曼人（Bushmen）、澳洲的土著。[[16]](#m16_2)（也有例外，如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屬狩獵采集者，卻生活于可支撐復雜社會的富饒區域。）

盧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農業的興起，他在這點上是基本正確的。出現農業之前的族團層次社會，不存在任何現代意義的私人財產。就像黑猩猩的族團，狩獵采集者居住于他們守衛的領土，偶爾為之爭斗。但他們不像農人，犯不上在一塊土地上設立標志，說“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團前來侵犯，或有危險獵食者滲入，由于人疏地廣，族團層次的社會有移居他方的選擇。他們較少擁有像已開墾的耕地、房子等投資。[[17]](#m17_2)

族團層次的內部，類似現代經濟交易和個人主義的東西是絕對不存在的。這個階段沒有國家暴政，更確切地說，人類只體驗到社會人類學家厄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所稱的“表親的專橫”。[[18]](#m18_2)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親戚，他們決定你做什么，跟誰結婚，怎樣敬拜，還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數戶家庭合在一起打獵和采集。特別是打獵，與分享直接有關，因為那時沒有儲存肉類的技術，獵到的動物必須馬上吃掉。進化心理學家紛紛推測，現代流行的進餐分享（圣誕節、感恩節、逾越節），都起源于長達數千年的獵物分享傳統。[[19]](#m19_2)此類社會中，大多數的道德規則不是針對偷人財產者，而是針對不愿與人分享者。在永久匱乏的陰影下，拒絕分享往往影響到族團的生存。

族團層次的社會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別僅在年齡和性別上。在狩獵采集社會中，男人打獵，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族團內，家庭之間僅有極小的差別，沒有永久領袖，也沒有等級制度。個人因突出的品質，如力大、智慧、可信，而被授予領袖地位。但該地位是流動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強制的機會非常有限。如弗萊德所說：

簡易平等社會的民族學研究中，很難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這做那”的案例，卻充滿了某人說“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之類的話語。之后他人可能照辦，也可能不予理睬……因為領袖無法迫使他人。在我們的敘述中，領袖扮演的角色只牽涉權威，無關乎權力。[[20]](#m20_2)

此類社會中，領袖因群體的共識而浮現。但他們沒有職權，不能傳予子孫。沒有集中的強制力量，自然就沒有現代意義的第三方執法的法律。[[21]](#m21_2)

族團層次的社會圍繞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類學家所稱的異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會群體，搬到丈夫的居所。這種習慣鼓勵群體之間的交往互動，增加基因的多樣化，創造群體之間發生貿易的條件。異族通婚也在減輕沖突中發揮作用。群體之間有關資源或領土的爭議，可通過女人的交換而獲得諒解，就像歐洲君主為政治目標而安排的戰略性聯姻。[[22]](#m22_2)群體的成員組成，與之后的部落社會相比，則更為流動：“任何地域的食物來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豐收，冬春獵場上海豹的數量，還是中部愛斯基摩人在內陸峽谷遇上馴鹿群的遷移，都是不可預測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親戚，即使想組成凝聚排外的群體，也屢屢遭挫。因為生態機遇時時在誘惑個人和家庭采取機會主義。”[[23]](#m23_2)

### 從族團到部落

農業的發展，使族團層次過渡到部落層次變得可行。九千到一萬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區出現農業，包括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沖積流域。野草和種子的馴化逐一發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興的產糧技術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邏輯的。但埃斯特·博塞魯普（Ester Boserup）認為，這樣講是因果顛倒了。[[24]](#m24_2)無論如何，它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取決于氣候，狩獵采集社會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農業的發明，則允許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到60人。[[25]](#m25_2)至此，人類的相互接觸更加廣泛，便會要求截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來描繪高于族團的新層次社會組織，但用得不夠精確，甚至靠此吃飯的人類學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為原則。

社會學家涂爾干以“分支”一詞來解釋由小型社會單位自我復制而成的社會，如蚯蚓的分段。這樣的社會以添加新的支系而獲得擴展，但沒有集中的政治機構，沒有現代的分工，也沒有他所描繪的“有機”團結。發達社會里，沒有人是自給自足的，每個人都要依賴社會中大批他人。發達社會的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生產自己的糧食、修理自己的汽車、制造自己的手機。在分支式社會中，每個“支系”都是自給自足的，都能豐衣足食，都能自我防衛。因此，涂爾干稱之為“機械”團結。[[26]](#m26_2)各支系可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衛，但他們不依賴對方以獲生存。在同一層次上，每個人只能屬于一個支系。

部落社會里，支系以共同老祖宗為原則。其最基本單位是宗族，成員們可追溯到好幾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類學家使用的術語中，后裔可以是單傳（unilineal），也可是雙傳（cognatic）。單傳系統中，后裔追隨父親，被標為父系；追隨母親，被標為母系。雙傳系統中，后裔可追隨父母雙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支式社會只能是單傳。為了避免支系的重疊，每名小孩只可分給一個后裔群，或是父親的，或是母親的。

在中國、印度、中東、非洲、大洋洲、希臘、羅馬曾經流行的宗族組織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戰勝歐洲的野蠻部落。羅馬人稱之為 agnatio（族親），人類學家遂稱之為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蹤男性的血脈。女人結婚時，便離開自己家族，轉而加入丈夫家族。中國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幾乎徹底切斷與自己家族的聯系。所以，婚姻之日變成妻子的父母悲傷時，只能在女兒的聘禮上獲求補償。女人在丈夫家里沒有地位，直到生下兒子。其時，她徹底融入丈夫的宗族組織，在她丈夫的祖先墳前禱告祭祀，保障兒子將來的遺產。

父系家族雖是最普遍，但不是單傳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會里，后裔和遺產追隨母親家族。母系社會（matrilineal）不同于女性掌權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長社會（matriarchal）。似乎沒有證據顯示，真正的女家長社會真有存在。母系社會僅表示，結婚時是男子離開自己家族，轉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權力和資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權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27]](#m27_2)母系社會遠比父系社會罕見，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亞、東南亞、美國西南部、非洲。埃爾曼·塞維斯指出，它們通常建立于特殊環境，如依靠女人勞作的雨林園藝區域。但該理論無法說明，為什么美國西南沙漠地帶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會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28]](#m28_1)

宗族有個神奇的特點，只要追溯到更早祖先，便能進入更為龐大的宗族組織。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爺爺的小宗族成員，鄰人的爺爺便是外人。如作進一步的追溯，到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早，我們兩個宗族又找到親戚關系。如情況合適，大家就有可能攜手合作。

此類社會的經典描述是愛德華·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對努爾人（Nuer）的研究，他的著作《努爾人》為數代人類學的學生所必讀。[[29]](#m29_1)努爾人是居住在蘇丹南方養牛的游牧民族。20世紀末，他們和傳統對手的丁卡人（Dinka）聯合起來，在約翰·加朗（John Garang）和蘇丹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開長期斗爭，以爭取南方獨立。但在20世紀30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進行實地考察時，蘇丹仍是英國殖民地，努爾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傳統中。

根據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部落是分支式的。我們把最大的支系，稱之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割成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部落……第三層次由數個村莊組成，其居民相互之間都有親戚和家庭的關系”。[[30]](#m30_1)

努爾人的宗族組織彼此經常打架，通常是為了在他們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層次內，血統之間互相打斗。但他們又能聯合起來，在更高層次作戰。到了最高層，全體努爾人同仇敵愾，向以同樣方法組織起來的丁卡人開戰。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釋說：

每個支系，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員互相存有敵意。為反對同樣層次的鄰近支系，支系的成員會聯合起來；為反對更高層次的支系，又會與同樣層次的鄰近支系聯合起來。努爾人以政治價值來解釋這些聯合原則，他們會說：如果婁（Lou）部落的郎（Leng）第三層次支系與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層次支系打仗——事實上，兩支系之間戰事頻頻——組成這兩支系的各個村莊都會參戰；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層次支系與魯莫喬科（Rumjok）第二層次支系發生爭執——不久前，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將團結起來，以反對共同敵人魯莫喬科。魯莫喬科也將組成其各支系的聯盟。[[31]](#m31_1)

各支系能在較高的層次匯總。一旦聯合的原因（如外部威脅）消失，它們又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眾多不同的部落社會中，看到多層次的支系。它體現在阿拉伯的諺語中：“我針對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針對我表親、我和我表親針對陌生人。”

努爾人社會里沒有國家，沒有執行法律的中央權威，沒有制度化的領導等級。像族團層次的社會，努爾人社會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間有分工，宗族之內有分代的年齡級別。所謂的豹皮酋長，只扮演禮儀的角色，幫助解決成員的沖突，但沒有強迫他人的權力。“在整體上我們可以說，努爾人酋長是神圣的人，但這神圣并沒給他們帶來特殊場合之外的權力。我從未看到，努爾人特別尊敬酋長，或在談話中把他們當作重要人物。”[[32]](#m32_1)

努爾人是分支世系組織獲得充分發展的范例，其宗族系譜的規則嚴格決定社會的結構和地位。其他的部落社會，則更為松散。共同老祖宗，與其說是嚴格的親戚規定，倒不如說是建立社會義務的借口。甚至在努爾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帶入宗族，視之為親戚（人類學家稱之為虛擬的親戚關系）。很多時候，親戚關系只是政治聯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構建社團的原動力。中國的宗族往往有成千上萬的成員，整個村莊使用同樣的姓，這顯示中國親戚關系的假想和包容。當西西里島的黑手黨把自己稱作“家庭”時，它的血誓僅是血親的象征。現代的種族劃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很遠，使宗族系譜的追溯變得異常艱難。我們把肯尼亞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庫尤（Kikuyus）稱作部落，該稱呼是非常松散的，因為他們各自的人數，少至數十萬，多至數百萬。[[33]](#m33_1)

### 祖先和宗教

實際上，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曾經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傾向于相信，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學上的原因。但弄不清，為什么你想與四圈之外的表親合作，而不愿與非親的熟人合作。難道，這只是因為你與表親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動物不這樣做，族團層次的人也不這樣做。人類社會到處建立部落組織，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對死去祖先的崇拜。

對死去祖先的崇拜開始于族團層次社會，每個族團內都會有巫師或宗教人，專司與死去祖先聯絡的工作。隨著宗族的發展，宗教變得更加復雜，更加建制化，反過來又影響其他制度，如領導權和產權。相信死去祖先對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會的動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甫斯特爾·德·庫朗日，提供了有關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1864年，給數代歐洲人帶來啟示。歐洲人習慣于把希臘和羅馬的宗教與奧林匹克的眾神掛起鉤來。甫斯特爾·德·庫朗日則揭示更古老的宗教傳統，其他印歐群體，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也在遵循這一古老傳統。他認為，對希臘和羅馬人來說，死者的靈魂并不飛上天國，卻住在葬地的底下。基于此，“他們總是陪葬他們認為死者需要的東西——服裝、器皿、武器。他們在他墳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饑。他們殉葬馬匹和奴隸，認為這些生命將在墳里為死者繼續服務，就像生前一樣”。[[34]](#m34_1)死者的精靈——拉丁文是manes——需要在世的親戚不斷的維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飲料，免得他們發怒。

在最早期的比較人類學家中，甫斯特爾·德·庫朗日的知識領域遠遠超出歐洲史。他注意到，靈魂轉世（死時靈魂進入另一肉體）和婆羅門宗教的興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類似希臘羅馬的祖先崇拜。亨利·梅因也強調這一點，他認為，祖先崇拜“影響著自稱為印度教徒的大多數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數人的眼中，自己家神比整個印度萬神廟更為重要”。[[35]](#m35_1)假如庫朗日的知識領域涉及更遠，他很有可能發現古代中國相似的葬禮。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滿了青銅和陶瓷的三足鼎、食物、馬、奴隸、計劃陪伴死者的妾。[[36]](#m36_1)像希臘和羅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養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遠不得熄滅，除非家族本身不復存在。[[37]](#m37_1)所有這些文化中，圣火被當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這里家庭不僅是現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會中，宗教生活和親戚關系緊密相連。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個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對自己祖先有責任，對你鄰居或酋長的祖先則沒有責任。通常，祖先并不久遠，不像所謂的羅馬人祖先的羅慕路斯（Romulus）。祖先只是三或四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還記得。[[38]](#m38_1)根據甫斯特爾·德·庫朗日，它絲毫不像基督教對圣徒的崇拜：“葬禮的禮儀只容最親近的親戚做虔誠表演……他們相信，祖先不會接受他人的奉獻，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靈魂。因此，結婚和育有男性后裔變得非常重要。大多數情形下，獨身在早期希臘和羅馬都是非法的。

這些信念的結果是，除了現存子女，每個人與死去的祖先和未來的后裔都有關聯。裴達禮（Hugh Baker）這樣解釋中國的宗族關系，一條繩子代表血脈，“兩端是無窮盡的，經過一把象征現在的剃刀。如果繩子遭到腰斬，兩端就會自行掉離，繩子不復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無后，其祖先和后裔的連續體便跟著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須的，因為他是整體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無關緊要的”。[[39]](#m39)

部落社會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現的思想，對社會組織有極大影響。對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眾人，其規模大大超過家庭或族團層次。該“共同體”包括的，不僅是宗族、氏族、部落現有成員，而且是祖先和未來后裔的整條繩子。甚至最疏遠的親戚都會覺得，他們之間有牽連和職責。這種感受，借共同體共同遵循的禮儀，而獲得加強。對如此的社會制度，成員不相信有選擇的權力。說得確切些，他們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會預定。[[40]](#m40)

### 宗教和權力

軍事上，部落社會遠比族團層次社會強大。一獲通知，他們可動員數百乃至數千名的親戚。第一個以祖先崇拜來動員大量親戚的社會，很可能享有對付敵人的巨大優勢。一經發明，它就會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戰爭不僅造就了國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進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們要問：部落組織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結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強既存的社會組織？很多19世紀的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和涂爾干，都相信后者。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眾的“麻醉劑”，它是精英們發明出來以鞏固其階級特權的神話。據我所知，他沒有對部落社會的祖先崇拜發表過任何意見。但也可推而廣之，說家長在操縱死去祖先的憤怒，以加強自己在活人中的權威。另一解釋是，需要幫助以對抗共同敵人的族團領袖，為贏得鄰人支持，而求援于傳奇或神話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雖是他的首倡，但這想法蔓延滋長后自成一體。

很不幸，我們只能推測思想與物質利益之間的因果關系，因為無人目睹從族團層次到部落社會的過渡。考慮到宗教觀念在后來歷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關系不是雙向交流的，人們反而會感到驚訝。宗教創意影響社會組織，物質利益也影響宗教觀念。但要記住，部落社會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會崩潰時回歸的首選。它出現于家庭和族團層次社會之后，只在特殊環境中繁榮昌盛。它產生于特定歷史時期，靠某種宗教信仰獲得維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發生變化，部落社會就會分崩離析。我們將在第19章看到，這就是基督教挺進野蠻歐洲后所發生的。隨時間流逝，部落社會被更有彈性、更易擴張的社會所取代，但其縮了水的變種從未消失。

## 第4章 部落社會的財產、正義、戰爭

親戚關系和產權發展；部落社會中正義的性質；部落社會作為軍事組織；部落組織的優缺點

法國大革命以來，分隔左右兩派的最大爭議之一就是私人財產。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將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標為己產的首位男人。卡爾·馬克思把廢除私有財產定為政治目標，受他激勵的所有共產黨政權，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產工具的國有化”，不單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國創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論》第10篇中堅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護個人不均平的致富能力。[[1]](#m1_4)現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將私人產權視作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諾斯的話，“增長根本不會發生，除非現存經濟組織是高效的”，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制度和產權”。[[2]](#m2_4)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生了里根—撒切爾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場導向的政策制定者，其當務之急就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提高經濟效率，雖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對。

共產主義的經驗，大大提升了現代私人財產的重要性。基于對摩爾根等人類學家的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階級剝削興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是共產主義意圖恢復的理想國。摩爾根描述的慣例財產（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處的親戚團體所擁有。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則強迫數百萬無親無故的農民，參加集體農莊。集體化打破努力和報酬之間的關聯，摧毀對工作的獎勵，在俄羅斯和中國造成大規模饑荒，嚴重降低農業生產力。在前蘇聯，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卻提供將近四分之一的農業總產量。1978年中國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鄧小平的領導下獲得解散，農業產量僅在四年間就翻了一番。

私人財產重要性的爭論，大都牽涉所謂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傳統英國村莊，其放牧地由村莊居民集體所擁有，共同使用。但其資源是可耗盡的，常因使用過度而荒蕪。將共有財產轉為私人財產是避免荒蕪的對策。業主甘心投資于維護，在持續基礎上開發資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文章認為，眾多全球性的資源，如潔凈空氣和漁場等，都會遇上公地悲劇；如無私人產權或嚴格管理，將因過度消耗而變得一無用處。[[3]](#m3_4)

現代有關產權的非歷史性討論中，人們往往覺得，因為缺乏現代私人產權，人類一直面對公地悲劇。集體所有與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馳的。[[4]](#m4_4)現代產權的出現被認為是經濟上的理性行為，人們討價還價來分割共有財產，就像霍布斯的“利維坦”從自然狀態中脫穎而出。如此解釋會遇上兩個疑問。第一，現代產權出現之前，曾存在各種各樣的共有財產，雖未能像現代產權那樣鼓勵高效地使用，但也沒導致類似的公地悲劇。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來證明，現代產權始于和平自發的討價還價。共有財產讓位于現代產權，其過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騙扮演了重要角色。[[5]](#m5_4)

### 親戚關系和私人財產

最早的私人財產，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宗族或其他親戚團體。主要動機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宗教和社會的。20世紀蘇聯和中國的強迫性集體化，試圖逆轉時光，進入想象的、從未存在的理想國。它們讓無親戚關系的人合在一起，擁有共同財產。

把希臘和羅馬人的家庭牽連到具體地產的有兩樣東西：屋內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墳。渴望得到地產，不僅是為了它的生產潛力，還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動的家灶。地產必須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國家才無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財產缺乏現代產權的重要特征，通常只是使用權（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6]](#m6_4)其主人不是單獨的業主，而是現存和死去親戚的整個社團。財產就像一種信托，為了死去的祖先和未來的后裔。很多現代社會也有類似安排。20世紀初，一名尼日利亞酋長說，“我想，地產屬于一個大家庭，其成員中，很多已死，少數還活著，還有無數尚未出生的”。[[7]](#m7_3)地產和親戚關系由此而緊密相連。它使你有能力照顧前世和后世的親人，并通過與你休戚相關的祖先和后裔來照顧你本人。

淪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親戚團體受土地的束縛，因為他們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臘和羅馬人。[[8]](#m8_3)西非的長期定居點則有不同形式的宗教運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為土地祭司來維持土地廟，并主持有關土地使用的各式禮儀。新移民不是通過買賣，而是通過加入當地禮儀社團，以取得土地使用權。社團把種植、狩獵、捕魚權，當作社團會員的特權，但不是永久的。[[9]](#m9_3)

部落社會中，財產有時由部落集體擁有。歷史人類學家保羅·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繪凱爾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親戚關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們集體擁有土地，其地界往往與村莊邊界不同，像蜘蛛網分布在不同定居點”。[[10]](#m10_3)集體擁有并不表示集體耕耘，像20世紀蘇聯或中國的集體農莊，個別家庭經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他情況下，個人可以擁有地產，但受嚴重限制，因為他有對親戚的義務——活的、死的，還有未出生的。[[11]](#m11_3)你的土地挨著你表親的，收獲時互相合作，很難想象將你的土地賣給陌生人。如你死而無后，你的土地歸還給親戚團體，部落經常有權再分配地產。根據維諾格拉多夫，在印度的邊界地區，戰勝的部落在大塊土地上定居下來，但沒把土地劃分給親戚。有時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證明部落對土地的有效統治。[[12]](#m12_3)

現代的美拉尼西亞，仍有親戚團體的共有財產。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財產。采礦公司或棕櫚油公司想買地產，必須應付整個一語部落。[[13]](#m13_3)任何交易，部落中每個人都享有潛在的否決權，而且不受時效法律限制。因此，某親戚團體決定將土地賣給公司；十年后，另一團體會站出來說土地是他們的，只在數代前被人偷走了。[[14]](#m14_3)還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況下出賣土地，因為祖先的神靈仍在那里居住。

親戚團體中的個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財產，不能將之出售。但這并不表示，他們會忽略或不負責任。部落社會中的產權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15]](#m15_3)部落擁有的財產是否得到很好照顧，與部落內部的聚合力有關，與部落所有權無關。哈丁敘述的共有財產災難，在英國歷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災難，尚不清楚。因議會圈地運動（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終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紀的富裕地主，懷有強烈動機，把農民趕出共有地產。起初，敞田制與親戚關系有關，以鄰里耕耘者的團結為前提[[16]](#m16_3)，通常沒有使用過度和浪費的現象。[[17]](#m17_3)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國鄉村中社會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他運作良好的部落社會里，很難找到公地悲劇的紀錄。[[18]](#m18_3)此類問題，肯定沒有騷擾美拉尼西亞。

努爾人那樣的部落社會，從事畜牧而非農業，其規則略有不同。他們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護的墳墓，乃因追隨牛群而要跋涉寬廣地域。他們對土地的權利不是排他的，只是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臘和羅馬家庭的土地。[[19]](#m19_3)權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這并不表示牧場一定會遭到過度開發。肯尼亞的圖爾卡納人（Turkana）和馬賽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來尼人（Fulani），都發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場但拒絕外人的制度。[[20]](#m20_3)

西方人沒能理解共有財產的性質，以及它與親戚團體的難解難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調的根源之一。歐洲殖民官員相信，缺乏現代產權，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產權是獨立且可轉讓的，并獲法律制度的確認。很多人相信，如聽任自由，非洲人將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m21_3)他們自己也有私心，或為天然資源，或為商業農場，或代表歐洲移民。他們想獲得地契，便假設酋長“擁有”部落土地，宛如歐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簽約轉讓。[[22]](#m22_3)在其他情況下，他們請酋長做代理人，不僅為了土地，還把他招為殖民政府的一員。非洲的部落社會中，傳統領袖的權力曾受到復雜親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馬哈默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認為，歐洲人欲建立現代產權，故意讓一幫貪婪的非洲頭人攫取權力，以非傳統的方式欺負自己部落的伙伴，從而助長了獨立后世襲政府的滋長。[[23]](#m23_3)

### 法律和正義

部落社會只有軟弱的中央權威——頭人或酋長，因此，其強制他人的能力遠遠低于國家。他們沒有現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執法。維諾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會中的正義，有點像現代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各式各樣的主權決策者，有時互相談判，有時全靠自助。[[24]](#m24_3)埃文斯—普理查德如此解說努爾人的正義：

血親復仇是部落社會的規則，發生于違反法律之后，以獲補償。事實上，對血親復仇的恐懼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懲罰，也是個人生命和財產的主要保障……個人覺得受了損害，但投訴無門，無法得到賠償。所以，他便向損害自己的人提出決斗，這一挑戰必須獲得接受。[[25]](#m25_3)

顯而易見，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懲罰”都是泛指的，因為國家層次的法律與部落社會的正義很少存在關聯。

然而，如何實施血親復仇，又有一套規則。遇害努爾人的親戚，可以追緝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親，但不能碰作案者母親的兄弟、父親的姐妹、母親的姐妹，因為他們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員。豹皮酋長會在中間調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尋求避難和遵循禮儀，以凈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關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禮儀，以防沖突的擴大。例如，將傷害對方的矛送到受害者的村莊，以獲魔法處理，從而避免傷口變得致命。豹皮酋長作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權威。他與被告村莊的其他長者一起，傾聽對方的申述，但沒權執行判決，就像無法執行現代國家之間判決的聯合國仲裁人。仍以國際關系為例，實力是至關重要的，弱小的宗族很難從強大的宗族獲得賠償。[[26]](#m26_3)討回公道的程度，則取決于爭執雙方出于自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親復仇逐步升級，造成更多傷害。

實際上，所有部落社會都有尋求正義的相似規則：親戚們有義務為受害者尋求報仇和賠償；無約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幫助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各種犯罪相對稱的賠償表，北歐日耳曼部落將之稱為賠償金（wergeld）。《貝奧武夫》（Beowulf）傳奇，就是一篇親戚為遇害者尋求報仇或賠償的英雄敘事長詩。不同的部落社會，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馬斯河（Klamath）的印第安社會中，“尤羅克（Yurok）人如想提出訴求，就要雇用二、三或四名越界者（crosser）。他們是來自其他社團的非親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這群人合在一起充當中間人，確定訴求和反駁，并收集證據。聽過所有證據之后，越界者會作出賠償裁決”。[[27]](#m27_3)像努爾人的豹皮酋長，越界者無權執行自己的判決，如當事人拒絕接受裁決，只能付諸排斥的威脅。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實，使之較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將來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伙伴的支持。因此，付出賠償是得到鼓勵的。[[28]](#m28_2)

同樣，自6世紀克洛維一世（Clovis）時代以來，薩利族法蘭克人（Salian Franks）在日耳曼各部落中勝出，他們的薩利克法典（Lex Salica）也建立正義規則：“薩利族法蘭克部落成員，如向鄰居提出訴求，在傳召對方時一定要遵循精確的程序。他必須前往對方居處，在其他目擊者面前宣布自己的訴求，并定下對方出席司法聚會的日期。如被告不來，他必須數次重復如此的傳召。”維諾格拉多夫總結說：“我們清楚看到部落社會司法的固有弱點：其法律裁決的執行，通常不靠最高權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訴訟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說，這是部落社會在司法上批準和認可的自助。”[[29]](#m29_2)

第三方強制執行司法裁決，還必須等待國家的出現。但部落社會確實開發了愈益復雜的制度，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糾紛中提供妥當的裁決。部落法律通常不是書面的，但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賠償額，仍需要監護人。斯堪的納維亞發明了雷格曼一職（laghman），他是民選的法律專家，專門在審訊時發表有關法律規則的演講。

民眾聚會起源于部落糾紛的判決。《伊利亞特》（Iliad）有關阿喀琉斯護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節，就描述一場涉及被殺男子價格的爭論，在市場的大庭廣眾面前發生，再由部落長者讀出最后的裁決。講個更具體的案例，執行薩利克法律的是條頓制度（Teutonic），稱作百戶法庭，由當地村民組成，即現代模擬法庭（moot court）的源頭。百戶法庭在露天開會，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戶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選的，他主持實際上的仲裁法庭。亨利·梅因認為，“其主要功能是讓熱血有時間冷卻，防止人們自行尋求賠償，把爭執接管過來，并協調賠償的方法。如有不服從法庭的，最早的懲罰可能是逐入另冊。不愿遵守其判決的人，將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被殺，其親戚們迫于輿論壓力，將不得參與本屬職責和權利的復仇”。[[30]](#m30_2)梅因指出，英國國王也派代表出席類似的法庭，最初是為了分享罰款。隨著國家的出現，英國國王逐漸堅持自己的裁決權和更重要的執法權（參看第17章）。百戶法庭和主席一職，作為司法制度早已消失，作為地方政府的工具卻得以保存。我們將看到，它最終成為現代民主代議制的一部分。

### 戰爭和軍事組織

迄今為止，我還沒從理論上解說，人類為什么自族團層次過渡到部落社會。我只提及，它與歷史上出現農業后生產力大大提高有關。農業使人口的高度密集成為可能，并間接創造了對大型社會和私人財產的需求。如我們所見，私人財產與復雜的親戚組織，緊密糾結，盤根錯節。

人類過渡到部落社會的另一原因是戰爭。定居的農業社會的發展意味著，人類群體變成近鄰。他們生產的糧食，遠遠超過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動產和不動產需要保護，或可供偷竊。部落社會的規模，遠遠超過族團層次，在人口數量上可壓倒后者。它還有其他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上的靈活性。我們在努爾人身上看到，部落社會遇上緊急狀況可迅速擴展，不同層次的分支能組成各式聯盟。愷撒在介紹他所戰勝的高盧人（Gauls）時指出，一俟戰爭爆發，其部落便選出聯盟的共同領袖，開始對他手下行使生死權。[[31]](#m31_2)基于此，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奪性的擴張組織”。[[32]](#m32_2)

類人猿祖先和人類的連貫性似乎是暴力傾向。霍布斯有個著名斷言：自然狀態是“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盧梭則不同，明確表示霍布斯弄錯了。他認為，原始人是溫和隔絕的，只是在社會使人腐化的較晚階段才出現暴力。霍布斯比較接近事實，但要有重大調整，即暴力應發生于社會群體中，而不是隔離的個人之間。人類高度成熟的社交技術和合作能力，與黑猩猩和人類社會中常見的暴力并不矛盾。說得確切些，前者還是后者的必要條件。這表示暴力是一項社交活動，參與者是成群結隊的雄性，有時還有雌性。黑猩猩或人類都面對同類的暴力威脅，因此需要更多的社會合作。孤獨者容易受到相鄰領土的打劫幫派的攻擊，與伙伴攜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將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

對很多人來說，人性中的暴力傾向是很難接受的。眾多人類學家像盧梭一樣，堅信暴力是文明社會的產物。還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會懂得如何與生態環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無法找到任何證據來支撐這兩種觀點。人類學家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學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詳盡的考古記錄顯示，史前人類社會的暴力一直持續不斷。[[33]](#m33_2)基利還指出，根據跨文化的調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會——族團、部落、酋邦的層次——參與戰爭。這樣的社會中，只有極少數經歷低水平的突襲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環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鄰人來犯。[[34]](#m34_2)狩獵采集者的殘余群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須曼人和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兇殺率是美國的四倍。[[35]](#m35_2)

就黑猩猩和人類而言，狩獵似乎是戰爭的源泉。[[36]](#m36_2)黑猩猩組織起來，成群結隊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樣技術追捕其他黑猩猩。人類也是如此，只不過人類的獵物更大、更危險，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會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將狩獵技術用于殺人是司空見慣的，我們有歷史記錄。例如，蒙古人的騎術和馬背上打獵，正好用來對付敵人。人類完善了追獵大動物的技術，以致考古學家往往把某處巨大動物群的絕跡，定在人類遷移至該地的時期。乳齒象、劍齒虎、巨型鴯鹋、大樹懶——這些大動物，似乎都被組織良好的原始獵人斬盡殺絕了。

隨著部落社會的出現，我們看到武士階層的興起，還看到人類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組織，即領袖和他的武裝侍從。后續的歷史中，這種組織實際上無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軍閥和手下、民兵隊、販毒卡特爾、社區幫派。他們掌握了武器和戰爭的專門技術，開始行使以前族團層次中所沒有的強制權力。

部落社會中，致富顯然是發動戰爭的動機。講到10世紀末戰勝俄羅斯的維京人精英時，歷史學家杰羅姆·布魯姆（Jerome Blum）說：

君主（維京人酋長）支持和保護他的侍從，以換取他們的服務。起初，他們與君主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員。其贍養費，則靠斬獲的戰利品和部落上繳的保護費……弗拉基米爾王的侍從埋怨，因為沒有銀勺，他們必須用木勺進食。君主旋即命令，趕快安排銀勺，并說“金銀難買侍從，有了侍從，就能獲得金銀”。[[37]](#m37_2)

20世紀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兩國淪為軍閥混戰，因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和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積極招募侍從。這次，他們憑借武裝侍從爭奪的不是銀勺，而是血鉆石。

但戰爭的爆發，不單單依靠致富的沖動。武士可能貪婪金銀，但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勇敢，不是為了資源，而是為了榮譽。[[38]](#m38_2)為一個目標而甘冒生命危險，為獲得其他武士的認可，這就是榮譽。請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紀編寫的日耳曼部落歷史，這是有關歐洲人祖先的罕見的同代人觀察：

侍從中有很大競爭，決定誰是酋長手下第一副將；酋長中也有很大競爭，決定誰擁有最多、最犀利的侍從。身邊有大量精選青年的簇擁，這意味著等級和實力……到達戰場時，酋長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從的膂力跟不上酋長的，那是丟臉；比酋長活得更久，得以離開戰場的，那是終身的臭名和恥辱；保衛酋長，以壯舉頌揚酋長，那是侍從忠誠的精髓。酋長為勝利而戰，侍從為酋長而戰。[[39]](#m39_1)

即使從事農業或貿易的報酬更高，武士也不愿與農夫或商人交換地位，因為致富只是其動機的一部分。武士發現農夫生活可鄙，因為它不共擔危險和團結：

如果出生地的社區長期享有和平和寧靜，很多出身高貴的青年，寧可自愿尋求其時忙于戰爭的其他部落；休息于比賽無補，他們更容易在動亂中功成名就；再說，除了戰爭和暴力，你很難挽留優秀的侍從……說服他們向敵人挑戰，以傷疤為榮，比讓他們犁地以待豐收更為容易；憑流血可獲的，你偏要通過辛苦勞作，這似乎有點窩囊和閑散。[[40]](#m40_1)

塔西佗評論，戰爭之間的空閑期，年輕武士們懶散度日，因為從事任何民間工作只會降低他們的身份。這種武士道德被取代，一直要等到歐洲資產階級興起的17和18世紀。其時，以獲利和經濟計算為內涵的道德規范替代榮譽，成為杰出人士的標志。[[41]](#m41)

政治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其原因之一，就是無法預知領袖與侍從之間的道德信任。他們的共同利益以經濟為主，組織起來主要是為了掠奪。但單靠經濟是不能把追隨者與領袖捆綁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美國與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作戰時，它相信戰場上失敗將迅速導致其政府的倒臺，因為他的重要部屬會意識到，去掉侯賽因應是一件好事。但那些部屬，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聯系，加上害怕，結果卻緊密團結，同舟共濟。

長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誠，是凝聚力的非經濟原因。部落社會向親戚關系注入宗教意義和神靈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沒有土地和其他財產的年輕人組成。他們身上荷爾蒙高漲，偏愛冒險生活，對他們而言，經濟資源不是掠奪的唯一對象。我們不應低估，性和俘獲女人在造就政治組織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通常用女人作為交換中介的分支式社會。這些社會相對狹小，由于缺少非親女子，其成員往往通過對外侵略來遵循異族通婚的規則。蒙古帝國的創始者成吉思汗，據稱如此宣稱：“最大的快樂是……擊敗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剝奪他們的財富、看他們的親人痛哭流涕、騎他們的馬、把他們的妻女擁入懷中。”[[42]](#m42)在實現最后一項抱負上，他是相當成功的。根據DNA的測試，亞洲很大一塊地區，其現存的男性居民中約有8%是他的后裔，或屬于他的血統。[[43]](#m43)

部落社會中的酋長和侍從，不同于國家層次中的將軍和軍隊，因為兩者的領導性質和權威是截然不同的。在努爾人中，豹皮酋長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沒有指揮權，也不是世襲的。現代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或所羅門群島，其頭人處于同等地位。根據傳統，他是親戚們選出的，也可能會以同樣方式失去該職。塔西佗寫道，日耳曼部落中，“他們國王的權力不是無限或任意的；他們的將軍不是通過命令，而是通過榜樣及他人由衷的贊美，站在隊伍的前列來控制人民”。[[44]](#m44)其他部落則組織得更為松懈。“19世紀的科曼奇（Comanche）印第安人，甚至沒有稱作部落的政治組織，沒有率領百姓的強悍酋長……科曼奇的人口，由大量組織松散的自治族團組成，沒有應付戰爭的正式組織。戰爭頭領只是戰績累累的杰出戰士；如能說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動員一支戰斗隊伍；但其領導地位只在攻襲期間有效，還必須依賴他人的自愿。”[[45]](#m45)等到歐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軍事壓力，夏安人（Cheyenne）等的印第安部落才開始發展出持久和集中的指揮機構，如固定的部落會議。[[46]](#m46)

疏松且分散的組織，對部落社會來說，既是優點，也是缺點。他們聯網的組織，有時可以發起強大的攻擊。配備以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遠方，征服廣袤的領土。阿爾莫哈德王朝就是一個案例，其柏柏爾部落在12世紀突然崛起，征服了北非全地和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斯。沒人可與蒙古帝國媲美，他們來自亞洲內陸的大本營，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設法攻克了中亞、中東大部、俄羅斯、部分東歐、印度北部、整個中國。但其永久領導的缺席、分支式聯盟的松散、繼位規則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會最終衰弱的命運。他們沒有永久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能力，無法治理征服的領土，只好依賴當地定居社會提供的例行管理。幾乎所有征戰的部落社會——至少是沒能迅速演進為國家層次的——都會在一代或兩代以內四分五裂，因為兄弟、表親、孫子都要爭奪創始領袖的遺產。

國家層次的社會，在繼承部落層次的社會后，其中的部落制并不消失。在中國、印度、中東、哥倫布到來之前的美洲，國家制度只是重疊在部落制度上，兩者長期共存，處于勉強的平衡。早期現代化理論的錯誤，一是認為政治、經濟、文化必須相互匹配，二是認為不同歷史“階段”之間的過渡是干凈和不可逆轉的。世界上只有歐洲，自覺自愿和個人主義的社會關系完全取代部落制，基督教發揮決定性作用，打破了以親戚關系為凝聚基礎的傳統。多數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都是歐洲人。他們假設，世界其他地區走上現代化，會經歷與親戚關系的類似告別，但他們錯了。中國雖是發明現代國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卻從未能成功壓抑親戚關系的弄權。因此，其兩千年政治歷史的大部分，一直圍繞在如何阻止親戚關系重新滲透國家行政機構。在印度，親戚關系與宗教互動，演變成種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會的最好特征。從美拉尼西亞的一語部落、阿拉伯部落、臺灣人宗族，到玻利維亞的“艾柳”（ayllu）村社，復雜的親戚關系組織仍是現代世界眾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場所，并塑造其與現代政治制度的互動。

### 從部落制到保護人—依附者和政治機器

我以親戚關系來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會也在進化。分支世系制的嚴格系譜，慢慢變成父母雙傳的部落，甚至是接受無親戚關系成員的部落。如果我們采用更廣泛的定義，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親戚，還包括因互惠和私人關系而綁在一起的保護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發展的常數。

例如在羅馬，甫斯特爾·德·庫朗日所描述的父系親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國初期，家族開始積累大量無親戚關系的追隨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們由自由民、佃戶、家庭侍從所組成，到后來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換取金錢或其他好處的貧窮平民（plebeian）。從共和國晚期至帝國初期，羅馬的政治離不開強悍領袖動員各自依附者來攫取國家機構，像愷撒、蘇拉（Sulla）、龐培。富有的保護人，把他們的依附者編成私人軍隊。在考察共和國末期的羅馬政治時，歷史學家塞繆爾·芬納（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拋開具體人物……你會發現所有這些爾虞我詐、大公無私、高貴莊嚴，并不比一個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國多多少。如果把羅馬共和國看成是弗里多尼亞共和國（Freedonian Republic），將時間設在19世紀中期，將蘇拉、龐培和愷撒想象成加西亞·洛佩茲、佩德羅·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會發現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由依附者構成的派系、私人軍隊和對總統職位的武裝爭奪”。[[47]](#m47)

寬泛意義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實。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國以來，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體，但印度政治家在議會競選中，仍需依賴保護人和依附者之間的私人關系。嚴格講，這些關系有時仍屬部落的，因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較窮、較落后的地區。其他時候，政治支持以種姓制度或宗派主義為基礎。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與支持者的社會關系，與在親戚團體中的一模一樣。它仍建基于領袖和追隨者的相互交換恩惠：領袖幫助促進團體利益，團體幫他獲得競選。異曲同工的是美國城市的贊助政治。其政治機器所依據的，仍是誰為誰搔了癢，而不是意識形態和公共政策的“現代”動機。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關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爭，仍在21世紀繼續。

## 第5章 “利維坦”的降臨

不同于部落社會的國家層次社會；國家的“原生”形成和競爭形成；國家形成的不同理論，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論；國家為何僅出現于部分地區

與部落社會相比，國家層次社會具有下列重要差別：[[1]](#m1_5)

第一，它們享有集中的權力，不管是國王、總統，還是首相。該權力委任等級分明的下屬，至少在原則上，有能力在整個社會執行統一規則。該權力超越領土中所有其他權力，這表示它享有主權。各級行政機關，如副首腦、郡長、地方行政官，憑借與主權的正式關聯而獲得決策權。

第二，該權力的后盾是對合法強制權力的壟斷，體現在軍隊和警察上。國家有足夠權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區的自行退出。（這也是國家與酋邦的分別。）

第三，國家權力是領土性的，不以親戚關系為基礎。因此，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時期，法蘭西還不算國家。其時，統治法蘭西的是法蘭克國王，而不是法蘭西國王。國家的疆土可遠遠超越部落，因為其成員資格不受親戚關系的限制。

第四，與部落社會相比，國家更為等級分明，更為不平等。統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員，常與社會中的他人分隔開來。某種情況下，他們成為世襲的精英。部落社會中已有聽聞的奴役和農奴，在國家的庇護下獲得極大發展。

第五，更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將合法性授予國家。分開的僧侶階層，則充任庇護者。有時，僧侶階層直接參政，實施神權政治；有時，世俗統治者掌管全部權力，被稱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時，政教并存，分享權力。

隨著國家的出現，我們退出親戚關系，走進政治發展的本身。下面幾章將密切關注中國、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歐洲如何自親戚關系和部落過渡到非人格化的國家機構。一旦國家出現，親戚關系便成為政治發展的障礙，因為它時時威脅要返回部落社會的私人關系。所以，光發展國家是不夠的，還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謂的家族化。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會都能自己過渡到國家層次。歐洲殖民者出現之前，19世紀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亞，由群龍無首的部落社會組成（即缺乏集中的權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一半，南亞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也是如此。[[2]](#m2_5)缺乏悠久國家歷史的事實，大大影響了它們在20世紀中期獨立后的進展。與國家傳統悠久的前東亞殖民地相比，這一點顯得尤其突出。中國很早就開發了國家，而巴布亞新幾內亞一直沒有，盡管人類抵達后者更早。為什么？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問題。

### 國家形成的理論

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把國家形成分成兩種，“原生”和“競爭”。國家原生形成是指國家在部落社會（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現。國家競爭形成是指第一個國家出現后的仿效追隨。與周邊的部落社會相比，國家通常組織得更為緊密、更為強大。所以，不是國家占領和吸收鄰里的部落社會，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會起而仿效。歷史上有很多國家競爭形成的案例，但從沒觀察到國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只能猜測第一個或第一批國家的出現，有眾多解釋，包括社會契約、灌溉、人口壓力、暴力戰爭以及地理界限。

國家源于自愿的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論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一開始并不想提供國家如何出現的實證。相反，他們只是試圖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國家是否通過部落成員的明確協議而建立集中權力，弄清這一點還是很值得的。

托馬斯·霍布斯如此解說有關國家的“交易”：國家（即利維坦）通過權力的壟斷，保證每個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棄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換。國家還可向公民提供無法獨自取得的公共服務，如產權、道路、貨幣、統一度量衡、對外防衛。作為回報，公民認可國家的征稅和征兵等。部落社會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權力，其公共服務非常有限。假如國家確實源于社會契約，我們必須假設，在歷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體自愿決定將獨裁的統治權委托給個人。這種委托不是臨時的，如部落酋長的選舉，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國王和其后裔手中。這必須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識，因為如有不喜歡，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說主要動機是經濟，即產權的保護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國家源于社會契約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會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處的親戚團體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國家是強制、專橫、等級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國家稱作“最冷酷的怪物”。我們想象，自由的部落社會只會在極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對即將來臨的異族入侵和滅絕，委托一名獨裁者；或面對即將摧毀整個社團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領袖。實際上在共和國期間，羅馬獨裁者就是這樣選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會戰后，漢尼拔（Hannibal）對羅馬造成了切實的威脅。這表明，國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脅。社會契約只是有效途徑，并非終極原因。

國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會契約論的變種是卡爾·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論，前人為此花費了很多不必要的筆墨。魏特夫原是馬克思主義者，后來蛻變成反共產主義者。他發展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為專政出現于非西方社會提供了經濟解釋。他認為，大規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方能滿足，從而促進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和墨西哥的國家興起。[[3]](#m3_5)

水利工程的假設要解答很多疑問。新生國家的地區，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數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應付。像中國大運河這種大工程，是在建立強大國家之后，只能算是結果，不應該是原因。[[4]](#m4_5)魏特夫的假設若要成真，我們必須假設，部落成員聚集起來說：“我們將心愛的自由交給一名獨裁者，讓他來管理舉世無雙的大型水利工程，我們將變得更加富有。我們放棄自由，不僅在工程期間，而是永遠，因為我們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種情形如有說服力，歐洲聯盟早已變成一個國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統計學家埃斯特·博塞魯普主張，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創造了精耕細作的農業。它涉及大規模灌溉、高產作物、各式農業工具。人口密集允許專業化，允許精英和百姓的分工，從而促進國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團和部落社會，為減少沖突可分道揚鑣；如發現不能共存，便自立門戶。但新興城市的密集人口并無如此的選擇，土地匱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資源，這一切都可觸發沖突，從而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們仍有兩個未獲答案的疑問：一開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與國家又是怎樣互動的？

第一個問題似乎有簡單的馬爾薩斯式答案：如農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產量，導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從而造成密集人口。問題是，有些狩獵采集社會的利用率，遠遠低于當地環境的富饒能力。新幾內亞高地居民和亞馬孫印第安人開發了農業，盡管在技術上做得到，卻不愿生產余糧。有了提高效率和產量的技術，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證這一切確實發生。[[5]](#m5_5)人類學家表明，在某些狩獵采集社會，糧食供給的上升反而導致工作量的降低，因為其成員更在乎休閑。按平均來說，農業社會的居民比較富庶，但必須工作得更加努力，這樣的交換可能并不誘人。或者說，狩獵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經濟學家所謂的低平衡。那是指，他們掌握了轉移至農業的技術，因為面對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轉移念頭。[[6]](#m6_5)

這里的因果關系，可能被顛倒了。早期社會的人們不愿生產盈余，除非揮鞭的統治者強迫他們這樣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卻很樂意壓迫他人。等級制度的出現，不在經濟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軍事征服或強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頓時浮現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國家形成的終極原因，只是中間的變數，其本身又是尚未確定原因的產物。

國家源于暴力和強迫

經濟解釋的弱點和空缺，把國家形成的來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國家的過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損失。很難想象，為了灌溉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部落社會愿意這么做。所以，牽涉的利害關系必須更大，威脅生命的有組織暴力比較可信。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實際上一直參與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層次。一個部落戰勝另外一個時，可能出現等級和國家。為了在政治上控制戰敗部落，戰勝者建立了集中的強迫機構，漸漸演變成原生國家的官僚系統。如果兩個部落在語言或種族上是不同的，戰勝者可能建立主仆關系，等級制度慢慢變得根深蒂固。異族部落前來征服的威脅，也會鼓勵部落群體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揮中心，如夏安和普韋布洛的印第安人。[[7]](#m7_4)

部落征服定居社會的案例，在歷史記載中屢有發生，如黨項、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維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們都是以此建國的。唯一的問題是，最早國家也是這樣起家的嗎？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蘇丹南部的部落戰爭，歷時數世紀，卻一直沒能建起國家層次的社會。人類學家認為，部落社會自有平衡的機制，沖突之后會重新分配權力。努爾人只收納敵人，并不統治他們。于是，解釋國家的興起似乎還要尋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體，從亞洲內陸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脈向外出征時，才會建立更為集中的政治組織。

地理界限和其他環境因素

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國家形成而言，戰爭雖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還不夠。他認為，生產力增長，如發生于地理上被環繞的地區，或發生在敵對部落的有效包圍中，才能解釋等級制國家的出現。在非環繞地區或人口稀少地區，衰弱的部落或個人可隨時跑掉。夾在沙漠和海洋中間的尼羅河峽谷，以沙漠、叢林、高山為界的秘魯峽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選擇。[[8]](#m8_4)地理界限也能解釋，由于沒人搬走，生產力的增長只會導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幾內亞高地的部落也有農業，也住在被環繞的峽谷。所以單憑這些因素，也是無法解說國家興起的。絕對規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達米亞、尼羅河峽谷、墨西哥峽谷，都是相當規模的農業區，又有山脈、沙漠、海洋的環繞。他們可以組成較大、較集中的軍隊，尤其是在馬或駱駝已獲馴養的情況下，可在廣闊地區施展威力。所以，不僅是地理界限，還有被環繞地區的大小和交通，決定國家的形成與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額外的幫助，暫時保護他們免遭峽谷或島嶼外敵人的攻擊，讓他們有時間擴軍備戰。大洋洲的酋邦和雛形國家，只在斐濟、湯加、夏威夷那樣的大島上出現，而不在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島（Trobriands）那樣的小島。新幾內亞雖是大島，但多山，被分割成無數個微型的生態環境。

國家源于魅力型權威

推測政治起源的考古學家，偏愛唯物主義的解釋，如環境和技術；不大喜歡文化因素，如宗教。這是因為，我們對早期社會的物質環境，已有較多了解。[[9]](#m9_4)但宗教思想對早期國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關重要的。部落社會喪失自由，過渡到等級制度，都可從宗教那里獲得合法性。在傳統和現代理性的權威中，馬克斯·韋伯挑出了他所謂的魅力型（charisma）權威。[[10]](#m10_4)這是希臘文，意思是“上帝碰過的”。魅力型領袖行使權力，不是因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選他，而是因為他是“上帝選中的”。

宗教權威和軍事威武攜手并進，讓部落領袖得以調度自治部落之間的大規模集體行動。它也讓自由的部落成員，將永久權力委托給領袖和其親戚，這比經濟利益更有說服力。之后，領袖可使用該權力建立集中的軍事機器，戰勝反抗部落，確保境內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環中再一次加強宗教權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規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個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過程的具體案例是正統哈里發和倭馬亞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時期第一個阿拉伯國家的興起。數世紀以來，部落群體居住在阿拉伯半島，屬埃及、波斯、羅馬、拜占庭等國家層次社會的邊緣地域。他們的環境惡劣，不適合農耕，所以沒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沒遇上仿效建國的軍事壓力。他們只在附近定居社會之間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產相當的糧食盈余。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誕生于阿拉伯城鎮的麥加，便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根據穆斯林傳統，穆罕默德40歲那年獲得上帝的首次啟示，隨即開始向麥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隨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麥地那。麥地那部落的爭執需要他的調解，他便草擬所謂的麥地那憲法，為超越部落忠誠的信徒團體（umma）定位。穆罕默德創立的政體，尚無真正國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脫離了親戚關系，不靠征服，而靠社會契約，這全憑他作為先知的魅力型權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體經過數年征戰，贏得信徒，占領麥加，統一阿拉伯半島的中部，一舉成為國家層次的社會。

在征戰國家中，創始部落的領袖血統通常開創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這沒有發生，因為他只有女兒法蒂瑪（Fatima），沒有兒子。新興國家的領導權因此傳給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屬倭馬亞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萊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馬亞氏族確實開創了新王朝。倭馬亞國家在奧斯曼（Uthman）和穆阿維葉（Mu‘awiya）的領導下，迅速戰勝敘利亞、埃及、伊拉克，在這些現存的國家層次社會中實施阿拉伯統治。[[11]](#m11_4)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國家興起是最好的證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歷史中扮演邊緣角色。多虧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權威，他們獲得統一，并把勢力擴展到整個中東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沒有經濟基礎，但通過宗教思想和軍隊組織的互動，不但獲得經濟實力，還接管了產生盈余的農業社會。[[12]](#m12_4)這不是純粹國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邊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現成國家，先作為仿效榜樣，后予以征服。不過，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強大，后來的阿拉伯國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無部落影響的官僚機構（參看第13章）。這迫使后來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別措施，如軍事奴隸制和招聘外國人充當行政官，以擺脫親戚關系和部落的影響。

第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創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幾乎所有國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獲得合法地位。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的創始傳說，都把統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靈，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統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禮儀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國家的政治力量。請看中國《詩經》中，獻給商朝創始者的商頌《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廣且強。古時帝命神武湯，整頓邊界安四方。）

另一首頌詩《長發》稱：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現朝代的禎祥。洪水滔滔，禹來治理大地四方。）[[13]](#m13_4)

我們似乎在接近國家原生形成的齊全解釋，它需要若干因素的匯合。首先，那里必須資源豐富，除維持生活，還有盈余。這類豐裕可以是純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區充滿獵物和魚，其狩獵采集社會得以發展成酋邦，雖然還不是國家。但更多時候，創造豐裕的是技術進步，比如農業的興起。其次，社會的絕對規模必須夠大，允許初級分工和執政精英的出現。再次，居民必須受到環境的束縛，技術機遇來到時，其密度會增高；受到逼迫時，會無處可逃。最后，部落群體必須有強烈動機，愿意放棄自由來服從國家權力。這可通過組織日益良好的團體的武力威脅，也可通過宗教領袖的魅力型權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國家出現于像尼羅河峽谷那樣的地方，這似乎是可信的。[[14]](#m14_4)

霍布斯主張，國家或“利維坦”的產生，起源于個人之間理性的社會契約，以終止暴力不斷和戰爭狀態。在第2章的開頭，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會契約論都有一個基本謬誤：因為它假設在史前自然狀態時期，人類生活于隔離狀態。但這種最早的個人主義從沒存在過。人類天生是社會的，自己組成群體，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層次階段，社會組織的特別形式往往是理性協議的結果；但在低層次階段，它由人類生物本能所決定，全是自發的。

霍布斯式謬誤，還有其另外一面。從蠻荒的自然狀態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會，從來未見干凈利落的過渡；而人類的暴力，也從未找到徹底的解決辦法。人類合作是為了競爭；他們競爭，也是為了合作。利維坦的降臨，沒能永久解決暴力問題，只是將之移至更高層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間的戰斗，現在是愈益擴大的戰爭，主要角色換成了國家。第一個國家問世，可建立勝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時日，借用同樣政治技術的新興國家將奮起提出挑戰。

### 國家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們現在明白，國家為何沒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現，部落社會又為何持續存在于阿富汗、印度、東南亞高地。政治學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認為，非洲很多地區缺乏自生國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國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國王和總督，還是獨立后的總統——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適居住的領土上行使統治權。”[[15]](#m15_4)他指出，與大眾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陸上僅8%的地區處于熱帶，50%的地區降雨不夠，難以支撐農業。人類雖在非洲起家，卻在世界其他地域繁榮昌盛。現代農業和醫學到來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剛剛達到歐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區和東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養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現集權國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權力的行使變得艱巨。非洲只有很少適合長途航行的河流（這一規則的例外是尼羅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國家之一的搖籃）。薩赫勒地區（Sahel）的沙漠與歐亞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為貿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礙。那些騎在馬背上的穆斯林戰士，雖然設法越過這道障礙，卻發現自己的坐騎紛紛死于孑孓蠅傳染的腦炎。這也解釋了，西非的穆斯林區為何僅局限于尼日利亞北部、象牙海岸、加納等。[[16]](#m16_4)在熱帶森林覆蓋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維修道路的艱難是建立國家的重要障礙。羅馬帝國崩潰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顛島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熱帶的道路能持續數年的寥寥無幾。

非洲只有少數在地理上被環繞的地區。統治者因此而遇上極大的困難，將行政管理推入內地，以控制當地居民。因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開；遇上被征服的威脅，居民可輕易朝灌木叢做進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戰后國家鞏固，從沒達到歐洲的程度，因為戰爭征服的動機和可能性實在有限。[[17]](#m17_4)根據赫伯斯特，這顯示，自部落社會向歐洲式領土政體的過渡從來沒有發生于非洲。[[18]](#m18_4)非洲的被環繞地區，如尼羅河峽谷，則看到國家的出現，這也符合相關規則。

澳洲本身沒有國家出現，原因可能與非洲雷同。大體上說，澳洲非常貧瘠，而且甚少差別。盡管人類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總是很低。沒有農業，也沒有被環繞地區，由此解釋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組織的缺乏。

美拉尼西亞的處境則不同。該地區全由島嶼組成，所以有自然環境的界限，此外，農業發明也在很久以前。考慮到多數島嶼都是山脈，這里的問題與規模大小和行政困難有關。島嶼中峽谷太小，僅能養活有限人口，很難在遠距離行使權力。就像較早時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島，如斐濟和夏威夷，確有酋邦和國家出現。

山脈也解釋了部落組織為何持續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區，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的庫爾德地區，老撾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區域。對國家和軍隊來說，山脈使這些地區難以征服和占領。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國人、俄國人，還有現在的美國人和北約，都試圖降伏和安撫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權國家，但僅有差強人意的成功。

弄清國家原生形成的條件是很有趣的，因為它有助于確定國家出現的物質條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響的因素，以致無法發展出一條嚴密且可預測的理論，以解釋國家怎樣形成和何時形成。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為之所作的解釋，聽起來像是吉卜林的《原來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亞的部分地區，其環境條件與斐濟或湯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島，其農業能養活密集人口——卻沒有國家出現。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無法復原的歷史意外。

找到這樣的理論并不見得有多重要，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競爭形成的。很多國家的形成是在我們有書面記錄的年代。中國國家的形成開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略晚，與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國家興起幾乎同時。早期中國歷史，有詳盡的書面和考古資料，為我們提供了細致入微的中國政治紋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馬克斯·韋伯的標準，中國出現的國家比其他任何一個更為現代。中國人建立了統一和多層次的官僚行政機構，這是在希臘或羅馬從未發生的。中國人發展出了明確反家庭的政治原則，其早期統治者刻意削弱豪門和親戚團體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機構。中國投入建國大業，建立了強大且統一的文化，足以承受兩千年的政治動亂和外族入侵。中國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遠遠超過羅馬。羅馬統治一個帝國，其公民權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島上的少數人。最終，羅馬帝國的版圖橫跨歐亞非，從不列顛到北非，從日耳曼到敘利亞。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組成，并允許他們相當可觀的自治權。相比之下，中國帝王把自己稱作皇帝，不叫國王，但他統治的更像王國，甚至更像統一國家。

中國的國家是集權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馬克思和魏特夫認識到中國政治這一特點，所以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這樣的詞語。我將要在后續章節論證，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不過是政治上現代國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國，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之前，后者可以是擁有領土的世襲貴族，組織起來的農民，以商人、教會和其他自治團體為基礎的城市。不像羅馬，中國軍隊一直處于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從沒對政治權力構成獨立威脅。這種初期的權力傾斜卻被長期鎖定，因為強大的國家可采取行動，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現，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要到20世紀，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才能出現，打破這種權力分配。強大的外敵曾不時占領部分或整個中國，但他們多是文化不夠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國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紀，歐洲人帶來的外國模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途徑提出挑戰，中國這才真正需要作出應對。

中國政治發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現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無法抵消這早熟現代國家的發展，也無法加以束縛，例如法治。在這一方面，它與印度截然不同。馬克思最大錯誤之一是把中國和印度都歸納在“亞細亞”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國，但像歐洲，其建制化的社會抵抗力量——組織起來的祭司階層和親戚關系演變而成的種姓制度——在國家積累權力時發揮了制動器作用。所以，過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國的預設政治模式是統一帝國，綴以內戰、入侵、崩潰；而印度的預設模式是弱小政治體的分治，綴以短暫的統一和帝國。

中國國家形成的主要動力，不是為了建立壯觀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領袖，而是無情的戰爭。戰爭和戰爭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內，把成千上萬的弱小政治體凝聚成大一統的國家。它創立了永久且訓練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階層，使政治組織脫離親戚關系成為可行。就像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評論后期歐洲時所說的，“戰爭創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這就是中國。

# 第二部分 國家建設

## 第6章 中國的部落制

中國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國的部落社會組織；中國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擴張和政治權威的性質

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殘留于中國南部和臺灣。歷史學家談起中國“家庭”時，不是指夫婦帶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員達數百乃至數千的父系家族。中國早期歷史有相當齊全的記載，提供了觀察國家自部落社會脫穎而出的罕見良機。

人類長居中國。早在80萬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類已現蹤跡。智人離開非洲數千年后，也抵達中國。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獲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區的首次出現，則在中國朝代之前的仰韶時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到龍山時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可見城郭和社會等級分化的明顯遺跡。在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師主持。他不是專家，像在大多數其他族團層次社會，只是社區的普通一員。隨著等級社會的逐漸成形，統治者開始壟斷巫術，借此來提升自己的合法性。[[1]](#m1_6)

開發農業后，最重要的技術革新恐怕是馬匹馴養，公元前四千年在烏克蘭率先發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傳至中西亞。過渡到草原游牧業則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馬背部落向中國挺進的開始。[[2]](#m2_6)這種挺進主宰了中國后續歷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國的分期有點讓人困惑。[[3]](#m3_6)仰韶和龍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學的范疇，以中國北部黃河中下游的定居點而命名。中國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發生分裂，從陜西的鎬京遷都至現代河南的洛陽，前為西周，后為東周。東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戰國前后兩段。

表1. 古代中國



從遠古到統一中國的秦是古代中國所涵蓋的歷史。我們的有關知識來自浩淼的考古資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銅器彝文、官員用來記錄政務的竹簡。[[4]](#m4_6)另一來源是問世于東周最后數世紀的偉大經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嗣后成為中國官員的教育之本。據稱，這五部經典是孔子編纂和傳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釋，構成了塑造千年中國文化的儒家意識形態。這些經典的形成背景是東周時期，其時內戰方興未艾，政治分崩離析；《春秋》就是魯國十二名國君的編年史，在孔子眼中，顯示了這段時期的退化和墮落。這些經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孫子等人的著作，雖然蘊含大量歷史信息，但大體上仍屬文學作品，其精確性尚不明確。

但有確鑿證據顯示，中國政治體數量經歷了極大的收縮，從夏初的大約一萬，到西周開國時的一千二百，到戰國時只剩下七個。[[5]](#m5_6)中國西部的秦孝公和謀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秦王征服所有對手，建立統一國家，并將秦首創的制度推向中國北方的大部，國家鞏固由此告成。

### 部落的中國

從部落到國家層次的過渡在中國慢慢發生，新的國家制度重疊在親戚關系的社會組織之上。夏商時期被稱作“國”的，雖然有日益明顯的等級和集中領導，實際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親戚團體仍是中國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變更，涌現了擁有常備軍隊和行政機構的真正國家。

中國歷史的早期社會由宗族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軍事單位由宗族內大約百家男子組成，以宗族領袖為首，聚集在同一旗號下。宗族又可靈活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層次的宗族，而國王只是特定地區所有宗族的最高領袖。[[6]](#m6_6)

三代時期，宗族中的儀式被編纂成一系列法律。這些儀式涉及對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廟堂舉行。廟堂內分劃不同的祭殿，對應不同層次的宗族，宗族領袖掌控儀式以加強自身權力。未能正確遵守儀式或軍事命令，會引來國王或宗族領袖的嚴苛處罰。依此類推，如要徹底摧毀敵人，一定要毀其祖廟，劫其珍寶，殺其子孫，絕其香火。[[7]](#m7_5)

像其他部落社會，中國社會組織的層次也時高時低。一方面，村莊范圍的宗族為戰爭、自衛、商業而團結起來，有時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時出于對個別領袖的尊敬，但更多時候是迫于強制。戰爭變得愈益頻繁，夯土圍墻的城鎮在龍山時期變得星羅棋布。[[8]](#m8_5)

另一方面，宗族社會又在分化瓦解。年輕人開發荒野，自立門戶。其時，中國仍屬地廣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現存宗族的管轄。[[9]](#m9_5)因此，正如國家形成理論所預測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礙了國家和等級制度的形成。

盡管如此，在黃河峽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與農業生產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級制度愈加分明，這可見證于領袖對追隨者施加的懲罰，以及其時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種處罰：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斷足）、宮（閹割）、大辟（處死）。[[10]](#m10_5)很多當時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無首骨骼，許是奴隸，又許是戰俘。高級領袖的陪葬人數竟高達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總共一萬，還有大量馬匹、戰車、三足鼎和其他珍貴工藝品。為平息死去祖先的靈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資源，包括人、動物、器物。[[11]](#m11_5)很明顯，自部落到等級分明政體的過渡正在展開。

### 中國的家庭和親戚關系

社會組織中家庭和親戚的重要性是中國歷史上重大常數之一。秦國君主試圖抑制親戚裙帶，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國，統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國。中國共產黨1949年上臺后，也嘗試使用專政權力消滅中國傳統的家庭主義，使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但這兩項政治工程，都沒獲得發明者所期待的成功。中國家庭證明是頗有韌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躍于中國部分地區。[[12]](#m12_5)短暫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終在西漢期間得以確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東漢末期和隋唐，親戚團體又卷土重來。要到第二個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國家管理才得以恢復。尤其是在中國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處于強勢，直到20世紀。它們在地方上發揮準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國家成為權力的來源。

關于中國親戚關系，我們有很豐富的資料，大部分由人類學家所編撰。他們研究臺灣和中國南部的現代社區，所使用的親戚團體記載可追溯到19世紀。[[13]](#m13_5)個別親戚團體所保存的詳細記錄，有助于研究更為早期的家庭關系。但在古代中國親戚關系上，我們卻只有很少信息。將現代趨勢投射得那么久遠，風險不小。有學者主張，當代宗族是宋明理學家所提倡的政策的產物，與公元1000年之前的親戚關系是迥然不同的。[[14]](#m14_5)盡管如此，在中國數世紀的歷史中，親戚團體的某些特征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中國社會的親戚關系嚴格遵循父系社會或父系家族的規則。有人類學家將之定義為“使用統一禮儀、顯示共同祖先的集團（corporate）”。[[15]](#m15_5)某些現代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二十五代以上，但歷史上的宗族通常不超過五代。相比之下，氏族是容納若干宗族的更高級組合，通常基于虛擬（fictive）的親戚關系。這種氏族和相關的姓氏聯盟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確定異族通婚。[[16]](#m16_5)

像其他父系家族社會一樣，繼承和遺產只通過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員，而是與其他重要家庭聯姻的潛在資源。結婚后，她與生身家庭一刀兩斷，在很多中國歷史時期，只可在規定時日回訪娘家。妻子不再往生身的家廟祭拜，而是改去丈夫家的。香火傳承全靠男子，因此，她在新家庭中沒有地位，直到生下兒子。除非有了將來為父母靈魂祈禱的兒子，她的靈魂將不得安寧。講得實在些，兒子又是她晚年的經濟保障。

數世紀來，無數中國小說和戲劇記載了年輕妻子與婆婆之間的緊張關系。婆婆虐待未生兒子的媳婦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旦有了兒子，女子作為重要宗族繼承人的生母，又可獲很高的地位。中國王朝眾多的宮廷權術，都涉及意欲提升兒子政治地位的擅權遺孀。西漢時期的皇太后，至少六次得以選擇皇帝繼承人。[[17]](#m17_5)

前現代（premodern）社會的可悲真相之一，就是很難把兒子撫養成人。現代醫藥發明之前，地位和財富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差別。世界君主政體的歷史，充斥著王后或妃嬪沒能生下兒子而引起的政治危機。日本皇太子徳仁親王于1993年結婚，與妻子雅子一起嘗試生個兒子（而未成功），引起眾多現代日本人的急切關注。與一連串早期皇帝相比，這又算不了什么：仁孝天皇（1800—1846）十五個孩子中，僅有三個活到三歲；明治天皇（1852—1912）十五個孩子中，僅有五個活到成年。[[18]](#m18_5)

跟其他社會一樣，傳統中國的因應對策是納妾。地位高級的人士可娶二房、三房甚至更多的妻子。為確定個中的繼承權，中國發展了復雜的正式規章制度。妻子再年幼的兒子對妾的兒子，仍享有優先繼承權，但也有違反此例的皇帝。雖然有具體規矩，繼承權的不確定性仍是宮廷政治的主題。公元前71年，霍光妻霍顯設法謀害了坐月子的許皇后，讓女兒成君取而代之。公元115年，漢安帝多年不育的閻皇后鴆殺了剛生下兒子的皇妃李氏。[[19]](#m19_4)

像庫朗日所描述的希臘和羅馬，中國親戚制度也與私人財產制度有關。周朝宣稱，所有土地都是國家財產，但周天子太弱，難以付諸實現。土地日益私人化，買賣和改造也變得普遍。[[20]](#m20_4)作為整體，宗族擁有祖廟或祠堂。較富的宗族又投資于共同財產，如水壩、橋、井、灌溉系統。單獨家庭擁有自己的耕田，但不得隨意處置，因為有對宗族的禮儀義務。[[21]](#m21_4)

宗族增長始終給遺產的繼承制造難題。周朝早期有長子繼承權制度，之后又改為兒子們平分。這一規矩延續了中國歷史的大部，直到20世紀。[[22]](#m22_4)根據這個制度，家庭的土地經常越分越小，以致無法維生。中國開發了大家庭概念，數代男子同堂。成年的兒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試圖購買鄰地。對宗族的共同財產，他們仍然有份；對共同的祖先，他們仍有祭拜的責任。這一切阻止了他們的搬遷，或出售祖地。[[23]](#m23_4)

在財產和同堂方面，不同區域出現了巨大差異。中國北方，宗族力量逐漸變弱，宗族成員搬往分散的村莊，喪失了相互之間的認同。在南方，宗族和氏族成員繼續并肩生活，以至整村人只有一個姓。為此出現很多解釋，其中之一是這么認為的：很多世紀以來，南方一直是蠻荒地帶，宗族即使增長卻仍能抱成一團；而在北方，戰爭頻仍，流離失所時有發生，從而拆散了數代同堂的宗族。

要記住，宗族組織在很多情形中純屬富人特權。只有他們才能負擔得起平分的龐大地產、共同財產、為傳宗接代而娶的多房妻妾等。事實上，周朝首次編纂的宗法規則，只適用于精英家庭。貧困家庭只能負擔很少的孩子，有時為彌補無子無孫，而讓入贅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這在日本很普通，在中國卻遭否定。[[24]](#m24_4)

### 中國的“封建”時期

商滅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當代陜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11世紀初，歷時數年。其時，商的軍隊還必須在山東應付馬背游牧民族的襲擊。周王殺死商的儲君，謀害自己兄弟，奪取政權，建立新朝。[[25]](#m25_4)

這一征服開創了很多學者所謂的中國封建時期。其時，政治權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級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從西周到東周早期，親戚關系仍是社會組織的原則。到了春秋和戰國，這些親戚團體之間戰火紛飛，國家開始慢慢成形。我們可仔細追溯國家形成的各項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學的重新組合，而是歷史記載中的證據。

從對比角度看，中國國家的形成過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為歐洲幾乎一千年后的歷程樹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長期定居的商朝領土，建立了封建貴族階層。無獨有偶，日耳曼野蠻部落打敗衰敗凋零的羅馬帝國后，也創立了類似的分散政體。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發動戰爭的需求促使了國家的形成：封建屬地逐漸聚合成領土的國家，政治權力趨于集中，現代非人格化行政脫穎而出。[[26]](#m26_4)

然而，中國和歐洲又有重要差別。英語版的中國朝代史，給中國平行制度貼上既定標簽，如“封建的”、“家庭”、“國王”、“公爵”、“貴族”，從而遮掩了中間的差別。所以，我們需要確定這些標簽的意義，既指出重要對應，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揚鑣。

最混亂和誤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義”。由于學者和辯論家的混亂使用，這兩詞基本上變得毫無意義。[[27]](#m27_4)根據卡爾·馬克思開創的傳統觀念，“封建主義”往往指歐洲中世紀莊園上領主和農民之間的經濟剝削關系。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認為，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前有個避不開的封建階段。這種按圖索驥的僵硬，迫使傳統學者到處尋找封建階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會。[[28]](#m28_3)

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關注存在于中世紀歐洲的采邑（fief）和屬臣（vassalage）制度，從而給封建主義提供了歷史上比較準確的定義。采邑是領主和屬臣之間的契約，后者獲得保護和土地，一定要向領主提供軍事服務作為交換。契約在特定儀式中獲得尊嚴，領主將屬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親吻來鎖定相互的關系。這種雙方兌現義務的從屬關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29]](#m29_3)屬臣之后還可將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與自己的屬下再簽新的契約。該制度自有一套復雜的道德規范，與榮譽、忠誠、宮廷婚姻有關。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歐洲封建主義的關鍵不是領主和屬臣之間的經濟關系，而是隱含的權力分散。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說：“西歐的封建主義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種政府……其中，一隊軍事領袖壟斷政治權力，隊員之間的權力分配卻又相對平等。”[[30]](#m30_3)這個定義與馬克斯·韋伯有關，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該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屬臣可以在其上實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權。封建契約在理論上可隨意取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的屬臣們把采邑轉換成自己的家族財產。這表示，后裔得以繼承采邑。他們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稅的政治權力，能獨立作出司法裁決，不受領主的干涉。因此，他們一點不像領主的代理人，卻是實打實的小領主。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質實際上代表了該制度的退化。[[31]](#m31_3)總之，封建制度的獨特處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權力。

在這個意義上，周朝的中國是個封建社會[[32]](#m32_3)，與中央集權國家沒有相似之處。像很多征戰的朝代，不管是之前還是之后，周天子發現自己沒有足夠軍隊或資源來直接統治所占領的土地，特別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頻繁騷擾的西方，還有后來成為楚國的南方邊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給麾下的將領。考慮到周社會的部落性質，那些將領多是他的親戚。周天子共設七十一處封地，其中五十三處由他的親戚治理，剩下的則分給其他文武官員，以及已被擊敗但愿效忠的商貴族。這些屬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時享有實質性的自治。[[33]](#m33_3)

周朝的中國封建主義與歐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區別。在歐洲，野蠻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會初期即遭摧毀，通常在數代人的時間內。歐洲的封建主義是一種機制，把沒有親戚關系的領主和屬臣綁在一起，在親戚關系不復存在的社會中促進社會合作。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參與者不是獨立分散的領主，而是領主和他們的親戚團體。在歐洲領主的境內，領主與農民簽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開始扎根。權力在領主手中，而不在領主親戚團體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財產，并不屬于更大的親戚集團。

另一方面，中國的封地授予親戚團體，之后又逐次分封給下一級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國貴族與歐洲領主相比，其權力比較薄弱，其等級森嚴比較緩和，因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權的親戚架構。我曾提到，部落社會的領袖地位往往是贏取的，而不是繼承得來的。周朝的中國領袖，雖然趨向于等級分明，但仍受親戚人脈的限制，看起來比歐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評論家指出，在春秋時期，“國家像一個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統而不治；大夫們很重要，不是因為其職位，而是因為他們是君主的親戚，或是顯赫家庭的家長”。[[34]](#m34_3)君主與其說是真正的一國之主，倒不如說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種故事講到，貴族當眾責備君主，并吐口水，卻沒受到他的訓斥或處罰；拒絕他對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與他一起玩游戲；未獲邀請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門邀他分享晚餐，卻發現他在外射鳥。”[[35]](#m35_3)

周朝社會的氏族組織中，軍隊也是分支式的，沒有中央統領。各個宗族動員自己的軍隊，再蜂聚到更大單位中（像努爾人的分支）。“有關戰爭的記述透露，戰場上，征來的士兵只跟隨自己的將領；重要的決定通常由將領們集體討論決定；部隊編制松散，以致將領只能指揮自己手下，而顧不上其余。”[[36]](#m36_3)很多案例顯示，因為沒有嚴格的統領制度，部將得以修改名義上君主的命令。根據第5章介紹的人類學分類，周朝早期政體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絕不是國家的。

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的非常相似，都發展了懸殊的階級分化和貴族階層，起因是關于榮譽、暴力、冒險的道德信念。開始時，早期部落社會相對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懸殊的各式調整機制。然后，某些人開始在狩獵中出類拔萃。狩獵與戰爭有關聯，這可追溯到人類的靈長目祖先。等級制度在狩獵和征戰中脫穎而出，因為有些人或群體就是略勝一籌。優秀獵手往往又是優秀戰士，狩獵所需要的合作技能進化成軍事戰術和戰略。通過戰績，有些宗族獲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內，卓越的戰士崛起而成為將領。

這也在中國發生。狩獵和戰爭的關聯保存于一系列禮儀，使武士貴族的社會地位獲得合法化。陸威儀（Mark Lewis）解釋說，春秋時期，“君主之所以在群眾中鶴立雞群，全靠在圣壇前的‘壯舉’，即禮儀化的暴力，如獻祭、戰爭、狩獵”。[[37]](#m37_3)狩獵把動物送上祖先的祭臺，戰爭把戰俘送上祖先的祭臺。血祭是商朝的習俗，到周朝仍然繼續，一直到公元前4世紀。軍事征戰出發于廟堂，為確保戰爭的勝利，既有犧牲品又有祈禱。禮儀中，大家分享祭肉，戰鼓因戰俘的血液而變得神圣，特別可恨的敵人則被剁成肉醬，供宮廷或軍隊成員進食。[[38]](#m38_3)

周朝早期的貴族戰爭高度禮儀化。發動戰爭是為了使另一氏族承認自己的霸權，或是為了榮譽受到藐視而實施報仇。軍隊向前沖是為了保護“繼承下來的祖業”，不克盡責的領袖，死后將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們通過在儀式上展示的力量和榮譽來達到目的，不需付諸殊死的實戰。戰役經常在貴族之間預先安排，需要遵守復雜的規矩。敵人一旦在戰場出現，軍隊一定要上前迎戰，否則就是恥辱。不向敵人的最強部位發起攻擊，有時也被認作丟臉。敵方君主去世時，為了不影響對方的哀悼義務，軍隊就會退出戰役。春秋初期，貴族打仗多用戰車。而這種戰車，既昂貴，操作起來又需要高超技術。[[39]](#m39_2)顯而易見，軍事戰略家孫子依靠奇襲和欺騙的“迂回”戰術，還要等到中國歷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國社會，處于部落和酋邦之間。史書中稱為“國”的，都不是真正的國家。周朝的中國好比是家族社會的教科書，換言之，整個國家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親戚團體所“擁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眾，都是可傳給后裔的家族財產，只受父系家族親戚規則的約束。這個社會中沒有公私之分，每個占統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稅，并作出自認妥善的司法裁決。然而，這一切將很快發生變化。

## 第7章 戰爭和中國國家的興起

國家源于軍事競爭；商鞅的現代化改革；法家對儒家家庭主義的批判；沒有經濟和社會發展做伴的政治發展

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國家開始在中國成形。它們設立常備軍，在界定領土內實行統一規則；配備官僚機構，征稅執法；頒布統一的度量衡；營造道路、運河、灌溉系統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國，全力投入不尋常的現代化工程，目標直指周朝早期親戚家族的社會秩序。它繞過武士貴族，直接征募大量農民，使軍隊趨于民主化；從事大規模土地改革，將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破壞世襲貴族的權力和威望，從而提高社會流動性。這些改革聽起來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國強兵，打造冷酷的專政。這些現代政治制度的優勢，令秦國打敗所有對手，進而一統天下。

### 戰爭與國家建設

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有個著名論點：歐洲君主發動戰爭的需求，驅動了歐洲的國家建設。[[1]](#m1_7)戰爭和國家建設的關聯不是普世共有的。總的來說，拉丁美洲就沒有這一歷史過程。[[2]](#m2_7)但毫無疑問，在中國的東周時期，國家形成的最重要動力就是戰爭。從公元前770年的東周初期到前221年的秦朝統一，中國經歷了連綿不絕的戰爭，規模、耗資、人命的犧牲有增無已，從分散封建國家到統一帝國的過渡全憑武力征服。這時所建立的幾乎每一個現代國家制度，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發動戰爭息息相關。

與其他好戰社會相比，中國在東周期間的血腥記錄仍然突出。有學者計算，春秋時期的294年，中國的“國家”之間共打了1211次戰役，和平歲月僅有38年，超過110個政治體被滅絕。后續的254年戰國時期，打了468次戰役，僅有89年太平無事。兼并使國家數量大跌，戰役總數因此減少，戰國七雄滅了其余十六國。另一方面，戰役的規模和歷時卻有顯著的上升。春秋時，有些戰役只打一個回合，一天就完。到戰國末期，圍攻可持續數月，戰役可持續多年，參戰將士高達50萬。[[3]](#m3_7)

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的僅1%，希臘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僅5.2%，歐洲早期現代則更低。[[4]](#m4_7)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李維（Livy）報道，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美諾湖戰役（Lake Trasimene）和坎尼會戰（Cannae）中，總共損失約5萬軍人。而一名中國史官稱，24萬戰死于公元前293年的戰役，45萬戰死于公元前260年的戰役。總而言之，從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國據說一共殺死150多萬他國士兵。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數字夸大其詞，無法證實。但它仍頗不尋常，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5]](#m5_7)

### 持續戰爭帶來的制度改革

激烈戰爭造就強烈的獎勵，導致了舊制度被摧毀和新制度取而代之。它們都與軍事組織、征稅、官僚機關、民間的技術革新以及思想有關。

軍事組織

一點也不令人驚奇，激烈戰爭的最初影響是參戰各國軍事機構的演變。

如早先提到的，春秋早期的戰事是駕戰車貴族的互相廝殺。每輛戰車配備一名御手和至少兩名武士，還需多達七十人的后勤支持。駕車開打是高難度的技術，需要實質性的訓練，的確是適合貴族的職業。[[6]](#m6_7)這時的步兵僅發揮輔助作用。

從戰車到步兵加騎兵的轉變逐漸發生于春秋末期。在南方湖泊和沼澤眾多的吳越兩國，戰車用處非常有限，在多山地區更是相形見絀。很顯然，與西方草原馬背野蠻人打交道的經驗，促使騎兵出現于戰國初期。隨著鐵兵器、弩、盔甲的廣泛使用，步兵變得更為有效。西部的秦是最早重整軍隊的國家之一，它淘汰戰車，改換為步騎兵的混成。其主因，既是秦的地形，又是野蠻人的持續壓力。楚是在他國征兵的第一國，擊敗陳之后，強迫當地農民提供軍事服務。這些軍隊不再是親戚團體的組合，而是等級分明的軍事單位，統領著固定數量的部下。[[7]](#m7_6)公元前6世紀中期，第一支全步兵軍隊投入戰斗，在未來兩個世紀內，完全取代戰車軍隊。到戰國初期，將農民大批征入軍隊已成司空見慣。[[8]](#m8_6)

中國軍隊打擊力量的核心從戰車轉到步兵；無獨有偶，歐洲也從盔甲騎士轉到弓箭和長矛的步兵軍隊。擔任戰車手和騎士的貴族，在這兩個轉向中，根本無法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在這兩個文明中，負擔得起舊式裝備和培訓的只有貴族精英。這個轉向似乎與技術改革有關；中國貴族數量持續下降，夠格的戰車手日漸稀少，可能是另外原因。

貴族階層的人員損失，推動了軍內的論功封賞。周朝早期，軍事將領全憑親戚關系和在氏族中的地位。斗轉星移，越來越多的非貴族將領，單憑自己的驍勇善戰而獲晉級。國家也開始分配土地、爵位、家奴給將士以作獎勵，無名小卒躍升為將軍時有發生。[[9]](#m9_6)參戰的野戰軍隊中，驍勇善戰不是文化規范，而是存活的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論功封賞的原則始于軍隊，輾轉傳入文官體系。

征稅和人口注冊

將農民大批征入軍隊，需要相應的物質資源來支付和裝備他們。從公元前594年到前590年，魯國開始征收田賦，不再作為親戚團體的財產，而是以眾多農家合成的“丘”為計量單位。鄰國齊的入侵，迫使魯國快速增征甲兵。從公元前543年到前539年，子產在鄭國重劃帶渠的田地，把農民編成五戶一組以征收新稅。在公元前548年，楚國丈量土地，登記鹽池、魚塘、沼澤、森林、人口。這項調查是為日后的征稅征兵預作準備。[[10]](#m10_6)

官僚機構的發展

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發明了現代官僚機構。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官僚機構自周朝中國的混亂中崛起，全沒計劃，只為征收戰爭所需的稅金。

周朝頭幾年的管理是家族式的，像其他早期國家一樣，如埃及、蘇美爾、波斯、希臘、羅馬。行政官位配給君主的親戚，被視作君主家庭的延伸。決策時，并不嚴格遵守等級分工，而是以咨詢和忠誠為依據。所以，君主可能掌控不住大夫，如有分歧，也不能予以解雇。像一語部落中的頭人，面對讓賢的強大共識，周朝一名君主只好束手聽命；除非他鋌而走險，如公元前669年的晉獻公，把合謀反己的所有親戚統統殺光。宮廷權術不是個人操作的，而是宗族，滿門抄斬才能絕其香火。[[11]](#m11_6)

官僚化始于軍隊，各項職能由貴族轉讓給庶民。軍隊需要征募、裝備、訓練大批新兵，記錄和后勤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援軍隊的需要又增加了對文官體系的需求。他們幫助征稅，確保大規模軍事動員中的連貫性。軍事機構成為文官的訓練場所，并促進統領體系的形成。[[12]](#m12_6)同時，周朝貴族內部的自相殘殺，為大夫家庭提供了社會升遷良機。大夫雖在傳統上也來自貴族階層，但經常屬于遠離君主和其親戚的外圍。士族是低于貴族的另一階層，包括軍人和其他有功績的庶民，也得以取代家族關系的大夫，承擔重要職位。所以，隨著貴族階層的日漸式微，論功封賞而不是論出身封賞的原則開始慢慢獲得認同。[[13]](#m13_6)

民間的技術革新

公元前4世紀到前3世紀，中國經歷了集約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集約型增長靠的是技術革新，包括青銅工具轉向鐵工具、基于雙向活塞鼓風的生鐵冶鑄、牲口耕犁的改進、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國各區域之間的商業交流增加，人口密度也開始出現顯著上升。粗放型增長靠的是人口增長，以及開發像四川那樣的新邊境。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增長源于經濟學家所謂的“外部因素”。這表示，它不是經濟制度的內部邏輯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術革新。軍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動力。戰國時期的每個國家都面對增稅的巨大壓力，為此必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仿效對方的技術革新以加強自己實力。[[14]](#m14_6)

思想

那么劇烈狂暴的春秋末期和戰國時代，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化思潮，這很值得欽佩。戰亂不斷所造成的流離失所，促使了對政治和道德的深刻反思，并為天才的老師、學者、謀士提供了出人頭地的良機。其時，眾多老師四下游學，招攬學生。其中有孔子，他出身于貴族，但只是作為學者和老師而謀生。戰國初所謂的百家爭鳴時期，還有很多如此的學者，包括墨子、孟子、孫子、韓非子、荀子，身后都留下影響中國未來政治的著作。當時的政治不穩定，似乎造就了文人的無根無蒂，這反映在文人的周游列國，不管何等政權，只要感興趣，他們都愿奉獻自己的服務。[[15]](#m15_6)

這種智慧橫溢有兩層政治意義。首先，它創建了宛如意識形態的東西，即政府如何施政的思想，后代中國人可以此來評判自己政治領袖的表現。最為著名的就是儒家，而儒家學者又與其他學派展開激烈爭辯，例如法家——這些爭辯其實是當時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中國的學者和文人享有最高級榮譽，甚至高于武士和巫師。事實上，文人和官僚的作用合二為一，在其他文明中是找不到的。

其次，中國文人的流動性又孕育了愈來愈像全國文化的東西。其時創作的偉大經典著作，變成精英教育的基石和中國文化的基礎。有關經典著作的知識，成為國民身份的坐標。它們享受如此高的威望，以至在中華帝國無遠弗屆，甚至傳播到邊界之外。邊境線上的游牧王國，有時在武力上強于中國，但無法匹配中國的智慧傳統。所以，他們傾向于以中國的制度和技術來治理中國。

### 商鞅的反家庭運動

周朝晚期，中國各地逐漸采用現代國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國。大多數情況下，新制度的采用全憑運氣，是反復試驗和政府別無選擇的結果。相比之下，秦確立國家建設的意識形態，率直地闡明中央集權新國家的道理。秦的建國者清楚看到，早期的親戚網絡是中央集權的障礙，為了取而代之，特意實施把個人與國家綁在一起的新制度。這些原則被稱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國做官，后來投奔相對落后的秦，一舉成為秦孝公的總顧問。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發起進攻。他攻擊繼承得來的特權，最終以論功封賞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襲官職。在這個邊境國家，論功封賞中的功就是軍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飾，都按各人戰績來分配。[[16]](#m16_6)另一方面，不服從國家法令的將面對一系列嚴厲處罰。最重要的是該制度下獲得的職位不可轉為世襲財產，像家族貴族那樣，而要由國家定期重新分配。[[17]](#m17_6)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廢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給由國家直接監護的農家。井田制中，農田分成九方塊，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戶農家各耕一塊，中間的是公田。每個貴族家庭擁有若干井田，耕耘的農家為此需要履行徭賦和其他義務，很像封建歐洲的農民。井田上布滿路徑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戶農家組成貴族地主保護下的公社。[[18]](#m18_6)廢除井田制使農民掙脫對地主的傳統義務，并允許他們搬往他人新開發的土地，或干脆擁有自己的土地。這使國家避開貴族，向全體地主征收以實物支付的統一地賦。

此外，為了資助軍事行動，商鞅還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頭稅。國家頒布，家庭如有若干兒子，長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繳雙倍的稅。商鞅的矛頭直指傳統儒家的大家庭，而贊許夫婦帶小孩的小家庭。對沒有足夠財產可分的窮苦家庭來說，該制度造成了莫大艱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個人獎勵，也加強了國家對個人的控制。

這次改革還與新的家庭注冊有關。傳統中國由龐大的親戚團體組成，商鞅則把家庭分為五戶和十戶的群體，讓他們相互監督。其他國家也在實施類似改革，如魯國的“丘”，不同之處是秦在執行中的暴虐。群體中的犯罪活動，如不予檢舉，懲罰是腰斬；舉報人有賞，等同于在戰斗中斬敵首級。該制度的翻版在明朝得以復活，稱為保甲。

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中認為，所有國家都具備共同的特征：它們都試圖掌控各自的社會，一開始就“昭告”天下。[[19]](#m19_5)它們清除自生自長的彎曲小街的舊區，代之以幾何圖形般秩序井然的新區，就是為此。19世紀，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紀廢墟上建造寬敞的林蔭大道，不單是為了美觀，還有控制人口的動機。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于商鞅治下的秦。除了廢除井田制，他還將郡縣制推向全國。他把市鎮和鄉村合并起來，設四十一個縣；縣令不是地方推舉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開始，這些縣位于邊境地區，表明其作為軍事區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齊矩形，與東南西北的軸心相對稱。現代地圖學顯示，曾是秦國的地域都有這種直線布局的地貌。[[20]](#m20_5)商鞅還頒布在秦國通用的統一度量衡，以此來替代封建制度下的雜亂標準。[[21]](#m21_5)

商鞅竭盡全力投入社會工程，將傳統親戚關系的權力和地產制度轉換成以國家為中心的非人格化統治。顯而易見，他招惹了秦國家族貴族的極大反感。庇護人秦孝公一去世，繼位人立即反目，商鞅只得逃亡。他最終遭人檢舉，所依據的恰恰就是自己頒布的嚴禁庇護罪犯的法律。據傳，商鞅遭車裂之刑，即四車分尸，他的宗族成員全被誅殺。

東周的中國，每一項制度革新都與戰爭的需求直接相連：服役擴充至全體男子、先是軍隊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體系、家族官職減少、論功封賞、人口注冊、土地改革、家族精英地產的重新洗牌、更好的通信和基建、非人格化的等級行政部門、統一的度量衡。這一切，都可在軍事要求中找到根源。戰爭可能不是國家形成的唯一引擎，但肯定是第一個現代國家在中國涌現的主要動力。

### 儒家與法家

商鞅在秦國實施的政策得到后續學者的肯定，如韓非子，并被歸納成全套的法家意識形態。在法家和儒家的緊張關系中，可以讀懂中國后來歷史的大部，直到1949年共產黨勝利，那份緊張都與政治中的家庭作用有關。[[22]](#m22_5)

儒家極力主張向后看，其合法性扎根于古代實踐。孔子在春秋末期編輯他的經典作品，十分懷戀周朝的社會秩序。但它因戰事不斷，已在分崩離析中。家庭和親戚關系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

所有部落社會都實行祖先崇拜，雖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儒家給中國版本涂上了特殊的道德色彩。儒家的道德原則規定，對父母的責任，尤其是對父親的，要大于對妻子或子女的。對父母不敬，或在經濟上沒盡扶養責任，就要受到嚴厲懲罰。兒子對妻子或子女的關心，如超過對他父母的，也要受到嚴厲懲罰。如發生沖突，例如父親被控犯了罪，父親的利益一定高于國家的。[[23]](#m23_5)

家庭和國家的緊張關系、家庭責任高于政治責任的道德合法性，在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迄今，中國家庭仍是一種強有力的制度，竭力捍衛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權力的干涉。家庭和國家的力量關系呈反比。19世紀清朝式微，中國南方強大的宗族干脆接管地方事務的治理。[[24]](#m24_5)1978年的中國，鄧小平推行包產到戶的改革，農民家庭又變得生龍活虎，成為后來影響全國的經濟奇跡的主要引擎。[[25]](#m25_5)

相比之下，法家向前看。它把儒家和對家庭的尊崇，看作鞏固政治權力的絆腳石。儒家精致微妙的道德和責任，對他們絲毫沒用。作為替代，他們追求直截了當的賞罰分明——特別是懲罰——使百姓臣服。如法家思想家韓非子所說的：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26]](#m26_5)

法家建議，不可把臣民當作可以教誨的道德人，只可當作僅對賞罰有興趣的自私人——特別是懲罰。所以，法家的國家試圖打破傳統，廢除家庭道德責任，以新形式將臣民與國家綁在一起。

1949年后，中國共產黨推動的社會工程與法家有明顯關聯。就像早先的商鞅，毛澤東也把傳統的儒家道德和中國家庭看作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他的反孔運動意在鏟除家庭道德的合法性，共產黨、國家、公社變成幫助中國人團結起來的新式制度。一點不令人驚訝，商鞅和法家在毛澤東時代得以復興，在很多共產黨學者的眼中成為現代中國的先例。

有學者說，“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視作道德的專制主義；作為對照，法家否定道德與政府的關聯，可被視作赤裸裸的專制主義”。[[27]](#m27_5)對皇帝的權力，儒家無法想象任何制度上的制衡。更確切地說，儒家試圖教育君主，緩和他的激情，使他深感對人民的責任。讓君主獲得良好教育，以建良好政府，西方傳統對此并不陌生。這實際上是蘇格拉底在描繪合理城邦時所簡述的，記載于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皇帝到底深感多少對人民的責任，還是僅僅利用儒家道德來保護自身利益，那是后續章節的主題。法家直接剝去道德政府的外衣，公開宣稱臣民是為君主而活的，不可顛倒過來。

我們不應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與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關聯。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蔭的既存法律，并獲得教士等級制度的捍衛。它獨立于國家，其歷史比國家更長。與當前統治者相比，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級、更合法，因此對統治者也具有約束力。法治的含義就在：甚至國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縛的，不可隨心所欲。

這種法治從沒存在于中國，對法家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他們認為，法律只是記錄國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來，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區的道德共識。[[28]](#m28_4)商鞅認為，懲罰一旦確定，適用于社會所有成員——貴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與現代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點。[[29]](#m29_4)



戰國時期的中國

商鞅所創建的新式國家制度，使秦國在調動資源方面，比以前更加廣泛，比鄰國更加有效。但仍不是取勝的保票，因為敵對國家的強烈競爭導致了互相仿效。秦國崛起進而稱霸全中國的故事，與其說是發展領域的，倒不如說是國際關系領域的。

春秋末期為鞏固國家而發起的爭戰中，秦國實際上是配角，只在更強大的對手中間發揮平衡作用。它處于爭戰國家中的最西面，在地理上受一定保護（參看地圖）。從公元前656年到前357年，涉及大國的160場戰役中，秦僅發動11場。秦孝公和商鞅開展國家改革后，這就有了大變。從公元前356年到前221年，秦發動了96場大戰役中的52場，打勝48場。公元前4世紀最后十年，秦打敗南方大國楚，又在前293年打敗東面的鄰國魏和韓。東方的齊國是僅存的主要敵人，也敗于前284年。到了公元前257年，所有他國都喪失了大國地位。始于公元前236年的統一戰爭，最終導致中國在前221年出現大一統的秦朝。[[30]](#m30_4)

爭戰國家到底圖什么？在某種程度上，東周沖突背后的癥結是舊貴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尋覓新機會，以攀登權力階梯。這也是意識形態問題，儒家和法家為此而爭論不休。這個爭論發生于一國之內，也發生于各國之間；既是爭戰的原因，又是爭戰的結果。秦國把自己當作法家的旗手，它的動機與其說是信服，倒不如說是實用。[[31]](#m31_4)

這里利害攸關的主導思想，不同于上述爭論，而是商周統一中國的古老理念。統一中國的實現，其傳說的色彩大于現實。東周的分裂始終被看作曠日彌久的異數，需要承擔天命的血統崛起，予以撥亂反正。尋求承認的斗爭，就是看哪個宗族獲得統治整個中國的榮譽。

### 中國發展路徑為何異于歐洲

許田波（Victoria Hui）等學者提出這樣的超歷史大題目：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由多極國家體系組成，最后鞏固成單一的龐大帝國，而歐洲卻沒有。歐洲國家體系實際上也有兼并鞏固，從中世紀末的400個主權政治體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25個。盡管有不少嘗試，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侖、希特勒，但還是沒有見到單一的歐洲大國。

有下列可能的解釋，第一條是地理。歐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脈而分成眾多區域，如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萊茵河、多瑙河、波羅的海、喀爾巴阡山脈，等等。不列顛島嶼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歐洲歷史上扮演了破壞霸權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個中華帝國僅擁有今日中國的部分領土，由西向東，只是從渭河峽谷到山東半島而已。戰國時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運河，當時的軍隊很容易在這個地區縱橫馳騁。這個核心地區鞏固成單一強國之后，才開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條與文化有關。商和周的部落之間有種族差異，但周朝時期涌現出的各國，則無種族和語言的明顯區分，不像羅馬人、日耳曼人、凱爾特人、法蘭克人、維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間。中國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子的周游列國，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證實了日益增長的文化統一。

第三條是領導，或領導的缺乏。許田波指出，多極國家體系不是自我調整的機器，不能永遠取得防止霸權崛起的平衡。國家有自己領袖，解讀自身利益。秦國領袖運用機智的治國術，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擊破敵國的聯合。而敵人無視秦國的兇險，反而經常自相殘殺。

最后一條與中國和歐洲政治發展走上不同路徑直接相關。歐洲從沒見過像秦朝那樣的強大專制國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國。但它發展較晚，一直處于歐洲政治的邊緣，直到18世紀的下半葉。（俄羅斯進入歐洲國家體系后，很快占據歐洲的大部，先是在1814年亞歷山大一世時期，后在1945年斯大林時代。）17世紀晚期，像法國和西班牙那樣的國家通常也被稱作“專制主義”。我們將會看到，它們在征稅和動員方面，遠遠比不上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潛在的專制君主開始其國家建設大業時，就會遇上組織良好團體的阻撓。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襲貴族、天主教會、組織起來的農民、獨立自治的城市。所有這一切，都可在國境內外靈活運作。

中國情形很不同，它依賴廣泛的親戚體系。中國的封建貴族，從沒建立起與歐洲領主一樣的地方權力。根于宗族的中國貴族，其權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糾纏于其他親戚團體；作為對照，歐洲封建社會發展了強大且等級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權。此外，不像歐洲貴族，中國貴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權利、特權的保護。中國貴族的人數，因數世紀不斷的部落戰爭而幾近耗盡；專業政客得以組織強大的庶民軍隊，輕易擊敗早期的貴族軍團。周朝的中國從沒發展出可與歐洲媲美的強大世襲地主貴族。君主、貴族、庶民階層之間的交叉斗爭，對歐洲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至關重要，卻從沒在中國發生。相反，它有個早熟的現代集權國家，一開始就打敗所有的潛在對手。

馬克斯·韋伯定為本質上的現代特征，秦朝如果沒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國的韋伯為何把中華帝國描述成家族國家，這是個謎。[[32]](#m32_4)迷惑韋伯的原因，也許是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沒有經濟現代化的陪伴，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也沒有社會現代化的陪伴，親戚關系沒有轉換為現代個人主義，反而與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現代化理論家一樣，韋伯相信發展中的各個方面——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都是緊密相連的。很可能是因為現代化的其他方面沒在中國出現，所以韋伯認不出中國的現代政治秩序。歐洲的實際發展中，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也沒有密切相連，有順序上的先后，它的社會現代化早于現代國家的形成。所以，歐洲的經驗是獨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會復制。

### 多種現代化

秦統一中國后，政治現代化為何沒有導致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現代國家的出現是集約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還不夠。如要資本主義出現，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資本主義革命之前有一場認知革命，發明了科學方法、現代大學、以科學觀察創造財富的技術革新、鼓勵革新的產權體系。秦朝的中國在很多方面的確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學術傳統是向后看，無法達到現代自然科學所需要的抽象。

此外，戰國時期沒有出現獨立的商業資產階級。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業中心，也沒有獨立自治的傳統。商人或工匠沒有社會威望，崇高地位只屬于地主。[[33]](#m33_4)雖有產權存在，但其形式無法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秦朝的獨裁政府，剝奪大批家族地主的土地來削弱其權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稅來支持軍事擴張。國家不是創造獎勵，讓農人的耕耘更為有效，而是訂出產量定額，如果完不成，還要加以處罰。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襲的地主莊園，開辟了土地買賣市場，但隨之沒有出現自耕農階層，土地又被新貴階層所吸納。[[34]](#m34_4)沒有法治來限制主權國家沒收私人財產的權力。[[35]](#m35_4)

親戚關系體系崩潰，被更自愿、更個人形式的團體所取代，這就是社會現代化。但它在秦統一后沒有發生，原因有二。首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出現，促進新社會團體和新身份的廣泛分工也無從說起。其次，破壞中國親戚關系的努力是獨裁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相比之下，破壞西方親戚關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論層次上，又通過教會對家事和遺產的影響力（參看第16章）來進行。西方社會現代化的生根發芽，比現代國家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足足早了數個世紀。

自上而下的社會工程經常不能達到目標。中國的父系宗族和以此為基礎的家族政府，其相關制度雖遭受痛擊，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們將看到，曇花一現的秦朝之后，它們又卷土重來，并作為權力和感情寄托的來源，在后續世紀中一直與國家明爭暗斗。

## 第8章 偉大的漢朝制度

秦始皇和他所創建的朝代為何迅速倒塌；漢朝恢復儒家制度，但仍保留法家原則；秦漢時期的中國治理

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創始人嬴政（死后廟號是秦始皇帝，生于公元前259年，卒于公元前210年），精力充沛，且不可一世，全憑政治權力改變了中國社會。世界聞名的兵馬俑是特地為他鑄造的，在1974年出土于一個2平方英里的陵墓區。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聲稱，造秦始皇陵動用了70萬勞工。即便是夸大其詞，但很明顯，他創建的國家掌控大量盈余，以驚人的規模調配資源。

秦始皇把秦的制度推廣到全中國，其所創造的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將在后繼者漢朝手里變成一種統一的中國精英文化。這不同于群眾現象的現代民族主義。盡管如此，將中國社會精英鏈結起來這一新意識，堅韌不拔，在朝代興亡和內亂之后，總能浴火重生。外邦人好幾次打敗中國，但無法改變中國制度，反被吸收消化，直到19世紀歐洲人抵達。鄰居的朝鮮、日本、越南，雖獨立于中國政體，但借鑒了大量中國思想。

秦始皇用來統一中國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權力。他實施了商鞅所闡述的法家原則，其時，秦仍是個邊陲國家。他攻擊既存傳統，推行龐大的社會工程，所作所為幾近極權主義，從而激發了社會中幾乎每個階層的強烈反對。僅十四年后，秦朝轟然倒塌，改朝換了姓。

秦朝為后世君主留下一份復雜遺產。一方面，受秦始皇攻擊的儒家和傳統派，在之后的世紀中，詛咒它是中國歷史上最不道德、最為暴虐的政權之一。儒家在漢朝重新得勢，試圖推翻秦的很多革新。另一方面，秦朝憑借政治權力所建立的強大現代制度，不但活過了漢初的貴族復辟，而且在事實上定義了中國文明。盡管在后來中國王朝中，法家不再是欽準的意識形態，但在國家制度中仍可看到它留下的遺跡。

### 秦朝國家和崩潰

秦始皇的政策由丞相李斯執行。李斯是法家思想家韓非子的同學，但設下陰謀讓后者蒙辱自殺。一旦掌權，這名建國設計師的最初行動是將帝國行政分為兩級，共設三十六郡，郡以下設縣。郡縣的長官全由皇帝從首都咸陽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已孱弱的封建貴族是打擊對象，歷史記載說，為方便監督，全國十二萬貴族被迫遷至首都近郊。[[1]](#m1_8)在人類歷史這么早的時期，很難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權的案例。這顯示中國離開部落社會已有多遠。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員抵抗國家集權，在公元前213年建議皇帝重新分封，試圖在鄉野為自己打下新的權力基礎，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認為，這將破壞他們的國家建設大業：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2]](#m2_8)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燒經典，據稱還下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這些行為招致了后世儒家對他經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國已有統一度量衡，現在推廣至全中國。秦始皇還以史籀大篆統一全國文字，這也是秦國當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為了促進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統一。[[3]](#m3_8)就是今天，中國各地仍有不同方言。文字統一為確定中國身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門有統一語言，而且全國各地都可分享經典的同一文本。

秦朝嚴格遵守法家方法，其統治如此暴虐，以致在全國激起一系列起義。它的轟然倒塌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的公元前210年。被押去軍事營地的一隊罪犯，因暴雨而受阻，遂揭竿而起。法律規定，無論什么原因，延遲到達者都是死罪。小隊領袖決定，即使造反，他們的命運也不會變得更糟。[[4]](#m4_8)叛亂迅速蔓延至帝國其他地區，很多幸存的前君主和前封建貴族，看到秦朝變得衰弱，便擁兵宣告獨立。同時，丞相李斯與一名宦官共謀擁戴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反而死于宦官之手。接下來，宦官又死于他想立為皇帝的子嬰之手。出身楚國貴族的項羽，還有其庶民出身的部下劉邦，組織新軍隊，攻入秦首都，消滅秦朝。項羽分派土地給親戚和擁護者，試圖返回周朝的封建主義。劉邦（死后謚號是漢高祖）轉過身來反對項羽，四年內戰后成為勝利者。他在前202年建立漢朝，史稱西漢。[[5]](#m5_8)

在項羽封建復辟和秦始皇現代專政之間，新皇帝漢高祖的政權采取折中路線。不像秦始皇，漢高祖沒有既存國家的權力基礎。他的合法性來自他的魅力，他是反暴政的造反軍的成功領袖。為取得政權，他統領一個由雜亂軍隊組成的同盟，包括很多傳統家族和前君主。此外，他還須提防北方游牧部落的匈奴。因此一開始，他改造中國社會的能力，遠遠低于其前任秦始皇。

高祖創建雙軌制度，部分地區恢復了周朝的封建主義。他把內戰中支持自己的前君主和將軍們分封去小王國，又給自己家庭成員分派新的封地。剩下的地區則保留秦朝的非人格化郡縣制，構成高祖自己的權力核心。[[6]](#m6_8)最初幾年，朝廷對小王國的控制很弱。秦朝統一中國的工作本來就不徹底，漢朝早期仍需繼續努力。高祖啟動這一過程，逐漸取消地方封王中不是劉姓的權力。繼承者漢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廢了長沙最后一個小王國。皇族成員管轄的封地持續較久，與搬到長安的中央政府日益疏遠。公元前154年，它們中的七個為取得完全獨立而反叛。成功的鎮壓導致漢景帝宣布，剩下的封地不再享有行政權力。政府提高征稅，迫使封地在兄弟姐妹中分家。西漢開國一百年后，封建統治最后的殘余變得無權無勢，地方官幾乎都是中央政府指派的。[[7]](#m7_7)

家族擁有地方權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轄的周朝封建主義，在中國后來歷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亂時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穩腳跟，又奪回對這些政治體的控制。從來沒有一次，封王強大到可逼迫帝王作出憲法上的妥協，如英國的大憲章。中國地方上的封王，不像封建歐洲的對應階層，從未獲得法律上的合法性。我們將看到，以后的世襲貴族試圖在中國掌權，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權力基礎，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強大國家早期的中央集權，隨著時間的推移，竟使自己變得永久化了。

在中國不同地區根除家族統治，代之以統一的國家政府，事實上是法家的勝利，也是秦建立集權強國傳統的勝利。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意識形態上，儒家的傳統主義得以東山再起。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治下，儒家學者重返行政高位，興辦太學，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專門研究各自的經典。讀好經典成為做官的敲門磚，著名的科舉制度的雛形也于此而起。[[8]](#m8_7)

思想領域也發生重大變化。法家為君主著想的殘酷統治，原是商鞅和韓非所倡導的，此時遭到貶謗，民為邦本的古代儒家見解重又獲得尊敬。這離民主觀念還很遠，沒有一名儒者相信，對皇帝的權力或權威應有制度上的正式制衡，更不用說普選或個人權利。對皇帝權力的唯一制衡是道德；也就是說，給予皇帝正確的道德教育，敦促他仁民愛物，并時常勸誡他不可辜負這些理想。

早期的皇權也有限制，因為皇帝身處儒家官僚機構之中。官僚機構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沒有制衡皇帝的正式權利。但像所有的官僚，憑借專長和帝國運作的知識，他們施加了可觀的非正式影響。像任何等級組織的領袖，從軍隊、公司到現代國家，坐在漢朝政府頂端的皇帝，必須依賴眾多顧問來制定政策、執行命令、判決呈入朝廷的案件。這些官員負責訓練年輕太子，等他們長大登基后，再提供咨詢服務。傳統和文化上的威望，增加了高級官僚左右皇帝的影響。歷史記載中，丞相和尚書批評皇帝的案例很多，有時還得以扭轉有爭議的決定。[[9]](#m9_7)

武裝起義是對壞皇帝的最后制裁，根據儒家天命流轉的原則，又是正當合法的。天命的首次提出是為了辯解公元前10世紀周對商的篡奪，之后又被用來辯解對不公或腐敗皇帝的造反。沒有精確規則來確定誰享有天命，其獲得往往是在造反成功之后（第20章對此有更詳盡的討論）。顯而易見，這種制衡是非常極端的，帶有極大風險。

君以民為貴的儒家思想，把負責制的原則帶進了中國政府。但要注意，這個負責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觀念，而這觀念又是官僚機構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爾曼（Schurmann）認為，官僚機構所塑造的道德說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說，他們強烈反對法家君主赤裸裸的專制統治，因為儒家就是這種權力的首批受害者。他們只想在漢朝復辟時期保護自己的地位。這些官僚不是公眾利益的監護人，而在代表基于親戚關系的社會等級制度；他們自己，又恰恰身處該制度的頂端。[[10]](#m10_7)盡管如此，對這一執政的意識形態，還是要多講幾句。它至少在原則上堅持君主應對人民負責，并執意保護抗衡集權的現存社會制度。

### 漢朝政府的性質

漢朝時期涌現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獨裁集權與周朝的親戚制度之間，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決家族統治的地方勢力。在西漢末期王莽的土地改革之前，沒有試圖使用權力來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基本上，它不觸及既存的社會人脈和產權。為營造公共工程，它也征用徭賦，但沒有秦朝那樣窮兇極惡。

漢朝時期，中國政府愈益建制化。在家族制中，無論是周朝的中國，還是當代的非洲或中亞國家，政府官員獲得任命，靠的不是自己的資格，而是與統治者的親戚或私人關系。權力不在職位，而在擔任此職的人。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就是指家族統治被官僚機構所取代。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經典定義，現代官僚機構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職需有明確專長、在界定清晰的等級制度中設立各級官職、官員不得有獨立的政治基礎、官員必須遵守等級制度中的嚴格紀律、薪俸官職只是謀生的職業。[[11]](#m11_7)

西漢的中國政府幾乎符合現代官僚機構的全部特征。[[12]](#m12_7)政府內確實有很多留用的家族官員，尤其是在高祖統治的早期，因為皇帝需要反秦和內戰盟友，以幫助自己鞏固新政權。但在中央政府，非人格化基礎上選出的官員逐一取代家族官員。朝廷顯貴和執行君主決策的永久官僚機構之間，出現了日益明顯的差別。

始于公元前165年，皇帝昭告全國高級官員，推薦定額的優秀青年以任公職。漢武帝治下，官員被要求擔保其推薦人選的孝悌和正直。在公元前124年，郡官推薦的學生赴都城長安的太學參加考試。考試成績最好的，接受老師和學者的一年培訓，以欽準的儒家經典為基礎，然后再次參加考試，以擔任政府要職。用人的來源也在進化，例如設立專職人員巡游帝國查找人才，或邀請公眾就帝國現狀撰文參加競賽。這種非人格化用人，允許非漢族人才脫穎而出，例如出身匈奴的軍事將領公孫昆邪。[[13]](#m13_7)

公元前5年，中國的編戶人口是六千萬，在首都和省級供職的就有大約十三萬官員。政府設立專門培養公職人員的學校，訓練十七歲或以上的青年，測試他們閱讀不同文體、管賬等能力。（到隋唐時期，科舉制度將變得更為成熟。）漢朝仍有很強的家族因素，高官可推薦兒子或兄弟擔任要職，推薦制度肯定不能杜絕一切私人影響。就像后續的朝代，任人唯賢仍有教育條件的限制。只有富貴人家才能培育出滿腹經綸的兒子，有資格獲得推薦或參加考試。

盡管尚有家族制的殘余[[14]](#m14_7)，根據韋伯的定義，漢朝的中央政府日愈官僚化。職位最高的官員是三公，從高到低分別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有時，丞相職位一分為二，分成左右丞相，可以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三公之下是九卿，各有自己的僚屬和預算。最重要的卿中，有掌管宗廟祭祀的奉常（后改稱太常）、負責皇帝禁衛的光祿勛（秦時稱郎中令）、負責皇宮和京城守軍的衛尉、負責皇帝財政的少府、負責司法的廷尉、負責糧食和稅收的大司農。在當時農業社會里，這最后一職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手下有六十五個機構，派遣高級官員去各州幫助管理谷倉、農活、水利。[[15]](#m15_7)

理性的官僚機構不一定追求理性的目的。奉常手下的機構分管奏樂（太樂）、祝禱（太祝）、犧牲（太宰）、星象（太史）、占卜（太卜）。太史向皇帝提供舉辦大事和儀式的兇吉日期，還監督文官考試。太祝下設三十五名僚屬，太樂掌管三百八十名樂人，政府的規模于此可見一斑。[[16]](#m16_7)

漢朝政府最不尋常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有效控制，這可追溯到中國歷史的最早時期。中國截然不同于羅馬，后者雄心勃勃的將軍，如龐培（Pompey）和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經常爭奪政治權力。中國也不同于軍事政變頻繁的現代發展中國家。

這不是因為中國缺乏軍人權威或魅力，其歷史上充滿了常勝將軍和赫赫武功。即使在戰國之后，中國仍繼續打仗，主要與草原游牧民族，但也包括朝鮮、西藏以及南方部落。幾乎所有朝代的創始皇帝，都憑借自己的軍事能耐而登上龍位。如我們所知，劉邦原是農家子，全憑軍事上的組織和戰略能力才當上漢高祖，他當然不會是最后一個。到了唐朝，像安祿山那樣野心勃勃的將軍也試圖爭奪王位。唐朝的最終崩潰，是因為防御北方野蠻部落的邊境軍隊得以掙脫中央政府的控制。

一般來講，征戰成功的王朝創始人一旦登基，就會卸下戎裝，實施文官統治。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摒除將軍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軍人至遙遠邊境，鎮壓妄圖起兵造反者。不像羅馬近衛軍（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衛軍（Janissaries），皇帝的宮廷衛士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扮演過王者之王的角色。考慮到戰爭對國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國文官統治為何如此強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軍事等級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后將軍，按理說，其地位都高于九卿，但這些職位經常是空掛的。它們多被認為是儀式性的，沒有真正軍事權力，通常由文官擔任。此時，軍隊中尚無專業軍官，皇帝手下的官員出將入相，被認作文武雙全。一旦開國的內戰結束，軍事長官通常被派去邊遠的草原或要塞，遠離文明。抱負不凡者所追求的，不會是這種職業。[[17]](#m17_7)

這些理由又帶出新的疑問，中國制度中的武官為何獲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規范化。春秋和戰國的嚴峻考驗中涌現出一種思想：真正的政治權威在于教育和教養，而不在于軍隊威力。覬覦王位的軍人發現，必須披上儒家學問的外衣，方能獲得他人的信服；必須讓兒子接受大儒的調教，方能繼承王位。光說筆桿子比劍更為強大，這似乎還不夠。我們應該考慮，文官政府得以成功控制軍隊，最終還得依賴有關合法權威的規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國軍隊明天就可奪走總統權力，但它沒有這樣做。這意味著，大多數軍官即使在夢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國憲法，如果真的想做，他們指揮的大多數士兵也不會服從命令。

漢朝在兩種利益群體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創建強大統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東周式的動亂和戰爭；另一方面，全國的地方精英又試圖盡量保留自己的權力和特權。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過于偏向集權國家，所侵犯的不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農民的利益。農民以前面對地方領主的暴政，現在則換成了國家暴政。漢朝重作平衡，既考慮曾是秦朝打擊對象的封王和貴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漸減少他們的影響。它的儒家思想，雖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認，使自己重歸合法。西漢創建的國家是穩定的，因為大家達成妥協。但與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盡量避免與殘余的貴族影響發生正面沖突。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短命的“新朝”，漢朝存活了四個多世紀，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這是頗不尋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遺憾，最終還是不免壽終正寢。

[[11]](#w11_7) 特征列表： a．官員本身是自由的，只須在規定范圍內服從權威。 b．他們被分配到明確定位的等級制度的職位。 c．每個職位都有規定的專長范圍。 d．職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約關系。 e．選擇候選人是以技術資格為基礎。 f．官員的酬勞是固定薪水。 g．職位是任職者唯一的職業。 h．職位成為一種職業。 i．所有權和管理之間的分離。 j．官員遵守嚴格的紀律和掌控。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1卷，220—221頁。很多評論家提到，韋伯的定義最適用于他最熟悉的普魯士—德國的官僚機構，卻不能準確描述今天諸多公共或私人的有效科層機構。例如，平面管理（flat management）的很多范例將高度自治權下放給屬下，并放松經典等級制度的嚴格掌控，使不同職位之間的邊界模糊不清。但依我看，現代官僚機構最重要的特征，如職位的專業性、職位從屬于更高級政治權力、公私分明，仍是所有現代公共管理制度的特征。Allen Schick主張，公共管理中最新

## 第9章 政治衰敗和家族政府的復辟

四百年漢朝為何倒塌；大莊園增長的意義和馬爾薩斯式社會的不公；門閥士族攫取政府和國家變弱；中國意義的國家

不能假定，政治秩序一旦出現就能自我持續。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開初只是一篇名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的文章。他認為，與現代化理論的循序漸進相反，沒有理由可以假設，政治發展比政治衰敗更有可能。社會中各競爭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會涌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部和外部都會發生變化。當初建立平衡的參與者在進化，或干脆消失了，又出現新參與者；經濟和社會條件也會發生變更，社會遭遇外部侵略，或面對新的貿易條件，或引進新的思想。因此，先前的平衡不再有效，引起政治衰敗，直到現存參與者發明新的規則和制度來恢復秩序。

漢朝的崩潰原因多種多樣，涉及早先政治平衡方方面面的變遷。公元2世紀，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漢朝皇族的團結和它的合法性受到嚴重破壞。除了中國，宦官還在很多帝王的宮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已被閹割，不再有性感覺和性能力，所以深得信任。他們沒有家庭，在心理上完全依賴主人，也不會想方設法為子女（因為不存在）爭奪利益。他們扮演重要角色，幫助中國皇帝避開強大自治的官僚機構，并慢慢發展了自己的集團利益。

先是外戚梁太后一族的領袖挑選軟弱的漢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繼承皇位，以便自己的宗族獲得政府高位和特權。不久，大難臨頭。皇帝在宦官的幫助下發動了現代拉丁美洲人所謂的自我政變（auto-golpe），殘殺梁氏外戚。宦官搖身一變，成了強大政治力量，獲得皇帝褒獎的官職、免稅等，從而威脅了官僚和儒家的地位。始于165年，官僚和儒家開始發起反宦官運動，最終取得徹底勝利。[[1]](#m1_9)

環境條件令形勢雪上加霜。173、179、182年發生瘟疫；176、177、182、183年發生饑荒；175年發大水。廣大民眾的悲慘導致道教的興起，它在農民和其他庶民中吸引眾多信徒。儒家是一種道德，不是超現實的宗教，一直是精英的行為準則。道教源于古老的民間信仰，現在變成非精英的抗議宗教。184年爆發的黃巾（他們頭戴黃色頭巾）起義以它為精神支柱，更因過去十年中農民所忍受的艱辛，而迅速星火燎原。雖在二十年后遭到血腥鎮壓（據傳死去五十萬人），它摧毀了大量的國家設施和生產力。[[2]](#m2_9)這些災難的結果是中國人口的驟減，從157年到280年，駭人聽聞地減少了四千萬，等于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3]](#m3_9)

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看，家族精英攫取國家權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漢朝衰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朝消滅封建主義，創建非人格化現代國家，這一努力現在遭受極大挫折。在中國，親戚關系再次成為權力和地位的主要途徑，一直延續到9世紀的晚唐時期。[[4]](#m4_9)

但這不是周朝封建主義的復辟。秦朝以來已有太多變動，包括強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機構、披上禮儀合法性的宮廷。西漢已逐步消除封地上的家族影響，當貴族家庭卷土重來時，他們沒有重建地方上的權力基礎，而是直接參與中央政府機構。周貴族和漢貴族之間的區別，有點類似17世紀晚期英國貴族和法國貴族之間的區別：英國領主仍住在自己莊園，行使地方上的權力；而法國貴族被迫遷去凡爾賽，以靠近宮廷和國王來謀取權力。在中國，宮廷中的權力就是通向地產的陽關大道，有權有勢的官員可獲得土地、侍從、農民、免稅特權。

### 富人更富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歷了大莊園（latifundia）愈益擴張。它們受貴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長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這加劇了貧富懸殊，一小群貴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財富。他們逐步剝奪政府的稅收，因為自己的富饒農地無需納稅，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謂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們利用政治關系攫取國家權力，再使用國家權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農業社會有條大莊園的鐵律：富人將變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國家的，或是農民起義的，或是國家害怕農民起義而采取的。在前現代農業社會里，財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術是呆滯的，創業或創新的人得不到獎勵。農業機械化之前，沒有大規模生產的好處，所以無法解釋大莊園的擴張。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塊，讓單獨農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債務機制，最初資源的小差別將與日俱增。富農或地主會借錢給較貧困的；遇上壞季節或壞收成，負債人不但賠掉家產，甚至可能淪為農奴或奴隸。[[5]](#m5_9)大地主又可購買政治影響，以保護和擴充自己的財產，長此以往，富人優勢自我更新，有增無已。

所以，把現代產權理論誤用于歷史場景，只會導致根本上的誤會。很多經濟學家相信，健全的產權促進經濟成長，因為它保護私人投資的回報，從而刺激投資和經濟成長。但中國漢朝的經濟生活，不像工業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卻像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學原理》中所描述的。[[6]](#m6_9)今天，我們期待技術革新所帶來的勞工效率增長（人均產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長全靠運氣。開發農業、灌溉、印刷機、火藥、帆船遠航，都促進了生產效率的增長。[[7]](#m7_8)但在間隔的漫長歲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農業社會已達到其技術可能性的頂端，進一步投資不會增加產量。唯一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增長，即開發新耕地，或干脆爭奪他人的。所以，馬爾薩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損。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為勤勞，他只是有更多資源來挨過難關。[[8]](#m8_8)

在集約增長不可能的馬爾薩斯式世界，健全產權只會鞏固資源的既存分配。財富的實際分配，代表不了生產效率或勤勞與否，只能代表起初的運氣，或者業主與政治權力的關聯。（甚至在今天流動和創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古板的產權捍衛者經常忘記，現存財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場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們自由選擇，精英們傾向于擴張大莊園。在這面前，君主有兩種選擇。他們可與農民站在一起，運用國家權力來促進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權，剪去貴族的翅膀。這發生在斯堪的納維亞，18世紀末瑞典和丹麥的國王與農民站在一起，反對相對較弱的貴族（參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貴族一邊，運用國家權力來加強地方寡頭對農民的控制。這發生在俄羅斯、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那里的農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紀以來，由于國家的同流合污，卻逐漸淪為農奴。法蘭西王國的君主政體太軟弱，不能剝奪貴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稅地位，只好把新稅負擔全部壓在農民頭上，直到整個制度在法國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從——保護現有的寡頭政治，或反戈一擊——取決于很多具體因素，如貴族和農民的凝聚力、國家面臨的外部威脅、宮廷內部的鉤心斗角。

漢朝的中國君主最初選擇支持農民，一起反對愈益強大的大地主。西漢時期，有人不時呼吁回到商鞅廢除的井田制。當時，它被視作農業社會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貧困農民因大莊園兼并而喪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復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議大莊園地產不得超過三千畝（1畝等于0.165英畝），由于大地主的反對，最后無疾而終。篡奪王位終止西漢的王莽也嘗試實施土地改革，使大莊園國有化。他也面對極大反抗，最終在應付赤眉軍（他們把眉毛畫成紅色）起義中筋疲力盡。[[9]](#m9_8)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敗，反讓家族貴族在東漢恢復時擴充財產，鞏固權力。大莊園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從、佃戶、族人，還經常擁有私人軍隊。他們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稅地位，減少帝國稅收以及可供勞役和征兵的農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軍隊的衰退而進一步變弱。中國大部分軍隊專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駐扎在遙遠的要塞，供應線拖得很長。農民很不愿意服這樣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當地野蠻居民中招募雇傭軍，或招募奴隸和罪犯。軍人愈來愈像一個特殊階層，在邊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務農，子承父業。這種情況下，獲得軍人忠誠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樣的當地將領，而不是遙遠的中央政府。[[10]](#m10_8)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2世紀70年代的自然災害和瘟疫，黃巾起義終于爆發。秩序蕩然無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爭而分崩瓦解，這一切促使大戶家庭躲在圍墻后的莊園和地區，不再接受軟弱國家的控制。漢朝的最后幾十年，中央國家完全崩潰，權力落到一系列地方軍閥手中，他們要么選擇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黃袍加身。[[11]](#m11_8)

### 國家分裂和家族制復辟

秦朝統一中國之后最長命的朝代漢朝，終于在公元220年徹底崩潰。除了很短的例外，中國在今后的三百年中不再有統一國家。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小說之一《三國演義》，講的就是東漢到晉朝這段時期。晉朝始于280年，但持續很短時間。小說作者羅貫中，在明朝寫成（也許在14世紀晚期，但沒有確定日期）這部作品。其時，明朝已從蒙古人手中解放中國，在漢人自己統治下，再度統一中國。[[12]](#m12_8)小說的潛在主題是中國的不統一（內亂），造成混亂和外國侵略（外患），還闡述了恢復國家統一的條件。在塑造現代中國人歷史意識方面，《三國演義》可與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媲美。它被改編成電子游戲和無數電影版本。北京要求統一臺灣，其背后對分裂的痛苦記憶，就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

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觀點看，值得關注的是親戚關系和家族制，如何在漢和隋之間的空白時期（581年中國再度統一）重新成為中國政治的組織原則。中央國家的力量，正好與家族團體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現代國家獲得建立之后，各種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預設的政治組織。

漢朝終止之后的時期是非常復雜的，但從發展角度看，細節就不那么重要。中國最初分裂成所謂的三國：魏、蜀漢、吳。魏得以在西晉名下重新統一中國，但很快發生內戰。西晉的都城洛陽在311年遭到匈奴部落的洗劫和占領，匈奴國王在中國北部創建眾多外族朝代中的第一個。逃至南方的西晉幸存者，在長江邊上的建康（現代的南京），也建立數個南方朝代中的第一個，即東晉。北方和南方一分為二，都經受了持續動亂。在北方，洗劫洛陽導致了所謂十六國的部落戰爭。有兩次新的野蠻人入侵，第一次是原始西藏人的氐和羌部落，第二次是拓跋部落，即突厥鮮卑人的分支。拓跋部落建立了北魏（386—534），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漢化。他們冠中國人的姓，與漢人家庭通婚聯姻。拓跋部落中的緊張導致再一次的內戰，到6世紀早期分成東魏和西魏。在南方，遷自北方的舊宮廷重組東晉朝代，大量貴族家庭和侍從跟蹤而來。到4世紀中，東晉滅于軍事政變，之后又有武將建立的數個孱弱朝代。[[13]](#m13_8)

漢朝軍閥曹操和兒子曹丕在220年建立魏國，制定九品中正制，從而加速了始于東漢的家族制傾向。每個郡和州，都派有仲裁人，官名叫中正，依據品德和能力評議官職的候選人。不像早先的漢朝推薦制度，遴選仲裁人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顯然要受更多地方精英的影響。新招聘制度將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級，又與各層官位掛上鉤。漢朝時，不做官的人仍可有高級地位。自從有了九品中正制，官位變成爭取高級地位的唯一途徑。加上對血統的愈益重視，子承父位便成家常便飯。[[14]](#m14_8)

在強大中央政府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可以是削弱豪門、加強國家的對策。17世紀和18世紀初，法國君主出售一套精細的爵位和等級給貴族階層，從而削弱該階層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每個貴族家庭太忙碌了，沾沾自喜，瞧不起底下人，以致不能互相合作來保護自己廣泛的階級利益。3世紀的中國，九品中正制卻似乎成了貴族攫取國家的手段。庶民人才不能再通過推薦或考試攀至高位，這些官位只保留給現任官員的孩子，好像他們是戰勝部落的領袖。其時的皇帝往往不能保證自己的寵臣得到高位，因為寵臣缺乏合適的血統。這一切證明，真正的權力不在國家手中，而在貴族家庭手中。[[15]](#m15_8)

西晉垮臺后，家族制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發展。在南方，東晉宮廷由本地大戶和洛陽遷來的貴族流亡者所掌控。他們把九品中正制也帶來，政府操縱在王、陸、張姓的大戶手中，都是高級血統的近距離表親。[[16]](#m16_8)

大莊園的繼續擴張加劇了貴族控制。早在3世紀晚期，西晉頒布土地法，規定所有農民有權獲得最低數量的土地，以換取他們的徭賦負擔。它也規定了貴族家庭擁有土地、免稅租戶和侍從的最高限額。但它和東晉時頒布的類似法律，從沒得到執行。像王莽夭折的土地改革，這些失敗證明了大莊園勢力的日益壯大，直接威脅到國家的控制和資源。[[17]](#m17_8)

在北方，戰勝的羌人和突厥人首先是部落組織，就把自己的主要宗族安插到重要官位。初期仍有持續的沖突和部落之間的爭戰，這些外族家庭便是整個地區的領導精英。漢朝時興起的中國貴族家庭，要么南逃去投奔東晉宮廷，要么退回自己的莊園。他們仍擁有地方權力，但避開宮廷政治。5世紀的后半葉，北魏朝代得以集中權力，5世紀90年代遷都到歷史名城洛陽，事情于是開始發生轉變。魏孝文帝禁止在宮廷使用鮮卑語和鮮卑服，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邀請主要的漢貴族家庭赴宮廷供職。他得以創造統一的貴族階層，將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級，就像南方的九品中正制。在這樣的環境中，多數高級官員同屬一個宗族，貴族等級又是晉升高級官位的必要條件。[[18]](#m18_7)大莊園兼并土地，貴族階層權力日益增加，也都是北方的難題。485年北魏頒布一條法令，限制大莊園，保證農民獲得最低數量的土地。[[19]](#m19_6)

### 強大的中國國家

6世紀中期，北方的東魏和西魏被北齊和北周所取代。577年，北周進攻并打敗了北齊。時任北周將領的楊堅成為風云人物，他出身鮮卑族，妻子來自匈奴一個強大氏族。楊堅在內斗中擊敗對手，于581年建立隋朝。他的軍隊在587年打敗南方的梁，在589年打敗南方的陳。這是220年漢朝崩潰以來，中國在單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統一（實際領土與秦漢時不同）。謚號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長安，以漢朝為榜樣重新打造強大的中央政府。他兒子兼繼位人煬帝執迷于運河營造，還向朝鮮的高句麗王國發起草率的進攻最終失敗。他死于618年，隋朝很快消失，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淵的北方貴族在617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長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國最偉大的朝代之一，持續了將近三百年，直到10世紀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權，但沒能終止貴族家庭的影響。他們在間隔的空白時期，攫取了眾多小國的政府權力。我們將在第20章和第21章看到，反對家族制的斗爭將持續隨后的三個世紀，一直要到11世紀的宋朝，行政機構才返回漢朝時的“現代”基礎。中國國家的重新集權，得以激活像科舉考試和學而優則仕那樣的制度。在先前的數世紀中，這些制度在門閥貴族面前一輸再輸。

漢隋之間三百年混亂所提出的最有趣問題之一，不是中國為何崩潰，而是中國為何再次統一。在如此廣闊的領土上維持政治統一，這個命題絕對不是瑣碎的。羅馬帝國崩潰后，盡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羅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組。漢朝之后的多國制度凝固成像歐洲一樣的半永久制度，眾多國家，相互競爭，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已經有了。中國國家早熟的現代化，使之成為社會中最強大的社會組織。即使中央國家崩潰了，它的許多繼承者在自己邊界內，仍盡量復制漢朝的中央集權制度，仍盡量追求在自己領導之下完成統一大業。合法性最終來自天命的繼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繼承國家在邊界內復制漢朝機構，從而防止進一步的分崩離析。所以，沒有在中國出現像歐洲那樣的一再分封。

中國何以再次統一的第二個原因也許更為重要，能向當代發展中國家提供啟示。中國在秦漢時期所創造的，除了強大國家，還有共同文化。這種文化不能算所謂的現代民族主義的基礎，因為它僅存在于中國統治階級的精英階層，而不存在于廣大老百姓。但產生一種很強烈的感情：中國的定義就是共同的書面語、經典著作、官僚機構的傳統、共同的歷史、全國范圍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會的層次主宰精英行為的價值觀。即使在國家消失時，這種統一文化的意識仍然熾烈。

遇上不同傳統的外族野蠻人時，這種共同文化的力量變得尤為顯著。占領中國的幾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鮮卑（拓跋），或更遲的女真（滿人）、蒙古、黨項（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傳統、文化、語言。但他們很快發現，如不采用中國精湛的政治制度，便無法治理中國。更有甚者，中國文化的威望迫使他們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維護自身文化。

中國得以重新統一是因為秦漢兩朝已創下先例，統治整體比統治其中一部更為合法。誰有此權利呢？這是個復雜題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認真弄清中國對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朝代的間隔期尤其富有啟示。這段時期無疑是一場自由競賽，政治權力的門外漢——農家子、可疑種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軍人——都有機會攀爬到制度的尖頂。中國人愿意向他們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絕對權力，其原因有點撲朔迷離。在后面論以及其他的改朝換代時，我會重新回到這一問題。

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但這個國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負責制機構的限制，中國制度中唯一的責任只是道德上的。沒有法治和負責制的強大國家，無疑是一個專制國家，越是現代和制度化，它的專制就越是有效。統一中國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國社會重新整頓為一種原始極權主義國家。這個工程最終失敗了，因為國家沒有工具或技術來實現這個野心。它沒有激勵人心的意識形態來為自己辯解，也沒有組織一個黨派來實現它的愿望，憑借當時的通信技術還無法深入中國社會。它的權力所到之處，它的專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導致自己迅速滅亡的農民起義。

后續的中國政府學會收斂雄心，學會與現有的社會力量并存不悖。在這一方面，它們是專制的，但不是極權的。與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國集中政治權力的能力頗不尋常。

在這方面，中國政治發展的路程與印度截然不同。這兩個社會作為“亞洲”或“東方”的文明，經常放在一起。它們在早期表現出相似特征，后來卻各奔東西，南轅北轍了。過去兩千年中，中國的預設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國家，綴以分裂和衰敗；而印度的預設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國和公國，綴以短暫的政治統一。我們如果察看印度的歷史長河，它是民主國家的事實就絲毫不足為奇。這不是說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從而創下先例；而是說很難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專制統治。我們將在后續章節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領域。

## 第10章 印度的彎路

印度早期的發展因婆羅門教的興起而不同于中國；瓦爾納和迦提；印度早期的部落社會；印度親戚關系的特征；印度在建國大道上的彎路

印度早期的政治發展明顯與中國形成分流。一開始，它們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會組織。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國家從印度北部的部落社會中脫穎而出，比中國晚不了太多。在這兩個文明中，酋邦和國家不以親戚關系為基礎，而是由等級分明的政府，開始在領土范圍內行使強制權力。

就戰爭而言，它們的軌跡卻截然不同。印度從沒經歷像中國的春秋和戰國時期持續數世紀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確，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國，受地理局限較少；與其順從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倒不如遷移他處。[[1]](#m1_10)無論如何，早期印度國家無須像中國所經歷的那樣，應對社會動員的極端要求。

更為重要的是，印度出現一種獨特的社會發展模式，對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大約在國家剛剛形成之際，便涌現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會階層，被稱為瓦爾納（varnas，階層）：它們是祭司的婆羅門（Brahmins）、武士的剎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羅其余的首陀羅（Sudras，主要是農民）。從政治觀點看，這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權力一分為二。中國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員，像主持宮廷禮儀和皇帝祖陵的禮部尚書，但只是國家雇員，嚴格屈從于皇家權力。中國祭司從沒作為獨立集團而存在，中國也就發展成“政教合一”的國家。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羅門與剎帝利判然分開，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權威。雖然它沒有組成像天主教一樣的嚴密集團，但仍享有類似的道德權威，不受國家干涉。此外，婆羅門階層被當作神圣法律的監護人，而這法律不但獨立于政治統治，且具更長歷史。所以，國王必須遵從他人所編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國皇帝。跟歐洲類似，印度也有可稱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權力。

第二項重要社會發展是迦提（jatis）的涌現，最終演變成種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爾納，再細分為數百種分支式、對內通婚的職業群體，從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農民，達成評論家所謂的職業秩序的神圣化。[[2]](#m2_10)迦提重疊在現有血統結構之上，為氏族的異族通婚設定界限。也就是說，異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統，必須在迦提范圍內談婚論嫁，鞋匠女兒必須嫁給不同氏族的鞋匠兒子。成員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給自足的社區，在這一點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會的分支式特征。但他們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廣泛分工的一部分。與工業社會相比，這種分工非常有限；盡管如此，它又遠比單純的部落社會復雜。依照涂爾干的標準，迦提顯示了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的雙重特征——這是指，個人既是自我復制相同單位的成員，又參與更為廣泛的社會互助。

在中國，出現于周朝的國家在社會頂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組織。宗族仍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國家和親戚團體之間出現了權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強大了，另一方就變弱。到最后，塑造中國文明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家。在印度，瓦爾納和迦提所創造的社會分類成為社會基石，大大限制了國家權力的滲透和掌控。以瓦爾納和迦提為定義的印度文明，獲得廣泛擴散，從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到東南亞，統一了語言和種族的眾多群體。不像中國，這塊遼闊領土從沒受到獨家政治權力的統治，也沒發展出獨家文學語言。20世紀晚期之前，印度歷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軟弱，最為成功的統一政治體中不少是外國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賴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 印度部落社會

與中國相比，我們對印度部落社會以及其向國家的過渡，所知極其有限。雖然處于對應的社會發展階段，印度社會的文化水平要低得多，絕對比不上記載商朝政治活動的大量甲骨文或東周的冗長編年史。印度最早的定居點是旁遮普（Punjab）和西部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它的哈拉帕（Harappan）文明僅留存于考古學資料。[[3]](#m3_10)我們所了解的印度早期社會組織，都是從“吠陀本集”（Vedic texts）中推斷而來。該本集記載圣歌、祈禱、注釋等，可追溯到公元前兩千年或三千年，以前是口口相傳，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中期才變成書面記錄。[[4]](#m4_10)印度第一個本土帝國是孔雀王朝（Mauryas，公元前321—前185年），在很多方面，它又是最偉大的本土帝國。但它的文字記載僅有流散到次大陸的數塊法令巖石，再加上希臘、中國和其他外國著作的提及。這里可能有因果關系：缺乏流傳廣泛的書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統治者和行政官員中，大大阻礙了強大集權國家的開發。

印度—雅利安部落自黑海和里海（Caspian）之間的俄羅斯南部遷移至印度，由此開創了印度政治發展。某些部落群體轉向西方，成為希臘、羅馬、日耳曼和其他歐洲團體的祖先；另一群體朝南抵達波斯，第三群體向東到阿富汗東部，再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峽谷（Swat Valley），直達旁遮普和印度河—恒河（Indo-Gangetic）分水嶺。現在通過Y染色體和線粒體，可以追蹤印度—雅利安群體之間的血緣關聯，但首次確定相互關系的卻是語言學家，他們在印度梵語（Sanskrit）和西方語言之間找出相似，因為它們同屬更大的印歐語系。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為食，并已馴養馬匹。他們第一次遷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時，碰上他們稱作達薩（dasas）的其他定居者，后者可能屬于不同種族，使用達羅毗荼語（Dravidian）或澳斯特羅—亞細亞語（Austro-Asiatic，又稱南亞語）。[[5]](#m5_10)這段時期，這些部落的行為與他處部落非常相似。他們襲擊達薩社區，偷他們的牛，與其他部落打仗。如果遇上強有力的軍事抵抗，他們就退避三舍，該地當時仍屬人煙稀少。吠陀本集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Rg Veda），它提及部落之間的頻繁沖突、拉賈（Raja）或部落領袖的涌現、確保戰爭成功的祭司。印度—雅利安人開始在恒河平原安頓下來，從單一游牧業轉為游牧業和農業的混合。種植由小麥改成稻米，農業技術因此獲得改進，使更多盈余、更突出的送禮和禮儀奉獻成為可能。大約同時，奶牛地位開始發生變化，從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像努爾人一樣），到受人崇拜的圖騰動物。[[6]](#m6_10)

在這個發展階段，與我們已經解說的其他分支式社會相比，印度—雅利安社會似乎沒有任何的別具一格。例如，拉賈一詞經常被譯成國王，但實際上只是當時的部落領袖。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指出，拉賈的主要詞根是“發光、帶領”，但它的另一詞根是“使人滿意”。這顯示，拉賈在部落中的權威有賴于眾人的共識。[[7]](#m7_9)拉賈又是軍事領袖，幫助保衛自己的社區，率領眾人向鄰近部落發起襲擊以攫取戰利品。他的權力受親戚團體集會的制衡，如維達薩（vidatha）、薩巴（sabha）、薩米提（samiti）。其中的維達薩，專門負責在社區內分派戰利品。像美拉尼西亞社會的頭人，拉賈的地位取決于他在奉獻和盛宴中分配資源的能力。拉賈們彼此競爭，看誰可擺出最多的財富以及最終的浪費，很像夸扣特爾（Kwakiutl）和其他西北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的慶典。[[8]](#m8_9)

像其他部落社會，印度沒有法律制度，以賠償金解決爭端（殺人賠償金是一百頭奶牛）。拉賈沒有征稅權力，也不在現代意義上擁有土地。所有權都在家庭手中，還有對親戚團體的義務。像其他分支式社會，印度—雅利安部落可團結起來，組成像般庶王朝（Panchalas）那樣的高層次分支，高層次分支之間可以再次聯手，以達成更高層次的聯盟。

### 印度家庭和親戚關系

像希臘、羅馬、中國，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組成父系家族的血統。19世紀的歷史人類學家，包括甫斯特爾·德·庫朗日和亨利·梅因，在希臘、羅馬、凱爾特、條頓、當代印度人中，找到甚多相似的親戚結構。我曾提及，希臘、羅馬、早期印度人都在家庭祭壇供養圣火（參看第3章）。從1862年到1869年，梅因是在印度度過的。作為總督會議的法律成員，他潛心攻讀印度的原始文獻。他確信曾有過統一的“雅利安”文明，包括羅馬和印度。由于共同的歷史起源，他們有關財產、遺產、繼承的法律條款都非常相似。他相信，印度以某種方式保存了法律和社會實踐的古代形式，人們可從印度的現在看到歐洲的過去。[[9]](#m9_9)

后來的人類學家對梅因提出嚴格批評，認為他過于簡化印度的親戚關系，并在它之上強加了不妥當的進化結構。在顯示歐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種族起源上，他似乎確有強烈興趣，也許是為了提供英國統治印度的歷史基礎。但他仍是比較人類學的偉大創始人之一，并以淵博知識展示，不同文明發展了相似方案，以解決社會組織問題。當代人類學家都意識到，各社會的親戚結構中存有難以置信的微妙差異，但有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認不清同級發展水平的不同社會之間的相似程度。

像中國一樣，我們也不能將當代印度親戚組織，投射到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親戚關系作為社會基本結構原則，從沒在印度消失，這不像西方，倒與中國相近。所以，印度的社會組織自有其潛在的持續性，我們必須心領神會，方能解釋其政治發展的此起彼伏。

印度的親戚組織分屬三大區，與次大陸的三大民族語言區相對應：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講梵語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講達羅毗荼語；第三，東部，與緬甸和東南亞其他地區非常相似。[[10]](#m10_9)幾乎所有的印度親戚團體，都形成分支式的世系，絕大多數是父系社會。然而，在印度的南部和東部又有重要團體，分屬母系社會和母系中心，例如馬拉巴地區（Malabar）的那雅人（Nayar）。[[11]](#m11_9)跟中國一樣，后裔團體基于共同祖先，通過某種形式的共有財產而取得集團身份。

印度親戚關系不同于中國，因為瓦爾納和迦提的等級制度參與其中。迦提確立異族通婚的界限。這意味著，任何人通常不得與自己瓦爾納或迦提之外的人談婚論嫁。瓦爾納和迦提的制度等級森嚴，較低地位女子如何“高攀”較高地位男子，或較低地位男子如何“高攀”較高地位女人（后者比較少見）（人類學家稱之為向上通婚[hypergamy]和向下通婚[hypogamy]），它都設有精細規則來作規范。每個瓦爾納和迦提的本身，在地位級別上又作進一步的條分縷析。所以，即使在自己分類中通婚，也會遇上甚多禁忌。例如，婆羅門中有些必須主持家庭儀式，而另一些則不必；有些主持葬禮，而另一些則不必。婆羅門最高級別的男子，絕不可能娶最低級別婆羅門的女兒（即主持葬禮的）。[[12]](#m12_9)

梵語的北方和達羅毗荼語的南方，它們在親戚規則上的差別涉及表親通婚，從而影響政治組織。在北方，兒子必須與父親血統之外的人通婚，不可與第一表親通婚。在南方，兒子同樣必須與父親血統之外的人通婚，但是，與父親姐妹的女兒通婚，不但允許，而且獲得鼓勵。這種做法叫作交叉表親（cross-cousin）的婚姻。而平行表親（parallel cousin）的婚姻，即與父親兄弟的女兒通婚，則不可，因為這違反了氏族的異姓通婚規矩。所以，男子可與姐姐的女兒和舅舅的女兒通婚。換言之，像很多阿拉伯部落一樣，南方的印度部落傾向于把婚姻（以及相關的遺產）局限于狹窄的親戚小圈子，相連的血統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在北方，家庭為了孩子能找到合適的配偶，被迫在更大范圍內撒網。達羅毗荼的交叉表親婚姻，加強了其社會關系狹小內向的特征，這存在于所有的部落社會。[[13]](#m13_9)可以假定，這樣的婚姻實踐降低獎勵，使南方的國王不愿去尋求遠方的婚姻同盟，如建立現代西班牙的阿拉貢國王（Aragon）和卡斯提爾女王（Castile）的聯姻。

這段簡潔的概述，尚未觸及印度復雜親戚關系的皮毛。對梵語的北方和達羅毗荼語的南方，雖然可做出一個概述，但這兩個地區在親戚規則方面，因地理位置、種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不同，而展示出巨大的內部差異。[[14]](#m14_9)

### 過渡到國家

促使印度從部落社會過渡到國家，其原動力是什么？我們所擁有的相關信息，遠遠少于中國案例。我們有兩種關于國家形成的虛幻解說，與人類學家的暴力和社會契約理論遙相呼應。第一種解說，“吠陀本集”中較晚文本的《愛達羅氏梵書》（Aitareya Brahmana，或譯《他氏梵書》）解釋：“眾神與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敵人手中吃盡苦頭，便聚會討論，決定要一名拉賈來率領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羅（Indra）為他們的國王，戰勢很快獲得逆轉。”這個傳奇顯示，印度最早的國王應人們和軍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職責是率領部下打仗。[[15]](#m15_9)第二種解說來自佛教資料：

當人們喪失原始的光榮，階級差別（瓦爾納）遂出現。他們簽訂協議，接受私人財產和家庭的制度，盜竊、謀殺、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們聚會討論，決定要選出一名成員來維持秩序，報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獲。他被稱為“大選出王”（Mahasammata），頭銜是拉賈，因為他取悅于其他成員。[[16]](#m16_9)

佛教始終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為仁慈，更為溫和。它強調非暴力，以及輪回轉生的更為可行。所以，佛教徒認為國家形成獲得大家同意，也屬意料之中。但上述兩種解說都不是歷史記載。

實際的過渡也許牽涉到其他社會在建立國家時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講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達薩人，發動戰爭，最終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爾納，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會階層，而是兩大社會階層，分別是雅利安階層和達薩階層。所以很明顯，從平等部落社會到等級國家社會的過渡，開始于軍事征服。最初，達薩人只是因為自己的種族和語言而與征服者有所區別，到后來，達薩一詞變成了從屬或奴隸的代名詞。這個轉變是逐漸發生的，時間在印度—雅利安從游牧社會過渡到農業社會之后。[[17]](#m17_9)剝削從屬階級創造莊稼收獲的盈余，自己部落不必投入勞動，便可收取一筆地租。“拉賈”的意思，也從部落領袖變為“自土地或村莊享受收入的人”。[[18]](#m18_8)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早期，等級的日益分明又與永久定居、雛形城市、土地所有權緊密相連。[[19]](#m19_7)在土地上勞作的，不再是親戚團體共同協作的家庭，而是與地主并不沾親帶故的農民。[[20]](#m20_6)為了使低級階層永遠處于被主宰的地位，為了防止他們逃逸，常備軍和領土的政治控制變得不可或缺。

跟中國相似，促進政治鞏固的還有技術變化。其中之一是鐵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與日俱增的使用。鐵斧可用來清除密集的森林，鐵犁可幫助耕地。國家沒有控制鐵的生產，但鐵工具的使用帶來威望，并增加國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總水平。[[21]](#m21_6)

像中國和其他從部落過渡到國家的社會，獨特和永久的祭司階層婆羅門，賦予部落領袖愈益增長的合法性，使后者權力獲得很大提升。拉賈行使政治權力，祭司通過儀式使之合法化；拉賈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資源來補償這些服務。早期的拉賈憑借祭司而獲得神性，從而將自己職位轉為祖傳財產，通過漸漸流行的長子繼承權再傳給兒子。顯而易見，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長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會的薩巴失去了選擇氏族領袖的能力，開始扮演咨詢的角色。國王的授權儀式發展成持續一年的獻祭儀式；其間，拉賈經歷凈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終結時，婆羅門再賦予他職位和神性。[[22]](#m22_6)

公元前6世紀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會已從部落過渡到雛形國家或酋邦，被稱為伽那—僧伽（gana-sangha，編按：前者意為“眾多”，后者意為“集合體”）。北方的國家，如鴦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盧（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領土，治理城市中相對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權政治體。它們等級森嚴，王位世襲，其精英向農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會的特征：等級松弛，領導權模糊，不能像真正國家一樣行使強制權力。[[23]](#m23_6)

### 彎路

到此為止，印度北部和兩三千年前的中國西周，它們所經歷的政治發展沒有重大差別。最初，社會組成父系氏族的聯合體，信奉祖先崇拜；大約在過渡到定居農業社會時，轉向等級分明、世襲領袖、統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統治者比印度的統治者行使更多權力，但差別不很驚人。

首批真正國家出現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時，印度的政治演變以戲劇性的方式與中國模式分道揚鑣。印度國家沒有經歷五百年日益激烈的連續戰爭，就像中國早期國家在東周時所承受的。之后的數世紀內，印度國家也彼此打仗，也與伽那—僧伽交戰，但從沒達到中國所實施的相互滅絕的慘烈程序。如我們所知，中國獨立政治體的總數，從東周初的數百持續下跌到東周末的一枝獨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較少較不激烈的戰爭，以及較低程度的統一。較為原始的伽那—僧伽，沒被強大的國家所兼并，一直生存至公元第一個千年的中期，這就很說明問題了。在發展現代國家制度方面，戰國時期的中國政治體不得不仿效鄰國，而印度政治體顯然沒有此種壓力。公元前3世紀末，孔雀王朝得以統一次大陸的大部，建成單一帝國，但仍有部分地區從沒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帶的統治也沒得到徹底的鞏固。孔雀王朝持續僅136年，這種幅員遼闊的政治體再也沒有在本土政權下重現，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國出現。

差別的第二領域涉及宗教。中國設立了專業祭司，主持向國王和皇帝賦予合法性的禮儀，但其國家宗教從沒超越祖先崇拜的層次。祭司主持對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沒有自己的司法權。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時，或朝代之間沒有合法統治者時，沒有作為機構的祭司來宣布誰享有天命。這種合法性可由任何人賦予，從農民、軍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則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國那樣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即“吠陀本集”創作時，它發展成精細的形而上學系統，以無形超然的世界來解釋塵世的全部現象。新興的婆羅門宗教，把重點從個人的祖先和后裔轉到包羅萬象的宇宙系統。為這超然世界把關的就是婆羅門階層，其權威是很重要的。他們在未來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國王的血統，而且是最低級農民的福祉。

在婆羅門教的影響下，分別是雅利安人和達薩人的兩大瓦爾納，進化成四大瓦爾納：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處于頂端的是祭司階層，他們創作了構成“吠陀本集”的儀式祈禱。隨著宗教的發展，歷代的婆羅門默記這些祈禱。這禮儀咒語的倒背如流成為他們的專業，與其他瓦爾納爭奪社會地位時，又變成其優勢。法律就從這些儀式中脫穎而出，起初只是慣例，口口相傳，最終寫入法律書籍，像英國人所稱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傳統中，法律并不來自政治權力，這不像中國；它的源泉既獨立于統治者，又比統治者更為崇高。事實上，《摩奴法典》講得很清楚，國王之存在是為了保護瓦爾納制度，不可顛倒過來。[[24]](#m24_6)

如果我們把中國案例當作政治發展的標準直線，印度社會大約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條大彎路。印度沒有經歷漫長的戰爭，以開發現代非人格化的集權國家。[[25]](#m25_6)權力沒有集中于國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階層和武士階層之間平分。他們相互依賴，以求生存。印度雖然沒在當時開發出像中國一樣的現代國家，但創造了限制國家權力和權威的法治雛形，中國則沒有。很明顯，印度始終不能以中國方式集中權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們將對此作更仔細的審視。

## 第11章 瓦爾納和迦提

經濟與宗教，作為社會變化的源頭；印度的社會生活因宗教而變得包羅萬象；印度宗教對政治權力的啟示

作為社會變化的源頭，經濟利益與思想到底誰占鰲頭？這是社會理論家最古老的爭辯之一。從卡爾·馬克思到持現代理性選擇理論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物質利益享有優先權。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大眾的“麻醉劑”，這個神話是精英編出的，為了辯護其對社會他人的掌控。很多現代經濟學家不像馬克思那么尖刻，但仍認為他們的功利最大化的理性架構（rational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足以解釋幾乎所有的社會行為。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Gary Becker）曾表示，不同意者只是研究得不夠認真。[[1]](#m1_11)思想被認為是外在因素，也就是說，為了解釋物質利益，它只是在事后建立的，并不是社會行為的獨立原因。

站在該論點對面的是一批現代社會學創始人，包括韋伯和涂爾干。他們認為，宗教和宗教觀念是主要因素，既是人類行動的動力，又是社會身份的來源。韋伯堅持，在現代經濟學家所運作的架構中，個人是主要決策者，物質利益是主要動機；但最終，這架構本身又是新教改革的觀念的產品。寫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后，韋伯繼續寫出有關中國、印度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著作。它們顯示，要理解經濟生活是如何組織的，宗教觀念不可或缺。

如果要舉馬克思一方的例子，即宗教在為少數精英掌控他人作辯護，一定不會選普世平等的基督教或伊斯蘭教，而要選公元前最后兩個千年出現在印度的婆羅門教。根據《梨俱吠陀》：

眾神奉獻犧牲時，以普魯沙（Man）為祭品……

他們分解普魯沙時，將他分成多少塊？

他的嘴和雙臂叫什么？雙腿和兩足又叫什么？

婆羅門是他的嘴，他的雙臂成為武士。

他的雙腿成為吠舍，從兩足生出首陀羅……

眾神作完奉獻，這是神圣法律之首。

這些大力神飛天，那里住有永久神靈。[[2]](#m2_11)

婆羅門不僅將自己安置在這四大社會階層的頂端，而且授予自己對祈禱和圣歌的永久壟斷。那些祈禱和圣歌在賦予合法性的各種儀式中不可或缺，從最高級的國王授權，到最低級的婚禮或葬禮。

以純唯物主義來解釋印度社會中的宗教功能，難以讓人滿意。首先，它無法解釋神話中的實際內容。如我們所見，在過渡到國家的前夕，中國社會和印度社會有很多結構上的相似。中國精英，像每個已知社會的精英，也利用賦予合法性的儀式來提升自己的權力。但中國人想象不出一個像印度那樣的既深刻又復雜的形而上學系統。事實上，即使沒有超然宗教的幫助，他們仍能有效奪取和保有權力。

此外，在印度占居首位的不是擁有強制和經濟權力的精英，反而是僅有儀式權力的精英。即使有人相信物質原因是最重要的，他仍要回答這一疑問：為什么剎帝利和吠舍——武士和商人——甘愿臣服于婆羅門，不僅向后者提供土地和經濟資源，而且讓后者控制自己個人生活的隱私。

最終，就印度社會而言，不管是經濟解釋，還是唯物主義解釋，都必須解釋該制度為何經久不衰。公元前600年，婆羅門教適合精英小團體的利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并不適合印度社會中其他階層和團體的利益。為何沒有反精英運動的興起，宣揚新的宗教思想，以提倡普世平等？在某種意義上，佛教和耆那教就是抗議宗教。兩者繼承了很多婆羅門教的形而上學假設，但在次大陸卻得不到廣泛接納。對婆羅門教霸權的最大挑戰，卻是外國入侵者憑借武力進口的——莫臥兒帝國帶來了伊斯蘭教，英國人帶來了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必須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為和變化的動力，不可視之為宏大經濟力量的副產品。

###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就現代經濟的需求而言，很難想象還有另外一個社會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羅門教迦提制度。現代勞工市場理論要求，每個人通過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資，自由地與人簽約來出售自己的服務，從而“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話。信息流通的靈活勞工市場，能夠導致個人處境的最大改善和資源的優化分配。相比之下，根據迦提制度，個人天生只能從事有限行業。他們必須繼承父業，必須與同一迦提團體的成員通婚。投資教育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個人永遠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會升遷只適用社區總體，不適用個人。所以，迦提的團體可決定搬往新區，或開發新的商機，但不允許個人創業。該制度對社會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礙，對某些婆羅門來說，光是看見賤民就需要一個冗長的凈化儀式。

從現代經濟觀點看，這很不合理；對接受婆羅門教根本前提的人來說，這又完全合理。整個社會制度，包括種姓制度中最細微的規則，作為宏觀形而上學系統的邏輯結論，卻是非常完美的。現代評論家經常試圖以實用或經濟功利來解釋印度的社會規則，例如，禁食奶牛剛開始只是衛生措施，為了避開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爾人一樣吃奶牛的事實，這種解釋無法看透主觀上體驗到的社會凝聚，反而折射了評論家自己的世俗偏見。

韋伯認識到婆羅門教理后面的高度合理性——自然神學（theodicy），或上帝的理由，他稱之為“天才的手筆”。[[3]](#m3_11)去印度修道院研讀的西方皈依者，往往能體會到這一天才，其始于否認現實的現象世界。下面是皈依者自己的話語：

所有印度宗教系統，其終級目的是為了超越生命（moksha）。它們都假設，感知的存在是對現實（maya）的誤解，僅是外表，躲在背后的才是終級存在的梵（brahman）。它無形無體，正因為無形無體，所以永恒。它是唯一的現實。我們所感覺的，我們因自己的物質存在而有所依戀的，都是稍縱即逝的（都會凋零和死亡），所以是虛無縹緲的（maya）。不像有些解說者所宣稱的，存在的“目的”實際上不是“獲得”對梵的認同，而是排除萬難去體會，個人內心（atman）中真實永久的東西就是梵。[[4]](#m4_11)

凡人的生存涉及物質的生物生存，其對立面，就是超越此時此地的無形無體的真正存在。早期婆羅門認為，“與分娩有關的流血、與疾病和暴力有關的痛苦和變形、與人體排泄物有關的污濁惡臭、與死亡有關的衰敗腐爛”，都會牽涉凡人生命，都需要得到超度。這就是為什么婆羅門在社會等級制度中授予自己特權地位：“污染物質滲透了凡人的生存，在現世和漫長的上升輪回（samsara）中，需要婆羅門主持的儀式來予以控制和削減，這是獲得解脫（moksha）的必要途徑。”[[5]](#m5_11)

迦提制度源于業力（karma），即個人在現世所做的一切。職業的地位有高有低，取決于它們離污染源有多遠——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敗的有機物。皮革匠、屠夫、理發匠、清掃夫、收生婆，以及處理動物尸體或死人的行業，被認為是最不潔凈的。相比之下，婆羅門是最完美的，因為遇上血液、死亡、泥土時，他們可依賴他人的服務。這解釋了婆羅門的素食主義，因為吃肉就好比吃尸體。[[6]](#m6_11)

社會升遷在現世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指望來世。業力只在代代相傳時才有變更，因此，個人一生都陷于自己的業力。在迦提等級制度中，個人到底獲得升級還是降級，則取決于自己是否履行了所屬迦提的法（dharma），即良好行為的準則。未能遵守準則的，將在來世等級制度中降級，從而更加遠離真正的存在。婆羅門教將神圣化賦予現有的社會秩序，履行現存迦提的法變成了宗教責任。

瓦爾納秩序發展自同樣的形而上學前提。前三級瓦爾納——婆羅門、剎帝利、吠舍——被認為是“兩次投胎”，所以獲得允許，進入儀式地位。包含大多數人口的首陀羅是“一次投胎”，只能希望在來世獲得儀式地位。歷史上不是很清楚，印度社會離開部落組織時，瓦爾納和迦提的出現誰早誰晚。可能是宗族進化為迦提，它們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都有精細的親戚關系規則。但也有可能是先進化為瓦爾納，再為隨后出現的迦提設置架構。[[7]](#m7_10)

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迦提制度，創造了頗不尋常的組合，既有分支式的隔離，同時又有社會中的相互依賴。每個迦提成為世襲地位，以調整現存的宗族系統。迦提設置了氏族的異姓通婚的外限，在眾多分支式單位中，又傾向于成為自給自足的社區。另一方面，每種職業又是更大分工的一部分，所以需要相互依賴，從高級祭司到葬禮工。[[8]](#m8_10)法國人類學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引用布蘭特（編按：E. A. H. Blunt，1877—1941，英屬印度殖民地官員）的資料：

理發匠聯合抵制曾拒絕為他們婚禮跳舞的舞女。

在格拉克珀（Gorakhpur），一名地主試圖中斷皮革匠的生意。他相信他們在毒死自己的牛群（經常有如此的懷疑），便命令他的租戶將無緣無故死去的牛的皮革故意割碎。皮革匠奮起反抗，命令他們的女人停止收生婆的服務。地主只好讓步。

在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又譯阿默達巴德，位于古吉拉特邦），一名正在重蓋屋頂的錢莊老板與糖果店主發生爭執，糖果店主說服瓦片制造商，拒絕為錢莊老板提供瓦片。[[9]](#m9_10)

這不單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因為每個執行自己功能的迦提，對其他迦提都具有儀式上的重要意義。

###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瓦爾納制度對政治有巨大影響，它要求武士的剎帝利服從婆羅門。[[10]](#m10_10)根據哈羅德·古爾德（Harold Gould），“婆羅門和剎帝利之間……有共生的相互依賴。王室權力需要連續獲得祭司（即儀式）權力所賦予的神圣化，以維持神圣的合法性”。[[11]](#m11_10)每位統治者需要與宮廷祭司（purohita）建立私人關系，他作為世俗領袖所采取的每一次行動，都要得到宮廷祭司所賦予的神圣化。

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力在理論上的分離，何以在實踐中對后者設限，初看上去不很清楚。婆羅門教的等級制度，沒有像天主教那樣組成正式的中央權威機構。它有點像巨大的社會網絡，單獨的婆羅門互相交流和合作，但并不行使制度化的權威。單獨婆羅門擁有土地，但作為制度的祭司階層，不像歐洲教會，卻沒有自己的領地和資源。婆羅門肯定不能像中世紀的教皇，召集統領自己的軍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076年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革出教門，并迫使后者赤腳來卡諾莎（Canossa）請求赦免，這在印度歷史中絕對找不出可媲美的案例。世俗統治者需要宮廷祭司來祝福自己的政治計劃，在收買后者一事上，好像總能如愿以償。印度宗教和社會的制度等級分明，各有分支，但它們如何使政治集權難以實現，我們還需尋找其他原委。

瓦爾納和迦提的制度限制了軍事組織的發展，這個影響很明顯。武士的剎帝利是瓦爾納制度四大階層之一，自動限制了印度社會軍事動員的潛力。像匈奴、匈人、蒙古人的武裝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強大，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動員幾近100%的健壯男子。就必不可少的技能或組織而言，武裝掠奪和游牧漂泊沒有什么兩樣。仍是游牧民族時，印度—雅利安人曾經也很強大，但現已定居下來，建立了瓦爾納社會。武士地位成為少數貴族精英的專業，如想加入，不但講究訓練和出身，還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

在實踐中，該制度并沒有始終限制他人的加入。很多印度統治者出生于剎帝利階層，但也有不少來自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新統治者奪取政治權力后，傾向于在事后獲得剎帝利地位。以這種方式成為剎帝利，比成為婆羅門更為容易。[[12]](#m12_10)瓦爾納四個階層都參與戰爭，婆羅門中有級別很高的軍事將領，首陀羅傾向于充當輔助部隊。就從屬關系而言，軍隊的等級制度就是社會等級制度的拷貝。[[13]](#m13_10)不像秦國和其他后期東周列國，印度政治體從未能動員大部分的農民。[[14]](#m14_10)考慮到儀式上對血液和尸體的厭惡，很難想象，受傷軍人能從高貴戰友手中獲得很多救助。在采用新興軍事技術方面，如此保守的社會顯然是遲疑不決的。他們在基督時代之后才放棄戰車，比中國人晚了好多世紀；大象繼續用于戰爭，盡管其效用早已被人懷疑。印度軍隊從沒開發有效的射箭騎兵，以致慘敗于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人和12世紀的穆斯林。[[15]](#m15_10)

從社會上層一直到底層，印度社會以迦提為基礎形成眾多緊密結合的小集團，其組織動力正是由婆羅門教提供的。這是限制政治權力的第二條途徑。這些集團自我管理，不需要國家幫忙組織。事實上，它們抵抗國家的滲透和控制，政治學家喬爾·米格代爾（Joel Migdal）稱之為軟弱國家和強勢社會。[[16]](#m16_10)這種情形維持至今，種姓制度和村民組織仍是印度社會的支柱。

19世紀的西方評論家，包括卡爾·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會自我組織的特征。馬克思宣稱國王擁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莊在經濟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為基礎（這種解釋有點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調整、一成不變的村莊社區，這種看法在維多利亞的英國非常流行。19世紀早期，英國行政官員把印度村莊當作能幸存于帝國毀滅的“小小共和國”。[[17]](#m17_10)

20世紀的印度民族主義者，部分原因是依據上述解釋，想象出一幅本土村莊民主的田園畫像，即潘查亞特制度（panchayat）。他們聲稱，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頭，直到被英國殖民者破壞。現代印度憲法的第40條，詳細解釋了復原的潘查亞特機構，旨在促進地方民主，曾在1989年獲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別關注。其時，政府正試圖在印度聯邦制中推動權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統治，不像后來評論家和民族主義者所宣稱的，實際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種姓制度的。每座村莊傾向于有個強勢種姓，也就是說，其人數和擁有的土地都超過其他種姓，而潘查亞特制度僅僅是該強勢種姓的傳統領導組織。[[18]](#m18_9)

單獨村莊自有地方的統治機構，不需要國家從外部提供服務。潘查亞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據慣例來裁決迦提成員之間的爭論。村莊中的產權不是共有的，這有悖于馬克思的想象。像其他分支世系社會，財產為復雜的親戚團體所擁有，單獨家庭在處理土地時要面臨很多責任和限制。這意味著，國王雖是名義上的主權君主，卻沒有真正“擁有”村莊土地。我們將在后續章節看到，在征稅和征地時，印度政治統治者的權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業活動也依據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從9世紀到14世紀，印度南部的貿易大多由像阿育爾（Ayyvole）那樣的商人行會控制。它們派出的代表滿布次大陸，與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長期控制印度洋、東非、阿拉伯半島南部、東南亞的貿易。艾哈邁達巴德商人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職業團體的成員。[[19]](#m19_8)在中國，貿易網絡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樣組織良好。中國宗族的司法權，往往局限于家法、遺產和其他家庭瑣事（尤其在強大政府時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會的行政管理，還發揮公開的政治功能。根據薩提希·薩貝瓦爾（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會動員的各式場合：進攻性的，則爭取掌控權和統治權……防御性的，則抵制國家和帝國入侵迦提領域……破壞性的，則任職于更大政治體，運用其權力和高位來謀取私人利益”。[[20]](#m20_7)迦提還為成員提供地理和社會上的升遷。例如，泰米爾（Tamil）紡織種姓的凱寇拉（Kaikolar），在朱羅王朝（Chola）時期改行，變成商人和軍人；19世紀后期，錫克人的木匠和鐵匠離開家鄉的旁遮普，遷往阿薩姆邦（印度的Assam）和肯尼亞（非洲的Kenya）。[[21]](#m21_7)這些決定由眾多家庭集體作出，以便在新環境中相互依賴、相互支持。在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擴充地域方面尤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權力的第三條途徑是婆羅門教社會制度對文化的控制，這一習俗延續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貧窮和絕望。現代印度處于某種吊詭狀態。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眾多領域的世界頂峰，從信息技術、醫藥、娛樂到經濟。境外印度人始終享受較多的社會升遷機會，這一事實多年前便引起小說家奈保爾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22]](#m22_7)經濟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出現，境內印度人也開始興旺起來。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數，國內文盲和貧窮的程度高得驚人。快速增長的城市，如班加羅爾（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廣闊的鄉村內地，那里的人類發展指數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層。[[23]](#m23_7)

這些差距的歷史根源最終還歸罪于瓦爾納和迦提的制度。作為儀式監護人，婆羅門當然掌控學習和知識。一直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末期，他們堅決反對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諸文字。根據薩貝瓦爾，“為儀式上的使用而默記圣歌——既為自己，又為主顧——是婆羅門最獨特的學習方式。儀式上和學習過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誦的東西……很多婆羅門獻身于浩瀚的默記、邏輯分析、辯論”。[[24]](#m24_7)為達到所需求的儀式效果，精確默記“吠陀本集”是必須的。據說，朗誦中的小錯將導致災難。

也許并非偶然，婆羅門堅持口頭傳誦“吠陀本集”，設置加入婆羅門的額外障礙，更加強自己的至高無上。猶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從他們宗教傳統的一開始就是“圣書上的民族”，婆羅門卻頑強抵抗文字和有關的書寫技術。5世紀和7世紀，中國取經人來印度尋求佛教傳統的文獻，竟找不到書面文本。中國人和歐洲人改用羊皮紙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櫚樹葉和樹皮。討厭耐用的羊皮紙有宗教起源，因為它來自動物的皮膚。11世紀造紙技術來到時，婆羅門仍然遲遲不用。[[25]](#m25_7)在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鄉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紙張使用一直要等到17世紀中期。一出現，它們就大大改善了記賬和監管的效率。[[26]](#m26_6)

公元1000年之后，書寫才變得普遍，自婆羅門擴散到印度社會其他群體。商人開始制作商業記錄，迦提開始記載家庭譜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貴族血統”的那雅人開始學習書面梵語，該邦的統治階級開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業的記錄。（20世紀晚期，當地共產黨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為印度治績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懷疑，這樣的治績是否植根于數世紀前的文化傳統。）

與中國相比，婆羅門壟斷知識，抵制書寫，嚴重影響了現代國家的發展。從商朝以來，中國統治者一直使用文字傳遞命令、記錄法律、保管賬目、書寫詳盡的政治歷史。在中國，對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識字、攻讀漫長復雜的文學傳統；對行政官員的訓練，依現代標準看仍屬有限，但仍涉及反復分析書本、以史為鑒。漢朝以來，科舉制度獲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對文學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階層。雖然在實際情形中，普通老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機遇非常有限，但中國人都知道，教育是社會升遷的重要途徑。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區在兒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舉制度。

如此情形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統治者自己是文盲，依靠同樣無知的家族官員來維持治理。文化是婆羅門階層的特權，他們維持對知識和儀式的壟斷來保障自身利益。跟軍隊的情形一樣，瓦爾納和迦提的等級制度阻止了大多數人獲得教育和文化，從而減少了可為國家所用的稱職人才。

在印度發展歷史中，宗教影響政治權力的最后途徑是建立了所謂法治的基礎。法治的本質是一組反映社會正義感的規則，比國王的意愿更為崇高。這就是印度的情形，各種法典中的法律不是國王創建的，而是婆羅門依據儀式知識所制定的。這些法律講得很清楚，瓦爾納不是為國王服務的，更確切地說，國王只有變成瓦爾納的保護人，方可獲得合法性。[[27]](#m27_6)如果國王觸犯了神圣法律，史詩《摩訶婆羅多》公開認可反抗，宣稱此人已不再是國王，而是一條瘋狗。在《摩奴法典》中，主權在法律，而不在國王：“在本質上，法律（danda）即是國王，享有權力，維持秩序，發揮領導作用。”（《摩奴法典》第7章第17節）[[28]](#m28_5)

不少古典文獻敘述有關梵那（Vena）國王的警世故事，他禁止除了給自己的所有其他祭品，還推行種姓之間的通婚。結果，神圣的眾神向他發起攻擊，以奇跡般化成矛的青草葉，將他殺死。很多印度朝代，包括難陀王朝（Nanda）、孔雀王朝、巽伽王朝（Sunga），都因婆羅門的陰謀而變弱。[[29]](#m29_5)當然，就像中世紀的天主教，很難弄清婆羅門是在捍衛神圣法律，還是在保護自己利益。像歐洲而非中國，印度的權威是分裂的，對政治權力造成了頗具意義的制衡。

印度的社會制度源于宗教，大大限制了國家的集權能力。統治者不能動員大批人口以建立強大軍隊；不能滲透存在于每座村莊的自治且嚴密組織的迦提；自己和部下缺乏教育和文化；還要面對維護規范化秩序的嚴密的祭司階層；自己在這一秩序中僅扮演從屬角色。就上述的方方面面而言，印度統治者的處境非常不同于中國。

## 第12章 印度政體的弱點

孔雀王朝何以成為印度第一個且最成功的本土統治者；孔雀王朝治下的國家性質；阿育王的性格；式微、分裂、笈多王朝的復興；印度為何被外國所征服

一開始，印度的社會發展就壓倒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次大陸獲得一種以宗教信仰和社會實踐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嘗試取得政治統一之前，就被標為與眾不同的文明。統一過程中，社會力量足以抵制政治權力，阻止后者對社會的改造。中國發展了強大國家，其社會因此而處于孱弱地位，并自我延續。印度有個強大社會，先發制人，反而阻止了強大國家的興起。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初的印度次大陸，成千上萬的小國和酋邦，自部落社會脫穎而出。其中三個王國——迦尸（Kashi）、拘薩羅（Kosala）、摩揭陀——和酋邦（或伽那—僧伽）的弗栗恃（Vrijji），成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逐鹿者。摩揭陀（其核心地區在現代的比哈爾邦[Bihar]）注定要扮演秦國角色，統一印度次大陸的大部。公元前6世紀的下半世紀，頻毗娑羅王（Bimbisara）登基，憑借一系列戰略性的婚姻和征服，使摩揭陀成為印度東部的主要國家。摩揭陀開始征收土地稅和收成稅，以代替國家形成之前低級血統的自愿進貢，由此而招聘征稅人員。稅率據說是農業產品的六分之一，如果屬實，這在早期農業社會是相當高的。[[1]](#m1_12)國王并不擁有國內所有土地，只享有荒地，其時人口稀少，應該是相當廣袤的。

兒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謀殺頻毗娑羅，兼并西部的拘薩羅和迦尸，并與弗栗恃展開持久斗爭。后來，他在伽那—僧伽領袖中挑撥離間，終獲大勝。他死于公元前461年，其時，摩揭陀已遷都至華氏城（Pataliputra），控制了恒河三角洲和恒河下游的大部。統治權傳給一系列國王，包括出身首陀羅的短命的難陀王朝（Nanda）。亞歷山大大帝曾遭遇難陀軍隊，由于軍隊嘩變，而不得不轉向旁遮普。希臘的資料稱，難陀軍隊有兩萬騎兵、二十萬步兵、一千輛戰車、三千頭大象。這些數字肯定是夸大的，以證明希臘人的退卻是正確戰略。[[2]](#m2_12)

繼承難陀王朝的是旃陀羅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又稱月護王）。他極力擴充領土，在公元前321年建立了印度次大陸第一個本土政治體——孔雀帝國。他是婆羅門學者兼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的門生，后者的《政事論》（Arthasastra）被視作是印度經世王道的經典論文。月護王率軍攻擊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征服西北部，并將旁遮普、阿富汗東部、俾路支地區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圖。至此，他的帝國西到波斯，東到阿薩姆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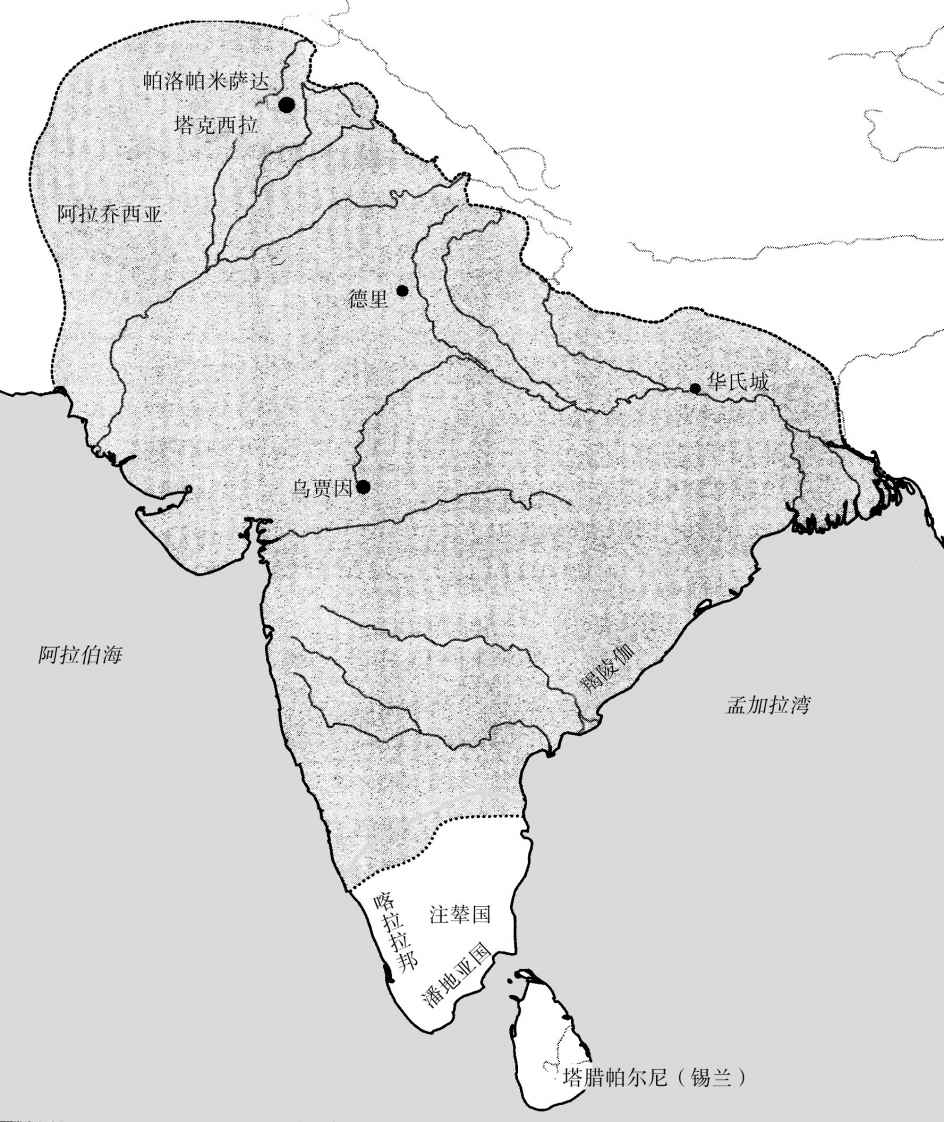
對印度南方達羅毗荼人的征服，則留給了月護王的兒子賓頭娑羅（Bindusara）和孫子阿育王（Ashoka）。賓頭娑羅將帝國擴展到南方德干高原的卡納塔克（Karnataka）。經過一場眾所周知的持久的血腥征戰，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占領東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包含現代奧里薩邦[Orissa]和部分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其時，印度缺乏文學文化，阿育王的功績從未見于史書，像中國的《尚書》和《春秋》。后代印度人一直要等到1915年，方才把他視作偉大的國王；其時，大批法令巖石的古文字獲得譯解，考古學家終于拼搭出他治下的帝國疆域。[[3]](#m3_12)

孔雀王朝歷經三代而建起的帝國，占據了喜馬拉雅山脈以南的整個印度北方，西至波斯，東至阿薩姆，南至卡納塔克。印度次大陸上，唯一沒被統一的是南方邊緣地帶，分別是現代的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斯里蘭卡。沒有單獨的印度本土政權再一次統治這么遼闊的領土。[[4]](#m4_12)莫臥兒帝國所征服的德里蘇丹國要小得多，英國人在次大陸的帝國更大，但不得不問：說阿育王、阿克巴（Akhbar）、英國總督統治印度，這到底意味著什么？

### 孔雀帝國：何等國家？

歷史學家在古印度國家的性質上爭論不休。[[5]](#m5_12)如果從比較眼光看，特別是對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國，我們也許能看得更加清楚。這兩個帝國幾乎在同時形成（公元前3世紀的中到晚期），但它們政體的性質可說相差十萬八千里。

兩個帝國都環繞一個核心而組成，分別為摩揭陀國和秦國。秦國是個真正的國家，具有馬克斯·韋伯所界定的現代國家政府的許多特征。管理國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數世紀的戰爭中戰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憑借非人格化基礎而獲選的新人。秦國廢除井田制，推翻傳統的產權，以統一的郡縣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終打敗對手，建立大一統帝國，便將這中央集權政府推向全中國。推廣至被征服國家的，還有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我們已在第8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會工程最終還是歸于失敗，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家族統治在西漢卷土重來。但漢朝統治者堅持中央集權，逐漸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國，而是統一的中央國家。



阿育王的帝國

此類事項在孔雀帝國發生得很少，核心國的摩揭陀好像沒有任何現代特征。與秦國相比，我們對其行政管理的性質了解得實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種姓制度的嚴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講明，高級官位的主要資格應是高尚出身，其“父親和爺爺”必須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們幾乎全是婆羅門。官僚的薪俸非常懸殊，最低與最高之間的比率是1∶4 800。[[6]](#m6_12)沒有證據顯示，官府用人是選賢與能的，或前三級瓦爾納之外的人也可申請公職。這些事實曾得到希臘旅行家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確認。[[7]](#m7_11)將摩揭陀推上戰勝國地位的戰爭沒有那么持久和殘忍，不像秦國所經歷的那樣。舊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處境從沒惡化到非要動員男子總人口的地步。據我們所知，孔雀王朝沒有統一度量衡，也沒有在管轄地區統一語言。事實上，遲至公元16世紀，印度國家仍在努力推行統一標準，其最終實行是在英國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將近整整兩千年。[[8]](#m8_11)

通過聯姻和征服獲得的地區，其與摩揭陀的關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國。秦國滅絕他國，往往是消滅或放逐整個統治宗族，并鯨吞其領土。東周時期，中國精英宗族的數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國的建立則較為溫和，涉及大量傷亡和焦土戰術的唯一戰役是對羯陵伽的攻占，給戰勝者阿育王帶來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現有統治者吃了敗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國在名義上的主權。《政事論》建議，孱弱的國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強大鄰國進貢。沒有出現中國或歐洲式的“封建主義”，即剝奪現有統治者，把領土賞賜給王室成員或侍從。印度歷史學家有時談到屬臣國（vassal），但它沒有歐洲屬臣的契約意義。[[9]](#m9_11)說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權力是不準確的，因為它一開始就沒有中央集權。孔雀王朝也沒有設法將其國家制度，自核心國推向帝國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沒有試圖建立永久且專業的行政制度。這意味著，每位新國王帶來新的忠誠侍從，替換現有的行政官員。[[10]](#m10_11)

孔雀帝國在它管轄區域內，僅行使松弛的統治；它稱霸的整段時期，部落聯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終存活，就是明證。與等級分明的王國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決策涉及較多的參與和共識，但它仍是基于親戚關系的幸存的部落政體。印度歷史學家有時稱之為“共和國”，這只是在為它涂上現代光彩。[[11]](#m11_11)

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詳盡討論了財政政策和征稅，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議究竟有多少被付諸實踐。與“東方專制主義”的信徒相悖，國王并不“擁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盤，另外宣稱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現存產權提出挑戰。不過，國家堅持向各式地主征稅的權利，繳稅可依據個人、土地、收成、村莊、邊界的小統治者，基本上以實物或勞役的形式。[[12]](#m12_11)似乎沒有一名印度統治者嘗試大型變革，像商鞅的廢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敗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他的帝國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國（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賈斯坦（Rajasthan）重又興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納塔克和其他領土紛紛脫離，返回獨立王國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國，其末代國王波羅訶德羅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185年遇害。還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統一印度，其規模可與孔雀帝國媲美。次大陸的孔雀帝國僅維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續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終止導致帝國分崩離析，分割成數百個政治體，很多尚處于國家之前的層次。

孔雀帝國的統治如此短暫，至少從外表上看，它對下轄區域從沒實施強有力的控制。事實上，這不是牽強附會。孔雀王朝從沒建立強大的國家制度，也從沒自家族政府過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個帝國維持廣泛的間諜網，但沒有證據顯示，它像中國一樣建造道路或運河，以促進交通。很不尋常，除了首都華氏城，孔雀王朝沒在任何地方留下有關它強盛國力的紀念物。后代沒把阿育王當作帝國創建者，這也許是原因之一。[[13]](#m13_11)

孔雀王朝的統治者從沒想到國家建設，也就是說，沒有嘗試以一套新穎的共同規范和價值穿透整個社會。孔雀王朝沒有真正的主權概念，即在全國范圍實施非人格化統治的權利。次大陸沒有統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國統治下詩人兼政治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14]](#m14_11)國王沒有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反而保護現存的各式社會秩序。

印度從沒開發出像中國法家一樣的思想，即政治目標就是赤裸裸地集權。《政事論》之類的論述，可向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議，但只針對價值觀和社會結構，與政治無關。此外，婆羅門教的精神孵育了非軍事思想。非暴力主義（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認為殺生對業力造成負面影響。它的有些文本批評吃肉和動物祭品，但另一些卻予以批準。如我們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議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國王旃陀羅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為了遂愿當一名苦行者，而自動讓位給兒子賓頭娑羅。他與一批僧侶搬到印度南方，據說，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餓死。[[15]](#m15_11)他的孫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統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戰中的傷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據傳十五萬羯陵伽人被殺或受逐。根據他的巖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開始了對宗教法律的熱誠追求”。他還宣布，“曾遭殺戮和俘虜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樣厄運，也會是陛下的遺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還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須忍耐”。阿育王繼續敦促仍在帝國邊境的外人，“不用怕他，應信任他，應從他那里獲得幸福，而不是悲傷”。他還呼吁他的兒子和孫子避免進一步征戰。[[16]](#m16_11)帝國擴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從他的意愿，還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們治下的帝國冰消瓦解。有人會問，如果印度開發了像中國法家一樣的權力原則，而不是婆羅門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國會變成怎樣——如果真是這樣，它就不是印度了。

### 社會戰勝政治

孔雀帝國崩潰后，印度經歷了政治衰敗，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體在西部的拉賈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現。該地區又受到來自中亞部落的侵略者的騷擾，部分原因是中華帝國的政治發展太具優勢。秦朝開始建設長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亞，取代當地一系列部落。這一連鎖反應又導致斯基臺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對印度北部的侵犯，緊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現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貴霜帝國（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國中，沒有一個組織良好，可以考慮像長城那樣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為這些部落所占。[[17]](#m17_11)

在遙遠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發展成王國，例如公元前1世紀統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這個政治體持續不長，沒有發展出強大的中央機構，尚比不上孔雀王朝。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與其他小王國發生沖突。此外，小王國之間也在爭斗，如注輦國（Cholas）、潘地亞國（Pandyas）、薩提亞普特拉國（Satiyaputras）。這段歷史相當復雜，難以融入政治發展的大敘述，也就缺乏啟發功能，從中呈現出來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敗。南方國家經常無法發揮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稅，因為其治下的社區既強大，又組織嚴密。[[18]](#m18_10)沒有一國得以在永久基礎上擴展疆域，實現霸權，也沒開發更為復雜的行政機構，以實施更為有效的統治。這個地區的政治分裂狀態還要持續一千多年。[[19]](#m19_9)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創建大型帝國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羅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320年，他在摩揭陀國當政，其權力基礎與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兒子沙摩陀羅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統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羅笈多在拉賈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區，兼并了眾多伽那—僧伽，這種政治機構因此而壽終正寢。他還征服克什米爾，逼迫貴霜帝國和塞克國進貢。在他兒子旃陀羅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變得繁榮，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廟宇。笈多王朝再持續兩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國王（Skanda Gupta）死于5世紀的下半葉。其時，西北部的酋邦變得衰弱，中亞新興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或Huna）趁虛而入。笈多帝國在這場戰爭中耗盡自身，在515年將克什米爾、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輸給匈人。[[20]](#m20_8)

姑且不論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沒在國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沒有試圖把征服的政治體整合成統一的行政機構。被打敗的統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來繼續執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繳貢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農業收成稅，擁有關鍵的生產資料，像鹽場和礦山，但沒有干預現存的社會安排。笈多帝國的疆土更小，因為沒能統一印度南方。它持續了將近兩百年，最后分裂為相互競爭的眾多小國，從而進入政治衰敗的新時期。

### 外國人的國家建設

10世紀后，印度的政治歷史不再是本土發展史，而是一連串外國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國人。從今以后，政治發展成為外國人如何將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們僅取得部分成功。每個外國入侵者必須對付這同一的“小王國”社會，四分五裂，卻又組織緊密；它們不團結，所以很容易征服；它們屈服后，又很難統治。外國入侵者留下了一層層新制度和新價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風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沒觸碰內在社會秩序的一根毫毛。

10世紀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蘭教在7世紀涌現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從部落過渡到國家層次，在很多方面開發了比印度本土政體更為精細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軍事奴隸制和外國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將在后續章節中討論），允許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親戚關系，實施選賢與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來自阿富汗，最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隊（Rajputs）。印度國家的軍隊竭力抵抗，但實在太薄弱、太分散。13世紀早期，馬穆魯克（Mamluk）朝代的顧特布-烏德-丁·艾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蘇丹國。

德里蘇丹國維持三百二十年，長過任何一個本土印度帝國。雖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國家權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會。跟笈多王朝一樣，它也沒能向印度南方推進太多。用蘇迪普塔·卡維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話說，“伊斯蘭政治統治者，在社會習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對自己權力的限制，這與印度本土統治者非常相像……伊斯蘭國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國家，既有局限，又游離于社會之外”。[[21]](#m21_8)今天，穆斯林統治的遺產體現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兩個國家，還有印度一億五千多萬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遺產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達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類的實踐。

英國統治則不同，其影響既持久又深遠。在很多方面，現代印度是外國人建國計劃的產物。卡維拉吉認為，與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敘述相悖，“英國人沒有征服一個既存的印度。更確切地說，他們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獨立王國。在他們的統治時期，這些獨立王國又聚合成政治層次的印度，也算是對英國統治的答復”。[[22]](#m22_8)這呼應了蘇尼爾·基爾納尼（Sunil Khilnani）的見解，與社會層次相對，政治層次的“印度”在英國統治之前是不存在的。[[23]](#m23_8)將印度凝成政治體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機構、軍隊、共同的行政語言（英語）、實施統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與英國殖民政府互動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價值融入印度歷史經驗之后的產物。

另一方面，就社會層次的印度而言，英國的影響又很有限。英國人修改了他們發現的可惡社會習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進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觀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種姓制度的哲學前提，鼓勵對社會平等的追求。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印度精英，在20世紀爭取獨立的斗爭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種姓制度本身、自給自足的村莊社區、高度地方化的社會秩序，基本上完整無缺，遠離殖民政府的權力。

### 中國和印度

21世紀初，中國和印度作為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其前景引起極大的討論。[[24]](#m24_8)討論的大部分圍繞它們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質。作為威權國家，中國在推動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為成功，像高速公路、機場、發電廠、大型水電項目。它的三峽大壩需要在漫水區遷走百萬以上的居民。中國的人均儲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壩和灌溉工程。[[25]](#m25_8)中國政府一旦決定拆除街區，以建設工廠或公寓大廈，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幾乎沒有途徑保護自身權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個多元的民主政體，各式社會團體都能組織起來，利用政治制度來達到自身的目標。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發電廠或新機場，很可能遭到反對，從環保非政府組織到傳統的種姓協會。很多人認為，這會使決策程序癱瘓，經濟增長的遠景因此而變得暗淡。

這類比較都有問題，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歷史。例如，很多人相信當代印度民主只是歷史發展的副產品，而這歷史發展又是相對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論認為，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一直維持成功的民主，這使很多人感到驚奇。印度絲毫不符合穩定民主“結構上”的前提：它過去非常貧困，從某種角度看，現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種族、語言、階級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眾暴力的狂亂中誕生，隨著不同小團體的相互爭斗，公眾暴力又會定期重現。根據這個見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來品，由殖民政權輸入，并不深植于國家傳統。

這是對當代印度政治相當膚淺的見解。這倒不是說，現代制度所表現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實踐，如阿馬蒂亞·森等評論家所提示的。[[26]](#m26_7)而是說，印度政治發展的歷程顯示，它從來沒有為暴政國家的發展提供社會基礎，以便其有效集中權力來滲透社會和改造基本社會制度。在中國或俄羅斯出現的專制政府，即剝奪全社會（包括精英階層）財產和私人權利的制度，從沒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還是蒙古人和英國人的外來政府。[[27]](#m27_7)因此而引發了如下的吊詭事態：印度有很多對社會不公的抗議，但不像歐洲和中國，大體上從不針對印度的執政當局。更確切地說，它們只是針對婆羅門所控制的社會秩序，經常表現為異端的宗教運動，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現世秩序的形而上學基礎。政治當局被認為離日常生活太遙遠，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國情形則不同。那里，擁有現代制度的強大國家早已產生，可刻意追求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廣泛干預，并在塑造國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當新的社會組合出現并提出挑戰時，國家的早期獨尊給自己帶來優勢。今天，由于經濟發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跡象顯示，中國公民社會正在漸漸成形，但中國的社會參與者始終比印度的更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國家。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國，這一比照在當時很明顯，在今天依然真實。

中國早熟出世的強大國家，始終能夠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務，從建造阻擋游牧入侵者的長城，到興建21世紀的大型水電工程。從長遠看，中國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中國強大的國家從來不受法治的約束，也就無法遏制其統治者的異想天開。它可睹的成績，都以普通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作為代價，而老百姓基本上無力（過去和現在）來抵制國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歷專橫，不是中國特色的政治專橫，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親的專橫”。在印度，個人自由受到諸多限制，如親戚關系、種姓制度、宗教義務、風俗習慣。在某種意義上，印度的表親專橫允許他們對抗暴君的專橫，社會層次的強大組織平衡和抑制了國家層次的強大機構。

中國和印度的經驗表明，強大國家和強大社會同時出現，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這樣才會有較好形式的自由。這個主題，我以后還會回顧。但此時，我將考察浮現于穆斯林世界的國家及其獨特制度，它們允許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體走出部落制。

## 第13章 軍事奴隸制與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奴隸制；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發展的主要障礙；軍事奴隸制最早興起于阿拔斯王朝；部落成員長于征服，卻短于管理；柏拉圖應付家族制的對策

16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正處權力的巔峰，大約每隔四年就會看到一次非同尋常的征召。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到土耳其手中。1526年，奧斯曼帝國軍隊在莫哈奇（Mohács）戰役中征服匈牙利；到1529年，才受挫于維也納城門。在帝國的巴爾干半島省份，官員分頭尋找十二至二十歲的年輕男子，這便是德米舍梅征募制（devshirme）[[1]](#m1_13)，或基督徒壯丁征募制。這些官員像尋找足球明星的探子，在評判年輕人潛在體力和智力方面經驗豐富，要完成首都伊斯坦布爾（Istanbul）規定的配額。官員訪問村莊時，基督教士被要求提供所有獲洗禮男童的名單，適齡的被帶來供官員檢驗。多數富有潛力的男孩被強行從父母身邊帶走，編成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小組。他們的名字仔細登記在兩本花名冊中，一本是在家鄉獲選時，另一本是在抵達伊斯坦布爾時，互相對照，以防止父母把孩子贖回。如果兒子們長得特別強壯，父母身邊可能一個也留不住。官員帶著俘虜一起返回伊斯坦布爾，家人將永遠見不到自己孩子。那段時期，這樣帶走的孩子估計為每年三千。[[2]](#m2_13)

他們不是注定在卑微和恥辱中度過一生。恰恰相反，最優秀的10%會在伊斯坦布爾和埃迪爾內（Edirne）的宮殿中長大，受伊斯蘭教世界中最好的培訓，為充任帝國高級官員而作準備。其余的則被撫養成說土耳其語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衛軍。這是精英的步兵部隊，陪伴蘇丹左右，在歐洲和亞洲南征北戰。

服務于宮殿的精英男孩，在宦官的監督下接受兩至八年的訓練。最為杰出的，再被派去托普卡帕宮（Topkapi），以獲取進一步的調教，那是蘇丹在伊斯坦布爾的居所。他們在那里攻讀《古蘭經》，學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音樂、書法、數學，還參與嚴格的體育鍛煉，以及學習馬術、劍術和其他武器，甚至要涉獵繪畫和書籍裝訂。那些進不了宮殿的，則在皇家騎士隊（sipahis of the Porte）中擔任高級職位。[[3]](#m3_13)如果年輕的奴隸軍人證明是強壯能干的，可逐步升級為將軍、維齊爾（vizier，大臣）、外省總督，甚至是蘇丹治下最高級的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在蘇丹皇家軍隊服完役之后，很多軍人會被安置在指定的莊園，靠居民的繳稅而安享晚年。

另有一個平行的女奴制度，不屬于軍事奴隸制度。這些女孩是在奴隸市場從巴爾干半島和南俄羅斯的掠奪者手中買來的。她們將擔任奧斯曼帝國高級官員的妻妾，像男孩一樣，也被養在宮殿，高度制度化的規則督導她們的成長和教育。很多蘇丹是奴隸母親的兒子，像其他君主的母親，她們也可通過兒子施展重要影響。[[4]](#m4_13)

但這些奴隸必須面對一個重要禁忌。他們的職位和莊園不算私人財產，既不可出售，也不能傳予子女。事實上，這些軍人中的多數被迫終生保持單身。也有人與來自基督教省份的女奴組織家庭，但孩子不能繼承父親的地位或職位。不管如何有權有勢，他們永遠是蘇丹的奴隸。蘇丹稍有不滿，就可對他們罰以降級或砍頭。

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奴隸制度是非常奇特的。沒有一名穆斯林可成為合法的奴隸，所以，也就沒有帝國的穆斯林居民追求政府高位。像中國一樣，文武官員都是量才錄用，以固定的程序招聘和提拔最能干的軍人和文官。但又不像中國，這個招聘和提拔只對外國人開放，他們在種族上不同于自己所治理的社會各階層。這些奴隸的軍人和官僚在泡沫中長大，與主人和同僚建立親密紐帶，但與自己所治理的社會卻格格不入。像在封閉階層工作的許多人一樣，他們發展了高度的內部團結，成為一個凝聚的團體。在帝國的晚期，他們變成了王者之王，擅自決定蘇丹的廢黜和任命。

不出意料，面臨此種征召的基督教歐洲人，包括那些住得遙遠只是聽說此事的人，都心懷恐懼。等級分明的奴隸在治理一個強盛的帝國，這一圖像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成了東方專制主義的象征。到了19世紀，奧斯曼帝國已趨式微。不少評論家認為，土耳其禁衛軍是怪誕且過時的制度，在阻擋土耳其帝國的現代化。禁衛軍在1807年罷免塞利姆三世（Selim Ⅲ），在下一年擁戴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登基。后者在后續年份中鞏固自己的地位，在1826年放火焚燒禁衛軍兵營，害死大約四千人。掃除了擋道的禁衛軍，奧斯曼帝國統治者現在可以推動改革，照現代歐洲的模式重建一支軍隊。[[5]](#m5_13)

顯而易見，把孩子從父母身邊搶走，使之成為改信伊斯蘭教的奴隸，這種制度非常殘酷，與現代民主價值格格不入，即使這些奴隸享有特權。穆斯林世界之外，沒有看到可以媲美的相似制度，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等評論家認為，它的創建最終歸于伊斯蘭教深處的宗教原因。[[6]](#m6_13)

但進一步觀察后發現，穆斯林的軍事奴隸制并不從宗教原則進化而來，僅僅是強大部落社會中建國的對策。它發明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其統治者發現，不能依賴部落組織的軍隊來維持帝國。阿拉伯部落的征召和擴軍很快，以取得速勝。統一后，他們憑借伊斯蘭教的激勵，又成功占領中東的大部和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如我們所知，中國、印度、歐洲的部落層次制度，因不能完成持續的集體行動，而被國家層次的制度所取代。部落社會高度平等，以共識為基礎，不輕易服從，傾向于發生內訌和分裂，很難長期守衛領土。

為了創建國家層次的強大制度，軍事奴隸制在世界最強大部落社會之一應運而生，成為一個精彩的適應。它作為集中和鞏固國家權力的措施，極為成功，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認為，它挽救了伊斯蘭教，使之成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7]](#m7_12)

### 創建穆斯林國家

先知穆罕默德誕生于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古萊什部落，其時，該地不屬于任何國家。如第5章所提及的，他運用社會契約、實力、超凡魅力的組合，首先統一了爭吵不休的麥地那部落，然后是麥加和周邊城鎮的部落，從而建成了國家層次的社會。在某個意義上，先知的布道是故意反部落的。它宣稱有個信徒團體，其忠誠只獻給上帝和上帝的話語，而不是自己的部落。這個意識形態上的發展，在內爭好斗的分支式社會中，為拓寬集體行動的范圍和延伸信任的半徑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維持政治統一始終是阿拉伯部落制背景下的艱辛斗爭。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麻煩立即露出端倪。先知的超凡魅力足以凝聚他所創建的政治體，現在卻面臨四分五裂的威脅，其組成部分很有可能分道揚鑣，如以麥加為基的古萊什部落、來自麥地那的“輔士”（Ansar）和其他部落的信徒。穆罕默德同伴之一的艾布·伯克爾（Abu Bakr），以他嫻熟的政治運作，說服部落團體承認自己為第一任哈里發（caliph），即繼承者。此外，他還是部落系譜的專家，借用他在部落政治上的淵博知識而贏得擁護自己的共識。[[8]](#m8_12)

在頭三個哈里發的治下——艾布·伯克爾（632—634年在位）、歐麥爾（Umar，634—644年在位）、奧斯曼（644—656年在位）——穆斯林帝國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兼并整個阿拉伯半島，以及今日的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埃及的主要地區。[[9]](#m9_12)最壯觀的勝仗是卡迪西亞會戰（Qadisiyyah），打敗了波斯的薩珊帝國。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時期，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曾大肆慶祝這一歷史戰役。661年，隨著倭馬亞王朝建立于大馬士革，版圖擴展仍在繼續，進一步征服了北非、小亞細亞（Anatolia）、信德（Sind）和中亞。阿拉伯軍隊在711年占領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的北邊繼續挺進，直到732年在法國的圖爾戰役（Battle of Poitiers）中受到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的遏制。

阿拉伯部落雖有宗教動機，但同樣重要的是經濟獎勵。他們所征服的定居農業社會，可提供大量土地、奴隸、女子、馬匹、動產。最初的統治問題是所有掠奪游牧民族所面臨的：如何分配戰利品，以避免各部落之間的內訌。通常當場分配可搬走的戰利品，五分之一給哈里發，運回麥地那。被征服地區的土地變成哈里發治下的國家領土，不少干脆落到參與戰役的各部落手中。[[10]](#m10_12)

過不多久，阿拉伯部落男子必須由征服者變為管理富饒農地和居民的統治者。哈里發不需要重新開發國家制度，因為四周都是成熟的國家或帝國。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薩珊帝國提供最及時的中央管理模式。曾屬君士坦丁堡的領土現已被阿拉伯征服，居住于此的很多基督徒前來參加穆斯林政府的工作，從而帶來拜占庭政府的治理方法。

真正的穆斯林國家何時出現？與文學描述相對的歷史記載，相對來說比較缺乏，使精確判定變得異常困難。維持常備軍隊和警察、定期向居民征稅、設立行政機構以收稅、裁定司法以解決爭端、主持像大清真寺那樣的公共建設，從事上述這一切的政體，肯定存在于倭馬亞王朝阿卜杜勒-馬利克（Abd al-Malik，685—705年在位）時期。或許更早，甚至在倭馬亞王朝第二任哈里發穆阿維葉（Mu‘awiya，661—680年在位）時期。[[11]](#m11_12)很難說先知穆罕默德創建的不是部落聯合體而是國家，因為上述的制度特征在他生前尚未出現。

波斯的理想絕對君主制中，其國王強大得能夠維護和平和遏制貪婪的武裝精英，后者是農業社會中沖突和混亂的主要來源。從現代民主角度看這樣的社會，我們傾向于認為，農業社會的君主只是掠奪性精英團體的一員，也許由其他寡頭選出來保護他們的租金和利益。[[12]](#m12_12)但實際上，這些社會中幾乎總有三角斗爭，分別是國王、精英的貴族或寡頭、非精英的農民和市民。國王經常站在非精英一邊來反對寡頭，既可削弱潛在的政治挑戰，又可爭到份下的稅收。于此，我們可看到國王代表大眾利益的概念的雛形。我們已經知道，中國寡頭精英的大莊園擴展，皇帝為此而受到威脅，遂運用國家權力來予以限制和破壞。同樣道理，薩珊帝國的絕對君主政體被視作秩序的壁壘，以反對損害大眾利益的精英的相互爭執。所以有人強調，君主執行法律便是正義的標志。[[13]](#m13_12)

從部落過渡到國家層次的社會，早期阿拉伯統治者享有幾點優勢。絕對君主制的中央行政官僚模式，作為國家層次社會的規范，早已存在于周邊國家。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宗教意識形態。就某種意義而言，以巴士拉（Basra）和阿拉伯半島為基地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從先知布道中得出了最符合邏輯的結論。他們認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只要是穆斯林就夠，不管他是不是阿拉伯人，也不管他來自哪個部落。如果穆罕默德的繼承者如此照辦，他們可能會嘗試創建一個包容不同種族的超級帝國，基于意識形態，不靠親戚關系，就像神圣羅馬帝國。但對倭馬亞王朝來說，光是維持帝國統一，且不談建立橫跨各地域的中央政府，已證明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頑強的部落忠誠勝過意識形態，穆斯林國家繼續受困于親戚關系的爭吵和仇恨。

先知死去不久就爆發了一起最重要的沖突。穆罕默德屬于古萊什部落的哈希姆（Hashemite）血統，但又與競爭的倭馬亞血統共享曾祖父阿卜杜·瑪納夫（Abd Manaf）。倭馬亞血統和哈希姆血統爭吵得很厲害，不管是先知出生之前，還是先知在世時，前者甚至起兵，反對穆罕默德和他在麥地那的穆斯林信徒。穆罕默德征服麥加后，倭馬亞血統改信伊斯蘭教，但兩個血統之間的仇恨仍在繼續。穆罕默德沒有兒子，只跟最心愛的妻子阿以莎（Aisha）生了女兒法蒂瑪（Fatima），長大后嫁給先知的表親阿里（Ali）。第三位哈里發奧斯曼屬于倭馬亞血統，把很多親戚帶入權力圈，最終死于行刺。繼承他的是阿里，卻被趕出阿拉伯半島，在庫法（Kufa，今日伊拉克）祈禱時，又被哈瓦利吉派系的人殺死。隨之，哈希姆血統、哈瓦利吉派、倭馬亞血統之間爆發了一系列內戰（fitnas）。等到阿里兒子侯賽因（Husain）戰死于伊拉克南部的卡爾巴拉（Karbala）戰役，倭馬亞血統才得以鞏固政權，開拓新朝代。阿里的黨羽被稱為什葉派（Shiites），信奉正統主義，認為阿拉伯帝國只能屬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14]](#m14_12)倭馬亞王朝穆阿維葉的追隨者發展成為遜尼派（Sunnis），聲稱自己是正統理論與實踐的奉行者。[[15]](#m15_12)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大分裂，起源于阿拉伯部落競爭，在21世紀的今天，仍引發汽車爆炸、對清真寺的恐怖襲擊等。

早期的哈里發嘗試創建超越部落忠誠的國家組織，尤其是在軍隊里，其十人和百人單位都是跨越部落的。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新興的穆斯林精英“知道部落身份在阿拉伯社會中植根太深，既不能以法令廢除，也不能以超越部落排外性的措施將之驅走。他們能否將部落成員成功融入國家，既取決于為自身利益利用部落關系的能力，也取決于自己超越部落關系的能力”。[[16]](#m16_12)占領伊拉克安巴（Anbar）省的美國人，在2003年入侵之后發現，倚靠部落領袖的傳統權威，比創建無視社會現實的非人格化單位，更容易掌控部落軍人。部落成員與指揮官發生爭吵，可能會悄悄溜走，返回自己的親人中。如指揮官又是自己部落的酋長，他就會三思而不行了。

但是，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本質上是孱弱和動蕩的，部落領袖的暴躁聞名遐邇。他們缺乏紀律，經常因為爭吵，或受到忽略，而與親戚們逃之夭夭。早期哈里發對所招募的部落領袖滿腹狐疑，通常不讓他們擔任重要的指揮職位。此外，新建國家經常受到獨立游牧部落的威脅，穆斯林領袖對之只有輕蔑。據傳，哈里發奧斯曼不愿理會一名重要部落領袖的見解，斥之為“低能貝都因人”的嘮叨。[[17]](#m17_12)

### 軍事奴隸制的起源

軍事奴隸制發展于9世紀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之前穆斯林軍隊基于部落征召的重重弊端。[[18]](#m18_11)阿拔斯王朝屬于哈希姆血統，在什葉派和波斯的呼羅珊（Khorasani）義軍幫助下，于750年推翻倭馬亞王朝，并把首都從大馬士革遷至巴格達。[[19]](#m19_10)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鞏固其統治方面非常殘忍，盡量滅絕倭馬亞王朝的血統，并鎮壓曾經的盟友什葉派和呼羅珊義軍。國家集權有增無減，大權獨攬的是稱為維齊爾的首相。宮廷的規模和奢華均有增加，定居城市的帝國與其發源的部落區域則更加分隔。[[20]](#m20_9)

一開始，阿拔斯王朝統治者就暗示，基于親戚關系的政治權力趨于浮躁善變，可能的解決之道就是軍事奴隸制。哈里發馬赫迪（al-Mahdi，775—785年在位）寧可選擇一批毛拉（mawali，釋奴）作為自己的仆人或助手，也不愿挑選親戚或呼羅珊盟軍。他解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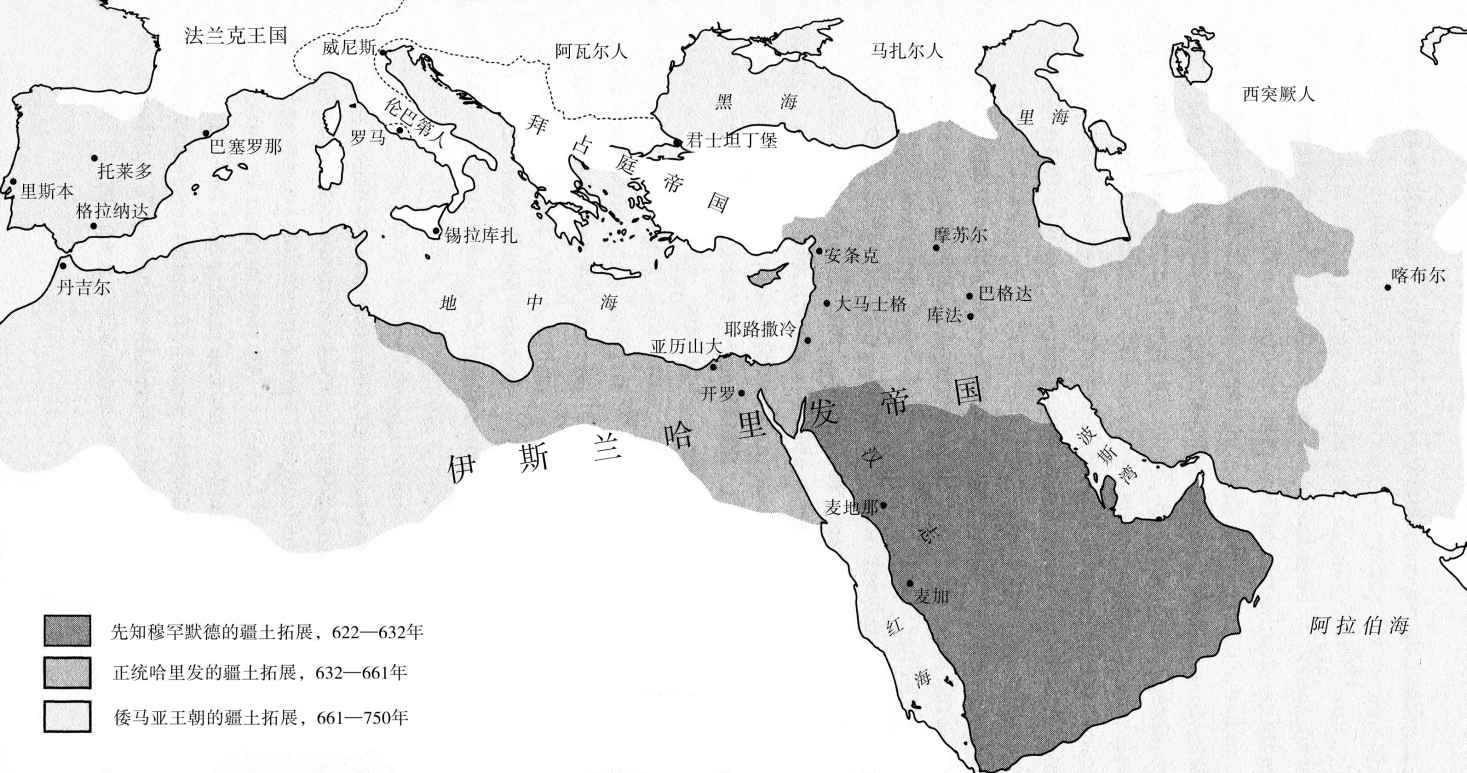
我坐在觀眾席里，可以喚來毛拉，讓他坐在身邊，他的膝蓋觸碰我的膝蓋。等到散席，我可命令他去侍候我的坐騎，他仍然高興，不會生氣。如果我要求其他人做同樣的事，他會說：“我可是你的擁護者和親密盟友的兒子”，或“我可是你（阿拔斯王朝）霸業的老兵”，或“我可是首先投入你霸業的人的兒子”。而且我不能改變他的（頑固）立場。[[21]](#m21_9)

到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和穆爾臺綏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亞的河中地區（Transoxania），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國，外國人充當國家軍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為慣例。當阿拉伯人遇上生活在中亞大草原的突厥部落時，其領土擴展受到阻止，后者優秀的打仗能力獲得很多阿拉伯學者的承認。[[22]](#m22_9)哈里發不能招募整個突厥部落為自己打仗出力，因為它們同樣有著部落組織的缺陷。所以，突厥人只是作為個別奴隸，在非部落軍隊中接受訓練。馬蒙創建了四千突厥奴隸的衛兵隊，稱作馬穆魯克，到穆爾臺綏姆時期，壯大至將近七萬人。[[23]](#m23_9)他們是兇悍的游牧人，新近皈依伊斯蘭教，充滿了對穆斯林事業的熱情。他們成為阿拔斯軍隊的核心，“因為他們在威力、血氣、勇敢、無畏方面，都比其他種族優越”。根據一名見證馬蒙征戰的觀察員，

停戰區道路兩側站著兩行騎士……右首一側是一百名突厥騎士，左首一側是一百名“其他”騎士（即阿拉伯人）……大家都排成戰斗行列，等待馬蒙的蒞臨……時值正午，天氣愈益炎熱。馬蒙到達時發現，除三四人外，突厥騎士依然危坐于馬背，而“混雜的其他人”……早在地上東倒西歪。[[24]](#m24_9)

穆爾臺綏姆把突厥人組成馬穆魯克團，因為本地居民與突厥士兵的暴力爭端，而把首都從巴格達遷至薩邁拉（Samarra）。他讓他們在自己學院中接受訓練，購買突厥女奴配給他們成家，但不準與本地人混雜，由此創建了一個與周圍社會分隔的軍事種姓。[[25]](#m25_9)

忠于家庭，還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兩者之間存在矛盾。這種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具有悠久歷史。柏拉圖的《理想國》記載了哲學家蘇格拉底和一群年輕人的討論，他們試圖在“講說中”創造一個“正義之城”。蘇格拉底說服他們，正義之城需要特別激昂的保衛者階層，為防御自己城邦而感到無比自豪；保衛者是武士，其首要原則是對朋友友善、對敵人兇狠；他們必須接受妥善的音樂和體操的訓練，以培養公益精神。



早期阿拉伯帝國治下的擴張

《理想國》第五卷有段著名論述，談到保衛者應實行妻小共有制度。蘇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兒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衛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兩者會有競爭；為此，必須告訴孩子一個“高尚謊言”，他們沒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還主張，保衛者必須過集體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單獨女子結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須過集體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敵人：

那么，我們已講過的和我們正在這里講的這些規劃，是不是能確保他們成為更名副其實的保衛者，防止他們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東西各各說成“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從公家弄到手的東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婦女兒童看作私產，各家有各家的悲歡苦樂呢？[[26]](#m26_8)

不很清楚，蘇格拉底或柏拉圖是否相信此舉的可行性。事實上，蘇格拉底的對話者，對“講說中”的正義之城能否成為現實，表示了巨大疑問。討論的目的在于指明，親戚關系和對公共政治秩序的義務之間永遠存在緊張關系。它的啟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過某種機制來抑制親戚關系，使保衛者把國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說馬蒙、穆爾臺綏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領袖讀到了柏拉圖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這非常可疑。但軍事奴隸制確實應答了柏拉圖所提出的必需，沒說他們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遙遠，除了代表國家和公益的哈里發，不欠任何人。奴隸們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認主人，忠心耿耿。他們獲得通常是突厥語的普通新名，身處基于血統的社會，卻與任何血統毫不關聯。他們沒有實行女人和孩子的共產主義，但隔離于阿拉伯社會，不準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門戶，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東西都搬回家”。傳統的阿拉伯社會中，裙帶關系和部落忠誠的難題，就此獲得一勞永逸的解決。

作為軍事制度的馬穆魯克來得太遲，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世紀中期，帝國已分裂成一系列獨立主權政治體。756年，逃亡的倭馬亞王子在西班牙設立第一個獨立伊斯蘭國，帝國分裂自此開始。8世紀末9世紀初，獨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世紀末10世紀初，獨立王朝又在伊朗東部出現。到10世紀中期，埃及、敘利亞、阿拉伯半島也從版圖上消失，阿拔斯國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區。阿拉伯政權，不管是王朝還是現代，再也沒有統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統一大業只好留給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

阿拔斯帝國滅亡了，但軍事奴隸制得以幸存。事實上，它在后續世紀中，為伊斯蘭教本身的生存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三個新的權力中心涌現出來，都基于軍事奴隸制的行之有效。第一個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國，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為中心，統一了波斯東部和中亞，還滲入印度北部，為穆斯林統治次大陸鋪平道路。第二個是埃及的馬穆魯克蘇丹國，在阻止基督教十字軍和蒙古軍方面，扮演了生死攸關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為世界宗教的伊斯蘭教。最后一個就是奧斯曼帝國，它改善軍事奴隸制，為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的崛起打下基礎。所有三個案例中，軍事奴隸制解決了部落社會中建立持久軍事工具的難題。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馬穆魯克的案例中，親戚關系和家族制滲入馬穆魯克制度，使該制度衰落。此外，作為埃及社會最強大制度的馬穆魯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進而接管國家，預示了20世紀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專政。只有奧斯曼帝國清楚看到，必須把家族制趕出國家機器，其照章辦事將近三個世紀。盡管文官政府嚴格控制軍隊，但從17世紀晚期起，當家族制和世襲原則重新抬頭時，它也開始走下坡路。

## 第14章 馬穆魯克挽救伊斯蘭教

馬穆魯克如何在埃及上臺；中東阿拉伯的權力卻在突厥奴隸之手；馬穆魯克挽救伊斯蘭教于十字軍和蒙古軍；馬穆魯克實施軍事奴隸制的缺陷導致政權的最終衰落

軍事奴隸制幫助穆斯林政權在埃及和敘利亞掌權近三百年，從阿尤布（Ayyubid）王朝終結的1250年到1517年。其時，馬穆魯克蘇丹國敗在奧斯曼帝國的手中。今天，我們把伊斯蘭教和全球的穆斯林社區（現今總人口約15億）視作理所當然。但伊斯蘭教的擴張，不僅取決于宗教思想的號召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治權力。根據穆斯林的信念，穆斯林軍隊必須向身處戰爭土地（Dar-ul Harb）的非信徒發起圣戰（jihad），再把他們帶入伊斯蘭土地（Dar al-Islam）。歸功于穆斯林，基督教和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東不再是主要宗教。同樣道理，如果十字軍得以掌控中東，或蒙古軍一路掃到北非，伊斯蘭教也可能成為次要流派。尼日利亞、象牙海岸、多哥、加納等北部邊界，就是當初穆斯林部隊的遠征終點線。要不是穆斯林部隊的打仗威力，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的穆斯林少數派就不復存在。它的出現不僅靠宗教狂熱，還靠國家建立有效制度來集中使用權力——最重要的就是軍事奴隸制。

伊斯蘭教本身的生存取決于軍事奴隸制，這一見解與阿拉伯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伊本·赫勒敦不謀而合。他活在14世紀的北非，與埃及的馬穆魯克蘇丹國同一時代。他在《歷史緒論》（Muqadimmah）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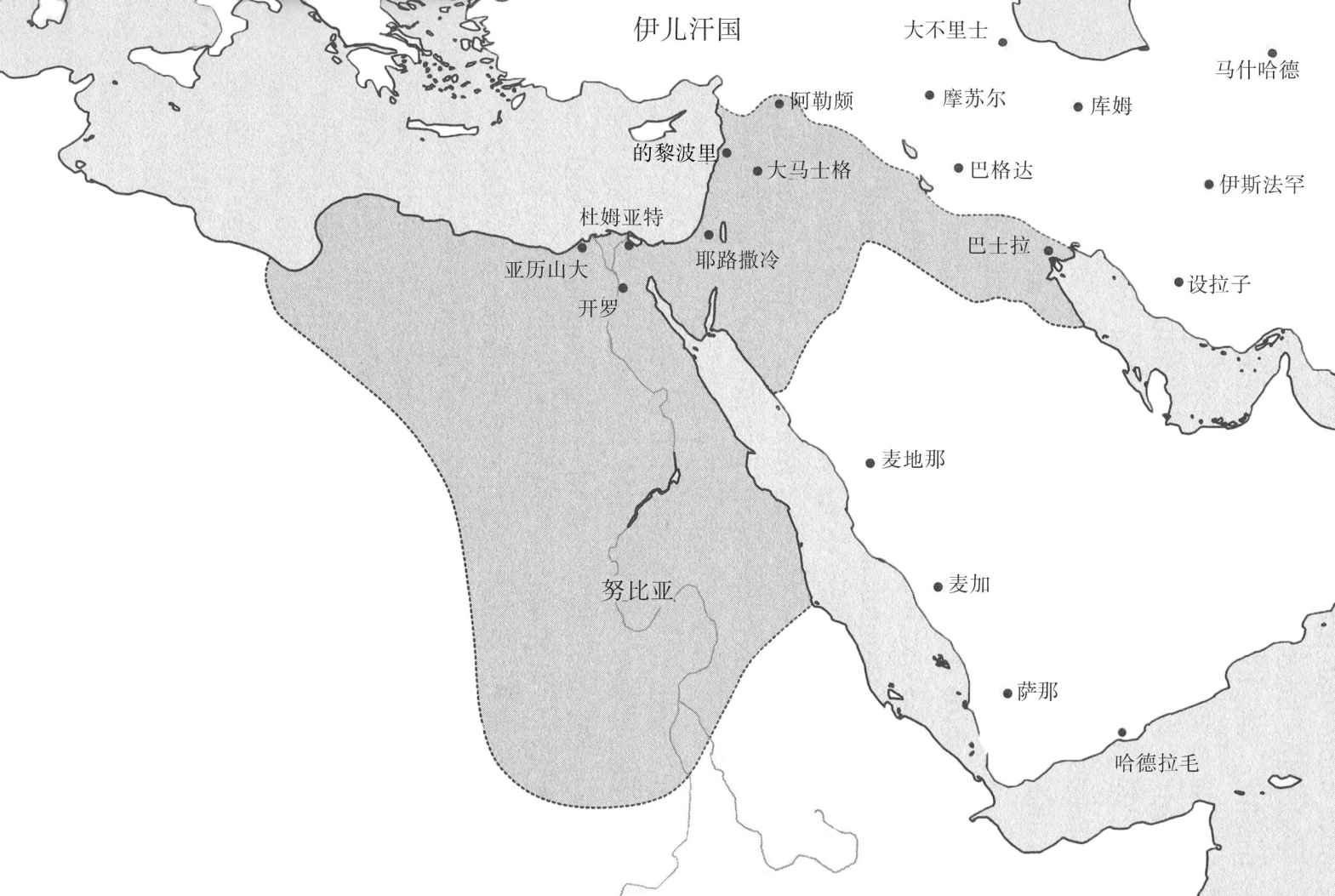
（阿拔斯）國家淹沒于頹廢和奢華，披上災難和衰弱的外衣，被異教的韃靼所推翻。韃靼廢了哈里發的寶座，毀掉該地的輝煌，使非信徒在信念之地得逞。這全是因為信徒們自我放縱，只顧享樂，追求奢侈，精力日衰，不愿在防衛中重振旗鼓，放棄了勇敢的臉面和男子漢的象征——然后，善良的上帝伸出救援之手，復蘇氣息奄奄的人，在埃及恢復穆斯林的團結，維持秩序，保衛伊斯蘭教的城墻。上帝從突厥人和其眾多部落給穆斯林送來保護他們的統治者和忠實助手。這些助手借助奴役的渠道，從戰爭土地來到伊斯蘭土地，本身便藏有神的祝福。他們通過奴役學習榮譽和祝福，榮獲上帝的恩惠；受了奴役的治療，他們以真正信徒的決心走進穆斯林宗教，保持游牧人的美德，沒受低級品行的玷污、享樂的腐蝕、文明生活的污染，他們的激情不受奢華的影響，仍完好無缺。[[1]](#m1_14)

馬穆魯克制度創立于庫爾德人的阿尤布王朝末期，那是12世紀末13世紀初，阿尤布王朝短暫統治埃及和敘利亞，其最著名的子孫是薩拉丁（Salah al-Din，在西方被稱作 Saladin）。阿尤布王朝曾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反十字軍戰爭中，投入了突厥奴隸軍。它的最后一任蘇丹薩里（al-Salih Ayyub），創建了伯海里（Bahri，編按：意即河洲）團，以總部所在地的尼羅河小島的城堡命名。據傳，庫爾德士兵的不可靠使他轉向突厥人。[[2]](#m2_14)該團含八百至一千的奴隸騎士，主要是欽察突厥人（Kipchak Turkish）。像欽察一樣的眾多突厥部落，開始在中東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其時，他們受到另一強大游牧民族的擠壓，蒙古人正在把他們從中亞傳統的部落地域趕走。

伯海里團很早就證明了自己的驍勇善戰。法王路易九世1249年在埃及登陸，發動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翌年，他敗在伯海里團手中。率領伯海里團的是一名欽察人，名叫拜伯爾斯（Baybars）。他曾是蒙古人的俘虜，作為奴隸賣到敘利亞，最后被招聘為新馬穆魯克的領袖。由此，十字軍在埃及遭到驅逐，路易九世的贖金相當于法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1260年，拜伯爾斯和伯海里團，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魯特（Ayn Jalut）戰役中取得更為重大的勝利，他們打敗了蒙古軍。其時，蒙古軍已經征服歐亞大陸的大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此前蒙古各部落已經在他手上完成統一。13世紀30年代，他們摧毀了統治中國北方的金朝；打敗了中亞的花剌子模帝國；同時又戰勝了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的王國；侵犯和占領了俄羅斯的大部，1240年洗劫基輔；在13世紀40年代挺進東歐和中歐。他們最終停止前進，不是由于基督教軍隊的威力，而是因為大汗窩闊臺（成吉思汗的兒子）的去世。蒙古指揮官奉召撤退，以討論繼承人選。1255年，蒙哥命令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征服中東。他占領伊朗，建立伊兒汗國（Ilkhanid），再朝敘利亞挺進，旨在征服埃及。1258年，陷落的巴格達遭到徹底蹂躪，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發也被處死。

馬穆魯克在阿音札魯特的勝利，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兵力優勢，由于蒙哥的去世，旭烈兀不得不率領主力部隊撤退。盡管如此，為了攻擊馬穆魯克，他仍留下最好的指揮官之一和實質性的兵力。蒙古人是優秀的戰術家和戰略家，以迅速轉移和簡易給養，設法包抄敵人。相比之下，馬穆魯克裝備得更好，戰馬更為高大，攜帶更為堅實的盔甲、弓、矛、劍，并且紀律異常嚴明。[[3]](#m3_14)阿音札魯特的勝利不只是僥幸，馬穆魯克曾與伊兒汗國發生一連串戰役，以保衛敘利亞，直到1281年戰爭結束。它后來在1299、1300、1303年，又三次阻擋蒙古人的入侵。[[4]](#m4_14)



伯海里系馬穆魯克蘇丹國，1250—1392年

馬穆魯克取代阿尤布王朝，與伊兒汗國開戰時，就以拜伯爾斯為第一任蘇丹，開始了他們的統治。[[5]](#m5_14)以馬穆魯克為基礎的政權比之前的王朝更為穩定。薩拉丁是偉大的軍事領袖和穆斯林的英雄，但他組建的政體非常脆弱，與其說是一個國家，倒不如說是基于親戚關系的公國聯邦。他的軍隊并不忠于王朝，在薩拉丁死后，分裂成一群相互競爭的民兵。相比之下，馬穆魯克治理一個真正的國家，設有中央官僚機構和專業軍隊——實際上軍隊就是國家，這既是優點也是缺點。[[6]](#m6_14)不像阿尤布王朝，馬穆魯克沒有瓜分國家，也沒有分發封地給親戚或寵臣。不像薩拉丁死后，敘利亞在馬穆魯克的治理下，也沒有馬上脫離埃及。[[7]](#m7_13)

馬穆魯克制度在埃及馬穆魯克政權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加強。蘇丹國得以從中亞草原、西北和北方的拜占庭領土獲得一波波新兵，這是成功的關鍵之一。有些新兵已是穆斯林，另外的是異教徒和基督徒。皈依伊斯蘭教的過程是至關重要的，重建了他們的忠誠，并拉近了他們與新主人的感情。新兵與家庭和部落完全隔絕，經過從小伊始的培訓而獲得新家，即蘇丹家庭和馬穆魯克相互的手足情誼，這是另一個關鍵。[[8]](#m8_13)

太監在制度運作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不像中國或拜占庭帝國的太監，穆斯林太監幾乎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之外出生的外國人。有位評論家這么說，“穆斯林沒有生下他。他也沒生下一名穆斯林”。[[9]](#m9_13)馬穆魯克幾乎都是突厥人或歐洲人，太監則有可能是從努比亞（Nubia）或南方其他地區招募來的非洲黑人。跟馬穆魯克一樣，他們也與自己家庭完全隔絕，因此對主人忠心耿耿。去勢得以讓他們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年輕馬穆魯克的教師。后者的獲選，除了體力和尚武，還取決于他們的健美。作為只有袍澤之誼而難近女色的軍人集體，老牌馬穆魯克的同性戀索求，始終是一件頭痛事，太監還可從中發揮緩沖的作用。[[10]](#m10_13)

作為政治制度的馬穆魯克之所以成功，除了教育特殊，還因為貴不過一代的原則。他們不能將馬穆魯克地位傳給孩子，兒子會融入普通老百姓，孫子則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特權。其中的道理簡單明了：穆斯林不能是奴隸，而馬穆魯克的孩子生來就是穆斯林。此外，馬穆魯克的孩子生于城市，沒經歷過草原上流浪生涯的鍛煉，在那里，孱弱就等于夭亡。假如馬穆魯克地位變成世襲，就會違反當年獲選時嚴格的量才錄用原則。[[11]](#m11_13)

### 馬穆魯克的衰退

馬穆魯克制度的設計中至少有兩個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它本身變得日益軟弱。第一，馬穆魯克軍中沒有制度化的統治機制。蘇丹以下有等級分明的指揮鏈，但蘇丹本身卻沒有明確的選任規則。有兩條相互競爭的原則，第一條是王朝原則，當政的蘇丹選擇一個兒子來繼位；第二條是非世襲原則，各派馬穆魯克一邊爭權奪利，一邊試圖達成人選的共識。[[12]](#m12_13)第二條比較占上風時，各資深埃米爾（emir，王公）所選出的蘇丹，經常只是門面裝飾。

馬穆魯克國家結構的第二個缺陷是缺乏最高的政治權威。馬穆魯克創建時，僅是阿尤布王朝的軍事工具。到最后一任阿尤布蘇丹去世，馬穆魯克卻接管了國家，造成了逆向的代理。大多數政治等級制度中，主人擁有權力，委任代理人去執行自己的政策。很多政體發生功能的紊亂，因為代理人自有打算，與主人的目標大相徑庭。制度的設計就是要鼓勵代理人遵循主人的命令。[[13]](#m13_13)

相比之下，在馬穆魯克的案例中，代理人自己又變成了主人。他們既是服務蘇丹的軍事等級機構，同時自己又在爭奪蘇丹職位。這意味著，他們既要做軍官工作，又要圖謀攫取權力并削弱對手。這自然給紀律和等級制度造成極壞的影響，就像現代發展中國家的軍政府。這個問題在1399年變得異常尖銳，其時，蒙古的帖木兒國侵犯敘利亞，洗劫阿勒頗（Aleppo），而馬穆魯克忙于內斗，無暇組織防御，竟撤回開羅。此外，他們也讓地方部落奪走對上埃及的控制。最終幸免于難，只是因為帖木兒國需要應對另一新興力量的威脅，即奧斯曼帝國。[[14]](#m14_13)如果馬穆魯克服從于文官政府，像奧斯曼帝國那樣，文官政府就可采取措施予以解決。[[15]](#m15_13)

反世襲原則逐漸衰退，最終導致埃及馬穆魯克國家的崩潰。隨著時間的推移，世襲不但用于蘇丹，甚至蔓延至馬穆魯克，他們也試圖建立自己的朝代。像中國的非人格化科舉制度，貴不過一代的原則違背人們的生物性追求，馬穆魯克都試圖保障家人和后裔的社會地位。富有的馬穆魯克發現，他們可以捐贈給伊斯蘭宗教慈善事業瓦克夫（waqf）、伊斯蘭學校（madrassa）、醫院和其他信托機構，讓自己的后裔擔任主管，從而戰勝貴不過一代的原則。[[16]](#m16_13)此外，有些馬穆魯克沒有直系親戚，卻把種族關系當作團結基礎。蘇丹蓋拉溫（Qalawun）廢棄欽察人，開始招募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和阿布哈茲人（Abkhaz）的奴隸，以組建新的布爾吉團（Burji）。最終，切爾克斯派從欽察派的手中奪走蘇丹國。[[17]](#m17_13)

到14世紀中期，馬穆魯克制度的嚴重退化已經相當明顯。事實上，其時的情形是一片和平繁榮，對馬穆魯克的紀律卻有災難性的影響。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多已消失，馬穆魯克在1323年與蒙古人簽訂和平條約。自己不是馬穆魯克的蘇丹納綏爾·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開始委派非馬穆魯克的效忠者擔任高級軍職，并清洗他心疑的能干軍官。[[18]](#m18_12)

政府隨著蘇丹巴庫克（Barquq）在1390年的上臺而獲得短暫活力。他的掌權全靠布爾吉，即切爾克斯人的馬穆魯克，他還恢復了招募外國奴隸的舊制度。后續的蘇丹使用國家壟斷所積累的資源，大大擴充了對年輕馬穆魯克的招募，從而造成代溝問題。老牌馬穆魯克開始演變成軍事貴族，像現代美國大學的終身制教授，在等級制度中盤根錯節，固守現狀，以應對年輕一代的挑戰。資深首領的平均年齡開始上升，人員流通顯著減緩，古老貴族分為氏族。馬穆魯克開始提拔自己的家人，以財富的炫耀來確立自己的地位，女眷也在爭取子孫利益上扮演更大角色。馬穆魯克制度，最初創建時是為了在軍事招募中克服部落制，自己現在反而變成部落。[[19]](#m19_11)新的部落不一定基于親戚關系，但反映出人們內心深處的沖動：應付非人格化社會制度，以促進和保障后裔、朋友、依附者的利益。

久而久之，馬穆魯克制度從中央國家退化成軍閥的尋租聯合體。年輕的馬穆魯克不再忠于蘇丹，如一名歷史學家所說的，反而變成

一個利益團體，它在戰場上的可靠性是可疑的，它的造反傾向卻是自然的。蘇丹國的最后幾十年，開羅的逐日編年史就是一個不斷要求蘇丹付款以換取國內稍稍穩定的故事。招募來的馬穆魯克以掠奪……歡迎甘素臥·胡里（al-Ghawri，一位晚期蘇丹）的登基。受訓新兵燒了五名高級長官的豪宅，以表達對自己低報酬的不滿，作為對照，大首領通常聚斂巨額的財富。[[20]](#m20_10)

將馬穆魯克與早期蘇丹綁在一起的道德關系，已被經濟考慮所替代。高級馬穆魯克向低級軍人購買忠誠，后者再向國家或平民百姓榨取租金，以期獲得贊助人的獎勵。蘇丹只是伙伴中的老大，有些遭到了馬穆魯克派系的行刺或撤職，所有晚期的蘇丹都不免會提心吊膽。

除了政治上的不穩定，政府在15世紀晚期又遭遇財政危機。葡萄牙海軍在印度洋取得首要地位，切斷了香料貿易，蘇丹的收入在14世紀末開始下跌，只好依靠稅率的增加。這迫使經濟主體——農民、商人、手藝人——想方設法隱瞞資產來逃稅，征稅官員愿意低報稅率來換取自己荷包的回扣。結果，雖然稅率增高，實際稅收反而下降。政府只好訴諸沒收所能找到的資產，包括馬穆魯克用來為后裔隱藏財富的伊斯蘭慈善事業瓦克夫。[[21]](#m21_10)

### 作為犯罪集團的國家

政治學家將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比作有組織犯罪。他們的意思是，國家統治者使用自己組織暴力的專長，向社會上其他人榨取資源，經濟學家稱之為租金。[[22]](#m22_10)有些學者使用“掠奪國家”的字眼來描繪一系列現代發展中國家的政權，像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爾（剛果），或查爾斯·泰勒治下的利比里亞。在掠奪國家里，掌權精英試圖向社會提取最高程度的資源，以供自己的私人消費。這些精英之所以追求權力，就是因為權力可向他們提供經濟租金。[[23]](#m23_10)

毫無疑問，有些國家是高度掠奪性的。在一定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掠奪性的。在理解政治發展時要面對一個重要議題，即國家是否在掠奪最大化的租金，或出于其他考慮，僅在提取遠遠低于理論上最大化的租金。以租金最大化來描繪成熟的農業社會，如奧斯曼土耳其、明朝中國、“舊制度”下的法蘭西王國，并不一定恰當。但對有些政治秩序來說，如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所設置的征服政權，這肯定是精確的，也愈來愈成為后期馬穆魯克政權的特征。馬穆魯克蘇丹的征稅，既是沒收性的，又是任意的，使長期投資變得難以想象，主人只好將財產投入非優化的用途，像宗教慈善事業瓦克夫。有個有意思的推測：當商業資本主義開始在意大利、荷蘭、英國起飛時，在埃及卻被扼殺在搖籃中。[[24]](#m24_10)

另一方面，高水平征稅僅出現于埃及馬穆魯克三百年統治的末期。這表明，早期蘇丹的征稅遠遠低于最大化。換言之，最大化的租金提取并不是農業社會中前現代國家不可避免的特征。根據波斯的中東國家理論，君主功能之一就是保護農民，以正義和穩定的名義來對抗貪婪的地主和其他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精英。這個理論為阿拉伯人所采用。所以，國家不單是占據領土的強盜，更是新興公共利益的監護人。馬穆魯克國家最終走向完全的掠奪，歸因于內外力量的交匯。

諸多原因導致馬穆魯克政權的政治衰敗，它在1517年遭到奧斯曼帝國的摧毀。從1388年到1514年，埃及承受二十六年的瘟疫。由于奧斯曼帝國的興起，馬穆魯克越來越難以招募奴隸軍，因為奧斯曼帝國直接擋在赴中亞的貿易途徑上。最后，馬穆魯克制度證明太僵硬，不愿采用新軍事技術，尤其是步兵軍隊的火器。面對歐洲敵人的奧斯曼帝國，早在1425年就開始使用火器，約在歐洲探索此項革新的一個世紀之后。[[25]](#m25_10)他們很快掌握這些新武器，其大炮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時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馬穆魯克要到甘素臥·胡里蘇丹（1501—1516年在位）時期，方才認真試驗火器，離他們毀滅于奧斯曼帝國已經不遠。馬穆魯克騎士發現使用火器有損自己尊嚴，而政府又受銅鐵礦產匱乏的限制。經過一些夭折的測試（十五門火炮在試用時全部炸壞），蘇丹國設法裝備了有限數量的火炮，并組建了非馬穆魯克的火槍第五軍團。[[26]](#m26_9)但這些革新姍姍來遲，無法保住這個資金短缺、墮落、傳統的政權。

阿尤布蘇丹創建伯海里團，所想解決的問題與早期中國建國者所面臨的完全相同，即在高度部落化的社會中組建軍隊，不得忠于自己的部落，只能忠于以他為代表的國家。他的對策是購買年輕外國人，切斷其對家庭的忠誠。他們進入馬穆魯克奴隸大家庭后，在選賢與能的基礎上獲得晉升；每年招募新人，前途全憑自己的才干。如此建起的軍事機器令人印象深刻，頂住兩代蒙古軍的進攻，將十字軍戰士趕出圣地巴勒斯坦，為保衛埃及而打退帖木兒國。如伊本·赫勒敦所說的，馬穆魯克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挽救了伊斯蘭教，否則，后者可能早已變得無足輕重。

另一方面，馬穆魯克的制度設計又包含了自己消亡的種子。馬穆魯克直接參政，不滿足于擔任國家的代理人。沒人可以管教他們，每一名馬穆魯克都能追求蘇丹一職，因此蓄謀弄權。王朝原則很早為最高層領袖所接受，很快傳染給整個馬穆魯克上層，變成既得利益的世襲貴族精英。同時，這些精英沒有安全產權，想方設法從蘇丹手中保住自己的收入，以傳給后裔。在布爾吉系馬穆魯克的治下，精英群體分化于年齡的差異，老牌馬穆魯克將年輕者招入自己的家族網絡。曾將年輕馬穆魯克與國家綁在一起的訓練不見了，只有為自己派別的赤裸裸的租金追求，他們使用強制力量，從平民百姓和其他馬穆魯克那里榨取資源。馬穆魯克精英為這些權力斗爭煞費苦心，以致不得不采用非常謹慎的外交政策。僅僅憑運氣，15世紀早期的帖木兒國侵略，沒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外部威脅，一直到奧斯曼帝國和葡萄牙逐一崛起的世紀末。由于瘟疫造成的人口減少和外貿的喪失，馬穆魯克的財政日漸捉襟見肘。沒有外部威脅，也就沒有軍事現代化的激勵。奧斯曼帝國完善了軍事奴隸制，并組建了更為強大的國家。所以，馬穆魯克1517年敗于奧斯曼帝國，早成定局。

## 第15章 奧斯曼帝國的運作和衰退

奧斯曼帝國以歐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權力；奧斯曼帝國完善軍事奴隸制；不穩定的土耳其國家依賴持續的對外擴展；奧斯曼制度衰退的原因；軍事奴隸制走進發展的死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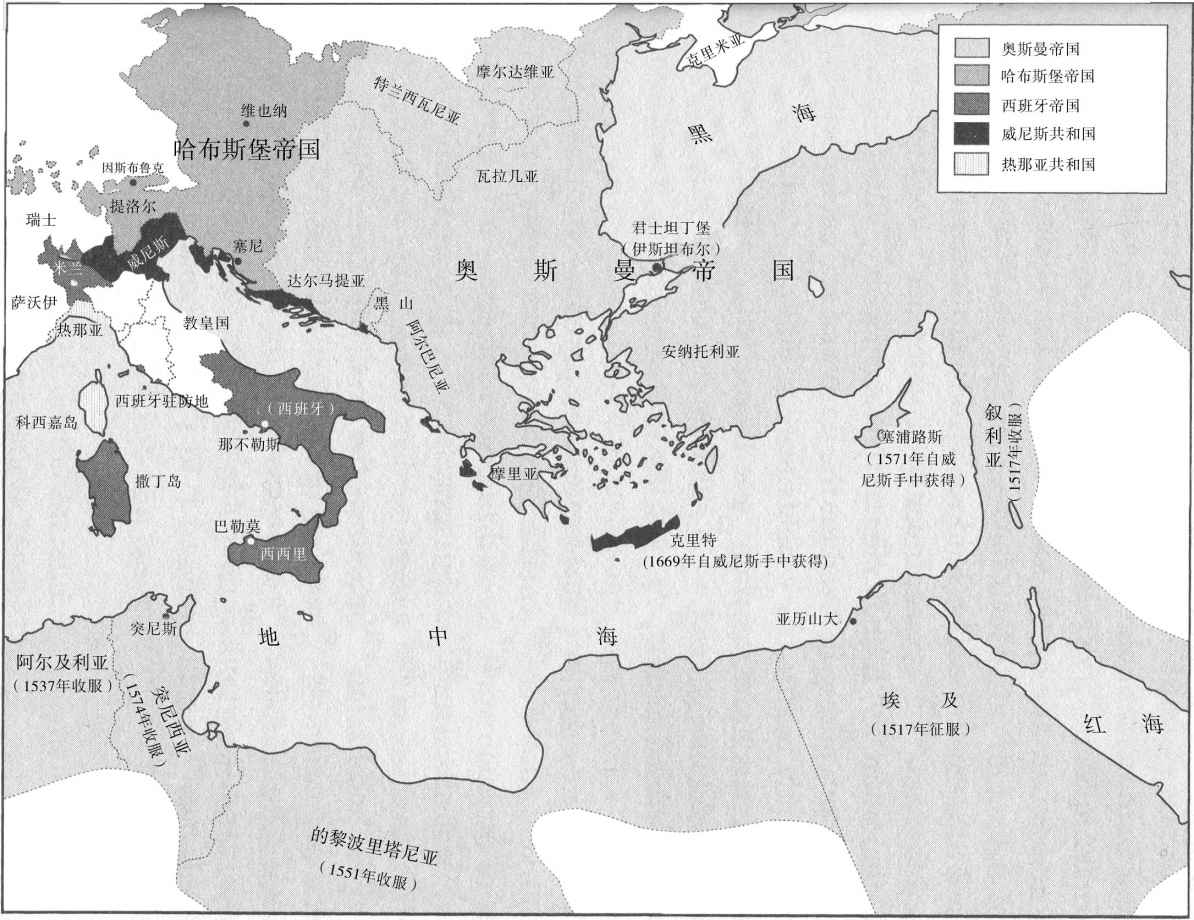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政論《君主論》寫于1513年。其時，奧斯曼帝國正處在權力的巔峰，將征服匈牙利，還將向哈布斯堡首都維也納發起首次進攻。在該書第4章中，馬基雅維利作出以下觀察：

在我們的時代，兩種各異的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國國王。土耳其整個君主政體由一人統治，其余的都是他的仆人。他將王國分割為眾多桑賈克（sanjaks，編按：相當于中國的縣或區），派去不同的行政官，可以隨意調換。而法國國王身處自古就有的領主中間，后者在國內獲得百姓的認可和愛戴，享有自己的特權，國王不可予以取消，否則會有危險。因此，無論誰在覬覦這兩個國家，你將發現很難征服土耳其，但一旦征服，維持非常容易；作為對照，在某些方面，你會發現攫取法國比較容易，但很難維持。[[1]](#m1_15)

馬基雅維利抓住了奧斯曼帝國的本質：它在16世紀早期的治理，比法國更加集中、更加非人格化，因此更加現代化。16世紀后期，法國國王攻擊地主貴族的特權，試圖創建同樣集中統一的政權。他從巴黎派遣總督（intendents）——現代地方長官的前身——去直接管理王國，像治理各桑賈克的土耳其長官貝伊（bey，縣長或區長），以取代地方的家族精英。奧斯曼帝國采用的制度與眾不同，以征募制和軍事奴隸制為基礎，建成了高度強大且穩定的國家，可匹敵歐洲其時的任何政權，治理著比阿拉伯哈里發或蘇丹所打造的任何一個都要大的帝國。奧斯曼社會與同時代的中國明朝有相似處，它們都有強大的中央國家，國家之外的社會參與者都相當薄弱，缺乏組織。（不同之處在于，奧斯曼政權仍受法律限制。）奧斯曼的國家制度是現代和家族制的奇怪混合體。家族制一旦以現代因素為代價來保護既得利益，國家制度就會衰敗。奧斯曼帝國完善了馬穆魯克的軍事奴隸制，但最終還是屈服于精英把地位和資源傳給孩子的天性。

### 僅一代的貴族

馬基雅維利所描述的行政制度，即土耳其蘇丹隨意派遣和調換去外省的行政官，其根源在于，奧斯曼帝國尚是新興的征戰朝代，沒有古老的制度可以繼承，只能創建全新的制度。蒙古人13世紀的征服把一系列土庫曼（Turcoman）部落，從中亞和中東趕到小亞細亞西部的邊境地區，使之夾在西方的拜占庭帝國和東方的塞爾柱（Seijuk，自1243年起成為蒙古伊兒汗國的屬國）蘇丹國之間。這些部落組織起來，向拜占庭發動攻擊（gaza）。領袖之一的奧斯曼（Osman）1302年在巴菲翁（Baphaeon）打敗拜占庭軍隊，因此而聲名鵲起，鶴立雞群，吸引其他邊境領袖前來投靠。于是，宛如暴發戶的邊境國家奧斯曼得以站穩腳跟。它東西出擊，以征服新領土，并向周邊的成熟國家借用現成制度。[[2]](#m2_15)



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

奧斯曼帝國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15世紀的西帕希騎士（sipahi）和其封地蒂瑪（timar，養馬的意思）。最小的封地只有一至數座村莊，其稅收只能負擔擁有馬和其他裝備的單名騎士。較大的封地叫扎美（zeamet），分配給稱為扎伊姆（zaim）的中級官員，高級官員分到的封地叫哈斯（has）。騎士或扎伊姆住在自己的封地，向本地農民征收實物稅，通常是每個農民每年上繳一車木材和飼料，再加上半車干草。該制度是拜占庭的，奧斯曼帝國只是信手拈來。像歐洲的領主，騎士也提供地方政府的功能，如安全和司法。他還要想方設法將實物轉換成現金，以支付裝備和奔赴前線的旅費。較大封地的主人被要求提供第二名騎士，包括侍從和裝備。整個制度稱作迪立克采邑制（dirlik），迪立克意即生計，這也是它的功能。其時的經濟僅取得部分貨幣化，蘇丹的軍隊由此獲得維持，無須增稅以付軍餉。[[3]](#m3_15)

地方政府圍繞桑賈克組成，包括數千平方英里和將近十萬人口。奧斯曼帝國征服新領土，便組成新的桑賈克，并實施詳盡的土地清查，列出每個村莊的人力和經濟資源，目的就是為了納稅和分配封地。起初，用于各地的規則因地制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領土的快速增加，法律和規則趨于統一。[[4]](#m4_15)桑賈克長官貝伊不是從本地招聘的，而由伊斯坦布爾的中央政府指派。跟中國的地方官一樣，他們任職三年后必須改任他職。[[5]](#m5_15)參戰時，他們又是率領自己治下的騎士軍隊的將領。[[6]](#m6_15)比桑賈克級別更高的行政區是州（beylerbeyilik），他們構成了帝國的主要區域。

如馬基雅維利承認的，迪立克制度與歐洲封建制的最重要區別在于，土耳其封地不能轉換成遺傳財產，不能傳給騎士的后裔。由于新興帝國的多數領土都是新近征服的，國家擁有大量土地（約87%在1528年獲得），封給騎士的期限只是他的一生。封地是為了換取軍事服務，如果沒有提供軍事服務，蘇丹就可收回封地。跟歐洲不同，大片封地的主人不可再作進一步的分封。騎士太老不能參與戰役，或中途夭亡時，他的封地便要上繳，被分配給新騎士。騎士的地位不可遺傳，軍人的孩子必須回歸平民。[[7]](#m7_14)在封地上耕種的農民，只有使用權，但不像他們的主人，其孩子可繼承這種使用權。[[8]](#m8_14)所以，奧斯曼帝國創造出僅一代的貴族，防止了享有資源基礎和世襲特權的強大地主貴族涌現。[[9]](#m9_14)

防止領土貴族的出現還有其他實際的原因。奧斯曼帝國經常處于戰爭，因此要求騎士在夏季前來報到候戰。所以每年有好幾個月，封地主人外出，既減輕農民的負擔，又削弱了騎士與封地的聯系。有時，騎士必須在他處過冬，妻子和孩子要在家里獨立謀生。騎士經常利用外出機會，挑上新的配偶。所有這一切都在破壞貴族與封地的聯系，而這種聯系在歐洲發展中是異常重要的。[[10]](#m10_14)

### 完善軍事奴隸制

迪立克采邑制得靠軍事奴隸制，不然就會管理失當。奧斯曼帝國以阿拔斯王朝、馬穆魯克和其他土耳其統治者的軍事奴隸制為基礎，但剔除了使馬穆魯克制度失靈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文官和軍官之間有明確差別，后者嚴格服從前者。軍事奴隸制始于蘇丹家庭的延伸，像阿尤布的馬穆魯克。但又有不像之處，奧斯曼帝國統治者一直保留對軍事奴隸制的控制，直到帝國晚期。王朝原則僅適用于奧斯曼統治者的家庭。不管職位多高，才能多大，奴隸永遠都不能成為蘇丹，或在軍事機構中創建自己的小朝廷。因此，文官政府可建立招收、訓練、晉升的明確規則，側重于建立高效的軍事管理機構，不必擔心其以軍政府名義奪取政權。

為了防止軍事機構中的小朝廷，遂定下有關孩子和遺產的嚴格規則。禁衛軍的兒子不得加入禁衛軍，在帝國早期，他們甚至不得結婚和組織家庭。皇家禁衛騎士（sipahis of the Porte）的兒子可加入騎士團隊充任侍從，但孫子絕對不可。奧斯曼帝國似乎一開始就明白，軍事奴隸制就是為了避免既得利益的世襲精英。軍事奴隸制中的招收和晉升全靠能力和服務，他們的獎勵是免稅地位和莊園。[[11]](#m11_14)神圣羅馬皇帝查理五世派駐蘇萊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宮廷的大使布斯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提及，缺乏世襲貴族的事實允許蘇丹挑選奴隸，全憑能力來提拔，“出身于牧羊人的杰出大維齊爾，歐洲評論家對他一直著迷不止”。[[12]](#m12_14)

奧斯曼帝國改善了馬穆魯克制度，將招募進執政機構的非穆斯林奴隸（askeri）與帝國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百姓（reaya）嚴格分開。后者可有家庭和財產，可將財產和土地遺傳給子孫。他們也可根據宗派附屬關系，組織成半自治的社區米勒特（millets），但不能成為執政精英的一員，不能攜帶兵器，不能當兵或在奧斯曼政府中當官。非穆斯林奴隸的干部通常每年更新，因為年年都有新招募的基督徒。他們被切斷與家庭的關聯，只對奧斯曼國家效忠，沒有行會、派別、自治協會，一切忠誠獻給統治者。[[13]](#m13_14)

### 作為治理機構的奧斯曼國家

有證據顯示，初期的奧斯曼帝國沒有實施最大化征稅。說得更確切些，他們視自己為監護人，除了較低水平的征稅，還在保護農民對抗更像有組織犯罪的精英。我們這樣說，是因為奧斯曼帝國晚期發生財政困難，蘇丹不得不大大提高征稅水平。

繼承于早期中東政權的自我約束已融入奧斯曼的國家理論。波斯薩珊王朝的庫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曾說，“如有公正和適度，百姓將生產更多，稅收將增加，國家將變得富強，公正是強國的基石”。[[14]](#m14_14)這里的“公正”意味著適度的征稅。[[15]](#m15_14)我們可能發現，這無疑是里根執政時流行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的中東版本：低稅率給予個人較多獎勵，個人因此生產較多，最后的總稅收也水漲船高。這種想法獲得早期土耳其學者的贊同[[16]](#m16_14)，并進入所謂的公平圓圈（circle of equity），由八條諺語組成：

1. 沒有軍隊就沒有皇家權力。

2. 沒有財富就沒有軍隊。

3. 百姓生產財富。

4. 蘇丹以公正統治來留住百姓。

5. 公正需要世界的和諧。

6. 世界是花園，國家是花園的圍墻。

7. 國家支柱是宗教法律。

8. 沒有皇家權力，宗教法律就失去支持。

這些諺語通常環繞一個圓圈寫下，到了第八條再輪回到第一條。這顯示，對皇家權力（第一條）來說，宗教合法性（第八條）又是不可或缺的。[[17]](#m17_14)這是一份異常簡潔的聲明，闡述軍事力量、經濟資源、公正（包括稅率）、宗教合法性的相互關系。這表明，土耳其統治者的目標不是經濟租金最大化，而是平衡了權力、資源和合法性的綜合國力最大化。[[18]](#m18_13)

與同期的歐洲君主政體相比，奧斯曼制度有個重大缺陷，因此而變得不穩定，那就是缺乏成熟的長子繼承制或其他繼承規則。按照中東的古老傳統，統治者的繼承權在上帝手中，建立繼承規則有悖上帝的愿望。[[19]](#m19_12)在繼承權未定時，不同候選人急需禁衛軍、宮廷官員、烏里瑪（ulama，教權階層）、行政機器的支持。蘇丹青春期的兒子跟導師一起去不同省城，以獲取總督的工作經驗，最靠近首都的兒子在影響禁衛軍和宮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蘇丹死后，兒子之間經常發生內戰。偶爾，蘇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搶班奪權。在這些情況下，兄弟之間的殘殺在所難免。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1595—1603年在位）奪權時，在宮殿里處決了十九個兄弟。他終止將兒子送去外省的安排，讓他們住在宮殿內特別居所，其生活宛如囚犯。[[20]](#m20_11)有人會說，這種制度確保新蘇丹將是最嚴厲最殘忍的兒子。但沒有制度化的繼承規則，往往造成致命弱點，在繼承期間容易受到外國威脅，并讓制度中的參與者獲得過度的影響力，如僅是蘇丹代理人的禁衛軍。

奧斯曼帝國混亂的繼承機制，讓人們懷疑其制度在總體上的建制化。像處理中國情形一樣，馬克斯·韋伯也把奧斯曼制度歸為家族制，而不屬于現代。如果把“家族制”定位為整個政府聽從統治者家庭，一切取決于統治者的心血來潮，奧斯曼制度確實如此。幾乎國家的所有雇員，其正式地位都是奴隸，這表明蘇丹對整個官僚機構享有絕對控制權。跟中國皇帝一樣，他可以命令處決上至大維齊爾（首相）的任何官員。蘇丹還有權更改制度上的任何規則，如蘇萊曼一世決定放松禁衛軍不得組織家庭的禁令。

另一方面，不管蘇丹在理論上的權力，他治下的政府照章辦事，所作的決定可以預測。首先，奧斯曼蘇丹受穆斯林宗教法律——伊斯蘭教法（sharia）——的束縛，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像中世紀的基督教君主，蘇丹正式承認上帝的主權和法律，他自己的權力只是來自上帝的委托。法律的監護人是龐大莊嚴的宗教機構，烏里瑪（神職學者）解說法律，主持宗教法庭，裁決家庭、婚姻、遺產和其他私人事務。對日常層次的執法，蘇丹不予干涉。私人產權和國家土地的使用權受到類似保護（參看第19章）。甚至混亂的繼承權爭斗，在一定意義上也以伊斯蘭法律為依據，其原則就是禁止長子繼承權。

奧斯曼政府照章辦事，還出于代理制的需要。絕對統治者必須將自己的權力和權威委托給代理人，這是簡單的生活常識。由于專長和能力，代理人開始營建自己的權力。這在統治像奧斯曼帝國這樣遼闊、多樣、復雜的地域時，尤其如此。

很奇怪，征募制和軍事奴隸制卻是奧斯曼帝國最現代的特征之一。在功能上，它的目標與中國科舉完全相同：都是國家非人格化招聘的來源，確保源源不斷的候選人面對激烈的選擇，只效忠于國家，與家庭和親戚沒有牽連，以攀高位。與中國相比，它比較不合理，因為它只允許外國人參與。另一方面，這種限制是為了防止家族化，可以撇開與家庭或地方藕斷絲連的本地精英。[[21]](#m21_11)

衡量國家制度現代性的另一尺度是法律和程序在帝國的統一。理所當然，中國人設下了最佳標準，很早就創造了不同尋常的統一行政制度，很少例外。奧斯曼制度則允許較多的差異，帝國的中央地區、小亞細亞、巴爾干半島開始實施相當統一的規則，如土地租佃、征稅、司法等。奧斯曼帝國強迫奴隸軍改信伊斯蘭教，但沒將自己的社會制度強加于外省的行政機構。希臘人、亞美尼亞基督徒、猶太人，雖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權利，但仍能組織半自治社區。這些社區的宗教領袖負責財政、教育、執法和其他有關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務。[[22]](#m22_11)離帝國的中心越遠，地方上的制度就越偏離核心規則。在1517年打敗馬穆魯克之后，中東的重要地區，包括埃及、敘利亞、漢志（Hejaz，現代沙特阿拉伯沿紅海的西部地區），并入帝國的版圖。馬穆魯克獲準保留自己的軍事奴隸制，但必須承認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漢志則實施自己的特殊規則，因為擁有穆斯林圣城麥加和麥地那，奧斯曼帝國現是穆斯林的監護人。

### 家族制的復辟和衰敗

奧斯曼制度的衰退歸罪于內外兩種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帝國的地理極限，以及人口和環境的巨大變化。這些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變化，不僅影響了土耳其，而且影響了所有的農業大國。內部因素包括軍事奴隸制的崩潰、禁衛軍由國家權力的工具蛻變成既得利益團體。

如我們所知，奧斯曼制度一開始就是一個征服王朝，依賴領土的持續擴張來增加稅收和封地。到16世紀30年代末，奧斯曼帝國面對兩條戰線，相隔幾乎兩千英里：在東歐與奧地利人對峙，在波斯與新近崛起的薩非王朝（Safavid）爭鋒。奧斯曼帝國雖能動員其人力的大部，但軍隊不能整年駐扎在外。以當時的技術，他們開發了先進的物流制度，但軍隊仍需在春天聚合，行軍數百英里，奔赴前線。第一次征服維也納敗北，因為軍隊抵達維也納郊外已是1529年9月27日，圍攻不到三個星期，就不得不放棄，因為軍隊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庭。類似的局限也存在于波斯前線。[[23]](#m23_11)

奧斯曼帝國為此決定全年防守匈牙利，并改善海軍，以開展地中海的軍事行動。他們繼續贏得戰利品（如塞浦路斯島和克里特島），直到17世紀中期。但是，輕易的領土征服到16世紀中已近尾聲，武裝的外部掠奪不再是經濟租金的良好來源。這給內部統治造成嚴重后果，因為更高水平的資源榨取必須來自帝國核心地區，而不是邊境地區。沒有新的基督教領土，也就減少了征募制人選的供應。

另一個外部發展是持續的通貨膨脹和人口增長，互為表里。從1489年到1616年，小亞細亞谷物的恒定銀價上升了400%。很多學者將價格上升歸罪于來自西班牙新大陸的金銀增長，但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認為，有理由說奧斯曼帝國的通貨膨脹不是貨幣事件，因為沒有找到新金銀進入奧斯曼土地的證據。實際上，政府因為白銀短缺而一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更確切地說，通貨膨脹是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長。從1520年到1580年，小亞細亞的人口增長了50%到70%。從1520年到1600年，伊斯坦布爾的人口從十萬增至七十萬。這種人口增長同時也在歐洲和中國發生，原因不明，但一定與15世紀摧毀歐亞大陸人口的瘟疫的退潮有關。戈德斯通認為這可能與氣候有關，再加上人類由此而增強的免疫力。[[24]](#m24_11)

這些變化大大影響了奧斯曼帝國的制度，通貨膨脹使采邑制度愈來愈靠不住。采邑的騎士靠土地生活，但另有土地和軍事裝備的貨幣開支，現在變得不堪忍受。很多人拒絕參與戰役，另外的干脆放棄封地，開始組成掠奪農民和地主的強盜幫派。駐扎在城市的禁衛軍，為應付開支，獲準從事手藝人或商人的民間職業，這模糊了奴隸和百姓之間的明顯界限。有些禁衛軍當上財政官員，操縱采邑登記以謀私利，或授予自己土地，或分配土地給百姓以換取賄賂。[[25]](#m25_11)

16世紀晚期，中央國家也面對財政危機。火器的引進使曾是15世紀奧斯曼部隊支柱的騎士變成老皇歷，國家必須以騎士為代價迅速擴充步兵。從1527年到1609年，禁衛軍的人數從五千增至三萬八千，再增至1669年的六萬七千五百。此外，政府開始招募無地農民（sekbans）充任臨時火槍手。[[26]](#m26_10)不像自我負擔的舊騎士，這些新式步兵需配備現代武器，領取現金薪水。所以，政府急需將征稅得來的實物，轉換成已是經濟交易基礎的現金。騎士人數的跌幅相當于步兵人數的漲幅，放棄的采邑現在租給私人經營者，出身于非奴隸的稅務承包商向他們征收現金。先前，政府約束對農民的剝削，現在為應付財政收入的燃眉之急，也就顧不上了。[[27]](#m27_8)

考慮到財政困境，軍事奴隸制的規則受到腐蝕也許是不可避免的。根據馬穆魯克的經驗，阻止奴隸軍人將地位和資源傳給孩子的規則很難執行，因為這有悖人性。奧斯曼帝國的原始制度非常嚴格，規定禁衛軍堅持獨身，不得組織家庭。但在制度內部，一直有放松規則的壓力。當遇上與日俱增的財政壓力時，政府只得作出讓步。這一過程始于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12—1520年在位）和蘇萊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先允許禁衛軍結婚和組織家庭。隨之，這些禁衛軍又向宮廷施加壓力，允許他們的兒子加入軍隊。這發生于塞利姆二世（Selim Ⅱ，1566—1574年在位）時期，設立了專收禁衛軍兒子的定額。蘇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在1638年正式廢除征募制，這等于確認了禁衛軍子承父業的納新制度，甚至百姓也被允許加入軍人階層。[[28]](#m28_6)晉升不再依據規則，愈來愈靠國家制度中的私人關系。以前局限于宮廷政治的家族制，現在擴散到整個體系。[[29]](#m29_6)

跟布爾吉馬穆魯克一樣，將禁衛軍與蘇丹綁在一起的道德關系也受到蛀蝕，他們全神貫注于自己的福利和家庭，變成一個為己謀利的利益團體。紀律趨于崩潰，禁衛軍開始定期在首都發動騷亂，以抗議薪酬的拖欠或鑄幣的貶值。跟馬穆魯克相似，他們與民用經濟掛鉤，收購商業，或提取被人遺棄的采邑的租金。[[30]](#m30_5)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奧斯曼帝國從17世紀初開始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事實上它還維持了三百多年，直到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運動。奧斯曼帝國仍能展示令人驚訝的精力，例如17世紀的下半世紀，科普魯律（Köprülüs）大維齊爾得以在帝國的中央省恢復秩序，在地中海繼續擴張，征服克里特島，并于1683年再一次向維也納發起進攻。[[31]](#m31_5)但這次中興又遭逆轉。什葉派的薩非王朝在波斯崛起，導致什葉派和遜尼派的長期戰爭。奧斯曼帝國鼓勵在全國貫徹遜尼派的正統觀念，并杜絕外部新思想。它發現自己愈來愈無法趕上鄰近歐洲帝國在技術和組織上的革新，從而不得不割讓領土，每隔十年再來一次。雖然如此，土耳其仍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打敗英國人，進入20世紀時，繼續是歐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 奧斯曼帝國的遺產

奧斯曼帝國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權。他們憑借自己創造的制度基礎，集中權力，其規模在那個地區是空前的。他們在異常短暫的時間內，從部落過渡到國家層次的社會，然后發展了具有顯著現代特征的國家制度。他們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和軍隊，以非人格化的擇優標準，挑選和晉升有限的外國招聘對象。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東社會的部落機構的局限。

此外，奧斯曼帝國創造了可從中央遙控的省級行政制度。通過這個制度，他們實施相對統一的規則，確定經濟的日常運作，維護遼闊帝國的治安。不像歐洲的封建主義，奧斯曼帝國從沒允許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貴族涌現。所以，不像早期現代的歐洲君主，蘇丹也無需向貴族討回權力。奧斯曼帝國的制度，比15世紀同期的歐洲政治組織更為成熟和先進。

就集權和支配社會的能力而言，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比較不像同期的歐洲國家和印度次大陸上建立的本土國家，而更接近于中華帝國。跟中國類似，它只有很少獨立于國家的組織良好的社會團體。如馬基雅維利所注意到的，沒有古老的貴族血統，沒有獲得憲章的獨立商業城市，沒有民兵組織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莊沒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會規則組織起來。

奧斯曼國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驅者，其不同于中國之處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機構，至少在理論上獨立于國家。它能否限制國家的集權，說到底，取決于宗教權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21章討論法治起源時，將回到這一題目。）

就全球的政治發展而言，作為奧斯曼帝國核心力量的軍事奴隸制只是一條死胡同。它的產生基于一種擔憂，同樣的擔憂促使中國人發明了科舉制度。今天，中國科舉制度的實用等同物都在應用之中，不管是現代歐洲和亞洲的官僚招聘，還是美國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和法國的高中畢業會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軍事奴隸制作為一種制度已從世界政治舞臺消失，不留任何痕跡。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從未認為它是合法的。問題不在奴隸，眾所周知，直到19世紀西方都視奴隸制為合法制度。歐洲人或美國人所無法想象的，是奴隸后來又變成政府高官。

從14世紀到16世紀，軍事奴隸制充任奧斯曼帝國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對各種內部矛盾，不能幸免于16世紀晚期帝國面臨的外部變化。奧斯曼帝國從沒發展出本土的資本主義，不能長期取得持續的生產力增長，所以只能依賴粗放式增長來增加財政資源。經濟和外交的政策失敗，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無法承受。它繼續生存于20世紀，多虧了創新的蘇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改用西方制度。但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權，繼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國則依據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則。

##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觀念

令歐洲退出親戚關系的是宗教，不是政治；對歐洲家庭性質的普遍誤會；天主教會摧毀延伸的親戚團體；英國個人主義甚至在歐洲也屬極端

我迄今所敘述的世界三個地區，其國家制度都自部落社會脫穎而出。中國、印度和中東的早期社會組織，都以父系家族的血統為基礎，建立國家是為了克服部落社會的局限。每一個案例中，建國者想方設法讓個人忠于國家，而不是忠于地方上的親族團體。以領土和中央合法統治權力為基礎的制度，不得不重疊在頑固的分支式社會之上。最極端的對策來自阿拉伯和奧斯曼帝國，他們綁架兒童，使之在人造家庭中長大，只忠于國家，不忠于自己的親戚。

但在這些案例中，不讓親戚關系成為社會組織基礎的建國努力，自上而下，都歸于失敗。事實上，這些社會的制度發展歷史，大多涉及親族團體的重新問政——我稱之為家族制復辟。所以，秦朝和西漢所創建的非人格化國家制度，在東漢崩潰時又落到強大宗族手中，這些家庭繼續成為中國政壇中的重要角色，直到隋唐。印度在創建強大的非人格化制度上，一開始就成績平平，以分支式迦提組織起來的印度村莊，其社會生活大體上又與這些制度毫不相干。土耳其國家是最為成功的，在小亞細亞和巴爾干半島的心臟地區削弱了部落組織的影響，但在治理不嚴的阿拉伯省卻不如人意。事實上，奧斯曼帝國在邊遠的貝都因（Bedouin）社區，僅行使非常有限的統治，其部落組織至今保持原樣。所有這些地區——中國、印度、中東——家庭和親戚團體至今仍然強大，成為社會組織和身份的來源，遠遠超過歐洲或北美。在中國臺灣和南方地區尚有成熟的分支世系家族，印度婚姻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的結合。部落的依附關系在阿拉伯中東無所不在，尤其是在貝都因的群體中。

### 例外的歐洲

歐洲的親戚關系采納不同形式。人口統計學家約翰·哈吉那爾（John Hajnal）在1965年的文章中注意到，西歐婚姻模式與世界上幾乎任何其他地方形成強烈對照。[[1]](#m1_16)西歐男女傾向于晚婚，從總體上講，不結婚的比率較高，這兩個因素導致相對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輕女子參加工作，家庭中有更多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較多機會獲取財產。這不僅是當代現象，哈吉那爾把這種模式的時期定在1400年到1650年。

西歐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差異也很突出。共同祖先的親戚團體所組成的社區，其在歐洲的消失遠遠早于哈吉那爾所指出的。對歐洲人而言，親戚和后裔很重要，特別是國王和貴族，他們有實質性的經濟資源傳給子孫。但跟中國貴族不同，他們沒有陷入表親的專橫，因為分割遺產和長子繼承權的原則早已深入人心。在中世紀，歐洲人享有更多自由，無須征得大批親戚的同意，便可任意處置自己的土地和動產。

換言之，歐洲社會很早就是個人主義的。在婚姻、財產和其他私人事務上，當家做主的是個人，而不是家庭或親戚團體。家庭中的個人主義是所有其他個人主義的基礎。個人主義無須等待國家的出現，無須等待它來宣告個人法律權利，并行使強制權力來予以保障。更確切地說，個人已在享受實質性的自由，無須承擔對親戚的社會義務，先有這樣的社會，再來建起國家。在歐洲，社會發展走在政治發展的前列。

歐洲何時退出親戚關系？如果不是政治，轉型動力何在？前者的答案是：蹂躪羅馬帝國的日耳曼部落，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開始退出。后者的答案是：天主教會。

### 馬克思的錯誤

很明顯，現代歐洲人的祖先都曾組成部落。他們的親戚關系、法律、習慣、宗教實踐，只要能找到的，19世紀偉大的歷史人類學家都已作了詳細記載，如甫斯特爾·德·庫朗日、亨利·梅因[[2]](#m2_16)、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弗雷德里克·梅特蘭（Frederic Maitland）[[3]](#m3_16)、保羅·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他們是比較人類學家，掌握不同文化的淵博知識，為父系親戚組織之間的相似而感到吃驚。那些組織分布于世界各地，如印度、希臘、日耳曼的社會。[[4]](#m4_16)

19世紀的歷史人類學家相信，親戚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化，人類社會有普遍的發展模式，從親戚團體的大集團，轉向個別男女自愿結合的小家庭。梅因有個著名概念：現代化涉及從“身份到契約”的過渡。[[5]](#m5_16)換言之，早期社會將社會地位賦予個人，安排一切，從婚配、職業到宗教信仰。相比之下，現代社會的個人可隨意與人簽約，走進不同社會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合同。但梅因沒有提出一種動態理論，以解說過渡是何時和如何發生的。

實際上，對歐洲親戚模式的過渡時間和過渡原因存在很多誤解。很多人相信，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類似，歐洲人始終居住于部落或龐大的家庭團體，一直到工業革命。其時，機器生產的壓力和社會流動的必要性，才將之打破。根據這個見解，工業化帶來經濟變化和核心小家庭出現，都屬于這同一過程。[[6]](#m6_16)

這個見解很可能來自早期現代化理論。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促使資產階級興起的，依次是技術革新和物質生產方式的變化。馬克斯·韋伯指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之間有嚴重斷裂。傳統社會的特征是：廣泛的親戚關系，宗教或親戚的約束對市場交易設限，缺乏個人社會流動性，基于傳統、宗教、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會規范。而現代社會是個人主義的、平等的、以優秀和市場為導向的、流動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權威組建起來。韋伯主張，這些特征屬于一個整體，如果由教士指定價格，或財產受親戚義務束縛，這樣社會就不能發展出高效的市場經濟。他相信，這種理性的現代化僅在西方出現，并把向現代化的過渡定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認為，經濟變化促使個人主義和核心小家庭的興起，而韋伯則把基督新教當作主要動力。總之，依他們看，這個變化僅有幾百年歷史。

### 從身份到契約

20世紀的社會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把從身份到契約的過渡一直往前提。我已提及，哈吉那爾認為歐洲的特殊模式始于15世紀和16世紀。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對英國個人主義起源的研究顯示，生前任意處置財產和死后在遺囑中剝奪子女繼承權，早在16世紀初就獲得英國普通法的承認。[[7]](#m7_15)這很重要，因為他所標志的“農民社會”中，如東歐和世界大部分區域，親戚義務大大限制了業主出售土地的能力。農民社會的特征就是大家庭，產權要么共有，要么陷于親戚的相互依賴之中。這樣的社會中，許多非經濟因素把農民牢牢綁在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諸如祖先葬于此之類的理由。

但麥克法蘭注意到，土地所有權（seisin）流行于英國，至少還要往前再提三個世紀。根據一項研究，15世紀晚期英國某區的地產轉戶中，生前贈與家人的占15%，死后遺贈給家人的占10%。[[8]](#m8_15)更早的是12世紀末13世紀初，英國的佃戶（villeins，不得隨意離開土地）無須獲得領主的許可，已在購買、出售、出租土地。[[9]](#m9_15)

如要衡量復雜親戚組織的衰退，就要考量女子擁有和處置財產的法律權利。父系家族的社會中，女子嫁與宗族中的男子，或給宗族生下男性后裔，方才取得法律地位。寡婦和未婚女兒有分享遺產的權利，但通常必須將宗族的財產留在父系家族中。1066年的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不久，英國女子就可自由擁有和處置財產，并可將之賣給外人。至少從13世紀起，她們不但可擁有土地和動產，而且可起訴他人，或被他人起訴，甚至可簽署遺囑和合同，無須征得男子監護人的許可。父系社會一旦承認這種權利，就會破壞宗族控制財產的能力，從而破壞社會制度的整體。[[10]](#m10_15)所以，女子擁有和遺贈財產的能力是部落組織退化的標志。它顯示，嚴格的父系社會規則已經消失。

根據麥克法蘭，早期英國個人主義的一個有趣標志是“扶養合同”。它最早出現于13世紀，由孩子和父母簽署。共同祖先的后裔團體所組成的部落社會，通常崇拜共同祖先。儒家道德的大部分涉及孩子照料父母的義務，尤其是兒子。儒家道德家講得很清楚，對父母的義務大于對自己孩子的，中國法律嚴懲不孝子女。

英國的習俗卻不同，父母活著時，如把產權愚蠢地轉移給孩子，就得不到慣例的剩余權利。中世紀有一首詩歌，描述了父親將財產移交給兒子的故事：兒子后來覺得扶養父親的負擔太重，便開始施以虐待。一天，父親冷得直打寒戰，兒子叫孫子送去一只麻布袋，“小男孩把麻布袋一割為二，一半留給爺爺，另一半帶回給父親。他的意思是，現在父親虐待爺爺，等到自己長大，也會如法炮制，給他半個麻布袋以御寒”。[[11]](#m11_15)為了避免如此的困境，父母與孩子簽署扶養合同，規定孩子在繼承父母財產后所承擔的扶養責任。“貝德福德的一對夫婦在1294年放棄財產，作為回報，將得到食物、飲料、主屋的居住；如果兩對夫婦發生爭吵，老夫婦會搬到另外房子，將在圣米迦勒節（Michaelmas）獲得五十六蒲式耳的谷物，其中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麥，十二蒲式耳的大麥，十二蒲式耳的大豆和豌豆，八蒲式耳的燕麥。此外，他們還將得到這另外房子的一切，可動的和固定的。”[[12]](#m12_15)

讓馬克思暴跳如雷的“純粹的金錢關系”，似乎不是18世紀資產階級的發明，其在英國的出現比資產階級的興起早了好多世紀。將父母寄放在療養院，在西歐有很深的歷史根源。這顯示，與馬克思的主張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只是社會關系和習俗變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說歐洲在13世紀離開復雜的親戚關系，即從身份過渡到契約，這依然太遲。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注意到，封建主義在9至10世紀興起之前，親戚關系是社會組織的基礎。部落宗族之間的血親復仇在歐洲社會有悠久歷史，我們對此很熟悉，只要看看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知道了。此外，布洛赫證明，在那段時期，親戚團體或龐大家族共同擁有財產，即使個人已開始隨意處置土地，賣主仍需獲得親戚團體的同意。[[13]](#m13_15)

不過，布洛赫提示，可以追溯到像中國、印度、中東那樣單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很久以前就在歐洲消失了。“羅馬家族視男性后裔為絕對重要，立場異常堅定。但此事到了封建時代，已變成聞所未聞。”作為證據，他指出，中世紀的歐洲人從不單憑父親來追溯他們的后裔；而在部落社會中，為了維持宗族分支的界線，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母親讓女兒冠母姓是很普遍的，這在中國那樣的父系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個人經常認為自己屬于兩個相互平等的家庭，母親的和父親的。兩個杰出家庭的子孫往往合并兩個宗族的姓氏（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其中季斯卡和德斯坦都是姓氏[編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系法國前總統，1974—1981年任職]。今日西班牙人喜用父母的雙姓）。到13世紀，類似當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歐洲遍地開花。血親復仇很難繼續，因為報仇圓圈變得越來越小，很多人覺得，自己與爭論雙方都有關聯。[[14]](#m14_15)

在布洛赫看來，某種意義上，封建主義的整個制度可被理解為迫不得已的調整，這是為了適應社會上的隔絕，因為親戚關系不再是社會團結的來源。自7世紀晚期起，歐洲遭受了一系列外國侵略者的蹂躪：來自北方的維京人、來自南方借道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Saracens）、來自東方的匈牙利人。即使阿拉伯人受挫于圖爾戰役，穆斯林對地中海的控制仍然切斷歐洲與拜占庭和北非的貿易，它曾是羅馬經濟的基礎。[[15]](#m15_15)隨著卡洛林帝國（Carolingian）在9世紀的式微，城市也開始凋零，受無數軍閥騷擾的居民撤回自給自足的村莊。

在這歐洲文明的最低點，由于更大政治結構的倒塌，親戚關系試圖卷土重來。但其時，歐洲的父系宗族結構已變得如此脆弱，以致不能成為社會支持的來源。封建主義興起，成為親戚關系的替代：

暴力氣氛所孕育的無數危險，時時都在威脅個人。甚至在封建的初期，親戚團體似乎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根據它們當時存在的形式，這些團體的范圍太模糊，太多變。父母都可界定后裔這種二元性，更造成了深刻的破壞。這就是為什么，人們被迫尋求或接納其他的紐帶。在這點上，歷史是決定性的。仍有強大父系團體的地區——北海邊上的日耳曼地區和英倫島上的凱爾特地區——對屬臣、采邑、莊園一無所知。親戚關系只是封建社會的必要元素之一，它的相對孱弱解釋了封建主義的出現。[[16]](#m16_15)

封建主義是指，個人自愿屈服于無親戚關系的他人，僅僅是以服務交換保護。“國家和家庭不再提供足夠的保護，村莊的社區僅能維持界線之內的秩序，城市的社區幾乎不存在。各處軟弱者覺得有必要獲得強人的庇護，而強人必須通過說服或強制來獲得簽約下屬的支持，以保障自己的威望、財富、人身安全。”[[17]](#m17_15)

但我們還沒算出歐洲脫離親戚關系的日期，以及合適的因果關系。[[18]](#m18_14)社會人類學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為過渡日期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釋。他把過渡的起點提至6世紀，將責任放在基督教身上——具體地說，放在天主教會的機構利益上。[[19]](#m19_13)

古迪注意到，羅馬帝國結束時，與眾不同的西歐婚姻模式從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來。包括羅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屬于嚴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會，具有分支式的社會組織。父系團體傾向于同族通婚，有些更偏愛交叉表親的婚姻。（我在第11章提及，交叉表親的婚姻在印度南部的達羅毗荼文化中非常流行，在阿拉伯世界、普什圖人[Pashtuns]、庫爾德人、眾多突厥人中也很普遍。）男女有嚴格的分隔，女子擁有財產或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很少。在所有這些方面，西歐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分配遺產時男女都有份、禁止交叉表親的婚姻、提倡異族通婚、女子有更多的產權和參與權。

天主教會促動了這一分化，它極力反對四種行為：與近親結婚、與兄弟的寡婦結婚（levirate，即所謂的兄終弟及或夫兄弟婚）、領養孩子、離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紀敦使異教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皈依基督教，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報告此事時就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譴責部落實行的與近親和兄弟的寡婦的婚姻。后來的教堂法令禁止納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0]](#m20_12)

古迪認為，這些禁令并不直接依據《圣經》或基督教經典。被禁的行為在耶穌誕生的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耶穌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親的婚姻，與兄弟的寡婦結婚在猶太人中也很流行。事實上，基督教福音是反家庭的：在《馬太福音》中，耶穌說，“愛父母超過愛我的人，不配我；愛子女超過愛我的人，也不配我”。古迪又稱，這些話語來自宣稱耶穌將統治塵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試圖招募人們離開安全的親戚團體，進入新興的分裂教派。贊成禁令的神學觀點則經常來自《舊約》，猶太人對此卻有不同見解。

根據古迪，教會堅持這個立場的原因，與其說為了神學，倒不如說為了教堂自己的物質利益。交叉表親的婚姻（或任何其他近親的婚姻）、與兄弟的寡婦結婚、納妾、領養孩子、離婚都是他所謂的“繼承策略”；借此，親戚團體得以繼續控制代代相傳的財產。其時，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壽命低于35歲。夫婦生下兒子、長到成人、再一次傳宗接代的可能性相當低。因此，為了讓人們得以孕育繼承人，社會提供各式合法途徑。討論中國時，已解說過納妾一事。在一夫一妻的社會，離婚可被視作變相納妾。哥哥在生孩子之前就已去世，嫂子就與弟弟結婚，以確保哥哥的財產將與弟弟的融合在一起。交叉表親的婚姻能保證家產留在自家人的手中。無論什么情形，教會有計劃地切斷將財產傳給后裔的各種途徑。同時，它又強烈提倡信徒向教會自愿捐出土地和財產。擁有財產但無繼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得益的便是教會。[[21]](#m21_12)

西歐女子相對較高的地位也是教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外結果。寡婦若在家庭團體內重新結婚，會將財產歸還部落。教會盡量使之難以實現，所以她本人必須擁有財產。女子有權擁有和處置自己的財產，對教會大有裨益，無子女寡婦和老處女變成了捐獻的一大來源。女子有權擁有財產破壞了單傳原則，從而敲響了父系宗族的喪鐘。[[22]](#m22_12)

規則發生變化后的數世紀中，天主教會在財政上非常成功，這絕對不是牽強附會。7世紀結束之前，法國富饒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會手中；從8世紀到9世紀，在法國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會財產翻了一番。[[23]](#m23_12)這些捐獻使教會成為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很強大的機構，為格里高利七世的敘任權斗爭（investiture conflict）鋪平道路（見后文第18章）。這些捐獻，跟富裕穆斯林給伊斯蘭慈善事業瓦克夫的捐贈有相似之處，但后者主要是富人避稅和遺贈子女的對策。而在天主教的歐洲，無子女寡婦和老處女所捐出的土地，則沒有附帶任何條件。教會因此發現自己成了大地主，在歐洲各地管理莊園，監督農奴的經濟生產。這幫助教會履行其賑濟饑民和照顧病人的使命，使教士階層和男女修道院的大幅擴充成為可能，也使內部規則和等級制度的發展變得必不可少。這一切讓教會在中世紀的政治舞臺中成為一名獨立角色。

這些變化對西歐的部落組織構成相當大的破壞。日耳曼、挪威、馬札爾（Magyar）、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僅在兩代或三代的時間就見證了其親戚架構的解散。事實上，這種皈依植根于政治，如馬札爾國王伊斯特萬（István，或St. Stephen）在1000年接受圣餐。但社會風俗和家庭規則中的實質性變化，不靠政治當局，而靠運作于社會和文化層次的教會。

### 歐洲建國的社會背景

歐洲（以及其殖民地）是個例外，因為它脫離復雜的親戚關系，首先在社會和文化層次，而不在政治層次。在某種意義上，教會采取政治行為，更改了婚姻和遺產的規則，但其動機卻是經濟的。教會不是其所在領土的主權統治者，更確切地說，只是一個社會參與者，它的影響只在制定文化規則。因此，中世紀時，歐洲社會已經非常個人主義了。它早于歐洲國家建設的開端，比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更早了數個世紀。家庭中的變化，與其說是這些現代化巨變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促進現代化發生的有利條件。16世紀在意大利、英國、荷蘭興起的資本主義，不必去克服印度和中國那樣的親戚大集團的抵抗，后者亟欲保護自己擁有的實質性財產。相反，資本主義在那些社會順利扎根，它們已有私人產權的傳統，財產經常在陌生人之間轉手。

這不是說，歐洲的建國者一帆風順，沒有遇上既得利益的社會建制。恰恰相反，我們在第21章繼續講述歐洲國家起源時，將看到各式強大的社會參與者，他們在創建法治和負責制政府方面至關重要。雖然沒有氏族或部落，但有既得利益的貴族，他們在封建時期積累下了財富、軍隊、法律地位。

這些社會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親戚關系。這一事實，對后世的歐洲政治發展來說，造成了重大差別。屬臣的封建關系是強者和弱者自愿簽署的合同，規定了雙方的法律義務。它將高度不平等和等級化的社會形式化，但也為個人主義（簽署合同的是個人而不是親戚團體）和法律人的理解樹立先例。歷史學家杰諾·蘇克斯（Jenö Szücs）認為，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到1200年便獲得契約特征，從而打下了將尊嚴擴充到農民階層的基礎。自那以后，“西方每一次農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違反合同所激怒的尊嚴，都在訴求自己的‘自由’權利”。[[24]](#m24_12)但這種事沒有發生于下列社會：土地產權以親戚關系和慣例為基礎的，或以某親戚團體稱王稱霸于另一親戚團體為基礎的。

以封建制度替代親戚關系建制，對地方治理的功效而言，另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宗族和封建制度都在不同時期發揮主權和統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中央國家式微時。它們都可提供地方安全、司法和經濟生活的組織。但封建制度更為靈活，因為依據的是合同，更能組織決定性的集體行動，因為其等級分明。跟宗族中的權威不同，封建領主的權利一旦獲得合法確認，便不需要持續的重新談判。財產的法律文件，無論在強者或弱者的手中，都代表自由買賣的權利，不受基于親戚的社會制度的限制。地方上的領主可“代表”社區講話，但部落領袖做不到。如我們所知，歐洲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經常犯的錯誤，就是假設部落領袖相當于封建社會的地方領主。在事實上，兩者截然不同。

馬克斯·韋伯的遺產之一，就是以價值概念來考量宗教對政治和經濟的影響。他的新教工作倫理（work ethic），據說通過工作的神圣化，而直接影響工業革命中企業家的行為。價值肯定是重要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基督原則，使女子更容易獲得擁有財產的平等權利。

但此類解釋經常引申新的疑問，為何有些宗教價值首先在社會中獲得提倡，并深入人心。教會攻擊延展的親戚關系，就是一例，這些價值并不起源于基督教原則。畢竟，同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東正教，并沒有設法改變婚姻和遺產的法律。所以，緊密相關的親戚社區在拜占庭統治的地區存活很久。例如，塞爾維亞代代相傳的著名鄉村團體“雜住蓋”（zadruga），以長期血親復仇著稱的阿爾巴尼亞氏族。這些建制消失于西歐，歸功于教會的物質利益和權力。教會對社會價值的控制，變成了為己謀利的工具。從這個角度看，經濟龜站在宗教龜的上面；但從另一角度看，宗教龜又站在更為底下的經濟龜上。

不管其動機是宗教的，還是經濟的，天主教會變成了獨立的政治參與者，其建制化的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社會的宗教權力。中國從沒發展出超越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的本土宗教。相比之下，宗教發明一開始就塑造了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成為政治權力的重要制衡。但在伊斯蘭教遜尼派的世界，以及印度次大陸，宗教權力從沒凝聚成國家之外的中央官僚機構。它只在歐洲出現，與現代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今天所謂的法治的出現又密不可分。

# 第三部分 法治

##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法律在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作用凸顯歐洲的例外；法治的定義和爭論；法律優先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論；英國普通法依據皇家權力來加強國家的合法性

歐洲的政治發展是個例外。歐洲社會得以較早脫離部落組織，卻沒有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力。歐洲例外還表現在，其早期建國者的杰出能力，與其說是在軍事上，倒不如說在分配正義上。歐洲國家權力和合法性的增長，與法治的涌現密不可分。

早期歐洲國家分配的只是正義，不一定是法律。法律植根于他處，或在宗教（像上一章所討論的有關婚姻和家庭的法令），或在部落和其他社區的習俗。早期歐洲國家偶爾立法——即制定新法律——但其權力和合法性更多依賴公正執法，所執的法無須是自己訂出的。

弄清法律和立法之間的差異，對理解法治是至關重要的。似乎有多少法律學者，就會有多少“法治”的定義，很像“民主”這個字眼。[[1]](#m1_17)我所使用的，符合思考此一現象的西方重要潮流：法律是凝聚社區的有關正義的一組抽象規則。在前現代社會，制定法律的權威據信是超凡的，或神權，或古老習俗，或自然。[[2]](#m2_17)另一方面，立法屬于現在所謂的制定法（positive law），它在發揮政治權力的功能。就像國王、男爵、總統、立法院、軍閥，憑借自己的權力和權威，在制定和執行新的規則。如果有高于任何立法的現存法律，方能說有法治的存在。這意味著，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必須接受法律的束縛。這不是說，立法機構不可制定新法，它們如想在法治中發揮作用，必須依據現存法律的規則來制定新法，不可隨心所欲。

法律的最初理解，即制定者是神權、古老習俗或自然，指的是人們不得更改法律，但可以為特殊情境作出妥善解釋，有時還是必須的。現代時期，隨著宗教權威的走低，自然法信徒的銳減，我們開始將法律視作人造的東西，但必須經過嚴格程序，以確保它符合基本規則的廣泛共識。法律和立法之間的差異，現在相當于憲法和一般法律之間的差異。前者具有更嚴格的要求，例如絕大多數人的投票同意。在當代美國，這表示國會通過的新法律，必須符合現存的更為重要的憲法，一切以最高法院的解釋為準。

迄今為止，我討論了政治發展中的建國以及國家集中和使用權力的能力。法治是政治秩序中的另一組件，以限制國家權力。對行政權力的最初制衡不是民主集會或選舉，而是人們堅信統治者必須依法行事。所以，國家建設和法治一直在緊張氛圍中共存。一方面，統治者在法律范圍內行事，或以法律的名義行事，這可提高自己的權威。另一方面，法律可防止他們做隨心所欲的事，不能只考慮私人利益，還要考慮整個共同體的利益。所以，政治權力的欲望經常威脅法治，從17世紀避開議會自籌稅收的英國國王，到20世紀以法外行刑隊來對付恐怖主義的拉丁美洲政府，皆是如此。

### 法治的現代迷惑

在當代發展中國家，最大政治缺點之一就是法治的相對軟弱。當代國家的所有組件中，高效法律機構也許是最難構建的。軍事和征稅的機構，天然來自人類基本的掠奪本能。軍閥組織民兵向社區榨取資源，這并不困難。在另一極端，民主選舉的安排也相對容易（只是比較昂貴），何況今天還有國際組織的援助。[[3]](#m3_17)但法律機構必須遍布整個國家，持續不斷，長期運作。它們需要設施，投資于律師、法官及法庭其他職員的訓練，還有最終執法的警察。但最重要的，法律機構必須被視作合法和權威的，不僅在普通人眼中，而且在更有力的精英眼中。做到這一點，證明是頗不容易的。今天，拉丁美洲絕大多數國家是民主的，但其法治卻非常軟弱，到處是收賄的警官和逃稅的法官。俄羅斯聯邦仍舉行民主選舉，自總統而下的精英都違法亂紀，肆無忌憚，尤其是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當政之后。

有很多文獻，將法治的建立與經濟發展掛起鉤來。[[4]](#m4_17)這些文獻從根本上反映出一條重要觀點，即現代資本經濟世界的涌現，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既存的法治，缺乏高效的法治是貧困國家不能取得較高增長的主要原因。

但這些文獻非常混亂，在法治的基本定義和它的存在與否上，前后又不一致。此外，將法治的不同組件與經濟增長掛鉤的理論，其實證經驗有點靠不住；將它投射到馬爾薩斯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困惑只會加倍。我們在講法治起源的歷史之前，需要清除一下當代討論所留下的累贅。

經濟學家談論法治時，通常指現代產權和合同執行。[[5]](#m5_17)現代產權是指個人擁有的財產，可自由買賣，不受親戚團體、宗教當局、國家的限制。經濟增長受產權和合同的影響，這理論非常直截了當。沒人會做長期投資，除非知道自己的產權是安全的。如果政府突然對某種投資增稅，像烏克蘭在20世紀90年代簽署移動電話基建協議后所作的，投資者可能會在中途改弦易轍，并對將來項目心灰意冷。同樣，貿易需要法律機構來維持合同，裁判合同雙方不可避免的爭執。合同的規則越透明，合同的維持越公正，就會鼓勵越多的貿易。這就是為何很多經濟學家強調，“可信承諾”是國家制度發展的重要標志。

這個法治定義與本章開頭的那個略有重疊。顯而易見，如果政府覺得自己在各方面都享有主權，不受既存法治的束縛，那么無人可阻止它充公自己公民或外國貿易伙伴的財產。如果普遍的法律規則，一旦牽涉到強大的精英階層或最強大的政府本身，就無法得到執行，那么產權或貿易的安全可能只是空頭支票。政治學家巴里·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注意到，強大的國家既可保護產權，也可取消產權。[[6]](#m6_17)

另一方面，有“足夠好”的產權和合同執行，允許經濟的發展，但沒有真正的法治（即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意思），這完全可行。[[7]](#m7_16)……中國經濟取得三十多年的兩位數增長，并不需要“法治”的抽象承諾。1978年，共產黨以包產到戶的法律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沒有恢復中國農民的現代產權（個人轉讓土地的權利）。更確切地說，他們只獲得可遺傳的土地使用權（長期租賃權），類似于奧斯曼帝國中央省的農民。這些權利已經“足夠好”，導致農業產量在改革后的四年功夫翻了一番。

古代帝制中國沒有法治。另一方面，正常時期的中華帝國很可能在地方層次享有“足夠好”的產權，至少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到其時技術所容許的極限。那時的產權與今天中國農民的產權相比，不會相差很多，與其說受到掠奪性國家的約束，倒不如說受到親戚關系的約束。父系宗族將無數的權利和習俗強加于財產之上，一直到20世紀的中華民國，家庭仍有權利限制土地的出售。[[8]](#m8_16)

此外，不是很清楚，最好的現代產權足以在實質上提高生產效率，還是足以在馬爾薩斯式社會中創建出現代資本主義。確保技術持續進步的其他建制（如科學方法、大學、人力資源、研究實驗室、鼓勵探險和試驗的文化氛圍，等等）尚未問世時，單憑良好產權所創造的生產效率增長仍然有限，因此不能假設技術的持續進步。[[9]](#m9_16)

所以，經濟學家對法治下現代產權和合同執行的強調，可能有兩個錯位。首先，在技術持續革新的當代世界，雖然沒有至高無上的法治，“足夠好”的產權仍足以創造高度的經濟增長。其次，在馬爾薩斯式世界中，即使有現代產權和法治的存在，還是無法取得如此的增長，因為限制增長的約束出自其他地方。

法治還有一個定義，對經濟生活具有極大影響，不管是在前現代還是在當代。這就是人身安全，即從暴力的自然狀態中退出，從事日常活動，不用擔心被殺或被搶。它存在時，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它缺席時，我們會尤其珍惜。

最終，談論法治時一定要弄清法律對象，即是說，受法律保護的法人群體。社會的基本執法對大家是一視同仁的，但保護公民免受國家任意侵犯的法治，最初往往只適用于特權階層的少數。換言之，法律僅僅保護靠近或控制國家的精英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法律就像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標榜的“強盜幫派的正義。”

舉塞維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寫給女兒的信為例，她是17世紀法國最著名的沙龍贊助人之一。這位聰明敏感的女子描繪，士兵在布列塔尼征集新稅，把老人和孩子從家中趕出，再在屋子里尋找可供奪取的財產。因為不付稅，大約六十名市民將在下一天上絞刑架。她繼續寫道：“那個手舞足蹈、想偷印花稅紙的閑漢在車輪上就刑，被割成四塊，分別在城市四個角落示眾。”[[10]](#m10_16)

顯而易見，法國國家不會向塞維涅夫人和她朋友圈子施以如此激烈的懲罰。我們將在第23章看到，它將繁重稅賦僅僅加給平民，因為它太尊重貴族的產權和私人安全。所以，說17世紀法國沒有法治是不正確的，但法律并沒認為平民也是法人，也享有與貴族相同的權利。美國初創時也是如此，否定非裔美國人、婦女、美洲原住民——除了擁有財產的白人男子——的選舉權。民主化的過程逐漸拓展法治范圍，以包納所有的居民。

法治定義的混亂，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富國設計的改善法治計劃，很少在貧窮國家產生效果。[[11]](#m11_16)住在法治國家的幸運兒，往往不懂它如何首次涌現，誤把法治的外表當作法治的實質。例如，“相互制衡”是強大法治社會的特征，政府各部門監督彼此的行為。但制衡的正式存在，并不等于強有力的民主統治。法庭可被用來阻撓集體行動，如當代印度，其冗長的司法上訴可拖死重要的基建項目。它又可被用來對抗政府的愿望，以保護精英利益。1905年最高法院的洛克納訴紐約州案（Lochner v. New York），其宗旨就是擊敗限制工時的立法，以保護企業利益。所以，分權的形式常常名不副實，與守法社會的主旨無法對應。

在接踵而來的討論中，我們將從盡量廣闊的角度去關注法治的發展：法律本身——整套正義規則——來自何方？產權、合同執行、商法的特定規則如何發展至今？最高政治當局如何接受法律的至高無上？

###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論

偉大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發展了關于法律起源的精深理論，為法治的涵義提供了重要見解，成為今日人們思考法律的框架。哈耶克被稱作當代自由至上主義的教父，但自由至上主義者并不反對規則。根據哈耶克，“共同規則的存在使社會中個人的和平共處成為可能”。[[12]](#m12_16)在法律起源上，哈耶克把批判矛頭指向所謂的“唯理主義”或“建構主義”理解。這種理解思路認為，立法者理性地研究社會問題，從而發明法律，以建立自以為更好的社會秩序。在哈耶克看來，建構主義只是過去三百年的自負，尤其是部分法國思想家，包括笛卡爾（Descartes）和伏爾泰（Voltaire），都認為人的大腦足以理解人類社會的工作方式。這導致了哈耶克所謂的鑄成大錯，如法國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其時，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力以公正社會的預設重整社會。在哈耶克的時代（20世紀的中期），這個錯誤不僅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依賴理性計劃和中央集權的蘇聯，還發生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福利國家。

在哈耶克看來，錯誤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沒有一名計劃者，能掌握足夠的社會實際運作知識，以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社會中的知識，大部分具有本地特性，再向整個社會擴散，沒人能掌握足夠信息來預測法律或規則改革后的效果。[[13]](#m13_16)

哈耶克認為，社會秩序不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計劃的結果，而是在數百或數千分散個人的互動中自發產生的。那些個人嘗試各式規則，保留有效的，拒絕無效的。社會秩序產生的過程是遞增、進化、分散的，只有借用無數個人的本地知識，有效的“大型社會”方能出現。自發的秩序獲得發展，以達爾文為生物有機體所安排的方式——分散的適應和選擇，并不倚靠創世主的專門設計。

在哈耶克看來，法律本身便構成一種自發秩序，“毫無疑問，人們發現可以制作或更改法律之前，它已存在良久”。事實上，“個人學會觀察（和遵守）行為規則之后的很久，才用語言將之表述出來”。立法——有意識頒布的新規則——“發生于人類歷史的相對晚期……所有的法律都是、能夠是、也應該是，立法者的自由發明……事實上，這是一種謬誤，一個建構論唯理主義的謬種”。[[14]](#m14_16)

哈耶克心目中的自發秩序模型就是英國的普通法，無數法官設法將普遍規則用于所面對的特定案例，其判決的累積促使法律的進化發展：

英國人享有的自由在18世紀令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們羨慕不已……它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即支配法院審判的法律乃是普通法。該法律獨立于任何個人意志，它既約束獨立的法院，又為這些法院所發展。對于普通法，議會很少加以干預，即便有所干預，其目的也主要是為了澄清某一法律系統內的疑點。[[15]](#m15_16)

哈耶克由此鎖定法治的本質：代表整個共同體愿望的既存法律，高于當前政府的意志，它限制著政府的立法范圍。他對英國普通法的偏愛，獲得當代經濟學家的贊同，他們也認為，它比歐洲大陸的民法傳統更為靈活，對市場更為友好。[[16]](#m16_16)

哈耶克在解說其法律起源理論時作出兩項聲明，一項是實證性的，另一項是規范性的。他主張在大多數社會中，法律以自發的進化方式發展，這種自然生成的法律應該優于有意識制定的法律。這一解釋也是偉大的英國法學家愛德華·柯克（Sir Edward Coke）所推崇的，他認為普通法始于太古時代。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為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辯護時，也援引此一解釋。[[17]](#m17_16)哈耶克是強大國家的偉大敵人，不管是蘇聯風格的共產黨專政，還是以再分配和調節來實現“社會公正”的歐洲社會民主政體。在法律學者羅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所謂的“法律中心論”和“法律外圍論”的長久爭論上，哈耶克立場鮮明地站在后者一邊。前者認為，正式制定的法律創立和塑造了道德規則；后者主張，它們只是編纂了非正式的既存規范。[[18]](#m18_15)

然而，哈耶克對最低限度國家的規范性偏愛，扭曲了他對法律起源的實證性見解。在很多社會，法律的存在確實早于立法，但政治當局經常介入以作修改，甚至在早期社會也是這樣。現代法治的出現全靠強大中央國家的執法，其顯而易見之處甚至可在他偏愛的普通法的起源中找到。

### 從慣例法到普通法

哈耶克認為，法律在社會規則分散演變的基礎上獲得發展，這一基本見解在廣義上是正確的，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但法律發展有重要中斷，只能以政治權力的干預來解釋，而不是“自發秩序”進程的結果。哈耶克只是把歷史事實搞錯了。[[19]](#m19_14)

這些過渡中有一個是英國從慣例法到普通法的過渡。普通法不只是慣例法的正規文本，它們之間有根本的差別。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社會從部落組織過渡到國家組織，法律的意義便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部落社會中，個人之間的正義有點像當代國際關系，以競爭團體的自助為基礎，沒有更高級別的第三方執法。相比之下，國家層次的社會恰恰有如此的執法者，那就是國家本身。[[20]](#m20_13)

羅馬帝國終結后的英格蘭仍是部落組織，由盎格魯人（Angles）、西薩克遜人（West Saxons）、朱特人（Jutes）、凱爾特人（Celts）等組成，尚無國家。家庭組成村莊，村莊再組成所謂的百戶（足以承受百戶居民）或縣的更大單位。該層次之上就是國王，但早期君主沒有武力的壟斷，也不能對部落單位執行強制規定。他們不把自己當作領土的統治者，只是民眾的國王——如盎格魯人的國王（Rex Anglorum）。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6世紀末，本篤派（Benedictine）的修道士奧古斯丁（Augustine）抵達英格蘭，基督教便開始破壞盎格魯—薩克遜的部落組織。但部落法律受到的侵蝕只是日漸月染的，到公元第一個千年后半期的混亂時代，仍然盛行。親戚團體內有深深的信任，但競爭氏族之間卻有敵意和警惕。所以，正義牽涉親戚團體之間的相處規則。

盎格魯—薩克遜編纂的第一本部落法律，是公元600年左右的《埃塞爾伯特法典》（Laws of Ethelbert），與稍早的墨洛溫（Merovingian）國王克洛維一世的《薩利克法典》非常相似，羅列出各種受傷的賠償金：

四個前門牙，每個價值六先令；其旁邊的牙齒價值四先令，剩下的牙齒價值一先令；大拇指、大拇指指甲、食指、中指、戒指手指、小手指，各自的指甲都有區分，分別定價。相似分類也用在耳朵上，損失聽力、耳朵削掉、耳朵穿孔、耳朵割裂；用在骨頭上，骨頭暴裸、骨頭損壞、骨頭斷裂、頭骨打破、肩膀失靈、下巴斷裂、領子骨斷裂、手臂斷裂、大腿骨斷裂、肋骨斷裂；用在瘀傷上，衣服外的瘀傷、衣服內的瘀傷、沒顯黑色的瘀傷。[[21]](#m21_13)

基于賠償金的懲罰，其特征是不公平，因受傷者社會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所以，殺死一名自由人的賠償金，也許是殺死仆人或奴隸的好幾倍。

日耳曼的部落法律在本質上類似于其他部落社會，從努爾人，到當代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一語部落。如果有人傷害了你或你的親戚，你的氏族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譽和可靠性，必須施以報復。受傷和報復都是集體的，報復對象不一定是行兇者，他的近親通常就也足夠。賠償金的存在就是為了解決爭端，以防升級，成為無休止的血親復仇或部落間的仇殺。

現代法庭的遙遠起源就是調停血親復仇的氏族聚會。在盎格魯—薩克遜部落，這就是模擬法庭，傾聽控告和被告的作證，然后商討適當的賠償。但它沒有現代的傳訊權利，以逼迫證人出庭。它的裁決也得不到執行，除非達成協議。法律的證據往往有賴于用刑，譬如迫使被告赤腳走過火紅的煤炭或犁頭，或干脆將他們扔進冷水和熱水，看是沉還是浮。[[22]](#m22_13)

如尼采所觀察到的，基督教傳入日耳曼部落后，給道德帶來了深遠啟示。基督教的英雄是和平圣徒和烈士，不是武士或報仇的征服者；其傳道的普遍平等，又相悖于部落社會基于榮譽的等級制度。基督教有關婚姻和遺產的新規則，不僅破壞部落團結，還創造新社區觀念，其成員不再忠于親戚團體，而分享共同信仰。國王的概念也從共同祖先團體的領袖，變成廣大基督徒社區的領袖和保護人。不過，這個改變是循序漸進的。

部落制在基督教社會中的消亡并不意味家族制的死亡。在東正教中，這段時期的主教和教士可以結婚生子，還可實行宗教名義下的納妾（nicolaism）。教會通過信徒的捐獻獲取愈來愈多的財產。教會領袖爭取將圣俸傳給孩子，加入地方的氏族和部落的政治運作，都變得不可避免。教會職位經手這么多的財富，本身也變成可供交易的珍貴財產，該做法叫作圣職買賣（simony）。

日耳曼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就像阿拉伯或突厥部落社會中不信者之皈依伊斯蘭教，向哈耶克自發秩序的理論提出了有趣挑戰。瀏覽哈耶克的相關闡述，找不到點滴的宗教因素。然而眾所周知，在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穆斯林的社會中，宗教是法律規則的重要來源。基督教進入歐洲，給剛從部落習俗中脫穎而出的慣例法帶來第一次主要中斷。婚姻和產權規則發生變化，允許女子擁有財產，但這不是地方法官或社區的自發試驗，而是強大的天主教等級制度所頒布的革新。教會并不反映地方上不同的價值觀念，東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當局，都沒以相似方式來改造社會上現存的親戚規則。教會很清楚，它不只是在批準慣例法：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Ⅱ）在1092年告訴佛蘭德伯爵（Count of Flanders）：“你宣稱，你只不過是照地方上的古代習俗行事？即使如此，你應該知道，創世主說過：我的名字是真理；他沒有說過：我的名字是習俗。”[[23]](#m23_13)

英國法律發展中第二個主要中斷是普通法的引入。普通法并不是慣例法的自發演變，它與早期國家的興起密切相關，并憑借國家權力而取得最終的統治地位。事實上在諾曼征服之后，向全國頒布統一的普通法，已變成擴展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偉大的法律學者弗雷德里克·梅特蘭和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如此解說普通法的起源：

國王法庭（royal court）的習俗就是英國的習俗，從而變成了普通法。對于地方習俗，國王法官以一般性的語言表示尊敬，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移風易俗的主觀愿望。不管如何，地方習俗即使沒遭破壞，也得不到成長。尤其是程序，國王法庭取得了對所有其他法庭的徹底控制，將自己的規則視為唯一公正的。[[24]](#m24_13)

弄不清早期歐洲國王的作用，就不能理解這個過程。11世紀的國王不是領土統治者，更像分散封建秩序中伙伴中的老大。像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那樣的國王，花大部時間在旅途中察看國土的各部分。其時，大家都已退回各自分隔的村莊和莊園層次的小社會，這也是國王宣告權力和保持聯系的唯一方法。國王的主要服務是充作上訴法庭，若有人不滿意領主法庭（seigneurial）或莊園法庭（manor）所提供的正義。從自身利益出發，國王也希望擴充自己法庭的司法權，因為它的服務是收費的。向國王法庭提出上訴增強國王的威望，他可以推翻地方領主的裁決，從而削弱后者的權威。[[25]](#m25_12)

起初，各類法庭相互競爭，以取得司法生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國王法庭開始占據優勢。人們避開地方法庭有多種原因。巡回的國王法庭被視為更加公平，與領主法庭相比，它與本地訴訟人的牽連更少。它們也有程序上的優勢，如強迫民眾參與陪審團的工作。[[26]](#m26_11)長年累月，它們又獲益于規模和范圍上的經濟效益，司法需要人力、專長、教育。第一個全國官僚機構是國王法庭所建立的，它開始編纂慣例規則，建立先例系統。顯而易見的，寫作是必要的前提。每過十年，熟悉先例的法律專家越來越多，再被指定為法官，派往全國。

顧名思義，普通法就是不特殊，普遍適用。也就是說，英國不同地區的眾多慣例規則，現由單一的普通法所取代。各地的先例適用于全國，即遵循先例的原則（stare decisis）。執法的是法官網絡，其工作環境是統一的法律系統，比以前拼湊的慣例規則更為系統、更為正式。普通法基于慣例法所訂下的先例，但國家權力的興起，創造了慣例規則不敷使用的全新環境。例如，以前親戚團體以賠償金解決的犯罪，現受到更高級別的第三方的起訴，或是莊園主，或是國王本人。國王法庭也開始變成無爭議事項的登記場所，如財產注冊和土地轉移。[[27]](#m27_9)

因此，普通法代表了英國法律發展的中斷。它依據較早的先例，如果沒有諾曼征服，絕不可能成為全國法律。諾曼征服趕走了古老的丹麥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貴族，建立起愈益強大的大一統中央政權。以后的普通法演變可能是自發的，但它作為法律裁決的架構，又需要中央政治權力的干涉。[[28]](#m28_7)

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特雷耶認為，中世紀時，早期國家的創建涉及法律制度和財政制度，而不是軍事組織；軍事動員促進國家建設，則要等到早期現代。在某種意義上，法律機構甚至早于財政機構，因為國王法庭是國王收入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國王提供平等正義的能力——不像慣例法中，依據受害者社會地位而定不同的賠償金——加強了自己的威望和權威。[[29]](#m29_7)像中東傳統中的君主，國王不一定被視為最大最具掠奪性的軍閥。他又可充任受地方領主掠奪的犧牲者的保護人，一個主持正義的人。

中央國家的法律功能，對英國后來的產權發展和國家的合法性至關重要。對地方領主與自由佃戶和非自由佃戶的交易，領主法庭享有專門司法權，直到大約1400年。這種情形下，一旦發生財產爭執，就有點像由狐貍來守護雞籠。逐漸地，國王法庭宣稱有權過問這些糾紛。13世紀早期，有人提出國王在全國范圍享有司法權，低級法庭的司法權來自國王的委托。原告偏愛把訴訟送到國王法庭，久而久之，領主法庭慢慢失去對土地租佃糾紛的司法權。[[30]](#m30_6)這一市場驅動的選擇顯示，國王法庭肯定被視作更加公平，更少偏向地方領主，更可能執行裁決。

其他歐洲國家沒有發生類似的改變。尤其在法國，領主法庭保留對土地租佃糾紛的司法權，直到法國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很諷刺。一般認為，17世紀的法國國王，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明顯不同于英國國王，通過堅持自己的絕對權力來削弱貴族階層，但他們卻把地方法庭的司法權留給省城貴族。亨利·梅因爵士在他的論文《法國和英國》中指出，革命爆發之后，全法國的莊園主住宅被燒，縱火的第一對象是儲存財產文件的契約房（muniment room）。不像英國農民，法國農民覺得地主手中的地契不合法，由于地方領主控制的法庭一直抱有偏見。[[31]](#m31_6)

最后的案例點明了法治性質的要點。法治依靠法律本身和可見的管理機構——法官、律師、法庭等，也依靠制度運作的正式程序。但法治的正常運作，既是制度或程序上的事務，也是規范性的事務。和平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服從法律，不是因為做了理性的利弊計算，恐懼處罰；而是因為相信法律基本上是公平的，在道德觀念上已習慣于遵守。如果相信它是不公平的，他們就比較不愿服從。[[32]](#m32_5)

被視作公平的法律，如果執行不均，或有錢有勢者得以豁免，也將被認作不公平。這似乎將負擔重又放回制度和程序，以及其公平執法的能力。這里仍有規范化的問題，如果有錢有勢者在某種程度上不相信自我約束的必要，甚至不相信有約束同類的必要，光是制度何以遏制他們？在很多法治軟弱的國家，法官、檢察官、警察可被收買，或可被脅迫，正式制度的存在又能發生什么效用呢？

要建立規范化的法律秩序，不但國王接受，老百姓也愿接受，宗教就很有必要。波洛克和梅特蘭寫道，國王并不在法律之上：“每個國家一定要有某人或某些人在法律之上，一名既無義務又無權利的‘君主’，這樣的理論一定會遭到拒絕……沒人假設，國王可以更改天主教會的普通法，即使獲得高級教士和男爵的同意。”[[33]](#m33_5)國王受到約束，因為百姓會以造反來反對他們所認定的不公。什么是不公，什么會動員百姓起來反抗國王，全看國王的做法合不合法。[[34]](#m34_5)

即使是公平的規范化秩序，也需要權力。如果國王不情愿執行針對精英的法律，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律的合法性就會受損，不管其來源是宗教、傳統還是習俗，這是哈耶克和他的自由至上主義追隨者所疏忽的。普通法可能是分散各地法官的業績，倘若沒有強大的中央國家，它首先不會形成，之后也得不到執行。

英國很早就完成了從慣例法到現代法律制度的過渡，讓人印象深刻，這構成了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其他歐洲國家在13世紀完成類似過渡，但依據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即來自《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歐洲大陸的過渡，其關鍵也是天主教會的行為。這個故事，以及教會如何不同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機構，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 第18章 教會變為國家

天主教會對法治在歐洲的形成至關重要；敘任權斗爭和后果；教會獲得國家般的特征；世俗統治領域的出現；當代法治植根于上述發展

最深刻意義上的法治意味著：社會產生共識，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夠約束其時統治者的行為；享有主權的不是統治者，而是法律；統治者的正當權力只能來自法律，方才享有合法性。

在我們的世俗現代之前，在政治秩序之外，公正法律的最顯著來源是宗教。宗教權威只有獨立于政治權威，基于宗教的法律才能約束統治者；如果宗教權威組織渙散，或國家控制著教會的財產及教士的任免，那么宗教法律更有可能是在支持而不是限制政治權威。要理解法治的發展，不但要看宗教規則的來源和性質，還要關注宗教權威的組成和建制化。

歐洲的法治植根于基督教。歐洲國家出現之前，羅馬就有頒布權威法律的基督教主教（pontiff）。歐洲關于婚姻和遺產的規則，最初不是君主所規定的，而是來自像教皇格里高利那樣的個別人士。他的特使奧古斯丁帶著他一清二楚的指示，遠赴不列顛島，以說服異教的埃塞爾伯特國王皈依基督教。

激進伊斯蘭主義在20世紀晚期興起以來，很多人指出，西方的教會和國家截然分開，但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樣的穆斯林國家卻政教不分。但這一差別經不起仔細的推敲。自基督教出現以來，西方的政教分離并不是常數，而是時斷時續的。

基督教起初只是一個千禧宗派，在其存在的頭三個世紀受到殘酷的迫害，先是猶太人，再是羅馬政治當局。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它從非正統宗派一下子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羅馬帝國的西部遭到異教野蠻人的征服，宗教和政治權力又一次分開。西方政權的孱弱給予天主教更多的獨立機會，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492—496年在位）在教條中爭辯，高級教士擁有比君主行政權更高的立法權。[[1]](#m1_18)到了黑暗時代之末，政治權力重新恢復，政教第二次交融。

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是一種制度，它的宗教權威完全服從于國家，像基督教向羅馬國教的轉化。現保留給教皇的最高教士（pontifex maximus）頭銜，曾是羅馬皇帝的，因為他也是羅馬國教的首腦。中國始終是政教合一（唐朝可能是例外。其時，佛教在精英中頗受歡迎），此外還有什葉派掌控地區之外的大部分穆斯林世界。拜占庭的東羅馬帝國是現代東正教的老祖宗，也是政教合一稱號的發源地。它始終不變，直到土耳其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大家所忽視的是，到了11世紀初，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都已變成實際上的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實際意義是指政治當局對教會享有委任權，中世紀早期的歐洲都是如此。全歐洲的皇帝、國王、封建領主都在任命主教，也有權力召開教會會議，頒布教會法律。教皇將合法性賦予皇帝，皇帝卻也在指定和罷黜教皇。1059年之前的二十五位教皇中，皇帝任命了二十一位，罷黜了五位。教會當局對文官當局的懲罰，歐洲國王都享有否決權。[[2]](#m2_18)

在多數歐洲國家中，教會確實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從而得到收入和自治。由于政治當局控制了教會圣職的任命，教會的獨立程度還相當有限。教會的土地經常被認為是皇家的贊助，統治者經常委任親戚為主教，主教和教士又允許結婚，經常會卷入他們所管轄地域的家庭和宮廷的政治。教會土地可變成遺產，傳給主教的孩子。教會官員也擔任政治職位，進一步增強了宗教和政權的牽連。[[3]](#m3_18)所以，教會本身就是前現代的家族組織。

###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

11世紀晚期，天主教開始獨立于政治權力。領銜帶頭的是一位名叫希爾德布蘭德的修道士（Hilderbrand），后來他成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4]](#m4_18)他在教皇派中凝聚了一幫人，包括彼得·達米安（Peter Damiani）、紅衣主教漢伯特（Humbert）、教皇帕斯卡爾二世（Pascal Ⅱ）。他們認為，教皇應對所有的基督徒和政治當局行使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力，并有罷免皇帝的權利。他還宣稱，任命主教的唯一機構是教會，而不是世俗當局。其時背景是神圣羅馬皇帝亨利三世（Henry Ⅲ）的陰謀詭計。為了出席加冕典禮，他抵達羅馬，馬上罷免作為對手的三位教皇，以推舉自己的候選人。[[5]](#m5_18)

根據希爾德布蘭德，教會一定要實施改革，才能獨立于政治權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嚴禁教士、主教結婚和生兒育女。他攻擊常見的宗教納妾和圣職買賣，它們讓教會職位變成了可供交易和遺傳的財產。[[6]](#m6_18)希爾德布蘭德派發起了一場傳單戰役，敦促基督徒不要接受已婚或納妾教士的圣禮，并抨擊為賺錢而提供教會服務的行徑。[[7]](#m7_17)成為格里高利七世后，他把教士獨身訂為教會的正式原則，并迫使已婚教士在教會義務和家庭義務之間作出選擇。這是向教士既得利益的挑戰，導致教會內部艱巨而激烈的斗爭。教皇格里高利的目標是想在教會內終止腐敗和尋租，所以攻擊家族制的根源，即主教和神父的生兒育女。他的思維邏輯無異于中國和拜占庭依賴太監、奧斯曼帝國從家人手中奪走軍事奴隸。如果在忠于國家和忠于家庭之間作出選擇，大多數人出于生物本能會選后者。所以，減少腐敗的最直接方法，就是禁止官員組織家庭。

這項改革自然遭到現有主教的反對。教皇格里高利明白，他贏不了這場戰役，除非他有權任免主教，而不是皇帝。在1075年的教皇宣言中，他要將罷免主教和世俗教職的權利從國王手中收回。神圣羅馬皇帝亨利四世的答復，是要將他罷黜，“下臺，下臺，你這個受詛咒的”。格里高利的回應是將皇帝逐出教會。[[8]](#m8_17)很多日耳曼君主和一部分主教支持教皇，迫使亨利四世在1077年趕來格里高利在卡諾莎的住所。他足足等了三天，赤腳站在雪地，以求教皇的寬赦。

有些歷史性事件全由個人引起，如不提及他們特殊的道德品質，就難以解釋。敘任權斗爭就是這樣的事件。格里高利有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在教皇派中，曾被伙伴稱作“我神圣的撒旦”。就像四個世紀后的馬丁·路德，他對改革之后的教會以及其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抱有恢宏的遠見。他不怕脅迫，愿意看到與皇帝的沖突逐步升級，直至全面對抗。

但這歷史上的著名沖突，僅靠個人意志是解釋不清的。天主教會成為自治的政治參與者，其重要背景是歐洲普遍的政治軟弱。拜占庭的東正教及其在俄國的正統繼承者，不得不接受其所在帝國的監護。相比之下，西方教會位于政治上分崩離析的意大利半島，北方鄰國的日耳曼人也是散沙一般，神圣羅馬帝國只取得名義上的統一。11世紀的法國并不團結，無法果斷地干涉教皇政治。這段時期的教會雖然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但很容易在周邊政治體的相互競爭中合縱連橫。

亨利四世在卡諾莎接受教皇的權威，但仍不愿承認教皇委任主教的權利，依舊拒絕格里高利的要求。他繼續占領羅馬，罷免格里高利，讓自己提供的候選人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成為一位對立教皇（antipope）。格里高利向意大利南部的諾曼國王們求救。他們答應，但到最后洗劫羅馬，引起羅馬居民的反抗。格里高利被迫與諾曼同盟一起撤回南方，于1085年死于薩萊諾（Salerno），身名俱敗。敘任權斗爭延續到下一代，格里高利的繼承者，再將亨利四世和其兒子亨利五世逐出教會。另一方面，皇帝罷免教皇，扶持自己的候選人成為對立教皇。最終達成協議的是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皇帝基本上放棄敘任權，而教會承認皇帝在一系列世俗事務上的權力。

敘任權斗爭對歐洲后續發展非常重要。首先，它允許天主教會進化成現代的、等級制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機構，如法律歷史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Berman）所認為的，還為后來建國者樹立了榜樣。根據亨廷頓，機構發展的標準之一就是自治，如果不能控制對自己官員的任命，機構就不可能是自治的。這也是敘任權斗爭的中心爭執。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之后，教皇變成教會等級制度中無可爭辯的執行總裁，在紅衣主教學院的建議下，可隨意任免主教。

教會也純潔自己的行止。教士的獨身制消除了將圣俸授予親戚和后裔的誘惑，并給教職出售涂上新的道德色彩。教會可以什一稅（tithe）的形式征收稅賦，由于教職人士脫離地方氏族的政治，而變得更善于處置自己的財政資源。它還顯示出真正國家的特征，有時組織自己的軍隊，在確定領土中（盡管很小）行使直接司法權。

教會對世俗事務的介入，當然未因敘任權斗爭而告結束。世俗統治者也在繼續設法操縱教皇職位，安置自己的候選人，例如14世紀的阿維農教皇（Avignon）。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出現新式濫權，最終為宗教改革鋪平道路。與世界任何其他宗教機構相比，天主教在適應性、復雜性、自治性、連貫性方面的建制化更為高級。

敘任權斗爭的第二個重要成果是精神領域和塵世領域的明確分離，從而為現代世俗國家鋪平道路。如早先提及的，這個分離只在基督教中隱性存在。沃爾姆斯宗教協定，在西方教會的歷史上永遠終止了政教合一時代。這種方式，從沒出現于東正教或穆斯林世界。

為了削弱政治統治者的權力，格里高利的改革宣告教會的普遍權威，不管是精神還是塵世，甚至還包括罷免國王和皇帝的權利。事實上，基督教皇是在要求印度婆羅門從一開始就在行使的權威。然而，經過漫長的政治和軍事的博弈，教會被迫妥協。它劃出明確界定的精神領域，讓自己實施無可爭辯的控制，同時又承認，世俗統治者有權在另外范圍行使統治權。這一分工，為后來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9]](#m9_17)

最后，敘任權斗爭對歐洲法律和法治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教會闡述系統性的教會法規取得合法化；第二，教會創造了建制化的精神權威的單獨領域。

### 羅馬法的再現

與皇帝發生沖突時，格里高利和繼承者沒有自己的軍隊可以調動，只能通過呼吁合法性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于是，教皇派發動了一次對法律源頭的搜索，以支持教會享有普遍司法權的主張。搜索結果之一是11世紀末，在意大利北部的圖書館內重新發現《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10]](#m10_17)迄今，《查士丁尼法典》仍是民法傳統的基礎，不管是歐洲大陸，還是受其殖民或影響的其他國家，包括從阿根廷到日本。很多基本的法律常識，如民法和刑法、公法和私法之間的差別，都可從中找到起源。

《查士丁尼法典》是羅馬法律高度精細的匯集，6世紀初，在查士丁尼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成書問世。[[11]](#m11_17)重被發現的文本包含四部分：摘要、制度、法典、案例，其中摘要最為重要，涵蓋的題目包括個人地位、民事侵權、不公平致富、合同、補償。查士丁尼時代的法學家相信，它是早期羅馬法（現已遺失）最重要遺產的匯總，并變成12世紀新一代歐洲法學家的研究主題。[[12]](#m12_17)

羅馬法的復興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在新式機構中開展了法律研究，那就是新興的現代大學。11世紀末，博洛尼亞（Bologna）大學成為研究中心，來自歐洲各地的數千學生聚集起來，聆聽像伊爾納留斯（Irnerius）那樣的教授講解摘要。[[13]](#m13_17)新的法律課程讓歐洲人看到一套詳盡的法律系統，可立即用于自己的社會。《查士丁尼法典》的知識由此傳播到歐洲大陸最遙遠的角落，法律學院在其他城市紛紛涌現，如巴黎、牛津、海德堡（Heidelberg）、克拉科夫（Cracow）、哥本哈根。[[14]](#m14_17)有點像英國普通法的情形，羅馬法的恢復突然取代了盛行于歐洲的日耳曼慣例法，代之以更為統一的跨國規則。[[15]](#m15_17)

推介《查士丁尼法典》的第一代學者被稱為訓詁者（glossators），其主要工作是重建羅馬法。后續一代的學者，如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則看得更遠，為尋求法律的思想基礎而直抵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學家認為，習俗和見解需要接受人們的理性考量，并對照于更普遍的真理標準。阿奎那將這條原則，用于自己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他所建立的哲學傳統，鼓勵后代法律評論家不要機械復制現存法律，而要推論法律來源，以做到活學活用。[[16]](#m16_17)歐洲大學所復原的古典傳統，不僅是向靜態的文本尋求權威，而是對文本的涵義進行理性查詢。

新興大學培養了一批特別律師，既能解釋古典文本，又掌握專門知識。教會和世俗的當局開始認為，他們需要依賴律師的專長來作出裁決，尤其是在極為重要的商業合同和產權方面。律師依次發展自己的機構利益，拒絕非專家和自私的政治派別闖入他們的專業領域。

格里高利改革之前，教會法律包括宗教會議的法令、教父的著作、教皇法令、代表教會的國王和皇帝所頒布的法令。此外，還混雜有羅馬法的殘余和日耳曼的慣例法。[[17]](#m17_17)隨著教會等級制度的建立，教會第一次有可能權威地制定法律，憑借愈益專業的教會法律專家，將統一性注入新法典。受過法律訓練的修道士格拉提安（Gratian），分析、校對、調和了數世紀以來的幾千條正典（canons），再將之綜合成統一的法規。這本《教會法規匯編》（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出版于1140年，洋洋灑灑一千四百頁。格拉提安建立了神圣法、自然法、制定法、慣例法的法律等級制度，又設計了理性程序，以解決相互之間的矛盾。格拉提安之后的一個世紀，教會法規得到極大擴充，涵蓋了廣泛的法律題目，包括刑法、家庭、財產、合同、遺囑。[[18]](#m18_16)

天主教會通過統一教會法規的概念而取得國家屬性，又通過發展行政官僚機構，而變得更像一個國家。法律學者認為，韋伯所定義的現代官僚的“職位”（office），其第一個模型是在12世紀教會等級制度中產生的。[[19]](#m19_15)現代職位的特征之一是職位和官員的分離，職位不是私人財產，執掌職位的只是領薪官員，身受所處等級制度的紀律約束；職位依功能而分，執掌職位要有技術專長。如我們所知，所有這些都是秦朝以來中國官僚制的特征，盡管有不少“職位”在后續朝代中重新家族化了。教會的敘任權從世俗政權的手中獲得解放，教士獨身制又得到強行的實施，自此以后，教會的官僚制特征愈益明顯。例如，教會開始在12世紀早期區分教職（officium）與圣俸（beneficium）。教職人士不一定收到封建圣俸，現只是領薪的教會員工，根據自己的工作表現或被雇用，或被辭退。這些官僚開始任職于教皇秘書處（Papal Chancery），很快又變成世俗統治者秘書處的榜樣。[[20]](#m20_14)

### 法律和現代國家的興起

9世紀卡洛林王朝崩潰之后，權力四下分散。到格里高利改革時期，歐洲的政治秩序見證了逆轉的開頭。權力流向一系列的地區領袖，當地方領主在10世紀末紛紛建造城堡時，又受到進一步的分割。莊園——基本上自給自足的生產和軍事的單位，以領主的城堡和土地為中心——變成整個歐洲的統治來源。這個系統之上又出現幾家王室，如以法蘭西島（Île de France）為中心的卡佩家族（Capetians）、征服英國和意大利南部的各式諾曼男爵。他們只是比對手擁有更多土地，遂變成新型領土國家的核心。

格里高利的改革不僅向領土國家提供了官僚和法律的榜樣，并鼓勵他們發展自己的建制。世俗統治者負責領土內的和平和秩序，并提供規則以促進新興商業。這導致了獨特法律領域的形成，分別與封建、莊園、城市、長途貿易有關。哈羅德·伯爾曼認為，法律形式的多樣化激發了司法轄區之間的競爭和革新，從而促進自由在歐洲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獨立城市的興起，它的自由人口和對外貿的依賴，刺激了對商業法律的新型需求。[[21]](#m21_14)

教會在建制上趨向獨立，更刺激了封建社會其他領域的集團組織。在11世紀，主教杰拉德·德·坎布雷（Gérard de Cambrai）和主教阿爾德貝隆·德·拉昂（Aldabéron de Laon）創立社會等級一分為三的原則：貴族、神職人士、平民——即打仗者、祈禱者、支持前兩者的勞作者。這些功能組織與地域沒有關系，其為三個代表階層的形成打下意識形態的基礎。統治者定期召集各代表階層，以批準征稅和討論國家大事。如后續章節所顯示的，歐洲國家今后發展的是負責制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將取決于這些階層能否頂住中央君主的壓力。[[22]](#m22_14)

歐洲國家建設的特征之一，是很早就非常依賴法律。法律在國家制度成長方面，既是動機，又是過程。專家習慣于認為，戰爭和暴力是歐洲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這在早期現代肯定沒錯，其時，專制主義的興起與軍事動員的財政需求休戚相關。但在中世紀，國家獲得合法性和權威，靠的是分配正義的能力，其早期機構多為執法部門。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非英國莫屬。21世紀初，我們習慣把英國及其衍生品美國，當作盎格魯—薩克遜經濟自由主義的家園，把法國當作中央集權政府的誕生地。然而在14世紀之前，這正好恰恰相反。所有的歐洲政治體中，英國國家是最集中最強大的，其基礎就是國王法庭，以及它向全國提供正義的職能。到1200年，它已擁有常設機構，配置以專業或半專業官員。它頒布法令規定，與土地權有關的案例，一定要得到國王法庭的命令方可成立。它還向全國征稅。[[23]](#m23_14)中央權力的證據就在《末日書》（Domesday Book，即《土地調查清冊》），它的編纂在諾曼征服后不久，核查了國內每一郡的居民。[[24]](#m24_14)

當時已有了英格蘭國家身份的雛形。1215年男爵們在蘭尼米德（Runnymede）對抗國王約翰，強行施加《大憲章》（Magna Carta）。他們這樣做，不是作為只想為自己爭取豁免權的軍閥。他們期待統一的中央政府，通過國王法庭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利。在這一點上，他們把自己當作更大社區的代表。[[25]](#m25_13)相比之下，法國其時比較分散，各地區之間有重要的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國王籌集稅賦，只能在法蘭西島周圍的自己領地。

### 中世紀教會為法治樹立先例

天主教會在12世紀成為現代官僚機構，并頒布統一連貫的教會法規，但這離現代法治還很遠。法治牢固的發達國家，向政府統治提供合法性的通常是書面憲法。但這套法律并不起源于宗教權威，事實上很多憲法規定，在牽涉宗教的道德問題上必須維持政治的中立。現代憲法的合法性來自某種民主的批準程序。這套法律可被看作扎根于永恒或普遍的原則之中，在亞伯拉罕·林肯看來，美國憲法就是一例。[[26]](#m26_12)但多數現代憲法對其合法性的最終來源都有點隱約其詞。[[27]](#m27_10)從實用角度看，那些原則的解釋仍然取決于政治上的爭論。到最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行政和立法的機構，其權力仍然要受制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憲法。后者取決于更嚴格的社會共識，如某種形式的超多數選舉。在最近發展中，各國政府也要受制于跨國法律機構，如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國際戰犯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不過，與國家層次的法庭相比，它們的合法基礎比較曖昧。[[28]](#m28_8)包括以色列和印度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宗教法庭仍在家庭法上享有司法權。但這只是例外，宗教權威不得參與法律制度是普遍規則。

那么，為何要說基于宗教的法律為現代法治奠下了基石？

宗教權威的分開存在，使統治者傾向于承認，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終來源。弗雷德里克·梅特蘭堅信，沒有一位英國國王認為自己高于法律。但這不適用于任何一位中國皇帝，因為沒有一條法律是他們承認的，除非是自己的金口玉言。在這方面，像印度的拉賈和剎帝利、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蘇丹，基督教君主同意自己身處法律之下。

在每個實行以宗教為基礎的法律的社會中，政治統治者都制定法律，試圖侵入宗教法律的領域。在許多情況中這種侵入是必要的，因為有很多方面宗教法律不敷使用，但最危險的侵入是針對原則的。早期現代歐洲的重要政治斗爭（將在后續章節中作詳細說明）涉及崛起的君主，他們憑借新穎的主權原則，將自己置于等級制度的頂部，以取代上帝。這些國王像中國皇帝，聲稱自己可單獨制作法律，不受既存法律、習俗和宗教的束縛。成功抵制這些聲稱，重申法律的至高無上，那就是現代法治興起的故事。法律本身可能還不夠，所以又從宗教傳統那里獲得圣潔、自治和連貫性，從而更易實行這種抵制。

法律體現有關正義規則的廣泛社會共識，如果明白這一點，那么中世紀法治和現代法治之間的中斷，與其說是實質性的，倒不如說是表面上的。這也是哈耶克所說的法律早于立法的涵義。在12世紀的宗教年代，或在同時期的穆斯林或印度世界，社會共識往往通過宗教表述出來。與今天相比，那時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宗教法律不是從外空掉入社會的，一開始可能伴隨暴力和征服而至，再與社會共同進化，漸漸演變成本土的道德規則。[[29]](#m29_8)當時，宗教和世俗的領域互不分離，闡明社會共識就不得不使用宗教語言。在宗教扮演較為局限角色的今天，無可避免地，必須通過其他途徑來確定社會共識，譬如通過民主選舉。無論用宗教語言還是世俗語言，法律始終是廣泛分享的正義規則的表述。

12世紀浮現的宗教法律，對現代法治施加了重大影響，它幫助促進了法律的建制化和理性化。法治若要存在，光是建立統治者服從法律的理論原則還不夠。還要有體現有關法律的具體機構，并取得獨立于國家之外的某種程度的自治，否則就很難控制國家的隨心所欲。此外，如果法律不是一套連貫和清晰的規則，就不能限制行政權力。憲法上的分權，必須依靠一個切實的法律體系，該體系掌控自己的用人和晉升，設立自己的專業標準，訓練自己的律師和法官，在解釋法律時，享有不受行政機構干涉的真正權力。英國國王負責創建了以國王法庭為終極權威的普通法，他也將大量權力下放給法官，允許法律專業的茁壯成長，其就業和收入并不完全依賴國家。在歐洲大陸，查士丁尼的民法傳統，意味著較為集中的法律詮釋，但也有自治的法律專業的平行成長——事實上，出現了多種法律的多門專業。兩種情形中，西方法律的理性化程度都要大于印度或穆斯林遜尼派。后兩種傳統文明中，沒有涌現像修道士格拉提安那樣的人，將整套既存的宗教法令統一連貫起來。

西歐出現的法律傳統明顯不同于東正教。影響后來政治發展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西方基督教所采用的特別制度。東正教的主教繼續接受皇帝或本地統治者的任命，教會在總體上也從沒宣告自己的獨立。不像西方的教會，東正教從未喪失羅馬法的傳統，也從未宣稱法律有高于拜占庭皇帝的至上地位。

法治的涌現是構成現代政治發展的三大組件中第二個。跟確定歐洲脫離部落或親戚社會組織的過渡時間一樣，法治出現的時間也需要再往前提，其遠遠早于早期現代時期——至少要提到到12世紀。這也點出了本卷的中心主題，即現代化的不同組件，并不全是某種一攬子解釋的一部分，它們并非都是伴隨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而來的。獨立城市和新興貿易的需求，促使了現代商業法律的發展。但法治一開始不是經濟力量的產品，而是宗教產品。所以，作為經濟現代化關鍵的兩個基本制度——可以自由選擇個人的社會關系和財產關系，透明預知的法律為政治統治設限——都是前現代中世紀教會所創造的。只是到了后來，這些制度證明在經濟范圍內也相當有用。

## 第19章 國家變為教會

法治在印度和中東的發展，但在中國缺席；中東世俗和宗教的當局有效分享權力；前現代中東政權遵守產權；穆斯林烏里瑪不能以基督教會的方式制衡國家權力；當代阿拉伯世界沒有法治；現代法治的比較

在中國，宗教并不反映社會和文化的共識，毋寧說是社會抗議的手段。這體現在漢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紀受基督教影響的太平天國等。中國的國家輕易掌控各式祭司團體，從不承認比國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權威。

所以，中國沒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歷史基礎。中國的傳統以法家思想為基石，中國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positive law），也就是皇帝所頒布的王法。秦、漢、隋、唐、明等朝都出版了重要法典，很多篇幅只是各式違法的處罰表。7至8世紀陸續頒布的《唐律》，不提法律的神圣來源，只說法律是世俗統治者所制作的，以控制百姓的行止和避免自然和社會的失衡。[[1]](#m1_19)

印度則完全不同，與印度國家形成同期或稍早的婆羅門教，規定政治/武士階層——剎帝利——必須從屬于祭司階層的婆羅門。印度宗教以四大社會階層的瓦爾納為基礎，印度統治者必須向身處頂端的祭司取得合法性和社會支持。所以，法律深深植根于宗教，而非政治。最早的法律文本《法論》（Dharmasastras），不是像中國那樣的皇帝法令，而是宗教權威所寫下的文本。[[2]](#m2_19)印度后來的法律發展有點像英國的普通法，沒有嚴格遵循這些法律文本，反而依據判例，并把班智達（panditas，精通宗教典籍的學者）所創造的先例前后連接。[[3]](#m3_19)執行裁決的經常是婆羅門，而不是政治當局，不允許分開的世俗領域來制訂規則。法律有很多哈耶克提及的特征，通常是不可更改的，除非能找到與當前法律有關的更古老先例。[[4]](#m4_19)獨立后，印度議會試圖修改婚姻和離婚的法律，據稱有名保守印度人這樣說：“議會的權力不可推翻經典（Shastras）的命令，那是上帝說的話，由圣人（Rishis）為我們抄錄下的。印度人不可接受經典之外的任何權威。”[[5]](#m5_19)

然而，婆羅門階層沒有組織成單一的等級制度，不能對國王和皇帝發號施令，沒有印度教皇，也沒有印度教會。婆羅門階層僅代表一個網絡，其成員居住在無數的村莊和城市，彼此聯絡而已。婆羅門內部又分出不同的迦提，由此而充滿等級差別。主持國王授權儀式的婆羅門，可能不愿與主持葬禮儀式的交往。宗教權威在地方上享有極大影響，幾乎每一項社會事務都需要他們的服務。他們從不臣服于國家，或成為國家的雇員，但也無法憑借建制化的等級制度來采取集體行動。迦提所造成的權威碎片化，不單影響政治權力，也影響宗教權力。

### 中東的法治

除了印度和歐洲，出現法治的另一個世界文明是伊斯蘭教的中東。今天，不管是境內還是境外的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很多政權是殘酷的獨裁專制政府，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內，不受任何更高法律或正義的約束。[[6]](#m6_19)西方人通常認為，教會和國家的交融合一是伊斯蘭教的本質，對基督教歐洲來說，才是天方夜譚。伊朗1979年革命后所建立的神權政府，只是返回傳統的穆斯林統治。但這一切都不準確。

現代穆斯林獨裁專制政府的出現是偶然事件的結果。這個偶然就是該地區與西方的碰撞對峙，以及之后向現代性的過渡。在基督教的歐洲，政治和宗教的權力經常聯合起來。在穆斯林世界，它們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倒是有效隔離的。法律在穆斯林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與在基督教領土上的完全相同：制衡政治統治者的隨心所欲——雖然較弱。法治是穆斯林文明的基礎，實際上它在很多方面定義著這一文明。

讓我們總結一下法律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社會作用的相同之處。在這兩個傳統中，法律都植根于宗教，只有一位上帝，行使普世的司法權，是所有真理和正義的源泉。這兩個傳統，再加上猶太教，都深深倚靠宗教的經典，其基本社會規則很早就被編纂成書。在伊斯蘭教中，這些規則不僅是神圣的《古蘭經》，還有圣行（sunna）和圣訓（hadith），后者是穆罕默德生前的故事和訓話，可作人們行為的指針。但這些規則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中又是模棱不定的，必須拜托專門的教士階層——基督教中的牧師和伊斯蘭教中的烏里瑪（宗教學者）。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法律并不像中國那樣出自政治權力，而是來自對政治當局享有統治權的上帝。穆罕默德生前可能已是部落的統治者，但在阿拉伯伙伴的眼中，他的權威并不在他所指揮的軍隊，而在他是上帝啟示的使者。

跟穆罕默德一樣，最初幾位哈里發集宗教和政治的權力于一身，這在倭馬亞朝代始終如此。該朝代結束時，政治和哈里發的權力才開始分隔。其時，倭馬亞王子逃離阿拔斯王朝，在西班牙建立了分立的西方哈里發政權。阿拉伯帝國的不同省份，隨著歲月的消逝而逐一分離出去，哈里發的權力只達首都巴格達和周邊地區，甚至變成掌權軍事指揮官的傀儡。[[7]](#m7_18)法蒂瑪王朝（Fatimids）先后在突尼斯和埃及分別建立分立的哈里發政權。巴格達哈里發的權威從沒獲得什葉派和哈瓦利吉派的承認。哈里發可以宣稱享有普遍的精神權威，但其真正的司法權非常有限。

到了11世紀，哈里發和在領土中行使政治權力的人分享權力。真正的掌權者——世俗君主——披上了“埃米爾中的埃米爾”的頭銜。通過立法上的巧立名目，哈里發聲稱把世俗權力委托他人，以換取自己在狹窄宗教事務中的權威。[[8]](#m8_18)中世紀伊斯蘭教法律學者艾布·哈桑·馬沃爾迪（Abu al-Hasan al-Mawardi）解說這是合法的，因為哈里發通過代理人仍在行使世俗的權力，真相恰恰相反，哈里發只是埃米爾的傀儡。[[9]](#m9_18)伊斯蘭教的世界實質上是政教合一，而不是神權。世俗統治者掌控權力，請哈里發和烏里瑪來到自己領土，幫助管理伊斯蘭教法。[[10]](#m10_18)

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中所缺乏的，恰好是哈里發和烏里瑪脫離政治，發展成為分立的單獨機構，享有分明的等級制度、司法權、人事權。也就是說，沒能建成單獨的穆斯林“教會”，可與格里高利改革之后涌現的天主教會媲美。跟敘任權斗爭之前的天主教會一樣，穆斯林知識階層只是分散的網絡，由教士、法官、閱讀和應用穆斯林判例的學者所組成。遜尼派的傳統內，有四家主要的穆斯林法律學派，相互競爭，在哲學上各持己見，其地位起伏有賴于權力的惠顧。烏里瑪一直沒有形成建制化的等級制度，無法建成單獨法律傳統和穆斯林等級制度，以羅馬教皇的方式向政治權力提出挑戰。

### 國家與清真寺的分離

但這并不意味宗教和世俗權力之間沒有功能的分離。圖森·貝（Tursun Bey）寫道，15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蘇丹可在伊斯蘭教法之外自行制定世俗法律。這套世俗法律叫作卡奴納莫（kanunname，該詞源自歐洲使用的canon law [教會法]），用于傳統伊斯蘭教法鞭長莫及的領域，如公共和行政的法律。所征服領土的征稅和產權、發行貨幣、貿易管理，全靠這套世俗法律。[[11]](#m11_18)傳統的伊斯蘭教法主要涉及婚姻、家庭、遺產和其他私人事務，由教法專家卡迪和穆智泰希德（kadis and mujtahids）執行。他們熟諳穆斯林經典，能將這一龐雜的法典應用到特定案例，很像印度的班智達。[[12]](#m12_18)這就需要平行的兩套司法建制，一個是世俗的，另一個是宗教的。卡迪應用伊斯蘭教法，但其裁決必須依賴世俗當局的執法。[[13]](#m13_18)

在理論上，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世俗法律從屬于伊斯蘭教法，需要接受宗教權威的審閱。哈里發在理論上高于蘇丹，但在實際上卻依賴蘇丹。同樣道理，因為日益增長的商業社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規則，實際上的宗教法律反而遭受排擠。等到奧斯曼法庭設立大穆夫提（grand mufti，教法說明官）一職時，宗教權威的獨立受到更大限制。以前，政府從學者圈中選任教法執行官卡迪，讓他們自主處置法律內容。新的大穆夫提和他的屬下，現在有權就伊斯蘭教法的內容，發布不受限制的意見或論斷（fatwas）。土耳其愈益增加對宗教的政治控制，所走的方向與歐洲恰恰相反。[[14]](#m14_18)如果說羅馬教會展示出國家特征，土耳其國家則展示出教會特征。

前現代的中東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遵守法治？如第17章所提到的，今天普遍認可的法治至少有兩層分開的意義：第一，遵守產權和合同的法律，允許商業和投資的發生；第二，統治者和統治階級自愿接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第二層意思直接影響第一層，如果社會精英不遵守法治，使用權力隨意攫取弱勢群體的財產，便成為巨大的誘惑。如前所述，統治者仍有可能在實踐中遵守日常法治，但在理論上卻有任意侵犯產權的權力。

對我們深入研究的兩個中東政權來說，即埃及的馬穆魯克和土耳其的奧斯曼，第一意義中的法治作為預設條件而存在。也就是說，它們有關于財產和遺產的完善規則，允許長期的投資和可預知的商業交易。第二意義中的法治也同樣存在，馬穆魯克和奧斯曼蘇丹都承認，他們的權力受上帝創建的既存法律的限制。但在實踐中，他們在解釋法律以袒護自己私利時，仍享有相當大的余地，尤其在財政嚴峻時期。對稅收的迫切需求，促使他們違反長期的法律規范。

但這兩個案例都沒有完全的現代產權，現代產權的付之闕如是否限制了穆斯林世界的經濟發展，這不很清楚。[[15]](#m15_18)奧斯曼帝國擁有大量土地，分配給提供軍事服務的騎士。替騎士耕種土地的農民，可把自己的使用權傳給孩子。手藝人和商人等其他百姓享有私人產權，如果幸運和技術精湛，可積累大筆財富。所有傳統的中東統治者，非常清楚苛捐雜稅的危險，盡可能以“正義”名義予以回避。此外，他們像其他君主一樣，把自己視作保護人，使平民免受貴族精英本能上的掠奪。甚至蘇丹也不可越過法律。如果蘇丹的騎士遵命來執行處罰，他們仍需要把被控者帶到卡迪那里，以取得法律的裁決。如個人去世而未留遺囑，財產在國家能夠拿走之前必須由理論上的遺囑執行者保管。非穆斯林的外國人過世后，其財產同樣由法學家記錄下來，直到繼承人出現。[[16]](#m16_18)

法律如何限制傳統穆斯林政府的權力，可在慈善性質的瓦克夫的作用中找到明顯證據。如我們所知，掌權的奴隸軍精英最初不可擁有后裔，也不可積累財產。馬穆魯克和土耳其禁衛軍，首先避開規則以組織家庭，然后再設立慈善基金，安置自己孩子或親信來運轉這些基金，其收入將保證后代的生計。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統治者，讓這些瓦克夫完整無缺地持續數代，但有對改動遺產的嚴格限制，從而束縛了它們的經濟效率。[[17]](#m17_18)

如果瓦克夫限定了國家攫取私人財產的能力，它的頻繁使用意味著，其他不受宗教保護的財產往往面臨隨意的征稅。盡管不是每個國家都堪稱匪寇，但如有緊急情形，所有國家都可能成為掠奪者。15世紀的切爾克斯系馬穆魯克政權，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陷入愈益可怕的財政困局，導致蘇丹尋求火燒眉毛的計策以增加收入。他們任意提高稅率，截獲各種財富，導致富人尋找越來越具創意的方法來隱藏財產，不愿做任何投資。同樣，奧斯曼在16世紀后半葉面臨財政危機，導致稅率增長，并威脅到傳統產權。禁衛軍職業的制度化老規矩，不得成家的禁令，都被一一放松。國家的封地不再留作軍事服務的報酬，而被腐敗當權人售給出價最高的投標者。像基督教統治者時時覬覦修道院的財富和其他教會財產，馬穆魯克甚至也突襲瓦克夫來籌措資金。

教皇的師團

據說，斯大林曾鄙視地問：“教皇手下有多少師團？”如我所說，既然法治植根于宗教，我們可向法官和律師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他們在法治國家中部署了多少師團？他們憑什么來迫使統治者服從他們所解釋的法律？

答案當然是零，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之間的分權只是隱喻性的。行政官擁有強制權力，可召集軍隊和警察來執行他（她）的意志。司法部門的權力，或身為法律監護人的宗教權威，體現在可向統治者提供合法性，以及作為社會共識保護人而獲得廣泛支持。格里高利七世可迫使亨利四世來卡諾莎，但實際上無法罷免這個皇帝。對此，他必須依賴軍事同盟，比如嫉妒亨利四世的日耳曼君主和意大利南部的諾曼國王。教皇能否吸引世俗的同盟，則要依賴其事業的合法性，以及他們為自己短期利益所打的小算盤。敘任權斗爭的結果是個復雜的混合體，既有物質因素，也有道德因素。最終，擁有軍隊和經濟資源的世俗統治者，被迫與具有部分經濟資源但全無強制權力的精神領袖達成妥協。教皇的權威確實存在，并不依賴他的師團。

穆斯林烏里瑪的權威在于可向蘇丹授予合法性，就像教皇的權威。遇上繼承權的斗爭，這種權威就變得非常重要。在穆斯林世界，伊斯蘭教和突厥部落習俗，都反對建立王朝繼承的明確規則，比如長子繼承權。蘇丹可指定繼承人，但實際的繼承過程經常變成一場蘇丹兒子的自由參賽，或在馬穆魯克的情況中，變成一場主要派系領袖的自由參賽。在這種情境下，烏里瑪給予或保留其支持的權力就是舉足輕重的。如果權力斗爭中的干預變得太公開，像切爾克斯系馬穆魯克時期的哈里發事件，他們可能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我們不應夸大法治在前現代穆斯林社會中的作用。在保護產權和商業上，法律的運作尚屬“足夠好”，但提供不了像憲法保障的東西，以對抗存心違法亂紀的統治者。大穆夫提和卡迪都是國家選擇和雇用的，明顯減弱了他們的自治性，全然不同于12世紀之后天主教會聘請的獨立法官。奧斯曼國家從頭到尾都是政教合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穆斯林學者的控制程度日益增加。

### 印度和伊斯蘭教的法治無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門

在變成殖民地或接受西方重大影響之前，印度和中東的法治互相之間有很多類似之處。它們都有傳統的書面法律，仰承宗教權威的保護，還有數世紀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達和穆斯林的卡迪）所積累的判例，作為先例而被繼承下來。它們的宗教法律都是正義的最終來源。至少在理論上，政治統治者獲得授權或代理權來執政。

印度和中東在這一方面，與基督教歐洲的距離，遠遠近于這三個地區與中國的距離。它們不同于歐洲的地方，在于其宗教機構都沒有脫離政治秩序。婆羅門教中從來沒有教皇，穆斯林的哈里發在倭馬亞王朝之后，基本上成為伊斯蘭地域中執政統治者的俘虜。這兩種宗教機構不能獨立于政府，也就無法發展成為自主控制用人和晉升的現代等級制官僚機構。沒有自治，宗教法律的機構難以對國家發揮強大制衡。宗教機構與國家相互滲透，國家本身也不能發展成單獨的世俗機構。

不管是印度還是穆斯林世界，傳統的法治都沒能在現代化之后繼續幸存，對后者來說尤屬悲劇。在1772年的印度，以瓦倫·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為首的東印度公司管轄區，決定將印度的法論用于印度教徒，將伊斯蘭教法用于穆斯林，將英國版本的“正義、公平、良心”的法律用于其他案例。[[18]](#m18_17)在應用“印度教法”時，英國人誤解了法律在印度社會中的作用。他們相信，法論（Dharmasastra）相當于歐洲的教會法，也就是，與世俗法律相對的、纂成法典并統一適用于所有印度教徒的宗教法。如我們所知，歐洲的教會法規發展至今，經歷了漫長演變，但印度法律從沒有過類似的進化。它與其說是基于文本的法律，倒不如說是一套鮮活衍變的規則，接受班智達的審視，依據語境而用于印度不同區域。[[19]](#m19_16)此外，英國統治者還因閱讀梵語的能力有限而跌跌撞撞。英國人起初把班智達當作法論專家使用，隨著更多梵語文本譯成英語，遂改持不信任和回避的態度。班智達的使用到1864年完全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英國法官，全靠自己來設法解讀傳統的印度教法。（用于印度穆斯林的伊斯蘭教法也遇上同樣的中斷。）[[20]](#m20_15)此時，作為活的傳統的印度教法全然崩潰，到了印度共和國方才復興，但傳統的連續性已被腰斬。

穆斯林的法治傳統發生更為徹底的中斷。奧斯曼政府像英國人對待印度法律那樣改革伊斯蘭教法。它從1869年到1876年編纂了馬雅拉法典（Mecelle，又譯麥吉拉）。其目標是整頓伊斯蘭教法，將之匯集成統一連貫的法典，以期達到1140年格拉提安整理基督教法規的效果（編按：參見本書第18章）。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削弱了烏里瑪的傳統社會作用。因為與靈活不定的體系相比，在嚴密編纂的體系中，法官作用完全不同，其重要性下跌。1877年的奧斯曼憲法將伊斯蘭教法降為各種法律之一，剝奪了它賦予政權合法性的作用。接受西方法律訓練的法官，逐漸取代傳統學者階層。凱末爾（Kemal Ataturk）和土耳其共和國興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廢除伊斯蘭王朝，以世俗民族主義取代土耳其國家的伊斯蘭基礎。[[21]](#m21_15)阿拉伯人從不接受馬雅拉法典的完全合法性，隨著奧斯曼和青年土耳其黨人等運動的展開，認同感的分裂日益增強。獨立之后，他們發現自己陷于尷尬境地，一邊是已簡化的傳統伊斯蘭教法，另一邊是殖民者帶來的西方法律。

從殖民地走到獨立之后，印度和阿拉伯的途徑分道揚鑣。印度共和國建立了憲法秩序，行政權力接受法律和立法選舉的限制。獨立后的印度法律一直都其貌不揚——像是現代和傳統法律的拼湊物，以講究程序和慢條斯理而聲名狼藉。但它至少是一套法律，除了20世紀70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的短暫緊急狀態，印度領袖愿意在它的約束下運作。

阿拉伯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英國、法國、意大利的殖民當局，其安插在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的傳統君主，很快被世俗的民族主義軍官所取代。后者繼而組織強大的中央政府，不受立法機關和法庭的限制。在這些政權當中，烏里瑪的傳統作用均遭廢除，換成來自行政機構的“現代化”法律。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從沒淪為殖民地，維持新原教旨主義（neofundamentalist）的政權，其行政權力受到瓦哈比派（Wahhabi）宗教機構的制衡。很多行政權力高于一切的阿拉伯政權，蛻化成壓制性的獨裁，無法為國民提供經濟增長或人身自由。

法律學者挪亞·費爾德曼（Noah Feldman）認為，21世紀早期的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重新興起，人們紛紛要求返回伊斯蘭教法，既不滿意當代威權政府的無法無天，又在懷念行政權力曾經尊崇法律的舊時代。他聲稱，回到伊斯蘭教法的呼吁，與其說是反撥時鐘，倒退回中世紀的伊斯蘭教，倒不如說是在祈求政治權力遵守規則的平衡社會。反復訴求“正義”，甚至融入很多伊斯蘭政黨的名字。這不是在追求社會平等，而是在追求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現代的強大國家，如果沒有法治或負責制的制衡，能夠成功實施完完全全的暴政。[[22]](#m22_15)

現代伊斯蘭主義者能否建成接受法治制衡的民主政權？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1979年革命后，伊朗伊斯蘭教共和國的經驗差強人意。自從19世紀以來，什葉派的伊朗一直擁有組織良好的神職等級制度，勝過遜尼派世界中任何其他組織。它在霍梅尼（Khomeini）阿亞圖拉的領導下，奪取伊朗政權，建起真正的神權國家，政府部門都受神職人員的控制。該國發展成為神職的獨裁政府，監禁和殺害政治對手，為達目的甘愿徇私枉法。

在理論上，伊朗共和國1979年憲法可以是溫和、民主、守法國家的基礎。它允許立法機關和總統的選舉，但要接受限制。限制來自一名非民選的最高領袖，以及代表上帝的高級神職人員所組成的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此類安排不一定是“中世紀”或前現代的。馬克斯·韋伯認為是現代理性國家典型的德意志帝國（Wilhelmine Germany），其憲法規定要有民選的立法機關，但受非民選的愷撒的制衡。如果伊朗的最高領袖或監督委員會，把自己當作高級的傳統烏里瑪，享有類似最高法院的權威，不時宣布民選伊斯蘭會議（Majlis）的立法不符伊斯蘭教法，那么將之稱作新式的伊斯蘭教的法治，這還有一點道理。然而，1979年憲法賦予最高領袖的，不僅是司法權，更是實質性的行政權。他控制伊斯蘭教革命衛隊軍團和民兵（Basij），主動干涉讓選舉候選人喪失資格，操縱選舉以制造有利結局。[[23]](#m23_15)像俾斯麥（Bismarck）憲法，或模擬它的日本明治憲法，伊朗憲法特地保留部分行政權力，不是給皇帝，而是給神職等級制度。與在日本和德國發生的情形一樣，這種行政權力使人墮落，軍隊因此而加強對知識階層的控制，恰恰與憲法所規定的相反。

國家建設旨在集權，法治卻在一旁掣肘。 因此，法治發展將遭遇政治競爭，并受制于特殊參與者的政治利益，如早期英王、雄心勃勃的教皇、要求回到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反對派。歐洲法治的基礎始建于12世紀，其最終鞏固還得有賴數世紀的政治斗爭。后來，法治的故事開始與負責制政府興起的故事水乳交融，因為負責制政府的倡導者不但要求民主選舉，還要求行政部門遵守法律。我將在第27章再次討論這個故事。

### 西歐的法治為何較強

過渡到現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紀的歐洲、中東、印度。這些社會的統治者承認，必須在并非由自己創造的法律下過活。然而，限制他們行為的實際程度，不僅取決于理論上的認可，還要依賴立法和執法的建制化狀況。要想讓法律對統治者構成更為有效的約束，需要某些特定的條件：它被編纂成權威的文本；法律的內容不由政治當局而由法律專家來確定；最后，法律被有別于政治等級的建制性秩序所保護，擁有自己的資源和任免權。

與中東或印度相比，西歐的法治獲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這與其說是宗教思想的緣故，倒不如說是歐洲發展中歷史性的偶然情勢所致，因為東正教就從未有過類似的發展。一個重要因素是歐洲權力的極端分裂，給了教會極大的機遇。這導致了頗不尋常的情形：法治得以在歐洲社會中生根發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負責制政府的出現，而且早于現代國家的構建。這在建制化法律的方方面面都是昭然若揭的。

編纂

印度的“吠陀本集”口傳心授，到后期方才寫成文字。明顯不同的是一神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很早就開始以權威的經典為基礎。他們都被稱作“圣書上的民族”。但只有在西歐，混亂的文本、法令、解釋和評論被梳理成邏輯統一的整體。在穆斯林、印度和東正教的傳統中，找不到《查士丁尼法典》和格拉提安的《教會法規》的等同物。

法律專業化

在這一方面，基督教與其他傳統基本上大同小異，大家都培養了解釋和執行法律的專家。只是法律教育在先進大學系統中獲得的開發和正規化，西歐要勝過其他地方。

機構自治

按照亨廷頓的分類，自治是機構發展的典型特征。在這一方面，跟其他地方相比，西方法律獲得更多進展。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類似格里高利改革和敘任權斗爭的經歷。其時，整個基督教會機構都投入與世俗統治者的持久政治沖突，造成勢均力敵的僵局。最后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確保教會作為一個機構的自治地位，并大大鼓勵它發展自己的官僚機構和正式規則。

所以在前現代，與中東、印度和東正教相比，西歐的法治對世俗統治者的權力實施了更為強大的制衡。就后來自由制度的發展而言，這個意義重大。

歐洲的法治得以存活下來，盡管它的合法性基礎在向現代化的過渡中發生了變化。這是內部有機發展的結果，宗教改革破壞了教會權威，啟蒙運動的世俗思想又腐蝕了當時的宗教信念。基于國王、民族或人民的新主權思想，開始取代上帝的主權，而變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礎。許多評論家指出，西方法治比現代民主足足早了數個世紀，所以18世紀的普魯士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Rechtsstaat），在人民主權原則獲得承認之前，已在制衡行政權力。到19世紀的晚期，民主思想獲得合法性，法律越來越被視為民主社會的正面措施。此時，法治所造成的習慣已在西方社會深入人心。文明生活與法律共存的觀念、強大自治的法律機構的存在、資本主義繁榮經濟的需求，合在一起加強了法治，盡管其合法性的基礎已有變更。

我反復強調，一個沒有法治的偉大世界文明是中國。中國皇帝當然有能力實施暴政，如秦始皇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基礎創建大一統國家。然而，中國歷代皇朝并不以嚴酷統治著稱。在有關產權、征稅及為重塑傳統社會風俗而行干預的程度上，中國國家遵守明確的限制。如果這些限制不是來自法律，那源頭到底是什么？作為成熟的農業社會，中國如何治理？這是下面兩章的主題。

## 第20章 東方專制主義

唐朝之后，現代國家重獲鞏固；女皇帝武則天的篡位和從中透露出的中國政治制度；天命和政治合法性在王朝中國的確立

在王朝中國，沒有皇帝承認法律權威的至高無上，法律只是皇帝自己頒布的制定法。換言之，沒有對皇帝權力的司法制衡，遂給暴政留下充分余地。

對中國政治制度而言，這至少提出四個基本問題。第一，缺乏法治給政治帶來的影響。西方有悠久的傳統，把中國列作“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想法是出于無知、傲慢和歐洲中心主義嗎？或者，中國皇帝的確比西歐的君主掌握更大權力？

第二，中國制度中的合法性來自何方？中國歷史充滿無數起義、篡位、內戰和改朝換代的嘗試。然而，中國人始終返回平衡，讓他們的君主掌控巨大權力，這樣做的原因何在？

第三，盡管存在著周期性的皇權專制，中國統治者為何沒有盡量行使理論上所享有的權力？雖然沒有法律，他們的權力仍有實實在在的制衡；中國歷史上有很長時期，皇帝主持穩定和守序的政體，沒有肆意侵犯百姓的日常權益。還有很多時期，皇帝確實很弱，無法在刁蠻社會中強制執行規則。在傳統中國，究竟什么在設置國家權力的真正極限？

最后，就仁政的性質而言，中國歷史為我們提供何種教訓？中國人發明了現代國家，但阻止不了國家的重新家族化。中國王朝歷史的后續世紀就是一段持久的斗爭史，防止這些制度的衰退，抵制權貴為自己和家庭謀求特權的權力家族化。什么力量促進政治衰敗，以及它的逆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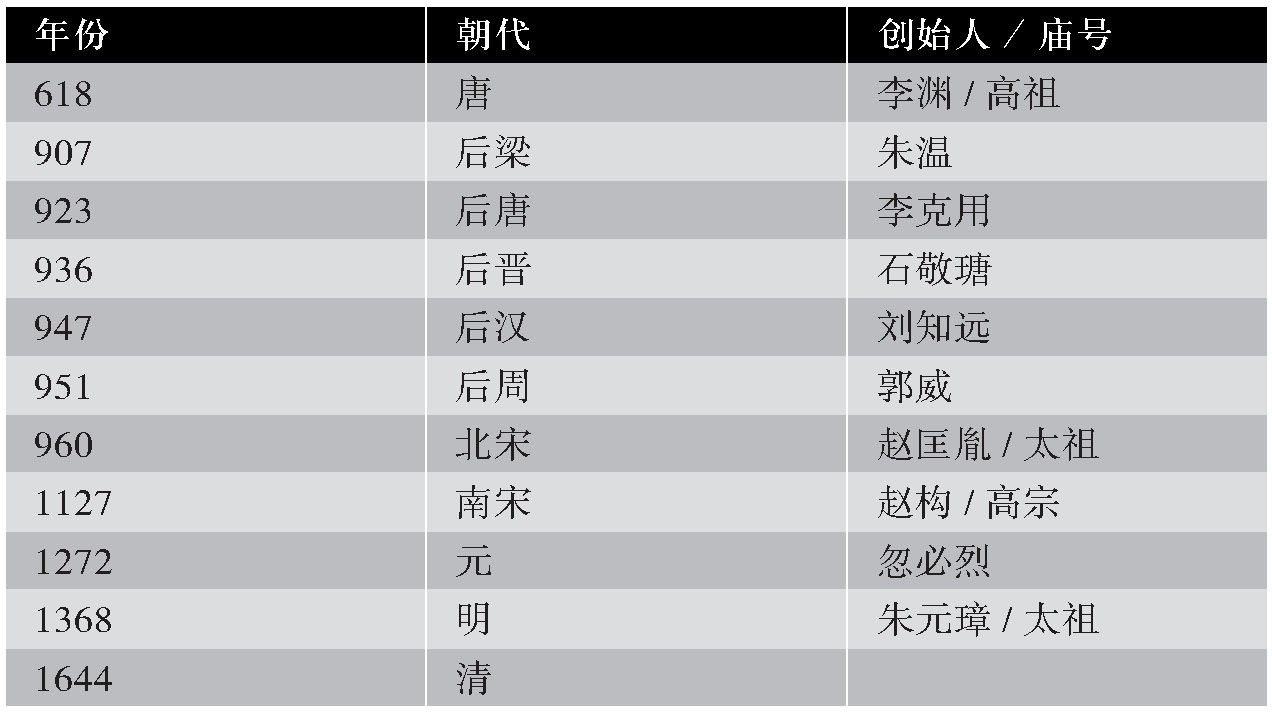
我將嘗試在本章解答頭兩個問題，以下一章解答后兩個。但首先得概述一下從唐朝到明朝的中國歷史。

### 唐宋過渡之后的中國現代化

我最后一次討論中國是在第9章。從3世紀到6世紀，中國經歷了三百年的政治衰敗。我們追蹤它的發展，直到隋唐的重新統一。我提到，秦漢時期就已到位的現代國家制度，遭受嚴重的崩潰，政府重又家族化。漢朝之后的繼承國，多半由貴族家庭掌控，他們將親戚安插在主要職位，競相攫取更多權力。重新統一中國的隋唐兩朝的創始人，楊堅和李淵，都出自這個階層。前者來自北周重要的貴族家庭，后者來自中國西北部的李氏望族，曾被封為唐國公。[[1]](#m1_20)像大部分繼承國，隋朝和唐朝早期都操縱在貴族手中，他們官居要職，統帥軍隊，掌控地方政權。這個精英由北方軍事貴族組成，其成員與鮮卑等野蠻血統進行廣泛的通婚。605年重新建立的科舉制度，只是敷衍了事，在招納非精英進入仕途上乏善可陳。[[2]](#m2_20)

唐朝持續近三百年，但在后期非常不穩定（請看表2的朝代排列）。從7世紀中期“邪惡”皇后武則天崛起開始，貴族精英殺死很多自己的同伴。到8世紀中期，帝國東北邊境上的粟特—突厥（Soghdian-Turkish）將軍安祿山發動叛亂，唐朝皇帝和太子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朝不同方向逃出首都長安。叛亂在八年后終告平息，但帝國中心區域的內戰導致了人口的大量損失和經濟衰退。帝國再也沒有獲得全盤恢復，權力流失到愈益自治的邊境節度使。中國政治制度始終保持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但從此時開始像羅馬帝國，強悍的將軍將轄下的藩鎮當作權力基礎，追求自己的政治前程。唐朝最終在1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崩潰于叛亂和內戰，北方出現軍人掌權的五個短命朝代，南方則看到十個王國你方唱罷我登場。

表2. 后期中國朝代



盡管有將近五十年的中斷，中央國家的合法性在唐朝末年仍然獲得廣泛的認同，以致將領之一的趙匡胤在960年重新統一中國，以太祖皇帝的名號開創宋朝。在很多方面，宋朝在文化思想上是最多產豐饒的朝代。佛教和道教在隋唐兩朝廣受中國百姓和精英的歡迎，而儒家在北宋期間得到巨大的復興，奪回不少信徒。宋明理學是一次強大的思想運動，波及鄰國的朝鮮和日本，大大影響了整個東亞的思想文化生活。[[3]](#m3_20)

同時，中國開始承受一系列來自北方部落的入侵，他們得以占領大片領土，最終竟是整個國家。[[4]](#m4_20)邊患始于契丹，它是蒙古邊界的一個突厥—蒙古民族，在中國北方建立了龐大的遼國，奪得漢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黨項人在遼國西邊創建了西夏，包括前幾朝已受中國控制的邊界地區。下一個出現的是來自東北的女真部落（滿族的老祖宗），它擊潰遼國，并把契丹趕到中亞。（他們向西逃得很遠，竟然碰上俄羅斯人。自此，后者把所有中國人都叫作契丹斯基Kitaiskiy。）1127年，女真人洗劫宋朝首都開封，囚禁剛退位的皇帝和其兒子，迫使宋朝播遷南方，開創南宋朝代。女真人的金國在最旺盛時控制大約中國的三分之一，直到1234年敗于另一入侵的游牧民族蒙古人。[[5]](#m5_20)占領中國北部之后，忽必烈可汗率領的蒙古軍向西南發起進攻，一舉占領整個中國。1279年，蒙古軍追逐南宋朝廷到廣東沿海小島的崖山。在蒙古軍的團團包圍下，數千朝臣自懸崖跳入海中自盡[[6]](#m6_20)，忽必烈可汗成為新創元朝的第一任皇帝。元朝統治者最終在1368年的民族起義中遭到驅逐，為本土的明朝所取代。

春秋戰國時期的持久戰爭激發了愈演愈烈的建國舉措，宋朝時的外敵入侵，卻沒對中國政治秩序發揮類似的作用。盡管有北宋興起的理學派的輝煌成就，這仍是一段相當令人沮喪的時期，中國朝廷內部的派系斗爭，阻止了政權對迫在眉睫的邊患作出充分準備。軍事壓力來自社會發展程度遠遠低于中國的游牧民族，反而成為驕傲自滿的理由。在當時的人類歷史節點上，國家層次的社會與組成靈活騎兵的部落民族對峙，并不一定因先進的政治發展而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如阿拉伯哲學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中國、中東和歐洲，因為鄰接中亞遼闊的大草原，而遭遇周而復始的衰落—野蠻人征服—文明復蘇。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一旦征服中國領土后，最終都采用中國制度，走后也沒留下重要的政治遺產。只有歐洲先進“野蠻人”前來征服，方才刺激中國政治制度醞釀更為根本的改革。

從隋朝開國的581年到12世紀的宋朝晚期，中國最普遍的政治發展之一是家族政府的逆轉，中央集權得以復原到西漢的古典官僚制。到結束時，中國政府已不再受貴族家庭小圈子的控制，治理國家的是從社會廣泛階層招納來的士紳精英。官僚作為儒家價值的監護人，其道德節操獲得修復，并為14世紀明朝的可觀政府打下基礎。中國人口在這段時期急劇增加，到1000年已有五千九百萬，到1300年更高達一億。[[7]](#m7_19)中國開發南方的大片邊境地區后，其領土也擴充到幾近今日的版圖。在這巨大的疆域上，隨著運河和道路的建造，商業和通信獲得實質性的增長。盡管疆域遼闊，中國還是發明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錯綜復雜的社會中設定規則，征收稅賦。統治如此廣闊領土的歐洲國家，還要再等五百年。

中國建立（或重建）較為現代的政治制度，不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與西方接觸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間的過渡期，這一見解首先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日本新聞記者兼學者的內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即內藤湖南。[[8]](#m8_19)內藤認為，貴族統治在公元750年之后的動亂時期遭到席卷。其時，唐朝經歷一系列叛亂和戰爭，非貴族背景的軍事強人乘機掌權。宋朝在960年當政，皇帝不再受貴族家庭的威脅，形成更為純粹的中央專制主義。科舉制度成為選拔官員更為公開的途徑，平民對貴族地主的農奴般的義務終告結束，其地位得到改善。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全國建成，較少依賴世襲特權，白話文和平易近人的通俗文學和歷史話本，逐一取代唐朝高度正規的文體。內藤從中找到與早期現代歐洲的顯著平行，其時的歐洲，在強大專制國家的庇護之下，終止封建特權，引進公民平等。[[9]](#m9_19)雖然內藤的假設引起很大爭議（尤其是他將西方分期法套用在東亞歷史上的努力），但他的主要結論中，已有很多獲得了晚近學者的認可。[[10]](#m10_19)

我們現可以返回本章開頭的中國政治秩序的四個問題，首先是專制問題，中國的專制是否比其他文明中的更為嚴峻？

###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則天

被后世中國史家稱為“毒侔蛇虺”的武曌（624—705），其故事值得在此重提，其意義不只是它可以告訴我們中國政治的性質。女皇武則天是以自己名義統治中國、并建立自己朝代的唯一女子。她的起伏是一部有關陰謀、殘忍、恐怖、性、神秘、女人掌權的編年史。她是極具天賦的政治家，單憑自己的意志和狡猾而獲得權力。儒家意識形態以歧視女子著稱，在這樣背景之下，她的成就顯得格外刺目。[[11]](#m11_19)

我以前討論法治時曾提到，它最初往往只適用于精英，而不是廣大的民眾，普通大眾被認為不算完整意義上的人，不值得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在法治不存在的地方，精英成員通常比普通人面臨更多危險，因為在上層賭注更大、權力斗爭更激烈。這就是武則天治下的情形，她向中國的古老貴族家庭撒出恐怖的天羅地網。

有些歷史學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在武則天的興起中看到重大的社會啟示。有的認為，她代表了上升的資產階級；有的說，她是人民大眾的斗士；還有的認為，她發揮了重要作用，把隋和唐初的家族精英趕走，代之以非貴族官員。尚不清楚，這些理論中哪一條最終證明是正確的。她自己擁有無懈可擊的貴族血統，與隋朝皇族楊家有淵源。她并沒有提攜能干的平民，事實上她取消科舉考試數年，為的是在官僚機構安插自己的寵臣。她對唐宋過渡的貢獻，表現在她清洗實際上和受懷疑的貴族對手，大大削弱他們的人數，使整個貴族階層變得孱弱，從而為安祿山的叛亂鋪平道路。安史之亂標志唐朝走向末路的開始，促動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

像中國宮廷的很多其他女人，武曌發跡于當上唐朝第二個皇帝太宗的低級嬪妃。她父親是唐朝第一個皇帝高祖的擁護者，后來升任高職。如上所述，她母親是隋朝皇室的后裔。據謠傳，她與太宗的兒子高宗甚至在太宗去世之前就已有染。太宗死后，她削發為尼，搬到佛教寺庵。但新皇帝高宗的王皇后，想轉移丈夫對淑妃的寵愛，故意將她帶進宮，以觀鷸蚌之爭。

這證明是個致命的大錯。高宗皇帝為武曌神魂顛倒，在他漫長的當政時期，證明自己是軟弱的，很易受武曌的迷惑。武曌與皇帝生得一女，在無兒女的王皇后來訪之后，設法讓女兒窒息而死。王皇后被控殺死武曌的女兒，與淑妃一起被廢成庶人，家人都被放逐到遙遠的南方。隨之，武曌獲得晉升，到655年當上皇后，遂下令將王皇后和淑妃截去手足，投入酒甕。曾支持王皇后、反對武曌為皇后的宮廷官員，包括曾忠實服務于前代皇帝的，或被放逐，或被處死。

很多中國女子躲在當上君王的兒子或丈夫的幕后，卻行使實質上的大權，但武皇后決心變成真正的共同皇帝（編按：與高宗一同上朝，臨朝聽政，合稱“二圣”），在公共場合中愈益顯示自己的自主權。皇帝為了擺脫她的操縱，曾指責她玩弄巫蠱和妖術。但她當面力爭，反而迫使皇帝殺死控告者，并從宮廷中清洗他們的擁護者。她恢復古代儀式，為自己和丈夫加封，震撼宮廷；為了逃避所謀殺的很多對手的鬼魂，她從長安遷都到洛陽。武皇后安排毒死自己身為太子的長子，誣蔑二子陰謀篡奪父位，將他放逐，迫他自殺。她丈夫最終于683年去世，她又把繼承者（她的三子）中宗從皇位上拖下，處以幽禁。

不出意外，武皇后的興起導致了684年的公開叛亂，叛亂來自身受其害的唐朝貴族家庭。武皇后迅速予以鎮壓，然后設置間諜和告密者的網絡，厚賞檢舉者，從而對整個貴族階層實施恐怖統治。她任用酷吏廣泛從事現在所謂的“法外撲殺”（extrajudicial killings）。等恐怖發作完畢，她又把矛頭指向酷吏頭目，把他們也給殺了，這一切為她建立新朝鋪平道路。690年，她改國號為周，不再以她男性親戚的名義，而以自己的名義單獨執政。

武則天提倡愛民政策，減輕賦役，削減靡費的公共開支，扶助老弱病貧。她也推動為女子著書立傳，延長對母喪的哀悼，封自己母親為榮國夫人。她確實發動了一場社會革命，殺死大量在朝做官的唐代貴族和儒家學者。但她提拔的，不是有才能的平民干部，而是自己的寵臣和阿諛奉承之人，為此而特別放松相關考試和教育的標準。她統治的末期充斥著神秘主義、眾多男寵（往往與她的宗教激情有關）、公開的貪污受賄，對于這些她并未試圖加以遏制。幾近八十歲的她，最終在政變陰謀中被迫讓位；兒子中宗登基，改回唐朝國號。

武則天的行為在中國統治者中不算典型，后世的儒家衛道士申斥她是尤其惡劣的統治者。但作為暴君，對政權內的精英進行大肆的恐怖統治，她在中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多數的歐洲君主，其行事處世較守規則，但對治下的農民和其他平民，往往更加殘酷。

武則天的興起反而給中國女子掌權帶來挫折，因為后來的文人學士將她當作女人干政只會壞事的例證。明朝皇帝在宮門上懸掛一塊鐵牌，告誡自己和繼承者，時刻小心后宮女子的陰謀。后者不得不回到幕后，重新操起遙控兒子或丈夫的故技。[[12]](#m12_19)

### 天命

武則天試圖攫取皇位，創建自己的新朝代，這引出中國君主一開始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問題。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為，主權國家的合法性來自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這份契約中，每個人放棄隨心所欲的自由，以保障自己的生命權，否則就會面對“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如果我們以“群體”替代“人”，很明顯，很多前現代社會的運作就憑借這種社會契約，包括中國。人類愿意放棄大量自由，將相應程度的酌情權力授予皇帝，讓他施政，以保障社會和平。他們寧愿這樣，而不愿看到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交戰狀態。其時，寡頭強人一邊彼此廝殺，一邊盡情剝削自己的臣民。這就是天命的涵義，中國社會將合法性賦予具體的個人和其后裔，讓他們享有統治百姓的獨裁權力。

中國制度使人困惑的，首先不是天命存在與否，所有君主社會中都有類似的東西。它其實是程序問題：覬覦皇位者如何知悉他（在武則天的案例中就是她）已獲得天命？一旦得到，其他覬覦皇位者如有機會為何又不來搶走（要知道皇帝享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

前現代社會的統治者，其合法性可來自多方面。在狩獵采集和部落的社會，它通常是某種形式的選舉的結果，參與的如果不是全體成員，就是主要氏族。或者，部落的長者開會來投票決定誰當領袖。在封建歐洲，某種形式的選舉程序一直存活到早期現代。名叫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或議會（Cortes）的機構，聚集起來開會，以批準新朝代的當政。這甚至發生于俄羅斯，1613年將權力轉給羅曼諾夫王朝，為取得合法性而召開了縉紳會議（zemskiy sobor，編按：俄語зе́мскийсобо́р）。

王朝合法性的其他主要來源是宗教。在基督教歐洲、中東和印度，有強大的宗教機構，既可將合法性賦予統治者，也可將之收回（如格里高利七世與神圣羅馬皇帝的較量）。通常，這些宗教機構在政治當局的掌控之下，別無選擇，只好確認。但在權力斗爭時期，這些宗教權威又可通過授予合法性的能力，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不同于其他文明，因為天命涉及的既不是選舉，也不是宗教賦予的合法性。中國沒有類似三級會議的機構，可供社會精英開會，以批準新王朝的創始人；也沒有宗教等級制度可提供合法性。中國制度中沒有超凡的上帝，天命中的“天”，不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的神。此外，后三種宗教各有自己明確的書面規則。更確切地說，天命更像“自然”或“大道”，可被打亂，但必須返回平衡。此外，基督教皇或穆斯林哈里發，將合法性賦予國王或蘇丹，但中國不同，它沒有宗教機構可代表“天”來授“命”。[[13]](#m13_19)

改朝換代永遠涉及合法性，因為新朝代上臺往往通過簡單的篡政或暴力。天命概念第一次出現于公元前12世紀的商周更替，周武王很明顯從合法持有人那里奪得王位。在隨后四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經歷了多次的改朝換代。不但有主要朝代，像秦、漢、唐、宋、明，還有無數小朝代，像漢朝崩潰后的三國，唐朝之后的五代。此外，有時中國分裂成眾多區域，各有自己的朝代。

成為王朝創始人不需要社會先決條件。有的是前朝的貴族和高級官員，如隋唐的創始人。也有的是平民，如漢朝的劉邦和明朝的朱元璋。事實上，明朝開國皇帝一開始只是農家孤兒，幸免于饑荒和瘟疫，在佛寺里充任小沙彌，后來成為紅巾軍的將領。紅巾軍是一起宗教運動，聚集農民、強盜和投機者向地方當局的不公正提出挑戰。自那以后，他在愈益澎湃的反元運動中統領越來越多的軍隊。元朝末年的中國淪落到一系列地方軍閥手中，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像很多其他的王朝創始人，在某種意義上，他證明自己是最能干最嚴厲的軍閥，最終攀上頂峰。

在中國，是否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天命是否只是軍閥權力斗爭的事后核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一點也不奇怪，這個命題已有大批中國文獻，如公元1世紀班彪的文章，解釋為何有些統治者應得天命，而其他的卻不值。但很難從這些文章中，提取一整套原則或程序，既能明確解說天命的授予，又不便在事后套在成功者的頭上。[[14]](#m14_19)個別領袖的統治能否享有“朝代”的稱號，往往要等很久才能得到歷史學家的確認，從而使當時頗為可疑的政權贏得合法性。歷史學家牟復禮（Frederic Mote）指出，默默無聞的北周創始人郭威和十年后創建強大宋朝的趙匡胤，他們都事涉篡位，上臺都與背叛和欺騙有關，很難分辨。郭威的北周早早夭折，只因為兒子郭榮在三十八歲意外去世。如果郭榮活得長久，趙匡胤可能只是歷史上一名試圖搞叛國政變的能干將領。[[15]](#m15_19)

但皇帝和強悍軍閥之間的道德距離還是非常遙遠的。前者是合法統治者，他的權力得到大家的自愿服從，后者只是暴力的篡位者。哪些領袖有資格獲得天命，哪些沒有，中國精英自有一套理念，雖然不能付諸明確的程序規則。儒家的正名思想意味著，皇帝必須遵循理想前任的榜樣，還必須擁有馬基雅維利所謂的成功君主的美德。顯而易見，未來皇帝必須是天生領袖，能激勵他人追隨自己的權威，敢于冒險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最常見的領導能力是指揮軍事（武功），所以有很多王朝創始人都是以軍事將領起家。但與其他文明相比，中國又比較不重視軍事威力。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飽學的士大夫，而非粗野的軍閥。覬覦皇位者，如果展示不出對儒家價值的恭敬和自身的教養素質（文治），便招攬不到宮廷內外各式派別的支持。牟復禮把明朝創始人朱元璋和他的競爭對手張士誠對照起來：

張士誠當過走私犯和強盜，在潛在的精英顧問和政治伙伴眼中，成了他的先天不足。很難在他的痞子經歷中找到將會有大造化的證據……其早期謀士在他身上開了一個文人玩笑，朱元璋對此津津樂道。那些早期謀士給他和他兄弟換上雅致的大名，選了“士誠”二字，但沒告訴他，《孟子》中有一名句，也包含依次出現的這兩個字。但只要移動一下句讀，該名句便變成：“士誠，小人也”。這一巧妙的蔑視讓朱元璋哈哈大笑，直到有一天他懷疑，身邊的文人顧問也有可能在用同樣的妙計詆毀自己。[[16]](#m16_19)

中國的社會精英沒有投票批準新朝代，但在潛在統治者的權力斗爭中，仍發揮重要的幕后影響。天命并不總是授給最殘忍最暴虐的軍閥，雖然這樣的人不時在中國上臺執政。

很多像武后那樣的覬覦皇位者，安排參與使自己獲得君王權威的儀式——選擇自己的廟號和朝代開始的年號——但很快垮臺。中國制度能在建制化上做得特別講究。一旦呈現某人擁有天命的社會共識，其合法性通常不會受到挑戰，除非出現異常。在這一方面，中國的政治制度遠比周遭的部落社會先進。

皇帝收到天命后，其權力實際上是無限的。然而，中國皇帝很少充分行使他們的權力。暴政永遠可能，但往往不是現實。其何以如此，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 第21章 “坐寇”

所有國家都是掠奪性的嗎？能否給明朝的中國貼上如此標簽；中國歷史后期的獨斷專行；沒有對行政權力的制衡，能否維持清廉政府

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一篇頗有影響的文章中，提出政治發展的一個簡單模式。[[1]](#m1_21)世界最初落在“流寇”（roving bandit）的手中，像20世紀早期中國的軍閥混戰，或21世紀初在阿富汗和索馬里的軍閥割據。這些強盜純粹是掠奪性的，經常在短時間向居民榨取盡可能多的資源，以便移往他處，尋找其他受害者。到一定時刻，其中一員變得鶴立雞群，掌控整個社會：“這些暴力企業家當然不會自稱為強盜，恰恰相反，他們會給自己和后裔冠上高貴的名號，有時甚至宣稱享有神授君權。”換言之，自稱合法統治的國王只不過是“坐寇”（stationary bandit），其動機與他所取代的流寇，沒有什么差異。坐寇知道，如果不做短期的掠奪，反而向社會提供穩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務，讓它在長遠時期變得更加富饒，更能承擔稅賦，自己也就得到更多的收獲。對受統治者而言，與流寇相比，這是一大進步。“流寇定居下來，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務，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這理性自私將使他從社會中榨取最大化的資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將使用壟斷的強制權力，攫取最大化的稅賦和其他勒索。”

奧爾森繼續指出，坐寇的最大化稅率可與微觀經濟中的壟斷價格媲美。如果實際稅率超過這個限制，將打消生產動機，從而導致總稅收的下跌。奧爾森認為，專制統治者不可避免總是制訂最大化稅率，而民主政權總是制訂比專制政權更低的稅率，因為它們必須求助于承擔主要稅責的“中間選民”（median voter）。

統治者就是坐寇，從社會中榨取最大值的稅賦，除非在政治上受到阻止。奧爾森解說政府如何運作的這一概念，雖然憤世嫉俗，卻討人喜歡。這符合經濟學家的努力，他們試圖將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行為模型推進政治領域，把政治看作經濟的衍生物。這非常吻合美國政治文化的反中央集權的傳統，后者對政府和征稅始終保持懷疑態度。這還為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發展理論，提供了預言性的漂亮模式，近年來得到了其他社會學家的極大擴展。[[2]](#m2_21)

但奧爾森理論是不正確的。傳統農業社會的統治者，經常無法使用奧爾森的最大化稅率向臣民征稅。要回到一個不完全貨幣化的社會，憑借殘缺不齊的歷史稅收數據，估算出當年的最大化稅率，當然非常困難。但我們知道，前現代統治者經常增稅，以滿足像戰爭等的特定需求，待到緊急狀態結束時再予以減稅。僅在特定時期，統治者才會把社會逼上適得其反的絕境，這通常發生于朝代末期，以救燃眉之急。正常年代，他們向社會的征稅一定遠遠低于最大值。

奧爾森模式的欠缺，最佳例證就是明朝中國。廣泛的共識認為，當時的稅率遠遠低于理論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務所必需的水平，譬如保障社會生存的國防。在明朝中國發生的，同樣也會在其他農業社會發生，如奧斯曼帝國和歐洲的君主政體。這還可成為其他理論的組件，以解釋傳統政權為何很少采用最大化稅率。[[3]](#m3_21)

皇帝并沒行使理論上的權力，不單表現在征稅上。武則天式的專制只是偶見，并不是持續現象。很多中國統治者對治下的百姓，表露出可被稱為仁慈或忍讓的態度，或儒家所謂的“仁”。中國有悠久的抗稅歷史，儒家的傳統更認為，重賦代表了國家的道德缺陷。《詩經》就有如下的詩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4]](#m4_21)

明朝皇帝在權力上受到的約束并不來自法律。如我們在武則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中國統治者不像歐洲統治者，如要增稅，無須征求高等法院或議會的同意。他們不但可以頒發行政命令，任意調整稅率，甚至可以隨意沒收他人財產。早期現代的法國和西班牙“絕對”君主，遇上強大精英時必須小心翼翼（參看第23章和第24章）。相比之下，明朝開國皇帝太祖，一下子就沒收了全國最大幾個地主的地產。據說，他清算了“無數”富裕家庭，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因為他相信那里有特別頑固的反抗。[[5]](#m5_21)

對中國權力的真正約束大體有三種。第一，缺乏誘因來設置龐大的行政機關以執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較高的稅賦。明初，中國已是大國，其人口在1368年超過六千萬，到17世紀末更增至一億三千八百萬。[[6]](#m6_21)在這樣遼闊的領土上征稅并不容易。在14世紀，貨幣流通很少，每個居民要繳的基本農業稅都是實物[[7]](#m7_20)，通常是谷物，也可能是絲、棉花、木材和其他貨物。當時沒有綜合的貨幣制度，以記錄這些稅賦，或將之轉換成共同的計量單位。很多稅賦歸當地消耗（納入預算），其余的運到逐級而升的糧倉，最終抵達首都（先在南京，后在北京）。納稅人承擔的運輸費用，往往超過所運貨物的價值。地方和中央的收入和預算不做分門別類。有學者將之比作老式的電話接線板，電線來自各方，再插入各方，復雜得像一團亂麻。[[8]](#m8_20)戶部人手不足，根本無法控制或理解這個制度。作為土地稅基礎的土地清查，實施于朝代早期，但并不齊全，之后又沒有更新。人口增長、所有權變更、地理變化（洪水淹沒或開辟荒地），很快使人口登記冊過時。像其他民族，中國人也非常擅長于隱藏資產，并策劃掩飾收入的計謀。[[9]](#m9_20)

皇帝征稅和沒收的無限權力常常是閑置的。它的使用多在朝代初期，皇帝正在鞏固權力，與早先的對手一一算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宮廷經常需要那些精英的合作，便在早先沒收財產的地區實施顯著較低的稅率。

第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應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稅收需求。奧爾森假定，任何統治者都想獲得稅收最大化。這反映了現代經濟學的普通假設：最大化是人類行為的共同特征。但這是時代倒錯，將現代價值向歷史投射，當時社會并不一定同享這種價值。明朝開國的太祖皇帝是一名非常節儉的獨裁者，他削減中央政府，避免涉外戰爭，糧倉實際上常有盈余。他的繼承者明成祖朱棣（1360—1424）則截然不同，啟動了雄心勃勃的營造運河和宮殿的大工程。明成祖也資助宦官將領鄭和（1371—1435）下西洋，其巨型艦隊抵達非洲，甚至可能更遠。其政府開支是太祖時的兩至三倍，額外稅賦和徭役都有相應提高，引發了抗稅起義和普遍不滿。結果，第三任皇帝和后續繼承者只好降低稅率，向太祖時的水平靠攏，還向受觸犯的士紳階層作出其他政治讓步。[[10]](#m10_20)明朝的大部分時期，土地稅定在總產量的5%，遠遠低于其他農業社會。[[11]](#m11_20)

中國君主一點也不遜于其他前現代社會的統治者，卻往往展示出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馬賀）所謂的“適可而止”（satisficing）行為，而不是最大化行為。[[12]](#m12_20)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如戰爭所引起的急需，他們經常滿足于讓睡著的狗繼續躺著，僅僅征收應付正常需要的稅賦。[[13]](#m13_20)下定決心的皇帝可能追求最大化稅收，如明成祖，但所有專制政治領袖都會自動追求最大化的想法，顯然不是真實的。

對皇帝權力的第三種限制不在征稅和財政，而是權威的轉授（delegation）。所有大型機構，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公司，都必須轉授權威。這樣做時，位居行政等級頂端的“領袖”，便會對機構失去相當程度的控制。轉授的權威可以給功能專家，如預算官員或軍隊后勤，也可以給省、州、市和地方當局。這種權威轉授是不可或缺的，因為統治者從來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知識作出國內所有的重要決定。

權威轉授的背后是權力轉授。代理人以專門知識向委托人行使反制的權威。它可能是管理特殊部門的技術知識，也可能是某地區特別情形的本地知識。因此，像赫伯特·西蒙那樣的組織專家認為，大型官僚機構中的權威不是一味從高到低，有時竟往往是反方向的。[[14]](#m14_20)

像現代的總統和首相，中國皇帝也遇上這類難題，官僚機構要么反應遲鈍，要么蓄意違抗。尚書們或者反對皇帝的提議，或者悄悄地陽奉陰違。當然，中國統治者享有現代主管所沒有的手段：他可以廷杖各級官員的赤裸屁股，或隨便判以監禁和處決。[[15]](#m15_20)但這種強制方案，并沒解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潛在的信息問題。官僚經常不執行領袖的意愿，因為他們比較了解帝國的實際情形——并可欺上瞞下。

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其治理必須轉授權力，必須依賴地方政府。不過，地方政府會濫用職權，腐化墮落，甚至共謀以反中央。正規的行政機構不足以對付此類問題。命令自上而下層層傳達，但信息不一定回饋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濫權的發生，最獨裁的皇帝也不會去懲治恣意妄為的官員。

君主權力的局限，曾在“封建制”和“郡縣制”孰是孰非的標題下，在前現代中國受到討論。這里的封建與歐洲封建主義的復雜內涵毫不相干，只表示權力的分散，而郡縣制的地方官員都是中央指派的。根據明朝學者顧炎武（1613—1682）：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16]](#m16_20)

為了應付反應遲鈍的行政機構，中國統治者的典型對策是設置間諜和告密者的平行網絡，完全脫離正式政府，只是重疊在其上。這顯示宦官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訪皇帝居所，通常獲得比政府官員更大的信任。皇宮因此派他們外出，或刺探情報，或懲罰正式官僚。到明末，皇宮估計有十萬宦官。[[17]](#m17_19)從1420年開始，他們組織成奧威爾式（Orwellian）的秘密警察，全名叫東緝事廠，受東廠掌印宦官的管轄，在朝代晚期演變成“極權恐怖主義的機關”。[[18]](#m18_18)但皇帝又發現，他也控制不了宦官。盡管有內正司（編按：明代負責懲處違紀太監的專門機構），他們還是自訂政策，上演政變，共謀反對皇帝。[[19]](#m19_17)中國政治制度沒有任何政治負責制的機制——沒有地方選舉或獨立媒體，以保證官員的誠信。因此，皇帝不得不將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統，疊放在另一套之上。雖然如此，他仍然無法取得對國家的嚴密控制。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稅賦，最終導致它的倒塌。明朝統治的頭兩個世紀，中國基本上沒有外患威脅。到16世紀末，安全情形急劇惡化。日本海盜開始突襲富庶的東南海岸，幕府將軍豐臣秀吉在1592年侵犯朝鮮。同年，內蒙古發生戰爭，南方的土著也紛紛起義。最為嚴峻的是北方的后金，它變得更加強悍，組織得更加嚴密，已在東北邊境頻作騷擾。

政府對危機的回應完全無力。面臨攀升的開支，它耗盡銀子儲備，但仍然拒絕向士紳階層增稅，最終坐失良機。雖然軍事威脅變得愈益明顯，累計欠稅在17世紀最初幾十年仍持續上升。皇帝甚至幾次頒布稅賦大赦，在征收欠稅上顯然認輸。戍邊軍隊早先組織成自給自足的軍事屯墾區，現再也無法支撐，必須仰賴中央政府長途運來的給養。政府沒能組織妥善的押運制度，因此做不到準時支付軍餉。朝廷步履蹣跚，勉強維持到1644年。其時，北京政府因李自成的漢族起義軍的打擊而愈益衰弱，最終毀于獲得明軍降將幫助的滿洲軍隊。

### 好政府，壞政府

20世紀之前，明朝是統治中國的最后一個本土政權，其傳統政治制度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的機構現在看來是非常現代和有效的，但其他方面卻落后和失靈得難以置信。

首先是帝國的官僚選拔制度。科舉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漢朝，但在隋、唐、宋初，出仕人選仍局限于精英家庭的小圈子。到了明朝，科舉制度才成為進入政府的主要途徑，贏得了威望和自主，使之成為所有后世科舉制度的榜樣。

科舉制度與更廣泛的教育機構相連。全國各地都有儒家學校，接受望子成龍的父母送來的孩子。最好的學生由老師推薦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深造，將來參加科舉考試。（推薦不爭氣學生的老師要受罰。此法現代大學可以借鑒，用以抵制貶值的分數。）精英家庭仍有可能以“例監”的名義，將自己的孩子送進去。但這些靠捐納取得資格的監生（類似于當代哈佛和耶魯的遺產特選生，即富裕校友的孩子），很少抵達官僚機構的最高層，那里仍然嚴格要求選賢與能。[[20]](#m20_16)最高榮譽屬于連中三元者，即在三級考試中都獲第一名：省的鄉試、京城的會試、宮廷的殿試。在明朝歷史中，完成此一壯舉的僅商輅一人。他在官僚機構中級級高升，到15世紀晚期成為謹身殿大學士。[[21]](#m21_16)

中國的官僚機構樹立了一個模版，幾乎所有現代的官僚機構都是它的復制品。它有中央集權的委任和晉升制度，各等官職從頂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很像美國政府的文官序列表），每一品又分正從兩級，所以，官職提升可從正六品到從五品。經科舉而入仕的官員，會被派到全國各地擔任低層官職，但不得在自己家鄉。如果親戚碰巧分配在同一衙署，年少的通常必須引退。三年之后，官員得到部門主管的評估，再直接上報吏部。不鼓勵官僚的水平調動。經受住這個制度淘汰、并被提升到頂端的官員，往往是才華特別出眾的。[[22]](#m22_16)

然而，這些才干優長、組織良好的官員在為一位獨裁者服務。他無須遵守任何規則，大筆一揮便可否決仔細謀劃出來的政策。他們面對皇帝變化無常的處罰和清洗，只有很少高官得以結束自己的任期，而沒有受到羞辱。最壞的決策出自開國的太祖皇帝，他對自己的丞相產生懷疑，不但廢除丞相制，而且規定“以后嗣君，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此請者，置之重典”。這意味著，后代皇帝不能有相當于總理的助手，只好親自與掌管實際工作的數十部門打交道。這個制度在精力充沛、巨細無遺的明太祖手中，尚能勉強運轉；在能力較差的后代統治者手中，簡直就是一場災難。十天內，太祖必須應答1 660本奏章，處理3 391件不同事項。[[23]](#m23_16)可以想象，繼任者對太祖所規定的工作量的憤慨。

很多后代皇帝不勝其任。傳統上認為，明神宗（萬歷皇帝）是最不堪者之一。他自1572年到1620年的漫長統治，正好對應著明朝的式微。[[24]](#m24_15)在位的后半期，他干脆拒絕與尚書們見面和主持朝廷。數千份奏折留中不發，在宮廷里堆積如山，既不看也不予答復。事實上，他一連數年不出宮殿，其間重要的政府決策都無法制定。他也非常貪心，挪用國家財政來支付私人費用，例如建造壯觀的定陵。17世紀早期的軍事危機中，國家儲備僅剩二十七萬兩銀子，他自己名下卻累積兩百多萬兩。不顧戶部尚書的屢屢請求，他仍拒絕發放足夠的帑銀來支付軍餉。[[25]](#m25_14)他的行動直接導致了最終摧毀明朝的滿族力量的增長。

### “壞皇帝”的問題

我們所討論的政治發展三大組件中——國家建設、法治、負責制——中國在歷史早期就獲得了第一件。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發明了好政府。他們設計的行政機構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組織起來，以非人格化標準進行招聘和晉升，這絕對是世界第一。也許因為中國社會如此重視家庭，國家建設者認定，他們的特別任務就是在政府中杜絕腐敗根源的家族或裙帶的影響。

在戰國時期的戰爭洪爐中建立如此制度是一回事，要在后續兩千年中維持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早已獲得現代性的官僚機構，在國家崩潰或遭受貴族家庭的瓜分時，又變成衰敗和家族制復辟的犧牲品。國家衰退在數世紀內逐漸發生，再要恢復到當初秦漢創建者的設計，也要花費數世紀。到了明朝，古典制度在很多方面獲得完善。它更加任人唯才，所控制的社會比漢朝的更為龐大，更為復雜。

在其他方面，中國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從沒創立法治和政治負責制的機制。國家之外的社會像以前一樣，與歐洲或印度相比，組織得更為松散，很難采取政治行動。沒有擁有土地的獨立貴族，也沒有獨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紳和農民，只可被動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時爆發激烈的起義，又遭到殘酷的鎮壓。他們從來沒有像斯堪的納維亞農民所做的那樣，組織成集團向國家爭取權利。隨著佛教和道教的流傳，獨立的宗教團體在隋唐時期蓬勃興起。在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這些宗教團體發揮反國家的作用，從紅巾軍到太平天國。但宗教始終只是小宗派現象，在正統儒家當局的眼中是可疑對象，從沒能代表強大的社會共識，也不能以法律監護人的資格來限制國家權力。

中國王朝的重大遺產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世界上幾乎所有成功的威權現代化者，包括韓國、新加坡，現代中國大陸、臺灣地區，都是分享中國共同文化遺產的東亞國家，這不是偶然現象。很難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中東，找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或韓國的樸正熙那樣素質的威權統治者。

但明朝和中國其他歷史時期的經驗，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在沒有法治或負責制的情況下，良好統治能否長久。如遇堅強能干的皇帝，該制度卓有成效，雷厲風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遇變化無常或庸碌無能的君主，他們大權獨攬，經常破壞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則天清洗官僚機構，安插自己不合格的追隨者；明太祖廢除丞相制，讓繼任者束縛于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導致政府癱瘓。中國人視之為“壞皇帝”問題。

中國制度中確有一種負責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對人民的責任。他們中的優秀者，盡量回應人民的需求和抱怨。盡責的統治者還經常以人民名義懲戒手下官員，并依靠宦官網絡來刺探誰在做好事，誰在做壞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負責制是向上的，即對皇帝負責。地方官員必須擔憂，宮廷如何看待他們的表現，但絕對不會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見，因為后者無法依賴司法或選舉的程序來反對自己。對普通中國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訴，希望皇帝有可能獲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遼闊的帝國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簡直是緣木求魚。

……

然而，法治和政治負責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濫權的絕大多數，并不來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散布四方的各級地方官員。他們狼狽為奸，或偷竊農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賄賂，或漠視環保和安全的規則，或遵循歷來地方官員所從事的。如有災難發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學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國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訴。而中央政府則不一定作答。有時，它會對犯法官員采取嚴厲措施，但在其他時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應付更為緊要的事務。

法治和政治負責制本身很好，但有時會攪亂卓有成效政府的運作，如印度國家由于訴訟和公眾抗議，而無法作出基建項目的決策；或美國國會由于說客和利益團體，而不愿面對像社會福利這樣的緊迫問題。

但在其他時候，為維護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負責制又屬必不可少。在適當條件下，強大的威權制度可以建立非常有效的政府。政治制度要能承受外部條件的變化，以及內部領袖的變更。法治和負責制制衡國家權力，從而減少政府表現的參差不齊。它們約束最好的政府，但也防止壞政府的失控。相比之下，中國人從未能解決壞皇帝的問題。

### 光有制度還不夠

傳統中國為何發展不出本土的資本主義？這引起了廣泛爭論，包括馬克斯·韋伯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本卷目的不是為了參與爭論，只是想解說，遏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大概不是由于良好制度的缺席。

現被認為與現代經濟發展休戚相關的制度，明朝中國已擁有大部。它有強大和組織良好的國家，可提供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賣官鬻爵和其他公開的腐敗雖然存在，但不像17世紀的法國和西班牙（參看23章和24章）那么猖獗。[[26]](#m26_13)暴力處于控制之中，與很多當代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實現了文官政府對軍隊的高度控制。其弱點當然是法治的缺乏，產權因此而受害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如我在第17章中所爭論的，對經濟增長而言，憲政意義上的法治并不是必須的。雖然土地不時被征用，尤其是在朝代初期，但國家得以維持幾十年“足夠好”的產權，在農村的征稅也尤其偏低。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足夠好的產權，以支持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27]](#m27_11)

當然，明朝中國奉行經濟上不理性的政策，嚴格控制商人和貿易。它對食鹽生產的壟斷將價格人為提高，像法國和奧斯曼帝國一樣，導致大量走私和腐敗。對發展來說，政策遠遠沒有制度那么重要，朝令可以夕改，而制度的建立則艱難得多。

中國所缺乏的，恰恰是經濟學家假設為人類共同特征的利益最大化精神。明朝中國的各行各業，都沉浸在巨大的滿足之中。皇帝覺得沒有必要收取力所能及的稅賦，其他種類的革新和變更也都不值一試。下西洋總兵正使鄭和遠航印度洋時，發現了全新的貿易通道和文明社會，但沒有激起好奇心，也沒有后續的遠航。下一個皇帝為了節約而削減海軍預算，中國的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剛剛開始，便告結束。同樣，名叫蘇頌的宋朝科學家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機械時鐘，由水輪推動龐大多層的齒輪系統，因女真人攻陷首都開封而遭遺棄。時鐘的部件散落各地，如何制作，乃至它的曾經存在，經過幾代人就湮沒無聞了。[[28]](#m28_9)

阻礙明清中國取得經濟增長的因素，今天已不復存在。早期西方評論家認為拖中國后腿的文化缺陷，現也不再是原因。20世紀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紳學者，留長指甲，除了當官，拒絕做任何其他工作，成為現代化的障礙。這一獨有的士紳理想已在20世紀消失，但重視教育和私人進取的文化遺產仍然生龍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它體現在全世界無數中國母親身上，省吃儉用，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學校，敦促他們在標準化考試中出人頭地。導致明成祖的繼任者取消遠航的自滿，已被異乎尋常的強烈意愿所取代，中國領導人渴望學習外國經驗，如果合適便加以采用。首創門戶開放的政治家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在前一世紀全球經濟比賽中表現得如此糟糕，現在又如此杰出。較為信服的解釋是它對科學、知識和革新的態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 第四部分 負責制政府

## 第22章 政治負責制的興起

何謂政治負責制；歐洲建國的遲到反成自由的來源；輝格史觀錯在何處；比較各國才能理解政治發展；歐洲五種不同的結果

負責制政府意味著，統治者相信自己應對治下的民眾負責，應將民眾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負責制可以多種方式獲得，如道德教育，這是中國和受儒家影響國家所奉行的。君主接受教育，深感對社會的責任，并從老練通達的幕僚那里，接受經邦緯國的咨詢。今天，統治者自稱關心民眾，但又不受法治或選舉在程序上的限制，如此的政治制度，西方人士往往嗤之以鼻。但道德負責制在威權社會中仍有實際意義，約旦哈希姆王國與薩達姆·侯賽因治下的伊拉克復興黨（Ba’athist）政權形成明顯的對照。它們都不是民主政體，但后者實施殘酷和無孔不入的專政，主要為薩達姆親朋好友的利益服務。相比之下，除了權力極其有限的議會，約旦國王無須對人民負責，但還在盡量滿足約旦社會各團體的需求。

正式的負責制只是程序上的：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隨心所欲的機制。歸根結蒂，這些程序（通常在憲法中得到詳細說明）允許社會公民因政府瀆職、無能或濫權而將之完全取代。今天，程序上負責制的主要形式是選舉，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選的多黨選舉。但程序上的負責制并不局限于選舉。在英國，對負責制政府的早期要求是以法律名義，公民相信國王也應服從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通法，基本上是由非民選法官所塑造，再加上非普選議會所制訂的。所以，最早形式的政治負責制，其對象不是全體人民，而只是代表社會共識的傳統法律，以及寡頭的立法機關。我在此使用“負責制”，而不用“民主”，道理就在這里。

久而久之，民主漸漸發生。選舉權逐一抵達更為廣泛的階層，包括無產男子、女子、少數種族、少數民族。此外愈來愈明顯，法律不再依據宗教，而要求得到民主的批準，即使其執行仍留給專業法官。在英國、美國和西歐，程序上負責制的完全民主化，一直要等到20世紀。

### 姍姍來遲的歐洲建國

早期現代時期，歐洲國家建設者方才投入等同于中國和土耳其的工程——建造強大的中央國家，在全國領土上實施統一的行政管理，并宣稱主權。這些努力開始得很晚，始于15世紀末，成于17世紀末。國家主權的理論來自學者的筆尖，如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他們主張，真正享有主權的不是上帝，而是國王。

總的來說，歐洲君主在此項工程中遇上更大阻力，與中國或土耳其相比，歐洲社會中其他政治參與者組織得更為嚴密。國家建設繼續進行，但經常遭遇有組織的反抗，迫使統治者尋找同盟以求折中。地主貴族早已根深蒂固，堅守在固若金湯的城堡，擁有獨立的收入和軍隊。中國貴族從未獲得如此的獨立；如我們所知，奧斯曼帝國從不允許此種貴族階層誕生。國家建設廣泛開展時，西歐涌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元素。商人和早期制造商創造大量財富，不受國家的控制。自治城市愈益成熟，尤其在西歐，還依據自己的規則來組織自己的民兵。

歐洲法律的早期發展在限制國家權力上發揮重要作用。君主經常侵占百姓的產權，但漠視法律依據而隨意沒收私人財產的卻很少。因此，他們并不享受無限的征稅權力，為了資助戰爭還要向銀行家借錢。就任意的逮捕或處決而言，歐洲貴族享有更多的人身安全。除了俄羅斯，歐洲君主也避免在自己社會中向精英發動赤裸裸的恐怖和威脅。

歐洲國家建設的遲到，恰恰是歐洲人后來享受的政治自由的來源。早熟形成的國家，如果缺乏法治和負責制，能對百姓實施更為有效的暴政。物質條件和技術的每一項進步，落在不受制衡的國家手中，便意味國家更有能力為自身目的而嚴格控制社會。

### 向平等進軍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開門見山：過去八百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認可，這一事實是天賜的（providential）。[[1]](#m1_22)貴族的合法性——有人生來就高貴——不再是理所當然。沒有奴隸的改變意識和尋求承認，主子和奴隸之間的關系就無法顛倒過來。這一思想革命有很多來源。所有的人，盡管在自然和社會的層次有明顯差異，但在尊嚴和價值上卻是平等的。這個概念是基督教的，但在中世紀教會的眼中，其實現并不在今生今世。宗教改革，加上印刷機的發明，賦予個人閱讀圣經和追求信仰的權利，不再需要像教會那樣的中介。始于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已開始質疑既存權威，現在這種質疑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那時，人們開始重新學習古典文獻。現代自然科學——從大量實證數據中提煉普遍規則，通過可控試驗來測試因果理論——樹立了新式權威，很快在各大學中獲得建制化。它所孵化的科學和技術，可供統治者利用，但不受控制。

奴隸日益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而變得理直氣壯，這種轉變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追求自己的政治權利。換言之，他們要求分享共同決策權。該權利曾存在于部落社會，只因國家興起而湮滅。這項追求導致了社會團體的大動員，像資產階級、農民和法國大革命中的城市“群眾”，曾經都是治下的消極老百姓。

這項追求寓于普世的字眼之中，對現代負責制政府的興起至關重要——如托馬斯·杰斐遜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它是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縱觀人類歷史的先前階段，不同個人和團體為獲得承認而斗爭，但其尋求的承認是為他們自己、他們的親戚團體和社會階層；他們試圖自己成為主人，而從不質疑主子和奴隸的關系。對普遍權利的新式理解顯示，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不再以新的狹窄精英團體去替換舊的，而在為全體人口逐漸獲得選舉權而鋪平道路。

思想變化的累積效果是極其巨大的。法國有中世紀機構三級會議，如有國家大事，可召集全國代表來開會作出決定。1614年，瑪麗·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攝政王召開的三級會議，對腐敗和稅賦頻發牢騷，怨聲載道，但最終還是接受皇家的權威。到1789年，由于啟蒙和人權思想的影響，它的再次召開遂激發法國大革命。[[2]](#m2_22)

如果沒有權力和利益的潛在平衡，使參與者認為它是糟糕選擇中最好的，單憑思想觀念，還不足以建成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強大國家既執行法律，又受法律和立法機關的制衡，這種奇跡全靠社會上不同的政治參與者彼此之間維持大致的均勢。他們當中，誰也不是龍頭老大，便不得不達成妥協。我們所理解的現代立憲政體，就是這些不受歡迎、計劃之外的妥協的結果。

自共產主義倒塌和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以來，我們目睹了這種動態。第三波始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在20世紀70年代的民主過渡；到70年代和80年代，再轉移至拉丁美洲和東亞；隨著1989年后東歐共產主義的倒塌而抵達頂峰。民主政體是最為合法的，甚至是唯一合法的，這種思想已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民主憲法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前共產主義世界獲得重訂，或首次制訂。但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僅占參與民主過渡國家的一部分，因為社會力量的對比，未能迫使不同參與者達成憲政上的妥協。這個或那個參與者——通常是繼承了行政權威的——總會比其他參與者更為強大，并以他人為代價擴充自己的勢力。

支持現代民主的啟蒙思想在歐洲廣泛傳播，一直抵達俄羅斯。各國接受程度則有顯著的差別，取決于不同政治參與者對自身利益所受影響的估量。要了解負責制政府的出現，必須了解歐洲各地既存的政治力量，有些提倡負責制，另一些并不反對專制主義的抬頭。

### 僅了解一個國家等于不懂國家

我談論歐洲時，好像它是與中國或中東作比的單獨社會，但在事實上，它擁有政治發展的多種模式。現代憲政民主的故事經常基于勝利者的觀點，即老是依據英國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國的經驗。在所謂的“輝格史觀”（Whig history）中，自由、繁榮和代議政府的同步成長，被視為人類制度無可阻擋的進步，其始于希臘民主和羅馬法律，銘記于大憲章，雖受到斯圖亞特王朝的威脅，但在英國內戰和光榮革命期間，獲得了捍衛和昭雪。這些制度通過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輸給世界各國。[[3]](#m3_22)

輝格史觀的問題，不是指它的基本結論是錯的。實際上，強調征稅在驅動負責制政府出現上的首要作用，大體是正確的。問題在于，像所有僅從單一國家歷史出發所作的論證一樣，它不能解釋議會制度為何出現于英國，而缺席于情形相近的其他歐洲國家。這種史觀經常導致評論家斷定，已然發生的事必然發生，因為他們不清楚導致特別結果的復雜背景關聯。

舉例說明，在蘭尼米德七年之后的1222年，皇家侍從階層迫使匈牙利國王安德魯二世（Andrew Ⅱ）簽署讓步的金璽詔書（Golden Bull），被譽為東歐的大憲章。該詔書保護精英免受國王的隨心所欲，如果國王違諾，主教和議會要員享有抵制權利。但這詔書從沒成為匈牙利自由的基礎。這部早期憲法在限制匈牙利國王權力上頗為有效，實際統治權竟而落到了不愿自律的貴族階層手中。該憲法并沒開發新政治制度，以立法機關來制衡行政權力，反而阻礙了強大中央政府的出現，以致國家無法抵抗外來侵略。國王也無法保護國內農民免遭寡頭的貪得無厭。到了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匈牙利完全喪失自由，成為奧斯曼帝國的戰利品。

負責制政府興起的任何解釋，既要看成功案例，也要看不成功的。這樣才能了解，為何代議制度出現于歐洲某地而專制主義卻盛行于其他地方。從德國歷史學家奧托·欣策（Otto Hintze）開始，已有人在作出努力。查爾斯·蒂利再接再厲，認為外部軍事壓力和征稅能力是主要的變量。[[4]](#m4_22)最近的卓越努力來自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他查閱的案例遠遠超過大多數比較歷史研究，并對大部分觀察到的差異作出了較為信服的解說。[[5]](#m5_22)

這種研究還無法成為政治發展的真正理論。說到底，能否創立這樣理論都還是未知數。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麻煩在于有太多變量，而沒有足夠案例。該理論嘗試解釋的政治結局，不僅是代議政府和專制主義的黑白之分。如下所述，至少有五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在歐洲出現，其起源都需要得到解釋。例如，法國和西班牙的專制主義，跟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就相當不同。事實上，普魯士和俄羅斯彼此之間又有很大差異。有實證顯示，發揮作用從而導致不同結局的變量，其數字是很大的，既有蒂利說的外部軍事壓力和征稅能力，還有內部階級關系的結構、國際谷物價格、宗教和思想、統治者和民眾接受變量的方式。要想從這么多因果關系中，找出可預測性的普遍理論，其前景確實微茫。

我將在后續章節中，嘗試描述歐洲政治發展的重要路徑，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原因。也許可從一系列案例中概括出哪些因素最重要哪些最不重要，但遠遠不能成為真正的預測性理論。

### 歐洲的東周時期

在很多方面，1100年的封建歐洲很像周朝的中國。有名義上的君主或統治朝代，但實際權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領主手中。他們保持軍隊，維持秩序，主持正義，在經濟上基本上自給自足。也像中國一樣，有些王室憑借嚴密的組織能力、冷酷無情以及運氣，而變得出類拔萃，并開始在愈益擴展的地域中鞏固自己的領土。

15世紀到17世紀，歐洲發生巨大的政治變動，導致強大國家的興起，可與中國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國家建設媲美。變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長，尤其是在16世紀，再加上人均財富的遞升。這是一個全球現象，如我們以前講到的，也影響奧斯曼帝國。它在歐洲造成的效果，比在中東也許更為良性。歐洲人口從1500年的六千九百萬，增至1600年的八千九百萬，增長率幾近30%。[[6]](#m6_22)大量金銀來自西班牙在新大陸的殖民地，經濟貨幣化在迅速流行。貿易增長開始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從1470年到19世紀初，西歐商船的規模增長十七倍。[[7]](#m7_21)

這段時期的一開始，多數歐洲政體只是“領地國家”（domain states）。國王的全部收入來自自己的領地，只占他名義上統治疆土的一小部分。行政人員很少，來自國王家庭。實際權力分散在各級封建屬臣手中。他們都是自治的政治實體，保持自己的軍隊，向自己的百姓征稅，在地方上主持正義。如果自己是強大的男爵，就提供服務給國王。如果自己是較低等級的屬臣，就提供服務給男爵。他們不是以稅賦而是以自己的鮮血來履行義務，或親自披掛上陣，或率領侍從。事實上，大多數貴族因此而免繳稅賦。國王的領地可能散播于遼闊的疆土，分成數塊，互不相連。他的王國只是各級屬臣領土的拼湊圖，甚至忠于敵對國王的屬臣也會間雜其中。

到這段時期結束，大部分歐洲政治秩序已轉化成國家體系。領地國家轉化成繳稅屬國，君主的收入不僅來自國王自己的領土，而且來自他所能征稅的整個疆域。管理這個制度需要更大的國家官僚機構，最開始是秘書處和財政部，以掌控收入的征集和支付。地方領主的自治受到嚴重限制，現在需要繳稅，而不再提供服務。中央政府向農民直接征稅，從而破壞了領主與農民的傳統關系。歐洲教會的地產都被國家奪走，國家直接控制的領地顯著增加。國家司法的領土也從互不相連的拼湊圖，變換成相鄰的一整片。例如，法國版圖就是在那時形成現在熟悉的六邊形。通過征服、聯姻或外交，各國吸收弱小政治體而得以擴展。各國也開始滲透社會，以宮廷語言來統一和減少各地方言，調整社會習俗，在愈益增大的管轄區內，建立法律和商業的統一標準。

該變化的速度和程度頗不尋常，在很多方面可與東周時期的中國媲美，不同處只在最終幸存國家的眾多，而不是大一統帝國。以征稅為例，在哈布斯堡帝國內，1521—1556年的征稅為430萬弗羅林（Florins），1556—1607年便漲到2 330萬。英國的平均年度稅收，從1485—1490年的5 200英鎊漲到1589—1600年的382 000英鎊。卡斯提爾王國（Castile）在1515年征稅150萬枚達克特（ducat）金幣，到1598年征稅1 300萬枚。[[8]](#m8_21)增加的稅收用來支付更大更為專業的公共機構。1515年，法國有七至八千官員為國王服務；到1665年，皇家行政人員升至八萬。巴伐利亞政府在1508年有162名官員領取薪俸，到1571年增至866名。[[9]](#m9_21)

歐洲國家的早期發展植根于主持正義的能力，但到16世紀之后，幾乎全是為了資助戰爭。這段時期的戰爭愈打愈大，幾乎持續不斷。其中大型的包括：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為爭奪控制意大利的持久戰；西班牙征服荷蘭聯合省的努力；英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法國在新大陸爭奪殖民地；西班牙試圖侵略英國；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內的持續對峙（以三十年戰爭而告終）；瑞典向中歐、東歐和俄羅斯的擴張；奧斯曼、哈布斯堡和俄國之間的戰火連綿。

早期現代的國家除了基本治安和正義，沒有提供多少服務。它們預算的大部用在軍事開支。荷蘭共和國預算的90%，花在與西班牙國王的長期戰爭上。哈布斯堡帝國預算的98%，用來資助與土耳其和17世紀新教政權的戰爭。17世紀從頭到尾，法國的預算上漲五到八倍。從1590年到1670年，英國預算增加了十六倍。[[10]](#m10_21)法國軍隊人數從13世紀的一萬二千，增至16世紀的五萬和17世紀30年代的十五萬，再增至路易十四統治晚期的四十萬。[[11]](#m11_21)

### 法律在歐洲發展中的作用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中期，中國從少量貴族駕駛戰車的戰爭，過渡到向全民征募的步兵戰爭。在12世紀和13世紀，類似的技術過渡也在歐洲發生，披甲戴盔的騎兵由配備弓矛的大批步兵所取代。跟中國的早期建國者不同，早期現代的歐洲君主沒在自己領土上征募大量農民。查理五世（Charles V）投入戰場的精銳軍隊，以卡斯提爾部隊的步兵方陣（tercio）為核心，再配以來自國內外簽有合同的雇傭兵。[[12]](#m12_21)歐洲的大規模征募僅出現于18世紀，但他們仍然不是國家權力的基礎，直到法國大革命的國民征兵制（levee en masse）。相比之下，像秦國一樣的東周列國，直接從騎兵的貴族戰爭過渡到大規模征募，中間沒有雇傭兵階段。[[13]](#m13_21)

早期現代的歐洲君主為何沒像中國君主那樣，直接征募自己領土上的大量農民？為何不以增稅來付軍餉，反而要依賴貸款和賣官鬻爵？

主要原因之一是歐洲的法治。我們在第18章中看到，它由宗教法律發展而來，在各領土上廣泛流傳。歐洲封建主義的整個等級結構，受到承繼下來的法律的保護，將主權和權力有效地分配給各式從屬政治體。農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義務的束縛，主要是欠自己領主的。國王沒有征募農民的法律權利，事實上，他甚至不能征募自己領土上的農民。因為后者的義務定得十分詳細，可能沒有軍事服務。歐洲君主并不覺得自己可攫取精英的財產，因為后者可援引基于封建契約的古代權利。國家可以征稅，但必須通過組織起來的各式會議（像法國的三級會議），以證明征稅的正當性，方可取得許可。專制君主曾嘗試削減這些會議的權力，但其操作仍局限于賦予君主合法性的法律總框架。國王并不覺得自己有權侵犯對手的私人安全，或任意拘留，或隨便處死。（但要注意，這些規則很少用于非精英者，像農民和其他平民，他們還要再等到歷史的后期。）

早期中國君主所實使的暴政，很少歐洲君主敢于嘗試，不管是在封建時期還是早期現代。中國君主從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任意處決當朝的行政官員，遷移整個區域的人口，瘋狂清洗貴族對手。出現此類行為的唯一歐洲宮廷是俄羅斯。這種不受節制的暴力要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方才變得流行。當時，源于古老歐洲秩序的所有法律約束，被現代化一掃而空。

歐洲的國家發展必須應付限制國家權力的全套法律，懂得這一點很重要。歐洲君主試圖扭曲、違反和回避有關法律，但其選擇仍受成熟于中世紀的既存法律的限制。

### 國家建設的架構

為了投入戰爭，國家必須以愈益增大的規模動員資源。對資源的需求，導致更高水平的征稅，想方設法將更多人口和社會資源納入征稅范圍。財政資源的管理，促使國家官僚機構的擴大和機構的愈益合理化，以謀求最高效率。國家要有遼闊領土，以擴大稅收基礎；要有相鄰領土，以達防御目的。政治異見會被敵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領土上實施統一的行政管理。

歐洲的某些地區——日耳曼和東歐的一部分，還有像瑞士那樣的地理隔離地區——沒有面對早期的軍事競爭，因此組織現代國家較晚。所有的其他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荷蘭、瑞典、俄羅斯、哈布斯堡帝國、波蘭、匈牙利等——從15世紀以來，都面對軍事開支和中央集權的需求。[[14]](#m14_21)

歐洲歷史此時的政治發展，體現在集權國家和抵抗團體之間的互動。如果抵抗團體單薄且組織不良，或被國家收買去幫助榨取他人的資源，那里就出現專制政府。如果抵抗團體組織良好，中央政府無法頤指氣使，那里就出現較弱的專制政府。如果抵抗團體與國家不相上下，那里就出現負責制政府，他們堅持“無代表即不納稅”的原則：愿意提供實質性的資源，但一定要參與如何使用的決策。

斗爭的結果不是國家與整個社會的雙邊權利爭奪戰。粗略而言，斗爭牽涉四支力量：中央君主政府，高級貴族，更為廣泛的士紳階層（小地主、騎士和其他自由人），包括市民在內的第三等級（資產階級的雛形）。占社會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尚不是重要參與者，因為他們還沒動員起來，還沒成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會集團。

對國家集權的抵抗程度，取決于國家之外的三個群體——高級貴族、士紳、第三等級——能否合作，以對抗皇家權力。它也取決于每個群體所顯示的內部凝聚力。最終，它還取決于國家本身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在后續章節中，我將顯示四個歐洲國家建設的結果，以及這些結果為何迥然不同的原因。這個分類覆蓋了最為紛紜的案例，從最為代議的到最為專制的。它們是：

1.軟弱的專制：16世紀和17世紀的法國和西班牙君主政體，代表了新型的專制國家，在某些方面，比荷蘭和英國更為集權，更為獨裁。另一方面，它們仍不能完全支配社會上的強大精英，更重的稅賦落到了最無力抵抗的階層。它們的中央政府仍是家族的，事實上，其家族制的程度日益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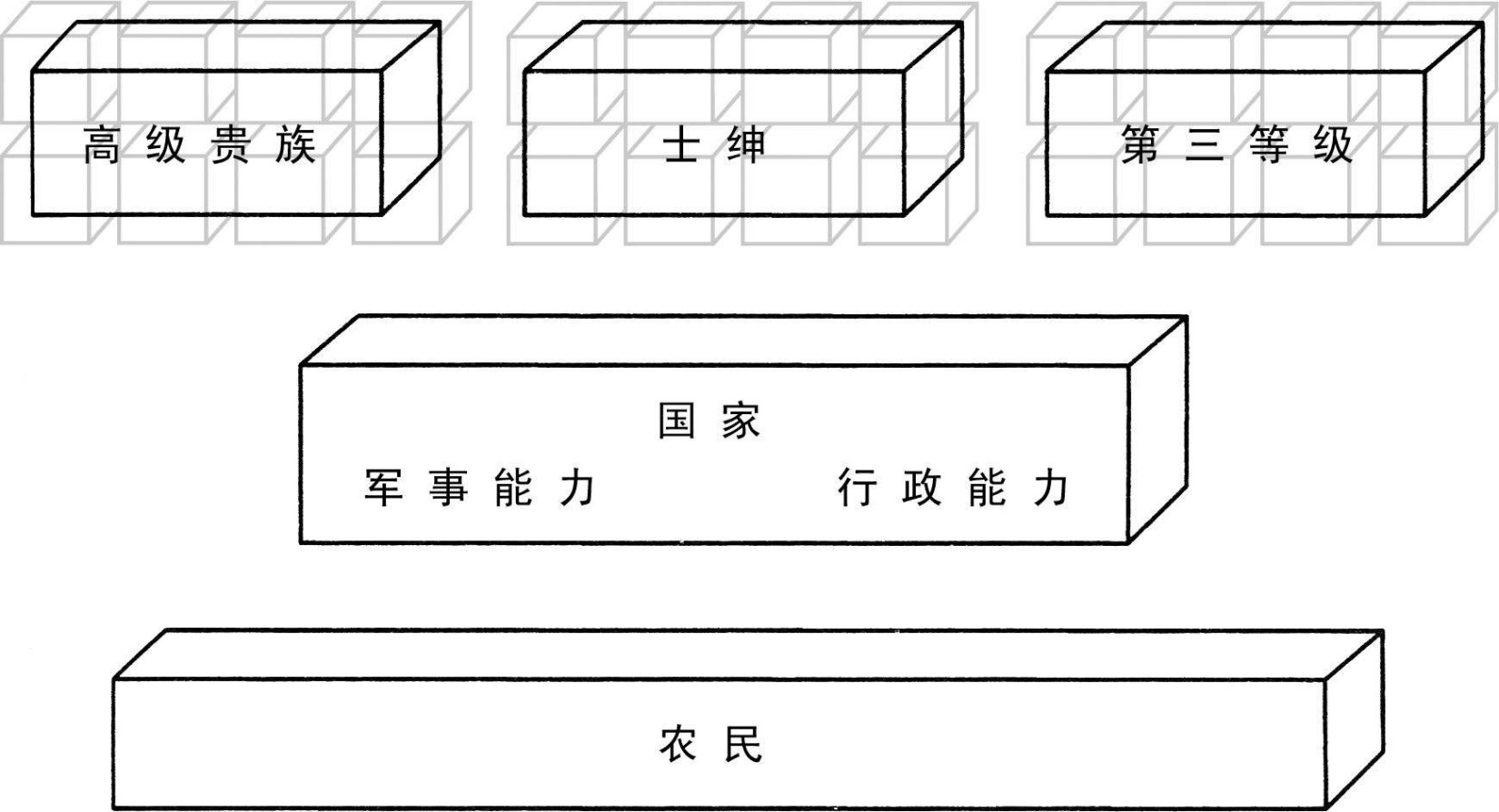


圖1. 農業社會的政治權力

2.成功的專制：俄羅斯君主政體收買貴族和士紳，使之變成完全依賴國家的服務階層。能夠這樣做，部分原因在于三方都有共同利益，都想將農民綁在土地上，并向其征收最重的稅賦。當時的政府仍是家族制的，但阻止不了俄羅斯君主對貴族階層的恐嚇和控制，其程度遠遠超過法國或西班牙國王所做的。

3.失敗的寡頭制：匈牙利和波蘭的貴族一開始就向國王權力施以憲法限制，導致后者一直軟弱，無法構建現代國家。軟弱的君主政體無法保護農民利益，以對抗貴族階層的殘酷剝削；也不能提取足夠資源來建造國家機器，以抵御外來侵略。這兩個國家都沒建成非家族的現代政府。

4.負責制政府：最后，英國和丹麥發展出了穩定的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同時又建成能發起全民動員和防御的中央國家。英國如何發展議會制度，這是耳熟能詳的故事。斯堪的納維亞通過不同的政治進程，卻獲得同樣結局。到19世紀末，一個成為自由派國家，另一個奠定了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基礎。法律和負責制的原則早已深植人心。

除了上述這些，還有其他重要的變量和結局。荷蘭共和國和瑞士聯邦，代表了另一類通向負責制政府和法治的共和途徑。普魯士君主政體雖然沒有負責制，卻發展了法治和強大的現代國家。我無法一一介紹這些和其他邊緣案例。重要的是弄清大致的相關條件，哪些支持負責制政府，哪些支持不同形式的專制主義。

## 第23章 尋租者

法國的財政危機導致家族政府的興起；總督和中央政府的成長；法國精英把自由當作特權，遂無法付諸集體行動；法國政府的致命弱點，既無法控制自己的精英，也無法向其征稅

法蘭西王國呈現極端矛盾的形象，既強大，又充滿潛在的虛弱。參觀過巴黎郊外凡爾賽宮的人都會明白，路易十四時代的歐洲人為何如此敬畏法國君主政體。相比之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波茨坦的無憂宮（Sanssouci）似乎只是小木屋。17世紀晚期，路易十四的英國和荷蘭對手，把法國看作幅員遼闊、富有、強大、野心勃勃的陸地強權，時時在威脅整個歐洲的自由，有點像冷戰期間美國人眼中的蘇聯。法國君主政體是歐洲國家建設進程中的急先鋒，為建立現代中央行政國家打下基礎。托克維爾在19世紀40年代寫道，與他同代的法國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只是伴隨法國大革命而出現的。如他所證明的，其基礎卻在兩個世紀之前就打下了，法蘭西王國的國王“越過大革命的深淵，與現代法國握手”。

同時，法國的國家大廈建造于腐爛和傾圮的地基。當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時，他的國家已徹底破產。皇家債務幾達20億里弗（livre），這還不包括6億里弗的政府短期債券。法國的債權人已擁有直到1721年的未來稅收，光是按期償付連本帶利的債務，便已超過可預期的未來稅收。[[1]](#m1_23)這般險惡的財政并非新鮮事，路易十四的激進外交只是使之急劇惡化。法國國王為打造中央國家，持續一個多世紀，與地方有權有勢者達成異常復雜的交易，后者以現金換取各式特權與豁免。國家逐漸蠶食所有百姓的自由，并以無法持久的方式將未來抵押給腐敗的公職人員。它無法達到專制主義的更高階段，像中國在數世紀之前所實現的。最后出于規范，它必須尊重它嘗試掌控的社會階層的利益，還必須尊重承繼下來的法律。等到那些社會階層被大革命的浪潮卷走，真正的現代國家才得以浮現。

在很多方面，法國君主政體的處境與當代發展中國家很相似，它們都把法治當作抵達目標路上的討厭障礙。政府非常揮霍，將大筆資金投入戰爭，不愿花在補助金或社會福利上。由此而生的預算赤字必須找到資金，君主政體為此而四下尋覓。只要有逃之夭夭的可能，它都會牽強附會、扭曲、違反有關法律。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最終，它還是要回到同一群債權人那里，去尋求新的資金。這種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君主政體征用精英的財產，那也是大革命最終付諸實現的。但這超越了舊制度的想象力或能力，它因此發現自己陷入了永久的經濟危機。

同時，政府尋求資金的對象，即法國社會，也無法反過來堅持負責制的基本原則。原因在于，不同經濟階層之間缺乏社會團結，或社會資本。貴族、資產階級和農民，在更早歷史時期曾有過團結，但現在彼此不抱同情。跟英國的情形不同，他們不相信自己是單一國家的一部分。這三個階層內部又分化成自尊的等級，每一等級非常在乎自己的特權，以及相對于下一等級的優越地位，并不在乎政府掌控自己的階層或國家。自由被當作特權，如托克維爾所說，在大革命的前夕，法國社會中“愿意為共同目標而一起奮斗的尚不滿十人”。

在爭奪主導地位的斗爭中，中央國家和抵抗團體如果組織得不夠嚴密，便出現弱的專制主義。法國的結局偏向于專制主義，但它非常脆弱，招架不住以人權為合法性基礎的啟蒙思想。

### 家族專制主義的起點

第一任波旁國王亨利四世在1594年加冕，其時，法國離統一國家或現代國家還很遙遠。早期的法國國王以巴黎附近地區為權力基礎，聚集數個公國，分別是勃艮第（Burgundy）、諾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納瓦拉（Navarre）、朗格多克（Languedoc）。但在語言和習俗上，各區域之間仍有很大差異。王國一分為二，分別叫作財政區省（pays d’élections）和三級會議省（pays d’états）。前者是巴黎附近地區，構成國家的核心。后者是新近擴張的，處于疆土的邊緣，使用不同的法律規則。此外，宗教改革又造成宗派分裂。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諾派之間的宗教內戰，要到原是新教徒的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方告結束。他在1598年頒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把天主教當作國教，但授予新教徒同等權利。

從波旁王朝到1789年大革命，法國的國家建設追隨兩條平行途徑。第一條，法國國家愈益集權，從屬單元的政治權利愈益縮小。這些從屬單元早在封建時期便已存在，包括所有的公國，曾是地方政府的獨立貴族，以及愈益納入國家的保護和控制的市政廳、行會、教會乃至獨立的私營商業組織。

第二條涉及集權的方式。不像早期的中國國家，也不像18世紀在勃蘭登堡—普魯士涌現的德國，法國的中央國家，并未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任人唯賢的官僚機構基礎上，因此也談不上官僚職能專業化和教育。恰恰相反，它變成徹底的家族化。國家經常缺乏現金，急需收入，便把官位賣給最高投標者，從軍事將領到財政部、征稅官的公職，都可以拿錢來換。換言之，政府的私有化直達它的核心功能，公職都變成世襲的私人財產。[[2]](#m2_23)

如果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來理解廉政，代理人遵循委托人的指示必須得到鼓勵。那么，法國政府所創造的制度絕對是一場夢魘。實際上，它給尋租和腐敗披上了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外衣，允許代理人在履行公職時謀取私利。事實上，租金一詞（rente）就源自法國政府出售公職的實踐，例如，出售征收特定稅賦的權利，讓買主獲得長年累月的收入。[[3]](#m3_23)如果現代公共管理是公私分明，那么，法蘭西王國代表了徹頭徹尾的前現代制度。所以，法國國家只是現代和家族元素奇特而又不穩定的混合物。

中央行政國家和家族化公職的發展相互糾結，無法分開追蹤它們的發展。法蘭西王國的財政制度高度復雜，反映出它零敲碎打的發展過程。各種稅項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稅（taille），直接征于農產品，由農民負擔。還有人頭稅和一系列間接稅，征于國內運輸的酒和商品。國家壟斷制造的食鹽也須繳稅（gabelle）。[[4]](#m4_23)后續的國王還征收其他稅賦，包括人頭稅（人均稅）和所得稅（vingtième）。

直接財產稅很難評估，因為沒有制度來維持最新的人口普查，以及居民和資產的登記，像中國、奧斯曼和英國所做的那樣。[[5]](#m5_23)富有家庭自然不愿誠實公開自己的資產，不然，他們的稅賦就會上漲。[[6]](#m6_23)間接稅的征收也很難，考慮到法國遼闊的疆土（如與英國相比）和分散的數千市場。17世紀的法國經濟尚未完全貨幣化，用來繳付現金稅的硬幣總是短缺。在這段時期，法國仍然是農業社會，那些在技術上容易收集的，如進口關稅，尚沒能提供實質性的收入。[[7]](#m7_22)

稅賦制度的真正復雜性在于各種免稅和特權。封建法國在中世紀晚期開發了兩層會議的制度，一層是全國三級會議，另一層是一系列的地方或省級會議——又稱為高等法院（sovereign courts, or parlements）——國王需要與之交換意見，以獲得征收新稅的許可。[[8]](#m8_22)為了鼓勵各省加入法國的疆域，他授予省級會議特別的恩惠，承認地方精英的習俗和特權。稅制因地區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財政區省和三級會議區省之間。貴族利用軟弱的國王來為自己贏得各種豁免，從直接稅到自產貨物的消費稅。這些免稅和特權，開始自貴族向外擴散，抵達城市富有平民、皇家官員和各級地方官員等。贏不到免稅的就是非精英者，即構成國家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工匠。[[9]](#m9_22)

公開出售公職的做法（venality，即捐官制或賣官鬻爵制）始于16世紀。法國為控制意大利，發動了與西班牙的持久戰爭，因此承擔急需國家收入的壓力。其時的國王光憑自己的收入尚不夠支付戰爭費用，所以開始向意大利、瑞士、日耳曼南部新興的金融中心舉債。法國的信用從來不高，在1557年拒絕還債給“大借款”的銀行家聯盟后，更遭受極大的損害。它也拖欠為其打仗的外國雇傭軍如瑞士人的薪金。在1602年，法國欠下3 600萬里弗，債主是瑞士的州和市，以及指揮其軍隊的瑞士上校和上尉。法國政府一旦違約，瑞士雇傭軍就停止參戰。[[10]](#m10_22)

為了解決信用問題，國家的對策是通過一種租賃機制出售公職給私人。與普通放貸相比，租主享有該公職所控制的特定長期收入。他們至少在財政區省負責征收土地稅和其他稅項。由于稅賦經過自己的手，他們得到取回本利的較大保障。內部財政（inside finance）的制度由此而生，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不再是私人銀行家，而是已屬國家機器一部分的富人。后者因自己的投資，而與國家沆瀣一氣。

到頭來，這些租金的信用也靠不住。政府很快將矛頭指向租主，要求重新談判相關條款。在亨利四世和財政部長敘利（Sully）治下，國家在16世紀早期想出一個新花樣官職稅（paulette）：租主如果愿意付費，可將自己的公職轉變成世襲財產，以傳給后裔。[[11]](#m11_22)家族制的復辟可以從早期天主教會的改革中找到根源，那時教會為現代行政管理樹立了一個先例，將圣俸從圣職中區分開來（參看第18章）。前者享有經濟租金，它的傳襲因神職人士的獨身而受到限制；后者是功能性職位，并接受官僚等級制度的約束。但是，一旦非神職的平民進入國家官僚機構，因為沒有圣俸或封建領地的許諾，便想方設法保住工作和照顧子女。法國政府也看到，讓平民融入國家，變成了削弱古老貴族影響的有效措施。追求公職的最大客源是第三等級的資產階級成員，他們希望購買公職來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全面家族化滲進了法國公共行政的核心。

官職稅的采用并沒終止國家籌款的詭計。國家將征收間接稅的權利出售給包稅商。后者在保證國家獲得固定稅金之后，得以保留額外的稅收。國家也出售征收新稅種附加稅（droits aliénés）的權利，很快使傳統土地稅相形見絀。此外，國家增加出售公職的數量，以壓抑現有公職的價格，從而稀釋持有人的產權。對公職的如饑似渴，甚至令該制度的創建者感到驚訝。路易十四問他的財務總監蓬查特蘭（Pontchartrain），他是如何找到購買公職的新人的。蓬查特蘭回答：“陛下……國王一旦設定一份公職，上帝就會創造一名購買它的傻瓜。”[[12]](#m12_22)

該制度造成的低效和腐敗非常可怕。財政部公職頗受歡迎，通常為私人金融家所購買，因為可以提前知道國家可能的招標，從而占據對付競爭對手的優勢。財政部長定期主持匯票和其他財政記錄的燒毀，以防秋后算賬。[[13]](#m13_22)英國在發展公共財政和優化征稅的高級理論，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法國的征稅卻日益投機取巧、嚴重失調。[[14]](#m14_22)例如，法國各地的鹽稅高低不平，創造了人為的“鹽稅邊界”，從而鼓勵自低稅地區朝高稅地區的走私。[[15]](#m15_21)最重要的，法國財政制度特地鼓勵尋租。富人不愿投資于私人經濟中的產業，寧可購買不會創造財富只會重新分配的世襲公職。與其致力于技術革新，他們寧可挖空心思來與國家和稅務制度斗智。這削弱了私人企業家的活力，使新興的私人經濟領域愈益依賴國家的援助。同時，英吉利海峽對面的私人市場卻在蓬勃發展。

17世紀晚期開發的法國財政制度相當落后，讓窮人納稅，以支持有錢有勢者。幾乎每一個精英群體，從高級貴族、行會成員到資產階級市鎮，都為自己爭取免稅，把最沉重的稅賦負擔留給農民，這自然激起了一系列農民起義和反抗。為支持路易十四的戰爭而實施的增稅，在1661、1662、1663、1664、1665、1670、1673、1675年都激起反抗。最后一次即是著名的法國紅便帽起義。[[16]](#m16_21)它們一一遭受殘酷的鎮壓。例如，1662年的反稅起義中，政府軍帶走五百八十四名俘虜，年過七十歲和不滿二十歲的獲得赦免，其余的都上了苦役船。[[17]](#m17_20)征稅是為了支付軍餉，但為了用武力執行征稅任務，軍隊又必須自邊境撤回，這不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它凸顯了稅收政策的根本教訓：征稅成本與百姓眼中征稅當局的合法性，正好成反比。

### 總督和中央集權

17世紀下半葉，在路易十三和首相黎塞留（Richelieu）、路易十四和馬扎然（Mazarin）治下，法國財政危機以總督這一新建制為中央集權鋪平道路。他們通常是年輕官員，前程全靠自己。如托克維爾所說，他們“并不是靠選舉權、出身或買賣官職才獲得手中權力”。重要的是，他們與地方精英或管理財政的鬻官等級制度全無瓜葛。總督通常是新近封爵的人，其直接下屬即是平民。他們不像尋租者，巴黎的政府部門可隨意予以辭退。中國為郡縣配備官員，土耳其派人管理外省，現在法國發明了相同的制度。托克維爾繼續說道：

然而，這些強勢的官員在殘余的古老封建貴族面前仍然黯然失色，仿佛消失于貴族所尚存的光芒之中……在政府內，貴族簇擁著國王，充實宮廷；他們統率艦隊，指揮陸軍。總而言之，貴族不僅是那個時代最令人矚目的人物，連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們身上。若是有人提議任命大領主為總督，那便是對他的侮辱。最貧困潦倒的貴族，通常也會拒絕這樣的職位。[[18]](#m18_19)

17世紀中期之前，總督的派遣沒有全盤計劃，只是中央政府為應付特定麻煩而派出的。[[19]](#m19_18)漸漸地，他們愈益牽涉征稅，尤其是傳統上由地方官員監督的土地稅。他們的篡權就是該世紀中期憲法危機的背景。

中央政府和地方參與者分享權力的斗爭，主要涉及高等法院所發揮的作用。如前所述，法國有傳統的兩層會議制度。一層是省級會議，每省一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另一層是全國三級會議。在中世紀晚期，法國國王定期召開全國三級會議來批準稅賦，像英國議會一樣。但沒有它們，國王自己也能單獨統治，這被視作專制權力的標志。從瑪麗·德·美第奇攝政王的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9年，竟沒召開過一次全國三級會議。代議制度在英國獲得發展，在法國卻沒有。要弄清其中原委，必須了解高等法院為何在一國發展成為強大機構，在另外一國卻沒有。

代表地方精英利益的省級高等法院基本上是司法機構。跟全國三級會議不同，它們經常開會，可以成為對國王權力的制衡。國王如想頒布一項新稅，就要來高等法院注冊。高等法院通常舉行公眾討論，遇上稅務事項，會變得相當激烈。然后，高等法院可注冊原封不動的法令，可修改，也可拒絕。不受歡迎的法令會在法庭上接受地方官員口頭或書面的抗議。高等法院的權力很有限，因為國王可召開所謂的御前會議（lit de justice），將高等法院所拒絕的法令強行注冊。[[20]](#m20_17)高等法院的抗議僅僅讓國王蒙羞而已。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該制度面臨嚴重危機。其時，三十年戰爭的累計債款促使法國政府試圖在和平時期繼續戰時的征稅水平。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絕，最初導致馬扎然打退堂鼓，從大多數的外省撤回總督。但高等法院領袖隨后被捕，激起了所謂投石黨（Fronde）的普遍叛亂。[[21]](#m21_17)從1648年到1653年，投石黨運動分成兩個階段，代表了傳統地方精英和貴族，對君主實施最終制裁，即武裝叛亂。雙方都有可能贏得內戰，但到最后，政府政策激怒的各式社會參與者不能團結一致以取得軍事勝利。

高等法院和貴族的失敗，為法國政治制度的徹底集權鋪平道路。17世紀下半葉，路易十四和財務總監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故意將總督轉化成國家工具，讓皇家會議（Royal Council）賦予他們在全法國的統一權力。[[22]](#m22_17)他們被安插到每個省份，權力大為增加。他們開始招募和監督地方民兵，接管公共建設，負責公共秩序。救濟窮人的義務，早已被封建貴族放棄，也變成由總督經手的中央政府的功能。[[23]](#m23_17)

國家建設過程中湮滅的自由，還包括城鎮和市政的自治權。直到17世紀晚期，法國的城鎮居民一直行使權利，以民主方式選出地方法官。他們維護自身權利，經常還獲得國王的支持，作為削弱地方貴族的手段。[[24]](#m24_16)但到1692年，第一次廢除選舉，地方法官改成中央指派的總督。托克維爾對此作出評論：

值得歷史大加蔑視的是，這場偉大的革命在并無任何政治目的的情況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為它的民主性質使他感到恐懼；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毀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懼，真實情況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給所有能贖買的城市。其實他并不想廢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為交易，即使他實際上廢除了城市自由，那也絕非本意，而僅僅是基于財政目的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是，這套把戲一成不變，竟然持續了八十年。[[25]](#m25_15)

托克維爾有一條非常有趣的評論。他所欽佩的新英格蘭城鎮是美國民主的基礎，與中世紀的法國城鎮一樣，都源自相同的封建地方機構。到18世紀，兩者卻分道揚鑣，原因在于法國中央政府的收買。[[26]](#m26_14)法國城鎮政府開始受到寡頭的控制，他們愈益通過買賣官職來獲得公職，讓自己出名。社區團結因而遭受破壞，除了掌控公職的精英，其他民眾陷入冷漠。

政治集權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知的更為劃一的國家。1685年撤銷南特敕令，讓天主教獨霸一方，導致很多企業家和巧匠的新教徒移民到歐洲他處，甚至遠赴北美和南非。中央政府現有更大權力，可以宣布新稅，不用擔心已被懾服的高等法院的反對，全國各地的稅賦差異得以降低。投石黨叛亂失敗之后，貴族失去了其在農村的權力基礎，反被召到宮廷。他們在那里直接為自己的補助金和免稅進行游說，為覲見國王而忍受操縱。古老貴族爭相出席路易十四的晨服儀式（levée），就是其中一例。貴族以真正的政治權力和財富作為代價，得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地位。[[27]](#m27_12)仍然剩下的權力只是他們繼續控制的領主法庭。我們在第17章中看到，此類法庭在英國逐漸納入皇家的控制。所以，法國只在錯誤的地方獲得統一：喪失地方上的政治自治，以致不能在社區問題上做出決定；保留了地方貴族掌控的不平等司法制度，以致人們更加不相信既有產權的公平。

### 中央集權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18世紀早期，法國國家日益增強的權力踐踏了個人權利，首當其沖的是產權。但它的做法，卻是典型的歐洲方式，即通過操縱法律制度，而不是罔顧法律、純用強力。要廢除慣例的權利和約束，必須經過漫長的辯論，并依照封建法律秩序的規定，在政治上爭個明白。因此，剝奪高等法院的權力，足足花費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法國國王對反抗的農民非常殘忍，對精英參與者卻有不尋常的尊敬。在投石黨叛亂遭受失敗之后，兩名帶頭造反的貴族蒂雷納（Turenne）和孔代（Condé），要求并獲得了路易十四的饒恕。如果這些人是中國貴族，他們和所有家人都會被處死。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身后的君主政體債臺高筑。為了減少負債，國家訴諸類似保護費詐騙的伎倆。它掌控名叫司法堂（chambre de justice）的特別法庭，然后威脅要調查債權人的私人財務。幾乎所有債權人或多或少都涉及腐敗，便同意降低政府的欠債，以交換調查的取消。[[28]](#m28_10)用選擇性的反腐調查來籌集收入，或脅迫政治對手，這種策略時至今日仍然流行。

新財政部長約翰·勞（John Law）上任后，法國嘗試另一套應付債權人的辦法。它創建國家銀行，訂出硬幣換成鈔票的固定比率，然后強迫百姓統統以硬幣兌換鈔票，如有不從，則以起訴、抄家、充公來威脅。過后，銀行又毀約，讓鈔票在硬幣的基礎上一再貶值，實際上只想少付債務利息。約翰·勞宣稱，個人手中的財產，只有用于國王認可的正當用途，方才真正屬于個人，導致孟德斯鳩（Montesquieu）稱他為“歐洲史上促進專制的最偉大人物之一”。但約翰·勞的制度最終證明無法實施，隨后很快破產。[[29]](#m29_9)像近代的很多專政政體，法國君主政體發現，政治法令既不能建立投資者的信心，也無法取消經濟的基本原理。

18世紀時期，法國各式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者，相互均勢發生了重要改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日益增長，提高了生產效率，導致物質財富和法國資產階級的劇增。就重要性而言，這些經濟變化卻比不上同時發生的思想運動。關于人權和平等的啟蒙思想，在歐洲迅速擴散，獲得突如其來的勝利。18世紀80年代重開三級會議，開會原因完全不同于先前：三級會議限制國王權力的權利，不再基于封建習俗的古老起源，而基于它們能代表享有平等權利的廣泛公眾。一般認為，法蘭西王國的財政制度已變得非常可怕，既復雜又不公平。早先數代財政部長，使用各式花樣來賴債和搜刮債權人，現在取而代之的是新見解：征稅應該統一和公平，合法性來自法國人民推選的代表。

法國大革命和民主蒞臨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想在本書詳盡敘述。我之所以提起，只是為了一個不同目的。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國政治家，接受新思想的影響，嘗試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造舊制度，但由于既得利益團體緊緊抓住政治權力不放，而屢屢受挫。

這樣的努力有過兩次。第一次始于路易十五和首相莫普（Maupeou）治下的1771年。莫普發起與高等法院的沖突，禁止他們彼此聯系和舉行罷工。對方拒絕聽命后，莫普重組整個司法系統，并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權。最重要的是，他廢除司法等公職的出售，讓由國王直接付薪的新法官取代尋租者。更為公平的新所得稅也變成永久性的，所依據的是對資產更為嚴格和誠實的評估。政府由此向賣官鬻爵的整個制度發動正面進攻，所威脅的不但是捐官者的職位，而且是其家庭儲蓄的投資。[[30]](#m30_7)

該行動引起極大反抗，反抗者既有捐官者的既得利益團體，也有新興的民主公眾，后者奮起支持寡頭反抗專制權力的擴展。傳統的家族精英，把自己對改革的反抗描繪成對獨裁的抵制。頗不受歡迎的路易十五突然死于1774年，他的繼承者路易十六（大革命期間被送上了斷頭臺），最終被迫恢復高等法院所有的權利和特權。[[31]](#m31_7)

第二次是在杜爾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擔任財務總監的18世紀70年代。他是重農主義者，對政治改革不感興趣，但深受自由經濟思想的影響，希望使法國經濟更趨合理化。在這點上，他很像現代發展中國家的財政部長。那些部長自己是技術專家，信奉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脫穎而出。杜爾哥廢除了谷物的出口限制，以及旨在穩定面包價格的其他復雜規定。他進一步頒布法令，廢除享有特權的行會，將勞役轉換成地主的新稅。所有這些，都可被視為現代化和理性的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必需的。但它們遇上狂暴的抗議，不僅來自面臨面包價格上漲的城鎮窮人，還來自行會和其他依賴國家租金的既得利益團體。杜爾哥倒臺，第二次努力終告結束。[[32]](#m32_6)

法蘭西王國的政治制度無法自我革新。廣大的尋租聯合體獲得權利，并在傳統和法律中尋求保護，這就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他們的產權體現在公職中，但這是非理性和紊亂的，且多數又屬不義之財。等到尋租者被非人格化和任人唯才的官僚所替代，現代法國方能涌現。如果政府正面攻擊這些權利，就會使自己權力所依賴的法律制度變得非法。作為現代政治制度重要組件的法治，很早就在法國獲得發展，遠在負責制政治機構和資本主義之前。所以，它所保護的不是現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傳統的社會特權和國家掌控的低效經濟。即使等級制度高層，在思想上接受舊制度的破產和根本改革，他們也沒有力量打破尋租聯合體所建立的平衡。需要更為強大的力量，即制度外非精英團體的憤怒，借用革命來將之徹底摧毀。

### 抵抗法國專制主義的失敗

如果說專制主義沒在法國取得完全勝利，那么抵制它的社會團體，也沒能向國家強加某種形式的政治負責制。事實上，后者的失敗顯然更為重要，源于他們未能團結一致、采取行動（參看圖2）。反抗場所應該是省級的高等法院和國家級的三級會議。這些法庭作出抗議、埋怨、辯論和抵抗，多次迫使法國君主政體撤回它們所反對的建議。但在革命前夕的三級會議之前，高等法院從沒迫使君主政體接受自己高于行政機構的憲政原則。自然有人會問：這些封建時代遺留下的傳統政治會議，為何沒能參照英國的方式組織集體行動？這個問題并不局限于高等法院。在中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城市也組織成自治的政治機構。為何前者最終發展成新英格蘭城鎮，后者卻淪作被動的行政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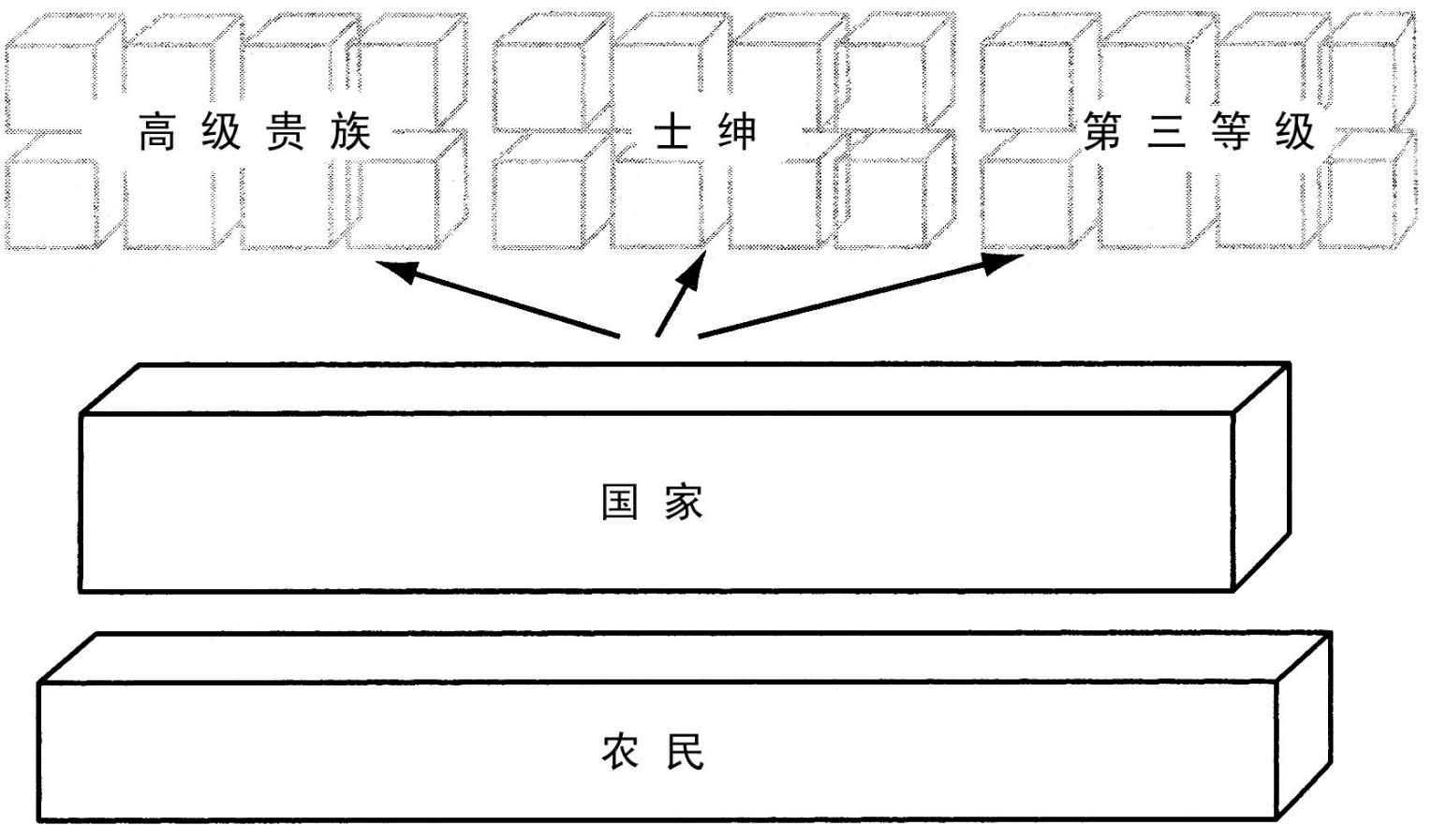


圖2. 法國

未以比較方式檢視其他國家之前，我們尚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但我們可建議大致的分類，以縮小對有關原因的搜索。第一種解釋，要在法國社會結構中尋找答案，如果不是更早，也要追溯到封建時代。政治學家托馬斯·埃特曼認為，家族專制主義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諾曼王國的興起，肯定與羅馬帝國崩潰之后那里自上而下的國家建設有關。卡洛林帝國之外的歐洲——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部分東歐地區——平民和貴族之間存在更多的社會團結，并發展出了強大的基層政治機構，幸存至早期現代。在拉丁語的歐洲，這些地方機構的軟弱，再加上中世紀以來的頻繁戰爭，解釋了應付專制主義的集體行動的缺席。日耳曼是卡洛林帝國的一部分，發展了非家族的專制主義。它不像西班牙和法國，沒有那么早就陷入地理政治的激烈競爭。等到它真正面對軍事威脅，可避免他人的錯誤，建立更為現代的官僚機構。[[33]](#m33_6)

托克維爾贊成的第二種解釋，將法國失敗歸罪于并不遙遠的近代。特別是他認為，法國貴族和平民之間缺少社會團結，是君主政體的故意挑撥所致。托克維爾解釋說，歐洲各地的封建制度并沒有特別懸殊的差異，莊園、城市、農莊都有類似的法律和社會團結。他的第二本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第9章和第10章中提供了很多案例。地方上的法國領主和其平民屬臣，每隔兩星期出席領主法庭來裁判案件，就像英國的百戶法庭。14世紀的資產階級在省級會議和三級會議中，都扮演積極的角色，只因遭到社會差別的排斥，才在后續世紀變得消極。“無代表即不納稅”的原則，在中世紀便已得到確立，不管是法國還是英國。[[34]](#m34_6)

對托克維爾來說，專制主義之下的法國社會不和，植根于家族制實踐本身，并不植根于古代傳統。“在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制造差別的所有方法，其中流毒最甚、最容易在不平等之上再添加孤立的，就是征稅不公平。”麻煩始于14世紀下半葉：

我敢斷言，自國王約翰被俘、查理六世瘋癲而造成長期混亂、國民疲敝不堪之日起，國王便可以不經國民合作便確定普遍稅則，而貴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王向第三等級征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幾乎全部弊病和禍害的根苗，它們折磨舊制度的余生，并最終導致它的暴斃。[[35]](#m35_5)

免稅在所有特權中最受憎恨，隨著稅賦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穩定上漲而愈演愈烈。再加上賣官鬻爵，免稅不只是某個社會階層的特權，也變成個別家庭的特權。購買公職的個人，只要自己覺得安全，寧愿讓同胞的權利受損。在英國，窮人享受免稅特權。在法國，富人享受免稅特權。

不平等的征稅使人墮落，不管是貴族還是資產階級。前者喪失他們的統治權，作為補償，愈加死守世襲的社會地位。考慮到有那么多新近買爵的平民，舊貴族規定，很多公職需要候選人顯示“四名祖先”（即四名祖父母）的貴族出身。暴發戶自己擠入行列后，又嘗試對后來者關上大門。資產階級通過搬到城市和謀求公職，試圖將自己與農民分開。他們原可投入企業活動的精力和雄心，現在轉向公共權威所推崇的地位和安全。[[36]](#m36_4)

這還不是解釋的終止。捐官和特權也存在于英國，但英國君主政體從沒像法國那么有效地破壞議會團體的團結。托克維爾自己也承認，英國貴族從一開始起，與其說是世襲的種姓制度，倒不如說是真正的執政貴族（最佳者的統治）。才華超眾的英國平民加入貴族階層，比在其他歐洲社會更為容易，原因源自歷史早期，現已模糊不清。我們再一次回到支撐龜的問題。很有可能，公職家族化本身也有賴一系列先在的社會條件，甚至被有意的政府政策所鼓勵。

### 尋租的社會

法蘭西王國就是今天所謂尋租社會的早期原型。在這樣的社會中，精英花費所有時間來攫取公職，以保證自己的租金收入——在法國的例子中，那就是可以私用的長期固定收入的法律權利。

尋租聯合體穩定嗎？它持續幾乎兩個世紀，為法國作為主要大陸政權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礎。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冠冕堂皇的法國宮廷掩蓋著嚴重的虛弱。最重要的是聯合體之外的人們，都感受到憤怒和不公，這種感覺鮮明而強烈，最終在大革命中爆發出來。甚至聯合體內的人，也不相信它的原則。如能徹底廢除賣官鬻爵，君主政體會很高興，曾在王國末期作出嘗試。尋租者只顧自己，對他人存有很少同情。他們自己已深深陷入這個制度，所以無法容忍改革的想法。這是完美的集體行動難題：廢除該制度，社會整體會受益匪淺；但制度參與者出于個人利益，便會阻止合作和變更。關于政治發展中法治的作用，法國的例子提供了教訓。現代國家存在之前，法治便已出現于中世紀。它約束暴政，但也約束現代國家的建設。為了引進真正的現代社會，必須廢除它所護衛的舊社會階層和習俗。早期現代時期，對抗君主政體以捍衛自由，實際上是在保護傳統的封建秩序和世襲的封建產權。而這封建產權，恰恰又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水火不容。政府覺得，它必須尊重傳統精英的產權，既然不能直接征用，只好訴諸借貸和愈益離奇的財政花招。于是，家族統治如魚得水。國家對法治的尊敬，反而幫助建立了高度不平等的社會，雖然嘗試染指寡頭精英的財富，但終告失敗。所以，它只能在窮人和政治弱者身上籌集收入，從而加劇不平等，并為自己的滅亡鋪平道路。

法國古老的家族制在革命中死去。不過，西班牙舊政權卻創建了類似的制度，在18世紀躲過革命和改革，并將之輸往拉丁美洲，后者不得不與這份遺產長期共處。

##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拉丁美洲政府的特征未見于世界其他地區；早期現代的西班牙發展出與法國類似的家族專制主義；西班牙制度和其移植至新大陸殖民地

拉丁美洲大陸在地理、種族、文化和經濟上具有極大的多樣性，但各國又顯示出共同特征，使拉丁美洲的政府模式，與東南亞、中東和非洲迥然不同。

到21世紀早期，拉丁美洲人口的大多數居住在世界銀行標為“上中等收入”的國家。他們的年度人均收入在4 000到12 000美元之間，不但超過非洲的大部分國家，甚至超過快速增長的新興國家，如印度和中國。[[1]](#m1_24)然而，經濟增長趨于跳躍式，平均來看，仍遠遠低于20世紀中期以來的東亞國家。[[2]](#m2_24)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它在總體上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區之一。隨著民粹政府的興起，例如在委內瑞拉，也出現了民主倒退。[[3]](#m3_24)

拉丁美洲在兩個方面表現平平。第一是平等。該地區在收入和財富的不均上名列世界前茅。21世紀的頭十年，某些國家的不均水平略有下降，但仍相當頑固。[[4]](#m4_24)第二是法治。舉行選舉，使用民主負責制來擺脫不得人心的領袖，拉丁美洲國家做得都不錯，但司法的日常工作卻比較落后。這體現在治安不良、犯罪率居高不下、法庭程序堵塞、脆弱或無保障的產權、很多富人和強人的胡作非為。

這兩個現象——不平等和脆弱的法治——互有關聯。法治的保護在拉丁美洲通常只適用于極少數人，如大企業主管或工會成員。在秘魯、玻利維亞和墨西哥，多達60%到70%的人口生存于所謂的非正式領域（informal sector）。這些人經常沒有自己住家的房契，從事無照的商業，如果受雇，也不是工會成員，得不到正式的勞工保護。很多貧困的巴西人住在蔓延的貧民窟（favelas），政府當局袖手旁觀，正義經常私下解決，有時還得靠犯罪集團。執法不公平更促進了經濟不公平，窮人居住的世界基本上得不到法律保護。他們不愿投資于自己的家，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文件。他們身受犯罪之害時，也不愿信任警察。[[5]](#m5_24)

要發現不平等的來源很容易，其大部分都是承繼下來的。很多古老精英的富有家庭是大地主，其祖先建立大莊園，又將之順利傳給后裔。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財政制度，又使不平等得到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富裕國家，其財政制度主要用于從富人到窮人的再分配。它的實施可通過累進稅制度（如美國），也可通過再分配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資助和社會服務（如歐洲）。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財政制度只做很少的再分配，在某種情況下，再分配卻給了相對優越的團體，像參加工會的公務員或大學生。正式領域的工人和各式精英，得以保住自己的福利和補助金。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在逃稅方面相當成功。不像美國的累進個人所得稅，拉丁美洲國家的稅收很少來自個人。其富人擅長于隱藏自己的真正收入，或轉移財產到海外，遠離稅務官的控制。這意味著，征稅主要來自消費稅、關稅和增值稅，落在窮人頭上的便高得不成比例。

21世紀初，拉丁美洲政府在管理宏觀經濟政策上大有長進，但這只是近況。其歷史的大部分時期，拉丁美洲政府因預算赤字、公共部門大量舉債、通貨膨脹和國債違約而聲名狼藉。[[6]](#m6_24)全洲范圍的最后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和其他國家都宣告延期還債，通貨膨脹隨之猛升。阿根廷在20世紀80年代末經歷了真正的惡性通貨膨脹，年增長率超過1 000%。它在2001年又一次面臨財政崩潰和國債違約。

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統治也與眾不同。如上所述，該地區近來有很好的民主記錄。但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即古巴革命之后，該洲所有大國都屈服于軍事獨裁。雖然民主根源可追溯到19世紀早期第一個獨立國家，但拉丁美洲沒有一個政權其民主政府的歷史始終不斷。除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古巴，該地區的獨裁政府沒能建成可被稱為極權主義的強國，也沒能掌控足夠的強制力，實施真正的社會革命，如剝奪富有精英的資產和收入。該地區的威權政府從沒能采取極端措施（很幸運），像蘇聯或中國共產黨政權下那樣的集體化，或中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規模死亡。做不到的還有“選舉式威權”（electoral authoritarian）政權，如查韋斯的委內瑞拉，它們甚至無法控制政權本身的犯罪或腐敗。[[7]](#m7_23)國家權力的傷害，大多落在非精英身上。如20世紀80年代，危地馬拉政府發動可怕的剿反，以反對原住民族的游擊隊運動。富有的精英學會與非民主政府和平共處，避開國家權力的鋒芒，經常獲益于制度化的腐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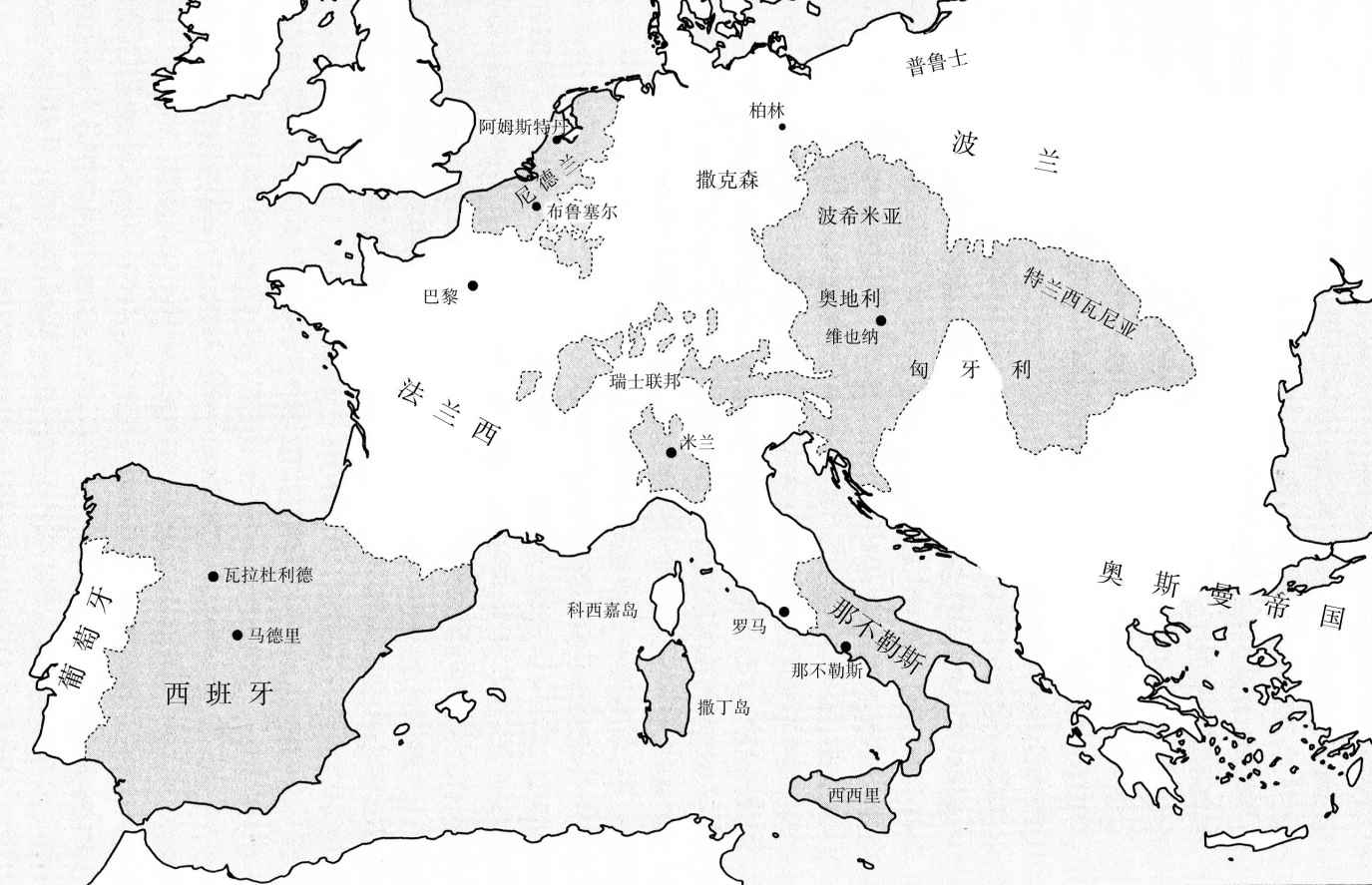
如果這聽起來親切，那是因為這使人憶起法蘭西王國的統治模式。在拉丁美洲，這些先例來自非常相似的家族政權，即早期現代的西班牙。跟法國相似，西班牙專制國家在1492年之后勉強拼湊而成。由于無止境的戰爭，西班牙君主政體永遠處于破產之中。它試圖通過借貸來彌補預算赤字，但很快在債權人面前喪失信用，最終訴諸像法國一樣的各式伎倆來籌集資金，包括債務一再重整、貨幣貶值和出售公職。事實上，這個外強中干的國家為了搜尋現金，將愈來愈多的公職，包括大部分軍隊，都售給私人企業家。其結果是如出一轍的內部財政，私人成功地獲取了國家創造的尋租權。貪污現象比比皆是，賣官鬻爵完全腐蝕了公私之分。

同時，托克維爾所敘述的法國因素，也在西班牙削弱對專制主義的抵抗。貴族、士紳和第三等級，本來應該團結起來抵抗王室權力，但卻由于國家向個人提供參與分享租金的機會，而陷入四分五裂。中世紀時，西班牙議會（Cortes，像法國高等法院和英國議會）必須批準新稅。但到后來，它中止了其制衡國家權力的功能。對公職和級別差異的耿耿于懷，又阻礙了西班牙社會采取集體行動。

這就是移植到新世界的政治制度，借助于新西班牙（墨西哥）總督轄區（viceroyalty）和秘魯總督轄區。此外，它治下的社會制度比歐洲的更為不平等。就像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之后的西班牙，新大陸也是軍事征服得來的。但不像前摩爾人領土，新大陸有大量原住民。16世紀40年代，在玻利維亞的波托西（Potosí）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Zacatecas）發現重要銀礦，由此開創了龐大的采礦帝國。歐洲統治者享用開礦租金，做工的都是淪為奴隸的原住民勞力。編年史家注意到，奔赴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不是去做工，而是去當主人：他們“全靠印第安人的勞動、手工和汗水”。[[8]](#m8_23)從一開始，西班牙美洲的經濟道德就不同于定居新英格蘭殖民地的農民小地主。如果美國政治制度都以黑奴歷史悠久的南方各州為基礎，其結果就是拉丁美洲的殖民政府。

### 破產的西班牙國家

隨著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貝拉（Isabella）在1469年的聯姻，現代西班牙國家迅速出現于世界舞臺。該聯姻合并了阿拉貢王國和卡斯提爾王國，再加上阿拉貢屬下的領土加泰羅尼亞（Catalonia）、那不勒斯、西西里島。聯袂后的君主政體在1492年征服摩爾人的最后堡壘格拉納達（Granada）。同年哥倫布前往新大陸，為西班牙爭得西印度群島（the Indies）。他們的孫子查理五世添加了包括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勃艮第，到1519年當選為神圣羅馬皇帝，更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納入版圖。



16世紀中期哈布斯堡帝國在歐洲的統治范圍

16世紀20年代，查理五世控制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帝國形成是通過王朝同盟，而不是征服，這一事實造就了財政上的捉襟見肘，從而對國家制度發展的性質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查理五世和兒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只有卡斯提爾一個安全的征稅基地（包括珍貴的新大陸殖民地），不能向帝國其他地區抽取資源來應付開支。[[9]](#m9_23)盡管如此，哈布斯堡君主政體在半島之外擔起了昂貴的擔子。其中之一就是在16世紀發起與法國的持久戰爭，為了控制意大利，尤其是米蘭公國。另外的是與荷蘭聯合省長達八十年的戰爭。最后，還有在日耳曼土地上發生的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它由于法國首相黎塞留支持新教徒，而演變成一場泛歐大戰。這段時期的戰爭，因開發了星狀要塞（trace italienne），而變得異常昂貴。這種要塞不易遭受圍攻炮火的傷害，但城防工程因此而變得格外拖延和艱辛。[[10]](#m10_23)所有這些戰爭費用，卡斯提爾納稅人承擔了其中的80%。[[11]](#m11_23)

盡管有來自新大陸的貴金屬，這些昂貴的外務負擔幾乎壓垮了西班牙的財政制度。在16世紀和17世紀，政府費用始終數倍于美洲殖民地的匯款。金銀進口，從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每年20萬至30萬枚達克特，增至16世紀末最高的每年220萬枚。但仍跟不上增長的債務，它在同期從120萬漲至600萬枚。[[12]](#m12_23)

16世紀早期的西班牙國王寧愿借貸，也不愿增稅，很快發現自己的信用不佳。在16世紀20年代，債務服務費用就超過稅入的三分之一。到西法持久戰爭結束的1560年，它已超過稅入的100%。[[13]](#m13_23)西班牙國王募集不到足夠的資金來應付赤字，只好在1557、1560、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宣布破產。[[14]](#m14_23)這些破產并沒賴掉債務，更像今天所謂的債務重整。國王以這些債務屬于高利貸為由，宣布延期償付短期和浮動的債務，然后再跟債權人開始拖延和不懷好意的談判。債權人被迫將舊債務換成一紙新契（juro al quitar），有資格分享未來的稅收，就像法國的租金。這種債券未標日期，可以轉讓，最初年息是7%，但要面對利率和本金的任意調整。通過這種債券，西班牙君主政體得以染指卡斯提爾社會精英的儲蓄——神職人員、貴族、士紳、官僚等。最強大的債權人往往能獲得較好條款，或者不受延期償付的限制，或者讓較弱的債權人承受債務重整。維多利亞公司（Vitoria）無法收到政府付款時，便拒絕償付自己的債權人，包括“修道士、修道院、救濟院、寡婦孤兒、其他非商人”。[[15]](#m15_22)政府發現，在政治上更難向這些精英直接征稅，寧可選擇不斷賴賬。這個傳統也傳至拉丁美洲的當代政府，如阿根廷。它在2001年的經濟危機后，強迫外國投資者以及國內的養老金者和儲戶大量放棄手中的國債。

### 無代表仍納稅

當時很多歐洲人，尤其是受到西班牙威脅的英國人，對西班牙國王所謂的專制權力心存敬畏，相信他具有“像土耳其一樣”的征稅權和特權。但西班牙政權的財政基礎卻非常不穩定，國王對自己屬下精英的權威也受法律和習俗的限制。西班牙的專制主義太弱，不敢像中國和俄羅斯那樣向自己的精英發起正面進攻。它也無法像英國所做的那樣開發基于情愿的合法征稅制度。

像其他歐洲國家，聚集成西班牙的各王國都有稱作議會的中世紀機構。萊昂王國（Kingdom of León）的議會是歐洲最古者之一，阿拉貢王國的議會是組織最好者之一，非常強勢。[[16]](#m16_22)兼并萊昂的卡斯提爾王國議會，與英國議會或法國三級會議相比，其代表性少而限制多。它通常并不邀請作為集團的神職人員或貴族跟平民坐在一起開會。在14世紀，召集到議會的有一百座城鎮的代表（procuradores），到15世紀，該數字跌至來自十八個城市的各兩名代表。這三十六個人聲稱可代表全西班牙講話，但實際上只是治內主要地區的寡頭代表。[[17]](#m17_21)

議會的傳統權力也受到限制。它沒有立法權，因為已經留給國王。腓力二世在1567年頒布的新法典（Nueva Recopilacion）說，“一定要召集議會，征得代表的首肯，方能在整個王國征收稅賦、捐獻和其他稅項”。但這指的是新設的額外稅。像消費稅（alcabala）、關稅（regalias）、鹽稅及礦物開采稅（quintos）的既存稅，則不需要獲得批準。國王也宣稱，如果需求“合理”，議會無權拒絕。什么是合理，全憑國王說了算。

國王和議會的相對權力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政治斗爭的結果。中央政府將消費稅包給包稅商，但遭到各城市的反對，后者寧要由自己負責收集和分配的人頭稅（encabezamiento）。人頭稅當年是伊莎貝拉批準的，1519年被查理五世廢除，從而激發所謂的公社叛亂（comuneros）。查理五世在議會安插自己心腹，不顧反對，強行通過新稅。反對原因在于他被視為外國人（出生于佛蘭德斯），向卡斯提爾征收的稅，又用于不涉及本地利益的外國戰爭。卡斯提爾所有的城鎮都奮起反抗，組織民兵，并要求另組民選議會，擁戴胡安娜女王（Queen Joanna）當政。要不是公社叛亂進而反對貴族，查理五世很可能丟失對王國的控制。貴族轉而向國王靠攏，查理五世最終得以重建軍事控制。[[18]](#m18_20)

公社叛亂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很像一百三十年后法國的投石黨叛亂。國王以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宣稱他對城市的權威。由民選的獨立議會充任西班牙的自由保護人，這種想法徹底壽終正寢。同時，國王意識到他需要化解不滿，遂逐一收買潛在的對手。當初激發叛亂就是因為人頭稅的廢除，他現在予以恢復，還將服務稅（servicios）和普遍稅（millones）的新稅留在地方當局手中。他們多半是家族官僚，幫國王征稅，自己可保留一部分。[[19]](#m19_19)議會后來重開時，只提供咨詢，再也沒有要求或獲得征稅的權力。但他們的偏袒還是會影響公共財政，因為他們不愿支付財產稅，所以新稅都是影響窮人甚巨的商業稅，從而阻礙西班牙的經濟增長。

西班牙國家的家族化始于16世紀60年代，在腓力四世（1621—1665）治下到達頂峰。跟法國一樣，驅動這一進程的是西班牙的持久戰爭和無止境赤字。西班牙第一次破產是在1557年，國王要他的朋友和侍臣魯伊·戈麥斯（Ruy Gómez）去兜售市政公職，多多益善。[[20]](#m20_18)跟法國不同，西班牙的賣官鬻爵最初只是城市和地區的。該措施受到廣泛譴責，大家知道售出的公職不能提供足夠的回報，除非走歪門邪道。[[21]](#m21_18)盡管如此，財政困境促使國家出售更多公職。到了1650年，據估計政府共創造三萬名捐官，按人均來算是同期法國的兩倍。[[22]](#m22_18)此外，卡斯提爾領土的30%回歸領主法庭的管轄，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是因為君主政體急需現款。各城鎮的全部權力，包括征稅權和司法權，都出售給私人。在某個意義上，西班牙的國家建設開了倒車，由于財政上的短見，中央政府失去對大部分領土的控制。

家族制也影響軍事組織。西班牙經歷很多世紀，方從摩爾人的手中獲得解放。卡斯提爾王國和阿拉貢王國聯姻合并時，軍隊組成所謂的步兵方陣，配備長矛，以后又改成火繩槍（arquebus，編按：中國稱鳥銃或鳥槍）。[[23]](#m23_18)如此訓練和裝備的西班牙軍人，在科爾特斯（Cortés）和皮薩羅（Pizarro）的率領下，戰勝了新大陸的本土帝國。他們也奔赴西班牙帝國的其他地區駐防，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基地，從那里可經過所謂的西班牙路（Spanish Road）直達低地國家。[[24]](#m24_17)卡斯提爾士兵參與了1533年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維也納防御戰。西班牙水兵也以少量艦隊參與1535年進攻突尼斯（Tunis）、1538年試圖攻占阿爾及爾（Algiers）、1571年重大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到了17世紀，募集陸海軍的任務越來越多地交托給自資招募軍人的私人和裝備自己艦船的沿海城鎮。向軍隊供應必需品的后勤基礎，又受控于熱那亞（Genoa）的金融家。這意味著，到17世紀中期，西班牙君主政體對屬下的武裝力量只行使很有限的控制。[[25]](#m25_16)

像其他西歐國家，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限制了西班牙國王在產權和公眾自由方面的權力。跟北歐不同，羅馬法的傳統在西班牙沒有完全消失。《查士丁尼法典》重現于11世紀之后，西班牙發展了頗為強大的民法傳統，民法被視作神法和自然法的成文化。國王可頒布制定法，但新法典講得很清楚，必須遵循既存的法律先例，與之相悖的皇家法令則沒有效用。天主教會仍是教法的監護人，并經常向皇家特權挑戰。與習慣權利和特權相抵觸的皇家命令常常受到抵制，此舉被稱作“服從但不執行”（Obédezcase, pero no se cumpla）。赴新大陸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如果從總督轄區接到自己不喜歡的命令，經常援引此理。個人如不同意收到的皇家命令，有權向皇家會議提出申訴。后者像英國的對應物，享有西班牙的最高司法權。根據歷史學家湯普森（I. A. A. Thompson），卡斯提爾的皇家會議信奉條文主義（legalism）和正當程序，反對隨心所欲。它還主張相對于行政模式的司法模式，積極抵制非正常程序，始終保障既定的權利和契約義務。[[26]](#m26_15)

該法律傳統的影響，體現在西班牙國王如何處置國內敵人和百姓產權。在西班牙，找不到秦始皇或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那樣的帝王，他們會任意處決自己宮廷的成員，以至滅族。像同期的法國國王，西班牙君主在搜索財源中不斷侵犯國人產權，但仍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中運行。他們沒有任意征用資產，只是重新談判利率和本金的償還表；不愿增稅以造成對抗，只是使貨幣貶值，承受較高的通貨膨脹。濫發貨幣的通貨膨脹實際上也是一種稅賦，但無須通過立法，對普通百姓的傷害超過精英，后者擁有的大多是實物資產，而不是貨幣資產。

### 制度移植到新大陸

與長期定居、擁有古代習俗的社會相比，征服社會為制度的發展和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機會。征服社會可實施當代企業所戲稱的“未開發地區的發展”——不受既得利益團體和習慣行為的妨礙，徹底重建制度。奧斯曼帝國在封地上安頓騎士，使之成為僅一代的貴族，因為土地是不久前搶來的。一點也不令人驚訝，西班牙征服新大陸時，隨身帶來了現成制度。與歐洲相比，他們面對更少既得利益者的遏制，以及不同的經濟機會和自然資源。如果拉丁美洲的統治類似于西班牙王國的統治，制度移植卻不一定直截了當，或刻不容緩。

收復失地運動的最后戰役之后，接踵而來的就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目睹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在格拉納達凱旋入城；科爾特斯的叔叔和父親參與反對摩爾人的戰役。科爾特斯在與阿茲特克人（Aztec）打仗時，好像仍在與摩爾人作戰，運用分而治之的類似策略。[[27]](#m27_13)

很多有關定居、殖民和政治制度的技術，直接搬自西班牙南部的殖民經驗。事實上，征服者習慣把美洲本土廟宇稱作“清真寺”。

這些早期探險受到西班牙國王的資助，但主要依靠組織探險的私人企業家的能量。一邊是身處新大陸的個人，另一邊是嘗試嚴控殖民地的馬德里政府，兩者之間的互動造就了拉丁美洲的制度發展。金銀開采權利特別重要，因此頒給私人的土地不包括地下權益，全部留給國家。赴秘魯和墨西哥的大部分移民，并不涉及金銀的開采。更確切地說，他們只想充任土地和由此而生的農業資源的主人。與西班牙南部相比，他們面對全新環境，所征服的土地住有密集人口，適合不同模式的開發。

為了獎勵和控制征服者，西班牙當局發明了托管權（encomienda）制度，所贈予的不是土地，而是原住居民。如奧斯曼帝國的封地，國王的意圖是防止既得利益的地方貴族興起。托管權的贈予是有條件的，不得遺傳。[[28]](#m28_11)科爾特斯征服了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提特蘭（Tenochtitlán），其幸存屬下中大約有40%獲得托管權，相當多的皮薩羅追隨者在秘魯也獲得托管權。從技術角度看，托管權并不將原住民當作奴隸，但要求他們提供勞力，以換取監護者給他們的基督教教育和善待。西班牙國王以家長姿態，擔憂新主人虐待原住民工人，也擔憂天花和其他極易為印象第安人感染的疾病造成原住民人口急劇下降。所以，基于種族的主奴等級關系成為早期拉丁美洲制度的組成部分。

為統治美洲殖民地，西班牙迅速建立了相對有效的現代行政機構。西班牙新大陸帝國的合法性來自教皇亞歷山大六世1493年的詔書，它將西印度群島（地理范圍不明）永遠賜給卡斯提爾和萊昂的國王。權力屬于西班牙國王和馬德里的西印度群島理事會，再傳至設立于墨西哥和秘魯的總督轄區。用于新大陸的法律是卡斯提爾的，與帝國其他地區毫無關聯，盡管很多西班牙征服者和新移民出生于他處。科爾特斯在1519年開始對墨西哥的征服，下一年就發生重大的公社叛亂。由于這場叛亂，移植到新大陸的政治制度不包括強大的議會，或其他類型的代議制度。政治獨立的唯一努力來自皮薩羅的兄弟貢薩羅（Gonzalo），他嘗試成為獨立的秘魯國王，在1548年被皇家軍隊打敗并處決。自那以后，中央權力再也沒有受到新大陸西班牙人的挑戰，直到19世紀早期的獨立戰爭。

西班牙當局移植羅馬法律制度，在十處建立高級法庭（audiencia），包括圣多明各、墨西哥、秘魯、危地馬拉、波哥大。派去幫助治理殖民地的行政人士中，有很多是具豐富民法經驗的律師和法官。行政人員不得與本地女子結婚，或在領地上建立家庭聯系，很像中國的縣令或奧斯曼帝國的桑賈克貝伊。歷史學家約翰·赫克斯泰布爾·艾略特（J. H. Elliott）在評論殖民地政府時寫道：“如果現代國家中的‘現代性’，指的是將中央權力的指令傳達到遙遠地區的機構，那么西班牙美洲殖民政府要比西班牙政府，甚至其他任何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更為‘現代’。”[[29]](#m29_10)在這一方面，它與英國君主政體對北美殖民地的放任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 大莊園的鐵律

1570年在新大陸的西班牙行政機構，似乎比同時代的歐洲制度更為現代，但好景不長。西班牙政治制度的家族化要到17世紀才加大油門，賣官鬻爵之類的制度移植到新大陸也屬無可避免。推動這個過程的基本動力，來自殖民地實際參與者的倡議。他們試圖增加自己的租金和特權，而馬德里的中央政府太軟弱、太遙遠，無法予以制止。

大地產或大莊園的鐵律——富人將變得更富，除非遭到國家的遏制——既適用于像中國和土耳其那樣的農業社會，也適用于拉丁美洲。移民階層強烈抵制托管權僅維持一代的規定。一點也不奇怪，他們要求將自己的權利傳給孩子，便在16世紀40年代公開違抗托管權自動回歸國王的法律。擁有原住民的勞力，使部分托管權主人發財致富，并開始購買大片土地。不像托管權，土地可以遺傳。到16世紀晚期，美洲面對本土居民瀕臨滅絕的危機。墨西哥的人口從2000萬跌至160萬。[[30]](#m30_8)這意味著許多人口稀少的土地突然進入市場。

新興的克里奧爾（creole，編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種人）精英大多住在城鎮，雇用勞力開發土地，自己只是缺席地主。拉丁美洲慣例的土地所有制，與其他部落社會相比，基本上沒有很大差異。產權共有，并聯系著擴展的血緣團體。剩下的印第安人，要么受騙售出自己的土地，要么被人趕走。共有土地變成私人地產，由于玉米和木薯等本地作物被歐洲經濟作物所取代，周遭環境大變。很多農地轉換成養牛牧場，對土壤肥力造成極大損害。馬德里政府承諾保護原住民地主的權利，但天高皇帝遠，無法控制實際局勢。而地方上的西班牙當局往往與新興的地主階層狼狽為奸，幫助后者逃避有關規則。這就是拉丁美洲大莊園（hacienda）的起源，在后續年代里，成為不平等和持久沖突的根源。[[31]](#m31_8)

少量精英卻擁有大片土地，在西班牙長子繼承權（mayorazgo）實踐中找到支持。它防止土地的分割出售和大莊園的瓦解。17世紀見證了富人的大肆兼并，甚至是整座村莊和城鎮。他們再借用長子繼承權，以防遺產分配造成土地流失。長子繼承權也已移植至新大陸。西班牙當局試圖限制長子繼承權的牌照，所依據的道理與他們要求收回托管權一樣。地方上的克里奧爾或移民群體，轉而使用改進繼承權（mejora）。父母在遺產分配上可作偏袒，目的仍是維持宗族的實力和地位。[[32]](#m32_7)

強大的地主階層出現，但無法成為凝聚的政治參與者。像法蘭西王國，稅務制度幫助將個別移民與國家綁在一起，破壞了他們可能建起的與非歐洲同胞的團結。構成早期移民浪潮的有大批單身男子，結果與本土女子要么結婚，要么生孩子，造就了麥士蒂索混血階層（mestizo）。愈來愈多的黑奴運來新大陸，與白人一起生下的后代叫穆拉托（mulatto），成為又一單獨階層。區別于這兩個階層，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克里奧爾可以享受免稅。這種待遇，如在西班牙，只屬于貴族和士紳（hidalgo）。就像在北美，身為白人就能獲得地位，截然不同于恭恭敬敬的印第安人和黑人。[[33]](#m33_7)

考慮到國王在馬德里的財政拮據，賣官鬻爵的歐洲制度最終越過大西洋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美洲的財政管理，在16世紀的大部都還不錯。殖民地畢竟是貴金屬的主要來源，再逐漸改為農產品。到世紀末，礦產開始下跌。隨著三十年戰爭的進行，西班牙國王對稅收的需求又有增加。君主政體防止新大陸出現貴族階層的努力，因此而銷聲匿跡。艾略特如此描述這個轉變：

城市的主要家庭借助與皇家管理機構的特殊關系，聚積資源，按自己需求建立繼承權，鞏固對城鎮和內地的掌控。他們還利用國王日益惡化的財政困境，趁機購買公職。市政會職位（regimiento）的私人交易由來已久，從1591年起，更變成公開出售。從1559年起，公證官的職位上市。到1606年，幾乎所有地方公職都跟進買賣。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反對出售財政部的公職，但到1633年，腓力四世開始放開買賣。最終，到17世紀下半葉，甚至最高級職位也上了市場。從1687年起，就系統性地出售高級法庭的職位。[[34]](#m34_7)

像法國和西班牙，對商人階層來說，購買公職成為提高社會地位的途徑。他們現在把自己當作紳士（caballero），將來再傳給孩子。古老家庭更可購買西班牙貴族的爵位，以保護他們相對的優越地位。17世紀的西班牙君主敞開大門，允許數百名克里奧爾進入頗有聲望的西班牙軍事修道會（Military order），分封其余的為侯爵和伯爵。

到18世紀，平等和人權的原則開始向新大陸殖民地滲透，但西班牙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已在拉丁美洲獲得再生。諷刺的是，家族制度的移植違背了馬德里殖民當局的初衷。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他們嘗試在殖民地建立更為現代的非人格化政治秩序，但這些計劃均因國王日益惡化的財政而擱淺，使他們難以實施更為強硬的遙控。伊比利亞半島上出現的公私不分，也在美洲發生。

在法國，尋租者和捐官者攫取國家，破壞國家權力，最終造成法國大革命的社會爆炸。在西班牙，相同的政治演變造成國力的長期衰退。但類似的政治革命，從沒光顧西班牙的母國或殖民地。19世紀早期的獨立戰爭推崇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自由和平等，但其領袖是克里奧爾的精英——像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他們曾深深陷入舊政權的家族政制。

法國大革命得以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重新劃定明確界限。它沒收所有捐官者的世襲財產和特權，誰反抗就砍誰的頭。新式的政治制度，其公職的招聘基于非人格化的選賢與能——中國人在將近兩千年之前就已發明的——又由馬背上的拿破侖帶往歐洲其他國家。1806年，他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特（Jena-Auerstadt）兩次擊敗普魯士的家族化軍隊，從而說服新一代的改革家，像馮·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和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普魯士國家必須以現代原則進行重建。[[35]](#m35_6)19世紀的德國官僚機構，成為韋伯現代合理政府的模型。它并不來自家族化官僚，而是與傳統的刻意分手。[[36]](#m36_5)

在拉丁美洲，獨立成功之前從沒發生社會革命，家族制仍然嵌入很多獨立后的政權。雖然出售公職和貴族封號的做法遭到廢除，正式的民主制度獲得建立，但舊心態依舊長存。19世紀拉丁美洲的新國家中，很少強大到能直面自己的精英，或加以征稅，或加以抑制。那些精英滲透和控制國家本身，并找到空隙，將自己社會和政治的特權傳給孩子。直到20世紀晚期，西班牙舊政權的財政惡習，像持續赤字、過分借貸、債務重新談判、隱性征稅的通貨膨脹，仍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等國徘徊。正式的民主和憲政，并不基于社會各階層的對抗和妥協，而是精英自上而下所施與的，如果不再符合自身利益，又可收回。這引發高度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在20世紀的涌現，并釀造了真正的社會革命力量——體現于墨西哥和古巴的革命。過去一世紀中，拉丁美洲國家定期遭遇騷亂，要求對整個社會契約進行重新談判。

近來出現很多新興的社會參與者，譬如工會、有密切國際關系的商業團體、城市知識分子、試圖要回殖民者所奪走的地位和權力的原住民團體。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對策，不管是民主的還是威權的，都趨于讓他們一步步參與國家，從而收買他們，而不是政治權力真正的重新調整。例如在阿根廷，20世紀初的前數十年，工人階級的興起遇到傳統地主精英的頑強抵抗。在歐洲，工人階級加入廣泛組合的社會民主黨，提倡再分配政策，為現代福利國家打下基礎。相比之下，代表阿根廷工人階級的卻是軍事領袖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他的阿根廷正義黨（Partido Justicialista），向擁護者網絡提供選擇性的好處。阿根廷在民粹狂熱和軍事獨裁之間左右搖擺，并沒開發出真正歐洲風格的福利國家。革命制度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治下的墨西哥也有類似情形，特別優惠只給選出的組織良好的擁護者。墨西哥比阿根廷更穩定，但同樣無法解決社會隔絕和貧窮的難題。所以，西班牙舊政權的家族遺產仍在21世紀存活。

## 第25章 易北河以東

匈牙利成為失敗負責制的另一選擇；西方廢除的農奴制卻在東歐冒頭；憲政主義和貴族統治出現于匈牙利；自由如要興盛，既要有強大中央國家，又要有對它的制約

早期現代的法國和西班牙是弱的專制主義和失敗負責制的案例。形成于16世紀和17世紀的國家是專制的，因為它的君主政體集中權力，無須以正式方式向議會或其他代議機構負責。其他政治和社會的參與者，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議會，公社叛亂者和投石黨人，反對國家集權，最終都被一一擊敗。他們失敗的方式凸現了專制權力的基本弱點。國家向精英參與者提供一部分國家職能，將他們逐一收買，既削弱了他們集體行動的能力，也限制了可在他們身上行使的權威。他們的財產和特權，雖然經常受到挑戰和侵蝕，但基本上完整無缺。

相比之下，匈牙利和俄羅斯提供了兩條另類發展路徑，它們彼此之間不同，又有別于法國和西班牙的模式。這四個案例最后都以政治負責制的缺席而告終。在匈牙利，專制努力最初是失敗的，因為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貴族階層，可以向國王權力施加憲法的限制。跟英國議會一樣，匈牙利議會也迫使匈牙利國王向自己負責。但他們對負責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體國民，只代表狹隘的寡頭階層；他們只想使用這份自由，以進一步榨取自己屬下的農民，又避免向中央國家繳納重稅。其結果是愈益惡劣的農奴制得到擴張，國家趨于孱弱，最終不能抵抗土耳其。換言之，一個階層的自由導致了其余階層的不自由，還導致國土被強大鄰國宰割。

我們花時間來考慮匈牙利的例子，只想顯示，對中央政府權力的憲法限制，并不一定能建成政治負責制。匈牙利貴族階層所追求的，是更加徹底地剝削農民的“自由”，強大中央國家的缺席讓他們得逞。大家都理解出自中央專政之手的中國式暴政，但暴政也可來自分散的寡頭統治。真正的自由傾向于在社會精英參與者的均勢中出現，匈牙利從沒能做到這一點。

### 主人和奴隸

歐洲歷史中重大謎團之一是早期現代之初，即16世紀和17世紀，主子和奴隸的關系在東西歐得到截然不同的發展。易北河以西的地區——西部日耳曼國家、低地國家、法國、英國和意大利——中世紀期間強加于農民的農奴制逐漸取消。奴隸制從未在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出現。相比之下，易北河以東的地區——波希米亞（Bohemia）、西里西亞（Silesia）、匈牙利、普魯士、利沃尼亞（Livonia）、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先前自由的農民卻在歷史同期逐漸淪為農奴。[[1]](#m1_25)

跟封建制一樣，農奴制有繁多定義。歷史學家杰羅姆·布魯姆認為，“如果一個農民受領主愿望的束縛，相互之間的關系使他低人一等，并在社會中無能為力；這種情形又被認作是領地上法律和社會結構的根本，而不是領主與他的契約或協議的結果；這樣農民就是不自由的”。對農民享有司法權的是領主，而不是國家。他們的關系可由詳細的慣例規則所定位，但領主可以修改規則，使之更加不利于農民。農奴僅保留少許的法律權利，不同于奴隸，但實際差別并不大。[[2]](#m2_25)

從12世紀以來，西歐農奴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贏得自由。他們通常先升為領主土地上的佃戶，土地使用權可能限于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傳給孩子。有些土地受到限制（mainmortable），只能傳給與自己同住的孩子，否則就要歸回領主。在18世紀，廢除該限制成為自由改革家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其他案例中，農民直接升為地主，享有隨意買賣和贈與土地的全部權利。法國大革命的前夕，法國農民已擁有土地的50%，超過貴族的兩倍。[[3]](#m3_25)托克維爾指出，那時的領主早已停止參與對農民的統治。這就是殘留的收費權利，或迫使農民使用領主的磨坊或酒坊，受到如此強烈憎恨的原因。[[4]](#m4_25)

在東歐發生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世紀時期，與西方相比，那里反而有相當充分的自由。多半因為它仍屬人口稀少的邊境地帶，來自西歐和歐亞大陸的殖民者，可遵循自己的法律。從15世紀開始，整個東歐建立新規則，限制農民的遷徙。農民不得離開他耕耘的土地，否則就要面對大筆罰款的威脅。幫助潛逃農奴要受沉重處罰，城鎮收容農民的能力大受限制，以防止他們逃避莊園上的義務。

農民損失最大自由的是俄羅斯。回溯到12世紀的基輔羅斯（Kievan Rus），其時已有奴隸和農奴。隨著15世紀莫斯科國家的興起，農民的義務持續上升，活動自由也在逐漸減少，直到每年僅得一次假（前提是債務已經還清），在圣喬治節（St George’s day）的前后。到了下一世紀，連這唯一年假也被取消。[[5]](#m5_25)俄羅斯領主對農奴的權利穩步加強，直到18世紀末。其時，人權原則正在整個西方傳播。農奴永久綁在主人身上，沒有活動權利。事實上，主人可隨意調遣農奴，從一處地產遷到另一處，甚至將農奴放逐到西伯利亞，之后又任意召回。俄國統治階層開始以手下農奴的數量來評估自己的地位。俄羅斯的貴族高層富得驚人：伯爵尼古拉·謝列梅捷沃（N. P. Sheremetov）擁有185 610名農奴；到他兒子手上，這個數字增至30多萬。18世紀末，伯爵沃龍佐夫（Vorontsov）擁有54 703名農奴；到19世紀中期農奴制廢除之前，他的繼承者光是男奴就有37 702名。[[6]](#m6_25)

農奴制在東西歐為何有如此迥異的發展？答案在于經濟、人口和政治因素的總匯，使農奴制在西方難以維持，在東方卻盈利豐厚。

西歐人口密集，在1300年是東歐的三倍。隨著始于11世紀的經濟繁榮，眾多人口變成城市居民。這些城市從意大利的北部輻射至佛蘭德斯，其存在首先是政治軟弱的產物，再就是國王發現，保護城市的獨立可以挖對手大領主的墻腳。城市也受到古老封建權利的保護，羅馬時代的城市傳統并未消失。由于受到如此庇護，城市發展成為獨立的社區，通過貿易增長來開拓自己的資源，獨立于莊園經濟。[[7]](#m7_24)自由城市的存在，又使農奴制愈加難以維持。它們好像是國內的邊境線，農奴可以逃到那里來贏得自由，因此有中世紀的說法，“城市空氣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8]](#m8_24)相比之下，人口相對稀少的東歐城市更為小型，跟中國和中東類似，主要充任現有政治權力的行政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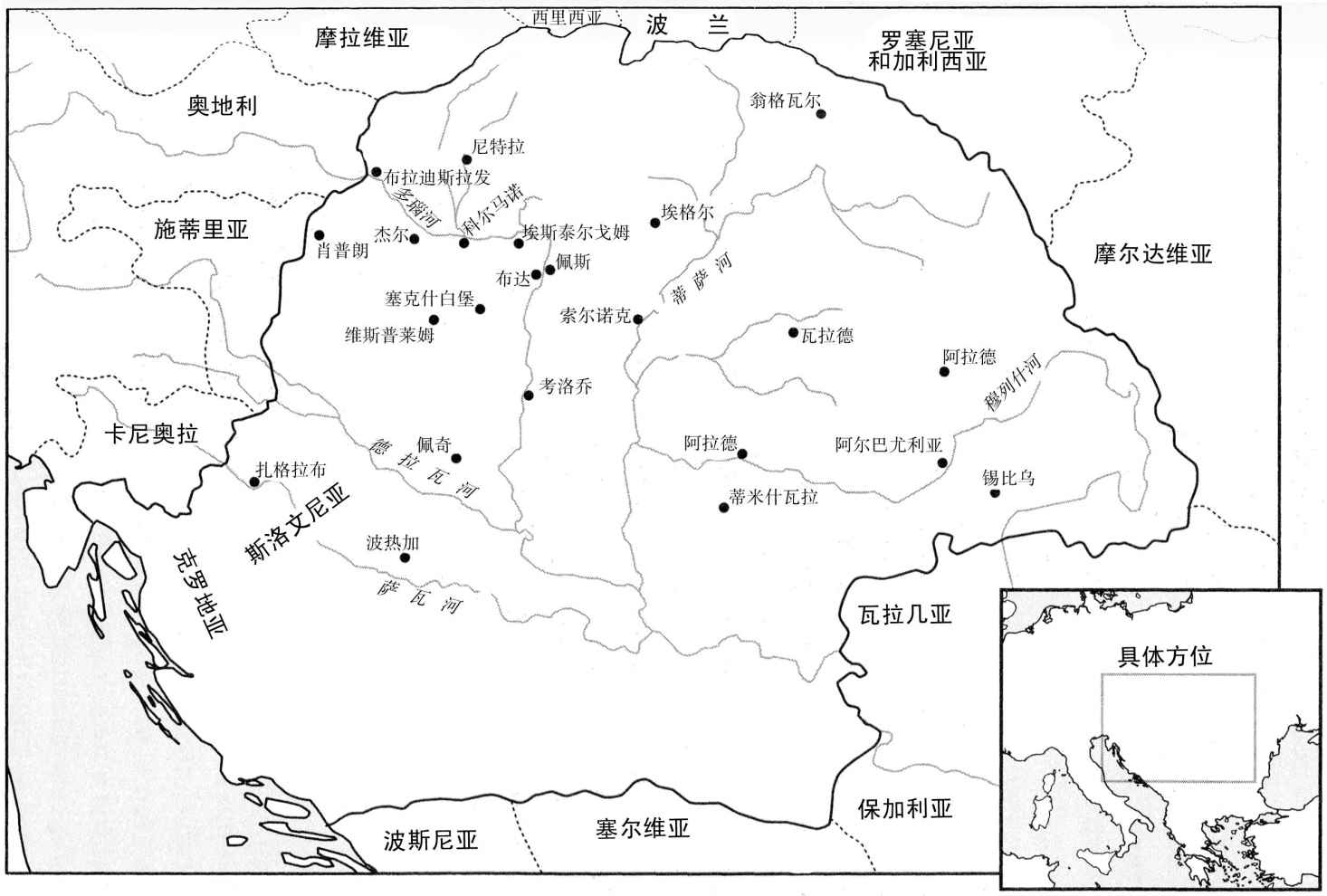
14世紀的災難性人口下降，更促使西歐趨向自由和東歐趨向非自由。重復發生的瘟疫和饑荒對西歐的打擊，比對東歐更為嚴峻，爆發時間也更早。經濟增長在15世紀恢復，西歐看到城鎮的再生。它們提供避難所和經濟機會，防止貴族進一步榨取手下的農民。事實上，為了挽留農民繼續耕耘，領主必須提供更多自由，從而開啟了現代的勞動市場。中央君主政體發現，保護城鎮的權利可以削弱貴族對手。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須依賴來自東歐和中歐的進口，包括食物和貴金屬。但在易北河的東面，軟弱的獨立城市和國王，允許貴族依靠農民勞力來開發農產品的出口。如歷史學家杰諾·蘇克斯所說：“從長遠看，易北河對岸的地區為西方復蘇作出了貢獻……‘第二次農奴制’的立法兇兆，以可怕的同步出現于勃蘭登堡（1494）、波蘭（1496）、波希米亞（1497）、匈牙利（1492、1498）、俄羅斯（1497）。”[[9]](#m9_24)

這是對東西歐農民權利不同模式的最明顯解釋。在西方，愈益強大的國王支持城市，其存在可以抵消貴族權力。在法國和西班牙，國王最終在長期斗爭中獲勝。與領主有委屈或沖突的農民和其他參與者，從精英的競爭中獲得更多機會。在東歐，城市和君主權力都很弱，讓貴族階層自由支配屬下的農民。這樣的模式出現于匈牙利和波蘭，國王由貴族階層選出。東歐兩個地區有強大國家：15世紀之后的俄羅斯和18世紀之后的勃蘭登堡—普魯士。然而，在這兩個案例中，國家都沒有代表平民來反對貴族，反而聯合貴族來反對農民和資產階級，再招聘貴族服務以增加自己的權力。

后來，農民在大規模行動中獲得解放，例如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宣言。但非精英的真正自由——不僅農民還有城市中的工匠和資產階級——還需依賴現有精英參與者的僵局或均勢。非精英團體在兩種情況下都受到壓榨：第一，分散寡頭變得太強大，那是匈牙利和波蘭的情形；第二，中央政府變得太強大，那是俄羅斯的情形。

### 憲政主義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今日匈牙利只是中世紀幅員遼闊王國的縮影，它曾在不同時期囊括今日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和塞爾維亞等部分。匈牙利人是公元第一個千年末期侵犯歐洲的部落民族，由七個部落組成，其主要部落馬扎爾（Megyeri）的統治者創建了阿爾帕德（Árpád）王朝。阿爾帕德大公伊斯特萬（István），在1000年受洗為基督徒，并獲加冕為匈牙利國王。他監督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來被追認為圣人，即匈牙利的守護神圣斯蒂芬。[[10]](#m10_24)



14世紀初的匈牙利

匈牙利的王朝斗爭消耗了君主政體，使之變得愈益孱弱，結果就是持續的寡頭統治。隨著部落財產共有制的瓦解，匈牙利君主政體最初擁有甚多地產，再加上來自皇家礦產的收入，其資源可與法英國王媲美。到貝拉三世（Béla Ⅲ，1148—1196）統治的晚期，國王開始分贈皇家地產、屬下各縣的大片土地、關稅、市場收入等。這些不是西歐那樣換取服務的封建贈與，而是新興男爵階層手中的自由財產。貝拉三世的繼承者們為權力斗爭繼續向貴族競相分送皇家禮物。[[11]](#m11_24)

這就是1222年國王安德魯二世簽署金璽詔書的背景（參看第22章）。[[12]](#m12_24)它實際上是限制國王權力的憲法文件，只是來自頗為不同的社會參與者。在大憲章的案例中，強大的英國男爵代表整個王國發言，迫使國王約翰限制自己享有的權力。迫使國王簽署金璽詔書的不是匈牙利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軍人。實際上，他們想要國王保護自己免受男爵的掌控。[[13]](#m13_24)匈牙利教會獲得格里高利之后強大羅馬教皇的支持，也是要求政策變化的重要政治參與者。教會想保護自己的土地和特權不受進一步的侵蝕，也要求把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商人驅逐出國，讓基督徒商人取而代之。金璽詔書的政治運作顯示，匈牙利社會已在國家之外組織成強大的競爭團體，包括男爵或上層貴族、士紳、神職人員。[[14]](#m14_24)

中央權力軟弱的第一后果是蒙古人對匈牙利的掠奪。后者征服俄羅斯后，在1241年入侵匈牙利。[[15]](#m15_23)國王貝拉四世試圖加強自己的力量，所以邀請大批異教庫曼人（Cuman）進入匈牙利，反而激怒自己的貴族，后者因此拒絕參戰。庫曼人最后也沒參戰，匈牙利部隊在蒂薩河之戰（Battle of Mohi）中遭到徹底摧毀。蒙古人占領整個國家，得知大汗在蒙古過世消息之后，方才撤退。

匈牙利在軍事上的薄弱促進了國家建設。[[16]](#m16_23)匈牙利不知道蒙古人何時歸來，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東方入侵者。為未來威脅作準備，路易一世（Louis I）等的后續國王投入實質性的軍事行動，以擴充對巴爾干半島的控制，甚至抵達遙遠的那不勒斯。國家還實施很多改革，以保護自己免受侵略。這包括建造大量石堡和城防，以替換頂不住蒙古進攻的木磚建筑；還以西歐模式的重甲騎士，取代匈牙利軍隊的輕騎兵。

軍事壓力導致匈牙利國王促進士紳的利益。然而，這類軍人和官員沒有直接進入中央國家的架構。后來的軟弱國王允許他們為強大男爵服務，促使單一貴族階層涌現。到14世紀，當初促成金璽詔書的皇家和城堡要塞的軍人發現，自身的利益不在國王一邊，而在男爵一邊。[[17]](#m17_22)

結果是非常軟弱的國家，以及寡頭地主團體所控制的強大社會。包括新近獲得爵位的士紳的匈牙利貴族階層，完全擁有自己財產，不欠國王任何服務義務。阿爾帕德朝代在1301年結束之前，國王雖是當選的，卻只是個裝飾。他手下沒有重要的軍隊或資源，也沒有強大的中央官僚機構。后繼的安茹（Angevin）王朝治下，分權過程得到暫時逆轉。該王朝終結于1386年，貴族迅速卷土重來。

一直到16世紀末，莫斯科公國的創始家族，持續成功地孕育男性繼承人。這大大幫助了其強大國家的興起，再一次顯示人類制度的偶然性。相比之下，匈牙利卻面對重復的繼承權斗爭，因為它的朝代短命，很多國王又有外國出身。[[18]](#m18_21)覬覦王位者為了爭得權力，只好讓貴族得到資源好處。在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國王治下，很多國王城堡都落到了貴族手中。[[19]](#m19_20)

事實上，匈牙利貴族以議會形式將自己的權力制度化，其權力超過法國的高等法院、西班牙議會、俄羅斯的縉紳會議。[[20]](#m20_19)遠遠早于約翰·洛克，貴族階層“宣布他們有權保護王國的福祉，甚至可以反對國王，如果他試圖損害共同利益”。他們還以此理由監禁一名國王。[[21]](#m21_19)召開議會的先例可追溯到金璽詔書的時代，到15世紀中，國家議會每年開會，有權選擇國王。不同于英國議會，匈牙利議會受大地主貴族的控制，僅僅代表貴族階層的利益。如歷史學家派爾·恩格爾（Pal Engel）所說，“新制度的本質是決策權的分享，在理論上分給王國中所有地主，在實踐中只給參與政治的貴族”。[[22]](#m22_19)早些時候，城市也可以參加議會，但隨著其影響的式微，而逐漸中止。[[23]](#m23_19)（圖3顯示中世紀匈牙利的政治權力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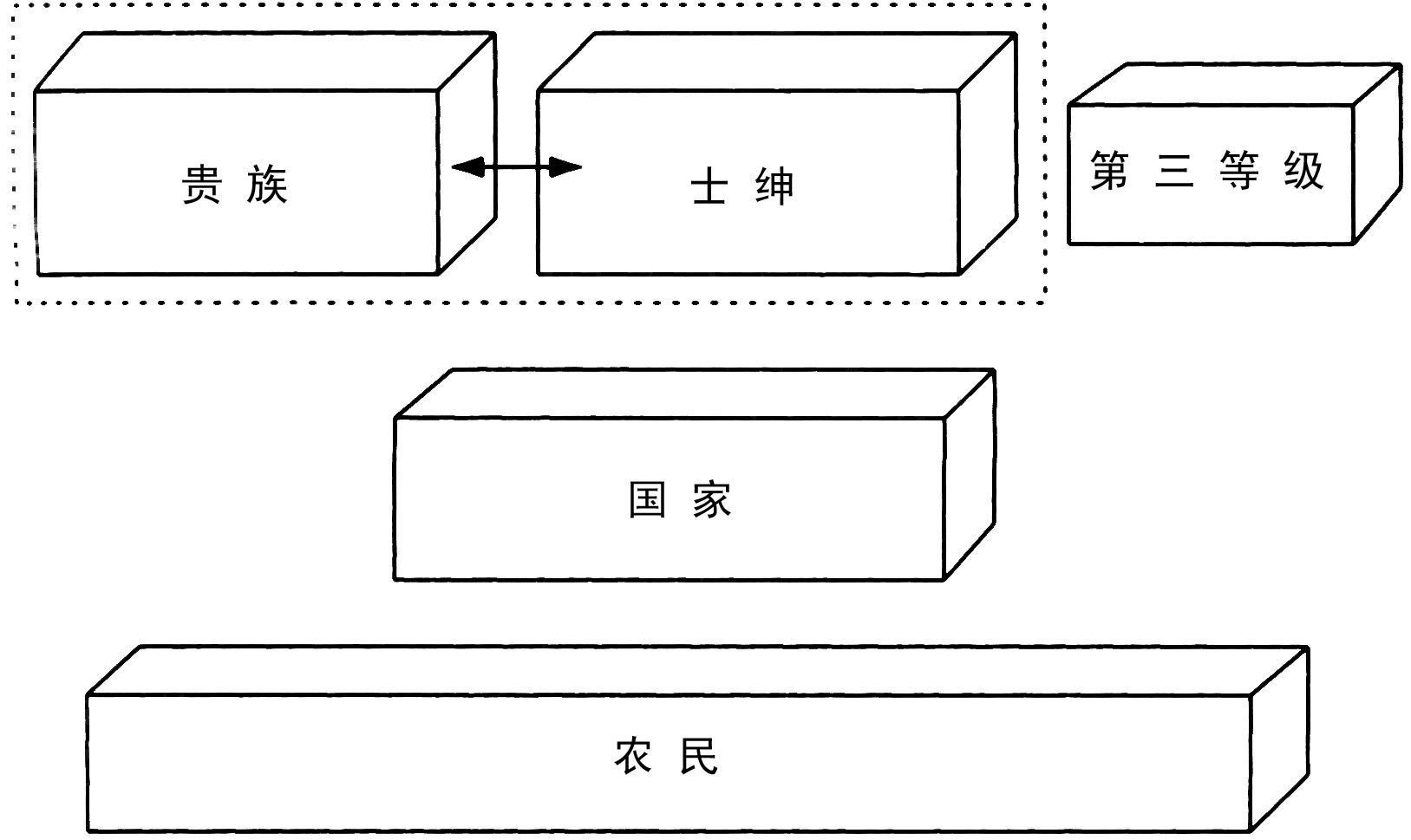


圖3. 匈牙利

匈牙利打造強大國家的最后機會是在15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已在東南方蠢蠢欲動。貴族地主約納斯·匈雅提（Janos Hunyadi）在1446年被議會推選為攝政王。他通過一系列對土耳其人的軍事勝利，包括1456年英勇的貝爾格萊德保衛戰，而獲得巨大威望。[[24]](#m24_18)約納斯兒子馬蒂亞斯（Mátyás，或寫作Matthias Corvinus）在1458年因此而當選國王，在長達三十多年的統治期間，完成了中央國家的現代化。這包括創建國王直接控制的強悍的黑軍（Black Army），以取代紀律不佳和半私人的貴族部隊，后者曾是匈牙利軍隊的基礎；發展皇家秘書處，并配以大學培養的官員，以取代家族化的貴族官員；實施全國海關和直接稅賦，中央政府征稅急劇上升。[[25]](#m25_17)馬蒂亞斯使用這些權力新工具，在波斯尼亞和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取得了對土耳其、奧地利、波蘭和西里西亞的重大軍事勝利。[[26]](#m26_16)

因軍事上的必需，馬蒂亞斯投入其他現代化專制君主也在做的努力。不同于法國和西班牙的國王，他仍需面對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貴族階層，被迫定期向選他當國王的議會征求咨詢。貴族因他的軍事成功而給他活動余地，但怨恨他所強加的與日俱增的稅賦，以及在決策中自身影響力的銷蝕。馬蒂亞斯死于1490年，貴族收回中央國家在前半世紀爭得的大部分權利。他們憤憤不平于自己特權的損失，渴望恢復舊狀。所以，男爵們將一名軟弱的外國君主推上王位，刪減黑軍的經費，然后將之送上土耳其的戰場，結果遭到殲滅。貴族階層還以國防能力為代價，將自己的稅收負擔降低70%到80%。

匈牙利返回到貴族分權的均勢，很快承受后果。紀律散漫的貴族部隊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中被蘇萊曼一世打敗，匈牙利國王被殺。相互爭執的男爵只顧反對國家，不顧國家防御；如此場景曾在蒙古入侵中發生，現又重演。匈牙利失去獨立地位，一分為三，分別受奧地利哈布斯堡、奧斯曼、土耳其屬國特蘭西瓦尼亞的控制。

### 自由和寡頭政治

我詳細討論匈牙利的例子，是為了挑明一條相對簡潔的見解：強大、凝聚且武裝齊全的民間社會，能抵制中央政府，但不一定能獲得政治自由。即使有憲政安排，對行政權力實施嚴格的法律限制，也不能保障政治自由。匈牙利正好符合上述的一切，它得以削弱中央權力，以致國家都不能抵御迫在眉睫的外國敵人。波蘭身處類似情境，軟弱的國王受貴族會議的控制。兩個世紀之后，波蘭步匈牙利的后塵，也失去國家的獨立地位。

國家獨立的喪失不是匈牙利失去的唯一自由。畢竟，匈牙利面對的是龐大和組織良好的土耳其帝國，后者已在歐洲的東南部兼并了多數王國和公國。即使是一個更為集權的現代國家，恐怕也承受不了土耳其的沖擊。匈牙利中央國家的脆弱，使匈牙利農民和城市處于從屬地位。蒙古入侵帶來了動亂和人口驟降。這之后，農民基本上成為自由人，尤其是住在皇家領地上的。作為皇家“客人”，他們有固定的權利和義務，既可充任士兵，又可以繳稅來替代。他們最重要的自由是流動自由，并可選舉自己的法官和教士。[[27]](#m27_14)

但世俗和教會的地主都想把他們綁在土地上，成為可供交易的商品。皇家土地分給私人始于13世紀，結果使更多農民陷入地主的司法權和掌控。始于16世紀早期的食物漲價，促使地主增加農民所欠的領地實物稅。農民被迫從事更多的勞役，從前一個世紀的每星期一天，到1520年的每星期三天。農民選擇地方法官和教士的權利也很有限，需要接受領主的控制。[[28]](#m28_12)此外，地主開始阻止農民在不同領地之間自由搬遷，或阻止他們移往城鎮。日益惡化的境況導致了1514年的農民大起義，起義遭到殘酷鎮壓。起義領袖被架在火堆上“登基”，他的同伴被迫分吃從他身上割下來的肉。[[29]](#m29_11)這次起義發生在土耳其人入侵的前夕，為奧斯曼帝國的勝利貢獻了有利條件。[[30]](#m30_9)

如本章開頭所提到的，愈益劇烈的農奴制回潮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它也發生于波希米亞、波蘭、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整個地區的貴族要求增強稅賦，取消自由，限制屬下人口的流動。20世紀教誨我們，把暴政視作強大中央國家的行徑，但它也可來自地方上的寡頭。在當代中國，侵犯農民權利、違反環保和安全法律、從事肆無忌憚的貪污，其中最惡劣的案例，多是地方黨員干部所為，或是受他們庇護的私人雇主所為，與北京的中央政府無關。中央政府的責任，就是以執法來抑制寡頭；有時失去自由，不是因為國家太強大，而是太軟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編按：泛指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南部各州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非裔美國人，但同時也包含其他族群]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和種族隔離持續二十年，其終止還要靠聯邦政府在南方各州強制執行憲法。由此看來，贏得政治自由，不是國家權力受到遏制時，而是強大國家遇上同樣強大社會的制衡時。

美國創始人理解此種平衡的必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論》第17篇中，描述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的權利分享。他說：

君主最終戰勝屬臣的案例中，其成功主要原因是屬臣對其手下實施暴政。男爵，即貴族，既是君主的敵人，又是平民的壓迫者。君主和平民對男爵又怕又恨，直到相互的危險和利益促成他們聯合起來，那就會置貴族權力于死地。如果貴族以仁慈和公正保住其侍從和追隨者的忠心耿耿，在與君主的競爭中，幾乎永遠是贏家，從而削弱或顛覆君主的權力。

漢密爾頓繼續說，聯邦架構中的州政府就像封建社會的男爵，它們獨立于中央政府，其獨立程度則取決于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強大的中央政府在本質上是不分好壞的，其對自由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它與從屬權力機構的互動。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真理，也在匈牙利和波蘭的歷史上體現出來。

另一方面，如果強大國家與強大寡頭相互勾結，自由就面臨尤其嚴峻的威脅。這就是俄羅斯所處的情境，莫斯科公國在匈牙利國家消亡的同一世紀崛起。

## 第26章 更完美的專制主義

莫斯科國家的涌現和俄羅斯政治發展的特征；君主政體依賴貴族，造成俄羅斯農民逐漸淪為農奴；與歐洲其他地區相比，專制主義在俄羅斯取得更為徹底的勝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爾·普京興起的21世紀初，俄羅斯聯邦成為政治學家所謂的“選舉式威權”政權。[[1]](#m1_26)政府基本上是威權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員和商業利益所組成的灰色網絡，但仍然舉行民主選舉，使繼續執政獲得合法性。俄羅斯民主的質量很低。政權控制幾乎所有的主要媒體，不允許對政府的批評，威脅反對派候選人，或使之喪失參選資格，還向自己的候選人和擁護者提供優惠。

它在法治上的表現，比民主質量問題更為糟糕。揭露官方腐敗或批評政府的新聞記者突然死去，沒有看到找出殺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業遇上政權內線人士的敵對接管，便會遭到政府部門的誣陷指控，從而被迫放棄資產。不夸張地說，重要官員即使參與謀殺，也可逍遙法外，無須負責。專門調查世界上腐敗水平的非政府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將俄羅斯排在180個國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亞、哈薩克斯坦、菲律賓，稍稍優于敘利亞、中非共和國。[[2]](#m2_26)

很多人看到21世紀的俄羅斯和前蘇聯的連貫性，又因俄羅斯人經常表達對斯大林和蘇聯歲月的懷舊，而得到放大。布爾什維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產主義扎根于俄羅斯，當然塑造了當代俄羅斯人的態度。

但在共產主義的下面藏有很多龜。如果僅把當代威權主義歸罪于20世紀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說，共產主義為何在俄羅斯和中國獲得徹底的成功。當然，發揮作用的還有更古老的專制傳統。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俄羅斯已發展了強大的中央國家，其行政權力只受法治或負責制立法的軟弱約束。布爾什維克之前的俄羅斯，其取得的專制主義的性質，不同于法國或西班牙的舊政權，更接近于前現代中國或奧斯曼。個中的原因與俄羅斯的地理環境有關，地理環境對它的政治文化產生了持久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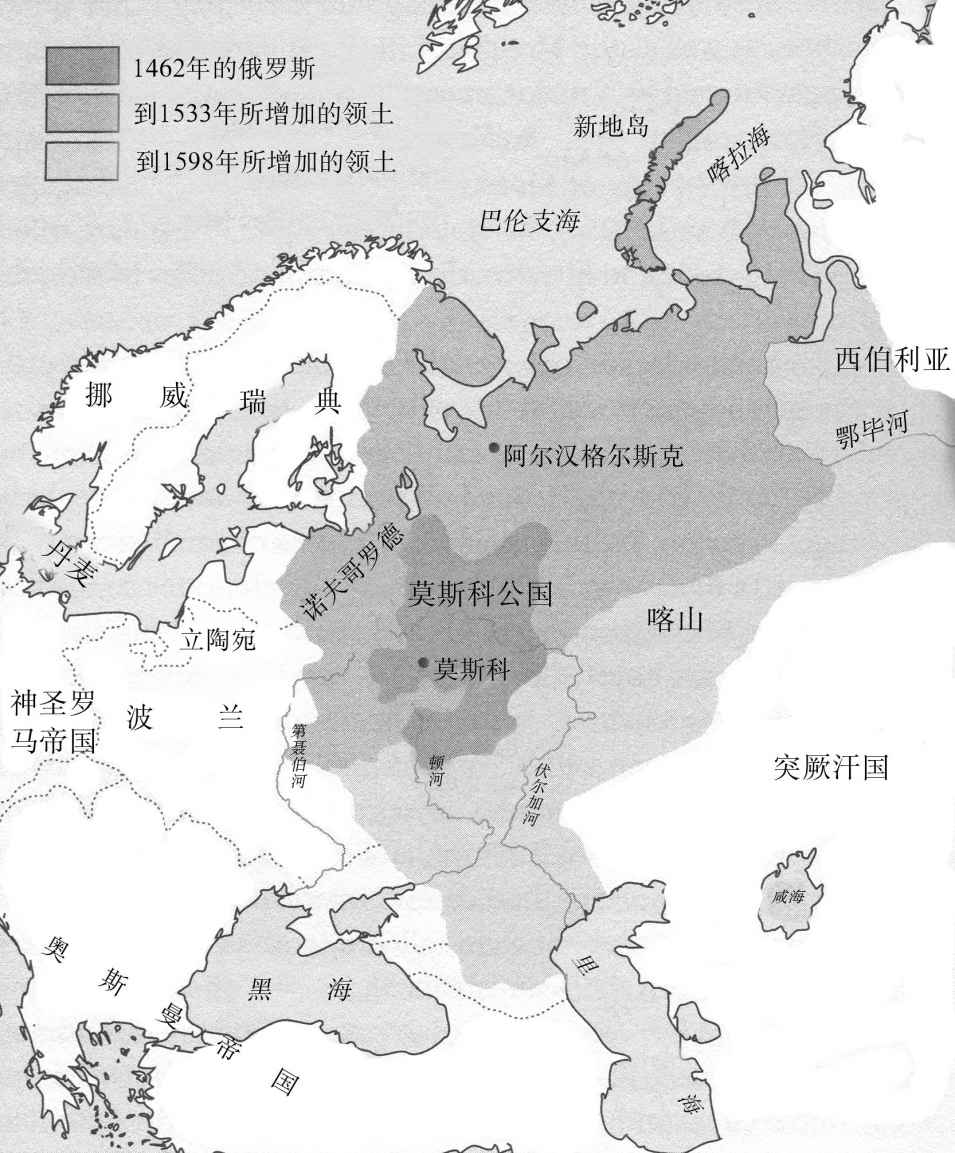
### 俄羅斯專制主義的來源

公元第一個千年末期，俄羅斯國家起源于烏克蘭的基輔地區，基輔曾是主要的貿易站，連接北歐和拜占庭帝國等。它的持續存在中斷于13世紀30年代末，其時，拔都可汗和速不臺率領的蒙古軍隊侵占俄羅斯，基輔遭到徹底摧毀。身為教皇使節的大主教迦兒賓（Carpini）寫道，經過基輔時，“我們看到現場有無數死人的頭顱和骸骨，該城曾經很大，人口眾多，現在卻一片荒蕪，只有兩百棟房子還立在那里，俘虜在從事著最為惡劣的苦役”。[[3]](#m3_26)蒙古占領持續了將近二百五十年。很多當代俄羅斯人，被問到為何他們的國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歐時，立即把責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觀察俄羅斯的悠久歷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堅持俄羅斯應被視作“亞洲”強國，它與蒙古人、奧斯曼人、庫曼人和其他亞洲人的互動，對它的成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4]](#m4_26)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出現，見解已經轉變。新一輪修正主義的歷史評論，以更為肯定的語氣解說蒙古人的作用。[[5]](#m5_26)

不管怎樣，蒙古入侵對俄羅斯后續的政治發展施加了重大影響，且多半是消極的。[[6]](#m6_26)首先，它切斷了俄羅斯與拜占庭和中東的貿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的來源。也阻礙了它與歐洲的聯系，這意味俄羅斯沒像西歐那樣，深入參與相關的歷史進程，比如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領大大延誤了俄羅斯的政治發展。基輔遭到徹底摧毀后，基本上需要重頭開始，當代烏克蘭的基輔地區曾是俄羅斯老祖宗的定居點。蒙古人抵達之前，俄羅斯國家已經開始分裂。政治權力向無數自稱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領而獲得確認。俄羅斯的重心從黑海北部的歐洲本都地區（pontic）轉向東北部，當地的莫斯科大公國崛起，成為政治舞臺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續八百年的歐洲封建主義，俄羅斯的封地僅生存兩個多世紀——從1240年開始套上韃靼軛（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當政的16世紀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領主必須面對日益強盛的中央君主政體。

最后，蒙古人破壞了繼承于拜占庭的法律傳統，使政治生活變得更為惡劣、更為殘忍。與歐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統治者把自己看作純粹的掠奪者，其目的就是從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資源。他們仍處在部落層次，從未發展出政治制度或正義理論，可以帶給所征服的居民。他們不像傳統農業國家的統治者，并不矯飾自己是為被統治者而存在的。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表，愿意以不可持續的方式大規模榨取資源。他們嚴懲任何抵抗力量，為了殺雞儆猴，甚至愿意處死整座城鎮的居民。他們招募俄羅斯的領主成為自己的征稅官，包括將來創建俄羅斯國家的莫斯科大公。他們以自己的掠奪策略，訓練數代的俄羅斯領袖。事實上，他們通過聯姻而融入俄羅斯人口的基因。



俄羅斯的興起

像我們所討論的幾乎所有政治體，發動戰爭的需要促動了俄羅斯的國家建設。像基于法蘭西島的卡佩家族，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Rurik）從自己的中心位置向外擴展，征服和吸收其他封地公國、蒙古和立陶宛等的外國軍隊。伊凡三世（1440—1505）治下的國家成為重要力量，兼并諾夫哥羅德和特維爾（Tver）。他給自己冠上全俄羅斯大公的稱號，莫斯科公國從伊凡一世（1288—1340）的六百平方英里，到瓦西里二世（1415—1462）的一萬兩千平方英里，再到他自己統治結束時的五萬五千平方英里。[[7]](#m7_25)

封地期間的俄羅斯國家，其形成非常類似于中國和奧斯曼的國家形成過程。像中國西周的創始朝代，基輔貴族家庭的后裔分布于俄羅斯各地，尤其是在蒙古入侵之后。他們組建一系列小公國，相當于俄羅斯版本的封建主義。每位領主控制自己的領地、經濟資源和軍隊，并與自由貴族（boyar）簽訂契約以獲服務。

莫斯科國家的權力基于服役貴族（middle service class），由騎兵組成，報酬不是現金而是封地（pomest’ia），每塊封地上約有五或六戶農家。由于地多人少，控制人口比控制土地更為重要。騎兵不是常備軍，受領主召集而提供服務，軍事季節結束后，再回到自己封地。俄羅斯和奧斯曼的封地非常相像，這可能不是意外。其時，俄羅斯與土耳其的接觸愈益增多。像奧斯曼的騎士，俄羅斯部隊的核心成員，如果身處歐洲其他地區，便被稱作低層士紳，其土地和資源全部來自國家。俄羅斯騎兵配置相對輕便的裝備，主要倚靠迂回戰術。這很像奧斯曼騎兵，而迥然不同于西歐的重甲騎士。莫斯科政權組建此種部隊的動機，也與奧斯曼相似。這個軍事組織的地位全靠國家，不會要求現金軍餉。它可被用來抵消領主和貴族的勢力，后者擁有自己的土地和資源。[[8]](#m8_25)

這是俄羅斯和匈牙利的重大差異。在俄羅斯，服役貴族接受招募，直接為莫斯科國家服務。在匈牙利，它變成貴族階層的一部分。這不同選擇也許足以決定后來的分道揚鑣，一個社會走上中央集權，另一個趨于權力下放。與西歐社會相比，俄羅斯社會對莫斯科的國家建設設置了較少障礙，原因之一就是：服役貴族直接從屬于國家，沒有接受領土貴族的再次分封。

俄羅斯版本的封建主義歷史太短，尚沒達到根深蒂固的程度，這是俄羅斯貴族無法限制中央國家權力的另一原因。俄羅斯是否經歷過封建主義？俄國史學界對此有長期爭論，因為俄羅斯的封地從沒獲得西歐對應物所享受的自治權。[[9]](#m9_25)俄羅斯的領主和較低層次的貴族沒有時間建造城堡，俄羅斯的平原和大草原，將優勢賦予快速移動的進攻軍隊，而不是防御軍隊。

莫斯科國家頒布門第選官制（mestnichestvo，編按[下同]：俄語為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故意在貴族中播種不和。它將貴族家庭以及家庭內的個人劃出等級。像法國和西班牙的爵位和特權的出售，門第選官制也讓貴族互相競爭，從而破壞了貴族內部的凝聚力。[[10]](#m10_25)所以，俄羅斯貴族作為一個階層，其內部團結很差，幾乎沒有發展出聯合抵抗中央國家的機構。他們以內部的小爭執而著稱，經常自我損耗。

在俄羅斯，法治一開始就比西歐薄弱。天主教會在領土主權國家之外建立教會法規，但俄羅斯東正教從沒扮演過類似角色。被俄羅斯當作模型的拜占庭帝國，其教會和國家的關系是政教合一。東羅馬皇帝委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最高主教），裁決教會中的教條爭議。格里高利改革和敘任權斗爭的相似情形，從沒在拜占庭的世界發生。東正教沒有發展出可頒布法律的國家般的中央機構，也沒像天主教會一樣，將牧首法令編纂成統一的教會法規。當蒙古入侵切斷了俄羅斯教會與拜占庭的交往時，它在莫斯科國家身上找到新監護人。教會和國家的利益相互吻合，后者提供贊助和權力，前者鼓吹后者作為“第三羅馬”的合法性。大牧首尼康（Nikon）在1666年遭到開除，之后的俄羅斯教會徹底變成政教合一。到1721年，彼得大帝頒布《宗教事務管理章程》，干脆取消牧首職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指定的神圣宗教會議（Holy Synod）。[[11]](#m11_25)

如果懷疑法治保護西歐精英的重要性，我們只要想想所謂的沙皇特轄制（oprichnina，俄語опричнина）。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黑暗年代，時值伊凡四世（1530—1584）統治的后半期，在西歐歷史中找不到對應物。他被后人稱作伊凡雷帝（Ivan Grozny，俄語Иван Грозный），既可譯作恐怖伊凡，也可譯作伊凡大帝。他心愛的年輕妻子阿納斯塔西婭（Anastasia，俄語Анастасия）死于1560年，使他對周遭的宮廷官員疑鬼疑神。他突然離開莫斯科，至1565年方才返回，要求貴族讓他建立所謂的非常行政區，并讓他享有處理惡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權。一旦獲得同意，他就發起恐怖統治，反過來攻擊貴族。愈來愈多的貴族與家人一起遭到逮捕、折磨、處決。伊凡創建了所謂的特轄軍（oprichniki，俄語опричники），身穿黑衣，騎黑馬，成為他法外統治的特殊工具。特轄區內的私人財產遭到國家沒收。之后，它又得到擴張，最后面積相當于全國的一半。估計有四千至一萬的貴族被殺，古老領主家庭中存活的僅得九家，大部分土地都被充公。[[12]](#m12_25)伊凡四世好像完全失去情緒平衡，一度致命地傷害了自己的兒子兼繼承人。他死后，俄羅斯只能說仍然心有余悸。[[13]](#m13_25)很難說，它不是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實施黨內清洗的先例。其時，蘇共總書記懷疑身邊處處有陰謀詭計，殺光了當年與其攜手鬧革命的老共產黨員。[[14]](#m14_25)它也使人不得不憶起清洗貴族精英的中國統治者，像武則天。

從俄羅斯政治發展來看，使人迷惑的是貴族為何授予伊凡這些特權，禍及自身。有人認為，他們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獨自當政，也害怕君主不掌大權的后果。在伊凡四世奇怪消失于莫斯科的時候，有人提出如此可能。俄羅斯人對軟弱國家會造成的混亂和崩潰心懷恐懼，這并不荒謬。他兒子費奧多（Feodor，俄語Фёдор）去世于1598年，沒有留下子女，留里克王朝因此而告終，開始了所謂的混亂時期。莫斯科國家飽受饑荒和外國侵略的困擾，因一系列“偽德米特里”（false Dmitri，俄語Лжедмитрий）競爭君位而分崩離析。莫斯科君主創造的國家機器不夠強大，承受不了漫長的繼承權斗爭。即使君主權力崩潰，也不能回歸到分權的封建統治。結果只是失序的暴力和外國的霸權，直到羅曼諾夫王朝在1613年涌現。

### 自由選擇

俄羅斯專制主義的興起并不由俄羅斯文化內在邏輯所命中注定。事實上，俄羅斯歷史上有西方的共和或代議制度的先例，為其他可能性提供視野。西北部的城市諾夫哥羅德從沒被蒙古人征服，在早期封地時期，一直是頗具活力的商業共和國。它與波羅的海貿易緊密相連，發揮門戶作用，讓歐洲貨物進入俄羅斯。諾夫哥羅德的君主統領軍隊，但在執政時受市民大會（veche，俄語вече）的限制。市民大會從城市貴族中選出市長，所有自由公民都可投票。它還控制稅賦、法律和外交，甚至可以解雇君主。城市內，社區在料理自己事務上行使很大自治權。諾夫哥羅德最終被伊凡三世征服，在1478年成為莫斯科國家的一部分。伊凡三世廢除諾夫哥羅德所有的共和機構，將很多當地領袖當作叛徒處死，并將大量貴族和商人家庭驅逐出境。[[15]](#m15_24)

第二個代議機構是縉紳會議，由貴族組成，近似于法國三級會議和西班牙議會。它的開會并無定律，但在適當時刻扮演重要角色。它批準了伊凡四世的數項倡議，例如他向利沃尼亞的開戰。其他會期批準了伊凡四世兒子費奧多在1584年的繼位，并在1598年向攝政王鮑里斯·戈杜諾夫（Boris Godunov，俄語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提供皇位。它最重要的舉動是在1613年核準米哈伊爾·羅曼諾夫（Mikhail Romanov，俄語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成為沙皇，從而終止混亂時期。該議會在17世紀還繼續開會，批準了多次宣戰和稅賦，直到彼得大帝使之邊緣化。[[16]](#m16_24)自那以后，代議機構在俄羅斯銷聲匿跡，直到1906年日俄戰爭之后召開的立法機構杜馬（Duma，俄語Дума）。

抵制權力的最后潛在來源是俄羅斯教會。如上所述，評論家經常譴責俄羅斯教會是莫斯科統治者的馴服工具，不管是沙皇時期，還是今天。但在大牧首尼康被開除之前的時期，仍有可能走上不同途徑。俄羅斯東正教曾擁有近乎四分之一的俄羅斯土地，由此而享受自治。自圣謝爾蓋（St. Sergius）改革以來，俄羅斯就有優良的修道院傳統，但經常引起世俗統治者的懷疑。至少在佛羅倫薩大公會議（Florentine Union）觸發危機之前，莫斯科的都主教（Metropolitan）都由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指派，俄羅斯君主無從置喙，之后才由俄羅斯主教會議選出。[[17]](#m17_23)也有個別教會領袖不畏暴政，如莫斯科都主教菲利普（Philip），因為譴責伊凡四世，而被趕出自己的教區，最終竟被勒死。[[18]](#m18_22)

這些案例表明，俄羅斯傳統并不是暴政不斷，自由選擇時有發芽開花。共產主義倒臺后重現創造更為自由社會的諾言，但其兌現恐怕還在將來。

### 農奴所有者結成卡特爾（Cartel）

17世紀末的俄羅斯國家已有中央集權，但還比不上歐洲對手。沒有整齊的中央官僚機構，只有一系列所謂的衙門（prikazy，俄語Приказы），其職責既有重疊，又不一致，來自沙皇繁雜的指令（prikaz，俄語Приказ）。[[19]](#m19_21)不同于法國的總督制度，從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任命，都出自沙皇，被稱為“給食”（kormienie，俄語Кормление），這名字就表明制度背后的監督和掠奪意味。早在16世紀既已存在的地方自治政府，在伊凡四世的治下遭到廢除，國家倚靠軍事總督制度（voevody，俄語Воевода）來實施行政命令。軍隊也同樣原始，仍然基于騎兵，只在首都組織新型步兵，但不一定靠得住。[[20]](#m20_20)

俄羅斯國家建設的下一輪是在彼得大帝（1672—1725）治下。他遷都圣彼得堡，又從歐洲引進一大批新制度。彼得是個巨人，不論是體形，還是領導才能，單槍匹馬盡力推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造。戰爭再次成為國家建設的主要動力，尤其是對抗瑞典的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彼得在1700年納爾瓦戰役中，敗于瑞典皇帝查理十二世，遂開始對當時歐洲邊界的俄軍進行徹底重整，并從零開始打造海軍（從最初的單船只艦發展到最終能夠戰勝瑞典海軍的八百艘）。他也推行俄羅斯中央政府的現代化，廢除老式衙門，換成模擬瑞典的參政院（a system of colleges）。參政院以技術專長為基礎——大多來自外國——在辯論和執行政策方面發揮了特殊功能。

15世紀和16世紀國家建設的第一期，主要是動員服役貴族，這分裂了貴族階層，確保他們大部分直接依賴國家。彼得甚至更進一步，征召整個貴族階層參與國家服務。貴族入伍先當小廝，其提升全憑現代的擇優標準，一生必須附屬于自己的團隊。所以，與歐洲相比，俄羅斯貴族服務的觀念更為持久，雖然實施方式大相徑庭。為國家服務的貴族隨身不帶自己的屬臣和侍從，卻在中央等級機構中獲得職位。這導致俄羅斯社會的總體軍事化，在道德上重視責任、榮譽、等級、服從。[[21]](#m21_20)

支撐俄羅斯專制主義的內部政治力量，其平衡可用圖4來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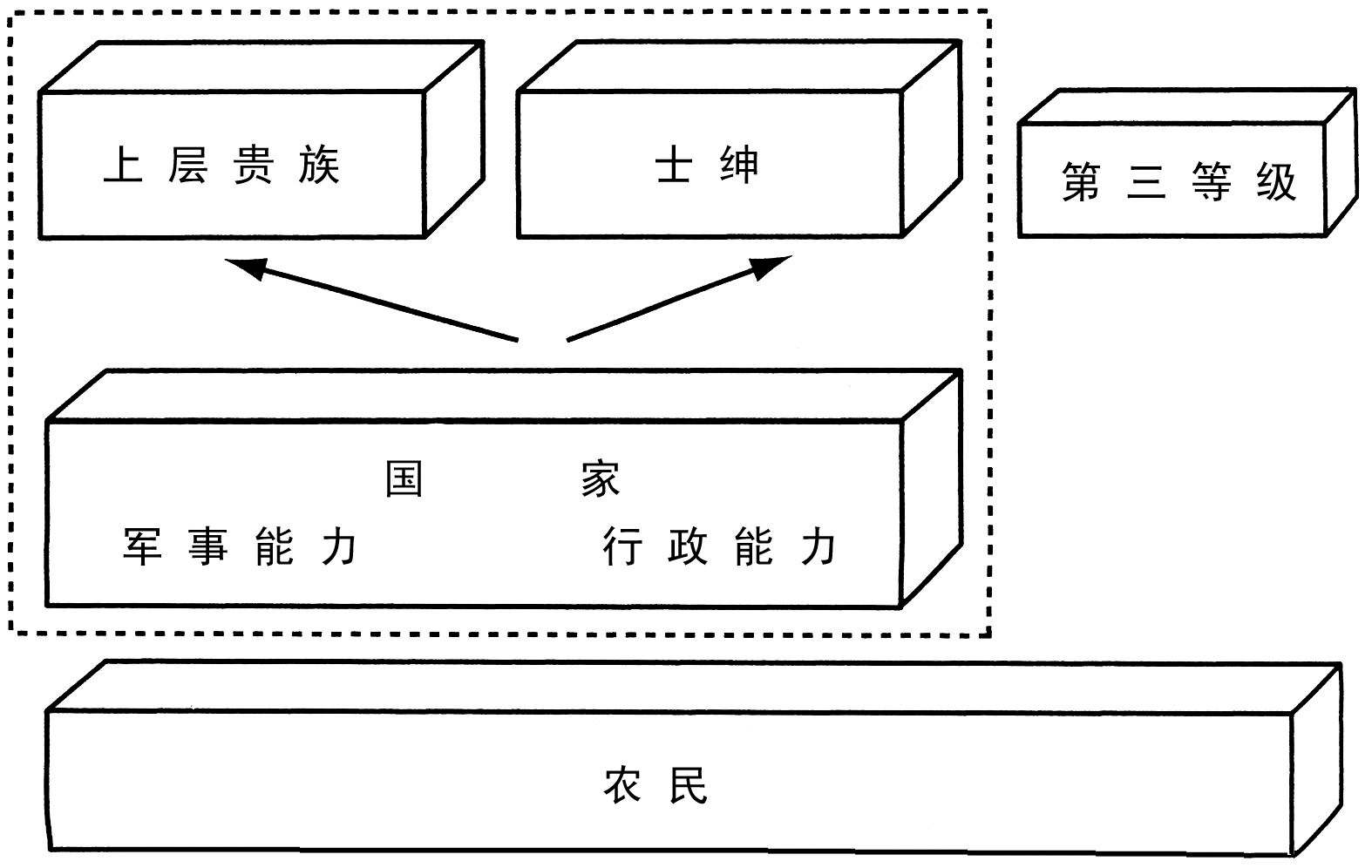


圖4. 俄羅斯

彼得大帝在1722年以官秩表（Table of Ranks）替換古老的門第選官制。每個國民都有自己的法定等級，以及相應的特權和義務。非貴族人員一旦升到足夠的等級，不管是在官僚機構還是在軍隊，就可自動進入世襲貴族的行列。新鮮血液進入貴族，這很有必要，因為國家需要大批公職人員。官秩表確定貴族的集團身份，并加強其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但它從不將自己視作君主政體的對手，因為其利益與國家緊密相連。[[22]](#m22_20)

貴族提供服務，以換取免稅、土地人口專有權和進一步榨取農奴的機會。農奴在君主贈與貴族的封地上首次出現，這顯示農民條件的惡化和貴族服務階層的興起，以及兩者的密切相連。這些封地傾向于在南方、東南和西方，都是國家奪之于鄰國的新土地。遼闊的北方領土上沒有戰事，它的農民處境要好得多——基本上只是國家的農民，只有欠國家的義務，不欠私人地主的。[[23]](#m23_20)

整個16世紀和17世紀，農民的稅賦日益上漲，而更為重要的法律限制則針對農民的行動自由。根據古老的傳統，農民有權離去，但在后來受到愈來愈多的限制，最后竟被全部廢除。[[24]](#m24_19)限制農民的遷徙是至關重要的，它直接影響俄羅斯貴族的團結，以及貴族與君主政體的同盟。

諷刺的是，此中原因與俄羅斯的地理有關。它缺乏地理界限，非常不適于奴隸制的發展。俄羅斯只有很少阻擋遷徙的自然屏障，如無法通行的大河或山脈。國家因擴張而不斷拉長邊境線，尤其是在南方和東南方。烏克蘭南部和頓河盆地（Don Basin）的自由哥薩克社區，據說由逃走的農奴所建。像蓄奴農地與開放邊境相鄰的美國南方，只有農奴主之間達成牢固協議，以限制農奴行動、送回逃奴、既嚴罰逃奴又嚴罰違規地主，農奴制度方能取得成功。如有主要參與者不予合作——或是部分地主，或是自由城市，或是向逃奴提供保護的國王——整個制度就會崩潰。考慮到這段時期勞力缺乏，任何地主如果退出聯盟，以較好條件將農奴吸引到自己領土，便會獲取豐厚的利潤。所以，必須以顯著的地位特權和嚴守反遷徙規則的承諾，來加強地主卡特爾的團結。俄羅斯專制主義的基礎，就是君主和上下層貴族的同盟。他們都答應遵循有關規則，犧牲品就是農民。

維持農奴卡特爾的需要，解釋了俄羅斯政治發展的眾多現象。自己沒有農奴的個人，欲自由擁有土地，會受到政府愈來愈多的限制。要想得到土地，必須先變成貴族。一旦成為貴族，便能自動獲得農奴，以及維持這一制度的義務。此舉遏制了資產階級在獨立商業城市的成長。西方的城市在促進農民自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俄羅斯率先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是貴族，而不是獨立的資產階級。[[25]](#m25_18)維持卡特爾的需要，也解釋了俄羅斯向南方和東南方的擴張。邊境旁邊的自由哥薩克社區的存在，無疑是持續的誘惑，也是逃跑農民的良機，必須遭到鎮壓。

### 彼得大帝之后

彼得大帝是推行現代化的偉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羅斯“歐洲化”，并使之成為歐洲政壇中的主要角色。但他從上到下的強行改革，遇上了俄羅斯社會本質上的局限。例如，他試圖創立省和地區的兩級制度，以及新式的市政規則，以改造省、市和地方的政府，到最后都不了了之。用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字眼來說，原因在于“能力缺乏”。那是指，地方上受過訓練的行政人員不夠，現存的又缺乏熱情。中央頒布的法令得不到實施，政權也無法鏟除既有的腐敗和獨斷專行。[[26]](#m26_17)

彼得大帝在軍隊和中央官僚機構中，推行選賢與能的現代晉升制度。他死后，便難以為繼。他的很多革新全靠自己的監督和精力，例如，他曾旁聽政府招聘干部的考試。他去世后，宮廷內外的強大家族使行政機構重趨家族化。他的繼位者軟弱。想要晉升到文武官職的最高等級，全得倚靠豪門巨室的贊助，像多爾戈魯科夫（Dolgorukov，俄語Долгоруков）、拉雷斯金（Naryshkin，俄語Нарышкин）、戈利岑（Golitsyn，俄語Голицын）、薩爾蒂科夫（Saltykov，俄語Салтыков）。日益掌控國家政策的貴族在1762年廢除自己的服務義務，并獲得更多針對農民的權利，如隨意遷徙和驅逐農民的權利。[[27]](#m27_15)豪門家庭及其贊助網絡的相互競爭，甚至延伸到軍隊，戰斗力因此而受損。

貴族家庭的興起分散了俄羅斯制度的權力，并軟化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所遺留下的專制傳統，再加上法國文化在俄羅斯精英中所享有的主導地位，這一切使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所描述的19世紀早期的貴族社會，看來酷像歐洲的貴族社會。如在兩百年之前，這是不可想象的。但這種權力分散與西方現代行政國家的興起，不可混為一談。歷史學家約翰·勒多內（John LeDonne）說：“全國范圍家族和依附者的網絡，無不在嘲弄立法文件所建立的嚴格等級制度。此類立法努力，一直在尋找行政秩序和‘規范化’。它解釋了為何俄羅斯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是人的政府，而不是法的政府。”[[28]](#m28_13)

### 專制主義完成

有關俄羅斯的解說，以18世紀晚期穩固專制國家的出現而告結束。顯而易見，之后又有很多新的發展，包括19世紀的自由派實驗和20世紀極權國家的興起。到法國大革命時，俄羅斯統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國和西班牙的弱的專制主義，也不同于中國和奧斯曼的國家。

在若干方面，俄羅斯的國家比法國或西班牙更為強大。至少在與精英打交道時，后者受到約束，必須尊重法治，這在俄羅斯卻是聞所未聞的。法國和西班牙的政府，以債務違約和貨幣操縱來蠶食產權，甚至捏造指控，通過法律程序來勒索錢財。但至少，他們覺得必須運用現有的法律機構。相比之下，俄羅斯政府無需法律借口來沒收私人財產，逼迫貴族為政府服務，處置敵人和叛徒時，漠視正當的法律程序。伊凡四世的特轄制在某種意義上只是意外，之后也沒有相似的復制，直到20世紀的共產主義政府。但它的曾經發生，為后來俄羅斯統治者創立了重要的先例。他們很清楚，他們手中針對精英的極端措施是西方主權國家所沒有的。在這一方面，俄羅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國，更遠離西方。俄羅斯政府發展了類似奧斯曼的專制制度，譬如作為騎兵報酬的封地。奧斯曼和馬穆魯克，即使在最興盛時期，也比俄羅斯統治者更加尊重法治。

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專制主義更為家族化，遠遠超過中國或奧斯曼的版本。如我們所見，中國人發明了現代官僚機構和非人格化的中央統治。大體上，中國歷史是國家與家族制復辟的斗爭史。早在中國統一之前的公元前3世紀，非人格化和選賢與能的政府的理想就已問世。奧斯曼的軍事奴役制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制度，不受家族影響，在其全盛時期，不乏來訪歐洲人的贊美。彼得大帝想在俄羅斯創建同樣制度，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俄羅斯的家族力量隨后輕易奪回政府，以不透明的方式在幕后制定政策。

當代俄羅斯，與彼得大帝死后的百年社會有驚人的相似。盡管有現代的正式憲法和書面法律，俄羅斯國家仍受灰色精英網絡的掌控，很像曾經控制帝制俄羅斯的薩爾蒂科夫和拉雷斯金家族。這些精英行使權力的方式，不是法律或規范程序所能定義的。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得越糟。當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的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為己著想。

俄羅斯沒有陷入歷史的泥潭。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開下專制先例，但接踵而至的卻是自由化。今日社會已被動員起來，其方式不同于舊政權時期，資本主義的引進允許精英的組成定期更換。今日腐敗和紊亂的選舉式威權主義，不再是俄羅斯人曾承受的殘酷獨裁。俄羅斯歷史提供很多通向較多自由的其他選擇，可作為將來改革的先例。

## 第27章 征稅和代表權

失敗的負責制案例，幫助理解議會制度在英國的發展；政治團結的來源，其在諾曼征服之前英國的扎根；英國制度合法化中的法律作用；光榮革命所真正實現的

政治負責制如何發展的最后案例是英國，其政治發展的三大組件——國家、法治和政治負責制——都成功獲得了制度化。我最后審視英國是為了避開輝格史觀的缺陷。關于英國代議政府的興起，已有很多論述認為，它是可溯源自古代雅典的西方發展模式的邏輯的、必然的或無可避免的結果。但這些論述很少互作比較，所引證的一系列因果事件，又忽略了不易察覺或更為遙遠的因素。而在事實上，那些因素卻在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它們只看到頂部的龜，而忽視了蟄伏于下的龜。

我們得以避免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已討論四個負責制政府無法出現的歐洲國家——如果把所討論過的非西方案例也包括在內，那就不止四個。我們觀察英國與其他案例的異同，將更好地了解促使負責制發展的組合因素。

跟法國、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羅斯一樣，英國首先是部落社會，然后是封建社會，它的中央集權始于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這些社會的精英都組成政治團體——英國議會、法國高等法院、西班牙議會、匈牙利議會、俄羅斯縉紳會議——推行現代化的君主要向它們尋求支持和合法性。在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這些團體沒能凝聚成強大的制度化參與者，沒能對抗中央國家，沒能取得憲政上的妥協，沒能獲得國王對自己的負責。相比之下，英國議會卻是強大而凝聚的。

具體地說，不同于主要代表卡斯提爾城市的西班牙議會，或貴族掌控的法國和俄羅斯的政治團體，英國議會不僅代表貴族和神職人員（世俗和精神的領主），而且代表廣泛的士紳、市民和業主。這些平民是議會的靈魂和動力。英國議會強大到成功擊敗國王的諸多計劃，包括增稅、組建新軍、躲避普通法。它還創建自己的軍隊，在內戰中打敗國王，將之處死，迫使繼任君主詹姆士二世退位，擁戴來自歐洲大陸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到最后，統治英國的不是歐洲大陸那樣的專制君主，而是正式承認議會負責制原則的立憲君主。英國議會獲得如此進展，而歐洲其他地區的議會卻四分五裂和軟弱無能，或被拉攏收買，或主動支持君主專制，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夕。有人自然要問，這是為什么？

英國還在另一方面為當代發展中國家樹立先例。17世紀初，早期斯圖亞特治下的英國不但日益專制，而且非常腐敗。滲透法國和西班牙政府的實踐，如賣官鬻爵和家族攫權，同樣也發生在英國身上，只是在規模上還算適中。但到該世紀末，英國的公共腐敗問題，即使沒有得到解決，至少已有很大收斂。政治制度得以廢除公職買賣，建立現代官僚機構，提升國家整體的力量和效率。這雖然沒有徹底解決英國公共生活中的腐敗問題，但阻止國家陷入最終摧毀法蘭西王國式的腐朽泥潭。今天，面對普遍公共腐敗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英國政治制度的應對方法。

### 英國政治團結的根源

我們看到，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的君主政體使用種種策略，在貴族、士紳和資產階級當中，收買、脅迫、化解潛在的對手。英國君主作出同樣的嘗試，但議會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團結起來，抵制并最終打敗國王。問題在于，這團結來自何處。

答案至少有三，有的已在以前章節中獲得詳細解釋。第一，很早以來，英國社會團結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會性。第二，普通法和英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獲得廣泛認同，業主保衛自己財產的意愿強烈。最后，此時的宗教，雖然在英國人中間造成痛苦的分裂，卻賦予議會超越的使命感。如果與國王的爭執只是為了財產和資源，該使命感便不復存在。

地方政府和團結

我們在第16章中提到，歐洲的部落社會組織因基督教的影響而趨于崩潰，遠遠早于現代國家建設。英國在這一過程中，比任何其他地方走得都要快。6世紀晚期坎特伯雷的圣奧古斯丁傳教開始，更加個人主義的社區便取代了擴展的親戚關系。（這并不適用于愛爾蘭人、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他們的部落關系——例如高地氏族——持續到很晚的歷史后期。）鄰居之間毫無關聯，這樣的社區在諾曼入侵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時期已屬司空見慣，使當地農業社會截然不同于東歐，更不同于中國和印度。[[1]](#m1_27)

基于親戚關系的社會組織雖然孱弱，但并不排除社會團結。緊密相連的親戚團體，可在團體范圍內提供集體行動，但遇上宗族或部落之外的合作，又會變成障礙。基于親戚關系的社會，其集體行動的范圍非常狹窄，所以需要政治制度。

英國社會早期的個人主義，并不意味社會團結的消失，只是團結形式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會性的。諾曼征服之前，英國分成相對統一的各郡（shires），它們可能曾是獨立的小王國，現已聚集成更大的英格蘭王國。主持郡務的是稱作長老（ealdorman）的古老官員，其職位是世襲的。（它的詞根來自丹麥，現在仍存活于美國的地方政治，市府參事即寫作alderman。）[[2]](#m2_27)但實際權力漸漸落到皇家官員手中，即郡治安官（shire reeve，or sheriff），后者受國王的指派，代表皇家權力。每半年，他組織一次郡會議，該區所有自由民（后來變成自由地主）必須出席。[[3]](#m3_27)諾曼征服并沒摧毀該統治制度，只是將郡改為縣，以符合歐洲大陸法蘭克人的習慣。然而，治安官的權力大增，取代了世襲的長老。郡會議演變成縣法庭，用弗雷德里克·梅特蘭的話說：“國王的大領主必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與自己的屬臣相聚。租戶可能與自己領主坐在一起，儼然像個同等伙伴。”[[4]](#m4_27)

今天，這些制度的詳情好像只有考古價值，但在解釋議會作為政治制度的演變時卻非常重要。歐洲大陸封建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在卡洛林帝國地區，看來非常不同。歐洲領主貴族享有對司法權的控制，其程度遠遠超過英國。[[5]](#m5_27)在英國，國王享有優勢。諾曼征服之后，國王利用縣法庭來監察封建法庭。如個人覺得在領主那里得不到正義，就可向治安官提出上訴，要求將訴訟移至縣法庭。后來，國王法庭（詳見第17章）取代縣法庭成為重要案件的預審庭。后者只得主持較不重要的訴訟，譬如金額不超過四十先令的土地糾紛。與歐洲大陸相比，英國的非精英更有機會運用這些機構。

縣法庭開始失去其司法功能的同時，卻獲得新的政治功能，成為更廣泛政治制度的代議場所。正如梅特蘭所說：

到13世紀中期，我們發現，民選代表被召集來參加全國會議，或叫議會（parliament）。他們是縣法庭的代表，不是無組織群體的代表。我們幾乎可稱他們為集團代表。理論上，整個縣都由縣法庭代表……國王的巡回法官不時來訪，整個縣的地主團體（totus comitatus），前來晉見，報告上次來訪之后的所作所為。縣法庭可作出裁決，也可作證，如有犯錯，還會被罰款。[[6]](#m6_27)

所以，縣法庭是奇怪的組織，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它由國王所創建，受由國王任命并對國王負責的治安官統轄。但它又以全體地主的廣泛參與為基礎，不受世襲等級和封建地位的限制。治安官反過來又受地方民選督察官（coroner）的制衡，民選督察官應代表縣民利益的觀念因此而獲得合法性。既有對國王的向上負責，又有對縣民的向下負責，兩者日益趨于平衡。

郡或縣下面還有更小的地方行政單位，叫作百戶（hundreds），相當于卡洛林帝國的鄉（centenae）。（這些行政單位也傳到美國。）百戶區有自己的聚會，叫作百戶法庭，開始在司法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百戶區由治安官任命的巡警所治理，一起負責警察功能，如抓捕罪犯。百戶也是英國陪審團制度的基礎，需要提供審判刑事案件的十二名陪審員。[[7]](#m7_26)

因此，甚至在諾曼征服之前，整個英國社會已組建高度參與的各式政治單位，一直抵達村莊層次。這不是地方社會組織參政的基層現象，而是全國政府邀請地方上的參與，構建地方上的生活，扎根成為社區的來源。

普通法和法律機構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后來英國政治代議制度的構成部件，一開始只是司法機構，像縣法庭和百戶法庭。英國歷史上，法治的出現遠早于政治負責制，后者又始終與保護法律密切相聯。英國司法的參與性質，加上普通法因應地方需求以定規則的特征，幫助造就了法律屬于大家的感情，其強烈程度遠遠超過其他歐洲社會。公共負責制首先意味著對法律的服從，盡管那時的法律，不論是法官作出的，還是頒成文本的，都沒有走過民主政治的程序。

法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護產權。在這一點上，英國普通法比其他地方的法律更為行之有效。正如哈耶克所說的，原因之一在于普通法是分散決策的產物，能盡量適應各地的情形和知識。不過吊詭的是，原因之二在于國王愿意在產權上支持非精英對貴族的反抗，這便需要強大的中央國家。在英國，原告早就可以將產權訴訟移至國王法庭，如金額不夠，仍可移至縣法庭或百戶法庭。中世紀有不少復雜的傳統產權，如佃權（copyhold）。土地在技術上是領主財產，但佃戶（villein）又可將之傳給兒子或親戚。國王法庭傾向于反對領主，保護佃權所有人的權利，以致這種財產漸漸進化成真正的私人財產。[[8]](#m8_26)

縣和百戶層次的法庭眾多，國王在地方產權爭執中愿意充任中立仲裁人，這一切大大增強了英國產權的合法性。[[9]](#m9_26)到15世紀，英國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和獲得認可的中立性，允許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變成真正的“第三分支”，有資格裁決憲法問題，如議會廢除專利特許證的權利。有評論家指出，“很難想象，此類問題能在中世紀歐洲的其他地方獲得解決——并且是完全獨立的解決——全靠法官以專業語言作出討論，而不是政治上的樽俎折沖，或有關團體的脅迫。”[[10]](#m10_26)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仍缺乏如此的司法才能和司法獨立。

到了17世紀的重大憲政危機時，不讓君主破壞法治成了保衛英國自由的吶喊和議會團結以抗國王的源泉。出現于早期斯圖亞特（1603—1649年）的威脅是國王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其起源和司法權都很模糊），其為了“更有效地”起訴犯罪，而省去一般法庭的正常保護程序（包括陪審團的審訊）。在第二任斯圖亞特國王查理一世（1600—1649）的治下，它帶有更多政治性，不只是起訴犯罪，還用來對付假想的國王之敵。[[11]](#m11_26)

英國法律獨立的更佳象征，莫過于愛德華·柯克爵士（1552—1634）。他是法學家和法律學者，最終升至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首席法官。他在各種法律職務中不折不撓，抵抗政治權威和國王對法律的侵犯。詹姆士一世試圖將某些案件從普通法搬至教會法之下審理，柯克堅持說，國王沒有足夠權力來任意解釋法律，從而引起極大憤怒。國王宣稱，堅持國王在法律之下，無疑是叛國罪。柯克引用布拉克頓（Bracton）的話作答：“國王不應在人下，但應在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omine set sub deo et lege）。”[[12]](#m12_26)再加上其他的冒犯，柯克最終被解除一切法律職位，轉而加入議會，成為反皇派領袖。

宗教作為集體行動的基礎

跟法國、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羅斯不同，英國對專制權力的抵抗也涂上宗教色彩，大大加強了議會陣營的團結。第一任斯圖亞特國王詹姆士一世，其母親是被處決的瑪麗·都鐸（Mary Tudor），即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其兒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娶法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為妻。父子都表示相信新教，但常被懷疑對天主教抱有同情。大主教勞德（Laud）試圖使英國國教向天主教靠攏，更加重視儀式，為此深受清教徒（Puritan）的憎恨。早期斯圖亞特的專制主義教條和王權神授，與法國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的觀點遙相呼應。很多新教徒從中看到國際天主教意欲剝奪英國人天生權利的大陰謀。1641年愛爾蘭的天主教叛亂仿佛就在家門口。新教徒移民遭受暴行的報告，似乎確認了很多英國人對國際天主教擴張的最壞擔心。其中還真有一定的道理。西班牙國王在16世紀末派來無敵艦隊（Armada），并投入八十年戰爭，以征服新教徒的荷蘭聯合省。法國的路易十四在17世紀末接過這項任務，出兵侵犯荷蘭，他的秘密同情者就是英國最后一位天主教國王詹姆士二世。

有關英國內戰的浩瀚史籍總有周期的修正。它不斷學術性地改變對戰爭動機的理解，以跟上流行的思想風尚，以致有些歷史學家對取得共識放棄希望。[[13]](#m13_26) 20世紀的很多解釋，淡化了戰爭參與者的宗教動機，并將宗教意識視作階級或局部的經濟利益的面罩。事實上這段時期的宗教和階級，其間互動非常復雜，很難厘清宗教和政治的效忠對象。有站在議會一邊的國教徒，也有作為保皇派的新教徒。很多高層國教人士認為，與天主教會相比，像公理會（Congregationist）和貴格會（Quaker）那樣的非國教徒，對道德秩序構成更可怕的威脅。[[14]](#m14_26)顯然，較激進的新教流派變成了社會動員和經濟進步的載體，并為抗議和團結提供機會，而傳統的等級制的宗教渠道是無能為力的。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主張沖突的主要原因不在宗教，但宗教在動員政治參與者和擴大集體行動范圍上，仍然發揮重大作用。這在議會陣營，以及議會創建的新模范軍（New Model Army）中，尤其如此。由于很多軍官的宗教信念，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模范軍變成反皇派激進主義的大溫床。光榮革命期間，議會愿意接受奧蘭治公國的威廉，以取代英國的合法君主詹姆士二世，就是因為前者是新教徒，后者是天主教徒。不然，真不好解說。

所以，英國地方上的自治團體、深植人心的法律、產權不可侵犯的信念、君主政體涉嫌參與國際的天主教陰謀，這一切都有助于議會陣營的精誠團結。

### 自由城市和資產階級

現代傳統智慧認為，如果沒有強大中產階級的存在，民主就不會出現。他們是有產階級，既不是精英，也不是鄉村窮人。這個概念起源于英國的政治發展，與其他任何歐洲國家（可能的例外是荷蘭）相比，英國看到更多城市和城市資產階級的早期涌現。城市中產階級在議會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內戰和光榮革命之前，就已獲得經濟和政治的實質性力量。在權力的三角比賽中，它是抗衡領主和國王的大砝碼。城市資產階級的興起，是更為廣泛的西歐變遷的組成部分，包括低地國家、意大利北部和日耳曼北部的漢薩同盟（Hanseatic）港口城市。詳細描述這一重要現象的有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5]](#m15_25)馬克思把“資產階級的興起”當作他現代化理論的中心命題，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階段。

我們在第25章中看到，自由城市的存在促成了西歐農奴的解放。對英國政治發展和議會獲勝來說，強大且凝聚的資產階級是非常重要的。但資產階級在英國和西歐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方面卻是異乎尋常的。它是特殊境遇的后果，其他歐洲國家只是沒遇上如此境遇而已。尤其是在易北河以東，那里只有很少獨立自治的商業城市，遵照自己的法律，受自己民兵的保護。那些城市更像中國的，只是地方領主控制的行政中心，碰巧也充任商業中心。馬克思的巨大影響促使好幾代學生，繼續把“資產階級的興起”看作經濟現代化的伴隨物，無須作出進一步解釋，認定該階級的政治力量來自其經濟力量。[[16]](#m16_25)

早于馬克思幾乎七十五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資產階級的起源，提供了更為周詳、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他認為，在資產階級的興起當中，政治既是原因又是結果。斯密在第一卷第三章的篇首提出，他所謂的“富裕”（opulence），即經濟增長，會有自然的升級，始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改善，導致更多國內的城鄉貿易，到最后才是日益增加的國際貿易。他注意到，歐洲現代國家所經歷的次序恰恰相反：國際貿易發展在國內貿易之前，前者興旺起來之后，強大男爵和地主的政治霸權才被打破。[[17]](#m17_24)

在斯密看來，造成這奇特次序有好幾條原因。第一，羅馬帝國崩潰后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強大男爵手中，他們寧愿保住自己的政治權力，也不愿追求財產回報的最大化。所以，他們創建長子繼承制和其他限制性的規則，以防地產的流失。此外，他們又將農民貶為農奴或奴隸；斯密認為，農奴或奴隸既不愿賣力干活，又不愿投資于土地。不愿追求回報最大化的另一原因，是缺乏以盈余去購買的消費品。在歐洲的黑暗時代，貿易不存在。因此，有錢有勢者沒有其他選擇，只得與大批侍從共享盈余。[[18]](#m18_23)

斯密又注意到，出現于中世紀的城市，其最初居民是“商人和工匠”。他們屬于低級階層，甚至處于奴役地位，但是他們逃離了領主的控制，在城市找到庇護。久而久之，國王授予特權，讓他們可以自由嫁女（編按：指無需領主同意而自主決定），組織自己的民兵，最終作為集團實體而享有自己的法律。這就是資產階級的起源，雖然亞當·斯密沒有使用如此字眼。不同于馬克思，斯密提到獨立城市的興起必須有重要的政治前提：

領主鄙視市民，認為他們屬于不同層次，只是被解放的農奴，幾乎不是自己的同類。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憤怒，一有機會就掠奪欺凌，不稍寬恕。市民自然也既嫉恨、又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也嫉恨和畏懼領主。國王雖可能亦會鄙視市民，但卻沒有理由去嫉恨和畏懼他們。所以，相互利益促使他們支持國王，又促使國王支持他們來反對領主。[[19]](#m19_22)

斯密接著說，這就是國王將獨立憲章和法律賦予城市的原委，允許他們在國王與領主的斗爭中成為一枚平衡砝碼。

城市和資產階級的形成，與馬克思所相信的相悖，不只是經濟增長和技術變化的結果。剛開始，他們非常軟弱，從屬于強大的領主，除非獲得政治保護。這就是在波蘭、匈牙利、俄羅斯和易北河以東其他土地上所發生的。那里，政治力量的不同配置使君主變得軟弱，或促使君主與貴族的派別結盟，以反對市民利益。由于這個原因，東歐從來沒有強大獨立的資產階級。技術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市場，其引進者不是市民，而是進步地主，或國家本身，因此無法達到相似的繁榮程度。

基于城市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旦出現，我們便離開古老的馬爾薩斯式世界，開始進入現代經濟制度，生產效率的增長變成家常便飯。此時，日益富有的資產階級，越來越能顛覆舊式地主秩序的權力，政治發展的條件因此而發生變化。斯密表明，舊精英受財富的誘惑而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力——鉆石扣環，“更適合于作孩子的玩具，而不應是大人的認真追求”——舊農業經濟是無法創造這種財富的。[[20]](#m20_21)因此而開始了政治發展的現代制度：政治變化取決于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但一開始，資產階級的興起要有政治前提——市民和國王都憎恨領主。這個條件不存在的地方，如東歐的大部，就沒有資產階級的出現。

### 征稅斗爭

自13世紀以來，英國議會開始定期開會，比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更為頻繁。如上所述，它們的原始功能是司法，但久而久之，開始扮演更廣闊的政治角色，成為國王的聯合統治者。在批準稅賦上，議會作用尤其重要，因為議會包括全國大多數地主，其資產和收入是國家征稅的基礎。到14世紀和15世紀，下議院與英國君主密切合作，以剔除不夠格或腐敗的官員，并定期監督議會撥款的具體花費。[[21]](#m21_21)圖5顯示的是內戰前夕的1641年的英國社會力量。

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議會，開始了十一年的“親政”，試圖以議會為代價來擴展國家權力。這導致查理一世與議會對手在好多問題上發生爭執，有的已在前面篇幅介紹過。議會中很多人不喜歡大主教勞德的專制國教，懷疑查理一世同情天主教，因為他有興趣與法國和西班牙建立外交關系。宗教問題和保衛法治互相交融，星室法庭、高級專員公署（High Commission）、北方政務會（Council of the North）起訴反主教制（anti-Episcopal）的清教徒。清教徒傳教士亞歷山大·萊頓（Alexander Leighton），遭到星室法庭野蠻逮捕和殘酷折磨，卻得不到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被認為是宗教和皇家權力肆無忌憚的濫用。



圖5. 英國

其時還有兩大問題，一是沒有議會批準、國王擅自增稅的權利。國王提出新關稅，向地主施以任意的罰金，重新引進蓄意避開禁令的壟斷專利，在和平時期為重整海軍而征收“船舶籌款”。[[22]](#m22_21)英國稅務制度的發展不同于法國，英國的貴族和士紳未以法國方式購買特權和免稅，稅收負擔的最大部分都落到了議會所代表的富人頭上。可能與緊密的地方團結有關，富人階層沒有與國王共謀，將稅收負擔推向農民、工匠和新近致富的中產階級，反而認為自己與議會的權力和特權休戚相關。

第二個問題涉及政治腐敗。與法國和西班牙一樣，英國也躲不過家族化和買賣公職的做法。從都鐸時期開始，皇家公職的獲得愈益依靠政治贊助，晉升不是選賢與能，而是以各種蔭庇關系圈子的圈內人資格為準。[[23]](#m23_21)公職待價而沽，又變成世襲財產。到斯圖亞特王朝早期，法國包稅（關稅）和內部財政（向國家官員借款）的做法獲得引進。國王建立皇家調查委員會，就像法國的司法堂，以私人腐敗的借口敲詐富有官員。[[24]](#m24_20)

1641年爆發的內戰持續十年，最后在1649年，以議會的勝利和查理一世被砍頭而告終。但國王和議會的長期斗爭，其最終解決并不全然依靠武力，雖然暴力和暴力的威脅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25]](#m25_19)勝利的議會派因處決國王而抹黑了自己聲譽；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護國公時期，又因追求愈益激進的政策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礎。所以，查理一世的兒子在1660年成功復辟，登位為查理二世，反而帶來一種解脫。二十年的強烈政治沖突之后，國家得以返回常態。

復辟確實解決了當初引起內戰的腐敗問題。議會在內戰和護國公時期推行很多政府改革，譬如建立嚴密的現代新模范軍和清洗腐敗的皇家官員。但查理二世的上臺，又帶回很多早期斯圖亞特的腐敗做法，包括出售公職和贊助任命。但是，多種因素聚合起來，在英國政府中建立了改革同盟，最終打退這些倒行逆施。

首先是第二次荷蘭戰爭（1665—1667）爆發，加上瘟疫突發和倫敦大火，導致國防嚴重衰弱，以致荷蘭船隊溯泰晤士河而上，燒毀英國海軍船塢。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也取得進步，以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威脅歐洲大陸的均勢。顯然，軍費必須上漲。第二是查理二世希望量入為出，以避免向議會請求特別征稅。第三是政府中出現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精明改革家，包括喬治·唐寧（George Downing）爵士和喜記日記的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他們關心日益增長的外國威脅，認識到財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必須改革才能獲得高效。[[26]](#m26_18)最后，告別內戰和護國公時期的議會，對政府的浪費和腐敗深感懷疑，其時政府將稅收用于非公共的開支。

不同壓力的匯合允許唐寧組織的第二財政委員會（Second Treasury Commission）推薦和實施重要的改革，使英國公共行政管理更為現代化，進一步脫離家族化。它取消從都鐸時期起便是腐敗溫床的國庫（exchequer）的權力，移交給總管所有政府開支的新財政部。它向公眾發行遵守公共債券市場紀律的新債券（Treasury order），以取代內部財政。最后，它將私人擁有的公職改成“悉聽尊便”（at pleasure）的職位，并取消新的公職出售。[[27]](#m27_16)

1667年后發生的改革努力沉重打擊了家族化實踐，確保英國在管理公共資金上比法國或西班牙更為有效。反對腐敗政府的斗爭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唐寧在17世紀60年代發起的很多改革，其完全實施尚要等到18世紀早期。這些努力也沒有排除后續稽查的需要，因為假以時日，家族制總是試圖卷土重來。

17世紀晚期確實提供了扭轉家族化的重要模式，對今天的反腐努力仍有意義。促使晚期斯圖亞特王朝改革的所有因素依然重要：外部環境的壓力迫使政府改善效率；首席執行官如果沒有發揮帶頭作用，至少不拖后腿；政府內有人倡導改革，并得到足夠的政治支持來付諸實行；最后，來自納稅人的強大政治壓力，他們不愿看到浪費。

國際機構最近作出的很多反腐努力，比如世界銀行或英國國際發展部，但卻功虧一簣，就是因為上述因素之一的缺席。現代世界的問題在于，腐敗政府經常無需向自己公民謀求稅收，像查理二世所作的，因此沒有議會或公民社會來監督它們的開支。它們的收入或者來自自然資源，或者來自并不要求財政負責制的國際捐贈人。亨廷頓建議，如果英國議會的吶喊是“無代表即不納稅”，今天口號應該是“不納稅即無代表”，因為最能激勵政治參與的乃是后者。[[28]](#m28_14)

### 光榮革命

國王與議會爭斗的結果是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詹姆士二世被迫退位。奧蘭治公國的威廉從荷蘭趕來，登基為國王威廉三世。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徒的詹姆士二世試圖擴軍，并配以天主教軍官。這即刻引起懷疑，他是否打算利用軍隊實施專制，并與法國和其他天主教勢力結成同盟。更大原因則與議會當初反對國王導致內戰的原因相同：合法性最終應基于被統治者的同意，得不到同意，國王無權強加于人。危機中達成的和解，涉及憲法、宗教、財政、軍事等重要方面。在憲法上，它建立了沒有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建軍的原則；議會還通過議案，羅列國家不得侵犯的國民權利。在財政上，它確立沒有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新稅的原則。在宗教上，它禁止天主教徒成為國王或王后，還添上增加異見新教徒權利的容忍議案（但排除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索齊尼派教徒）。[[29]](#m29_12)最后，它允許政府發行更多債券，使國家機構的大大擴展成為可能。議會主權的原則要在數年后才得到最后確認，光榮革命不愧為現代民主發展的主要分水嶺。[[30]](#m30_10)

光榮革命導致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大改變。作為這些事件的評論家和參與者，哲學家約翰·洛克擴充了霍布斯的觀點，即國家源于為保障天賦權利而簽署的社會契約。[[31]](#m31_9)其《政府論》上篇攻擊羅伯特·菲爾麥（Robert Filmer）爵士為君主政體辯護的君權神授；其《政府論》下篇力辯，與霍布斯相悖，侵犯臣民天賦權利的暴君可被撤換。這些原則使用普世性的論述，對1689年的憲政和解至關重要。光榮革命不是某個統治者或一群精英從他人手中奪得國家和租金，而是定出如何選擇后續統治者的原則。從洛克的《政府論》下篇，到美國革命和美國創始人的憲法理論，其間距離很短。盡管現代民主有復雜的方方面面，但1688—1689年的事件，牢固建立了政府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的基本原則。

光榮革命使政治負責制和代議政府的原則制度化，但還沒引進民主。此時的英國議會，只由很小比例的人口選出。出席議會的有高級階層、議員和士紳。后者是英國最重要的政治階級，根據彼得·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它代表了大約總人口的4%到5%。[[32]](#m32_8)更為廣泛的民眾參與地方統治，或參加陪審團，或協助百戶區和縣政府的工作，包括大部分條件較好的自耕農（yeoman）。如把這個團體也包括在內，政治參與者會接近男性成人總人口的20%。[[33]](#m33_8)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無論性別、種族、社會地位，所有成年人都享有選舉權——要到20世紀的英國或美國，方才得到實施。跟美國獨立宣言一樣，光榮革命建立了被統治者同意的原則，讓后人再去拓寬政治意義中的“人民”的范圍。

有些人認為，光榮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標志了英國安全產權的開始，其實非也。[[34]](#m34_8)數世紀之前，健全產權即已建立。包括女子在內的個人早在13世紀就行使買賣財產的權利（參看第14章）。普通法、國王法庭、縣法庭和百戶法庭，允許非精英地主在領主司法范圍之外，提出產權爭執的訴訟。到17世紀晚期，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參與反斯圖亞特專制的中產階級，都已出現。光榮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強大可靠產權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它的結果。英國有產階層覺得有重要東西需要保護。

光榮革命也未給新近壯大的納稅人減稅的借口，如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所提示的。[[35]](#m35_7)恰恰相反，政府開銷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1689—1697年的11%，漲至1741—1748年的17%，再漲至1778—1783年的將近24%。[[36]](#m36_6)在18世紀的高峰時期，英國征稅高達30%。

光榮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征稅合法，從此以后，征稅全憑同意。民主政體的公眾并不一定反對高稅，只要知道這是為了重要的公共目標，比如國防。他們所不喜歡的是非法征稅、稅款被浪費或掉進貪官污吏的荷包。光榮革命之后，英國投入兩場與路易十四法國的昂貴戰爭，即九年戰爭（1689—1697）和西班牙繼位戰爭（1702—1713）。二十年幾乎連續不斷的戰爭，證明是非常昂貴的。從1688年到1697年，英國艦艇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納稅人愿意支持這些及后來的戰爭，因為他們在戰爭得失上得到咨詢，被要求批準新的稅收。不用多作解說，英國較高的征稅并沒有遏制資本主義革命。[[37]](#m37_4)

與專制法國的對照是很醒目的。法國沒有接受同意的原則，征稅必須依賴強力。政府在同一時期從沒能征收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到15%，真正到手的往往更低。法國社會中最負擔得起的精英卻在購買免稅和特權，這意味著稅收負擔落到社會最弱成員的身上。所以，在路易十四過世的1715年，人口幾乎是英國四倍的法國發現自己已經破產。

光榮革命和隨之發生的財政和銀行改革，如1694年建立的英國銀行，確實使公共財政經歷了革命性的變更。它們允許政府在透明的公共債務市場上借貸資金，而法國或西班牙是無法企及的。因此，英國政府借貸在18世紀激增，使得國家愈加壯大。

### 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本卷對政治發展的介紹到此結束，時值18世紀末，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在此停下有邏輯上的原因。黑格爾的偉大注釋者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出生于俄羅斯，后來長住法國）認為，眾所周知的歷史終結于1806年，其時，拿破侖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君主政體，將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帶到黑格爾的歐洲。科耶夫以他通常的諷刺和頑皮說明，1806年以來發生的一切，包括間雜世界大戰和革命的20世紀狂飆突進（sturm und drang），只是在填平歷史所留下的坑坑洼洼。也就是說，現代政府的基本原則在耶拿戰役時已獲建立，后續任務不是發現新的原則和更高級的政治秩序，而是將之推至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38]](#m38_4)

我相信，科耶夫的聲明仍值得認真考慮。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組件——強大且有能力的國家、國家從屬于法治、政府對所有公民負責——已在18世紀末世界上的某地獲得確立。中國很早就開發了強大國家；法治存在于印度、中東、歐洲；負責制政府首次出現于英國。耶拿戰役之后的政治發展，只涉及這些制度在全世界的復制，而沒有看到全新制度的補充。20世紀的共產主義曾有如此的雄心壯志，到了21世紀，卻又在世界舞臺上幾近消失。

英國是三大組件聚合在一起的第一個大國。這三者互相之間高度倚靠。沒有強大的早期國家，就沒有法治，以及對合法產權的廣泛認識。沒有健全的法治和合法產權，平民絕不可能群起奮爭，將負責制強加給英國君主政體。沒有負責制的原則，英國絕不可能在法國大革命時成為強大國家。

其他歐洲國家，包括荷蘭、丹麥和瑞典，也在19世紀建立國家、法治和負責制的整套制度。它們所走的途徑與英國有實質上的不同。但要承認，整套制度一旦到位，它所創建的國家如此強大，如此合法，對經濟增長如此友善，以至成為推向全世界的模式。[[39]](#m39_3)在缺乏英國式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國家，這個模式將有怎樣的遭遇，那將是第2卷的主題。

## 第28章 負責制或專制主義？

前述案例的互相比較；通向代議政府的英國路徑不是唯一；達到丹麥；歷史討論與今日的民主斗爭息息相關

我們現已介紹了五個歐洲案例，在負責制和代議制度方面，引出四個不同結果。法國和西班牙創造了弱的專制主義，但沒有建立議會負責制的原則。兩個國家分割出賣自己的功能給眾多精英，精英以特權和免稅保護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會群體——避開國家的任意權力。俄羅斯建立了更為徹底的中國式專制主義，其君主政體將精英征入國家服務，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強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權力上實施憲政制衡，從而建立起負責制的原則。但這制衡太過強大，以致阻礙了國家的有效運作。最后，只有在英國，強大的議會將負責制原則強加于國王，但并沒有破壞強大和統一的主權政府。問題在于，為何會有如此不同的結果？

可用一個很簡單的公式來解釋這些差異，其與我們所介紹的農業社會中四大政治參與者的均勢有關。它們是以國王為代表的國家本身、高級貴族、士紳以及我所謂的第三等級。這種四分法過于簡略，但對結果的理解大有裨益。

歐洲有些貴族家族先發制人，取得優勢，而變得強盛起來——法國的卡佩家族、匈牙利的阿爾帕德王朝、俄羅斯的留里克王朝、征服后的諾曼王朝——從而出現國家。它們的興起歸功于有利地理、卓越領導、組織能力和掌控合法性的能力。合法性可能是統治者最初優勢的來源，如率領馬扎爾人（Magyars）皈依基督教的伊斯特萬。有人以赫赫武功征服軍閥對手，給社會帶來和平和安全，合法性也可能接踵而至。

高級貴族可說是遺留下來的軍閥，擁有自己領土、大批侍從和資源。這個群體有效治理自己的領土，可傳給后裔，也可交換成其他資產。

士紳是低級精英，雖有社會地位，但不一定擁有重要的土地或資源。他們的人數遠遠超過貴族，明顯從屬于貴族。

第三等級包含工匠、商人、解放了的農奴，以及不受莊園經濟和封建法律管轄的城鎮居民。

除了這四個群體，還有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然而，農民還不是重要的政治參與者。到18世紀，他們才在北歐某些地區參與政治。四下分散、貧困和缺乏教育的農民，很難完成重大的集體行動。中國、土耳其和法國的農業社會，農民起義同期性爆發，最終都被鎮壓，經常伴隨可怕的野蠻和殘忍。那些反抗影響了其他參與者的行為和計算，例如，國家在考慮增加農業稅時會特別小心。在其他時刻，農民起義可幫助推翻中國皇朝。但農民很難采取集團行動，以迫使整個制度實施關心農民利益的長期改革。

這五個群體的交叉關系在圖1中得到說明（參看第22章）。除農民外，這些社會群體都組織起來（只在程度上有深有淺），可以成為政治參與者，為奪得權力而斗爭。國家嘗試擴充自己的統治。國家之外的群體試圖保護和擴充現有特權，或反對國家，或互相爭斗。這些斗爭的結果多半取決于主要參與者的集體行動，甚至國家本身也需要精誠團結。王朝的內部分裂、組織故障、侍從不再相信王室的合法性、國王沒能孕育繼位者，都有可能造成國家的軟弱。此外，這些不同群體可以組成各式同盟——國王和士紳之間、國王和第三等級之間、高級貴族和士紳之間、士紳和第三等級之間，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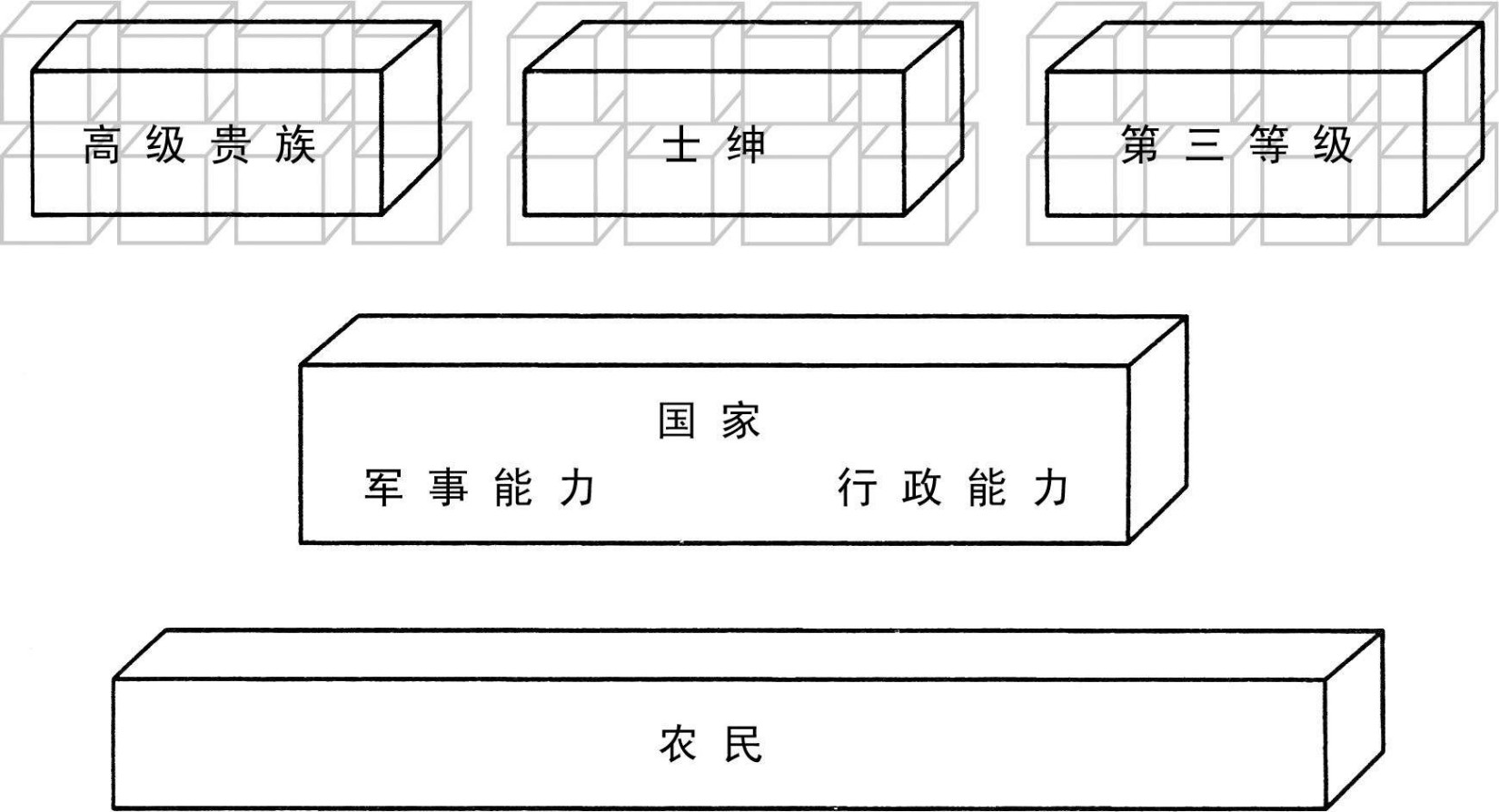


圖6. 集體行動的故障

出現專制主義的案例中，無論是強大的還是軟弱的，抵抗國家的群體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集體行動的故障（參看圖6）。哪里有負責制，哪里的國家相對弱于其他政治群體。議會政府出現的地方，凝聚的國家和組織良好、善于自衛的社會之間產生了相對均勢。

### 弱的專制主義

我們現在可以總結早先章節所描述的各種結果。

相對軟弱的國家遇上組織良好的社會，但前者仍得以掌控后者，這就是法國和西班牙，遂出現弱的專制主義。在這兩個案例中，國家的權力基礎依靠有限的領土，包含皇家領地和國家直接征稅地區——對法國君主政體來說，即巴黎周圍的財政區省（編按：原文誤為三級會議省[pays d’états]，據前文第23章改正）；對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來說，即卡斯提爾區域。它們都想通過拉攏收買、王朝陰謀和直接征服來取得更多領土，但西歐的地理，以及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的軍事技術，尚不允許快速的武力擴張——應該還記得，星狀要塞使圍攻戰爭變得既昂貴又必不可少——法國和西班牙的君主很快發現，自己因軍事開支和帝國擴張而深陷財政危機。

在這兩個案例中，國家之外還有強大的地方參與者，竭力抵制中央集權。他們包括擁有土地和資源的古老血緣貴族、廣大的士紳階層、城市資產階級，已經組成正式的等級——法國的高等法院和西班牙的議會。法國和西班牙國家一步步收買這些群體，開始時好像不是國家建設的戰略計劃，只是防止破產的絕望革新。最初，法國在財政區省以免稅和特權來購買地方精英的忠誠。它在1557年對“大借款”賴債不還，引發破產。這之后，它開始向富有個人出售公職，到17世紀早期又搖身變為世襲財產。公職的出售和再出售，一直持續到世紀末的路易十四年代。意大利和低地國家的持久王朝戰爭，使西班牙國家早早陷入破產。來自新世界的收入使之維持到16世紀末。到17世紀，它也只好訴諸拍賣國家的部分職能。

法國和西班牙君主的集權能力，受到兩國既存法治的嚴格限制，他們覺得必須尊重封建權利和臣民的特權。但他們試圖抓住每一次機會，以擴充征稅和征兵的權力，一有可能就想方設法扭曲、違反或規避有關法律。他們鼓勵知識分子傳播專制和主權的教條，以支持自己是法律最終來源的宣稱，但沒有設法廢除或忽略法律。到最后，他們仍受規范化的遏制，無法從事中國皇帝式的隨心所欲，像血腥清洗貴族對手的武則天，或像任意沒收豪族土地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對精英的一步步收買，意味著一再擴展尋租聯合體，先是傳統的貴族精英，再是新動員起來的社會參與者，如城市資產階級。更確切地說，與其聯合起來保護自己階層的利益，這些精英寧愿以政治權力來交換社會地位和部分國家職能——不是議會的代表權，而是國家征稅權的分享。用托克維爾的話說，自由被理解為一種特權，而不是真正的自治。這導致弱的專制主義，一方面，國家權力不受正式憲法的約束，另一方面，它又將自己前途抵押給了自己很難掌控的大批強勢個人。

對法國和西班牙來說，國家的軟弱最終證明是致命的。因為國家建設以精英免稅為基礎，稅收負擔都落到農民和普通商販的頭上。兩個國家都無法征集足夠收入，以滿足統治者的帝國野心。法國競爭不過更小的英國，后者的稅收基礎因議會負責制的原則而獲得保證。西班牙進入持續一世紀的軍事和經濟的衰退。它們的國家都喪失了合法性，因為其組成方式本身就是腐敗的，法國改革的失敗為大革命鋪平道路。

### 強大的專制主義

俄羅斯建立了更接近中國的強大專制主義國家。只要將它的發展與法國或西班牙作一對比，個中原因顯而易見，其間重大差異至少有五項。

第一，俄羅斯的地理——廣闊大草原，只有很少自然障礙來應對基于騎兵的軍隊——使之易受來自西南、東南和西北的入侵，且經常是同時發生的。軍事動員因此而變得非常重要。這還意味著，與對手相比，先發制人的軍閥享有規模上的極大優勢。莫斯科國家的權力基于對服役貴族——相當于士紳——的軍事招聘。它能這樣做，因為它仍是邊界不定的邊境國家。跟奧斯曼帝國西帕希騎士的情形一樣，該階層成員所獲的獎勵就是新土地，這些騎兵變成了國王的直接受養人。（最相似的西歐做法就是西班牙國王，將新大陸的托管權作為服務的報酬贈與征服者，導致了同樣的政治等級制度。）莫斯科公國憑借對韃靼的早期軍事成功而獲得先發制人的優勢，因此享有比其他封地領主更多的合法性。

第二，從卸下韃靼軛到莫斯科投入國家建設，其間只有很短時期。封建主義在西歐扎根八百年，孕育了驕傲的血緣貴族，堅守在散布四野的險固城堡。相比之下，俄羅斯的封地時期僅持續兩個世紀，貴族成員組織松弛，根本無法抵制中央君主的權力，也沒有城堡可住。與西歐相比，他們以及像諾夫哥羅德那樣的獨立城市，較少受到地理上的保護。

第三，俄羅斯沒有可與西歐媲美的法治傳統。指派俄羅斯牧首的拜占庭東正教，本身沒有經歷類似敘任權斗爭的沖突，始終是政教合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拜占庭帝國的法律也沒變成綜合法典，受西方那樣法律專業自治團體的保護。俄羅斯東正教是拜占庭教會的精神繼承人，雖然時有偏離莫斯科統治者的政治獨立，但也從國家贊助那里收獲重大好處。天主教會可在分裂的西歐政治舞臺中合縱連橫，俄羅斯教會沒有選擇，只好去莫斯科，通常成為國家的順從擁護者。沒有獨立的教會權威來監看一套教會法規，這意味著，接受訓練的法律專家沒有屬于自己的機構來培養集團身份。教會官僚擔任早期西歐國家的行政官員，在俄羅斯，管理國家機構的是軍官和家族人選（經常是同一人）。最后，對很多俄羅斯人來說，統治者的榜樣不是依法執政的君主，而是純粹掠奪的蒙古征服者。

第四，地理環境使農奴所有者結成卡特爾成為必需，將貴族和士紳的利益與君主政體的利益緊緊綁在一起。因為沒有地理界限，要維持像農奴制那樣的制度，全靠農奴主在處罰和歸還逃奴上的嚴格自律。沙皇只要支持對農奴實施越來越緊的限制，就可把精英拴在國家這一邊。相比之下，西歐的自由城市是庇護所，逃離領主和莊園經濟的農奴，為追求自由而來投奔城市。在俄羅斯，城市充任功能上的邊境——最終都被封閉。明顯不同于俄羅斯君主和其他東歐統治者，西歐的國王發現，自由城市在反對強勢領主的斗爭中于己有利，因此予以保護。

最后，有些思想在俄羅斯的滲透，達不到在西方國家那樣的程度。首先是法治，再延伸到源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整套思想。丹麥王太后索菲亞·瑪德蓮娜（Sophie Magdalene）在皇家領地上釋放農奴時，曾是伏爾泰朋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卻在對俄羅斯農奴的行動自由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當然，很多啟蒙運動的思想被推行現代化的俄羅斯君主所采用，像彼得大帝。三代之后，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方才解放農奴。與歐洲其他部分相比，現代思想對俄羅斯的影響更為緩慢、更為虛弱。

### 英國的結果為何不像匈牙利？

以這些未能抵抗專制的國家為背景，英國的成果便顯得愈加驚人。英國主要社會群體為保護自己的權利而反對國王，所顯示出的團結勝過任何其他地方。英國議會包括從大貴族到自耕農的全部有產階級的代表。其中兩個群體特別重要，那就是士紳和第三等級。前者的階層沒有被招募進入國家服務，像俄羅斯那樣；后者基本上不愿以政治權利來交換爵位和個人特權，如法國那樣。法國、西班牙、俄羅斯的君主政體，向精英中的個人兜售官爵，從而破壞精英之間的團結。俄羅斯的門第選官法，其目的很像法國和西班牙的賣官鬻爵。英國君主也嘗試像出售公職那樣的手段，但議會仍是凝聚的機構，其原因早已提到——即對地方政府、普通法和宗教的普遍認可。

這還不足以解釋英國議會為何如此強大，以致君主政體被迫接受憲法。匈牙利議會中的貴族也很強大，也組織良好。像在蘭尼米德的英國男爵，較低層次的匈牙利貴族在13世紀強迫君主接受憲法妥協，即金璽詔書，在后續年份中又死死看住國家。[[1]](#m1_28)在馬蒂亞斯·匈雅提于1490年去世后，貴族階層扭轉君主政體在前一代作出的中央集權改革，奪回權力。

但匈牙利貴族階層沒有運用權力來加強整體國家能力。更確切地說，他們以國防能力為代價給自己減稅，保護自己的狹隘特權。相比之下，源自1688—1689年光榮革命的憲政和解，大大加強了英國的國家能力，以至它在未來一世紀中成為歐洲的主要強國。那么，我們要問的是，既然英國議會已經強大到能夠遏制掠奪性的君主，但議會本身為何沒有發展成尋租聯合體，沒有像匈牙利議會一樣作繭自縛。

英國負責制政府沒有退化成貪婪的寡頭政治，至少有兩條原因。首先，英國的社會結構不同于匈牙利。英國議會中的團體是寡頭政治，但與匈牙利相比，他們底下的社會更為流動，向非精英開放的程度更高。在匈牙利，士紳被吸收到狹窄的貴族階層；在英國，他們代表一個龐大且凝聚的社會群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貴族還要強大。不像匈牙利，英國擁有基層政治參與的傳統，體現在百戶法庭、縣法庭和其他地方治理機構。英國領主習慣于出席會議，與自己的屬臣和佃戶平等相處，討論決定涉及共同利益的問題。此外，匈牙利沒有英國那樣的自耕農。自耕農是相對富裕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參與地方上的政治生活。匈牙利城市受到貴族階層的嚴格控制，不能像英國那樣衍生出富庶和強大的資產階級。

其次，盡管英國有個人自由的傳統，但它的中央國家既強大，又在社會上獲得大致的好評。它是發展出統一司法制度的首批國家之一，保護產權，為應付歐洲大陸的各式敵人而建起實質性的海軍。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之后，英國又試驗了共和政府和克倫威爾的護國公體制，結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在議會擁護者的眼中，弒君本身似乎都是不正義的非法行為。英國內戰見證了同樣的愈趨激進，像法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革命后來所經歷的一樣。更為激進的反皇派，像平均派（leveller）和掘地派（digger），所追求的似乎不只是政治負責制，而是更為廣泛的社會革命，從而嚇壞了議會所代表的有產階級。所以，隨著查理二世的登基，君主政體在1660年得以復辟，大家都松了一口氣。[[2]](#m2_28)復辟之后，政治負責制的問題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治下重新泛起，其陰謀詭計招致議會的懷疑和反對，最終引致光榮革命。但這一次，沒人再想廢除君主政體或國家，只想要一位對自己負責的國王，那就是奧蘭治的威廉。

這再次證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到17世紀晚期，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樣的思想家，擺脫了基于階級和等級的封建秩序的概念，轉而贊成國家和公民之間的社會契約。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認為，就激情和彼此施暴的能耐而言，人與人在根本上都是平等的；此外，他們還享有天賦權利。洛克接受這些前提，并抨擊不經被統治者同意也可有合法統治的主張。只要依照同意原則，就可以推翻國王。這些早期自由主義者認為，權利是抽象和普遍的，任何強人不得合法剝奪。但在這些思想傳到匈牙利之前，匈牙利早已向土耳其和奧地利屈服稱臣了。

從上述比較中可得出一個簡單的教訓。政治自由——即社會自我統治的能力——不但要看社會能否動員起來，以對抗中央集權，并將憲法約束強加于國家；還要看國家是否足夠強大，能在必要時采取行動。負責制不是只從國家流向社會的單行道。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團結行動，沒有廣泛接受的共同目標，就無法奠定政治自由的真正基石。明顯不同于馬蒂亞斯·匈雅提死后的匈牙利，1689年之后的英國仍然強大而團結。議會愿意向自身征稅，為18世紀的海外持久爭斗作出犧牲。與沒有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高度制衡的不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功，因為政府需要定期采取堅決果斷的行動。所以，負責制政治制度的穩定，全靠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廣泛均勢。

### 達到丹麥

輝格史觀的問題之一在于，它將英國的經歷當作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興起的范例。然而，歐洲其他國家走上不同路徑，最后抵達與英國相同的目的地。我們開始解說冗長的政治發展史時，曾提出丹麥如何變成今日丹麥的問題——守法、民主、繁榮、執政清廉的政體，其政治腐敗處于世界最低水平——我們需要時間來解釋這個結果。

在1500年，還看不出丹麥（或斯堪的納維亞其他國家）將會不同于中世紀晚期的其他歐洲社會。有些評論家嘗試將今日的丹麥一直追溯到當初定居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3]](#m3_28)除了他們不騎馬，駕長艇遠行，很難想象這一掠奪部落，如何將自己從來自羅馬帝國之后定居歐洲的日耳曼野蠻人中徹底區分出來。

丹麥的君主政體具有很古老的血統，從13世紀起變得相對軟弱。國王被迫簽署憲章，允諾向貴族議會征求咨詢，向教會提供特權。[[4]](#m4_28)像歐洲的其他國家，丹麥的經濟仍以莊園為基礎。丹麥地處波羅的海的進口，鄰近漢薩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國際貿易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5]](#m5_28)卡爾馬聯盟（Kalmar Union）在15世紀中期曾短暫地統一大部分的斯堪的納維亞。聯盟解散后，丹麥仍是相當重要的多民族政權，控制著挪威、冰島、說德語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Schleswig ＆ Holstein），以及現是海灣對面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說有一個事件，促使丹麥和斯堪的納維亞其他地區走上獨特發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跟在歐洲其他地區一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證明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眾對天主教會的長期不滿。在丹麥，短暫內戰導致新教徒的勝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麥國教的建立。[[6]](#m6_28)促成這個結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質因素，丹麥國王視之為攫取教會資產的良機。當時，教會擁有相當多的財富，大約占有丹麥土地的30%。[[7]](#m7_27)

宗教改革在丹麥的持久政治影響是鼓勵農民脫盲。路德教會堅信，普通老百姓要與上帝溝通，需要閱讀圣經，或至少要讀路德教的簡易問答集（Lesser Catechism）。始于16世紀，路德教會在丹麥每一座村莊設立學校，讓教士向農民傳授基本的讀寫技能。結果在18世紀，丹麥農民（還有斯堪的納維亞的其他地區）已成為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日益組織起來的社會階層。[[8]](#m8_27)

當代社會的社會動員通常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也是中世紀英國所走的道路。普通法的產權擴展，促使英國農民的最高層進化成政治上活躍的自耕農。相比之下，在前現代16世紀的丹麥，促進社會動員的是宗教。脫盲允許農民改善經濟條件，還幫助他們互相交流，并作為政治行動者組織起來。到19世紀早期，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的鄉村，彼此之間的懸殊是無法想象的，盡管兩者的地理相近，氣候相似。

跟英國的情形不同，這里的代議民主制并不來自組織良好、足以抵抗中央國家的封建殘余機構（議會）。丹麥在1660年敗于瑞典，遂建立了專制國家，其官僚機構變得愈益精明。[[9]](#m9_27)丹麥議會已被廢除，沒有基于社會等級的政治結構，可供君主前去要求增稅。

從1760年到1792年，丹麥發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開明君主開始逐漸廢除農奴制（Stavnsbånd），先在皇家領地，再擴展到所有地主，并限制地主處罰下人的權利，譬如不能再將農民放在木馬上鞭打。[[10]](#m10_27)農民仍然沒有選舉權，但可以擁有土地，并能在同等的基礎上從商。[[11]](#m11_27)

丹麥君主將農民自由視作遏制貴族地主的良機，遂遭到了地主的頑強抵抗。他又可將獲得自由的農民，直接征募進國家軍隊。思想也很重要。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他認為，自耕農的生產效率將遠遠超過農奴。同樣重要的是農民本身得到越來越多的教育和動員，充分利用自由經濟的機會，投入到盈利較多的增值生意，例如食物加工。

使丹麥現代民主成為可能的第二個重大事件來自外國。到18世紀末，丹麥仍是歐洲中等的多民族政權。在1814年的拿破侖戰爭中失去挪威。19世紀前幾十年，法國大革命思想的傳播促成復雜的政治后果。它刺激了基于階級的兩項需求，一項來自資產階級和農民，跟政治參與有關；另一項來自說德語的少數民族，與國家認可有關。

普魯士解決了第二項需求，通過一場短暫但決定性的戰爭，在1864年兼并了主要說德語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國。只過一個晚上，丹麥就變成基本上講丹麥語的整齊劃一的小國。它知道自己別無他法，只好接受小國寡民的處境。

丹麥的民主出現于19世紀后期，社會民主主義出現于20世紀早期，這就是它們的來龍去脈。教士兼教育家的葛隆維（N. F. S. Grundtvig）所激發的農民政治運動，最初只裝扮成宗教復興運動。它擺脫官方的路德教會，在全國各地大辦學校。[[12]](#m12_27)等到立憲君主政體在1848年當政，農民運動和代表資產階級的自由派開始要求直接的政治參與，并在翌年獲得選舉權。丹麥在20世紀成為福利國家，這已超越本卷的范圍。當它最終來到時，并不完全依靠新興的工人階級，還需要農民階級的幫助。在關鍵時刻，促使農民動員起來的不是經濟增長，而是宗教。

民主和現代市場經濟在丹麥的發展，比在英國經歷了少得多的沖突和狂暴，更不用提相比法國、西班牙和德國了。為了到達現代丹麥，丹麥人確實與鄰國打了好幾仗，包括瑞典和普魯士，也在17世紀和19世紀發生了激烈的國內沖突。但沒有持久的內戰，沒有圈地運動，沒有專制暴政，沒有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赤貧，所留下的階級斗爭遺產非常薄弱。就丹麥的故事而言，思想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指路德教會和葛隆維的意識形態，而且還有18世紀和19世紀一系列丹麥君主所接受的關于權利和憲政的啟蒙思想。

丹麥的民主興起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不能在別處復制。丹麥抵達現代自由民主制的途徑完全不同于英國，但最終都抵達非常相似的目的地。它們都發展了強大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這似乎顯示，“達到丹麥”可有多種途徑。

# 第五部分 邁向政治發展理論

## 第29章 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

政治的生物基礎；政治秩序的進化機制；政治不同于經濟；制度的定義；政治衰敗的來源；國家、法治、負責制的相互關聯；政治發展條件的歷史演變

本卷提供的政治發展史是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和美國革命前夕，直到這時，真正的現代政治方才問世。此后，眾多政治體出現，囊括現代政治制度的三大重要組件：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

至此，有些讀者可能會斷定，我對政治發展的解讀是歷史決定論的。通過介紹各種政治制度復雜且背景獨特的起源，我似乎在主張，類似的制度要在今日出現必須要有類似條件，各國因獨特的歷史背景已被鎖定在各自單一的發展路徑上。

這肯定是誤解。能把優勢帶給社會的制度，總是被他人復制和改進；知識和制度的跨社會交匯，伴隨著歷史的始終。此外，本卷的歷史故事，結束于工業革命前夕，而工業革命本身，又大大改變了政治發展的條件。這兩點，將在最后一章得到詳細描述。本書的第2卷，將描述和分析后馬爾薩斯世界（post-Malthusian world）的政治發展。

人類社會對制度持強烈的保守態度，不會每過一代就把臺面上的賭注一掃而光。新制度往往重疊在既有制度上面，例如分支世系制，它是社會組織最古老的形式，卻依然存在于現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如不弄清這一遺產和它對今日政治行動者選擇的限制，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

此外，厘清制度初建時的復雜可幫助我們看到，它們的轉變和模仿，即使在現代情形下，也是異常艱難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往往出于非政治原因（經濟學家稱之為政治制度的外部因素），我們已看到若干案例。其中之一是私人財產，它的出現不僅為了經濟，還因為宗族需要土地埋葬祖先以平息死者靈魂。同樣，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歷史上全靠法律的宗教起源。國家在中國和歐洲出現，根源就是當代國際體系所竭力阻止的無休止戰爭。沒有這些外部因素，仍想重建這些制度，往往舉步維艱。

我將總結本卷中有關政治制度發展的主題，并從中提煉出政治發展和衰敗的理論大綱。這可能算不上真正的預測性理論，因為最終結果往往取決于互有關聯的眾多因素。此外還有龜的問題，即選來充當原因的龜，結果又要以底下的龜為基礎。我以自然狀態和人類生物學為本卷的開頭，因為它是明顯的起點，可算作底層的龜（Grund-Schildkröte），可以背馱后續的龜群。

### 政治的生物基礎

人類在社會中組織自己行為時，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他們共享一種生物本性。考慮到非洲之外的多數當代人，都可認祖歸宗到大約五萬年前的小群體，這種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統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決定政治行為，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質。這表示，人類政治取決于人類重復的行為模式，既橫跨文化又縱越時間。共享的本性將在下述論點中獲得說明：

人類從未在無社會狀態中生存。據稱，人類曾是隔離的，要么在無政府暴力中與他人互動（霍布斯），要么在和平中對他人一無所知（盧梭），但這卻是錯的。人類及其靈長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親戚關系的大小社會群體中。生活得如此長久，以至社會合作所需要的認知和情感，都已進化成人類的天性。這表明，有關集體行動的理性選擇，即他們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類社會既存的合作，也誤讀了其中的動機。[[1]](#m1_29)

人類天生的社會交往建立在兩個原則之上：親戚選擇和互惠利他。親戚選擇原則，又稱包容適存性原則，是指人類會大致根據共享的基因比例，對跟自己有遺傳關系的親屬（或被認為有遺傳關系的個體）做出利他行為。互惠利他原則是指，隨著與其他個體的長時間互動，人類會發展出共同的利害關系。跟親戚選擇不同，互惠利他不依賴遺傳關系，而是依賴重復、直接的人際互動，以及從這類互動中產生的信任關系。在缺乏其他更為非人格化制度激勵的情況下，這些形式的社會合作是人類互動的預設模式。一旦非人格化制度出現衰敗，這兩種合作又會重現，因為這是人類的本性。我所謂的家族化，就是指基于這兩項原則的政治用人。所以，當中國漢朝末年皇親國戚充塞朝廷，當土耳其禁衛軍讓自己的兒子入伍接班，當法蘭西王國賣官鬻爵制造世襲產業，只不過是自然的家族制原則復辟了。

人類天生喜歡制定和遵循規范或規則。從根本上說，制度就是限制個人選擇的規則，由此類推，可以說人類天生喜歡建立制度。人們核算如何可獲最大私利，從而制定理性規則，與他人一起履行社會契約。人類天生具有認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徒困境”類的合作問題。他們記住過去行為以作未來合作的指南；他們通過閑聊和其他分享，傳播和獲悉他人的可信度；他們有敏銳的知覺，通過察言觀色以偵測謊言和不可信賴的行為；他們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語言的，還是非語言的。在某種意義上，制定和遵循規則是在走捷徑，可大大減少社交成本，允許高效率的集體行動。

人類遵循規則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像罪過、可恥、驕傲、憤怒、困窘和贊美，都不是學來的，都不是洛克所謂的出生后、與外界互動時獲得的。它們在小孩身上表現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這基于遺傳但寓于文化的規則來組織自己的行為。我們制定和遵循規則的能力很像我們的語言能力：規則的內容是傳統的，因社會而異；但規則的“內在結構”和我們的接受能力卻是天生的。

人類傾向于將內在價值注入規則，這有助于說明社會的保守和頑固。規則的產生是為了因應特殊情形；之后，情形本身有了變化；久而久之，規則變得過時，甚至嚴重失調，但社會仍然拽住不放。歐洲人示范了槍械的卓有成效，但馬穆魯克仍予以拒絕，因為他們已向騎士征戰注入了特殊情感，這直接導致了他們慘敗于應時而變的奧斯曼帝國。因此，各社會都有竭力保留現存制度的普遍傾向。

人類天生具有暴力傾向。從存在的第一瞬間，人類就對其同類行使暴力，就像他們的靈長目祖先。盡管我敬仰盧梭，但暴力傾向不是人類在歷史某時某刻學來的。同時，社會制度的存在就是為了控制和轉移暴力。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調控暴力出現的層面。

人類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質，還有承認。承認是指對他人尊嚴或價值的承認，又可稱作地位。追求承認或地位的奮斗，往往不同于為物質的奮斗；地位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即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所稱的“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2]](#m2_29)換言之，只有他人都處于低級地位時，你才算擁有了高級地位。像自由貿易的合作游戲是正和，允許大家都贏；然而，追求承認或地位的斗爭卻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對方的損失。

人類政治活動的大部分都以尋求承認為中心。不管是尋求天命的中國未來君主，打黃巾或赤眉旗號的卑微農民，還是法國紅便帽起義軍，他們都在追求承認。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糾紛，征服北非和中東的大部，這是在為伊斯蘭教尋求承認。歐洲戰士征服新大陸，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幟。近代民主政體的興起，如避而不談其內核的平等承認，也是無法理解的。在英國，追求承認的性質循序漸進，從部落或村莊的權利，到英國人民的權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賦人權。

抵制人類只追求物質利益的講法是很重要的。人類歷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尋求財富，而在追求承認。沖突的長期持續，遠遠超過其經濟意義。承認有時與財富有關，有時又以財富為犧牲品；如把承認視作另類的“功用”（utility），那就偏于簡單，于事無補了。

### 思想作為原因

在解釋社會差異和獨特發展路徑時，如不把思想當作原因，便無法打造政治發展的理論。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中，思想是獨立的變數；在龜的術語中，思想處在龜群的下層，它的底下絕對沒有經濟或自然環境的龜。

所有的社會都制造現實的心智模型。這些心智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時常是無形的——尋找因果關系，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預言、更容易操縱。在早期社會，這些無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自然，時至今日則演變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輻射、經濟自利、社會階級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現實的心智模型，都把觀察到的現象歸因于無法或很難觀察的力量。至少從大衛·休謨起，我們懂得，單靠實證資料是無法核實因果關系的。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我們改用新的因果理論以控制實驗或統計分析，至少可以證偽。有了測試因果的更好辦法，人類得以更有效地操縱環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來增加糧食產量，而不是犧牲者的血液。每個已知的人類社會都制造現實的心智模型。這表明，這種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學的。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進大規模集體行動方面是至關重要的。建立在理性自利上的集體行動，解釋不了世界上客觀存在的社會合作和利他主義。[[3]](#m3_29)宗教信仰激發人們所做的事，只對財富感興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伊斯蘭教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會增進合作，因為有共同目標，還有應付類似難題的協調。[[4]](#m4_29)

很多人看到當代世界的宗教沖突，從而反對宗教，認為它們是暴力和心胸狹隘的來源。[[5]](#m5_29)這在重疊宗教和多樣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萬確的，但他們忽視了宗教的歷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許超越親友的合作，成為社會關系的來源。此外，世俗的意識形態，如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已在很多當代社會取代宗教信仰，呈現出不相上下的破壞能量，也能激發強烈的信念。

心智模型和規則緊密相連，因為它往往明確指出社會必須遵循的規則。宗教不只是理論，而且是道德規范的處方，要求追隨者嚴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頒布的教規，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為了它的固有價值，不是為了它的準確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確認，也很難證偽。所有這一切加深了人類社會的保守性。現實的心智模型一經采納就很難變更，即使出現不利的新證據。

幾乎所有已知的人類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宗教信仰。這表明，宗教很可能植根于人的天性。就像語言和遵循規則，宗教信仰的內容是傳統的，因社會而異，但建立宗教原則的能力卻是先天的。[[6]](#m6_29)我的敘述與宗教的政治影響有關，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與否為前提。即使宗教是后學的，它對政治行為仍施加巨大影響。

像馬克思和涂爾干那樣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聯合群體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區整體，或是階級整體），從而相信宗教是故意為此打造的。如我們所見，宗教思想與政治經濟一起發展，從薩滿教（shamanism）和巫術，到祖先崇拜，再到擁有成熟原則的多神論和一神論宗教。[[7]](#m7_28)宗教信仰與信徒團體的生存條件，必須發生明顯的關聯。自殺教派，或禁止其成員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會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產生一種傾向，以物質條件來解說宗教，并視宗教為它的產物。

然而，這是一個大錯。既存的物質條件永遠解釋不了宗教。最明顯的案例是中國和印度的對照。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終止時，兩個社會的社會結構非常相似，都有父系血統的家族和由此產生的政治模式。之后，印度社會轉入彎路，唯一的解釋是婆羅門宗教的興起。該教形而上學的主張是非常復雜的，但要把它與當時印度北部的經濟和環境條件掛起鉤來，卻是徒勞無益的。

我描繪的眾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結果方面扮演了獨立角色。例如，在歐洲兩個重要制度的形成中，天主教會曾發揮主要作用。6世紀以來，日耳曼野蠻部落逐漸征服羅馬帝國；但在顛覆日耳曼的親戚團體產權結構上，天主教會是關鍵，更削弱了部落制本身。歐洲由此走出基于親戚關系的社會組織，用的是社會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與中國、印度和中東截然不同。在11世紀，天主教會宣告獨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轄，并將自己組織成現代的等級制度，推動全歐洲的法治。相似的獨立宗教機構，也存在于在印度、中東和拜占庭帝國，但在促使獨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會。沒有敘任權斗爭及其后果，法治絕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沒有案例顯示，宗教價值是超越物質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羅門和穆斯林社會的烏里瑪，天主教會也是擁有物質利益的社會團體。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頒布的遺產新法，似乎不是為了教義，而是為了私利；它鼓勵把土地轉讓給教會，而不必留給親戚團體。盡管如此，教會不只是簡單的政治參與者，像當時支配歐洲的各式軍閥。它無法將資源轉換成軍事力量，沒有世俗政府的幫助，也無法從事掠奪。另一方面，它卻可將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參與者。這件事，后者光憑自己是做不到的。經濟學家有時談起政治參與者如何“投資”于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產工具，像土地或機器。[[8]](#m8_28)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語境，即人們對上帝、正義、人生、社會、財富、美德等的觀念。

人類價值和意識形態的最重要變化之一——平等的承認——發生于本卷所涵蓋時期的結尾，可以說正是這一觀念定義了現代世界。人類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學者如黑格爾、托克維爾和尼采，把現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經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說法。然而，享有同等尊嚴的人類小圓圈，其擴張速度是非常緩慢的，要到17世紀之后，才開始包括社會較低階層、女性、種族、宗教等少數人群體等。

從族團和部落層次的社會邁入國家層次的社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人類自由的一大挫折。與基于親戚關系的前任相比，國家更為富饒，更為強大。但這財富和力量，卻鑄造了懸殊的等級差別，有的變成主人，更多的變成奴隸。黑格爾會說，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中，統治者獲得的承認是有缺陷的，最終連自己也不滿意，因為它來自缺乏尊嚴的人。現代民主的興起為所有人提供自決機會，以承認相互的尊嚴和權利為基礎。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復雜的社會里，恢復當初邁入國家時所失去的。

負責制政府出現，與相關思想的傳播是分不開的。我們在英國議會的案例中看到，對英國人民權利的信仰是議會團結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賦人權塑造了光榮革命。這些思想進而推動美國革命。我在此書呈現的負責制興起的歷史原因，似乎植根于政治參與者的物質利益，但我們必須同時考慮，確定政治參與者和集體行動范圍的相關思想。

### 政治發展的普遍機制

政治制度的進化，大致可與生物進化媲美。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兩項簡單的原則為基石：變異和選擇。有機體的變異，源于基因的隨意組合；能更好適應環境的變種，則獲得較大的繁殖成功，適應力較差的就要付出代價。

以長遠的歷史觀點看，政治發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類群體所使用的政治組織發生了變異，較為成功的——能發展較強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得以取代較不成功的。在高層次的抽象中，很難想象政治發展還有他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進化與生物進化的差異，其至少有三條。

首先，在政治進化中，選擇對象是體現在制度身上的規則，而生物進化中的選擇對象是基因。盡管人的天性促進規則的制訂和遵循，但不能決定其內容，所以會有內容上的極大差別。制度以規則為基礎，將優勢授予其生存的社會；在人類代理人的互動中，獲選的是優勢制度，淘汰的是劣勢制度。

其次，在人類社會中，制度的變異可按計劃，可作商討，不像基因變異那樣隨意。哈耶克強烈駁斥人類社會自覺設計制度的想法，將之追溯到后笛卡爾（post-Cartesian）的理性主義。[[9]](#m9_28)他認為，社會中多數信息其實是本地的，無法獲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10]](#m10_28)哈耶克論點的缺陷是，人類一直在社會各層次成功地設計制度。他不喜歡自上而下、集中的國家社會工程，但愿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制度革新，盡管后者仍是人為設計的。大規模設計的成功頻率，可能低于小規模的，但確有發生。人類很難將意外結果和信息殘缺納入計劃，但能作計劃的事實表明，自覺建立的制度之變異，比簡單的隨機而變更有可能適應解決問題。不過，哈耶克仍是正確的，制度進化并不取決于人們設計制度的能力，單是變異和選擇，便可取得適時應務的進化結果。[[11]](#m11_28)

最后，被選擇的特征——政治進化中是制度，生物進化中是基因——借文化而獲得傳遞，不靠遺傳。就適應性而言，這既是優勢，又是劣勢。文化特征，如規范、習慣、法律、信念或價值，至少在理論上，可在一代人的時間獲得迅速修改，如7世紀的伊斯蘭教，或16世紀丹麥農民的掃盲。另一方面，人們偏愛將內在價值注入心智模型和由此建立的制度，導致制度的經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機體不會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幫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選擇原則便會無情將之去掉。所以，制度進化既可快于也可慢于生物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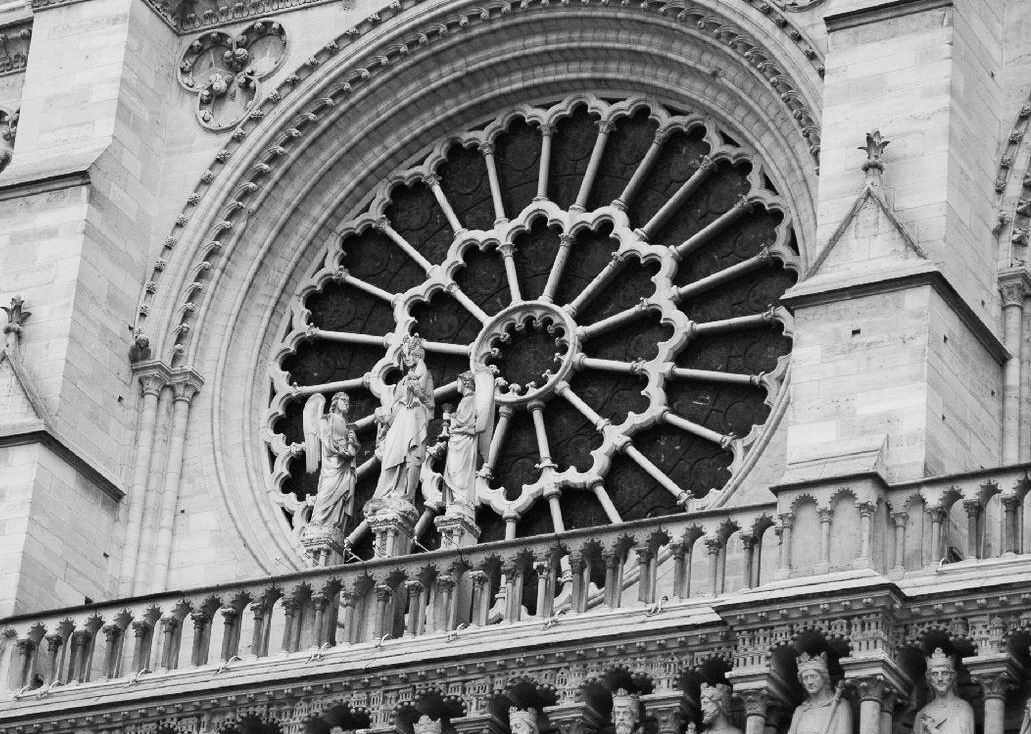
與生物進化不同，制度可通過模仿而獲得擴散。衰弱制度的社會，被強大制度的社會打敗了，或干脆消滅了，但也有采納“防御性現代化”的[[12]](#m12_28)，從而引進競爭者的制度。17—19世紀的日本德川幕府時期，治國的封建君主們從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處，很早就獲悉火器的存在。但他們正處于長期的軍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進火器，因為不想放棄傳統的冷兵器戰爭形式。當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Matthew Perry）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東京灣露臉時，執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為第二個中國，他們必須終止這種舒適的自我管制來取得美國人所擁有的軍事技術。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引進的不只是軍火，還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體制、新教育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均借鑒于歐洲和美國。

生物進化既是特別的，又是普遍的。特別進化是指物種適應了特殊環境，并作調整，如著名的達爾文雀（Finches）。普遍進化是指成功的物種跨越本地環境，而向外擴散。所以有大規模的普遍進化，從單細胞到多細胞的有機體，從無性繁殖到有性繁殖，從恐龍到哺乳動物等。政治發展也是如此。行為意義上的現代人類，大約在五萬年前離開非洲，遷移到世界各地。他們努力適應遇上的不同環境，開發了不同的語言、文化和制度。同時，某些社會湊巧碰上能提供優勢的社會組織。于是，也發生了普遍進化，從族團層次，轉到部落層次，再轉到國家層次的社會。國家層次社會中，組織較為完善的又擊敗或吸收組織較差的，使自己的社會組織獲得傳播和擴散。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既有分流，也有匯集。

跟生物進化一樣，競爭對政治發展至關重要。如沒有競爭，就不會有對制度的選擇壓力，也不會有對制度革新、借鑒、改革的激勵。導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競爭之一是暴力和戰爭。經濟生產力的增長，使族團層次向部落層次的過渡得以實現，但直接動機則來自部落社會動員人力的優勢。第5章中，我討論了國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論，包括經濟自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權威、暴力。雖然，所有因素都發揮了作用；但從自由的部落社會到專制的國家社會，此項艱難的過渡，更像是由保全生命而不是經濟利益的需要促成的。瀏覽諸如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等地國家形成的歷史記錄，我們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勵國家形成，還鼓勵與現代國家相關的特別制度的建立。本章后面還會講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種問題，除了暴力，沒有其他方法。

### 處處是拱肩

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n Gould）和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筑學上的拱肩（spandrel）來解釋生物變異中的不可預知。[[13]](#m13_27)拱肩是支撐圓屋頂的拱門背線與相鄰直角形成的弧形區域。它不是建筑師故意設計的，而是其他精心計劃的零件組裝后留下的副產品。盡管如此，拱肩開始獲得裝飾，并隨時間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爾德和列萬廷主張，有機體身上為某個原因而進化的生物特征，到后來，卻能為完全不同的原因，提供適應的優勢。



拱肩（左上角）

我們在政治進化中看到不少類似拱肩的東西。公司——一個有著與其組成人員清晰可分的身份并可以永久存在的機構——最初是作為宗教組織出現的，沒有任何商業目的。[[14]](#m14_27)天主教會支持女子的繼承權，不是想增加女子權利——這在7世紀是不合時宜的——而是看上了強大家族手中的珍貴地產，認為這是很好的途徑。如果說，教會領袖當時就預見，這將影響親戚關系的整體，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敘任權斗爭的人，腦海中并沒有浮現以獨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當時，那只是一場道德和政治的斗爭，為了爭取天主教會的獨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組織贏得的獨立自主，經過長期進化，變成了司法部門的獨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礎被世俗來源所取代，但它的結構仍保持原樣。所以說，法治本身就是一種拱肩。

實際上，不同制度的歷史根源，往往是一長列歷史意外事件的產品，沒人能夠預測。這看起來令人泄氣，因為當代社會無法經歷同樣事件來獲得類似制度。但這忽略了政治發展中拱肩的作用，與制度的歷史來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為重要。一旦發現，其他社會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來模仿和采納。

### 制度（機構）[[15]](#m15_26)

在本卷中，我一直使用亨廷頓對制度的定義，即“穩定、有價值、重復的行為模式”。[[16]](#m16_26)至于被稱作國家的那個制度或機構（the institution called the state），我不僅使用韋伯的定義（在界定的領土上合法行使壟斷暴力的組織），還使用他對現代國家的標準（按專門技術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對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權威）。非人格化的現代國家，不管是建立還是維持，都很困難。家族化——基于親戚關系和互惠利他的政治用人——是社會關系的自然形式，如果沒有其他的規范和鼓勵，人類就會回歸。

現代組織還有其他特征。亨廷頓列出四條標準來測量國家制度（機構）的發展程度：適應和僵硬，復雜和簡單，自主和從屬，凝聚和松散。[[17]](#m17_25)這是指越善于適應、越復雜、越能自主和越凝聚的機構，其發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適應的組織，可評估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再修改其內部程序來應對。環境總在變化，所以善于適應的機構活得長久。英國的普通法系統，其法官因應新情形，不斷在重新解釋和延伸有關法律，就是善于適應的樣板。

成熟的機構更為復雜，因為它們有更大的分工和專業化。在酋邦或初期國家中，統治者可能同時又是軍事長官、總教士、稅務員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發達的國家中，這些功能由各自為政的組織承擔，它們負有特別使命，需要高度的技術能力。漢朝時期，中國已在中央、郡、地方層次派駐無數官僚機構和部門；雖然比不上現代政府，但與猶如君主家庭簡單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卻是一大進步。

自主和凝聚是機構標準的最后兩條，如亨廷頓指出的，它們密切相關。自主是指機構開發自覺的集團身份，不受社會其他力量的影響。在第17至19章討論法治時，我們看到，法律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這里的自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權訓練、雇用、晉升、懲罰律師和法官。[[18]](#m18_24)自主與專業化也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它適宜被看作比較成熟的機構的特征。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掌控自身內部升遷的軍隊，比將軍是政治任命的軍隊，或將軍是金錢買來的軍隊，更具戰斗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系統中，不同組織的職責和使命都有明確的界定并被遵從。松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組織參與政府行為，如征稅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誰在負責。眾多自治機構組成的國家部門，比眾多從屬機構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會中，領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員，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疊或曖昧的權力，或干脆為特殊個人設立特殊官位。忠誠比公共管理能力更為重要，這種情況迄今仍存在于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少數發達國家）。國家部門中的官方權力分工，與權力的實際分配不符，導致機構的松散。

制度（機構）的四條標準隱含一個概念，即制度是規則，或是重復的行為模式，比任何掌管機構的個人，都要活得長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麥地那部落團結起來，但他沒有為阿哈里發的繼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輕的宗教勉強活過第二代的權力斗爭，在很多方面仍在為當初的缺陷付出代價，那就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后來的成功政權，全都依靠制度的創建，像奧斯曼帝國的征募制，招募奴隸軍，不依賴個人權力。在中國，皇帝實際上變成屬下官僚和繁復規則的囚犯。領袖可塑造機構，而高度發達的機構，不僅比拙劣的領袖活得更長，更有訓練和招募優秀領袖的制度。

### 政治衰敗

制度之間的競爭促使政治發展，這是一個動態過程。與此對應的，還有一個政治衰敗過程；彼時，社會的制度化越來越弱。政治衰敗可在兩種形式中發生。制度的建立最初是為了迎接特殊環境的挑戰。那環境可以是物質的，如土地、資源、氣候和地理，也可以是社會的，如對手、敵人、競爭者和同盟者等。制度一旦形成，傾向于長久存在。如上所述，人類天生偏愛將內在價值注入規則和心智模型。如果沒有社會規范、禮儀和其他情感投資，制度便不成其為制度——穩定、富有價值、重復的行為模式。制度長存帶有明顯的適應價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規則和行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斷舉行談判，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損失。另一方面，就制度而言，社會是極端保守的；這意味著，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條件發生變化時，制度卻做不到隨機應變。制度與外部環境在變化頻率上的脫節，就是政治衰敗，就是反制度化。

社會對現存制度的歷代投資，導致雙重失誤：不僅沒能調整過時的制度，甚至察覺不到已出毛病。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認知失調”，歷史上有無數這樣的案例。[[19]](#m19_23)某社會因優秀制度而變得更富裕，或在軍事上更強大，其他競爭力較弱社會的成員，如想繼續生存，就必須正確地把上述優勢歸因于根本性的制度。然而，社會的結果總有多種原因，總能為社會弱點或失敗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辯。從羅馬到中國，眾多社會把軍事挫折歸咎于對宗教的不誠，寧可獻上更多的禮儀和犧牲，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軍隊。近代社會里，很容易把社會失敗歸咎于外國陰謀，不管是猶太人的，還是美帝國主義的，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尋找原因。

政治衰敗的第二種形式是家族制復辟。眷顧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會交往，也是人類互動的預設。人類最普遍的政治互動，發生在保護人和依附者之間，領袖以恩惠換取追隨者的支持。在政治發展的某些階段，這種政治組織曾是唯一的形式。但是，隨著制度的演化，產生了新的規則，用人標準慢慢改為功能或才干——中國的科舉制度、土耳其的征募制、天主教的教士獨身制、禁止裙帶關系的現代立法。但家族制復辟的壓力始終存在。最初以非人格化原因聘入機構的人，仍試圖將職位傳給自己的孩子或朋友。制度遭受壓力時，領袖經常發現自己必須做出讓步以保證政治優勢，或滿足財政需求。

這兩種政治衰敗，我們可看到很多例子。17世紀前期，組織良好的滿人在北方虎視眈眈，中國的明朝面對與日俱增的軍事壓力。政權的生存，取決于朝廷能否整頓資源，重建精兵，北上御疆。結果一無所成，因為政府不愿或不能增稅。此時，政權與不愿承擔更高稅賦的精英，處于某種大家都覺滿意的共存關系；疏于朝政的皇帝發現，比較容易的對策是讓睡著的狗繼續睡下去。

家族制復辟是一種循環現象。中國西漢時期建立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度，逐漸受到貴族家族的侵蝕；他們試圖為自己和后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權；這些家庭在后來的隋唐兩朝仍得以支配中國的官僚機構。埃及的馬穆魯克和土耳其禁衛軍先要求成家，再要求自己的孩子進入軍事機構，從而破壞了非人格化的奴隸軍制度。馬穆魯克一例是對13世紀晚期局勢的回應，當時蒙古威脅逐漸減退，鼠疫頻仍，貿易條件惡化。奧斯曼一例的起因是通貨膨脹和預算壓力，導致塞利姆一世和蘇萊曼一世向土耳其禁衛軍做出類似讓步。天主教會禁止教士和主教成家以建立現代官僚制度，久而久之也發生故障；神職人員尋求圣職與圣俸的合一，使之成為世襲產業。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出現公開的賣官鬻爵，政府部門私有化，再由后裔繼承。

這兩種政治衰敗——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復辟——經常同時發生。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會極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徹底崩潰，往往又是他們，憑借其蔭庇關系網絡出來收拾殘局。

### 暴力和功能失調的均衡

我們除了指出制度長存的自然傾向，還可精確解釋制度在適應環境時的姍姍來遲。任何一個制度或制度系統，即便在整體上提供諸如內部和平和產權等的公共服務，也一定會惠顧社會上某些群體，并以其他群體為代價。受惠顧的群體，可能在人身和財產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權力而收取租金，可能獲得特別的承認和社會地位。這些精英組織在現存制度安排中享有既得利益，會盡力保護現狀，除非自我分裂。使全社會獲益的制度性變化，如征集土地稅以應付外來威脅，仍會遭到組織良好的群體的否決，因為對他們而言，凈得仍然是負數。

經濟學家很熟悉此種集體行動的失敗。博弈理論家稱之為穩定的均衡（stable equilibrium），因為沒有一名參與者能從現存制度安排的變更中得到個人的好處。但從全社會的角度看，這個均衡是失調的。曼瑟爾·奧爾森認為，任何社會的既得利益群體，經過長年的累積，為保護其狹隘的特權，會組成尋租聯合體（rent-seeking coalition）。[[20]](#m20_22)他們的組織能力遠勝過人民大眾，所以后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調的政治均衡可借民主而獲緩和。民主允許非精英，至少在理論上，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組織能力有云泥之別，從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果斷行動。

尋租聯合體阻止必要的制度變革，從而激發政治衰敗；這樣的例子不計其數。其經典案例就是法蘭西王國，也是租金一詞的發源地。其時，法蘭西君主在兩個世紀中，招誘大部分精英，而逐漸強大。招誘的形式是出賣國家功能的一小部分，之后變成世襲產業。像莫普和杜爾哥這樣的改革部長，力圖廢除賣官鬻爵，卻遭到既得利益者強有力的阻撓。賣官問題的解決，最終只有通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力。

功能失調的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出現在人類歷史上。考古證據顯示，族團層次社會早已掌握農業技術，但持續幾代仍堅持狩獵采集。個中原因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族團層次社會中，分享食物相當普遍，一旦出現農業和私人財產，就難以為繼。定居下來的第一戶，其生產的糧食必須與族團其他成員分享，反過來摧毀了轉向農業的獎勵。農業的生產效率，高于狩獵采集。所以，改變生產方式將使全社會更加豐裕，但會剝奪部分成員的免費享用。考古學家斯蒂芬·勒布朗認為，部分狩獵采集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轉變之所以緩慢，就是因為無法解決此類合作問題。[[21]](#m21_22)

所以，社會能否實施制度變革，取決于能否分化手握否決權的既得利益群體。有時，經濟變化削弱現存精英，加強贊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紀的英國，與商業或制造業相比，地產的回報逐漸降低，從而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獲益，吃虧的是舊貴族。有時，新興的社會參與者因新宗教的涌現而贏得權力，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宗教改革后，由于掃盲和圣經的廣泛傳播，斯堪的納維亞的農民不再是毫無生氣的一盤散沙。還有的時候，促成變化的是領袖意志和凝聚各無權群體的能力，像敘任權斗爭中格里高利七世所組織的教皇派。實際上，這就是政治的精髓：領袖們能否借助權威、合法性、恐嚇、談判、魅力、思想和組織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功能失調的均衡可持續很久，由此說明，暴力為何在制度革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經典的看法認為，政治就是為了解決暴力問題。[[22]](#m22_22)但有時，要把阻擋制度變革的既得利益者趕走，唯一辦法卻是暴力。人類對暴斃的害怕強于獲利的欲望，由此激發在行為上的深遠變化。我們已在第5章提到，很難同意經濟動機（如實施大型水利工程）是國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無休止的戰爭，或害怕較強群體前來征服，促使自由驕傲的部落成員走進集權國家，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釋。

中國歷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現代國家制度形成的障礙，無論是在秦朝興起時，還是在隋唐時的復辟期。秦朝方興的戰國時期，貴族帶頭的無休止戰爭，摧毀了自己階層，為非精英軍人進入政權打開大門。女皇帝武則天崛起于唐朝早期，清洗傳統貴族家庭，促使較為廣泛的精英階層涌現。兩次世界大戰為1945年后走向民主化的德國提供了類似的幫助。它們清除容克貴族階層（Junker），制度變革遂再無阻擋。

尚不清楚，民主社會能否和平地解決此類難題。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少數美國人試圖竭力保留他們的“特有制度”——奴隸制。只要在美國的西部擴張中，沒有足夠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決權，當時的憲法規則就允許奴隸制的存在。最終，沖突無法在憲政框架內得到解決，戰爭遂成為必須的選擇，六十多萬美國人因此而喪生。

現代世界的規范和制度，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決政治僵局的大門緊緊關上。沒人期望或希望，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國家為建立強大鞏固的國家，也經歷如中國和歐洲所體驗的數世紀坎坷。這意味著，制度革新的責任將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機制上。不然，社會仍將遇上政治衰敗。

幸運的是，國家、法治、負責制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得以鍛造成功的舊世界，十分不同于當代世界。美國和法國革命以來的兩個多世紀，世界經歷了工業革命和大幅提高社會交往的技術革新。如今，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大組件在發展中的互動，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怎樣的互動呢？那是本卷最后一章的主題。

## 第30章 政治發展的過去和現在

自18世紀以來，政治發展的條件發生劇烈變化；發展中的政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及其在馬爾薩斯式世界中的互動；在今天的互動；當代世界的期望

亨廷頓在1968年發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他的中心見解是，政治發展有其獨特邏輯，與經濟和社會的邏輯既有關聯又有差異。他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一旦超越政治發展，政治衰敗就會發生，因為現存政治制度無法容納動員起來的新興社會群體。他還認為，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遭遇此起彼伏的政變、革命、內戰，原因就在這里。

有人認為，政治發展遵循自己的邏輯，未必是整體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看待這個觀點要以經典現代化理論為背景。該理論來自19世紀的思想家，如馬克思、涂爾干、滕尼斯和韋伯。他們試圖分析歐洲社會的工業化所引起的巨變。盡管彼此之間有很大差異，他們都傾向于主張，現代化是個整體，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隨之而生的大規模分工、強大的集權官僚國家、親密的村莊群體變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體、公共的社會關系變為個人的社會關系。所有這一切，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匯聚。該宣言宣稱，“資產階級的興起”改變了一切，包括勞動條件、全球競爭、最為私密的家庭關系。根據經典現代化理論，這些變化始于16世紀早期的宗教改革，在之后三個世紀得到迅猛的展開和傳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現代化理論家移軍美國，搶占地盤，像哈佛大學的比較政治系、麻省理工的國際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比較政治委員會。哈佛大學的比較政治系，由韋伯心愛的學生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領軍，希望建立跨學科的社會綜合科學，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冶于一爐。[[1]](#m1_30)現代化理論家將強烈的規范化價值注入現代化本身，在他們眼中，現代化的好處總會一同到來。經濟發展，親戚團體瓦解，個人主義興起，更高更包容的教育，價值觀以“成就”和理性為方向發生規范性轉變，世俗化，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這一切被視為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經濟發展將提供更好教育，導致價值觀的改變，依次再促進現代政治，等等，從而取得無止境的良性循環。[[2]](#m2_30)

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摧毀現代化理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強調，現代性的好處不一定相得益彰。尤其是民主，對政治穩定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亨廷頓講的政治秩序，相當于我在本書中所論的國家建設。他的發展策略，被稱作“威權式過渡”（authoritarian transition），主張政治秩序優先于民主，該書因此而變得名聞遐邇。[[3]](#m3_30)這也是土耳其、韓國、中國臺灣、印尼所走的道路：先在威權統治下實現經濟現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開放民主競爭。

本卷呈現的歷史材料確證了亨廷頓的基本見解，即發展中的各方面應分開對待。如我們所見的，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創造了韋伯式的現代國家，但沒有法治或民主，更不用說個人的社會關系或現代資本主義了。

此外，歐洲的發展又與馬克思和韋伯的描述大相徑庭。歐洲現代化的萌芽遠早于宗教改革。我們曾在第16章看到，隨著日耳曼野蠻人皈依基督教，脫離基于親戚關系的社會組織，在中世紀黑暗時代便已開始。到13世紀的英國，自由買賣財產的個人權利，包括女性的財產權，已屬根深蒂固。天主教會11世紀晚期與皇帝的爭斗是現代法律秩序的根源。它建立歐洲第一個官僚化組織，以管理教會的內部事務。它一直被當作現代化的障礙而橫遭詆毀。但從長遠看，在推動現代化的關鍵問題上，它至少像宗教改革一樣重要。

所以，歐洲走向現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飛猛進，而是幾乎歷時一千五百年的點滴改良。在這特有的次序中，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可早于資本主義，法治可早于現代國家的形成，封建主義作為地方抵抗中央的頑固堡壘，可成為現代民主的基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封建主義是資產階級上升之前的發展階段。但在事實上，它主要是歐洲的獨特制度。不能把它說成是經濟發展的普遍過程，也不能期望非西方社會遵循相似的發展次序。

然后，我們需要分別對待發展中的政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弄清它們作為分立的現象，又是如何相互關聯、如何周期性互動的。我們必須弄清此事，因為它們現在的相互關系的性質，與在馬爾薩斯式世界的歷史條件之下，已然十分不同。

### 托馬斯·馬爾薩斯

約在1800年后，隨著工業革命的出現，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那之前，生產力因技術革新而持續增長、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的美事是靠不住的。事實上，它幾乎不存在。

但這并不表示，1800年之前沒有發生過生產力的大幅增長。農業、灌溉、鐵犁、印刷機、遠航帆船，都提高了人均產值。[[4]](#m4_30)例如，公元前第三個千年和第二個千年之間，墨西哥特奧蒂瓦坎（Teotihuacán）的農業生產力因引進玉米新品種而增長兩倍。[[5]](#m5_30)那時所缺乏的是年復一年的生產力和人均產值的穩定增長。我們今天假設，電腦和互聯網在五年后將獲得巨大改進，這很可能是正確的。而中國西漢的農業技術，即基督誕生后不久，與19世紀淪為半殖民地之前的清朝的相比，則相差無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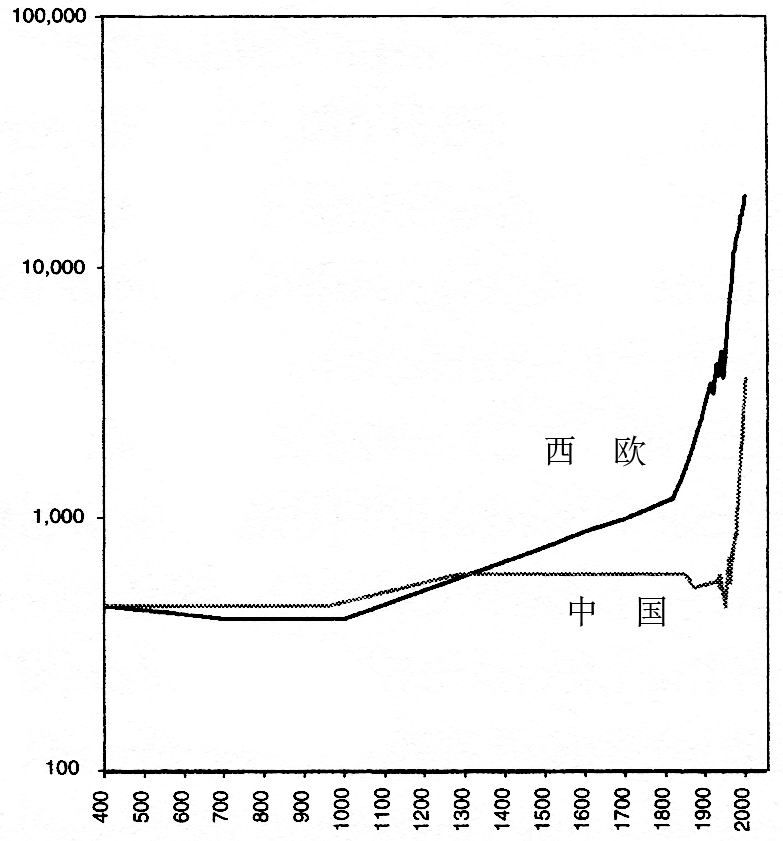


圖7. 人均GDP水平比較：中國與西歐，400—2001年（單位是1990年國際元）來源：麥迪遜（Maddison）（1998，2001，2003a）

圖7是西歐和中國在公元400年至2001年之間的人均產值估計。它顯示，從公元1000年到1800年，西歐的人均收入在八百年期間逐步上升，之后卻突飛猛進。同期的中國人均收入，幾乎是停滯不前，但在1978年后騰飛，速度甚至超過西歐。[[6]](#m6_30)

1800年后生產力大幅增長的原因，一直是研究發展的核心命題。首先是智識環境的巨變，促進了現代自然科學、實用科技、復式簿記、專利法和版權的涌現。最后兩項又是鼓勵不斷創新的微觀經濟制度。[[7]](#m7_29)注重最近兩百年的發展是未可厚非的，但這阻礙了我們對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理解。經濟可以持續增長的假設，使我們重視有助于這種增長的制度和條件，如政治穩定、產權、技術和科研。另一方面，如果假設生產力的改進非常有限，社會就會陷入零和的世界，掠奪他人資源往往變成獲得權力和財富的更佳途經。

這個生產力低下的世界，因英國神職人員托馬斯·馬爾薩斯的分析，而引起世人的注意。他的《人口學原理》初版于1798年，其時他僅32歲。身為八個孩子之一的馬爾薩斯認為，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假設女子“自然”生育率是每人生育十五個小孩），而谷物生產以算術級數增長，這表示人均谷物生產只會下降。馬爾薩斯還認為，農業效率可以提高，但從長遠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長；實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幫助控制人口的增長（那是避孕尚不普遍的世界）；但人口過剩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依靠饑荒、疾病和戰爭。[[8]](#m8_29)

馬爾薩斯的文章出現于工業革命前夕。如上所述，工業革命引發了1800年后生產力的驚人增長，尤其是在開發煤炭和石油的能量上。從1820年到1950年，全球的能源供應增長六倍，而人口僅增長一倍。[[9]](#m9_29)隨著現代經濟世界的出現，馬爾薩斯經濟學遭到普遍貶斥，譬如說它的眼光短淺，對技術進步過度悲觀。[[10]](#m10_29)但是，如果說馬爾薩斯的模式不能用于1800—2000年這段時期，它卻可作為理解此前世界政治經濟的基礎。

作為1800年前經濟生活的一種歷史描述，馬爾薩斯模式必須作出重要調整。埃斯特·博塞魯普認為，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不僅沒有造成饑荒，反而促進了提高效率的技術革新。例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和中國發展出了密集農業模式，實現了大面積灌溉、新高產作物培育和農業工具的改進。[[11]](#m11_29)因此，人口增長本身未必是件壞事。食物供應量與死亡率并沒有直接關聯，除非在大饑荒時期。在抑制人口增長上，疾病一直比饑餓更為重要。[[12]](#m12_29)如食物不夠，人類不必死去，可以縮小身軀來降低對卡路里的需求。[[13]](#m13_28)類似這樣的情形似乎就在上一世代的朝鮮發生過，以應付廣泛的饑荒。[[14]](#m14_28)最后，除了人口過剩，本地環境的惡化也是人均谷物生產下降的原因。對人類社會來說，環境破壞不是什么新鮮事（只是今日的規模前所未有）。過去的社會曾殺盡大型動物、侵蝕表土、顛覆當地氣候。[[15]](#m15_27)

經過上述修改的馬爾薩斯模式可提供良好架構，幫助我們梳理工業革命前的經濟發展。全球人口在過去一萬年中有驚人增長，從新石器初期的大約六百萬，到2001年的六十多億，這是一千倍的增長。[[16]](#m16_27)不過，增長的大部發生在20世紀；講得更確切些，在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1820年之前的經濟增長大都是粗放型的，例如，開墾處女地、給沼澤排水、清除森林、填海造地等。新土地一旦得到開發，產量達到當時技術的限度，生活重又回歸到零和。一人增加資源，他人必須削減，人均產量得不到持續增長。不管是世界整體還是本地居民，絕對增長之后便是停滯不前和絕對下跌。在全世界范圍，人口因疾病而經歷大幅度的滑坡。其中一次發生于羅馬帝國末期，那時它面對野蠻部落的入侵、饑荒、瘟疫。另一次發生在13世紀，蒙古侵占歐洲、中東和中國，并把瘟疫帶到世界各地。在1200年至1400年之間，亞洲人口從大約兩億五千八百萬跌至兩億零一百萬。在1340年至1400年之間，歐洲人口從七千四百萬跌至五千二百萬。[[17]](#m17_26)

如此緩慢的技術進步具有雙刃特性。短期內，它改進生活水平，革新者為此而得益。但較多資源促成人口增加，從而減少人均產量。與革新之前相比，人類平均生活水平并沒得到改善。所以，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從狩獵采集到農業社會的過渡，反而使人類生活越過越糟。雖然谷物生產的潛力大增，但人類的食譜更為狹窄，從而影響健康。他們為生產糧食消耗更多體力，居住在密集地域，為疾病的蔓延提供溫床，等等。[[18]](#m18_25)

### 馬爾薩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在零和的馬爾薩斯世界，人的生存對政治發展有巨大的意義，也與今日的發展大相徑庭。馬爾薩斯式世界的人們雖有資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資機會，譬如促使經濟持續增長的工廠、科學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財富，最好走政治途徑來從事掠奪，即強奪他人資源。掠奪有兩種：享有強制權力的人，可通過征稅或赤裸裸的偷竊，奪走社會其他成員的資源；或將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去攻擊和偷竊鄰近社會。為掠奪而組織起來，增強自己的軍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資于生產能力更為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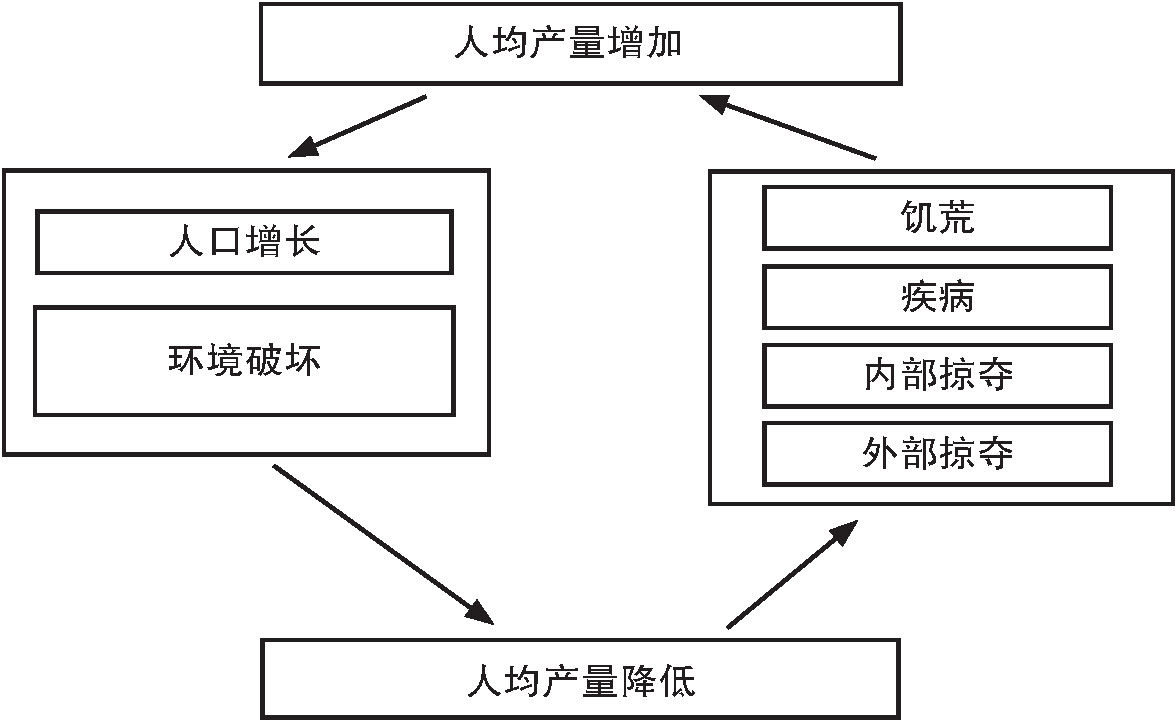


圖8. 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認識到戰爭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馬爾薩斯的經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戰爭在限制人口過剩中的重要性。它作為人口的控制機制，與饑荒和疾病互為表里，因為饑荒和疾病通常由戰爭引起。跟饑荒和疾病不同，掠奪是一種可以由人有意掌控、用以應付馬爾薩斯式壓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學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會中的戰爭和暴力不斷，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環境的支撐能力。換言之，多數人寧可打仗，也不愿挨餓。[[19]](#m19_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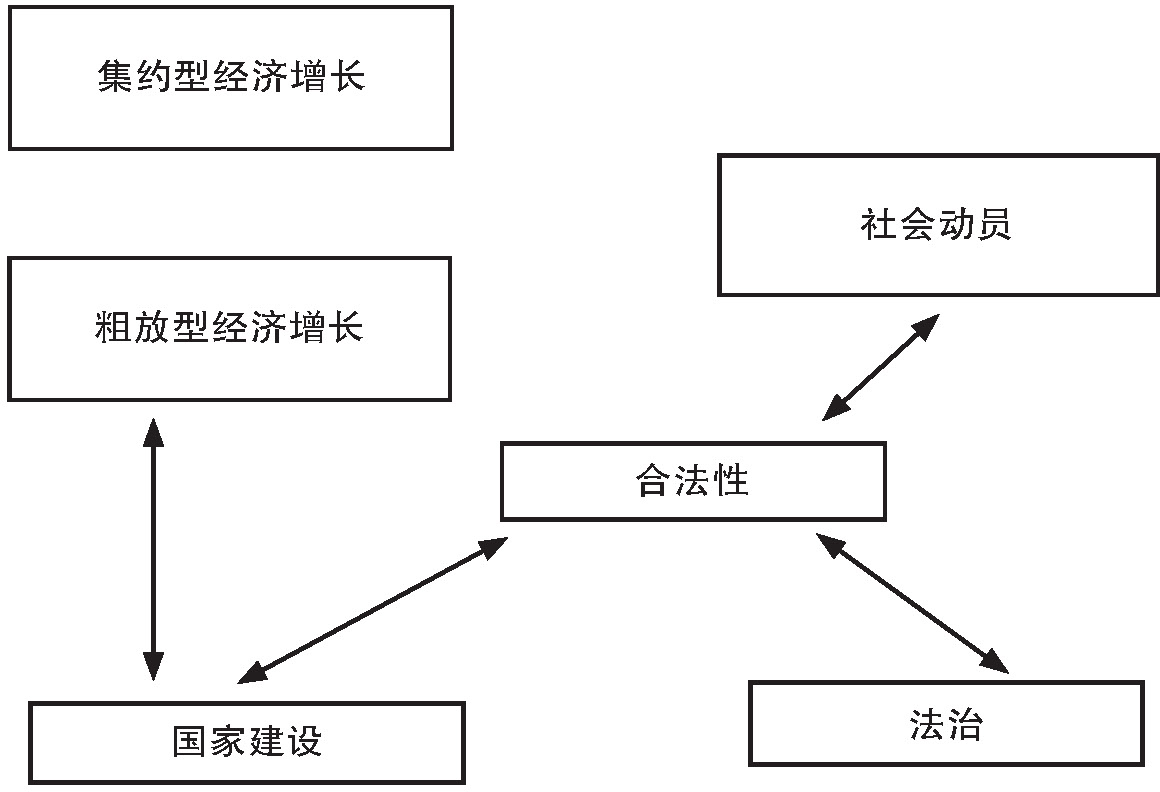


圖9. 馬爾薩斯條件下的發展

馬爾薩斯模式加以擴充后，看去就像圖8。像新作物或農具那樣的技術進步，會暫時提高人均產量。但假以時日，這個增產會被人口增加或環境破壞所抵消，人均產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貧窮的蔓延有四種主要機制：他們忍饑挨餓，體型變小；死于疾病；從事內部掠奪；向其他社群發起進攻（外部掠奪）。然后，人均產量又會上升，因為土地和糧食變得更為充沛，或因掠奪他人而致富。

在沒有持續技術革新的馬爾薩斯式世界中，千萬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導地位。除了掠奪，還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機會。農民和城鎮居民開展貿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務，如治安和互相防衛，會使政府本身和百姓都得到好處。事實上，掠奪要求緊密合作，這一事實又是發展政治組織的最重要動機之一。

圖9表明工業革命之前，馬爾薩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集約型經濟增長單獨處于左上方，沒有任何箭頭指向它。集約型增長全靠技術進步，但這些進步不可預測，發生時間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間隔。對整個制度來說，那時的技術革新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外部因素，獨立發生，與發展的其他任何方面無關。（博塞魯普假設，與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術革新，又使技術革新成為內在因素。但它和人口增長之間，又找不到預測或正比的關系。）所以，所發生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約型的。這表示，隨著時間的流逝，總體的人口和資源有所增長，但不在人均基礎上。

馬爾薩斯式世界中至關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國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強制能力——軍隊和警察——是開展外部掠奪（戰爭和征服）的資源，又可用于國內居民以保障統治者的掌權。反過來，通過征服或征稅而獲得的資源，又可轉換成強制能力。于是，因果關系是雙向的。國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安全和產權，可提高經濟生產力，但僅得一次——即奧爾森所解釋的從流寇變成坐寇——但它無法促使生產力持續增長。

國家權力受合法性的影響，法治和社會動員如要影響政治，全憑作為傳送帶的合法性。在大多數馬爾薩斯式社會，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現。中國、拜占庭帝國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國家，從其控制的宗教權威那里獲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會中，宗教將合法性賦予獨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國家頒發或拒絕法律上的批準。

在馬爾薩斯社會中動員新的社會群體，會比在當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動員惰性社會參與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紀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兩教。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在動員新興精英上發揮了類似作用。在農業社會，宗教經常成為抗議的載體，以反對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僅能提供合法性，還能制造不穩定。

馬爾薩斯式世界中，政治發展的可能性體現在兩條主要途徑上。第一條圍繞國家建設的內部邏輯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政治權力創造經濟資源，后者回過來又創造更為強大的政治權力。這個過程自作循環，直到一個極點：對外擴張的政治體遇上物質上的極限，如地理或技術的；或碰上另外一個政治體；或兩種情形的組合。這就是在中國和歐洲出現的建國和戰爭的邏輯。

政治變化的第二條途徑與合法性有關。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權給新興的社會參與者，以影響國家權力。我所謂的印度彎路，其根源就是婆羅門宗教的興起，它削弱了印度統治者仿照中國方式集中權力的能力。新興的社會參與者一旦獲得宗教授權，既可對國家權力作出貢獻，如阿拉伯人；又可約束君主集權的嘗試，如英國議會。

在馬爾薩斯式世界，變化的來源相對有限。國家建設的過程非常緩慢，在中國和歐洲都持續了好多世紀。它也避不開政治衰敗，政體回到低層次的發展階段，不得不再從頭開始。新興的宗教或意識形態不時出現，但像技術革新一樣，有點靠不住，無法向現存制度提供持續的活力。此外，技術限制了人們和思想在世界上的遷徙和傳播。中國秦始皇發明國家的消息，從沒傳到羅馬共和國領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馬拉雅山脈，抵達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其他制度大多困頓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歐洲、中東和印度的法律傳統都自我發展，很少相互影響。

### 當代條件下的發展

現在讓我們考察一下，發展的不同方面在工業革命開始后如何互動。最重要的變化是持續性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出現，從而影響了發展的幾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經濟增長繼續出現，但在促進政治變化上，其重要性遠遠比不上人均產量。此外，民主加入國家建設和法治的行列，成為政治發展的組件。這在圖10中獲得說明。

這些不同方面在當代世界的客觀關聯已有實質性的研究，可在下列關系中得到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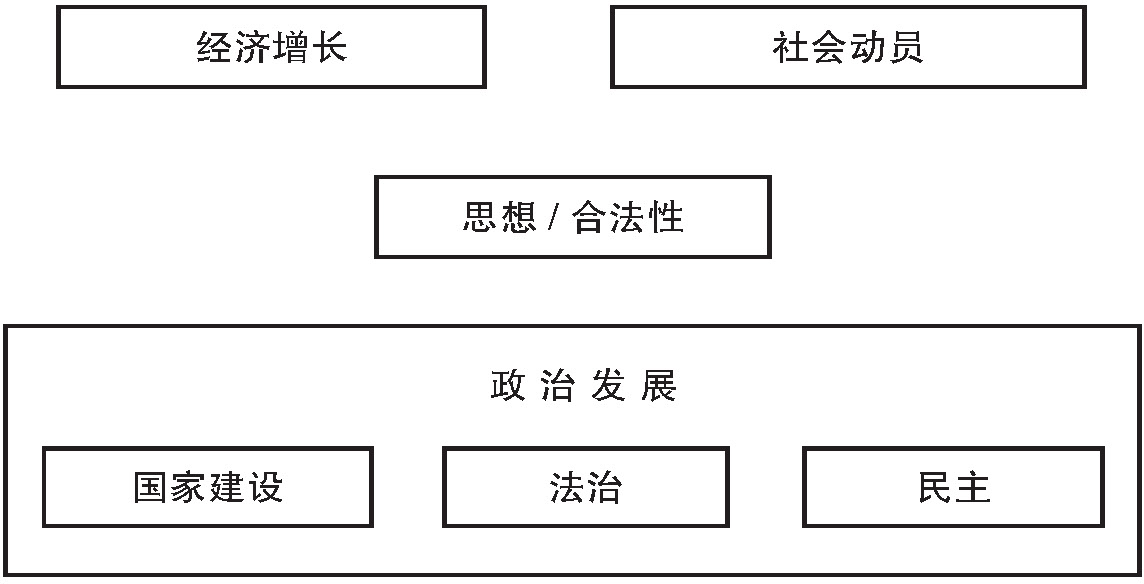


圖10. 發展的諸方面

國家建設和經濟增長之間

國家是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示范了該命題的反面，即國家崩潰、內戰、國際沖突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20]](#m20_23)20世紀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貧窮都得歸罪于國家的薄弱，以及不時發生的癱瘓和動亂。除了建立國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強大的行政能力與經濟增長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處于絕對低水平時（少于1 000美元），國家變得尤其重要。到了較高水平的收入，國家仍然重要，但其影響可能會發生不成比例的改變。已有很多文獻，把良好統治與經濟增長聯在一起。“良好統治”的定義，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異，有時包括政治發展的三大組件。[[21]](#m21_23)

強大凝聚的國家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早已確定，但相互的因果關系卻并不很清楚。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良好統治是內生的，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22]](#m22_23)這聽起來很有邏輯，因為政府是大開支。窮國腐敗泛濫的原因之一是它們付不起好薪水，以致它們的公務員很難負擔家用，所以趨于受賄。政府方面的開支，包括軍隊、通向學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國大約是人均17 000美元，在阿富汗卻只有19美元。[[23]](#m23_22)所以一點也不奇怪，阿富汗的國家遠遠比不上美國，或者，對之大筆援助只會制造腐敗。

另一方面，既有經濟增長沒能促成良好統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統治促成經濟增長的案例。舉韓國和尼日利亞為例。朝鮮戰爭之后的韓國，1954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尼日利亞，后者在1960年從英國手中贏得獨立自主。在接下來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亞的石油收入超過三千億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卻在1975年和1995年之間出現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韓國經濟每年增長7%到9%，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已成為世界上第12大經濟體。這表現上的差異，幾乎完全歸功于韓國政府，它的治理成績遠遠超過尼日利亞。

法治和增長之間

在學術文獻中，法治有時被認作統治的組件，有時被認作發展的方面（我在本書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與經濟增長有關的法治，涉及產權和合同的強制執行。有大量文獻顯示，這個關聯確實存在。大多數經濟學家視之為理所當然，但不清楚，對經濟增長來說，普遍和平等的產權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會中，穩定的產權只為精英而存在，也足以推動經濟增長，至少在一段時間內。[[24]](#m24_21)此外，像當代中國那樣的社會，擁有“足夠好”的產權，雖然缺乏傳統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和穩定民主之間

社會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紀50年代率先注意發展和民主的關聯。自那以后，出現了很多將發展與民主連在一起的研究。[[25]](#m25_20)經濟增長和民主之間的關系可能不是線性的——即更多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產生更多的民主。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顯示，低水平收入時的關聯較強，中等水平收入時的關聯較弱。[[26]](#m26_19)有關發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顯示，從獨裁到民主的過渡，可在發展的任何階段發生，如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遇上逆轉的機會較小。[[27]](#m27_17)

經濟增長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穩定，但逆向的因果關系卻不大明顯。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數數近年來取得經濟增長驚人紀錄的威權政治體——當初仍處于獨裁統治的韓國和臺灣地區，中國大陸、新加坡、蘇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尼、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國家和良好的統治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民主是否發揮同樣的正面作用，就有點含混不清。

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或公民社會發展）之間

很多古典社會理論將現代公民社會的出現與經濟發展聯在一起。[[28]](#m28_15)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市場增長與社會上的分工有關：市場一旦擴展，公司充分利用規模上的經濟效益，社會專業更加精益求精，新興的社會群體（如工人階級）得以涌現。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流動性和開放途徑，打破了很多傳統形式的社會權威，代之以更有彈性的自愿組合。分工愈細所造成的轉型效果是19世紀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

社會動員和自由民主制之間

自托克維爾開始，大量的民主理論認為，如果沒有積極參與的公民社會，現代的自由民主制無法生存。[[29]](#m29_13)組織起來的社會群體，允許形單影只的個人匯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領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標，志愿組織也會有意外效用，幫助培養在新奇環境中彼此合作的能力——通常被稱為社會資本。

上述的經濟增長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過社會動員的途徑來生效。經濟增長促使社會新參與者出現，隨之，他們要求在更為公開的政治制度中獲得代表權，從而推動向民主的過渡。如果政治系統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納這些新參與者，然后可有邁向全面民主的成功過渡。這就是20世紀的前幾十年，隨著農民運動和社會黨的興起，在英國和瑞典所發生的。這也是1987年軍事獨裁垮臺后，在韓國所發生的。

高度發展的公民社會也能成為民主的危險，甚至可以導致政治衰敗。基于民族或種族的沙文主義群體會散播不容忍的偏見；利益群體會盡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經濟沖突和社會沖突的極度政治化會使社會癱瘓，并破壞民主制度的合法性。[[30]](#m30_11)社會動員也可導致政治衰敗。政治制度拒絕社會新參與者的要求，即所謂的亨廷頓式過程，就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高度組織起來的社會群體一再罷免獲選的總統。[[31]](#m31_10)

民主和法治之間

民主的興起和自由主義法治的興起在歷史上一直有密切關聯。[[32]](#m32_9)如我們在第27章所看到的，負責制政府在英國的興起與保衛普通法不可分。越來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護，這一向被視作民主本身的關鍵組成部分。這個關聯在1975年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繼續有效，共產主義專政的垮臺導致了代議民主制的興起和立憲政府的建立，以保護個人權利。

思想、合法性和發展的其他方面

有關合法性的思想，其發展有自己的邏輯，但也受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的影響。如果沒有在大英圖書館奮筆疾書的馬克思，20世紀的歷史可能會相當不同，他對早期資本主義作了系統性的批判。同樣，共產主義在1989年的垮臺，多半是因為很少人繼續信奉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影響了人們對思想合法性的認同。對法國人來說，人權的思想順理成章，因為法國階級結構已發生變化，還有18世紀晚期新興中產階級高漲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機和經濟受挫，破壞了部分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使國家干涉經濟獲得合法性。后來，大福利國家的興起、經濟停滯、由此而生的通貨膨脹，為20世紀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礎。同樣，社會主義無法兌現關于現代化和平等的諾言，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譽掃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動經濟增長，也可獲得合法性。很多迅速發展的東亞國家，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即使沒有自由民主制，也廣受民眾支持。相反，經濟危機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經濟倒退，可能動搖政府的穩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印尼獨裁政府。[[33]](#m33_9)

合法性也有賴于經濟增長的好處分配。如果好處只給處于社會頂端的寡頭小集團，沒有得到廣泛的分享，反而會動員社會群體奮起反對既有的政治制度。這就是波費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專政下的墨西哥。從1876年到1880年，再從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國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長，但產權只適用于富裕精英，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長期內戰創造了條件。其時，弱勢群體為爭取份內的國民收入而奮斗。最近，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領袖的挑戰，后者的政治基礎是窮人和先前遭到邊緣化的群體。[[34]](#m34_9)

### 現代發展的范例

發展的不同方面中有多重關聯，這表示今天有很多潛在的路徑通向現代化，其大部分在馬爾薩斯式環境中是無法想象的。讓我們以韓國為例，它的發展組件得到特別滿意的聚合（參看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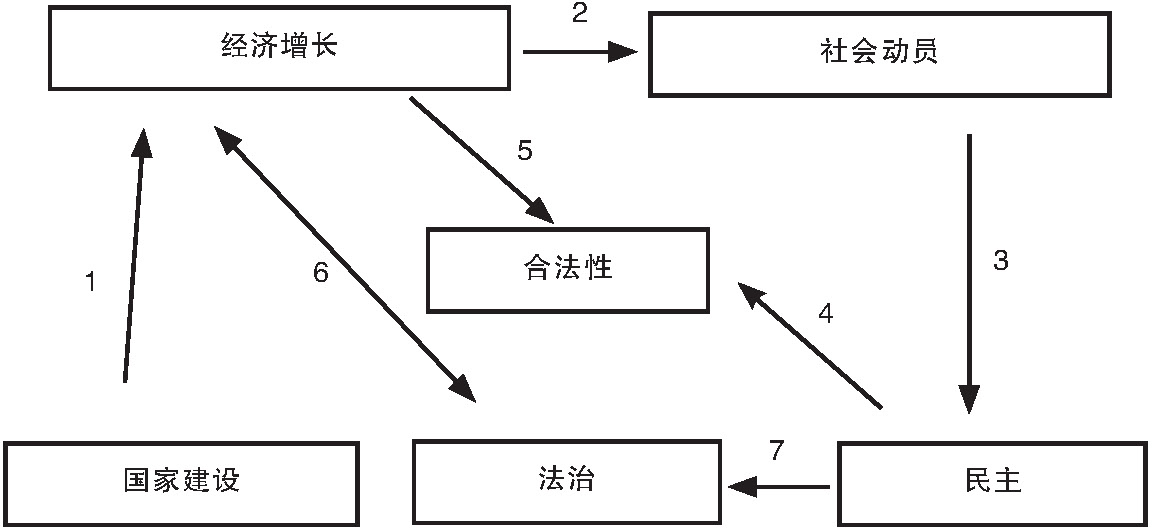


圖11. 1954—1999年的韓國

朝鮮戰爭結束時，韓國有相對強大的政府。它自中國繼承了儒家的國家傳統，并在190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期間建成很多現代制度。[[35]](#m35_8)樸正熙將軍1961年通過政變上臺。韓國在他的領導下，推行工業化政策，以促進經濟的迅速增長（箭頭1）。韓國的工業化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就將一個農業窮國改造成為主要的工業強國，并開啟了新興力量的社會大動員——工會、教會團體、大學生和其他傳統社會所沒有的民間參與者（箭頭2）。全斗煥將軍的軍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鎮壓而喪失合法性，這些新興的社會團體開始要求軍政府下臺。在盟友美國的溫和推動下，1987年軍政府下臺，宣布了總統的首次民選（箭頭3）。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國家的民主過渡，幫助加強了政權的合法性。反過來，這又幫助韓國平安渡過1997—1998年的嚴重亞洲金融危機（箭頭4和5）。最后，經濟增長和民主蒞臨都有助于韓國法治的加強（箭頭6和7）。

在韓國的案例中，如現代化理論所表明的，發展中不同方面傾向于互相支持，彼此加強，盡管有明確的次序，如代議民主制和法治的開始，要等到工業化發生之后。韓國模式未必是普世的，通向現代化還有很多其他路徑。在歐洲和美國，法治存在于國家鞏固之前。在英國和美國，某種形式的民主負責制早于工業化和經濟增長。中國迄今為止走的是韓國路徑，但忽略了箭頭3、箭頭4、箭頭7。1978年鄧小平發動經濟自由化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相當高效的國家。開放政策促使了未來三十年經濟快速增長，數百萬農民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參加工業就業，社會因此而發生巨大的變遷。經濟增長幫助國家取得合法性，并建立公民社會萌芽，但沒有動搖政治制度，也沒有施加民主化的壓力。此外，經濟增長導致了法治的改善，因為中國試圖將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界貿易組織所頒布的標準。中國未來的大問題在于，迅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大動員，會導致對更多政治參與的難以抑制的需求。

### 什么變了

馬爾薩斯經濟條件下的政治發展和工業革命以來的政治發展，兩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異，關鍵是經濟持續密集型增長的可能性。人均產量的增長，其所實現的不只是在國家手中注入更多資源。它還刺激社會的廣泛轉型，動員各式社會新力量，假以時日，將變成政治參與者。相比之下，在馬爾薩斯式的世界中，社會動員非常罕見，要是有，大多源于合法性和思想。

傳統精英鎖在尋租聯合體之中，由此造成功能失調的均衡，社會動員是打破這種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丹麥國王能在18世紀80年代削弱既得利益的貴族的權力，全靠組織良好的有文化農民的涌現——這是世界歷史上的新鮮事，以前只有失序動亂的農民起義。這是工業革命前的社會，動員來源是宗教，打起宗教改革和普遍脫盲的旗號。20世紀80年代，韓國軍隊和商業精英對權力的掌控，因社會新參與者的出現而被打破。二戰后韓國經濟起飛時，這些新參與者幾乎都尚未問世。政治變化因此而來到丹麥和韓國。丹麥的動員似乎是個意外——丹麥國王選擇路德教——而韓國的動員卻是馬爾薩斯式世界中經濟增長的結果，可以預測。在這兩件案例中，社會動員在民主傳播上都有良好影響，但在其他方面，也導致了政治不穩定。

那時的政治發展與現在相比，另一重要差異是國際因素對國內制度的影響。本書所介紹的幾乎所有故事，只涉及單一國家，以及國內不同政治參與者的互動。國際影響基本上是戰爭、征服、征服的威脅，偶爾還有橫跨邊界的宗教傳播。其時的“跨國”機構，像天主教會和伊斯蘭的阿拉伯帝國，在跨越政治邊界傳播《查士丁尼法典》或伊斯蘭教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現代的歐洲人嘗試重新發現古典的希臘和羅馬，這屬于跨代的學習借鑒。但從整個地球看，發展傾向于各自為政，按地理和地域而分。

今天，情況已有很大不同。我們所謂的全球化，只是數世紀來持續開展過程的最新篇章，其間，與運輸、通訊和信息有關的技術在不斷蔓延推廣。獨立發展、幾乎沒有外界輸入的社會，在今天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世界上最隔離最困難的地區，像阿富汗或巴布亞新幾內亞，也不能幸免。國際參與者以外國軍隊、中國伐木公司、世界銀行經理的形式嶄露頭角，不管邀請與否。與以往所熟悉的相比，他們自己也感受到變化的加速。

世界各社會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競爭，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頻繁的政治變化和政治模式的匯聚。特別進化——即新物種形成和增加生物多樣性——發生時，有機體擴散進入明顯不同的微型環境，互相之間又失去聯系。它的反面是生物全球化，暫棲船艙底層的生物從一個生態區域遷徙到另外一個，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斑馬貝、野葛、殺人蜂（Africanized killer bee）都與本土物種展開競爭。這一切，再加上競爭力最強的人類，已導致全球物種數量發生驟減。

這也在政治領域中發生。任何發展中國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發展模式，無須顧及本土的傳統或文化。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試圖輸出各自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到了今天，美國仍有促進民主的項目。此外，還有國家指揮的東亞發展模式和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那樣的國際機構，隨時準備提供關于建立制度的建議，以及資源和技術上的支援，以幫助擴大生產能力。現代的后發達者在制度或政策上無須重新發明車輪。[[36]](#m36_7)

另一方面，壞事也得以輕易跨越邊界——毒品、犯罪、恐怖主義、各式武器、不法資金等。全球化被稱作“主權的黃昏”[[37]](#m37_5)，這未免太夸張。但技術和增長的流動性，使國家很難在自己領土上執法、征稅、規范行為、實施與傳統政治秩序有關的其他操作。在大多數財富仍體現在土地上的時代，國家可對富裕精英施以相當大的影響。今天，財富可輕易逃至海外的銀行賬戶。[[38]](#m38_5)

所以已不可能光談“國家的發展”。在政治學中，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明顯的分支。前者涉及國內發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國家之間的關系。但現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越來越被當作一個綜合體。我們如何到達這一步，政治發展如何在當代世界發生，都將是第2卷的主題。

最終，社會并不受困于自己的過去。經濟增長、社會新參與者的動員、跨邊界社會的組合、競爭和外國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變化的契機。在工業革命之前，這些政治變化要么不存在，要么頗受限制。

然而，社會并不能在一代人時間內自由重組自己。全球化對世界各社會的整合，其程度很容易言過其實。社會之間交換和學習的水平遠遠超越三百年前，但大多數人繼續生活在基于傳統文化和習慣的環境中。社會慣性仍然很大，外國的制度模式雖比過去更加容易得到，但仍需要融入本土。

必須以恰當的眼光看待本書關于政治制度起源的歷史介紹。不應該期望，當代發展中國家必須重蹈中國和歐洲社會所經歷的狂暴步驟，以建立現代國家；或現代法治必須以宗教為基礎。我們看到，制度只是特殊歷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產物，不同處境的社會很難予以復制。它們起源的偶然，建立它們所需的持久斗爭，應讓我們在接受建立當代制度的任務時，備感謙遜。如不考慮現有規則和愿意支持的政治力量，很難將現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會。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電大壩或公路網絡，它需要克服很多困難。首先得說服大家制度變革是必需的；再建立支持者的同盟，以戰勝舊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后讓大家接受新行為準則。通常，正式制度需要新文化的補充。例如，沒有獨立的新聞界和自我組織的公民社會以監督政府，代議民主制將不會行之有效。

孕育民主的環境和社會條件是歐洲的獨特現象，立憲政體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環環相連，脫穎而出。但一旦出現，它造就的政治和經濟體那么強大，以至在全世界得到廣泛的復制。普遍的承認已成為自由民主制的基礎，并指向政治發展的初期。其時，社會更加平等，容納更廣泛的參與。我注意到，與取而代之的國家層次社會相比，狩獵采集和部落的社會提供更多的平等和參與。平等尊敬或同等高貴的原則，一旦獲得明確的闡述，就很難阻止人們提出此類要求。這可能有助于說明，人人平等的概念在現代世界的無情蔓延，一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提出的。

### 今天的負責制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鞏固的原因，與其說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夠，倒不如說是物質和社會條件的缺席，無法促使負責制政府出現。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強大統一、能在領土上執法的國家，又要有強大凝聚、能將負責制職責強加于國家的社會。強大國家和強大社會之間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紀的英國，還是在當代的發達民主國家中。

歐洲早期現代的案例與21世紀初的情形之間有很多平行和對照。自第三波開始以來，欲鞏固權力的未來威權領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會群體，兩者之間發生了頻繁的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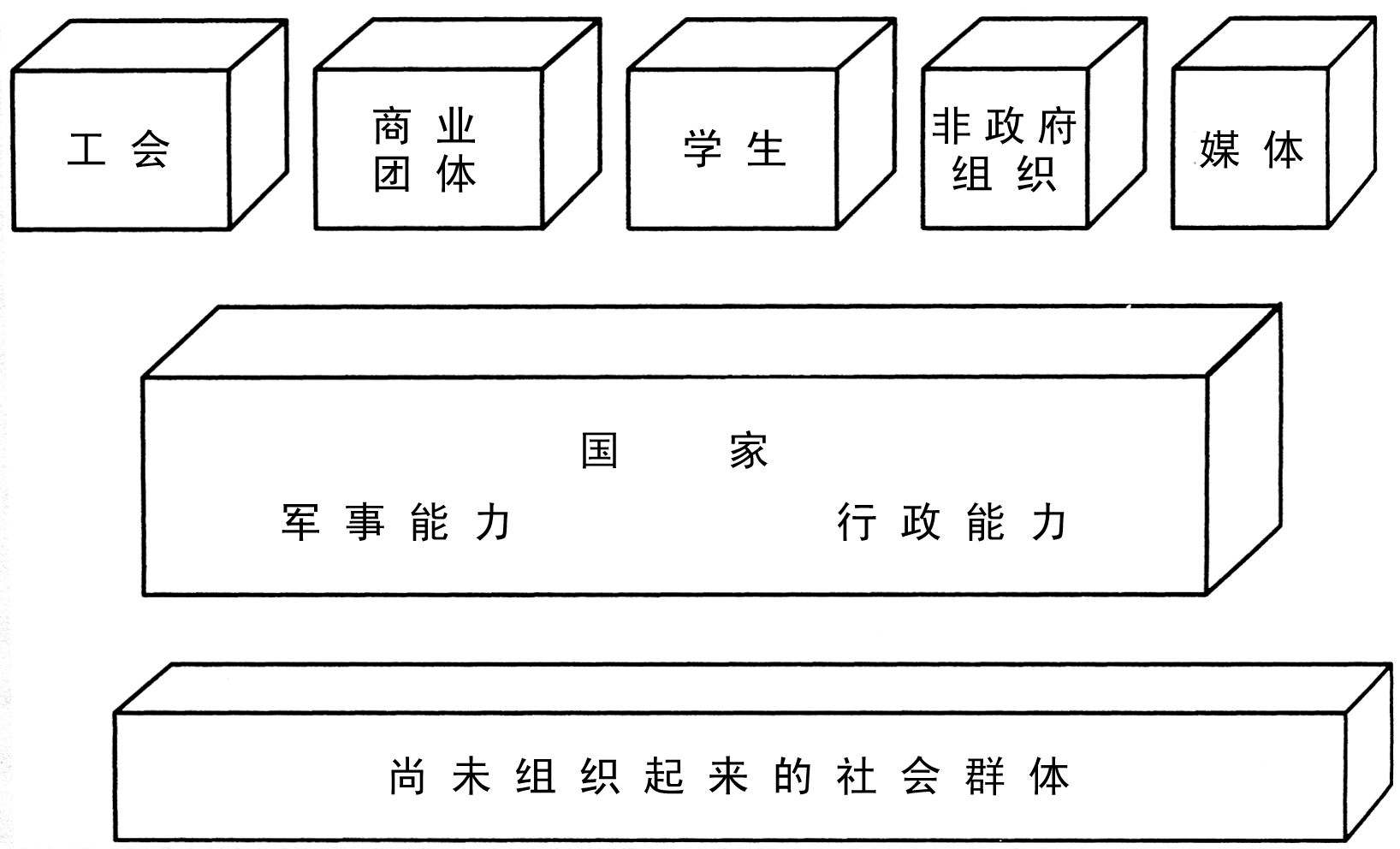


圖12. 今天的政治權力

這是很多蘇聯繼承國的情形，后共產主義的統治者——通常來自前任執政黨——開始重建國家，集大權于己身。這也是委內瑞拉、伊朗、盧旺達、埃塞俄比亞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或2009年總統選舉之后的伊朗，這種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對派聯合不起來，無法阻止專制國家的建立。但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動員起來的政治反對派抵制國家權力，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獲得勝利。在前南斯拉夫，國家徹底崩潰。

早期現代歐洲的情形顯然與21世紀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權化和社會抵抗的相似場景。今天有工會、商業團體、學生、非政府組織、宗教組織和其他社會參與者（參看圖12），以取代貴族、士紳、第三等級、農民。當代社會所動員的社會參與者，與我們研究的農業社會相比，更為廣泛，更加多樣。相關的政治分析，必須弄清國內外不同參與者的性質和凝聚程度。公民社會是否齊心合力和眾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軍隊和情報部門是否忠于政權，或存在愿意與反對派談判的溫和路線派？政權的社會基礎是什么，掌控怎樣的合法性？

今天的國際體系，與我們所研究的早期現代案例相比，對這些斗爭有著更大的影響。反對派群體可從國外獲得資金、訓練、甚至偶爾的武器，而當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國呼吁支持。此外，經濟全球化提供財政收入的其他來源，如自然資源的出租或外援，從而允許政府避開自己的公民。國王和議會的征稅爭執不會在石油豐富的國家發生，可能解釋了它們中極少民主政體的原因。

### 未來會怎樣

就未來的政治發展而言，我們可提出迄今尚無答案的兩個問題。第一個與中國有關。我從一開始就宣稱，現代政治制度由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所組成。擁有全部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中國今天在經濟上迅速增長，但三條之中只擁有一條，即強大的國家。這樣的情境能否長久？沒有法治或負責制，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所引發的社會動員，到底是受控于強大的威權國家，還是激起對民主負責制的強烈追求？國家和社會的平衡長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會能否出現民主？沒有西式的產權或人身自由，中國能否拓展科學和技術的前沿？中國能否使用政治權力，以民主法治社會無法學會的方式，繼續促進發展？

第二個與自由民主制的未來有關。考慮到政治衰敗，在某一歷史時刻取得成功的社會不會始終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認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賴自己的表現。而表現又取決于維持恰當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時的強大國家行為，又要有個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礎，并孕育私營經濟的增長。現代民主制的缺點有很多，呈現于21世紀早期的主要是國家的軟弱。當代民主制太容易成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規定，無法作出困難的決策，以確保自己經濟和政治的長期生存。民主的印度發現，很難整修自己行將崩潰的公共基礎設施——道路、機場、供水和排污系統等——因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選舉制度橫加阻撓。歐盟的重要成員發現，顯然已負擔不起自己的社會福利，但無法作出削減。日本累積了發達國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債，仍然沒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經濟中阻礙未來增長的僵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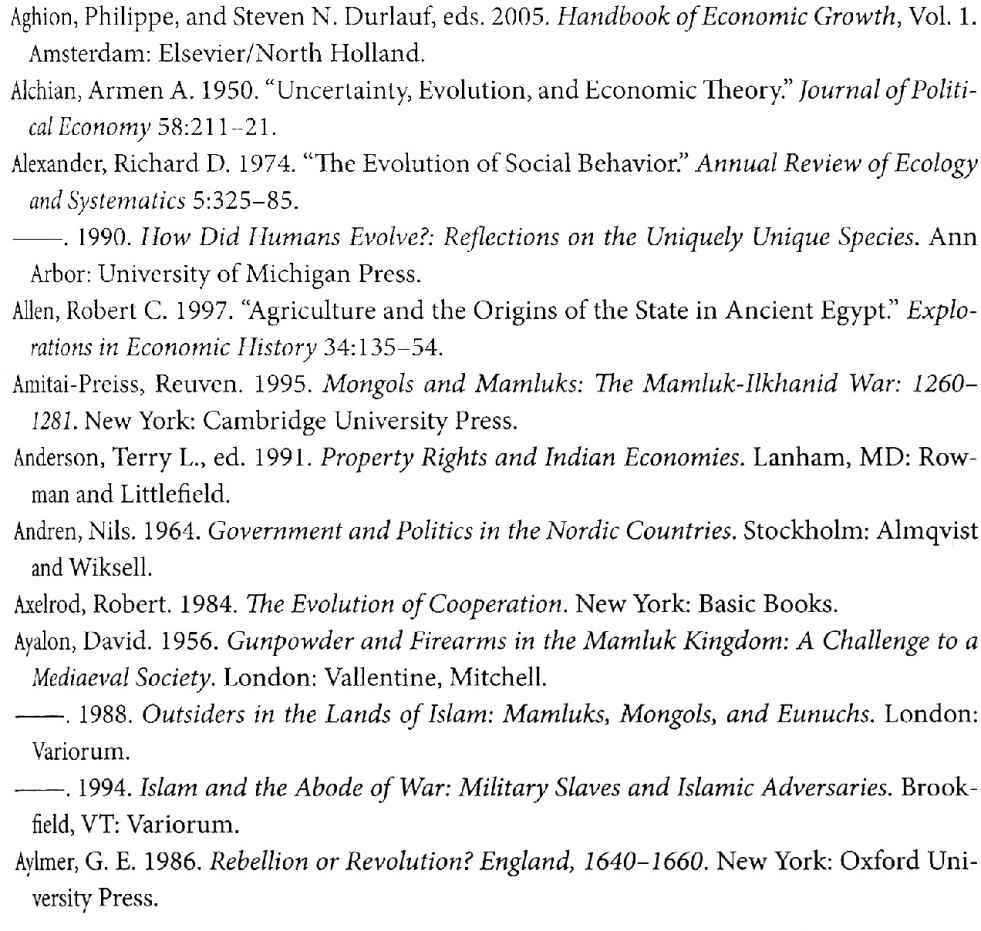
還有美國，它無法認真處理長期的財政難題，像健康、社會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調的政治均衡。每個人都同意，必須解決長期的財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稅或削減開支，仍受到強大利益群體的阻撓。國家制度的設計基于相互制衡，使難題的解決變得尤其困難，加上美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僵硬，使之束縛于既定的對策范圍。盡管出現這些挑戰，美國不太可能重蹈法蘭西王國的覆轍，即公職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權宜之計，推遲而不是避免最終的危機，像法國政府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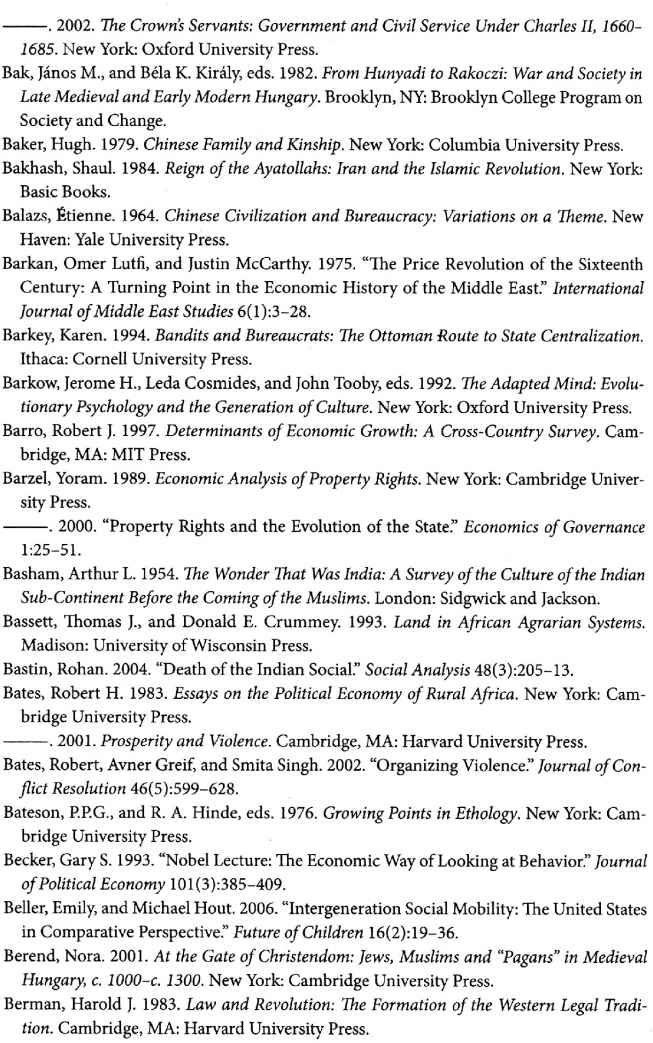
現在回頭看，制度的最初出現是為了歷史上不確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傳開來，因為它們能滿足某種意義上的普遍需求。這就是為何制度在歷史上得以互相結合，為何可以提供政治發展的概論。但制度的繼續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個人口中位年齡在二十幾歲的迅速增長的國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適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齡的停滯社會。如果制度無法適應，社會將面臨危機或崩潰，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還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視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負責制的社會將勝過沒有政治負責制的。政治負責制為制度的改善提供和平途徑。中國政治制度在王朝時期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壞皇帝”，像武則天或萬歷皇帝。英明領導下的威權制度，可能不時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為它可作出快速決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機關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決于英明領袖的持續出現。如有壞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權很容易導致災難。這仍是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其負責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這里所提供的制度發展的歷史介紹，必須對照工業革命后的不同條件。在某種意義上，我已經重新洗過牌，以便直接解說和修正《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問題。工業化發軔后，經濟增長和社會動員取得極為迅速的進展，大大改變了政治秩序三個組件的發展前景。這將是我在第2卷解說政治發展時所用的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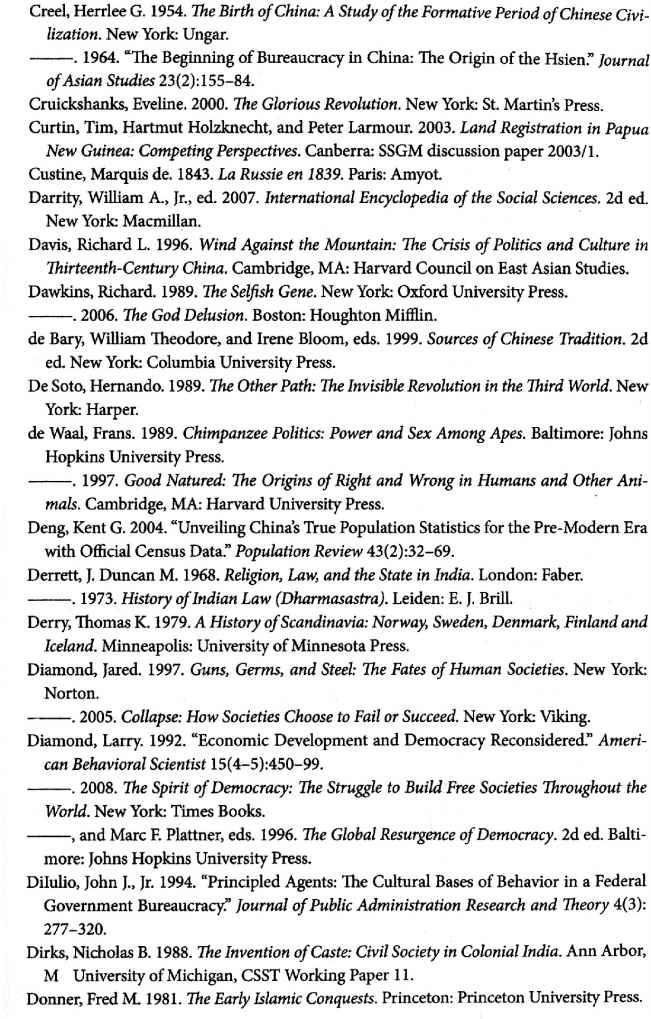
#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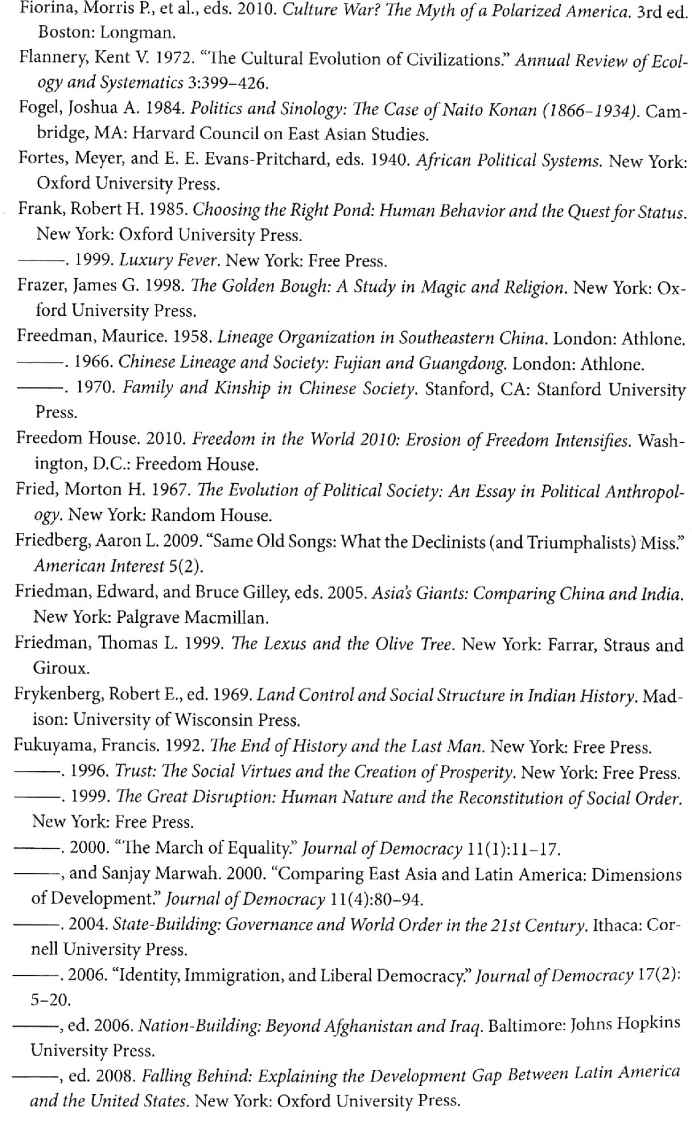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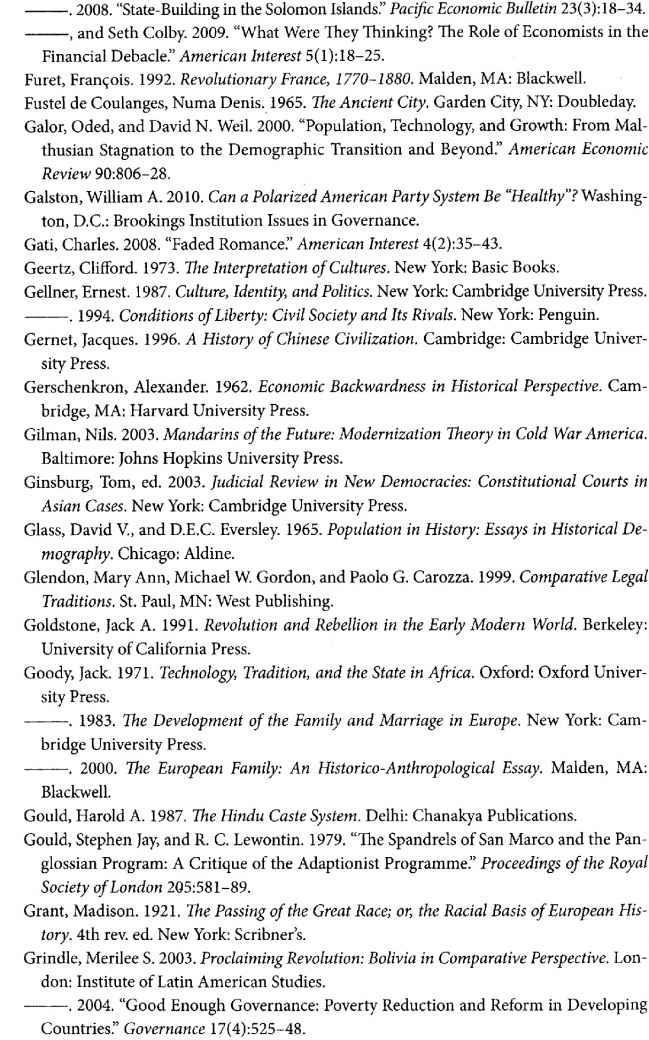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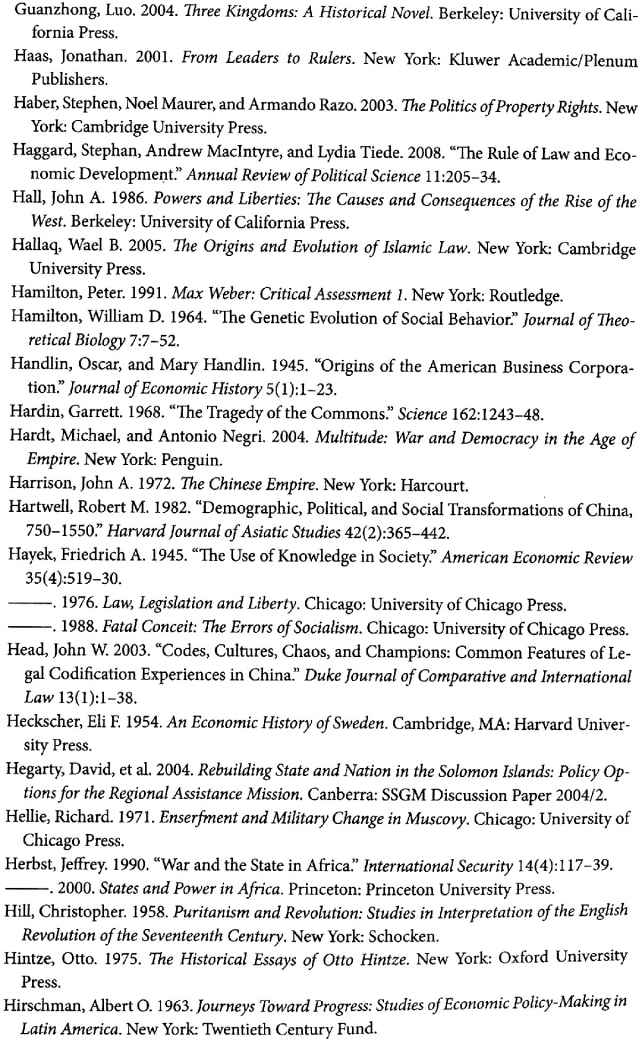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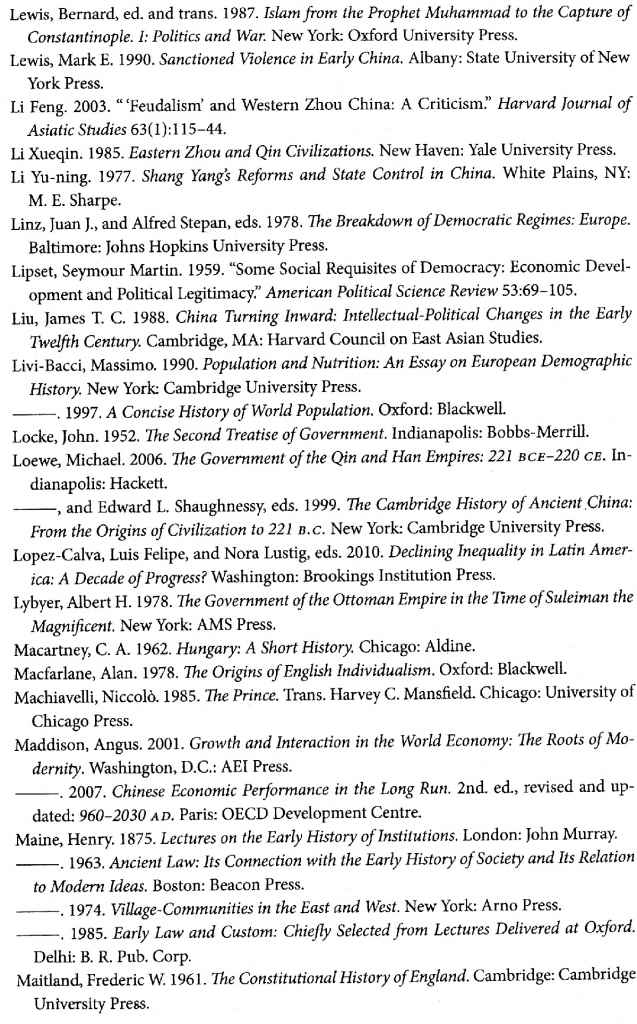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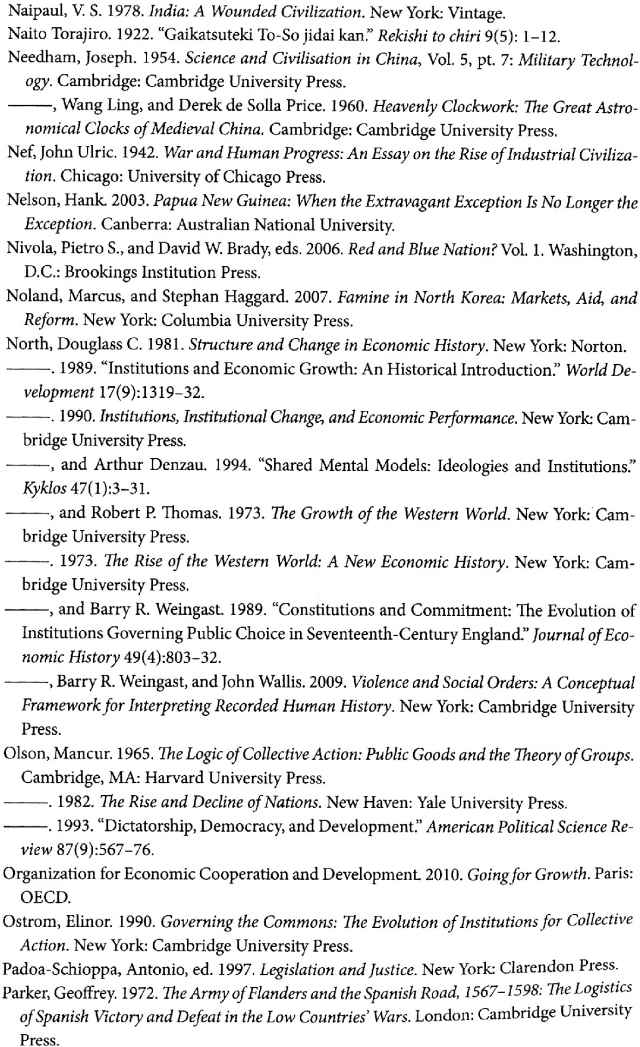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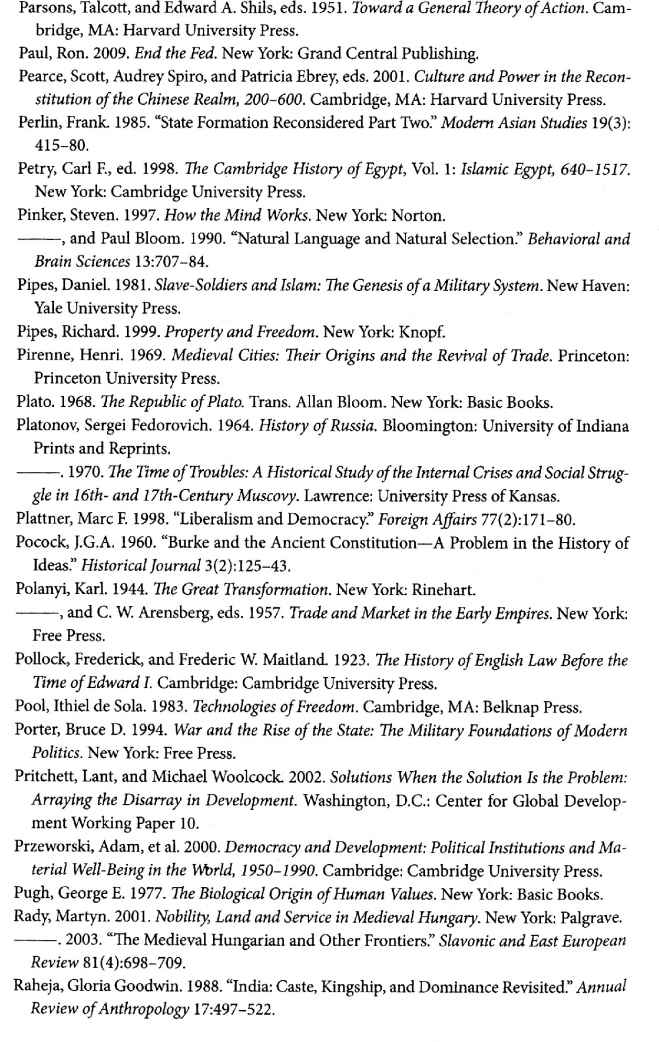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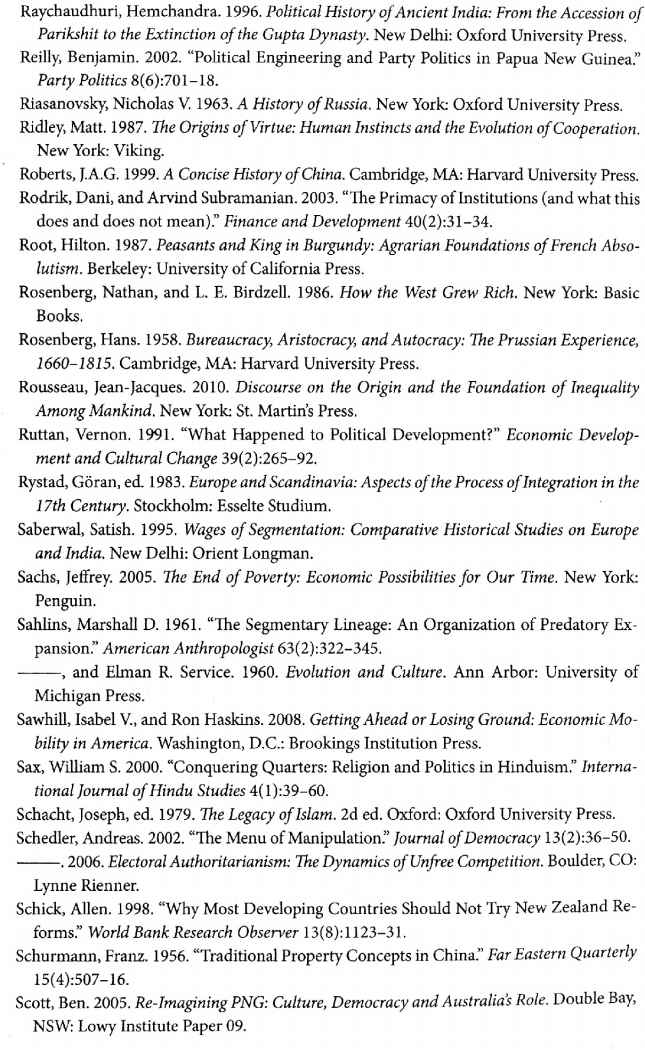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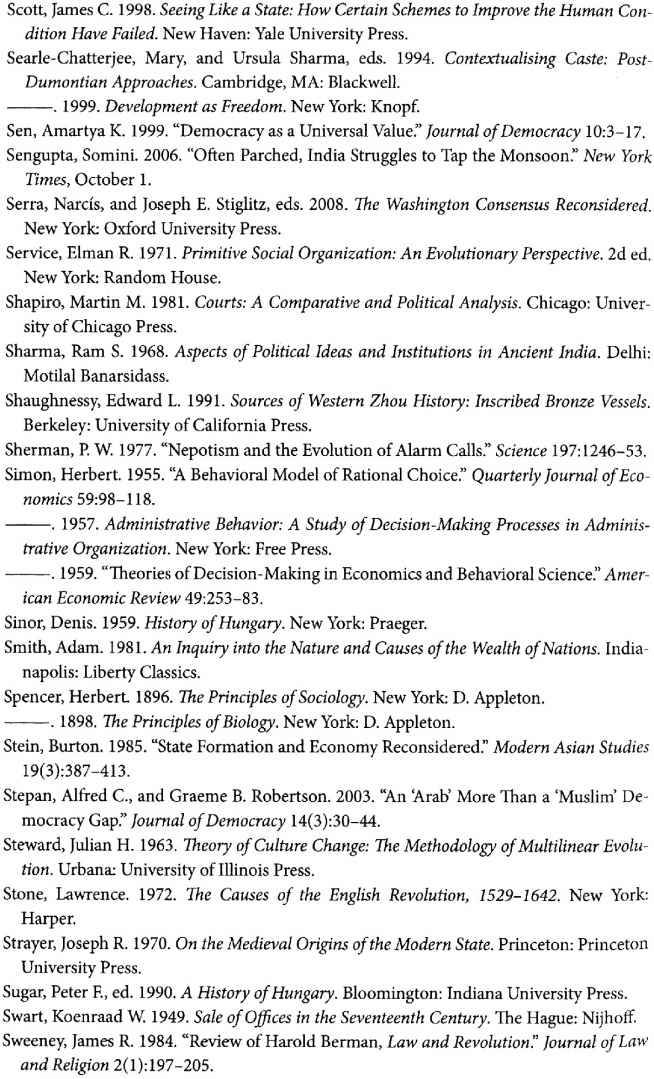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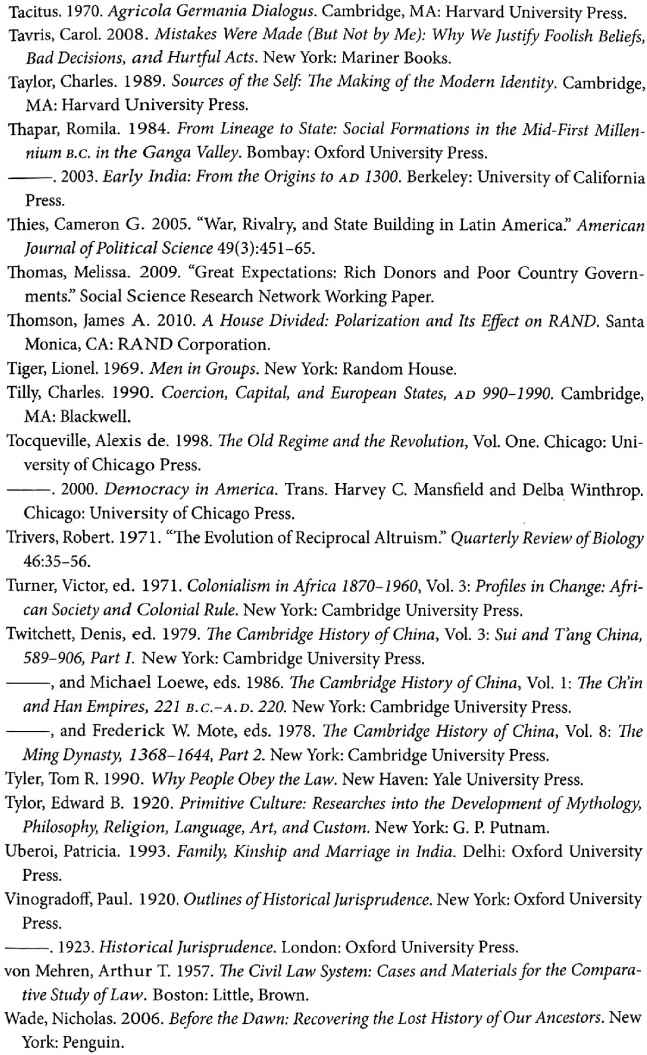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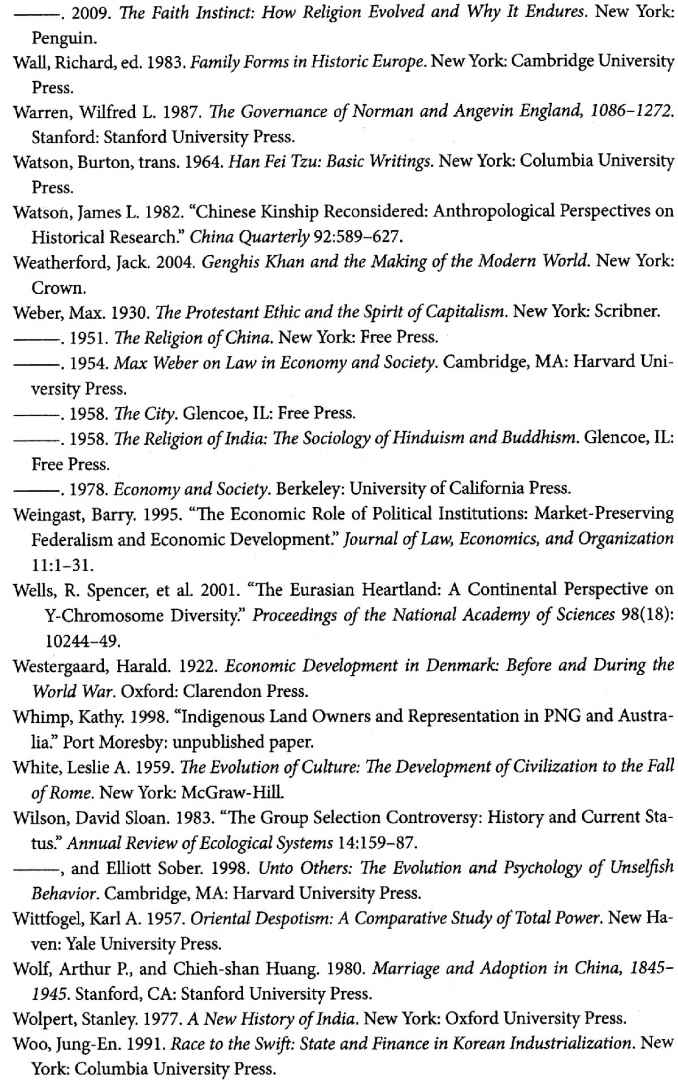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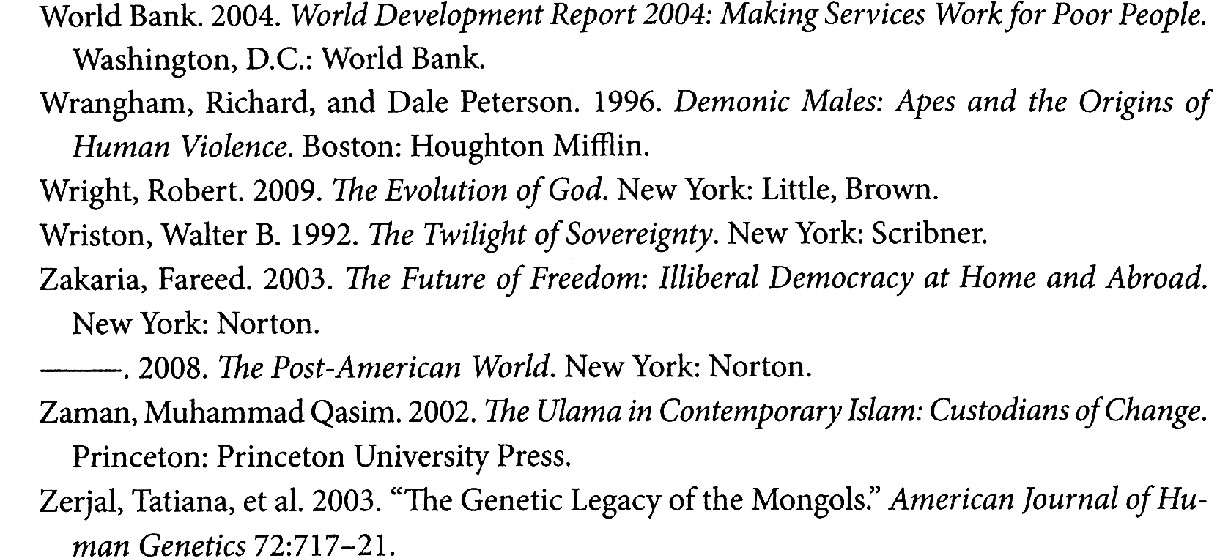












# 致謝

如果沒有諸多人士和機構的鼎力相助，本書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我構思和起草本書時，仍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擔任教授，并兼任其國際發展項目的主任，該學院為我的苦思和下筆提供了良好環境。對研究院以及院長Jessica Einhorn所提供的支持，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在高等國際研究院筆耕本書的同時，我還在各地課堂中演講它的主題，包括丹麥的奧胡斯大學、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從中獲得了很多頗有價值的反饋。

我要感謝Farrar，Straus ＆ Giroux出版公司發行人Jonathan Galassi的支持，感謝其編輯Eric Chinskj的幫助。Eric 是一位非常體貼、富有同情心的讀者，促使我在本書中全面考量眾多的重要課題。對我的版權代理人，即國際創意管理公司的Esther Newberg和柯蒂斯·布朗公司的Betsy Robbins，我一如既往地心抱感激。他們的鼎力相助，方使本書和我的其他著作成為現實。

我還要感謝襄助我完成本書的下列人士：Seth Colby、Mark Cordover、Charles Davidson、Larry Diamond、Nicolas Eberstadt、Adam Garfinkle、Saurabh Garg、Charles Gati、Mary Ann Glendon、Francisco Gonzalez、George Holmgren、Steve Kautz、Sunil Khilnani、Pravin Krishna、Ove Korsgaard、Steven LeBlanc、Brian Levy、Peter Lewis、Arthur Melzer、Rick Messick、Jørgen Møller、Mitchell Orenstein、Donna Orwin、Uffe Øtergård、Bruce Parrott、Steven Phillips、Marc Plattner、Jeremy Rabkin、Hilton Root、Nadav Samin、Abe Shulsky、Georg Sørensen、Melissa Thomas、Avi Tuschman、Justin Vaisse、Jerry Weinberger、Jason Wu和Dick Zinman。更有下列人士充任我的研究助手：Khalid Nadirj、Kevin Croke、Michael Leung、Matt Scharf、Bryan Prior、Purun Cheong和Kamil Dada。Mark Nugent為本書的地圖作出重大努力。我也要感謝我在高等國際研究院的助理Robin Washington，不管是本書還是我的其他著作，都曾得到她的大量幫助。最后，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和孩子茱麗、大衛和約翰，在本書成形的進程中評讀了本書的部分章節，始終在旁充任我的啦啦隊。

于加利福尼亞州帕洛奧托鎮

理想國譯叢

001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南非]德斯蒙德·圖圖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

　　　[南非]納爾遜·曼德拉 著

003　斷臂上的花朵: 人生與法律的奇幻煉金術

　　　[南非]奧比·薩克斯 著

004　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英]蒂莫西·加頓艾什 著

007　蘇聯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愛爾蘭]康納·奧克萊利 著

008　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荷]伊恩·布魯瑪 著

010　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

　　　[荷]伊恩·布魯瑪 著

013　檔案：一部個人史

　　　[英]蒂莫西·加頓艾什 著

014　布達佩斯往事：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

　　　[美]卡蒂·馬頓 著

015　古拉格之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

　　　[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016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遇見理想國

官 網：http://www.ilixiangguo.com/

微 博：http://weibo.com/bbtbook

天貓店：https://lixiangguo.tmall.com

|  |  |  |
| --- | --- | --- |
| 理想國公眾號 好文 影像 活動 共讀 共賞 共享 |  | image00378.jpeg |
|  |
|  |
| 理想國服務號 兌圖書　換周邊 看視頻　享優惠 |  | image00353.jpeg |

